SIPRI 年鉴 2019

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www.sipriyearbook.org

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是一个致力于研究冲突、军备、军备控制和裁军的独立国际机构。SIPRI 成立于 1966 年，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媒体和感兴趣的公众提供数据、分析和建议。董事会对研究所出版物中表达的观点概不负责。

董事会

扬・埃利亚松大使，主席(瑞典)
黛维・福图纳・安瓦尔博士(印度尼西亚)
弗拉基米尔・巴拉诺夫斯基博士(俄罗斯)
埃斯彭・巴特・艾德(挪威)
让・玛丽・格埃诺(法国)
库马尔博士(印度)
帕特里夏・刘易斯博士(爱尔兰/英国)
杰西卡・塔奇曼・马修博士(美国)

所长

丹・史密斯（英国）

伊恩・戴维斯博士 执行编辑
乔伊・M・福克斯女士 主编
编辑
约翰・巴索，弗兰克・埃斯巴拉加，安德鲁・马什，安妮卡・索尔兹伯里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
SE-169 72 索尔纳，瑞典
电话: + 46 8 655 9700
电子邮箱: sipri@sipri.org
网址: www.sipri.org

牛津大学出版社

克拉伦登街，牛津大学 OX2 6DP，
英国

牛津大学出版社是牛津大学下辖出版机构。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出版高质量研究、学术和教育方面出版物，进一步促进完成牛津大学之目标。Oxford 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注册商标。
©2016 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作者的道德权利主张：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 SIPRI 事先许可，或者法律明确允许，或根据条款与适当复制权组织达成一致情况下，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转载、保存于检索系统中，或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传播。关于上述范围以外的复制问询请发送至:
SIPRI, Signalistgatan 9, SE-169 72 索尔纳, 瑞典

您不得以任何其他形式散布本书，您必须对任何受让方施加相同的条件。

英国图书馆编目出版数据
数据
国会图书馆编目出版数据
数据
ISBN 978‐0‐19‐883999‐6
排版，由 SIPRI 首创
英国印刷
CPI 集团(英国)有限公司，克罗伊登，CRO 4YY
牛津提供第三方网站链接，仅供参考。 牛津对本作品中引用的任何第三方网站所载资料不承担任何责任。
SIPRI 年鉴 2019 也可见网络版
http://www.sipriyearbook.org

目录

序言 1
缩写和惯例 3
SIPRI 年鉴在线 6
简介 8
第一章 概述：2018 年国际稳定与人类安全 9
第 1 节.核军备控制危机 10
第 2 节.核不扩散关切 13
第 3 节.使用化学武器 16
第 4 节.国际紧张局势与大国博弈 18
第 5 节.人类安全与国际合作 21
第 6 节.结语：年鉴第 50 版 24
第一部分：2018 武装冲突和冲突管理 30
第二章.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 31
概述 31
第 1 节.2018 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回顾 34
第 2 节.美洲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 43
第 3 节.亚洲和大洋洲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 50
第 4 节.欧洲武装冲突和和平进程 68
第 5 节.中东和北非武装冲突和和平进程 77
第 6 节.撒哈拉以南非洲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 107
第三章.和平行动和冲突管理 132
概述 132
第 1 节.和平行动全球趋势和发展 133
第 2 节.和平行动区域趋势和发展 145
第 3 节.2018 年多边和平行动表 161
第二部分 军费与军备 2018 164
第四章 军费开支 165
概述 165
第 1 节.全球军费情况 167
第 2 节.军费透明度 192

第五章.国际武器转让和武器生产 199
概述 199
第 1 节.2018 年全球武器转让趋势 1 200
第 2 节.2018 武器供应国 204
第 3 节.2018 武器接收国 220
第 4 节.武器转让透明度 235
第 5 节.各国武器出口的金融价值 241
第 6 节.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 246
第六章 世界核力量 258
概述 258
第 1 节.美国核武装力量 260
第 2 节.俄罗斯核武装力量 270
第 3 节.英国核武装力量 279
第 4 节.法国核武装力量 282
第 5 节.中国核武装力量 285
第 6 节.印度核力量 292
第 7 节.巴基斯坦核力量 298
第 8 节.以色列核武装力量 303
第 9 节.朝鲜核武装力量 306
第 10 节．2018 年全球裂变材料库存及生产 314
第三部分：2018 不扩散、军备控制及裁军 320
第七章 核军控和不扩散 321
概述 321
第 1 节.朝美核外交 323
第 2 节.美俄核军备控制与裁军 329
第 3 节.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执行情况 336
第 4 节.禁止核武器条约 344
第 5 节.核军控、裁军和不扩散多边条约和倡议相关事态发展 347
第八章.化学和生物安全威胁 351
概述 351
第 1 节.叙利亚化武指控 353
第 2 节.斯克里帕尔案：英国有毒化学品刺杀案 360

第 3 节.化学武器：军备控制与裁军 368
第 4 节.生物武器裁军和不扩散 380
第九章.全球常规军备控制机制 390
概述 390
第 1 节.特定常规武器和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公约 392
第 2 节.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弹药 403
第 3 节.小武器和轻武器管制措施 410
第 4 节.联合国秘书长启动新裁军议程 415
第 5 节.网络军控与适应力 418
第十章. 军民两用和武器贸易管制 435
概述 435
第 1 节.武器贸易条约 437
第 2 节.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多边禁运 444
第 3 节.出口管控制度 452
第 4 节.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 461
第 5 节.控制技术转让和外国直接投资：出口管控的局限性 466
附件 473
附件 A.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 474
第 1 节.普遍性条约 475
第 2 节.区域性条约 501
第 3 节.双边条约 513
附件 B 国际安全合作机构 517
第 1 节.全球性机构或成员国 518
第 2 节.区域性机构及成员国 529
第 3 节.战略性贸易控制机制 544
附件 C. 2018 年表 548
作者简介 569

序言

本册为 SIPRI 年鉴的第 50 版，我们谨以此书献给 SIPRI 创始董事、SIPRI 年鉴之父罗伯特·尼尔德（1924-2018）。罗伯特曾在第一版中写道："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一个权威国际机构对国际军费支出最新趋势、军备竞赛技术发展以及军控或裁军或成功或失败的种种努力进行系统的梳理"。50 载回眸，罗伯特夙愿已变为现实，SIPRI 已然成为全球公认的和平安全事务权威。

SIPRI 年鉴 2019 付梓，国际形势普遍紧张，全球秩序日益动荡。一边是同俄罗斯对抗的不断加深，一边是欧洲迎来"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100 周年。美国宣布退出两大核心军控条约：1987 年禁止美俄中程核导弹的《中短程导弹国家条约》（INF 条约）和 2015 年阻断伊朗核武道路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尽管世界三大武装冲突（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

让人们目睹太多人间惨剧，但沙特记者被杀依旧激起了人们的出离愤怒，也为也门和平协议带来一线曙光。此外，尽管阿富汗林林总总的和平进程波折不断，但也是在朝着积极方向推进，叙利亚武装冲突明显缓和。也门、叙利亚、阿富汗三地占到全球 2018 年所有有组织暴力事件一半以上。巴以关系恶化也标志着这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步入第 70 个年头。

尽管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总体而言世界倾向越来越为动荡。面对人类安全和国际稳定面临的种种挑战，需要在政策制定中引入强力询证手段。呈现确凿的事实一直是年鉴的核心宗旨，在一个错误信息和"假新闻"满天飞的时代，这点尤为重要。和平、安全和冲突呈现出多维度、覆盖广的特点。SIPRI 的各类出版物也体现出这一特点。年鉴对 2018 年国际和平、安全与冲突领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并对相关背景信息进行了呈现。

序言（第 1 章）反映出 2018 年国际趋势依旧呈现出令人担忧的态势。年鉴第 1 部分侧重武装冲突和冲突管理，旨在抓住冲突升级和建设和平的关键时点和趋势。第 2 章侧重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第 4 章侧重多边和平行动。

第 2 和第 3 部分侧重军备和裁军相关问题。这一领域的许多工作都是严格基于第一手数据收集---SIPRI 数据库。第 2 部分专门论述军费支出及军备，其中包

括对最新军费支出趋势评估（第 4 章）、国际武器转让和武器生产（第 5 章）。第 6 章详细介绍了世界核力量和当前核现代化计划。第 3 部分涉及不扩散、军控和裁军。第 7 章涉及朝美核外交、俄美核军控进展，包括《中导条约》以及伊朗继续执行 JCPOA。第 8 章讨论叙利亚化武使用，英国神经毒剂未遂暗杀事件以及化学和生物武器安全威胁。第 9 章概述了常规武器控制的全球机制，包括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和国际网络安全规范的最新讨论。第 10 章涉及加强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贸易管控的各类措施。

总而言之，SIPRI 年鉴涉猎人类社会当今面临的最紧迫问题。SIPRI 将继续致力于发挥年鉴最大作用，使之成为信息透明和问责的最佳手段。有鉴于此，年鉴多年来陆续被译为阿拉伯文、中文、俄文和乌克兰文。

SIPRI 年鉴顺利付梓，背后是许多人的辛勤工作。SIPRI 年鉴 2018 共有作者 24 名，年鉴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内外部资料查证引用。专业的编辑团队确保年鉴最高水准的呈现。SIPRI 外联、图书馆、运营及 IT 人员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年鉴默默奉献。在此，我谨借此机会向所有为年鉴作出贡献的人们，致以我最崇高的谢意。

1969 年 9 月，第一本 SIPRI 年鉴面世，开启了年鉴 50 载大幕。世界农业、世界经济等此类年鉴早已并不鲜见，但世界军备和裁军年鉴却始终空缺。50 年后，SIPRI 年鉴依旧是国际安全、军备和裁军等重要领域提供深入、权威开放信源的第一人。即便步入鼠标轻点，便可轻松获取各类“事实”的数字时代，SIPRI 对铁证事实的不懈追求依旧是对全球公益不可或缺的承诺。

丹·史密斯

SIPRI 斯德哥尔摩，2019 年 7 月

缩写和惯例

ABM	反弹道导弹
ACV	装甲战斗车
AG	澳大利亚集团
ALCM	空基巡航导弹
APC	装甲运兵车
APEC	亚太经合组织
APM	反步兵地雷
APT	东盟 10+3
ARF	东盟地区论坛
ASAT	反卫星计划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ATT	武器贸易条约
ATTU	大西洋到乌拉尔(地区)
AU	非洲联盟
BCC	双边协商委员会（俄美新条约）
BMD	弹道导弹防御
BSEC	黑海经济合作组织
BTWC	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BW	生物武器/战争
CADSP	非洲共同防务和安全政策
CAR	中非共和国
CBM	互信机制
CBRN	化学、生物、放射和核
CBSS	波罗的海国家委员会
CBW	化学和生物武器/战争
CCM	集束弹药公约
CCW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CD	裁军谈判会议
CDS	南美洲防务理事会
CEEAC	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CFE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CFSP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CICA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COPAX	中非和平与安全委员会
CSBM	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CSDP	共同安全与防御政策(欧盟)
CSTO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TBT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CTBTO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CTR	减少威胁合作计划
CW	化学武器/战争
CWC	化学武器公约
DDR	解除武装、遣散、重新融入社会
DPKO	联合国维和行动
DPRK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
DRC	刚果民主共和国
EAEC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ato）
EAPC	欧洲-大西洋合作委员会
ECOWA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DA	欧洲防务署
ENP	欧洲睦邻政策
ERW	战争遗留爆炸物
EU	欧盟
FATF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MCT	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
FSC	安全合作论坛（隶属欧安组织）
FY	财政年度
FYROM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G7	七国集团(工业化国家)
GCC	海湾合作委员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GE	政府专家组
GLCM	陆基巡航导弹
GNEP	全球核能伙伴计划
GTRI	全球减少核威胁倡议
GUAM	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
HCOC	海牙行为准则
HEU	高浓铀
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
ICBM	洲际弹道导弹
ICC	国际刑事法庭
ICJ	国际法庭
ICTR	卢安达国际刑事法庭
ICTY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IED	简易爆炸装置
IFS	稳定工具
IGAD	政府间发展组织
IGC	政府间会议
INDA	国际防扩散和裁军援助
INF	中程核力量条约
IRBM	中程弹道导弹
ISAF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JCG	联合磋商小组（欧共体条约）
LEU	低浓铀
MANPADS	便携式防空导弹
MDG	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
MIRV	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载具
MOTAPM	反车辆地雷
MRBM	中程弹道导弹
MTCR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NAM	不结盟运动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BC	核能、生物和化学（武器）
NGO	非政府组织
NNWS	无核武器国家
NPT	不扩散条约
NRF	北约反应部队
NSG	核供应国集团
NWFZ	无核区
NWS	核武国家
OAS	美洲国家组织
OCCAR	联合军备合作组织
ODA	政府开发援助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HCHR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OIC	伊斯兰合作组织
OPANAL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
OPCW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OSCC	天空开放咨询委员会
OSCE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P5	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
PFP	和平伙伴关系
PSC	和平与安全委员会(非洲联盟)
PSC	私营安保公司
PSI	防扩散安全倡议
R&D	研究与开发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LW	小武器和轻武器
SAM	地空导弹
SCO	上海合作组织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
SCSL	塞拉利昂特别法庭
SICA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SLBM	潜射弹道导弹
SLCM	海基巡航导弹
SORT	美俄裁减战略攻击武器条约
SRBM	近程弹道导弹
SRCC	次区域磋商委员会
SSM	地对地导弹
SSR	安全部门改革
START	战略武器削减条约
TLE	条约限制设备
UA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NASUR	南美洲国家联盟
UAS	无人机系统
UAV	无人航空载具
UCAV	无人战斗机
UN	联合国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HCR	联合国高级难民事务专员办事处
UNODA	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
UNROCA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WA	瓦森纳协议
WMD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WMDFZ	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域

惯例

.. 数据无法获取或不适用

- 零或可忽略的图形

() 不确定数据

b. 十亿（千百万）

kg 千克

km 公里（1000 米）

m. 百万

th. 千

tr. 兆

$ 美元

€ 欧元

地理区域和次区域

非洲　由北非（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但不包含埃及）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组成

美洲　由北美洲（加拿大和美国），中美洲和加勒比（包括墨西哥）和南美洲组成

亚洲和大洋洲　由中亚，东亚，大洋洲，南亚（含阿富汗）和东南亚组成

欧洲　由东欧（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西欧和中欧（与东南欧）组成

中东　由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国家组成

SIPRI 年鉴在线

www.sipriyearbook.org

SIPRI 年鉴全部内容也可以在线获取。 通过 SIPRI 年鉴在线，您可以：

- 可通过您的笔记本电脑或手持设备，随时获取 SIPRI 年鉴完整信息
- 使用高级搜索和浏览功能轻松阅读
- 轻松搜索所需内容:对整个 SIPRI 年鉴和您的特定信息进行搜索
- 节省您宝贵的时间:使用您的个人资料，对搜索历史以及内容实时保存
- 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工具，轻松地与同事和学生分享
- 通过以下参考资料和网络资源提升您的研究，链接如下

如何在线访问 SIPRI 年鉴

机构订阅

SIPRI 年鉴网络版可通过一次性付费或年度订购的方式供全世界各机构使用。图书馆管理者和中央资源协调者可根据以下联系方式联系牛津大学出版社获取报价，或可注册获取免费试读资格。<http://www.oxfordonline.com/freetrials/>.

个人订阅

全世界所有个人均可以 12 个月一次性付费方式订购 SIPRI 年鉴网络版。具体订购办法见网站<http://www.oup.com/>.

联系信息：

美洲客户

电邮：oxfordonline@oup.com

电话：+1(800)6240153

传真：+1(919)6778877

非美洲客户

电邮：institutionalsales@oup.com

电话：+44(0)1865353705

传真：+44(0)1865353308

简介

第一章 概述：2018 年国际稳定与人类安全

第一章 概述：2018 年国际稳定与人类安全

丹·史密斯

本年度年鉴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军备、裁军、军备控制和安全领域发展情况的第 50 次年度回顾。在 SIPRI 年鉴 1968-69 中，SIPRI 第一任主管罗伯特·尼尔德就曾表示，年鉴的目的就是“对争议话题---军备竞赛和遏制军备竞赛---做出一个客观平衡的描述”。[1] 这依旧是 SIPRI 年鉴最近几年所涉及的最核心主题，本册年鉴也是如此。本卷同年鉴首版一样，主要回顾了军费开支和武器转让，核力量、化学和生物武器现状，以及裁军和军备控制谈判大事件。此外年鉴还调查了武装冲突和国家间对峙、和平进程与和平行动以及军备控制协定执行情况。

这些数据构成全球和平与安全评估的关键指标。当然，任何年份，其和平与安全风险机会描述必须置于一定时期的大趋势之中。

坦率而言，近年来的大趋势还是令人沮丧。2018 年 1 月，《原子科学家公报》将“末日钟”（被人们广为引用并视为权威）设定为午夜前 2 分钟，午夜意味着世界末日。[2]新年伊始，时钟设定表明的是我们对上一年度事件的一个整体判断。时钟设定者回顾 2017 年，认为这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最为凶险的全球形势，时钟设定如此接近午夜时分。

令人遗憾的是，2018 年落下帷幕，恶化趋势显然并未得到逆转。尽管朝鲜半岛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尤其是在缓和也门局势、共同努力结束也门暴力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之间的和平解决方案仍在执行，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平协议结束了 20 年冲突和敌意，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处理气候变化对安全影响，也都表明人类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乐观。其中包括军控体系的崩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JCPOA)，同时还有一些地区地缘政治的持续紧张。总体而言，全球军费开支高企、武器转让数量惊人、全球武装冲突频发。

同几年前相比，平衡并未进一步恶化。但是，持续高风险是人们惴惴不安的最深刻动因；但它同时或者说应该是，摆脱当前全球政治对抗和僵局的一个契机。总体而言，平衡仍极易打破。SIPRI 过往年鉴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即便如此令人

不安，但找到满意的答案依旧是前路漫漫。

第 1 节.核军备控制危机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2018 年 10 月 20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 1987 年《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INF 条约），中导条约旨在清除所有射程在 500 公里至 5500 公里之间的美苏陆基导弹。[3]美国给出的原因是俄罗斯存在违规行为，涉及开发射程超过 500 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4]

东西方军控的成就主要是上世纪 80 年代末、冷战结束以及 90 年代伊始的几年时间，而时至今日，物是人非事事休。[5] 特朗普总统对俄罗斯不遵守 INF 的具体指控，最初源于 2013 年 5 月奥巴马政府向俄罗斯发难，随后第二年公开化。[6] 2018 年 7 月，北约峰会召开。美国的北约盟友对美国表示声援，尽管似乎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心翼翼。峰会声明表示，“在俄罗斯对新型导弹不做任何置评的情况下，最可信的评估就是俄罗斯违反了该条约”。[7] 这既可以解释为支持美国对俄罗斯的指控，也可以理解为对 INF 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态度，从而依然保留外交回旋余地。然而，到今年年底，北约立场逐渐强硬。12 月的外长会议上，表示出对美方的强烈支出“美国的发现可以认定俄罗斯严重违反其义务”。[8]

俄罗斯拒绝了美方的指控并提出反诉，美国自身在三个方面违反 INF：美国使用条约禁止的导弹进行试射，美国的一些无人机本质上就是巡航导弹，部署在欧洲的导弹防御系统(陆基宙斯盾)可用于中程核打击。作为回应，美国拒绝了上述指控。[9]俄罗斯对美国进一步进行程序性驳斥。INF 包含一个违约投诉渠道，即特别调查委员会（SVC），但在 2003 年至 2016 年期间均未举行会议。正是在这 13 年的时间里，美国对俄罗斯巡航导弹产生担忧，但是俄罗斯也正是因此对美方抱怨---为何不是诉诸 SVC 或其他官方渠道而是选择公开抱怨。然而，当美国在 2016 年 11 月和 2017 年 12 月通过 SVC 提出申诉，却石沉大海。[10]因此，我们很难评估程序冲突在俄美 INF 争端上，究竟占到多大比重。

然而，很明显的是，对于单一武器系统已经演变成为美俄军控彻底决裂的导

火索。这已不仅仅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问题，俄罗斯在 2018 年年底看来很可能会效仿美国，更为严重的是随后更多的衍生问题。

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武数量受到 2010 年新 START 限制。[11]该条约将于 2021 年到期；时至 2018 年年末，新 START 并未有进行任何更新或替换讨论。俄罗斯声称，美国在技术上不遵守新 START，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不可能就任何后续协议展开工作。[12]美国方面，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美方在新 START 续签或更新谈判中的立场，并补充到 2021 年时间还很充裕。[13]这番表态，远不是一个明确的意向声明。值得注意的是，2010 年，博尔顿曾将新 START 描述为美国单方面裁军；同样，特朗普总统在就职后不久，将新 START 定义为“片面”，且“只是美国做出的又一个糟糕决定而已”。[14]

与此同时，美俄都已步入核战略复兴之路。对美国而言，这包括提升核武现代化水平、拟设新太空部队（见下文）和扩大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MD）。对俄罗斯而言，核战略道路同样踌躇满志，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对标美方 BMD 军力发展计划，一定程度也佐证了这一点。[15]

2018 年 2 月，美国发布新《核态势评估》（NPR）。[16]总体而言，NPR 保持了与历届美国政府一致的核武方针政策。然而，NPR 提出可能使用核武应对网络威胁在内的非核威胁的设想，

并对导弹系统低当量核弹头计划进行了概述。这立刻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也呼应了 40 多年前的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人们关于核战略中“微型核武”的争论，尤其是“中子弹”。[17]NPR 声称，这将扩大核威慑的范围（即可对对手行动实现全覆盖）。反对者则认为，其结果将是拉低核门槛，进而加大核战争的风险。[18]

就俄罗斯而言，2018-27 年战略规划高度重视改进俄罗斯核力量。[19]一型先进的战略轰炸机正在研制中，新战略核潜艇也即将下水。[20] 2018 年 3 月，普京总统毫无征兆的向世界展现俄罗斯新研制的大杀器。[21]

今年来，美国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一直在讨论俄罗斯对标美国 2018 年 NPR 而表现出对低当量核弹头的兴趣，而俄罗斯打着的旗号是“升级到降级”的战略概念。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利用核升级维持自己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进而主导战争走向，无论对方是否使用核武器。换一个角度，人们也可以将此理解为拉低核门槛，并有意发动核战争。[22]尽管美国在对俄罗斯核战略进行这样那样的评估，但并未有明确证据表明这一概念已进入俄罗斯官方战略思维。确实，一些分

析人士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官方并不接受这一核理念。[23]尽管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一样明确表示，如遇攻击，可能使用核武，且无论对手是否首先使用核武。其理念就是“当国家存在岌岌可危之时”，选择就出现了。[24] 2018 年 10 月，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的战略构想就是，只有在俄罗斯领土受到攻击时，才会使用核武器，而并非要区分究竟是核武还是常规攻击。[25]综合来看，俄方将核武使用门槛定在美国 NPR 差不多一样的水平之上。NPR 表示“无论是哪国总统，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以保护自身和盟国切身利益”。[26]

今年 6 月，特朗普总统宣布即将组建一支太空部队，将其称为美国第 6 军种。[27]8 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对组建太空部队的大致步骤进行了介绍。[28]根据政府提议，新组建的太空部队将从其他部门抽调人手。同时还将设立一个太空开发机构，以简化硬件采购流程，便于创新。

一系列动作使得国际社会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PAROS)的努力付诸东流。自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生效以来，国际社会尚未就规范外层空间军事活动达成一致协议。[29]联合国裁军大会也举行过多轮讨论，最终成果寥寥。2018 年，俄罗斯提交《防止在外层空间防止武器》草案，随后 2014 年与中国联合提交了一份修订版。[30]美国强烈批评 2014 年草案，认为“根本无法核实”，而且故意不提反卫星武器。[31]2017 年，政府专家组开会讨论 PAROS，并商定下次会议定于 2019 年。然而，尽管专家讨论对于我们确定能做什么固然重要，但是要想在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取得实质进展，国际政治关系必须做出改变。

BMD 再度成为战略焦点，部分原因是 INF 条约争端，使得人们对导弹防御系统重拾兴趣。如果核威慑失效，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性在美国 NPR 中已有阐述；美国政府绝非今天才有这样的担忧。上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就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计划），尽管其预算一直在缩减。

在欧洲部署 BMD。正如 7 月北约首脑会议表示，北约一直强调“北约 BMD 并非针对俄罗斯，也无意挑战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32]这一表述也就是说北约 BMD 旨在抵御来自欧洲-大西洋地区以外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伊朗的威胁。在俄罗斯人眼中，这一说法并没有什么说服力。2002 年，美国小布什政府推出 1972 年《反弹道导弹条约》（ABM）后，俄罗斯认为，美国发展 BMD 将会削弱俄核武威慑力，从而破坏核威慑稳定。[33]因此，俄罗斯认为，BMD 将成为核武裁军的一大障碍。自 2007 年以来，俄罗斯一再提出上诉关切，特别是在美国宣布计划在东欧部署

导弹防御系统之后。[34]事实上，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认定的俄方首次违反 INF 条约是在 2008 年。尽管我们无法证明美国 BMD 和俄罗斯开发测试新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之间存在直接关联，但俄罗斯官方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毋庸讳言。最近又出现一种猜测的声音，美国正在考虑调整其 BMD 政策，将来自俄罗斯中国以及伊朗和朝鲜的威胁都纳入防御范围。[35]

第 2 节.核不扩散关切

美俄军控举步维艰，但也仅仅是核不扩散面临的诸多困难中的一个，其他重大挑战依旧积重难返。

美国的伊朗和朝鲜政策

2018 年，军控领域的其他两个方面也出现重大进展。5 月 8 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 2015 年由 7 个国家（中国、法国、德国、伊朗、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和欧盟签署的 JCPOA，该协议通常被人们称作伊核协议。[36]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对朝外交，尽管 2017 年底至 2018 年初，美朝口水战愈演愈烈。这不仅直接导致两国领导人隔空恶语相向，甚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表示“核按钮就在我办公桌上”。特朗普总统则在推特上反唇相讥，“美国的核按钮更大、更强”。[37]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的对朝政策和对伊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朝美公开叫板之时，朝鲜已经步入核武国家行列，朝鲜已经拥有打击地区目标的核弹道导弹，甚至可以直接攻击一些美方目标。尽管国际社会做出大量努力，安理会通过 9 项制裁决议。[38]金正恩在 2018 年新年讲话中宣布，他现在讲话“核大气粗”，并提议朝韩采取措施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39]朝韩和平进程立竿见影，6 月的新加坡见证了金正恩与特朗普的首脑会谈。事实证明，任何一位领导人，对待先前的对手和国家，都愿意使用外交手段“一笑泯恩仇”。

和朝鲜不同的是，伊朗既没有承认有发展核武的计划，也从来没有被证实拥有核武。尽管有迹象表明伊朗在 2003 年之前可能有核武计划，但此后一段时间也未有迹象表明伊朗在发展核武。[40]然而，即使仅仅只是为了减轻经济制裁压力，

伊朗谈判并最终同意 JCPOA，伊朗的核武之路也已被彻底封死。JCPOA 将伊朗的铀浓缩计划限制至 2030 年，并辅以各种监督和透明度措施，这些措施将在 2030 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效力；这一协议至少在技术上而言是有着明晰的核查路径。[41]沙特、以色列和多数美国共和党政客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特朗普把退出伊核协议作为 2016 年总统竞选的口号。和大多数伊核协议的批评人士一样，特朗普将 JCPOA 的时效性和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控制不力以及叙利亚和世界各地的战事掌控无力都描述为重大缺陷。[42]这也不能掩盖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监督 JCPOA 执行)调查后铁一般的事实---伊朗完全合规执行了伊核协定。因此，我们只能将美国退出 JCPOA 理解为是针对伊朗的一项政治措施，而并非基于证据的技术性反对协议或是协议执行。[43]

8 月，美国再次实施域外制裁，惩罚包括欧洲在内的第三国与伊朗进行贸易往来的公司。年底，法德英正在设计所谓特殊目的机构（SPV），以此作为促进欧洲和伊朗贸易的一种机制。[44]那些将与伊朗进行贸易往来的欧洲商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极易受到美国的惩罚性行动的影响，令人不寒而栗。SPV 是否能达到目 的还有待观察，尽管伊朗仍能同中国和俄罗斯保持贸易往来，但伊朗对美国再次制裁施压的反应依旧令人担忧。重压可能会带来反弹。美国退出 JCPOA 也加剧了海湾地区的安全风险（见第 3 节）。

相比之下，美国的对朝外交政策就大为温和，加上朝韩关系趋缓，在 2018 年年末带来一丝希望的温暖。新加坡金特峰会达成协议，为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韩持久和平以及朝鲜战争军人遗骸等问题描绘出一幅不甚清晰的路线图。[45]关键问题的语焉不详和缺乏具体务实举措，金特会也曾饱受诟病，但是一番唇枪舌剑、激烈抨击之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也已是难得。金特协定已定下框架，随后几年，朝美官员都有时间细细打磨、敲定具体细节。

不扩散条约：迈向 2020 年审议大会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于 1970 年生效，近 50 年来一直是防止核扩散的核心国际机制。[46]早在 70 年代初，SIPRI 评估表明，约有 15 个国家处于“接近核武国”地位。[47]在这一时期，全球有 6 个国家拥有核武：NPT 中列出的 5 个核武国家(NWS)，中国、法国、英国、美国、苏联以及秘密拥有核武的以色列。此后，又有三个国家加入核武国行列：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1991 年苏联解

体时，四个继承国本可保持核地位，但是只有俄罗斯保留核武国地位。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都放弃了核武器。1994 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时，南非放弃了其核武计划。随后的 10 年间，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核武计划在国际监督下被废除。因此，总体而言，防扩散也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

因此，全世界对 NPT 仍有着很强烈的厌烦情绪。其核心就是讨价还价，你来我往：NWS 将最终放弃核武，非核武国家（NNWS）放弃自身核武雄心，作为回报可获得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权利。博弈的核心体现在 NPT 条约第 6 条，不扩散成为军控手段最终铺就核裁军大道：条约缔约国承诺就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有效措施进行真诚谈判，同时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之下实施全面彻底裁军。[48]

俄罗斯和美国核武库大幅度削减，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截至 2018 年 1 月，世界范围内核弹头数量已从 65000-70000 枚减少到 15000 枚以下。[49] 然而也并未有迹象表明 NWS 国家准备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相反，所有的核武国家都在提升其核武运载系统及相关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50]

在此背景下，《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也被称为禁核条约，于 2017 年获联合国批准并于开放签字。[51] 2018 年间，TPNW 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除 50 个 NNWS 国家直接签字通过，2017 年有 6 个国家签字，2018 年 13 个国家。截至年底，共有 69 个签字国和 19 个缔约国（条约生效还需 31 个国家批准）。诚然批准步伐似乎稍显缓慢，但却已和 NPT 条约保持了步调一致。尽管相比其他裁军条约要慢半拍，但较 1992 年《化学武器公约》（CWC）和 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这一阶段要快。[52]

TPNW 争议在所难免。核心条款禁止核武器，但即便条约生效，也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条约本身只对其正式缔约国具备约束力。但是对于条约起草者和支持者而言，条约的目的在于污名化核武并激发对“核裁军采取紧急行动”。[53]法国、英国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和俄罗斯立即驳斥 TPNW 不切实际且并不可取，原因就是压根没考虑国际现实---西方列强同俄罗斯出现罕见的团结，尽管这两个阵营本身对国际现实和诉求有着不同的解读。[54]中国的观点则更为微妙。2017 年 3 月，TPNW 最终敲定之前，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最终实现核裁军的目标“基本符合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的宗旨”。[55]

下届 NPT 五年审议大会将在 2020 年举行。围绕 TPNW 的争论已成为 NPT 大会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在 2018 年筹备委员会会议上，大多数 NNWS 国家表示欢迎

TPNW，而 NWS 及其盟国则强调需要通过 NPT 采取“递增”、“渐进”或“循序渐进”的裁军方式。[56]TPNW 争论部分是源于这个世界在拥有核武之后是不是更加安全（因为核威慑）或者是没有核武（因为某一天可能会使用核武）。其中还有部分分歧是源于如何推进核裁军。尽管 NPT 反映出的是 60 年代末认为有必要将不扩散置于高于核裁军的优先地位，TPNW 代表的则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在 NPT 半个世纪之后，早就应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这一观点似乎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赞同。5 月发布的《联合国裁军进程》，确定了若干优先任务，其中包括减少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裁军议程将 TPNW 描绘为“核裁军和不扩散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却并未呼吁各国签署或批准 TPNW。[57]

第 3 节.使用化学武器

2018 年发生的两起重大化武(CW)事件揭示出军控领域的另一大顽疾。[58]在当下的国际政治氛围之下，公然违背 CWC 使用化武，激起了人们对裁军和军控机制可行性和可靠性的质疑。

英国未遂暗杀事件

2018 年 3 月 4 日，人们发现在英国索尔兹伯里有人使用化武诺维乔克，试图杀害前俄罗斯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刺客将一个香水香氛器交给一名妇女使用，妇女在其手腕上试用了香水后死亡。香氛器被刺客抛弃，后被找到。[59]英国当局很快确认该化学物质为诺维乔克，一种军事级神经毒剂。禁化武组织(OPCW)于 4 月 12 日证实了这一点。[60]

尽管当时的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最初声称，英国专家已查明了诺维乔克来源，但英国和 OPCW 专家未能核实其确切来源。[61]

事件发生的随后几天内，英国政府表示，俄罗斯政府极有可能应对此事件负责。俄罗斯对此予以强烈否认。[62]由于西方世界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已处于数十年来最糟糕的时期，索尔兹伯里袭击事件导致紧张关系加剧、指控和反指控此起彼伏，最终发展为互相驱逐外交人员。[63]

俄罗斯官方观点认为，对外交人员的指控和驱逐是英方凭空捏造的戏码。俄罗斯外交情报局局长称此次袭击是“英美情报机构粗暴而荒唐的挑衅”。[64]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判决前，借用爱丽丝梦游仙境嘲笑英国。[65]诚然约翰逊对俄罗斯罪责证据上有些夸大，但是俄方妄图冷嘲热讽，对使用特工使用化武这样的严重指控用一些经不起推敲的反驳来敷衍，不会有任何作用。

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

叙利亚内战的 7 年里，关于巴沙尔·阿萨德总统对自己国民使用化武的指控不绝于耳。近年来，联合国也先后发起了几项针对叙利亚使用化武指控的调查。2015 年，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同意成立 OPCW-UN 联合调查机制（OPCW-UN JIM），共发布 7 份调查报告，并得出结论，叙利亚政府应对 4 起化武案件负责，非国家行为主体应对 2 起化武案件负责。[66]遗憾的是，JIM 授权至 2017 年 11 月到期，原因是俄罗斯的否决，安理会也未能就延长授权条款达成一致。[67]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设立，负责调查叙利亚境内侵犯人权行为，其定责更为直截了当。自 2013 年以来，已经证实至少发生 34 起化武袭击，其中多数使用了氯或沙林这样的神经毒剂，罪魁祸首就是叙利亚政府。[68]据报道，4 月 7 日在大马士革郊区再次发生一起疑似化武袭击事件，造成只搜啊数十名平民死亡。[69]此前有报道称，3 月在杜马发生了较小规模的氯气事件。[70]OPCW 宣布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为化武袭击，并确定使用何种化武。然而，4 月 13 日，美国、法国和英国先发制人，对霍姆斯以西两个疑似化武储存设施和大马士革一个研究中心发射了 105 枚巡航导弹和空对地导弹。[71]

三国政府解释，导弹袭击是对叙利亚政府的惩罚，阻止再次爆发化武袭击。[72]对这些目标实施打击符合国际法，但尚不肯定军事行动是否能实现目标。连天炮火并未改变阿萨德总统的行为，也未给叙利亚民众带来曙光。先入为主的 OPCW 调查使得这一问题政治化。俄罗斯再次显得准备不足，最初否认发生化武袭击，后来改口化武袭击是英国策划。[73]用一个谎言遮盖另外一个谎言，并不能提升可信度。即便如此，对于西方大国来说，静观其变并随后团结最多数国际力量，不失为最为高效的反击。

俄罗斯对索尔兹伯里和杜马化武袭击事件反应中的诚信愈发让人质疑，因为荷兰军事情报机构声称，有证据表明俄罗斯企业入侵 OPCW 网站。[74]然而，西方

世界不是等待 OPCW 结果，而是侵犯叙利亚主权，同样无法让人相信西方对国际法和国际协定的尊重，一样是对军控的伤害。最终，我们还要相信合法的目的最好是通过合法的手段来实现。

第 4 节.国际紧张局势与大国博弈

双边和多边军控和裁军协定谈判的跌宕起伏，背后折射出的是国际政治环境的紧张和动荡。

没有一个强力的国际平衡是现今国际社会中的一大怪相。中国、俄罗斯、美国都试图改变国际政治秩序生态。对于中国-崛起的新兴大国和俄罗斯-冷战后 10 年大伤元气，挑战自不待言。两国厉兵秣马，积极应对全球秩序的方方面面挑战，从全球核心地缘政治博弈到国际金融平衡较量。

更让人侧目的是，那些曾经是美国苦心经营并长期坐收渔利的核心国际机制和准则，今天的美国正在发泄着不满和愤懑，并准备分道扬镳。也许这只是现任政府为了赢取选民偏好的短期之举。但是，也许会比我们预期的要来的长久。美国例外论和对“外部世界任何地区永久联盟”(乔治华盛顿总统)和“互相纠缠的联盟”(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长期不信任一直是美国政治思想的基石。[75]美国独立的 165 年来，美国除在独立期间同法国结成国际联盟外，并未与任何国家结盟。[76]2018 年，美国与其他 54 个国家签订了联盟协议。[77]甚至在 2016 年特朗普当选之前，对结盟前时光的怀念就在美国共和党主流思想中甚嚣尘上。事实上，特朗普“美国优先”口号在美国政治舞台有着悠久的历史，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还有其他一些政客也都曾喊出过这一口号。[78]美国的铁杆欧洲盟友也对特朗普总统对联盟逻辑的含糊其辞表明态度，公开质疑美欧联盟的持续性。[79]

这些变化使得国际政治走向扑朔迷离，也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与几年前相比，现在我们还无法确定国际体系中阐明的法条和规则是否会得到尊重，更不用说其他约定俗成的规范和担当。所有的这些都意味着，紧张和对抗一如既往给世界政治带来的是更多的风险，对国际稳定带来的是较以往更为不利的后果。

俄罗斯、美国和西方

特朗普执政的头两年，美国同西方世界内部的关系削弱。这也就意味着，在重大问题上，美俄和西俄关系不再是一回事。[80]尽管如此，美俄关系荆棘丛生，俄罗斯同美国欧洲盟友的关系也一样是一触即发。美俄军控崩溃，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 2018 年美国国防战略声明中都可见一斑---俄罗斯是全球对手。[8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的一体化似乎已是水到渠成；但时至今日任何一方都不再将其视为可能，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罗斯在 2014 年吞并克里米亚并卷入东乌冲突，成为俄西关系长期恶化历史中的关键时点。2018 年，3 艘乌克兰军舰试图穿越亚速海刻赤海峡时，遭到俄方扣押，俄乌冲突升级。[82]2018 年 5 月，连接克里米亚和俄罗斯领土的一座桥梁被视为非法并阻碍国际航运，饱受国际社会抨击。[83]

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诉求，已然超越其自身能力。俄罗斯经济规模不仅无法比拟美国和中国，相比其他 9 国也是羸弱不堪。[84]然而，俄罗斯自有其对策，毕其功于一役且不惜背水一战。事实证明，2014 年开始的乌克兰战事和始于 2015 年的叙利亚战事，俄罗斯都是决意一战。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对国家利益构成和国际秩序的看法同时下的西方世界并未有多大区别，然而俄罗斯对国际事务发声却有着大量忠实听众，不仅仅是俄罗斯内部更有着广泛的国际基础。[85]

另外一方面，虽然美国在全球范围都有强大的军事存在，包括大约 800 个军事基地和其他军事网点，但是西方阵营似乎还是心有戚戚，心猿意马。[86]西方世界正在失去自己的软实力，很难得到人们的同情和关注还有它曾经拥有的--信任。[87]从表象看，在索尔兹伯里毒剂袭击事件中的外交博弈和相互驱逐中，选择同英国站在一起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国家，除了澳大利亚，我们找不到任何来自南美、非洲、中东或亚太地区的国家。[88]俄罗斯和西方互不相让，互相指责对方并坚持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却都未提交国际仲裁，风雨飘摇的国际形势并不任何改观。

中国的国际关系

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接近 10%的增幅。[89]按照最常用的衡量标准（名义 GDP），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似乎可能在 2030 年就要超越美国。

[90]自 2008 年-世界经济体系爆发一系列重大危机以来-中国强大而稳定的经济实力反映在区域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舞台是更为笃定的国际政策。中国提升其军事实力，在对非援助和投资中结交朋友；目前中国借助“丝绸之路”倡议，在亚洲大规模推进其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91]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全球化的新捍卫者，同时积极参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92]在多边行动的自我主张中，中国在其领国的博弈中，努力争取国家利益，其中就包括同邻国的一些领土争端。

中国在国际商业上无往不利，也带来了国际社会对其关税、货币政策和知识产权诸多方面不公平政策和做法的诟病，如中国投资和市场的准入限制。[93]现在已升级为美中贸易战。2018 年，美国对价值 2500 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对价值 110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94]2018 年 12 月中美达成休战协议，两国政府承诺在制定广泛贸易协定的同时，90 天内不再加征关税。如果无法达成，贸易战将重燃战火，对全球经济稳定将会带来极其有害的影响。

其他问题也可能会成为阻碍。今年 9 月，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大选，气氛愈发紧张。[95]与此同时，台海和南海战略竞争加剧。据报道，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部署了反舰和防空导弹，并部署了几架轰炸机，其中包括具备核投放能力的轰-6K。[96]美国及其盟国（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新西兰和英国）在该地区展开“航行自由”行动。[97]一艘美国军舰和一艘中国军舰险些相撞，两舰最近距离不足 40 米。[98]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

中东正陷入全面安全困境和暴力冲突，不能自拔。[99]理解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对老冤家，便可管中窥豹，了解整个中东危机。伊沙博弈的舞台在伊拉克、在叙利亚，也在也门。沙特是包括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在内的反伊朗联盟的马前卒。美国倡议建立一个新的逊尼派安全整治联盟---中东战略联盟，通常被称为“阿拉伯北约”---以抗伊朗不断膨胀的影响力。然而，尽管有声音表示 2019 年阿拉伯北约就将破壳而出，但是新联盟依旧面临重重困难。[100]

美国、沙特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批评集中在其区域角色和弹道导弹研发。伊朗的战略利益包括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加强其同伊拉克盟友的关系、反对库尔德人独立、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协助也门胡塞武装。近些年来，伊朗的对手也在干预上述国家或地区其他国家事务，要么是政治手段，要么直接间接的动用武力。

中东地区，伊朗绝不是唯一一个发展弹道导弹的国家。许多中东国家正在从多个卖家手中购买中短程导弹。[101]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中程导弹是一种常规威慑性自卫武器。

针对伊朗的一系列组合拳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尤其是在经济上重创伊朗。然而，反伊联盟并非铁板一块。10 月 2 日，记者贾马尔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被暗杀。暗杀事件引发人们对美国沙特政策的强烈反弹，强烈反对美国对沙特的无条件支持。[102]浮出水面的不仅仅是暗杀事件的诸多可怕细节，同时涉及沙特监狱对女囚的酷刑。[103]这无疑是对风口浪尖中的也门战争火上浇油，沙特支持的也门战事夺去了 58000 人的生命，100 万例霍乱病例，估计 1400 万人面临饥荒风险。[104]人们竭尽全力结束战争，2018 年 12 月的斯德哥尔摩达成荷台停火协议。[105]

伊朗和沙特同为地区大国。两国你来我往常常被解释为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内部冲突的产物。宗教在这两个国家都牢牢把持着政治和宪法---对沙特逊尼派和伊朗什叶派的瓦哈比解读，但是如果把沙特伊朗对你单纯理解为宗派主义难以让人信服。

美国和以色列同属反伊联盟，这也表明单靠宗教优先并非沙特政策的全貌。同样，伊朗为叙利亚阿拉维派统治集团的坚定背书，并在 2017 年第一时间向面对沙特制裁和近乎被封锁的卡塔尔(逊尼派)伸出援手。这些都表明国家利益和战略考量才是伊朗政策的核心特征。

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权力争夺。这也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地区政治的核心分水岭。结果很难预测，如果要避免灾难性的局面，就必须举行必要的妥协，人们似乎对对话的胃口也越来越大。

第 5 节.人类安全与国际合作

199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年度报告》提出人类安全概念，其核心思想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除非人们的日常生活得到保障，否则世界永无宁日。未来的冲突往往发生在国家内部，而并非国家间，其根源深深植入日益严重的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均。在

这样的背景下，安全源于发展而并非武器。[106]

将人类福祉置于安全核心地位，而非国家利益和权力。这一思想上的转变带来的是软安全和硬安全手段的不同：前者旨在保护百姓福祉，后者旨在针对潜在对手的军事准备。

两个常常被认为是对立的概念之间的距离其实比最初看起来的，要小得多。理论上而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本就是共通；那么硬安全的核心要义就是确保人民福祉，至少是本国公民福祉。尽管如此，如果在军事准备时不考虑人类安全问题，很可能会产生明显的安全后果。如旱灾和水资源管理不善所带来的压力，其实也是叙利亚和也门战争的诱因之一。[107]简而言之，在一个单一的安全空间之中，不同性质的行动和准备就可能会对局势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大多数国家的安全政策制定之时，并未有一个整体性的规划和执行计划。多数安全政策只是强调军事准备，辅以外交手段，而人的安全问题则常被忽视或是留给其他机构负责。在国家安全政策和战略框架制定中，还是有一些例外值得注意，将人类安全纳入框架之中。可惜的是这样的例外并不多见，决策规划核心节点时往往会被边缘化。[108]

如要有效应对人类安全挑战并战胜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形式环境恶化所引起的国际形势动荡，我们就必须纠正安全思维模式上的缺陷。

气候变化，安全议程和饥饿

2018 年，并非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前面 3 年都比 2018 年热。第 5 热的年份是 2014 年。换言之，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5 年，就是过去的 5 年。[109] 一项预测表明，未来 4 年将是另一高温时期，另有预测到 21 世纪 40 年代，我们今天界定为一场炎热的夏季将是欧洲的平均气温。[110]就全球范围而言，2018 年干旱、洪水和极端事件频发，同时也是加拿大冰川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发生破裂。[111]

2018 年，一些报告对气候变化趋势和后果发出了警告。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在 10 月发表一份特别报告，报告指出如果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提升 1.5 摄氏度的严重后果，并将其同提升 2 摄氏度以上的破坏性后果进行比较。[112] 其他报告显示，自 1970 年以来，除人类以外，脊椎动物数量平均下降了 60%，并探讨了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等其他驱动因素可能会对核心生态子系统产生或

突然或持久的变化。[113]

这一因果链取决于诸多因素，如一国经济状况等其他情况。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一国水、粮食供应出现危险，进而导致出现社会稳定、政治动荡甚至更糟的情况出现。[114] 更为紧迫的是我们需要从风险意识转变到系统性风险管控。行动必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IPCC 估计，如果继续保持当前的速率，全球气温将在 2030 年至 2052 年某一时点上升至较工业化水平 1.5 摄氏度。[115]1.5 摄氏度的水平是海洋附近低洼处居民的最高安全阈值。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约四分之一国土为此类地形，共居住有 2000 万居民，海拔高度不到 5 米。[116] 其他风险包括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住所的坚固程度、营养和健康影响。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他们的持续生存受到威胁。有估计表明全球共有 9 个高危 SIDS，总人口约 100 万人。[117]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太严重的危险包括对经济、住所的人身稳定、营养和健康的巨大影响。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他们的持续生存受到威胁。一项估计确定了 9 个高风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为 100 万人。117 除上述高危地区外，全球生活在海平面 5 米以下沿海地区还有 10 多亿人，其中部分人群同样处于风险之中。[118]

如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纠正错误、减少碳排放并努力适应气候变化，这些地区的有效运作和基本生存能力将在本世界中叶前面临严重困难。人类面临的这些挑战可能会对人类安全、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及国际稳定产生深远影响，灾祸在劫难逃。如果世界各国、国际社会应对挑战不力，结果将是触目惊心。国际安全议程也极可能成为一纸空谈。

受长期饥饿影响的人口数量曾经长期稳步下降，如今再次攀升，增至 8.21 亿人，占全球人口 11%。[119] 一些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受到武装冲突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最为严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2018 年下半年，阿富汗、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也门局势恶化，主要原因是就是冲突爆发。乍得湖地区、索马里和叙利亚粮食供应和安全形势都有所改善。[120]

人类在议程和机制调整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安全双重挑战上取得一些进展。如非盟和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安全风险上都有进步。[121] 2018 年 7 月，联合国安理会就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进行了全面辩论；越来越多的安理会决议强调气候风险评估和管理战略的重要性。[122] 此外，最近的两项倡议可能会有助于联合国未来在气候安全领域的行动：2018 年 8 月开始的政府间气候安全之友小

组；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在 2018 年 11 月创建的气候安全机制。[123]

即便这些不算新闻头条，也都是希望满满的进展。气候相关安全风险，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的多维度难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组织的参与至关重要。2019 年 9 月，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峰会将见证气候议程制定的高光时刻。

联合国及国际多边机构

国际安全视角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便是通过合作和多边手段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今天的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军控和裁军框架。今天的我们继续一条出路，带领我们走出世界政治的多边博弈。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适应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恶化所带来的挑战。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合作，需要多边政策以及强力高效的国际机制。问题是当前加强合作的需求空前，但合作意愿却大不如前。中美俄世界三强，他们对国际准则、国际法和多边机制都是按各自喜爱行事。

身强体壮的联合国就显得尤为重要，亲力亲为的联合国秘书长在推动裁军、暴力冲突防控、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都有着强有力的议程安排。或许面对当前忧心忡忡的国际安全问题，他或许能找到答案。世界上的那些大国们，他们什么时候选择遵守法律，什么时候选择抛开法律，似乎我们无法控制。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后面的二流国家就必然会更为系统更为一以贯之的倾向于国际法和政治行为规范，并努力要求大国们也遵守。当前国际安全挑战的性质使得合作、规范和制度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大国例外论和国际机制主义之间的平衡如何拿捏，仍是一大旷世难题。

第 6 节.结语：年鉴第 50 版

本卷是 SIPRI 年鉴第 50 版，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回首半个多世纪起来，SIPRI 走过的历程。50 年前 SIPRI 关注主题和今天，既呈现出极大的连贯性，同时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SIPRI 关注面更广，反映出的是全球政治军事技术变革，也反映出人们对新安全观和其背后驱动因素的新认识。气候变化和其他形式的环境恶化的影响、人类安全概念、建设和平理念、

性别问题意识及其明确表述、安全问题的综合手段、武装冲突起因多维度解释之必要性，还有人类承认传统标准定义战争和武装冲突之外的暴力，过去的50年，林林总总诸多概念现在都已是和平安全议程范畴。

尽管上述内容并非都在本章或本卷SIPRI年鉴涉及，但都是SIPRI50年不断发展的脚步。其中有两大一以贯之的特征。

2018年12月，SIPRI创始董事罗伯特·尼尔德教授辞世。[124]尼尔德教授做了大量的工作，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这两大特征成为SIPRI血液的DNA。一是对和平的承诺：成立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宗旨就是通过开展研究，打开和平国际关系和裁军之窗。另一DNA就是对事实的庄严承诺：SIPRI的建立就是要弥补信息的空白，以提供军费开支、武器转移、核武器和化学生物武器基本数据。二战结束以来，罗伯特·尼尔德一直致力于上述核心领域的实证研究。

以事实为准绳，孜孜耕耘但求为改善国家间关系贡献一份力量，双重承诺对尼尔德教授而言，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也正是如此，这家新机构的基因就此刻上烙印。

多年来，年鉴大量数据收集工作得以不断改进，数据口径不断扩大。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公共数据源（SIPRI从公共数据源获取数据，并按一致透明原则进行整理）。信息来源仍存在缺憾，核心国家数据透明度不够。精准数据生产任务艰巨，但却意义重大。罗伯特·尼尔德和其他SIPRI创始人，特别是瑞典政治家阿尔瓦·迈尔达尔和经济学家冈纳·迈尔达尔，用自己不懈的追求铺就今天的SIPRI之路。

1“前言”，SIPRI 1968/69年世界军备与裁军年鉴（阿尔姆奎斯特&维克塞尔:斯德哥尔摩，1969），第5页。
2梅克林·J，“午夜还有2分钟”，原子科学家公报，2018年1月25日。
3本节中导条约及其他双边军备控制条约摘要和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A第3节。
4俄罗斯和美国相关核军控进展，含中导条约，见本卷第7章第2节。
5冷战结束时(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军控体系核心支柱讨论，见史密斯·D，“简介：2017年国际稳定和人类安全”，SIPRI年鉴2018。
6阿里·I，“美国将军表示俄罗斯部署巡航导弹，威胁到北约”，路透社，2017年3月8日；
戈登·M·R，“美国称俄罗斯试射巡航导弹，违反条约”，《纽约时报》，2014年7月28日；戈登·M·R，“俄罗斯部署导弹，违反条约，挑战特朗普”，《纽约时报》，2017年2月14日；潘达·A.，“中导条约未来迷雾重重”，外交关系委员会背景文件，2018年10月22日。
7北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布鲁塞尔首脑会议宣言，2018年7月11日，第46段。
8北约外交部长，“关于中程核力量条约的声明”，布鲁塞尔，新闻稿（2018）1622018年12月4日，第2段。部分原因是法国和荷兰情报部门声称独立核实了美国的指控，见本卷第7章第2节。
9美国国务院，军控、核查和合规局-反驳俄罗斯关于美国不遵守中导条约的指控，2017年12月8日。
10沃尔芙·A·F，俄罗斯遵守中程核力量（INF）条约：背景文件和国会议题，国会研究服务局（CRS）国

会报告 R43832（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9 年 2 月 8 日）。
11 新 START 和先前美俄双边战略协定摘要及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3 节。另见本卷第 7 章第 2 节。
12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部声明”，2018 年 2 月 5 日；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联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 73 届会议第一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弗拉基米尔·耶尔马科夫的声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不扩散和军备控制司司长，一般性辩论，纽约，2018 年 10 月 9 日”，2018 年 10 月 10 日。
13 梅赫塔·A，“一个核条约已经寿终正寝。下一个会轮到新 START 吗？”国防新闻，2018 年 10 月 23 日。
14 博尔顿·J，“新 START 是单方面裁军”，《华尔街日报》，2010 年 9 月 8 日；霍兰德·S，“特朗普希望确保美国核武库处于“生物链最顶端”，路透社，2017 年 2 月 23 日。
15 俄罗斯总统，“瓦尔代国际讨论俱乐部会议”，对普京总统的采访记录，2018 年 10 月 18 日。
16 美国国防部，2018 年核态势评估，2018 年 2 月；见本卷第 6 章第 1 节。
17 1977 年 6 月 6 日，《华盛顿邮报》“埋在 ERDA 预算中的中子杀伤弹头”引发了中子弹争议；另见美国瓦肖斯基·A·S，战场辐射伤亡，军事评论，1976 年 5 月。关于这一争议，见莱滕贝格·M，“战术核武器背景信息（主要是在欧洲背景下）”，F·巴纳比，SIPRI，《战术核武器：欧洲前景》（泰勒&弗朗西斯:伦敦，1978）；科恩·S，“增强型径向弹头：创造记录”，战略评论，1978 年冬天；《新闻周刊》，“对中子弹的愤怒”，1978 年 4 月 17 日。
18 柯尔·P·E 和麦肯·J，“小型核武的巨大风险”，议程，2017 年 10 月 3 日。小型核武，一个绝对的怪胎，见罗恩斯利·A 和布朗·D，“最小的男孩”，外交政策，2014 年 1 月 30 日。
19 库珀·J，“俄罗斯在核武器上花了多少钱？”，SIPRI 评论，2018 年 10 月 1 日。另见本卷第 6 章第 2 节。
20 塔斯社，“俄罗斯将在 21 世纪 20 年代初开发下一代战略轰炸机原型机”，2017 年 4 月 13 日。
21 奥斯本·A，“奇葩的公开投票后，俄罗斯命名普京的新“超级武器”，路透社，2018 年 3 月 23 日；俄罗斯总统，在联邦议会发表总统讲话，2018 年 3 月 1 日。详见本卷第 6 章第 2 节。
22 见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温尼菲尔德上将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的声明”，2015 年 6 月 25 日；佩恩·K·B 和施耐德·M·B.，“俄罗斯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真正的明确防御，2016 年 2 月 11 日；皮弗·S，“击退核武的时间-格斗”，布鲁金斯学会，2016 年 5 月 10 日；施耐德·M·B，“升级到降级”，美国海军学会诉讼，Vol.143/2/1368（2017 年 2 月）；克朗内·M，“美国战术核武器案例”，《华尔街日报》，2018 年 1 月 24 日。
23 见奥利克·O，“俄罗斯的核理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这意味着什么”，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2016 年 5 月；奥利克·O 和巴克利斯基·A，“核态势评估和俄罗斯的缓和：一个不存在问题的危险解决方案”，岩石战争，2018 年 2 月 20 日；以及朗格·A，“俄罗斯核力量和军控前景”，提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恐怖主义、不扩散和贸易小组委员会的证词，2018 年 6 月 21 日。
24 俄罗斯总统，[俄罗斯联邦军事理论]，2010 年 2 月 5 日（俄语）；以及可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获得英文版本，“俄罗斯联邦军事理论”，2010 年 2 月 5 日获得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批准。
25 俄罗斯总统，“瓦尔代国际讨论俱乐部会议”，对普京总统的采访记录，2018 年 10 月 18 日。
26 美国国防部（注 16）。
27 魏斯格伯·M 和塔克·P，“特朗普的太空武装声明意味着什么？”国防一号，2018 年 6 月 18 日；以及“建立美国太空部队”，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2018 年 8 月 16 日。
28 白宫，“副总统彭斯对美国未来太空军事的评论”，五角大楼，2018 年 8 月 9 日。
29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外层空间条约），1967 年 1 月 27 日开放供签字，1967 年 10 月 10 日生效。摘要和更多详情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30 核威胁倡议，提议防止太空军备竞赛条约；2017 年 9 月 29 日。
31 施莱因·L，“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化问题上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美国之音，2018 年 10 月 4 日。
32 北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注 7）。
33 反导条约摘要及其他细节见附件 A 第 3 节。
34 埃拉斯托·T，“在盾牌和利剑之间：北约被忽视的导弹防御困境”（犁头基金会: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2017 年 6 月）。
35 索恩·P，“五角大楼希望调整导弹防御政策，以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的威胁”，《华盛顿邮报》，2018 年 3 月 2 日。
36《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2015 年 7 月 14 日，维也纳，转载为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附件 A，2015 年 7 月 20 日。另见埃拉斯特·T，“伊朗执行 JCPOA”，SIPRI 年鉴 2018，第 337-46 页；以及本卷第 7 章第 3 节。
37《爱尔兰时报》，“一直在他的案头”，2018 年 1 月 1 日；@realDonaldTrump，2018 年 1 月 2 日，<https://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status/948355557022420992>；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特朗普对金正恩：我的核按钮“更大更强大”》，2018 年 1 月 3 日。
38 最初的制裁决议于 2006 年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第 1718 号决议。表决通过更过进一步措施：1874（2009）、2087（2013）、2094（2013）、2270（2016）、2321（2016）、2371（2017）、2375（2017）和 2397（2017）。
39 朝鲜全国委员会，“金正恩 2018 年新年讲话”，2018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3 月 20 日）。
40 克尔·P·K 对每种方式的证据、有争议的解释和论点都进行了审查，伊朗核计划：现状，国会研究服务局（CRS）报告，国会 RL34544（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9 年 4 月 1 日）。
41 见劳夫·T，“解决对伊朗核计划的关切”，SIPRI 年鉴 2016，第 673-88 页；劳夫·T，“在伊朗实施联合

全面行动计划”，SIPRI 年鉴 2017，第 505-10 页。
42 霍兰德·S，“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修复”伊朗核协议”，路透社，2018 年 1 月 12 日。
43 路透社，“伊朗履行核协议承诺：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2017 年 10 月 30 日；迪克西·A，“伊朗正在履行其核相关 JCPOA 承诺，总干事天野之弥告诉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018 年 3 月 5 日。
44 加拉古鲁·L，“欧盟对伊朗实施新的贸易机制”，CNBC 新闻，2019 年 1 月 31 日；以及
O·图尔·B，“面对现实：欧洲特定目的机制并不会挑战美国制裁”，大西洋理事会，2019 年 1 月 31 日。
45 白宫，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正恩主席联合声明，2018 年 6 月 12 日新加坡朝美峰会讲话。美朝核外交，见本卷第 7 章第 1 节。
46《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NPT），1968 年 7 月 1 日开放签字，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
47 世界军备与裁军：SIPRI 年鉴 1972（阿尔姆奎斯特&维克塞尔；斯德哥尔摩，1972），第 290-98 页。
48《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注 46），第 4 页。
49 基勒·S·N 和克里斯滕森·H·M，“世界核力量”，SIPRI 年鉴 2018，第 236 页。
50 世界核力量，见本卷第 6 章。
51TPNW 摘要，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TPNW 谈判及争议焦点，见史密斯·D，“国际政治漩涡中的核武器”，SIPRI 年鉴 2018，第 7-10 页；基勒·S，“禁止核武器条约”，SIPRI 年鉴 2018，第 307-18 页；以及本卷第 7 章第 4 节。
52 范·S，“重温禁止核武器条约”，法律战，2018 年 11 月 27 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学武器公约》CWC）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CTBT）摘要，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53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污名化、禁止和消除：核裁军的一种方式”，2013 年 10 月 1 日；比阿特丽斯·菲恩引用霍格斯塔·D，“UNGA 上的 ICAN”，海因里希·博尔基金会，2016 年 11 月 16 日。
54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美国、英国和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后发表的联合声明”，2017 年 7 月 7 日；俄罗斯外交部，“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建立信任措施的会议上的讲话，纽约，2018 年 1 月 18 日”，2018 年 1 月 18 日。
55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例行新闻发布会，2017 年 3 月 20 日。
56 见本卷第 7 章第 4 节。
57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确保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纽约，2018 年）。另见本卷第 7 章第 5 节、第 8 章第 3 节和第 9 章第 4 节。
58 事件更多处理，见本卷第 8 章第 1 节和第 2 节。
59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诺瓦克:道恩·斯特格斯死亡后的谋杀调查”，2018 年 7 月 9 日；森古普塔·K，“索尔兹伯里中毒：四名俄罗斯突击队成员中的一名妇女被确定为斯克里帕尔·诺维乔克调查的主要嫌疑人”，《独立报》，2018 年 7 月 19 日。
60 赞德斯·J·P，“各类观点与纷繁事实夹缝中的诺瓦克---第 1 部分：对俄罗斯否认的解构”，《战壕》，2018 年 4 月 10 日。
61DW，“鲍里斯·约翰逊:俄罗斯在斯克里帕尔案中的立场“越来越奇怪”，2018 年 3 月 20 日；莫里斯·S 和克里拉·P，“波顿唐的专家无法核实诺瓦克的确切来源”，《卫报》，2018 年 4 月 3 日。
62 英国政府，“首相下议院关于索尔兹伯里事件的声明：2018 年 3 月 12 日”，2018 年 3 月 12 日；以及阿萨那·A，“俄罗斯间谍中毒：特雷莎·梅向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卫报》，2018 年 3 月 13 日。
63《卫报》，“西方盟国因斯克里帕尔袭击驱逐数十名俄罗斯外交官”，2018 年 3 月 27 日；英国广播公司新闻，“间谍中毒：俄罗斯驱逐更多英国外交官”，2018 年 3 月 31 日。
64 塔斯社，“俄罗斯外交情报局长猛烈抨击将克里帕尔案视为挑衅”，2018 年 4 月 4 日。
65 RT 新闻社，“拉夫罗夫称英国对斯克里帕尔案的处理是“对国际法的公开嘲弄”，YouTube，2018 年 4 月 5 日。
66 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第 7 次报告——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S/2017/904，2017 年 10 月 26 日；哈特·J，“关于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SIPRI 年鉴 2018，第 349-61 页。
67 坎波斯·R，“俄罗斯否决延长叙利亚化学武器调查”，路透社，2017 年 10 月 24 日。
68 阿尔穆赫塔尔，S.，“叙利亚大多数化学袭击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 34 例确诊病例，《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13 日。
69 哈伯德·B，“叙利亚数十人因政府化学袭击而窒息死亡”，《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8 日。
70 桑德斯·扎克雷·A，“叙利亚化武袭击更多报告浮出水面”，《今日军控》，2018 年 4 月。
71 柯林斯·K，沃德·J 和尤里斯·K，“我们对叙利亚三个袭击目标地点的调查”，《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14 日；路透社，“法国解密叙利亚天然气袭击情报报告”，2018 年 4 月 14 日。
72CNN，“马蒂斯：一镜到底，就是现在”，2018 年 4 月 14 日。
73 路透社，“俄罗斯否认在叙利亚杜马使用化学武器，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告”，2018 年 4 月 8 日；BBC 新闻，“叙利亚冲突：俄罗斯称没有杜马化学攻击的证据”，2018 年 4 月 9 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Sputnik，“我们有证据证明英国在杜马事件中，挑衅俄罗斯国防部”，2018 年 4 月 13 日；BBC 新闻，俄罗斯表示，叙利亚的“化学袭击”已经上演，2018 年 4 月 13 日。
74 路透社，荷兰政府表示，它挫败了俄罗斯入侵化学武器监管机构的企图，2018 年 10 月 4 日。
75 弗洛姆金·D，“纠缠的联盟”，外交部，1970 年 7 月。

76 贝克利·M，“纠缠的联盟-神话”，岩石战争，2015 年 6 月 9 日。
77 美国国务院，“美国集体防御安排”。
78 白宫，“就职演说：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准备发表讲话”，2017 年 1 月 20 日；丘吉尔·S.美国：美国第一的历史和美国梦（布卢姆斯伯里:伦敦，2018）。
79BBC 新闻，默克尔：欧洲在特朗普和英国脱欧后“不能再依赖盟友”，2017 年 5 月 28 日；《时代周刊》，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成立一支“欧洲军队”来防御中国、俄罗斯和美国，2018 年 11 月 7 日；政治杂志，马克龙说特朗普的行为‘损害’了盟友，2018 年 11 月 29 日。
80 德鲁里·C，欧洲领导人“被吓死”，唐纳德·特朗普将把美国军队撤出欧洲大陆，《独立报》，2018 年 7 月 8 日；雷诺夫·J·S，“为什么特朗普让欧洲更害怕俄罗斯可能发动的袭击”，《对话》，2018 年 7 月 18 日。
81 白宫，“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2017 年 12 月，第 3 页；美国国防部（DOD），2018 年美国国防战略概要：提高美国军队竞争优势（DOD:华盛顿特区，2018 年 1 月）；阿里·I，美国军方将“大国竞争”置于战略核心：马蒂斯，路透社，2018 年 1 月 19 日。
82 萨斯·G，“克里米亚兼并 2.0”，朱迪·登普西的战略欧洲，卡内基欧洲，2018 年 11 月 29 日。乌克兰冲突，另见本卷第 2 章第 4 节。
83 萨哈·D，克拉夫楚克·V 和莫夫尚·V，“新刻赤海峡大桥对乌克兰贸易的影响”，政策简报系列，PB/02/2018，德国乌克兰咨询小组，2018 年 2 月；索科·V，“亚速海，刻赤海峡：法律地位演变（第 1 部分）”，《欧亚日报》，第 15 卷，第 169 期（2018 年 12 月 3 日）；索科·V，“亚速海，刻赤海峡：法律地位演变（第 2 部分）”，《欧亚日报》，第 15 卷，第 171 号（2018 年 12 月 5 日）；索科·V，“亚速海，刻赤海峡：法律地位演变（第 3 部分）”，《欧亚日报》，第 15 卷，第 173 号（2018 年 12 月 10 日）；索科·V，“亚速海，刻赤海峡：法律地位演变（第 4 部分），《欧亚日报》，第 15 卷，第 173 号（2018 年 12 月 10 日）。
84 俄罗斯为世界第 12 大经济体；除美国和中国外，下列国家（按顺序排列）的国民经济总量都比俄罗斯大：日本、德国、印度、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加拿大和韩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 数据映射器”，2019 年 3 月 20 日数据。
85 利文·A.，“幽灵之舞：与俄罗斯的新冷战不符合西方利益”，生存，第 60 卷，第 5 期（2018），第 115-40 页。
86 彭伯顿·M，“美国海外基地：事实”，2018 年 11 月 27 日；彭伯顿·M，“我们可以达成的共识：关闭一些海外基地”，防务一号网站，2018 年 11 月 28 日。
87 奈·J·S，软实力：在世界政治中取得成功的手段，（珀修斯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剑桥，2004 年）。
88 半岛电视台，“哪些国家在驱逐俄罗斯外交官？”，2018 年 3 月 31 日。
89 赫斯特·T，“中国经济增长简史”，世界经济论坛，2015 年 7 月 30 日。
90 霍克斯沃思·J 和陈·D，2050 年的世界：全球经济实力转变是否还会继续？（普华永道：伦敦，2015 年 2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经济前景六图，2018 年 7 月 26 日。
91 吉赛·R 和周·J，《丝绸之路经济带：考虑安全影响和中欧合作前景》，SIPRI 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SIPRI:斯德哥尔摩，2017）；以及吉赛·R，苏·F 和萨尔曼·L，《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欧盟的安全影响和未来之路》，SIPRI 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SIPRI:斯德哥尔摩，2018 年）。
92 英国《金融时报》，“习近平在达沃斯为全球化提供强有力的辩护”；2017 年 1 月 17 日，NBC 新闻，“中国习近平针对特朗普在全球化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演讲”；希尔顿·I，“中国：气候领袖的矛盾”，翻译稿，2017 年 12 月 11 日。
93 柯林斯·M，“是时候站出来对抗中国了”，《工业周刊》，2016 年 6 月 13 日；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2018 年 5 月 29 日。
94 汪·D.和柯蒂·A·C，“美中贸易战：时间表”，中国简报，2019 年 2 月 25 日。
95BBC 新闻，“特朗普指责中国在选举中“干涉”他”，2018 年 9 月 26 日。
96《经济学人》“中国在南海岛屿上部署导弹”，2018 年 5 月 21 日；费勒克·B“中国在南海岛屿上试验轰炸机”，CNN，2018 年 5 月 21 日。关于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见史密斯·D，“国际紧张局势和权力转移动态”，SIPRI 年鉴 2018，第 12-13 页。
97 布朗·R 和斯塔尔·B，“在与中国的紧张对峙中，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CNN，2018 年 10 月 23 日。
98 CNN，“照片显示中国军舰与美国驱逐舰相撞近在咫尺”，2018 年 10 月 4 日。
99 中东和北非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100 半岛电视台，巴林称“阿拉伯北约”将于明年 10 月 29 日成立，《经济学人》，新的阿拉伯军事联盟前景黯淡，2018 年 10 月 6 日，海伦·A，究竟是什么阻碍了阿拉伯北约？，《国防新闻》，2018 年 11 月 20 日。
101 向中东转让导弹问题，见本卷第 5 章第 3 节。另见埃尔斯托特，“剖析国际社会对伊朗导弹的担忧”，SIPRI 背景文件，2018 年 11 月 15 日。
102BBC 新闻，“贾马尔·卡舒吉：沙特记者之死，你需要知道的一切”，2018 年 12 月 11 日；伊格纳修斯·D，“卡舒吉遇害之谜如何震撼美沙伙伴关系”，《华盛顿邮报》，2019 年 3 月 29 日。
103 斯坦卡蒂·M 和 赛德·S，“沙特阿拉伯被指控在针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中虐待女权活动分子”，《华尔街日报》，2018 年 11 月 20 日。
104 科克本·P，“也门战争死亡人数之巨，已然五倍于我们认为可以耸耸肩置之不理的数量”，《独立报》，2018 年 10 月 26 日；《科学日报》，也门霍乱疫情之谜已经解开，2019 年 1 月 2 日；联合国新闻，“一半的

也门人面临饥荒风险：联合国紧急救援负责人”，2018 年 10 月 23 日。
105 也门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10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 年人类发展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4 年）。
107 克拉姆佩·F 和史密斯·D，“中东与气候相关安全风险”，A·耶格斯科格，M·舒尔茨和 A·斯温编辑的《中东安全劳特利奇手册》（劳特利奇:阿宾顿，2019）。
108 英国发展、概念和理论中心对未来风险的评估，全球战略趋势：未来从今天开始（英国国防部：伦敦，2018 年 10 月）。
109 NASA，根据 NASA，NOAA，2018 年是持续变暖趋势中第四热的一年，《全球气候变化》，2019 年 2 月 6 日。
110 塞维莱克·F 和德里霍特·S·S，“一个新的概率预测系统预测了异常温暖的 2018-2022 年，长期全球变暖趋势强化”，《自然通讯》，2018 年 8 月 14 日；BBC 新闻之夜，“2018 年热浪得以解释”，YouTube，2018 年 7 月 25 日。
111 森古普塔·S，梅·T 和雷曼·Z，“创纪录的高温是如何在四大洲造成巨大破坏”，《纽约时报》，2018 年 7 月 30 日；《卫报》，“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巨大的加拿大冰川迅速萎缩”，2018 年 10 月 30 日。
11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全球变暖 1.5° C（IPCC:2018 年日内瓦）；列文·K，“关于 IPCC 1.5° C 报告的 8 件事，你需要知道”，世界资源研究所，2018 年 10 月 7 日。
113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研究成果经常被误报为揭示脊椎动物总数减少 60%，这与所有大小迥异的动物种群平均 60%的损失在统计学上有很大不同。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华盛顿特区，2018 年。同时见罗查·J·C，“级联内和跨尺度的级联转换”，《科学》，第 362 卷，第 6421 号（2018 年 12 月 21 日），第 1379-83 页。
114 见鲁廷格·L，《新和平气候：对气候和脆弱性风险采取行动》，阿德菲，《国际警报》，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欧洲联盟安全研究所报告，2015 年。
115IPCC（注 112），导言，第 A.1 段。
11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处于气候行动前线的小岛屿国家”，2017 年 9 月 18 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数据主要来源为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高级代表办事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统计”。
117 阿西奥纳，所有人的可持续性，“面临因气候变化而存在消失风险的国家”。另见牙买加统计研究所，“气候变化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 49 届大会上的演讲，2018 年 3 月 7 日。
118 “海岸之战”，《世界海洋评论》，第一卷（2010 年）。
119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IFAD、UNICEF、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 WHO，2018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为粮食安全和营养建立气候耐受能力（FAO：罗马，2018 年）。
120 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监测冲突国家的粮食安全（FAO 和 WFP：罗马，2019 年 1 月）。
121 布伦伯格·N，桑斯杰·H 和莫比克·M，“欧盟和气候安全风险：正在形成的实践共同体？欧洲一体化杂志，2018 年；菲什曼·A，“欧盟讨论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2018 年 6 月 28 日；坎普·F 和阿明加·V·M.，“需要非盟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特使”，SIPRI 评论，2019 年 2 月 7 日。
122 瑞典政府办公室，“外交部长马戈特·瓦尔斯特伦在联合国安理会气候安全风险辩论会上的发言”，纽约，2018 年 7 月 11 日。
123 SIPRI，“气候安全风险专家工作组”；史密斯·D，气候安全：使之可行，克林根戴尔报告，2019 年 2 月；德国联邦外交部，“联合国：德国发起气候与安全之友小组”，2018 年 8 月 8 日。
124 卡尔多·M，“罗伯特·尼尔德讣告”，《卫报》，2019 年 1 月 8 日。

第一部分：2018 武装冲突和冲突管理

第二章：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

第三章：和平行动和冲突管理

第二章.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

概述

本章介绍 2018 年全球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的发展情况，本章以区域为脉络展开（美洲、亚洲和大洋洲、欧洲、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核心案例均以学术出版物、新闻报道和专业冲突数据库为蓝本。本章并未将所有有组织武装暴力收录，基本不涉及刑事暴力事件，特殊事例主要出现在第 2 节美洲论述之中。

根据学术和技术出版物、新闻报道和与冲突有关的数据库，讨论了关键实例。本章不包括所有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基本上不包括刑事暴力，第二节讨论的主要例外是美洲的一些事件。

第 1 节主要探讨 2018 年武装冲突定义和主要特征及后果。现今大量的武装冲突往往爆发在城市地区且受害者主要为平民。2018 年，城市稠密地区出现爆炸性武器使用，超过 90%的伤亡均为平民。2018 年年初，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口为 6850 万（包括 2500 多万难民）。阿富汗、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流离失所危机灾难深重，旷日持久。

美洲（第 2 节），尽管在 2018 年遇到一系列问题，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稳步推进。尽管哥伦比亚是美洲地区唯一个存在活跃武装冲突的国家，但是由于有组织犯罪和非国家武装组织在中美洲和南美洲许多国家肆虐，美洲安全和动荡局势依旧普遍。尼加拉瓜爆发政治动乱和暴力冲突，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危机日益严重，产生大量难民外流，这也引发了人们对地区稳定深深的担忧。经济发展停滞、地区性犯罪和腐败问题的多重打击，人民对民主的信心几乎消磨殆尽。

2018 年，亚洲和大洋洲（第 3 节）共有 7 个国家爆发活跃武装冲突：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最严重的 3 次武装冲突发生在阿富汗、缅甸和菲律宾。阿富汗战争是 2018 年世界第一致命的武装冲突，共有 43000 多名战斗人员和平民丧生。尽管林林总总各类和平进程出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进展，但时至岁末年终，冲突各方依旧一如往常势不两立，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地区和国际大国也是各自为阵。出现两个新的趋势（a）基于种族和/或宗教两极分化下的政治身份，导致暴力不断上升；以及（b） 跨国暴力圣

战组织泛滥，包括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生根发芽。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也极为普遍，但却鲜有报道。2018 年的两大核心进程是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以及印巴克什米尔地区武装冲突的再度爆发和停火。

2018 年，欧洲爆发乌克兰武装冲突（第 4 节），除间或的临时停火，和平进程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欧洲其他地方，紧张局势仍然是源于那些久拖未决的冲突，尤其是后苏联时代的冲突，以及黑海地区这类高度军事化和争议安全背景下的各类问题。

2018 年，中东北非地区（第 5 节）共有 7 个国家爆发活跃武装冲突：埃及、伊拉克、以色列、利比亚、叙利亚、土耳其和也门。其中多起冲突相互关联，涉及区域和国际大国及众多非国家行为者。除上述武装冲突，2018 年，还有三大冲突贯穿始终并重塑地区安全格局：（a）

地区国家间博弈背后是不断变化的外部联盟和利益之争，（b）暴力圣战组织的持续威胁，以及（c）水资源竞争的日益加剧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

2018 年，伊拉克步入后冲突时期，但本质上伊拉克依旧是一个国家机器运转极其羸弱的国家。以色列和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巴勒斯坦组织之间的持续武装冲突和内乱持续恶化，上升至 2014 年以色列-加沙战争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 2018 年叙利亚内战硝烟还未散尽，但由于叙利亚政府牢牢控制了领土，伊斯兰国几近战败，叙局势明显缓和。2018 年，尽管从港口城市荷台达拉开停战大幕，联合国也努力从中斡旋，也门人道主义状况依旧出现恶化。

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在年底达成的《斯德哥尔摩协定》令人稍感欣慰，尽管随后的谈判中仍有重大分歧有待弥合。

2018 年，11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第 6 节）爆发活跃武装冲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索马里、南苏丹和苏丹。由于伊斯兰暴力组织、其他武装团体和犯罪网络的跨国活动，许多武装冲突在国家和区域间呈现重叠趋势，并与赤贫、治理不善、经济脆弱和复原力低下相互交织。2018 年，三大问题贯穿多领域，极大的影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a）非洲反恐活动持续国际化；（b）选举相关暴力冲突规模和频度变化；（c）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日益恶化。2018 年 7 月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达成的和平协议可能会改变非洲之角的游戏规则。

伊恩·戴维斯

第 1 节.2018 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回顾

伊恩·戴维斯

2018 年，共有 27 个国家爆发活跃武装冲突：美洲 1；亚洲和大洋洲 7；欧洲 1；中东和北非 7；撒哈拉以南非洲 11（分别见第 2 节至第 6 节）。[1]同往年一样，绝大多数武装冲突发生在单一一个国家（国内）、政府军同一个或多个非国家武装组织之间。只有一场武装冲突为国家间战争（印巴边界冲突），两场为国家军队同渴望建国的武装组织之间的战争，战争有时会蔓延到国际公认的国家边界之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土耳其和库尔德人）。国内冲突，涉及三个重大武装冲突（年度冲突相关死亡人数超过 1 万）-阿富汗（约 43700 人死亡），也门（30700 人）和叙利亚（30200 人），13 国爆发高强度武装冲突（年度冲突相关死亡人数超过 1000）-伊拉克（6200 人），尼日利亚（6200 人），索马里（5100 人）、刚果民主共和国（DRC，3000 人）、土耳其（2000 人）、菲律宾（1800 人）、马里（1800 人）、埃塞俄比亚（1600 人）、南苏丹（1500 人）、喀麦隆（1500 人）、埃及（1200 人）、中非共和国（CAR，1200 人）和利比亚（1100 人）。然而，这样的分类只能是暂时性的：作为上述死亡数据编纂者，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ED）提醒："死亡统计信息是最有偏见和最不准确的数据统计，任何冲突报告采集任何死亡数据都应极为谨慎。[2]所有三大核心武装冲突和大多数高强度武装冲突都已国际化，也就是说，外部因素的卷入都会延长或加剧武装冲突。

本节论述了"武装冲突"的定义及本章使用的相关术语，着重对 2018 年武装冲突的突出特点（主要是延续性）以及主要后果进行了探讨，同时对本年度和平进程进行梳理。

表 2.1 暴力武装形式及其两方面核心数据

数据集	覆盖区域（最近年份）	信息类型	方法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地域事件数据集；<www.ucdp.uu.se/ged>	全球（2017）	日期 位置 演员 事件类型 死亡人数	具有政治目的的有组织行动者之一切形式武装暴力，造成至少1人死亡。3种事件类型：国家间武装冲突；非国家间冲突；单方面暴力冲突。
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www.acleddata.com>	非洲 中东 南亚 东南亚 （2018）	日期 位置 演员 事件类型 死亡人数	所有“政治暴力和抗议事件”，暴力和非暴力（如部队调动），没有死亡门槛。6种事件类型：战争；爆炸/远程暴力；针对平民的暴力；抗议；暴乱；战略发展。

定义武装冲突

武装冲突日益呈现出复杂性和多维性，通常涉及多个行为主体和目标的多重且多变性。[3]这种复杂性对武装冲突概念和法律划分以及和平建设和冲突预防理念都是一个重大挑战。[4]在国际法框架内界定“武装冲突”，如根据冲突是国家间（两国或多国武装冲突）还是发生在一国和单一或多个非国家组织之间（国内武装冲突），而有所不同。[5]暴力犯罪带来更多的问题；尽管暴力犯罪同武装冲突一样威胁一国政府和国家运转，但并不属于国际法范畴。2018年，绝大多数武装冲突均为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尽管国家间武装冲突相对较易判别，但国内武装冲突和惯常规模较小的国内政治暴力事件之间往往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区分两类的阈值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通过权衡一系列指标数据后进行评估。可能包括行为主体是否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冲突持续时间、暴力行为和军事行为频率及其相互连续程度、使用武器性质、平民流离失所、反对派部队领土控制以及受害者人数（含死伤人数和流离失所人数）。[6]

复杂多维也导致暴力和冲突主流数据库之间的差异，包括本章引用的两大数据集：ACLED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程序地理参考事件数据集，每个数据集都有自己的定义和方法（见表2.1）。[7]

本章主要描述（非定量）2018年重大武装冲突趋势和大事件。[8]本章采取相对松散的框架来论述和区分三大武装冲突类型：国家间、国家内和国家外部冲突（见方框图2.1）。同时还将它们同其他有组织暴力（如暴力犯罪）区分开来。为界定武装冲突，本章将一年25人冲突相关死亡定义为武装冲突阈值。

2018 武装冲突的显著特征

冷战后大多数武装冲突不仅仅是正规军，而且也有民兵和武装平民卷入其中。战斗常常是间歇性，强度不一且间或短暂停火，很鲜有明确的战场。大多数武装冲突性质都是由具体情况决定；本节重点阐述 2018 年几场武装冲突的一些重要特征。

虽然有证据表明暴力越来越集中在城市地区，但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与政治和刑事暴力相关（此类问题多超出本章范围）。[9]尽管冷战后武装冲突往往是在城市进行，但其他冲突则还是保留了强烈的农村特征。平民无论是在城市和农村武装冲突中都有很大的危险，但在城市环境中这种危险往往倍增。根据一项研究，当在城市地区（研究中定义为“人口稠密区”）使用爆炸性武器时，超过 90%的伤亡为平民（相比之下，农村或“其他”地区为 20%），连续 8 年数据都是如此。[10]

武装冲突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非国家武装组织之间使用武力。本章武装冲突被定义为一年冲突相关死亡人数为 25 人或 25 人以上。战争死亡数据往往不精确且不明确，本章根据本年度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将冲突定性为重大（10000 人或以上死亡）、高强度（1000-9999 人死亡）或低强度（25-999 人死亡）武装冲突。

武装冲突可进一步进行如下分类

国家间武装冲突，即两国或多个国家间的战争，现在已较为罕见，且冲突强度多数较低。尽管国家间领土、边界和其他争端依旧持续存在，但大多不太可能升级为武装冲突。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是最常见的武装冲突形式，通常涉及一个或多个国家武装与单一或多个明确政治目标（如控制整个国家或部分国家领土）的非国家组织之间的持续暴力冲突。也可分为以下几类：

•次国家级武装冲突通常限于一个主权国家内的特定地区，该国其他地区经济社会活动相对政策。此类冲突往往发生在稳定的中等收入国家，此类国家拥有强力的国家机构和精干的国家安全部队。有时一个大国的动乱边境也有可能爆发，原因是该国在过去有过地理上的扩张，或是边境划界相对模糊。

•内战涉及该国大部地区，年度冲突相关死亡人数超过 1000。

•如遇外部势力（不含联合国和平行动）介入，冲突明显延长或是加剧，如单一或多个外部国家或外部非国家行为体对冲突国一方或多方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或军事训练等武装干预，则此类武装冲突可界定为国际化。

国外武装冲突发生在一个国家和一个政治实体之间，此政治实体并未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为一个国家，但其长期具有建国愿望（如巴以冲突）。此类冲突较为罕见，多发于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边界内外。

在城市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尤其是破坏半径大、投送载具精度低或是能够在大范围实施多弹头打击的爆炸性武器，是一个日益令人关切的问题，也是人道主义军控的焦点所在。[11]

根据联合国-世界银行的一项联合研究，过去几十年间，参与冲突的武装组织数量持续上升。从 1950 年的每次国内冲突平均 8 个冲突组织增加到 2010 年的 14 个。[12] 像叙利亚和利比亚这样的武装冲突，大大小小的武装组织不下千余。[13] 尽管武装冲突行为主体或武装组织

识别体系的差异，导致我们无法对此类研究进行横向对比，但武装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的趋势似乎很容易确定：2018 年 ACLED 共记录 2271 个各色武装组织，较 2017 年增加 23%。尽管按照 ACLED 统计数据，非国家行为体数量飙升，但是造成平民伤亡最多的且最强大最暴力的行为主体依旧是国家部队。[14]

按照 ACLED 口径统计，2018 年有组织暴力总体有所减少，但是覆盖面更广。阿富汗、叙利亚和也门三地的武装冲突中，有组织暴力事件发生率最高，伤亡人数最多，2018 年死亡人数合计接近 10 万。[15]

当代武装冲突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强征和使用童兵。2017 年最新可查数据表明，全年共有 8000 多名儿童被强征到非国家或政府军（较 2016 年上升 3%）。经查证，CAR 童兵数量翻了两番，DRC 增长一倍，索马里也是大幅增长，尼日利亚、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童兵比例也是长期居高不下。[16]

武装冲突中性暴力频发。两大国际政策应对为联合国安理会第 1820 号决议和 1998 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1820 号决议承认普遍存在将强奸作为一种战略策略的现象，罗马规约承诺对犯下“令人发指，震撼人类良知罪行”的人提起指控，并明确将战争中的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定性为刑事犯罪。[17]联合国秘书长在其关于冲突相关性暴力年度报告中，将暴力极端主义势力抬头、武器扩散、大规模流离失所和法治坍塌列为性暴力的核心诱因。2017 年（报告年份）

阿富汗、CAR、哥伦比亚、DRC、伊拉克、利比亚、马里、缅甸、尼日利亚、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冲突中都有性暴力罪行。[18]2018 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丹尼斯·穆克韦格和纳迪亚·穆拉德，表彰他们为终结武装冲突中性暴力所作出的不懈努力。[19]

许多武装冲突中，尤其是在高强度重大武装冲突中，还发生国其他违反国际人权国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包括利用饥饿达到军事目的、拒绝人道主义援助、强迫流离失所以及袭击援助人员、医院和学校。目前尚不清楚此类行为是否还在呈现上升势头，但是那些旨在战争中保护平民的国际规则正在一步步被击碎。[20]

2018 年武装冲突后果

武装冲突带来的不仅仅是生命凋零，百姓流离失所，基础设施被毁，国家机器停滞，同时还会带来一系列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问题。

武装冲突中受害最深的就是儿童：2017 年（最新可查数据）共有 4.2 亿儿童生活在武装冲突影响地区--几乎占到全球你儿童五分之一---1.42 亿儿童生活在高强度或核心武装冲突地区（即年度武装冲突相关死亡人数大于 1000 人）。[21]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冲突后遗症，如营养不良、疾病和医疗系统坍塌以及供水和卫生条件不足。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记录了 2017 年全球冲突，共发生 25000 起针对儿童的“严重侵犯”事件，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报告所述的 6 类严重侵犯行为：杀害和残害儿童、招募和使用童兵、儿童性暴力、绑架儿童、袭击学校和医院以及拒绝人道主义援助。[22]

冲突死亡人数一直稳定下降，过去 25 年中战斗死亡人数仅占过去 100 年战斗死亡人数的 3%，如果剔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 7%。[23]近年来，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一些。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测算，2014 年，有组织暴力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 15 年来最高水平，总计约有 10.3 万人死亡。乌普萨拉 2017 年最新数据显示，死亡人数近 92000 人，连续第三年下降，较 2014 年峰值降低 32%。[24]数据地理覆盖范围更为集中（2018 年集中在亚洲、中东和非洲，但不包括欧洲或美洲），但暴力冲突事件类型更为丰富。ACLED 报告称，从 2017 年至 2018 年，政治暴力死亡人数减少 23%，似乎也印证了下降趋势得以延续。[25]ACLED 报告称，2018 年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拉克和叙利亚死亡人数降低最为显著。

武装冲突还是流离失所背后的罪魁祸首。[26]2017 年年末，全球被迫流离失所

人数为 6850 万人（含 2500 万难民），这一数据可能会持续到 2018（本文创作时数据尚未公布）。[27]2018 年，美洲流离失所形势继续恶化，超过 50 万人逃离政治暴力肆虐、经济崩盘的委内瑞拉（见第 2 节），这也使得 2015 年开始越境进入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人口总数超过 100 万。阿富汗、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地相继发生旷日持久的流离失所危机。大量流离失所的百姓跨国边境，需求难民庇护和援助，还有无以计数的民众只能在本国游荡。[28]

针对大量难民大规模长时间流动，联合国经过两年的磋商和谈判于 2018 年 12 月通过两项全球协定：《全球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契约》（GCM）和《全球难民契约》。两项协议都不具法律约束力。全球合作机制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由 164 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一次政府间会议得以通过，该协议是第一个处理全球移民问题的全面国际协定。[29]该机制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合作框架，在此基础上，各国可采取各类措施以加强正常移民途径，解决非正常移民问题，保护移民人权。12 月 19 日，联大通过：152 个国家赞成，5 个国家反对（捷克、匈牙利、以色列、波兰和美国），12 个国家弃权，24 个国家未投票。[30]反对 GCM 的主要是强烈反对移民的国家。[31]

12 月 17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该契约建立在现行既有难民待遇相关国际法基础之上。旨在更为公平地分摊收容责任，较全球合作机制赢得更多国际支持，只有美国和匈牙利两国投了反对票。[32]

2018 年，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后，粮食危机席卷阿富汗、CAR、DRC、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 7 个国家和乍得湖盆地地区（与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接壤）。

上述国家和地区约有 5600 万人急需粮食和生存救援。其中三个地区（乍得湖盆地、索马里和叙利亚）在 2018 年下半年粮食危机有所改善，这也与其安全形势改善相一致。然而，其他 5 个地区，2018 年下半年粮食问题愈发严峻。[33]

最后，无论是眼前还是长期，武装冲突对社会带来的都是巨大的经济损失。研究表明，2017 年全球暴力损失为 14.8 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12.4%，为过去 10 年的峰值。受暴力影响最为严重的 10 个国家，其经济损失达到其 GDP 的 45%；2017 年叙利亚、阿富汗和南苏丹的暴力冲突带来的损失相当于其 GDP 的 68%、63%和 49%。过去 10 年中，和平国家 GDP 增长为冲突国家的 7 倍。

34

和平进程

和平进程，正如其针对的冲突一样，同样也日益呈现复杂多维的特点，参与方庞杂、行为方式各异、最终结果也是云泥之别。[35]2018 年，和平进程包括结束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冲突的和平协议和在西班牙正式解散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埃塔（ETA，巴斯克祖国自由党）。

波诡云涌、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中，和平进程不啻为一缕希望之光，尤其是在美国和塔利班进行外交接触的阿富汗，尤其是在达成新和平协定的南苏丹和也门。

建设和平的努力通常包括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复员以及重返社会；停火谈判；签署和平协定；多边和平与维稳行动；权力共享安排；以及旨在实现冲突各方可持续和平的国家建设举措。[36] 近年来，还做出大量努力使得和平进程更具包容性，尤其是提升妇女的参与度。[37]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和平进程最终都能带来持久的和平。似是而非的政治解决途径、悬而未决的冲突根源、持续的动荡和紧张局势往往导致武装冲突死灰复燃。[38] 多数和平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常常是道阻且长。一些国家协议最终被撕毁，重拾兵刃（如 2013 年底以来的南苏丹），但是其他国家也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停火，尽管持续性停火仍未实现（如后苏联时期久拖未决的武装冲突，见第 4 节）。即便是相对成功的和平协定，如 2016 年哥伦比亚协定，也一样面临挑战（见第 2 节）。

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武装冲突都是以前的冲突再度爆发，而并非产生了新冲突。基于对 1975-2011 年签署的 216 份和平协定的研究，91 项协定在随后 5 年内战火重燃。[39] 这也说明，和平进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多维性，但是成功的协定还是多于失败的协定。随着战争和平界限的日益模糊，界定武装冲突结束也一样会变得越来越困难。[40]

1 本节和本章所使用“武装冲突”定义及相关术语，见下文第 2.1 栏“武装冲突定义”。
2 武装冲突地点及事件数据项目(ACLED),“数据导出工具”;ACLED,“死亡”。伤亡人数统计，见吉格尔·A，《武装冲突中的伤亡记录:方法与规范问题》，SIPRI 年鉴 2016，第 247-61 页。
3 见戴维斯·I，追踪 2017 年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SIPRI 年鉴 2018，第 30-31 页。
4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和平之路:预防暴力冲突的包容之道》一书中，对这种复杂性进行了阐述(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2018)。
5 见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暴力与使用武力》，2011 年 7 月。
6 威特·S,《国际人道主义法中武装冲突的类型:法律概念与实际情况》,《国际红十字会评论》第 91 卷第 873 期(2009 年 3 月)。
7 收集和获得武装冲突数据方面的重大进展，见布尔佐斯卡·M,“集体暴力定量数据收集进展”，SIPRI 年鉴 2016，第 191-200 页。
8 2018 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更多信息，见本卷附件 C。
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 脆弱国家:洞悉暴力》(OECD:巴黎，2016);安东尼·I,《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红十字会法则及其在城市战争中的应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 2017 年第 545-53 页;国际红十字会,“城市战争”。
10 打击武装暴力行动,“2018:爆炸性暴力之年”，2019 年 1 月 11 日。
11 见本卷第 9 章第 1 节。另见奥弗顿·I，克雷格·I 和珀金斯·R,广域影响:调查爆炸性武器的广域效应，武装暴力行动，2016 年 2 月。
12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注 4)。
13 BBC 新闻,“叙利亚叛军概览”，2013 年 12 月 13 日;BBC 新闻,“利比亚主要民兵组织概览”，2016 年 1 月 11 日。
14 基希·R，帕夫利克·M，ACLED 2018:一年回望，ACLED, 2019 年 1 月 11 日，第 13-14 页。
15 基希·R 和帕夫利克·M(注 14)，第 18 - 20 页。
16 拯救儿童，停止对儿童的战争:保护 21 世纪冲突中的儿童，2019 年，第 20 页;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秘书长报告”，A/72/865-S/2018/465，2018 年 5 月 16 日。
17 联合国安理会第 1820(2008)号决议，S/RES/1820(2008)， 2008 年 6 月 19 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1998 年 7 月 17 日。见柯尼格·K 和林肯·R 和格罗斯·L，性暴力法学，性暴力与问责项目工作论文，美国伯克利大学人权中心，2011 年 5 月。
18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冲突性暴力问题的报告，S/2018/250, 2018 年 3 月 23 日。

19 诺贝尔媒体,“2018 年诺贝尔和平奖”;穆勒·B,“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要求全世界对大规模强奸采取行动”,《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10 日。
20 见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报告，S/2018/900, 2018 年 10 月 9 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安理会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讲话，2018 年 5 月 22 日。
21 奥斯拜·G 和托勒夫森·A·F,“武装冲突影响下的儿童，1990-2017”,《冲突趋势》第 10 期，奥斯陆和平研究所，2018 年。
22 见拯救儿童(注 16)第 19-21 页;联合国(注 16)。
23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18 年全球和平指数:在复杂世界中的和平评估，2018 年 6 月，第 36 页。
24 彼得森·T 和艾克·K，有组织暴力，1989-2017，和平研究杂志，第 55 卷第 4 期(2018)，第 535-547 页。
25 基希·R，帕夫利克·M(注 14)，第 13 - 14 页。
26 见格瑞普·L，危机应对:脆弱环境下的被迫流离失所，SIPRI 年鉴 2017，第 253-284 页。
27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全球趋势:2017 年被迫流离失所，2018 年。
28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注 27)。
29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政府间会议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全球协议”，摩洛哥马拉喀什，2018 年 12 月 10 日-11 日，会议成果文件草案，A/CONF231/3，2018 年 7 月 30 日。
30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73/195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全球协议”，A/RES/73/195, 2019 年 1 月 11 日;《华盛顿邮报》2018 年 12 月 19 日报道，“联合国大会通过全球移民协议”。
31《经济学人》,“欧洲各国政府因一项不具攻击性的移民协议分崩离析”;英国《金融时报》2018 年 12 月 3 日报道，“欧洲国家反对分裂的联合国移民协议”。
32 联合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报告，第 2 部分:全球协议，A/73/12(第 2 部分)，
2018 年 8 月 2 日;联合国新闻,“全球难民协议:这与移民协议有何不同?”2018 年 12 月 17 日;美国之音“联合国通过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3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冲突局势国家粮食安全监测:FAO/WFP 联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最新情况，2019 年 1 月，No.5。关于武装冲突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见 FAO、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WFP 和世界卫生组织-2018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建立粮食安全和营的气候适应力，(FAO:罗马，2018)。
34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18 年和平的经济价值:衡量暴力与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2018 年 10 月。
35 沃尔夫·S，“和平的建立:进程与协议”，武装冲突调查，第 4 卷第 1 期(2018)，第 65-80 页。
36 见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注 4)，第 144 页。多边和平行动，见本卷第 3 章。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见巴斯曼·M,《部队整编、复员与内战战火重燃》,《干预与国家建设杂志》第 13 卷第 1 期(2019)，第 95-111 页。“和平”一词的各种解释以及实现和平的其他工具，见卡帕里尼·M 和米兰特·G,《危险地区的持续和平与可持续发展》，SIPRI 年鉴 2017，第 211-252 页。公认的和平协议中相关文件数据，见联合国，和平缔造者，“和平协定数据库检索”。冷战后和平协议分析，见卡斯珀森·N,《和平协议:寻求国家内部冲突的解决方案》(政治: 剑桥, 2017)。
37 巴尔·J，比尔滕·冈特·E 和容格·Y,“评估和平进程中的性别观点，并将其置于哥伦比亚和棉兰老岛案例研究之中”，No.2018/6,2018 年 11 月。
38 贝尔·C,《和平解决:人权与共同利益的创造》(英国学院:伦敦，2017 年 6 月);贝尔·C，波斯皮尔·J,《冲突转型中引导包容:正式的政治解决》,《国际发展杂志》，第 29 卷第 5 期(2017)， 第 576-93 页。
39 霍格布·S,“和平协议 1975 - 2011 -UCDP 和平协议数据集更新”，佩特森和 L·特纳, 2011 年武装冲突中的国家，和平与冲突研究报告 99(乌普萨拉大学:乌普萨拉，2012)，第 39-56 页;冯·艾恩西德尔,《内战趋势与武装冲突性质的变化》，联合国大学政策研究中心，2017 年 3 月 10 日。
40 德弗朗哥·C，恩伯格·佩德森·A 和门内克·M,“战争是如何结束的?”《战略研究杂志》，2019 年 3 月 21 日在线出版。

第 2 节.美洲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

玛丽娜·卡帕里尼和何塞·阿尔瓦拉多

2018 年，哥伦比亚是美洲唯一爆发活跃武装冲突的国家。哥伦比亚政府卷入两场低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与民族解放军（ELN）游击队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中不接受 2016 年和平协议并拒不解除武装，继续顽抗的残余分子。哥伦比亚政府同 FARC 之间的一纸协定并非那么牢不可破，伊万·杜克总统的民主中心党对和平协定诸多条款都是极力反对，其中就包括土地权利和民族和解。

尽管中美洲和南美洲并没有活跃武装冲突，但局势依然难言安定，依旧是世界暴力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尼加拉瓜，反对政府削减社会保障福利声势浩大，政府出动安全部队对抗议者进行镇压。在委内瑞拉，严重的经济恶化和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难民大量外流（尤其是流入邻国哥伦比亚），人们对安全形势早已是忧心忡忡。中美洲和南美洲暴力犯罪水平持续攀升，过去 20 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动用军队打击暴力犯罪。[1] 公众对经济问题、地区性犯罪和政府贪腐深恶痛绝，对民主的信息降至冰点。民粹主义抬头，巴西和墨西哥尤甚，地区最大的两国，都是民粹主义领导人当选总统。

大事件

2018 年正值美洲大选季，整个美洲政治变革风头正盛。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巴拉圭和委内瑞拉相继举行大选。随着劳尔·卡斯特罗下台，古巴也完成权力交接，全国人民权力大会投票副总统米格尔·迪亚兹·卡内尔接替总统职位；智利新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正式就职。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巴拉圭和美国也举行了立法选举。[2]

平均而言，中美洲、加勒比和南美洲 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1.2%）增幅略低于预期，尽管其中部分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后羸弱的经济复苏出现的经济增长乏力。[3] 好几个国家大选之时，民众人心惶惶、腐败丑闻四起、各方政治势力粉墨登场。[4] 民意调查现实，中美洲和美洲民众对民主的信心急剧下降。[5] 平均而言，该地区只有 20%受访者表示，相信自己的国家正在进步。[6] 受访者最为关

心的问题是经济问题（35%）、犯罪和公共安全（19%）、政治问题（9%）和腐败问题（9%）。[7]

2018 年年底，民粹主义领导人已在该地区最大的两个国家掌权。左派领导人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布拉多（俗称 AMLO）获得压倒性胜利，开始为期 6 年的总统任期，他已能控制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强力推动宪法改革。巴西，保守派贾尔·博尔索纳罗开始为期 4 年的总统任期。但是由于未能获得政府统一联盟多数席位，而宪法修正案必须获得五分之三的多数票，因此也难言高枕无忧。同时巴西国会 30 多个政党，也创下纪录，极度分散的国会也是一大隐患。[8]

尽管洛佩斯·奥布拉多总统和博尔索纳罗总统分别来自左翼和右翼，但两人都是民粹主义者，都反对精英腐败，都是彻底激进变革的倡导者。洛佩斯·奥布拉多的政治重心是帮助穷人，实行公务员减薪和打击腐败，而博尔索纳罗则强调法律和秩序、小政府、私有化、减税和对赤字缠身的养老金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9]博尔索纳罗接替米歇尔·特梅尔，后者在迪尔玛·罗塞夫总统任内一直担任副总统，直到她于 2016 年 8 月被弹劾免职。博尔索纳罗战胜主要对手，左翼工人党的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达席尔瓦因贪污被判入狱 12 年。达席尔瓦曾谋求连任，直至被法院禁止参与大选。[10]一个接一个的腐败丑闻也断送了恩里克·培尼亚·涅托的 6 年任期，涅托政府期间墨西哥国际腐败指数下降 33 位（从 180 个国家中的 105 位跌至 138 位）。[11]

虽说中美洲、加勒比和南美洲很少爆发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但暴力水平却是全球第一。这一地区 20 个国家中的 17 个，2018 年谋杀率都是全球前列。[12]同年，墨西哥杀人案增长 15%，女性谋杀率较 2017 年增长 13%。[13]洛佩斯·奥布拉多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宣誓就任总统，推出一项旨在降低凶杀率的长期政策。其中包括大麻合法化、特赦贩毒集团非核心成员、针对贫困的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项目。颇具争议的是，在国防部下组建一支由约 6 万名陆军、海军和联邦警察组成的新军事化国民警卫队，负责打击毒品帮派暴力。[14]

4 月中旬，尼加拉瓜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削减社会保障福利，并要求总统奥尔特加辞职。安全部队和亲政府武装准军事团体对抗议者实施镇压，300-450 人死亡，数千人受伤。[15]政局动荡和暴力肆虐，人权遭到肆意践踏，迫使约 6 万人在 2018 年底前逃离尼加拉瓜，其中 2.3 万人逃往哥斯达黎加。[16]奥尔特加拒绝提前举行大选以化解危机，并宣布其总统任期将到 2021 年。11 月，

美国对尼加拉瓜副总统罗萨里奥•穆里略（罗萨里奥•穆里略是奥尔特加的妻子，被广泛认为是奥尔特加指定的接班人，也是其高级助手）实施金融制裁，冻结这对夫妻档在美的任何资产，同时阻止美国金融机构同他们的业务往来。[17]

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犯罪团伙和非国家武装组织肆虐，严重挑战公共安全。暴力冲突和犯罪高峰期，一边是气焰嚣张的马拉斯（街头帮派），一边是铁拳出击的政府军，男人、女人、孩子，越来越多的人逃离洪都拉斯。而其他中美洲国家则有不少人组成车队，前往墨西哥和美国边境寻求庇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些车队是“洪水猛兽”，旋即向有争议边境地区部署了 5200 名美军士兵。[18]

按照美国政府“零容忍”政策，4 月至 6 月间，墨美边境 2737 名儿童因没有证件被逮捕，并同父母骨肉分离。一个政府监督机构称，据信在宣布零容忍政策之前，又有数千名儿童被从父母身边带离。[19] 迫于国内国际谴责，特朗普总统在 6 月宣布结束这一政策。然而，一些家庭依旧妻离子散，至 11 月底，又有 81 名儿童离开父母的怀抱。[20]

8 月 31 日，危地马拉总统吉米·莫拉莱斯宣布，危地马拉政府将不再延长消除危地马拉有罪不罚现象委员会任期。该委员会是联合国于 2007 年设立的一个独立机构，旨在协助国家机构对安全机构动用非常手段犯下的累累罪行进行调查，并解散此类组织，同时对犯罪分子提起诉讼。2015 年，委员会成功地对一众政府高层提起指控，最终将莫拉莱斯的前任奥托·佩雷斯·莫利纳拉下马。[21] 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深入，委员会工作被人们认为是莫拉莱斯政府对前任的清算，政治经济精英阶层反对声四起。[22]

今年 5 月的委内瑞拉大选几近白热化，一些候选人要么被禁止参选要么锒铛入狱，选举遭到第一大反对党的抵制。最终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再次当选，连任 6 年。反对派控制的国民议会拒绝承认马杜罗连任，理由是大选普遍存在不正当行为，包括涉嫌贿选和徇私舞弊，并坚称总统职位暂时空缺。根据委内瑞拉宪法，国民议会议长将暂任总统。在这种情况下接任。委内瑞拉议会主席瓜伊多于 2019 年 1 月 5 日当选国民议会主席，并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在加拿大、欧盟、美国和地区多个国家支持下宣布成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23]然而，马杜罗自 2017 年国民议会组建以来一直无视国民议会，认为国民议会都是政府支持者。2018 年 8 月 4 日，马杜罗遭到武装无人机暗杀，最终幸免于难。

委内瑞拉曾经是南美最富裕的国家，但现在却经历着畸形恶性通货膨胀，

2018 年达到百分之 8000，按照国际货币组织预测 2019 年通胀将达到百分之 100 万；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意味着物价每 4 周翻一番。[24] 8 月，委内瑞拉政府宣布货币贬值 95%，并将其与国家加密货币挂钩，以免经济崩溃。[25]食品药品短缺以及卫生系统的崩溃是 2018 年社会经济危机深重的一个缩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这些因素也导致日益严重的难民危机，目前已有 300 万委内瑞拉民众逃离祖国，其中 230 万人逃往南美和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26]

愈演愈烈的危机引发美国国内一政客呼吁，特别是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要求马杜罗下台，并通过支持反对党领袖和国民议会议长胡安·瓜伊多向委内瑞拉施压。[27]9 月，美洲国家组织（OAS）秘书长路易斯·阿尔马格罗呼吁 OAS 进行军事干预，剑指马杜罗。10 个中南美洲国家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拒绝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或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28]

委内瑞拉拥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储备，但作为主要出口收入来源的石油产量却跌至 140 万桶/天，为 1947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为增加收入，委内瑞拉政府一直致力大力开采 Arco Minero 矿场矿产资源，以获取黄金和其他资源。军方已控制委内瑞拉食品和石油工业，军方在 2017 年获得授权组建溢价矿业公司，并授权动用安全力量打击非法采矿以控制采矿业。其后果就是武装组织火并频繁，黄金开采中心 El Callao 沦为暴力之城，凶杀率高达骇人听闻的每 10 万居民 816 起。[30]

哥伦比亚武装冲突

50 载兵戎相见，终于硝烟散去，哥伦比亚第一大游击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于 2016 年最终签署和平协议。冲突期间，其他非法武装组织和贩毒集团同样犯下侵犯人权的滔天罪行。自 2016 年 11 月以来，哥伦比亚政府和 FARC 采取一系列措施力促和平协定执行。

2018 年，浩繁的和平进程遇到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同反对和平协定的 FARC 士兵的关系，如何保护解除武装的 FARC 前战斗人员、如何面对羽翼渐丰的 ELN、如何处理政治优先事项上存在的分歧同时还要面对千疮百孔的委内瑞拉危机。

2018 年 1 月至 5 月，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担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月里，261 名部落首领和 40 名复员 FARC 游击队员被暗杀。[31]前 FARC 领地在很长一段时

间成为政府真空地带，今天安全部队正在努力在这片土地重建安定。2018 年 8 月 7 日，杜克总统宣布就职，并承诺加大公众人物保护力度。但 2018 年 6 月至 12 月间，170 名人权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惨遭杀害。[3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表示，哥伦比亚沿海和北部地区（安蒂奥基亚、考卡、纳里尼奥和桑坦德北部）领导人遇害事件激增。上述地区因其铲除古柯种植园而闻名，如和平协定规定的农作物替代种植和土地发展计划。[33]上述地区似乎因为 FARC 的离去，成为安全真空地带，国家安全部队并未填补这一真空。旋即成为新的犯罪组织和其他暴力组织争夺领地和资源的新战场，导致地区领袖和社会活动家被刺杀。

进行反政府武装斗争的游击组织---ELN 便是典型的例子。尽管 2017 年至 2018 年间的武装冲突致死人数并未达到 2015 年的峰值水平，但由于 ELN 在毒品贸易风生水起，在 85 个镇生根发芽并且正在向另外 32 镇拓展势力范围。[34]桑托斯时期，政府就同 ELN 展开谈判，意图结束冲突。到了杜克政府时期，由于政府不愿谈判，除非 ELN 和其他派别停止所有犯罪活动并放弃古柯贸易。[35]ELN 同时也未停止向委内瑞拉的步伐（见下文）。

2018 年年初，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杜克和他的民主中心党风头正盛，也为和平协议带来了变化。与此同时，桑托斯政府为应对哥伦比亚日益恶化的安全形势，也采取了更为铁腕的对策。杜克试图对战争法庭（被称为和平特别管辖权）做出调整，战争法庭也被视为是过渡时期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杜克希望对前 FARC 战斗人员实施更为严厉的惩罚。根据和平协定，那些被判战争罪的罪犯，如果认罪将免于监禁，但将面临 5 至 8 年的替代惩罚，如软禁或社区服务赔偿。杜克和他的支持者认为这无异于有罪不罚。[36]杜克还希望设计一个单独的法庭，对犯下战争罪的哥伦比亚军警实施宣判，杜克的理由是他认为 JEP 对政府军队存在偏见。[37]

更为强硬的路线是哥伦比亚总检察长办公室于 2018 年 4 月 9 日宣布，以美国提出的贩毒指控逮捕 FARC 前领导人杰斯·桑特里奇。[38]桑特里奇是 2016 年和平进程中 FARC 谈判小组成员，这一点意味深长。他的被捕被视为对和平协议稳定性的威胁。截至 2018 年 12 月，桑特里奇仍在监狱中。JEP 要求释放桑特里奇，辩称美国并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表明其引渡的正当性。[39]

哥伦比亚和平协定中更大的创新，来自两性平等和妇女权利，可惜也未得到

充分执行。负责监测协定执行情况的克罗克研究所表示，截至 2018 年 6 月，协定 130 项与性别相关规定，只有 4%得到充分执行。[40]延迟执行最为显著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政治参与和解决非法毒品问题。研究所强调民间组织女性领导人、人权活动家和前战斗人员生命安全遭到严重威胁。[41]

成立真相委员会，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开始运作，旨在评估哥伦比亚国内武装冲突根源，促进民族和解。鉴于和平协定的批准和执行都绝非一帆风顺，协定究竟效力几何还有待观察。

11 月 24 日，FARC 领导人罗德里戈·隆多尼奥（化名蒂莫琴科）批评协定执行进展缓慢，尤其是土地分配。[42]

哥伦比亚的问题也加剧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问题，特别是委内瑞拉，反之亦然。如 10 月 14 日至 16 日，委内瑞拉图梅雷莫的一次非法金矿开采活动中，7 名矿工遭到 ELN 杀害。据报道，到 2018 年 11 月下旬，委内瑞拉 12 个省份都能发现 ELN 的身影。[43]除巩固可卡因跨境走私通道外，ELN 和 FARC 残部沆瀣一气，从事诸如勒索走私等非法活动。哥伦比亚境内有委内瑞拉难民超过百万，这无疑是一本万利。[44]委内瑞拉跨境人口流动也刺激了人口贩运，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哥伦比亚武装犯罪集团，并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45]

1 皮翁·柏林·D 和卡雷拉斯·M，《拉丁美洲武装部队、警察和打击犯罪》，《拉丁美洲政治期刊》，第 9 卷第 3 期(2017)，第 3-26 页。
2 美洲协会/美洲理事会，“2018 年拉丁美洲选举导读”。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8 年 10 月 17 日在《国家关注》发表题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复苏失去动力》的文章;沃纳·A，《拉丁美洲增长放缓》，《美洲季刊》，2015 年春。
4 佐瓦托·D，《2018 年拉丁美洲选举马拉松的利害攸关之处》，布鲁金斯学会，2019 年 1 月 22 日。
5 拉丁晴雨表 2018(拉丁晴雨表报告 2018)(西班牙文)。
6 拉丁晴雨表(注 5)，第 5 页。
7 拉丁晴雨表(注 5)，第 6 页。
8 谢兹科夫·Y，博尔索纳罗重振巴西经济的努力注定要令人失望，《金融时报》2018 年 11 月 29 日;托雷斯·弗雷尔·V，《巴西政党分裂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成为世界反常现象》，《圣保罗页报》英文版，2018 年 10 月 10 日。
9 博德勒·A，“随着新政府承诺缩减政府开支，巴西股市飙升”，路透社 2019 年 1 月 2 日。
10 菲利普斯·D，“巴西法院禁止卢拉参加总统选举”，《卫报》2018 年 9 月 1 日。
11《墨西哥新闻日报》，“培尼亚·涅托任期内，巴西腐败排名从 105 位骤降至 138 位”，2019 年 1 月 29 日
12 穆加·R 和阿吉雷·托邦·K，《拉丁美洲公民安全:事实和数字，战略文件 33》(伊加拉佩研究所:里约热内卢，2018 年 4 月)，第 4 页。
13 Televisa.news(网站)，“2018 年墨西哥发生谋杀案共 28,816 起”，2019 年 1 月 24 日。
14 阿利埃·加西亚·D 和古铁雷斯·M，“墨西哥新总统上任第一天就着手打击暴力”，路透社，2018 年 12 月 2 日。
15 森普尔·K，“法外之地”：政治危机迫使尼加拉瓜人逃离家园，《纽约时报》2018 年 8 月 6 日。
16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尼加拉瓜局势简报，2018 年 11 月;罗伯斯·F，“尼加拉瓜，奥尔特加命悬一线。如今，他又将面对如潮的反对者。”，《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24 日。

17 马尔金·E，“美国对尼加拉瓜施压，制裁副总统”，《纽约时报》，2018 年 11 月 27 日。
18 曼森·K 和格思里·A，“美国向美墨西哥边境部署 5200 名士兵”，《金融时报》，2018 年 10 月 29 日。
19 隆·C 和阿隆索·萨尔迪瓦·R，“看门狗:数千名儿童可能已经被和家人分开”，美联社，2019 年 1 月 18 日。
20 桑兹·G，自特朗普发布关于拆散移民家庭的行政命令以来，81 名儿童在边境和家人分离，CNN ，2018 年 12 月 6 日报道。
21 曼楚·S，“危地马拉不再对联合国反腐败机构延长授权”，路透社，2018 年 8 月 31 日，路透社，。
22 鲍文·R·E，危地马拉总统禁止对政府进行腐败调查后深陷危机，《对话》，2019 年 1 月 16 日，2019 年 1 月 29 日更新。
23 冈森·P，“委内瑞拉，危险的开局”，国际危机组织，2019 年 1 月 24 日。
24 隆·G，“委内瑞拉为了阻止经济崩溃，把玻利瓦尔上的 5 个零抹去”，《金融时报》，2018 年 8 月 20 日。
25 隆(注 24)。
26 联合国难民署，“委内瑞拉难民和移民人数高达 300 万”，新闻发布，2018 年 11 月 8 日。
27 贝克·P 和黄·E，“在委内瑞拉问题上，卢比奥成了美国总统的傀儡”，《纽约时报》2019 年 1 月 26 日。
28 拉斯伯恩·J·P，“呼吁国际社会在委内瑞拉采取行动”，《金融时报》，2018 年 9 月 13 日；埃雷拉·J，“呼吁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干预之声四起，而同时拉丁美洲国家挫败了 10 起政权更替”，《太平洋标准》，2018 年 9 月 17 日。
29 卡马乔·C，“委内瑞拉石油产量降至 1949 年加拉加斯的水平”，《拉丁美洲先驱论坛报》，2018 年 5 月 16 日。
30 罗萨蒂·A，“委内瑞拉最危险城市的血腥淘金”，彭博商业周刊，2018 年 4 月 9 日。
31 阿雷斯马·A，“261 名社会领袖和 40 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在哥伦比亚和平进程中被暗杀:桑托斯”，《哥伦比亚报道》，2018 年 5 月 23 日。
32 法国 24 小时，“哥伦比亚:两年内 282 名社会领袖和人权捍卫者被杀害”，2019 年 3 月 1 日。
33《洞察犯罪》，“哥伦比亚激进分子猖獗之地，古柯种植区”，最初发表于 Verdad Abierta 网站，2018 年 10 月 9 日。
34 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哥伦比亚政府-ELN”，检索日期 2019 年 3 月 6 日;奥拉亚·A，里斯奎兹·R 和博尼拉·M·A，“哥伦比亚总统手中 5 个烫手的山芋”，《洞察犯罪》，2018 年 8 月 8 日。
35 奥拉亚，里斯奎兹和博尼拉(注 34)。
36 费尔巴布-布朗·V，“和平协议执行不力，死亡不断?”，杜克政府和哥伦比亚和平协议，布鲁金斯学会，2018 年 7 月 24 日。
37《世界政治评论》，“过渡时期司法争议，对摇摇欲坠的哥伦比亚和平构成威胁，2018 年 11 月 21 日。
38 拉丁新闻，“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面临新关口”，2018 年 4 月 10 日。
39《时代报》，“参议院和平委员会要求释放桑特里希”，2018 年 12 月 5 日。
40 克劳克国际和平研究所，圣母大学，克劳克研究所特别报道，联合国妇女，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瑞典，哥伦比亚最终和平协议执行性别监测，2016 年 12 月- 2018 年 6 月(克劳克研究所:波哥大，2018)，第 6 页。
41 克劳克国际和平研究所(注 40)。
42 拉丁新闻，“哥伦比亚真相委员会在和平挑战中开始工作”，2018 年 11 月 27 日。
43 《洞察犯罪》，“目前 ELN 活跃在委内瑞拉一半地区”，2018 年 11 月 13 日。
44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注 26)。
45 里斯奎兹·R 和所罗门·J，“2018 年游戏玩家:委内瑞拉移民成为有组织犯罪眼中的新金矿”，《洞察犯罪》，2019 年 1 月 8 日。

第 3 节.亚洲和大洋洲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

伊恩·戴维斯

2018 年，亚洲和大洋洲共有 7 个国家爆发活跃武装冲突：阿富汗（重大国际内战）、印度（低强度国家间边界和次国家级武装冲突）、印度尼西亚（低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缅甸（低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巴基斯坦（低强度国家间边界武装冲突）、菲律宾（高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和泰国（低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本节着重讨论阿富汗、缅甸和菲律宾三个最严重的武装冲突。[1]

除上述武装冲突外，亚洲和大洋洲部分地区继续受到动荡局势的影响，原因各异且未呈现出统一趋势，次国家级冲突也存在极大的不同，后续会逐一进行论述。2018 年的两大关键和平进展是朝鲜半岛曙光初现，印巴克什米尔之争休战。[2]

大事件

亚洲，尤其是东亚，在过去 40 年中武装冲突和大规模暴力犯罪急剧下降。[3]共有三种结构性解释这一现象：（a）将大规模暴行作为战争工具使用减少（一些人认为，部分原因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暴力预防工作到位，ASEAN）；（b）收入增加（该地区几个国家专注经济发展以确保国内稳定）；和（c）民主传播。[4]

然而，这一可喜趋势可能发生逆转。2017 年缅甸爆发针对罗兴亚平民的大规模暴行，菲律宾（和缅甸一样都是 ASEAN 成员国）国家安全部队四处施暴，以及阿富汗连绵不绝的武装冲突，无一不印证构建起统一的政治和人权规范并非就一定会带来和平。这两大冲突相比该地区其他低强度冲突较为突出，但出现的两个新趋势却令人担忧：（a）基于种族和/或宗教对立，与身份政治相关的暴力日渐增多；（b）跨国暴力圣战组织激增，包括阿富汗、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都出现 IS 有关联的行为主体。[5]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也十分普遍，却鲜见报道。[6]

最后，亚洲极易受到灾害影响；2000 年至 2017 年，全球几乎半数灾害发生在亚洲。[7]本就风雨飘摇、硝烟弥漫的冲突国叠加自然灾害的侵袭，自是苦不堪言：2012 年至 2018 年，亚洲最脆弱的五个国家--阿富汗、孟加拉，朝鲜（DPRK，

北韩）、缅甸和巴基斯坦自然灾害造成经济损失约为 80 亿美元。[8]另有估计显示，灾害造成的损失可能更大：例如 2016 年，整个地区损失为 790 亿美元。[9]预计到 2030 年，亚洲地区由于极端天气造成的额外死亡，其脆弱等级将由“高危”提升至“严重”。[10]

中亚

中亚地区脆弱性包括边界紧张局势以及牧场和水源问题。[11] 3 月 15 日至 16 日，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了近十年来的首次首脑会议。尽管会议联合声明并未提出新建议，但各国领导人同意就水资源共享和发展区域贸易达成谅解，并决定每年举行过一次中亚首脑会议，下届会议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12]

东亚

2018 年东亚迎来了朝韩和平进程的重大突破。2017 年年底，金正恩领导下的朝鲜核计划大步推进，而金正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隔空骂战不断升级，观察人士眼中的朝鲜半岛灾难性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然而，2018 年的头几个月，局势却柳暗花明，朝鲜两大平行和平进程同步启动。第一个是同韩国，目的是促进两国和解。第二个是同美国，寻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协定，1953 年朝鲜战争中止实际上只是签订了停火协议。[13]这些事态发展不仅决定着所有朝鲜民众的未来，而且决定着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美中关系和东亚军事平衡。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地区大国，很可能对这一进程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在国内外一片质疑和争议声中飞速崛起，其中必然包括和周边邻国和地区大国的紧张关系。[14]就国内而言，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族（突厥穆斯林）、哈萨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监视、监禁和强迫再教育，招至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声讨。[15]而在战略层面，中国同美国、印度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维度的竞争日益加剧，愈发加重地区焦虑。

2018 年，中美紧张关系达到数十年的沸点，两国在经济、政治、安全和人权等诸方面产生严重分歧。[16]11 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

年度首脑峰会，由于中美贸易分歧，自 1993 年 APEC 领导人首次会晤以来，首次未能发布联合公报。[17]除中美贸易战升级外，两国围绕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博弈升温。[18]随着中国在争议南沙群岛部署反舰和反恐导弹以及数枚导弹试射，中国对南中国海军事化步伐加快（这也是该地区其他国家担忧的问题），几型轰炸机在未注明的岛屿上完成着陆测试，其中就包括具备核投送能力的轰-6K。[19]

今年 3 月，特朗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公开鼓励美国与台湾官员进行互访。中国谴责美方违反了数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关系基石的一个中国原则。[20]一个中国政策其实是一个刻意模糊的概念，可以解读为不同的版本。它允许存在两个独立的中国实体：中国大陆和台湾。一个月后，中国首次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演习。[21]今年晚些时候，美国加大了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频度。[22]让人略感欣慰的是，8 月 2 日中国和 ASEAN 通过《南海行为守则》草案。草案最后敲定还需几个回合。[23]

虽然 2017 年中印边境冲突一幕没有重演，但两国继续在喜马拉雅地区集结地面部队。两国新一轮全面战略对抗大幕开启，环境层面也使得久悬未决的边境争端愈发扑朔迷离。[24]

2018 年，日中、日俄关系有所改善。今年 5 月，经过多年谈判你，日中两国同意建立海空通信机制以进行危机管控。10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历史性官方访问。这也是 2011 年以来，日本领导人首次访问中国。[25]安倍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会晤，就日俄长达 70 年的南千岛群岛（日本也称北方四岛）争端和平协定的可能性展开探讨。自 2012 年以来，两国领导人就此问题展开了 23 次会晤，至 2018 年年底，双方似乎已经在新层面达成合作：宣布两国外长将督促 2019 年 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日俄首脑峰会和平协定谈判。[26]

南亚

最近几年，南亚国内冲突频发。然而，除了硝烟难散、断壁残垣的阿富汗（见下文），南亚地区可以说迎来了最近几十年最为稳定、最为民主的一段时光。主要叛乱活动已经得到控制，暴力冲突和动乱大幅下降，南亚正享受着强劲的经济增长。然而，2018 年依旧远未到高枕无忧，种族、宗教和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独裁倾向有可能在几个国家诱发新一轮的武装冲突。[27]

在孟加拉国，人们担心执政的人民联盟和主要反对党之间的政治对立，可能

会刺激圣战分子卷土重来。[28]12 月 30 日，孟加拉国大选期间爆发的反对党之间的政治冲突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尽管首相谢赫·哈西娜取得压倒性胜利获得连任，但是反对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声称选举普遍存在舞弊现象。[29] 政治动荡似乎要持续到 2019 年。

2018 年，印巴克什米尔紧张局势较 2017 年的急剧升温有所缓和。[30]5 月下旬，印巴持续 18 个月的边境冲突告一段落，冲突造成 150 多名平民和安全人员丧生。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意恢复 2003 年控制线停火协议。[31]但是，2018 年下半年，控制线零星冲突仍在继续。印控克什米尔一侧，暴力冲突仍时有发生。如今年 4 月，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和安全部队之间的交火导致 13 名武装分子和 3 名印度士兵死亡。警察向抗议者开枪，至少 4 名平民被打死。[32] 印度反恐策略受到人权组织批评，其中包括对印度法外处决的指控。[33]6 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首次就克什米尔问题提交报告，详细说明了控制线两侧侵犯和虐待行为并着重强调了安全部队侵犯人权行为长期有罪不罚的现象。[34]

印度依旧面临着诸多国内安全威胁，特别是 2018 年毛派叛军（称为纳萨尔派）和少数民族（主要是印度教-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局势。[35]如 2018 年 11 月，印度安全部队与毛派叛军在恰蒂斯加尔邦、奥迪沙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发生战斗。然而，官方数据显示，印度暴力事件从 2009 年的 2258 起下降到 2018 年的 190 起。[36]

2018 年，巴基斯坦不仅缓解了与印度的紧张关系，巴基斯坦同阿富汗的紧张关系也大幅改善。巴基斯坦军队采取了更为有力的措施，打击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武装分子的跨境流动，包括在与阿富汗接壤边境地区实施围墙修建计划，并对联邦管理部落地区推行一系列改革。[37]一年来，各武装团体同巴基斯坦军方之间打打停停、交火不断。俾路支省---巴基斯坦四个省中最大的一个---面临着来自俾路支激进组织日益猖獗的袭扰，其中尤以俾路支解放军为甚。俾路支解放军在 2018 年 11 月对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发动袭击，造成至少 4 人死亡。[38]7 月 25 日的巴基斯坦大选也受到暴力事件严重影响，200 多人在暴力袭击中丧生，其中甚至包括几位候选人在投票日前后遇袭身亡。两起袭击事件为 IS 所为。[39]

斯里兰卡饱受宗教关系紧张之苦，甚至可能颠覆其本就危如累卵的过渡司法进程，进而引发新的武装冲突。[40]如 2018 年 3 月，爆发自 2014 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反穆斯林暴力冲突，政府不得已宣布进入为期 10 天的紧急状态。[41]10 月，宪

法危机再度引发紧张局势，民众目光再度转向改革和民族和解进展。[42]12 月宪法危机得以解决，普遍被人们认为是法制和议会民主的胜利。[43]

东南亚

2017 年缅甸罗兴亚人被迫流离失所和菲律宾旷日持久、肆虐横行的暴力行为，仍然是 2018 年东南亚地区的主要问题（见下文）。

柬埔寨，红色高棉两位在世的最高级别领导人农谢（前波尔布特二号人物）和乔森潘（前国家元首）都因 1977-79 年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于 11 月被判处无期徒刑。[44] 正义姗姗来迟，波尔布特政权倒台近 40 年后，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作出里程碑式裁决。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于 1997 年由联合国和柬埔寨联合设立。然而，特别法庭只宣判三人有罪，诉讼费用高达约 3.2 亿美元。包括波尔布特在内大多数刽子手在受审之前就已死亡。三名红色高棉指挥官仍在等待审判，如何判决仍不确定。这主要是因为来自洪森总理的反对，洪森长期反对判决，并于 7 月再次当选，再度获得 5 年连任（洪森已担任柬埔寨总理 33 年）。[45]

2018 年，IS 在印度尼西亚继续风生水起，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的印尼籍 IS 成员踏上归途。[46]5 月 13 日至 14 日，IS 在印尼泗水市及其周围地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 25 人死亡，这也是 IS 在该国发动的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47]

12 月，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TPNPB）声称对巴布亚省恩杜加县 31 人被杀事件负责，31 人大部分为建筑工人（政府信息）或军事人员（TPNPB 信息）。[48] 袭击发生前一天，印尼数省爆发集会，支持未获承认的西巴布亚共和国独立 57 周年，警方逮捕了数百人。[49]

尽管印尼已成为东南亚 IS 的大本营，但是马来西亚政府却担心这伙人正在越过印马边境。马来西亚警方在 2018 年的报告中表示，自 2014 年以来，他们已成功挫败 9 起 IS 袭击事件，

逮捕了 300 多名涉嫌与 IS 有联系的疑似恐怖分子，并关闭大量支持 IS 的网站。同样有不少马来西亚人加入 IS 组织，在伊拉克、菲律宾和叙利亚进行战斗。[50] 泰国南部叛乱分子手中的武器，被走私到武装马来西亚 IS 分支极端分子。[51]

泰国军政府与南部各分离主义组织之间的小规模战斗断断续续，持续了几十年。2018 年，紧张局势再度发酵并爆发冲突。自 2004 年以来，近 7000 人在冲

突中死亡，法外处决和酷刑的报告屡见报端。[52]对马来西亚斡旋的泰国政府同马拉帕塔尼（泰马分离组织组成的伞形组织）的和谈，泰国第一大反叛组织国民革命阵线（BRN）继续抵制。[53]然而，时至岁末，各方加大力度吸引 BRN 加入谈判。[54]

阿富汗武装冲突

阿富汗战争是 2018 年，全球最为致命的武装冲突。大约有 43700 名战斗人员和平民死于非命，达到 2001 年塔利班溃败后的历史新高。阿富汗战争死亡人数占到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LED）报告全球死亡人数 30%。[55]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继续记录伤亡数量。2018 年，武装冲突对平民的伤害，全年共录得 10993 名平民伤亡（3804 人死亡，7189 人受伤），较 2017 年平民总伤亡增加 5%。[56]联合国将平民伤亡大部（63%）归咎于“反政府分子”，包括塔利班和 IS。阿富汗也是全球地雷及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伤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反政府分子”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占 2018 年所有平民伤亡人数的 42%。[57]

阿富汗政府对塔利班的停火和退让，却并未换来和平。一些塔利班领导人似乎是打算谈判，可是塔利班部队却未放下刀枪。伊斯兰国-呼拉珊省（IS-KP）和其他反叛组织也是如此。[58]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12 月中旬宣布撤出 7000 名美军，约占驻阿美军的一半，进一步加大不确定性。[59]诚然这一决定有助于结束战争的外交斡旋，但其本质上就是权宜之计，似乎也在无形中使得塔利班和其他一些极端主义武装组织愈发有恃无恐。

暴力水平畸高

武装冲突中的各方非国家行为体都盘算着在 10 月的和平谈判以及在大选中抢得先机，2018 年暴力活动此起彼伏。1 月 25 日，塔利班包围了喀布尔的一家旅馆，造成 22 人死亡。1 月 27 日，塔利班在喀布尔引爆炸弹，造成至少 95 人死亡，158 人受伤。[60]2018 年春季，塔利班加大了对农村人口稠密区域和省会城市的袭击，与此同时 IS-KP 继续在阿富汗全国各大城市大开杀戒，4 月 22 日袭击喀布尔选民登记中心，造成至少 63 人死亡。[61]4 月 30 日，IS 在喀布尔和坎大哈的自杀式袭击造成 50 多人死亡。[62]

塔利班与 IS-KP，时而兵戎相见，时而并肩战斗。但时至 2018，他们更多的

是彼此争锋相对。[63]8 月初，据报道，200 名 IS-KP 成员向阿富汗政府投降，其背后的原因就是不想在鏖战两天后被塔利班俘获。[64] 8 月末，IS-KP 领导人阿布·萨阿德·埃哈比，据报在一次美阿联合军事行动中被射杀，IS-KP 再受重挫。[65]埃哈比成为自 2017 年 7 月以来，IS-KP 被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射杀的第三位领导人。12 月，阿富汗南部塔利班最高指挥官毛拉·阿卜杜勒·马南在美国为首的联军空袭中丧生。[66]2018 年，美国空袭大幅增加，据估计已达 2001 年以来历史最高水平。[67] 这导致 536 名平民死于联军空袭的炮火之下，较 2017 年增加 45%，尽管伤亡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叛军袭击（见上文）。[68]尽管阿富汗政府自 2017 年 5 月以来就不再公布伤亡统计，但阿富汗部队伤亡也被认为达到历年之最。[69]11 月，阿什拉夫·加尼总统表示，即便不计入最近的伤亡数据，自 2015 年以来，已有 28000 多名阿富汗警察和士兵丧生（每天约 25 人）。[70]

尽管阿富汗全国各地投票站都遭受塔利班袭击，但阿富汗议会选举依旧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21 日和 27 日举行。[71]阿富汗逾 3500 万人口中，约 1200 万人有资格参与选举，但只有约 880 万人登记投票。最终只有不到一半，约 420 万人实际参加选举投票。[72]

目前尚不清楚塔利班控制了这个国家多少土地。美国的估算往往低估了塔利班开疆拓土的能力；即便如此，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在 10 月的季度报告中表示，阿富汗政府只控制或影响该国 56%的土地，低于 2015 年 11 月的 72%。叛军势力的影响或控制从 2015 的 7%上升到了 12.5%，约有三分之一的阿富汗领土成为各方势力不断拉锯抢夺的对象。[73] 塔利班实际控制了大约一半的国土，并包围了几个城镇。[74]战场上节节胜利，塔利班还通过地方治理举措（例如设立法院，征收税赋、提供医疗服务）和地方性非正式停火。[75]

经年累月的流离失所和人道主义危机

表 2.2 2010-18 年阿富汗重大国际和平进程

进程名称	日期	参与方
多哈进程	2010－15 2018－至今	美国、塔利班
穆里进程（巴基斯坦平台）	2015	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和塔利班

四方协调小组	2016－17	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国
喀布尔进程	2017－至今	阿富汗、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伊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韩国（南部）、挪威、巴基斯坦、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瑞典（北欧普拉萨）、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美国、欧盟、北约和联合国
莫斯科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	2017－至今	阿富汗、中国、印度、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美国（2018年）、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和平委员会（2018年）和塔利班（2018年）

EU=欧盟；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UAE=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北欧国家联合体是一个由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组成的捐助集团，其中一个国家在任何特定问题上都处于领导地位。

资料来源：可汗·I，“阿富汗政府，塔利班周五在穆里恢复和谈”，《黎明》，2015年7月29日；可汗·A.，“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中国四方协调小组”，战略研究所，简报，2016年1月22日；俄罗斯外交部，“关于在莫斯科就阿富汗问题进行区域磋商的新闻稿”，2017年4月14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阿富汗和平与安全合作喀布尔进程宣言”，2018年3月1日；半岛电视台，“塔利班与美国驻卡塔尔特使举行会谈”，2018年11月19日。

阿富汗面临的是全球最为严重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危机。截至2017年底，阿富汗难民达到260万，半数居住在巴基斯坦，其余分布在其他92个国家，另有180万国内流离失所人口。[76] 2018年，冲突和大规模干旱而导致新增35万流离失所人口，2018年全年阿富汗人民都在经历自2011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2018年11月，预计至2019年2月，约47%的阿富汗农村人口都将面临严重粮食短缺（1060万人）。[77]

和平进程

阿富汗冲突舞台，是各色联盟粉墨登场，其背后是各色利益集团，所以和平努力也一样多层面。众多行为主体参与到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事务（见表2.2）。[78]然而，总体而言，这样那样的努力，在实实在在的和平谈判中却鲜有成功。然而，时至2018，人们似乎有看到了一丝曙光。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于 2010 年成立高级和平委员会，旨在搭建政府与塔利班直接对话的桥梁。[79]2011 年至 2014 年，国际社会的努力集中在通过塔利班在卡塔尔的政治办公室打通谈判通道。所有与塔利班的谈判美国从未缺席，无论阿富汗政府是否参与。在德国和卡塔尔官员的协助下，美国官员和塔利班代表之间的秘密会谈于 2010 年开始，2011 年在卡塔尔浮出水面，被称为多哈进程。[80] 到 2015 年，多哈进程停滞不前，取而代之的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新进程。巴基斯坦情报机构协助下，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再度展开谈判。[81]

与此同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平与团结行动计划》框架下，举行了多轮高级别双边会谈。框架旨在打击武装分子跨境流动，促进经济联系。2018 年 4 月，加尼总统和巴基斯坦总理沙希德·哈坎·阿巴西商定了最后确定行动计划的七项关键原则。[82]

随着巴基斯坦加大了对塔利班跨境进入阿富汗（见上文“南亚”）动向施压，巴基斯坦与塔利班的联系日渐减弱。因此，塔利班转向与包括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寻求外交渠道接触。近年来，阿富汗大多数邻国，都一直将自己定位和平谈判利益攸关方。2016 年，四方协调小组——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国——浮出水面，并在同年先后举行五次会议，其目的就是寻求务实可行的阿富汗和平进程。[83]尽管会议举步维艰，但标志着中国正越来越多的参与这一进程。[84]

阿富汗国内，和平讨论方面取得若干进展。尽管很大程度上，2017 年是失去和平的一年。但在 6 月，当加尼总统启动喀布尔进程，新一轮阿富汗主导的重大会谈税制启动随之启动。[85]包括欧盟、北约和联合国在内的主要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约 3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分别于 2017 年 6 月和 2018 年 2 月在喀布尔举行会议。[86]2018 年会议上，加尼总统提议在无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同塔利班进行和谈，并表示承认其为合法组织，同时提出一些重要和平建议。[87]2018 年 3 月 26 日至 27 日在塔什干举行大会支持喀布尔进程，共有 21 个国家及政府间组织参会。会议再次发声，呼吁塔利班接受和平提议。[88]6 月，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停火三天，这也是历时 17 年武装冲突中的第一次停火。三天的宁静为人们带来片刻的喘息，也为人们点燃和平的希望，但随后战火重燃。[89]8 月 19 日，加尼总统提议再停火三个月，却遭到塔利班拒绝。[90] 相反，塔利班加大了武装袭击力度，尤其是在东部省会加兹尼。[91]

尽管国际社会努力推动喀布尔进程，但塔利班依旧倾向于同美国直接对话。尽管美国已经多年以来不断做出努力，但是始终无法打开美国--阿富汗--塔利班外交对话通道。

特朗普政府于 2018 年 7 月重启与塔利班的直接对话，并于 9 月任命扎尔梅·哈利勒扎德为会谈特使，哈利勒扎德在 2003-05 年曾担任驻喀布尔大使。[92] 塔利班官员与哈利勒扎德在卡塔尔至少举行过两次初步会晤。[93] 正当塔利班领导打算正襟危坐回到谈判桌前，进程却陷入僵局。原因就在于其先决条件，即美国承诺在阿富汗各派系全面介入和平谈判之前，美方会拿出全面撤出时间表。

11 月中旬，俄罗斯主持召开塔利班代表和阿富汗高级和平委员会成员会谈。[94] 2017 年 2 月和 4 月，俄罗斯主持的前两轮会谈主要是与邻国的区域对话（见表 2.2，“莫斯科形式磋商”）。同样在 11 月，加尼总统宣布了一项最新和平计划。计划基于先前喀布尔进程提议制定，加尼预计需要五年时间来执行。[95] 将成立一个由 12 名成员组成的新谈判小组（实际上这也使得高级和平理事会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成立一个 9 名委员组成的“和平咨询委员会”，为谈判小组提供指导并“确保协商一致”。[96]

去年 12 月，哈利勒扎德和其他美国官员一道会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的塔利班代表。巴基斯坦、沙特和阿联酋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但塔利班依旧拒绝与阿富汗政府代表接触。[97] 时至 2018 年底，阿富汗危机仍然前路漫漫。冲突各方依旧水火不容，地区暴力不断恶化升级，地区和国际大国立场针尖麦芒。然而，如果中国(正向巴基斯坦施压，要求其遏制塔利班)、俄罗斯和美国立场趋于一致，那么 2019 年和平进程前景将大为改善。定于 2019 年 4 月举行的阿富汗总统大选和 2018 年 12 月宣布的美方撤军又为和平进程平添了更多变数。[98]

缅甸武装冲突

过去的 70 年间，缅甸钦邦、克钦邦、克伦邦、孟邦、若开邦和掸邦的叛乱活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各路武装团体同缅甸国防军你来我往，为争夺领土、少数民族权利和自然资源打的你死我活。[99] 在掸邦，民族冲突的背后是毒品贸易的兴风作浪，而克钦邦冲突的背后是玉石贸易。[100] 2017 年若开邦武装冲突最为血腥。2017 年 8 月，鞑靼人和当地佛教民兵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发动袭击，据估计逾 75 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其中绝大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101] 若开邦人

道主义危机一直持续至 2018 年。尽管和平进程早在 2015 年就已启动，但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尤其是在中国接壤的东北部克钦邦和掸邦，和平进程在 2018 年几乎毫无进展。[102] 据估计，2018 年缅甸共有 265 名战斗人员和平民被杀。[103]

2011 年以来，克钦邦和掸邦已有超过 12 万人流离失所。5 月，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警告，缅甸政府军和克钦独立军之间的战斗急剧升级。[104]

罗兴亚人道主义危机

2017 年年末，超过 90 万罗兴亚人迫于缅甸国防军的驱赶，滞留在孟加拉国南部难民营。这里也成为世界规模最大、人口密度最大的难民安置点。[105] 如被遣返，罗兴亚人没有公民身份、没有安全保障，尽管中国的外交压力日益加大，遣返计划还是被无限期推迟。[106] 数十年的政治压迫、周而复始的暴力冲突，空前规模的危机以及圣战组织日益受到关注，罗兴亚人特别容易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然而，时至今日，最大的反叛组织阿拉坎罗兴亚救世军，似乎和任何激进伊斯兰运动都未有瓜葛，2018 年也只是零零星星发动了几次小规模袭击。[107]

2017 年 3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缅甸问题独立国际真相调查团（FFM），调查克钦、若开邦和掸邦三个邦军事和安全部队侵犯人权的指控事实。调查团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发表报告，认定缅国防军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及疑似种族灭绝罪。2017 年在若开邦持续两个多月的“清场行动”中，至少有 10000 人（保守估计）因“种族灭绝”而丧生。[108]

卫星图像显示，若开邦北部 40%的村庄被完全或部分摧毁。报告同时指出，缅甸军队犯下“国际法规定的最严重罪行”，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将缅甸提交国际刑事法院（ICC），或成立国际法庭，起诉背后的刽子手，包括军队高级军官。此外，报告呼吁对军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要求修改宪法，以结束军方主政。[109]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缅甸军方利用社交媒体传播分裂和煽动信息，挑唆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的不和，并煽动对罗兴亚人发起攻击。[110]

8 月，来自东盟五国的 130 多名议员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对缅甸展开调查。[111] 9 月 18 日，在真相调查团公布报告的同一天，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已展开初步审查，以确定是否有足够证据支持展开全面调查。[112] 缅甸政府拒绝承认真相调查团的调查结果，而联合国安理会行动预计又将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阻挠。[113] 10 月，真相调查团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声称数以千计的罗兴亚人仍在逃往孟加拉国，估

计 25 万至 40 万人仍在“持续的种族灭绝”遭受残酷压迫和镇压。[114]

和平进程

缅甸政府一直试图推动一个颇为复杂的和平进程，其核心是 2015 年全国停火协议，该协议最初由 8 个反叛组织共同签署。2018 年 2 月又有两个加入，孟邦党和拉祜族民主联盟。但缅甸实力最强大的民兵组织，其中包括克钦独立军和大昂民族解放军，仍然拒绝加入协议。[115]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官方称为国务参赞），参加了 2018 年 7 月举行的最近一次对话会，目的就是说服更多反叛组织加入这一倡议。[116]然而，并未取得实际进展。民间组织参与和平进程寥寥无几，妇女更是难于登天。[117]

11 月，克伦民族联盟/克伦民族解放军和掸邦恢复委员会/掸邦军南部，全国停火协定的两个主要签署方，暂停参加正式和平谈判。[118]12 月 21 日，缅国防军宣布在克钦邦和掸邦停火四个月（但不是若开邦），目的就是推动重启已陷入僵局的谈判。[119]

菲律宾武装冲突

亚洲持续时间最长、最为血腥的武装冲突之一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地区的摩洛叛乱。弥漫多年的硝烟中，各路冲突参与方逐渐合并成两大分离主义组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摩洛民族主义解放阵线。2014 年，后者与菲律宾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120]

与此同时，棉兰老地区也成为孕育亲伊斯兰暴力组织的沃土，2017 年，这些组织参与马拉维市暴力叛乱。[121]2018 年，马拉维重建工作进展缓慢，紧张局势依然严峻，尤其是 2018 年 12 月，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总统在棉兰老岛延长戒严期，杜特尔特总统同时签署了以 2014 年和平协议为基础的班加莫罗组织法。[122]该法律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将目前的穆斯林棉兰老岛自治区替换为穆斯林棉兰老岛的邦萨莫罗自治州，目前正在等待公民投票的批准。新的自治区预计将纳入更多的省份，自治区政府将拥有更大的自主权。[123]2018 年底，这一变动还待批准（公投定于 2019 年初），但它可能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和平协议，足以鼓励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加入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并和政府一道对抗亲伊斯兰组织。[124]

同样令人难以捉摸的是，尽管和谈总是断断续续，但 60 年来，其目标始终

是终结菲律宾共产党及其武装派别新人民军(NPA)，还有政治伞组织国家民主阵线的叛乱。[125]

定于 2018 年 6 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 125 次政府与国家民主阵线会谈被取消。2018 年年底，尽管地方谈判取得一些成果，但是谈判双方领导人恶语相向，所有的国家信任和信任机制都已荡然无存。[126] 据菲律宾军方表示，NPA 叛乱有所缓和，其中包括 2018 年 1 月 326 名 NPA 战士投降，今年晚些时候棉兰老岛几条战线的威胁等级大幅下降。[127] 但是，其他报告也表明，NPA 仍然是一个重大威胁。[128]

尽管 2018 年菲律宾平民被杀人数尚不确定，同时也颇具争议，但是有迹象表明，2016 年杜特尔特总统就职时发起的政府“禁毒战争”，致死人数已然超越叛乱。政府统计数字显示，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11 月底的死亡人数为 5050 人，而人权组织的估计数字可能在 12000 至 27000 人之间。[129] ACLED 的数字则低得多，2018 年共记录 1000 多名平民死亡，主要是死于毒品战。[130] 2018 年 2 月，国际刑事法院开始调查毒品战争是否涉及危害人类罪。[131]

1 冲突定义和类型见本章第 1 节。
2 关于朝鲜半岛和平进程，见本卷第 7 章第 1 节。
3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和平之路:预防暴力冲突的包容性方法》(世界银行:华盛顿，2018)，第 11-12、19 页。
4 弗兰克·D·A,《减少东亚大规模暴行犯罪:东盟预防机制规范的演变》,《种族灭绝研究与预防:国际期刊》，第 11 卷，第 3 期(2018)，第 98-108 页。
5 BBC 新闻，“印度尼西亚袭击:伊斯兰国如何获得支持”，2018 年 5 月 13 日;劳尔·A,“伊斯兰国煽动的极端主义威胁在印度日益严重”,《恐怖主义监测》，第 17 卷第 3 期(2019 年 2 月 8 日);《海峡时报》,“ISIS 宣称对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发动致命袭击”，2018 年 11 月 24 日;索利耶夫·N,“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有多严重?”,《外交官》，2017 年 3 月 14 日。同时参见查·W,“民族政治、复杂的合法性危机与东盟内部关系”,《太平洋评论》第 31 卷第 5 期(2018)，第 598-616 页。
6 罗德里格斯·B，沙基勒·S 和莫雷尔·A,“亚洲性别暴力的四大事件”，亚洲基金会，2018 年 3 月 14 日;特鲁·J,《亚洲冲突与性别暴力冲击》,J·里格尔主编,《亚洲冲突与暴力状况》(亚洲基金会:华盛顿，2017 年，第 230-39 页)。
7 彼得斯·K,《加快仙台框架在亚洲落地:在暴力、冲突和脆弱背景下降低灾害风险》(海外发展研究所:伦敦，2018 年 7 月)，第 7 页。灾难被定义为“同任何规模的危险事件接触和相互作用，导致人员、物资、经济和环境的损失和影响,联合国减灾办公室,“术语”。
8 彼得斯(注 7)。
9 古哈-萨皮尔·D,《2016 年灾害统计年鉴》(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卫生与社会研究所和鲁汶大学:布鲁塞尔，2017 年 10 月)。
10 彼得斯(注 7)。
11 气候安全风险专家工作组，中亚:气候安全风险评估，2018 年 12 月。
12 格泰克·G,“阿斯塔纳低调举办中亚峰会”,《欧洲动态》，2018 年 3 月 16 日;《亚洲动态》,“中亚领导人会议，但缺乏约束性承诺”，2018 年 3 月 16 日。
13 见本卷第 7 章第 1 节。
14《经济学人》,“为什么抗议在中国此起彼伏—大量群体性事件”，2018 年 10 月 4 日。
15 参见《人权观察》,《根除意识形态病毒:中国镇压新疆穆斯林运动》，2018 年;巴克利·C。2018 年 12 月 16 日,《中国穆斯林劳改营》,《纽约时报》;《卫报》2019 年 1 月 9 日报道,“中国将允许成千上万的哈萨克族人离开新疆”。
16 见哈德逊研究所,“副总统彭斯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2018 年 10 月 4 日。
17 《海峡时报》,“中美分歧加剧，Apec 峰会未能达成共识”，2018 年 11 月 18 日。
18BBC 新闻,“美中贸易战速浏”，2019 年 1 月 7 日。
19《经济学人》,“中国在南海诸岛部署导弹”，2018 年 5 月 10 日;费兰克·B,“中国在南海岛链测试轰炸机”，CNN，2018 年 5 月 21 日。
20 布赖斯·M,“特朗普签署台湾旅游法案，遭遇中国政府反对”,《悉尼先驱晨报》,
2018 年 3 月 17 日。
21 陈·M,“随着两岸关系缓和，中国海峡实弹演习规模缩小”,《南华早报》,2018 年 4 月 18 日;拉姆齐·A,“中国进行军事演习，台湾就是目标”,《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18 日。
22 布朗·R 和斯塔尔·B,“台海局势紧张的氛围下，美国军舰驶过台湾海峡”，CNN，2018 年 10 月 23 日。
23 泰勒·C,“中国—东盟南海行为准则(草案)”,《外交官》，2018 年 8 月 3 日；南海问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专家工作组,“南海行为准则蓝图”国际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18 年 10 月 11 日。
24 关于 2017 年中印边境冲突，见史密斯博士,《导论:2017 年国际稳定与人类安全》，SIPRI 年鉴 2018，第 13 页;马库斯·J,“中印边界紧张:卫星图像显示多克拉姆高原拉锯正在形成”，BBC 新闻，2018 年 1 月 26 日;甘布勒·R,“中印边界争端演变为一场缓慢发展的环境灾难”,《对话》，2018 年 6 月 17 日。
25 科维里戈·M,“期待已久的热线如何为冷场的中日关系暖场”,《南华早报》，2018 年 5 月 13 日；迈尔斯·S·L 和里奇·M,“安倍晋三称日本是中国的“伙伴”，不再是中国的援助国”,《纽约时报》，2018 年 10 月 26 日。
26 雷诺兹·I 和克拉琴科·S,“普京和安倍同意就 70 年的岛屿争端加快谈判步伐”，彭博社，2018 年 11 月 14 日;小原·J,“安倍和普京指派谈判代表进行和平条约和岛屿磋商”，日本经济新闻，2018 年 12 月 2 日。
27 史丹尼兰德·P,“南亚民主的未来”,《外交事务》，2019 年 1 月 4 日。
28 国际危机组织(ICG),“打击孟加拉国圣战武装分子”,《亚洲报告》，第 295 期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2 月 28 日)。
29 萨菲·M，霍尔姆斯·O 和艾哈迈德·R, “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卫报》,2019 年 12 月 31 日。

30 关于 2017 年印巴重新爆发领土争端，见史密斯(注 24)，第 13-14 页。
31 “巴基斯坦和印度承诺实施 2003 年停火协议”，半岛电视台，2018 年 5 月 29。
32 BBC 新闻，“克什米尔:激烈冲突中 20 人丧生随后实施宵禁”，2018 年 4 月 2 日。
33《经济学人》,“印度对克什米尔武装分子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偿失”，2018 年 5 月 12 日;甘古力·M，“印度安全部队法外杀戮，最后却逍遥法外”，《人权观察》，2018 年 3 月 20 日。
34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份关于克什米尔人权报告，呼吁对多起侵犯人权事件进行国际调查”，新闻稿，2018 年 6 月 14 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4 月，印度查谟-克什米尔邦的事态发展，以及阿扎德-查谟-克什米尔和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的总体人权状况”，2018 年 6 月 14 日。
35 卡拉克·N， “印度 2018 年社区暴力—简报”，《人民之声》，2019 年 1 月 7 日。有关与毛派叛乱分子冲突的背景资料，请参阅戴维斯·I，吉阿西·R 和苏·F，“亚洲和大洋洲武装冲突”，SIPRI 年鉴 2018，第 47-48 页。
36 南嘉帕·V，“2018:军队如何向纳萨尔派分子发起战斗，但战斗远未结束”，One India 网站，2018 年 12 月 18 日;沙赫·A，“与印度毛派游击队一起梦游”，BBC 新闻，2018 年 10 月 8 日。
37 见奥提戈·L·I，“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的边境政策与安全动态”，《边境研究期刊》，2018;沙赫·M，“巴基斯坦军队正在认真打击国内恐怖主义”，《经济学人》，2018 年 3 月 1 日;卢卡斯·S，“巴基斯坦改变了主意?”“反恐新动态与巴基斯坦国际影响力的转变”，德国联邦安全政策学院，《安全政策工作文件》，2018 年第 1 期;国际危机组织(ICG)，“塑造巴基斯坦部落地区新和平”，《亚洲简报》，第 150 期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8 月 20 日)。
38 BBC 新闻，“卡拉奇袭击:中国领事馆遇袭，4 人死亡”，2018 年 11 月 23 日;哈什米·W，“残暴好战”：俾路支分裂分子是否继续成为巴基斯坦持续时间最长的叛乱?，《小规模战争》，2018 年 8 月 21 日。
39 哈什米·A，“数百万巴基斯坦人在枪林弹雨中投票”，半岛电视台，2018 年 7 月 25 日。
40 斯里兰卡和平进程，见戴维斯、吉阿西和苏(注 35)，第 57-58 页;赫拉特·D，“卢旺达与斯里兰卡冲突后的重建与和解”，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2018 年 5 月 31 日。
41《经济学人》，“斯里兰卡反穆斯林骚乱标志着社会新裂痕”，2018 年 3 月 8 日;国际危机组织，“佛教武装力量在斯里兰卡再次崛起”，2018 年 3 月 7 日。
42 萨菲·M 和佩雷拉·A，“发言人表示，斯里兰卡政治危机可能演变为大屠杀”，《卫报》2018 年 10 月 29 日。
43 联合国，“秘书长欢迎和平解决斯里兰卡政治危机”，新闻发布 SG/SM/19417, 2018 年 12 月 20 日。
44 埃利斯-彼得森·H，“红色高棉领导人在柬埔寨纽伦堡大屠杀中被判有罪”，《卫报》，2018 年 11 月 16 日。
45 胡克威·J，“柬埔寨铁腕人物宣称赢得大选，却被世人揶揄闹剧一场”，《华尔街日报》2018 年 7 月 30 日。
46 森普特·C，印尼极端分子死灰复燃:意图不明且毫无防备，《政策概要》，国际反恐中心，2018 年 7 月。
47 舒尔茨·K·E，“泗水爆炸案与印尼圣战威胁的演变”，《反恐委员会前哨报》第 11 卷第 6 期(2018 年 6 月/ 7 月)，第 1-6 页;《经济学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徒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自杀式袭击的武器”，2018 年 5 月 17 日。
48 戴维森·H，“西巴布亚独立领袖呼吁杀戮后保持冷静”，《卫报》，2018 年 12 月 6 日。
49 戴维森·H，“西巴布亚岛:袭击造成 31 人死亡的报道自相矛盾”，《卫报》，2018 年 12 月 5 日。
50 埃利斯-彼得森·H，“恐怖分子威胁杀死国王和总理，马来西亚随后对 ISIS 展开打击”，《卫报》2018 年 7 月 20 日。关于伊斯兰国在马来西亚的兴起，请参见穆罕默德·奥斯曼·N·W 和阿索沙伊·A，“温和”堡垒下的圣战:ISIS 马来西亚威胁洞悉，《亚洲安全》，2018 年。
51 博达迪·A，“泰国冲突是如何刺激伊斯兰国在马来西亚的兴起”，《外交官》，2018 年 10 月 17 日。
52《经济学人》，“泰国南部恐怖分子正在进行疯狂的炸弹袭击”，2018 年;莫奇·M，“泰国南部纵深地区叛乱渐起”，《外交官》，2018 年 2 月 6 日。
53 怀塔拉萨克·W，“泰国希望所有 BRN 叛军组织加入南部和平谈判”，贝纳尔新闻，2018 年 11 月 21 日报道。
54 怀塔拉萨克·W，拉卡纳姆·P 和穆斯塔法·M，“泰国南部和平谈判:马来西亚斡旋代表表示暴力将在 2 年内结束”，贝纳尔新闻，2018 年 1 月 4 日。
55 基什·R 和帕弗里克·M，“ACLED 2018:回顾之年”，2019 年 1 月 11 日，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第 20 页。
56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富汗:武装冲突中平民的保护: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 2 月。
57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注 56)。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见本卷第 9 章第 1 节和第 2 节。
58 代尔·S，“阿富汗领导人向塔利班的提议是和平的最后一搏”，《卫报》，2018 年 8 月 23 日。阿富汗的伊斯兰叛乱组织，见美国国会研究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机构”，2018 年 8 月 23 日。
59 吉本斯·内夫和马沙尔·M，“官员表示美国将从阿富汗撤出约 7000 名士兵”，《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20 日。

60 马沙尔·M 和苏罕尼亚尔·J，“这是一场大屠杀:喀布尔爆炸让漫长的战争更加伤亡惨重”，《纽约时报》，2018 年 1 月 27 日。
61 半岛电视台，“阿富汗:63 人在选民登记中心遇袭身亡”，2018 年 4 月 22 日。
62 代尔·S，“美国和阿富汗:这场战争既打不赢，也打不停，还难以脱身”，《卫报》，2018 年 5 月 1 日。
63 易卜拉欣·N 和阿克巴尔扎德·S，“圣战组织内部冲突与合作:呼罗珊省与阿富汗塔利班”，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2019 年。
64 拉希姆·N 和努尔兰·R，“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的增兵路线”，《纽约时报》，2018 年 8 月 1 日。
65 托塔基尔·H·K，“阿富汗伊斯兰国领导人在袭击中丧生”，《华尔街日报》，2018 年 8 月 26 日。
66 沙·T 和阿贝德·F，“美国空袭击毙阿富汗塔利班高级指挥官”，《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2 日。
67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袭数据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很难进行横向历史比较。见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注 56)，第 5 页;韦尔曼·P·W，“美国扩大对阿富汗北部的空袭力度”，《星条旗》，2018 年 2 月 6 日;莱姆芙·K，“本月美国对阿富汗的空袭继续攀升，达到近十年来最高水平”，《军事时报》，2018 年 8 月 28 日。
68 波尼亚·K，“计算特朗普在阿富汗发动空袭的成本”，BBC 新闻，2018 年 6 月 7 日；库贝·C，“新任驻阿富汗美军司令表示，我们将继续打击塔利班”，NBC 新闻，2018 年 10 月 31 日。
69 诺德兰·R，“阿富汗部队伤亡数据是一个秘密。这就是原因。”，《纽约时报》，2018 年 9 月 21 日。
70 诺德兰·R 和阿贝德·F，见“2015 年以来，阿富汗军人死亡人数超过 2.8 万”，《纽约时报》，2018 年 11 月 15 日。
71 关于选举引发的暴力，见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2018 年选举暴力特别报告，2018 年 11 月。
72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注 71);《经济学人》，“阿富汗人在战火中投票”，2018 年 10 月 25 日;费尔巴布-布朗·V，“阿富汗的选票和子弹”，布鲁金斯学会，2018 年 10 月 23 日。
73 诺德兰·R，恩古·A 和阿贝德·F，“美国政府如何在阿富汗问题上误导公众”，《纽约时报》2018 年 9 月 8 日;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SIGAR)，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季度报告(SIGAR: 阿林顿, VA, 2018 年 10 月 30 日)。
74 沙·S，纳尔逊·C 和尤萨泽·S，“美国在和平谈判中面对着的是新崛起的塔利班势力”，《华尔街日报》，2018 年 11 月 5 日;斯蒂奇·A·Q，“塔利班的税务员帮助镇压叛乱分子”，路透社，2018 年 11 月 6 日。
75 杰克逊·A，“塔利班为心灵和思想而战”，《外交政策》，2018 年 9 月 12 日。
76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全球趋势:2017 年被迫流离失所”，2018 年，第 14、34 页。
77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阿富汗:行动情况介绍”，2018 年 12 月 31 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监测冲突局势国家的粮食安全: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联合向安理会提交的最新情况”，2019 年 1 月。
78 阿富汗叛乱中相互较劲的对手，见蒙克·P 和鲁蒂希·T，“谈判与持续抵抗:阿富汗叛乱局势”，《东方》，德国政治杂志，《中东政治、经济与文化》，第 55 卷，第 3 期(2014)，第 25-41 页。
79 见和平高级委员会网站，<http://hpc.org.af/english/>；范·比杰勒特·M，“军阀和平委员会”，阿富汗分析家网站，2010 年 9 月 28 日。
80 沃默·N，“试探性会谈与阿富汗和平倡议”，SWP 评论 44，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2012 年 12 月。
81 法雷尔·T 和森普尔·M，“与塔利班握手言和”，《生存》，第 57 卷，第 6 期 (2015)，
第 79 -110 页;培根·T，“挣脱束缚?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生存》，第 60 卷，第 5 期(2018)，第 159-180 页;黄·E 和马沙尔·M，“塔利班与阿富汗和平官员在中国进行秘密会谈”，《纽约时报》，2015 年 5 月 25 日。
82TOLO news 网站，“加尼，阿巴西同意行动计划中的 7 项关键原则”，2018 年 4 月 7 日。
83 蒂耶兹·S，“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美国就阿富汗和平进程举行会谈”，《外交官》，2016 年 1 月 12 日。
84 鲁蒂希·T，“探求和平进程:一个“全新的” HPC 和对塔利班的最后通牒”，阿富汗分析家网站，2016 年 2 月 26 日;普茨·C，“中国能否帮助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进行斡旋?”，《外交官》，2017 年 6 月 13 日。
85 鲁蒂希·T 和阿里·O，“雷声大雨点小：2017 年，阿富汗和平（对话）又是逝去的一年”，阿富汗分析家网站，2018 年 1 月 24 日；阿富汗总统办公室，“喀布尔进程会议新闻发布会”，2017 年 6 月 6 日;海达里·M·A，《阿富汗和平进程:常见问题解答》，《外交官》，2018 年 5 月 14 日。
86 拉斯穆森·S·E，“阿富汗和平会议在暴力和抗议声中举行”，《卫报》，2017 年 6 月 6 日;阿里夫·S，“第二次喀布尔进程会议后阿富汗的未来之路”，《外交官》，2018 年 3 月 7 日。
87 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喀布尔进程宣言下的阿富汗和平与安全合作”;艾德·K，“阿富汗和平进程终于开始了?”，TOLOnews 网站，2018 年 3 月 8 日。
88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塔什干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宣言:和平进程、安全合作与地区互联互通”，2018 年 3 月 30 日。
89 沙利齐·H，“阿富汗宣布与塔利班停火至 6 月 20 日”，路透社，2018 年 6 月 7 日；BBC 新闻，“塔利班排除了延长阿富汗开斋节停火的可能性”，2018 年 6 月 17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在阿富汗短暂停火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亚洲报告，No.298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7 月 19 日)。

90 纳尔逊·C，托塔基尔·H·K 和阿米里·E，“阿富汗总统向塔利班提出有条件的三个月停火”;《华尔街日报》，2018 年 8 月 20 日；奥斯曼·B，“随着美国新任特使的任命，动荡的阿富汗和平希望依然存在”，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9 月 5 日。
91《经济学人》，“阿富汗政府重新夺回战略重镇”，2018 年 8 月 18 日。
92 奥斯曼(注 90)。
93 格林伍德·M，“国务院官员会见塔利班开启阿富汗和平谈判大幕:报告”，《国会山》;马沙尔·M，“在特朗普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之际，美国官员再次与塔利班会面”，《纽约时报》，2018 年 10 月 13 日。
94 罗吉欧·B，“莫斯科会议上，塔利班共有 61 次称自己为‘伊斯兰酋长国’”，长期战争杂志，2018 年 11 月 9 日;简恩·R，“俄罗斯向阿富汗领导人伸出援手，与塔利班进行谈判，这激怒了喀布尔”;路透社，2018 年 11 月 2 日；罗斯·A，“俄罗斯主持塔利班与阿富汗和平委员会会谈”，《卫报》，2018 年 11 月 9 日。
95 阿富汗总统办公室，“加尼总统在阿富汗问题日内瓦会议上的讲话”，2018 年 11 月 28 日;阿富汗外交部，“实现和平:阿富汗主导和平进程的新篇章”，摘要文件，2018 年 11 月 28 日。
96 鲁蒂希·T，“把紧方向盘:加尼总统的新和平建议”，阿富汗分析家网站，2018 年 12 月 17 日。
97 纳尔逊·C 和费奇·A，“美国特使和塔利班讨论和平，阿富汗政府被晾在一边”，《华尔街日报》，2018 年 12 月 18 日;斯蒂奇·A·Q，“追寻和平的步伐加快，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官员会面”，路透社，2018 年 12 月 17 日报道。
98 卡马出版社，“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阿富汗总统选举的最后日期”，2018 年 11 月 28 日。
99 哈特·M，“缅甸和平进程”，《地缘政治观察》，2019 年 1 月 10 日。
100 国际危机组织(ICG)，“冰与火:缅甸掸邦的武装冲突与毒品问题”，亚洲报告第 299 期 (ICG:布鲁塞尔，2019 年 1 月 8 日);库姆斯·D，“玉石引发的战争”，《外交官》，2018 年 6 月 1 日。
101 2017 年罗兴亚危机，见戴维斯、吉阿西和苏(注 35)，第 49-52 页。
102 国际危机组织(ICG)，“缅甸政权交接停滞不前”，亚洲简报第 151 号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8 月 28 日)。
103 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LED)，“缅甸”，2018。
104 联合国新闻，“缅甸克钦邦战斗急剧升级，人权专家发出警告”，2018 年 5 月 1 日;库姆斯·D，缅甸克钦邦战斗季，《外交官》，2018 年 5 月 18 日;尼克森·J，“克钦邦 IDP 危机:缅甸的另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半岛电视台，2018 年 12 月 2 日。参见布伦纳·D，“克伦邦内部叛乱:缅甸不断变化的边境地区的冲突与和解的原因”，《亚洲安全》，第 14 卷第 2 期(2018)，第 83-99 页。
105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全球趋势:2017 年被迫流离失所”，2018 年，第 24-25 页。同时参见霍洛威·K 和法恩·L，“尊严与孟加拉国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人道主义政策小组工作文件，2018 年 8 月。
106《经济学人》，“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拒绝返回缅甸”，2018 年 11 月 22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孟加拉国-缅甸:强迫遣返罗兴亚人的危险，《亚洲简报》，第 153 期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11 月 12 日)。
107 费尔·C·C，“阿拉坎罗兴亚救世军:不是你想象中的圣战分子”，《法律战》，2018 年 12 月 9 日。
108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缅甸问题独立国际真相调查团的详细调查结果报告，A/HRC/39/CRP.2，2018 年 9 月 17 日。关于死亡人数难以量化的问题，见报告第 241-42 页。
109 卡明-布鲁斯·N，“缅甸对罗兴亚人犯下‘滔天罪行’，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纽约时报》，2018 年 9 月 18 日。
110 莫祖尔·P。2018 年 10 月 15 日，《纽约时报》，“缅甸军方发帖指责脸书煽动种族灭绝”;杜克·E，“脸书在缅甸种族灭绝中的角色:混淆视听的新报道”，《法律战》，2018 年 10 月 22 日。
111 埃利斯-彼得森·H，“罗兴亚危机:132 名 MP 呼吁将缅甸诉诸国际刑事法院”，《卫报》2018 年 8 月 24 日。
112 温图尔·P，“缅甸罗兴亚危机:国际刑事法院开始调查暴行”，《卫报》，2018 年 9 月 19 日。有关支持和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决定意见的讨论，请见戴维斯·S·E 和霍尔·I，“关于国际刑事法院对孟加拉国和罗兴亚人民裁决的评论”，《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第 73 卷第 1 期 (2019)。
113 尼科尔斯·M，“9 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要求讨论对缅甸的调查”，路透社，2018 年 10 月 17 日；尼科尔斯·M，“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考虑对采取缅甸行动;俄罗斯、中国抵制会谈”，路透社，2018 年 12 月 17 日。
114《卫报》，“联合国高级调查员，罗兴亚种族灭绝仍在继续”，2018 年 10 月 24 日。
115 《雅加达邮报》，“两支民族武装在“支离破碎”的和平协议上签字”，2018 年 2 月 13 日。
116 2016 年 8 月和 2017 年 5 月举行的前两轮会谈，见戴维斯，吉亚西和苏(注 35)，第 48-50 页;《每日新闻》，“缅甸和平会议达成更多未来联盟协议”，2018 年 7 月 17 日。
117 佩珀·M，“缅甸少数民族妇女、多样性、非正式参与和平建设”，《建设和平与发展杂志》，第 13 卷第 2 期(2018)，第 61-75 页。
118 迎·N，“克努民族联盟重申暂停和谈”，《伊洛瓦底江日报》，2018 年 11 月 12 日。
119 乃·S 和昂·T·T，“缅甸军队罕见地暂停了在北部的军事行动”，路透社，2018 年 12 月 21 日。
120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和平进程，见斯文森·I 和隆格伦·M，“调解与和平协定”，SIPRI 年鉴 2014，第 51－52 页；桑巴普西里·J，“确保和平？ 帕塔尼（泰国）和班萨莫罗（菲律宾）和平进程中的政权类型和安全部门改革，2011－2016 年，《战略分析》，第 42 卷第 4 期，2018 年，第 377-401 页。
121 马拉维冲突，见戴维斯、吉阿西和苏(注 35)，第 54-55 页;弗朗哥·J，“菲律宾:应对马拉维之战后的伊斯兰好战分子”，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7 月 17 日。

122 米勒·P，“解放马拉维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东南亚环球报》，208 年 10 月 17 日;贝尔特兰·M 和托宾·M，“杜特尔特延长戒严令再次引发对菲律宾独裁的担忧”，《南华早报》，2018 年 12 月 8 日。
123 库克·E，“杜特尔特签署《邦萨莫罗法》意味着什么?”，《外交官》，2018 年 8 月 1 日。
124 西曼乃斯·F·B，“为菲律宾带来和平:动荡的南部邦萨莫罗组织法”，《菲律宾星报》，2018 年 6 月 16 日;埃利斯-彼得森·H，芬布纳·C，“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数十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卫报》，2018 年 11 月 11 日。
125 和谈更多详情，见“时间表:1986 年至今政府和 CPP-NPA-NDF 之间的和谈”，GMA 新闻在线，2017 年 12 月 6 日。
126 克拉帕诺·J·R，“约玛·西森抨击取消和谈”，《菲律宾星报》，2018 年 6 月 16 日；里加拉多·E，“杜特尔特警告 NPA:血债血偿”，《菲律宾星报》，2018 年 12 月 20 日。
127 普农巴山·M，“AFP 看到来自 NPA 的威胁正在减缓”，《菲律宾星报》，2018 年 2 月 5 日;“布基德农的 NPA 威胁减弱”，2018 年 8 月 9 日;克里斯蒙多·M，“5 条 NPA 前线威胁等级下降”，《马尼拉公报》2018 年 8 月 25 日。
128 利钦·L，“新人民军在棉兰老岛的暴力行径不断升级”，《新曼陀罗》，2018 年 9 月 19 日。
129 埃利斯-彼得森·H，“杜特尔特的菲律宾禁毒战争死亡人数超过 5000 人”，《卫报》，2018 年 12 月 19 日。
130 岸信介和帕夫利克(注 55)，第 11 页。参见岸信介·R，帕夫利克·M 和拉维纳·R，“杜特尔特之战：菲律宾毒品相关暴力”，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LED);戴维斯、吉阿西和苏(注 35)，第 54 页。
131《卫报》，“国际刑事法庭对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发起反人类罪调查”，2018 年 2 月 8 日。

第 4 节.欧洲武装冲突和和平进程

伊恩·戴维斯

2018 年，欧洲只有一场活跃武装冲突：乌克兰。乌克兰武装冲突起因，以及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定义为一场内战，或是否是因为俄罗斯外部势力干预，都存在很大争议。鉴于 2018 年冲突现状，我们在这里将其定义为低强度国际性、次国家级武装冲突。[1]欧洲一些尚未解决的冲突虽不再活跃，但似乎一如既往积重难返。本节回顾了欧洲主要冲突进展和乌克兰武装冲突态势。

总体走向

尽管过去的 20 年间，欧洲大部分地区似乎远离枪炮，但林林总总的各种紧张局势背后就是各类悬而未决的武装冲突，尤其是在后苏联时期，以及高度军事化和争议不断的安全环境之中，如黑海地区。[2]东南欧部分地区的政治紧张局势也依然存在，尽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FYROM)和希腊之间的名称之争到年底已接近解决(见下文)。与此同时，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 Euskadi ta Askatasuna(ETA、巴斯克家园和自由组织)于 2018 年正式解散，2011 年宣布无限期停火，并于 2017 年交出武器。[3]

俄罗斯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以及整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仍在加剧。北约“三叉戟”和俄罗斯“沃斯托克”等军事演习，其规模达到冷战以来之最，对俄罗斯干预西方国内政治指控不绝于耳，这也是到达前所未有的程度。[4] 3 月，一名俄罗斯流亡间谍在英国险些遭受有毒化学物质（一名英国公民死亡）暗杀，西方将这一事件归咎于俄罗斯，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5]

图 2.1 后苏联时期争议领土示意图，2018 年

来源： 阿勒尼乌斯·H，指北针，2018

北爱尔兰冲突虽旷日持久，但 1998 年通过《耶稣受难日协议》基本解决。然而，英国实施 2016 年脱欧全公决 BRXIT，增加了英国和爱尔兰陆地边界性质的不确定性。过境便利和非军事化是《耶稣受难日协定》的核心部分。无论何种原因，如北爱政治和宪法解决方案难以为继，人们就仍然担心暴力卷土重来。[6]

尽管 2018 年涌入欧洲的难民和移民数量较 2015-16 年峰值大幅减少约 14 万人(2015 年超过 100 万人)，但从北非泅渡地中海致死人数仍高达 2275 人(2017 年 3139 人，2016 年 5096 人)。[7]

后苏联地缘政治背景下的非活跃武装冲突

尽管 2018 年的每场冲突都是剑拔弩张（见图 2.1），但后苏联地缘背景下的三场武装冲突或多或少都不再称得上活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和外德涅斯特（摩尔多瓦）。尽管在军

事上依旧是互相忌惮，但冲突更多的表现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争议领土之争，2016年和2017年你来我往，零零星星有过升级，但到了2018年又相对平静下来。[8]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的调解下定期举行和谈，但依旧未能阻止亚阿冲突在2018年迈入第40个年头。[9]近年来，双方都厉兵秣马，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10]2018年5月，接触线沿线最大的军事对抗爆发在破败的Gyunyut村及其周围地区。虽然具体细节不明，但据报道，冲突结束时阿塞拜疆夺回了几个被占领的村庄和战略阵地；至少一名阿塞拜疆士兵被打死。[11]

明斯克小组调解下，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外交部长于2017年10月和2018年1月进行了讨论，监测停火终于取得进展，即原则上同意在年底将OSCE接触线沿线监测员人数从6人增加到13人。[12]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措施是否已被采纳。

2018年4月，亚美尼亚相继爆发大规模抗议和“天鹅绒革命”，随后在5月，亚美尼亚政府更迭，局势更为动荡。尤其是亚美尼亚新总理尼科尔·帕辛扬的职位，武装冲突和和平进程前景更是迷雾重重。[13]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外交部长分别于7月和9月在布鲁塞尔和纽约与明斯克小组联席主席进行会谈，但似乎并未带来任何明确或突破性进展。[14]然而，双方同意建议新的沟通渠道，以便更好的管理边界并控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区类似事件。12月5日，两国外长举行了今年的第四次会议，两国领导人可能在2019年举行会谈。[15]

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冲突在2018年仍未解决，尽管格鲁吉亚在4月提出了新的和平倡议，但并未有任何政治突破迹象。[16]格鲁吉亚与这两个分离领土之间以及阿布哈兹与区域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有所增加，也为分裂地区之间提供了一个潜在桥梁。[17]然而，OSCE处理冲突地区实际问题的主要谈判论坛，即事件预防和反应机制，却仍深陷泥潭，濒临崩溃。[18]

在摩尔多瓦，OSCE努力斡旋德涅斯特河以东分离地区冲突，这一地区自1992年以来德涅斯特河以东的摩尔多瓦领土就一直被控制。[19]2017年底，OSCE报告，摩尔多瓦领导人与分离地区的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8年OSCE进程并未取得重大进展。[20]2018年6月，联合国应摩尔多瓦要求举行联大辩论，联大通过决议，敦促俄罗斯从外德涅斯特撤军。[21]

东南欧

东南欧诸多地区依旧动荡。在科索沃，科索沃塞族人和科索沃阿族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存在，尤其是在北部地区。欧盟发起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对话，遇到了一些挫折，其中包括 1 月 16 日在米特罗维察发生的塞尔维亚政治家奥利弗·伊万诺维奇遇刺谋杀，以及 3 月拘留了另一名访问该市的塞尔维亚政治家。[22] 据报道，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领导人正在考虑一项提议，沿种族界线重新划定科索沃边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和科索沃总统塔奇之间的谈判已进行一年多，有人提议塞尔维亚占领科索沃北部，同时放弃普雷塞沃山谷部分地区。然而，似乎没有任何协议迫在眉睫。提议虽然得到美国支持，但在欧盟内部遭到一致反对。[23]

今年 10 月，科索沃宣布将其安全部队整编为国家军队的行动，加剧了科塞紧张关系，并招致欧盟和北约的谴责。尽管如此，科索沃议会在 12 月批准了政府计划，即在未来 10 年内将配备轻武器的 3000 人精干科索沃安全部队变身为科索沃国防军，并将其扩充至 5 000 名现役部队和 3 000 名预备役的规模，这一计划得到美国的支持。[24] 对从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出口到科索沃的货物征收 100%的关税，进一步推升了科索沃内部及其同领国之间的紧张关系。[25]

6 月 12 日，FYROM 与希腊达成协议，将其名称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有效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 27 年的纷争，尽管协议仍需两国议会批准，并在 FYROM 举行全民公决。[26] 两国名称争议可追溯到 1991 年，当时 FYROM 以马其顿共和国的名义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独立。希腊反对马其顿这个名字，称这一名称意味着对希腊北部同名地区的领土要求，希腊对此极力阻止马其顿加入欧盟和北约。

协议在 9 月 30 日 FYROM 全民公投中赢得压倒性支持（约 91%选票），但全民公投未能达到要求的 50%的有效投票率（投票率仅为 36.9%，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俄罗斯造谣造成）。[27] 不过，总理佐兰·扎耶夫誓言将继续推动批准该协议，并计划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在马其顿议会进行投票。希腊议会也将于 2019 年初就该协议进行投票。

乌克兰武装冲突

1991 年苏联解体，乌克兰获得独立，一方面努力寻求同西欧更为紧密的一

体化，另一方面寻求与俄罗斯合作。俄罗斯的利益受到亲西方乌克兰的威胁，俄于 2014 年 3 月出兵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卢甘斯克州和顿涅茨克州引发叛乱。[28] 2014 年 4 月 14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乌政府军与俄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间的战争共导致 12800-13000 人死亡（至少有 3321 名平民和约 9500 名战斗人员）。关于分离主义分子伤亡还包括俄罗斯雇佣军和（或）俄罗斯正规军事人员的说法难以核实。[29]

尽管 2018 年顿巴斯地区战争死亡人数和平民伤亡人数较前几年大幅下降，平民伤亡人数（55 人死亡，224 人受伤）已不及 2017 年一半，但至少有 520 万人深陷乌克兰东部人道主义危机。约 100 万人粮食短缺，国内流离失所人口达到 150 万人之巨，更多乌克兰百姓面对的是贫穷和镇压。[30]乌克兰东部也饱受全球最严重的地雷污染之殇。[31]

全面对抗

乌克兰武装冲突，既受到俄罗斯和西方大国地缘政治对抗推动，又反过来加深两大阵营的对抗，向交战双方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就是佐证。乌克兰估计，活跃在顿巴斯地区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武装部队约有 3.5 万人，其中包括 3600 至 4200 名俄罗斯正规军和雇佣兵，装备大约 1400 辆装甲车和坦克以及重型迫击炮和其他火炮辎重。[32] 乌克兰还指责俄罗斯不断向分离分子提供军事物资，特别是电子战装备；这一点已得到 OSCE 观察员证实。[33]乌克兰政府反过来从美国和其他一些北约成员国接受武器和训练例。如 2017 年 12 月，美国宣布向乌克兰出售价值 4700 万美元的 210 枚标枪反坦克导弹。但另据报道，在顿巴斯接触线，此类导弹的使用受到一些限制，还有消息乌克兰获得了一批狙击步枪。[34]2018 年 2 月，波罗申科总统宣布即将有反狙击武器交付，包括用于电子战装备和防空装备。[35]11 月，据报道，美国和乌克兰就再次交付未指明的美国武器已接近达成协议。[36]

表 2.3 2018 年乌克兰主办或协办的多边和双边军事演习

演习名称	时间	军种	参演方
2018 海风联合军演	7 月 9 日-21 日	空军、陆军、海军、两栖登陆部队	保加利亚、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希腊、意大利、立陶宛、摩尔多瓦、挪威、波兰、罗马尼亚、瑞典、土耳其、乌克兰、英国和美国（混成）
2018 快速三叉戟多国军演	9 月 3-15 日	陆军	阿塞拜疆，保加利亚，加拿大，丹麦、格鲁吉亚、德国、立陶宛、摩尔多瓦、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2018 河流军演	9 月 4-7 日	海军	罗马里亚
2018 晴空军演	10 月 8-19 日	空军	比利时、丹麦、爱沙尼亚、荷兰、波兰、罗马尼亚、英国

资料来源：贾斯廷·L，“2018 年快速三叉戟演习跨越国界”，美国陆军，2018 年 9 月 14 日；美国国防部，“2018 年乌克兰海风演习结束”，2018 年 7 月 19 日；112 美联社，“2018 年乌克兰-罗马尼亚河流军演在敖德萨地区开始”，2018 年 9 月 5 日；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晴空-2018”：美军机参演乌克兰军演，2018 年 10 月 8 日。

自 2015 年以来，乌克兰安全部队共接受 3 项训练项目：多国联合训练项目（加拿大、丹麦、立陶宛、波兰、瑞典、英国和美国）；轨道行动（英国）和统一行动（加拿大）。[37] 此外，乌克兰于 2018 年 1 月通过一项法律，允许多达 3000 名外国军队进入该国进行演习和训练。此后多国举行了一系列多边和双边军事演习（见表 2.3）。[38] 尽管都是例行训练计划，这些演习有助于增强北约和乌克兰军队之间的操作通用性，并向乌克兰传递出声援讯号。

11 月，亚速海成为乌东武装冲突新战场。亚速海是黑海东北部的大片延伸，是顿巴斯通往马里乌波尔和伯丁斯克的主要港口（见图 2.1）。

海军冲突的导火索是俄罗斯扣押 3 艘乌克兰船只和 24 名船员。从西方的角度看，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公开使用武力，这也是自 2014 年俄罗斯武装吞并克里米亚以来的第一次。[39] 俄乌双方都指责是对方首先挑衅。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这一事件，是俄罗斯几个月来限制乌克兰东部港口进入黑海的最后恶果，违反了两国 2003 年达成的建立亚速海联合控制的双边协议。[40] 俄罗斯声称，这些船只已进入其沿海水域，乌克兰波罗申科总统挑起冲突，目的就在于巩固其国内基础

（2019 年 3 月总统选举前）和西方支持。作为回应，乌克兰议会批准了波罗申科总统实施 30 天戒严的提议。[41]

俄乌两国关系剑拔弩张，乌克兰官员还警告，俄方正在俄乌边界集结军队和武装装备，为可能的入侵做准备。[42]

和平进程

根据 OSCE 驻乌克兰特别监察团的说法，2015 年 2 月达成的和平协议和停火，即明斯克协议 II，在 2018 年形同虚设，几乎每天都在违反。[43]俄罗斯不愿意从顿巴斯分离分子控制区撤出军队和物资，乌东武装对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俄语区享有特殊地位似乎又不屑一顾。波罗申科总统已将部分权力下放给顿巴斯，但最关键的立法权限依旧由议会保留，2019 年大选之前看起来也难有进展。[44]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提议，一年间也没有任何进展。[45]简言之，明斯克协议 II 仍未得到履行，和平进程前路漫漫。

应对顿巴斯地区冲突的两个主要外交进程：诺曼底四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和三方接触小组（俄罗斯、乌克兰和欧安组织），下设四个工作小组（经济、人道主义、政治和安全）。2018 年 6 月，诺曼底四国外长自 2017 年 2 月以来首次会晤，讨论乌克兰局势。讨论涉及冲突诸多方面，包括交换囚犯、和平行动潜力、安全环境和政治改革，但未取得任何明显突破。[46]11 月柏林举行的后续会议也是止步不前。[47]

三方联络小组于 2018 年定期举行会议。然而，除开若干减小伤亡的临时停火外，收效甚微。12 月的小组会上，OSCE 特别代表--马丁·萨伊迪克大使对局势深表关切："双方似乎都没有用心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而是朝着相反的渐行渐远"。[48]2018 年底，期盼顿巴斯地区冲突硝烟散去，仍然只能是一个无法触及的未来。

1 冲突定义和类型见本章第 1 节。乌克兰冲突的最初起因，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可视为内战(现在降级为次级国家武装冲突)，主要源自国内，或是源自俄罗斯的外国干预，见威尔逊·A 相关著作，"乌克兰冲突的外部干预:顿巴斯武装冲突趋向冻结"，SIPRI 年鉴 2016，第 143-57 页;克莱姆·S，"消除战争迷雾: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中的公开官方信源及地缘政治故事"，《欧亚地理与经济》，第 58 卷，第 6 期(2017)，第 592-612 页。有关俄罗斯干预乌克兰的身份、机会和成本等驱动因素分析，请参见弗雷尔·M·R 和海勒·R，"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权力政治:在身份、机会和成本之间寻求地位"，《欧亚研究》第 70 卷，第 8 期(2018)，第 1185-1212 页。

2 梅尔文·N·J，“重建黑海地区集体安全”，SIPRI 政策文件第 50 号（SIPRI：斯德哥尔摩 2018 年 12 月）
3《经济学人》，“西班牙巴斯克埃塔恐怖分子解散”，2018 年 5 月 10 日;琼斯·S，“西班牙首相称埃塔的罪行不会逍遥法外”，《卫报》，2018 年 5 月 4 日。
4 俄美关系不断恶化，见史密斯·D，“国际紧张局势与权力转移”，SIPRI 年鉴 2018，第 11-12 页;本卷第 1 章;格罗诺·M，“镜像:莫斯科与西方国家的对峙”，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5 月 4 日。关于后苏联时代冲突，见克里缅科·E，“后苏联时代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及其对黑海安全的影响”，SIPRI 国际和平与安全观察 No.2018/8,2018 年 12 月。军事演习，见约翰逊·D，“沃斯托克 2018:俄罗斯十年战略演习和战争准备”，《北约评论》，2018 年 12 月 20 日;北约“2018 三叉戟走到十字路口”。俄罗斯干预西方选举的指控，见《纽约时报》，“俄罗斯黑客行为和对美国选举的影响”。
5 英国中毒未遂事件，见本卷第 8 章第 2 节。
6 沃森·T，“脱欧可能让北爱尔兰“冲突重燃”，BBC 新闻，2018 年 9 月 14 日;古德曼·P·S，“爱尔兰边界长期以来一直是看不见摸不着，可脱欧威胁将使其变为现实的边界”，《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26 日。
7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绝望的旅程:难民和移民抵达欧洲和欧洲边境，2018 年 1 月至 12 月”，2018 年 12 月 18 日。关于欧盟对难民危机的政策回应，见格里普·L，“全球难民危机及其对欧洲的影响”，SIPRI 年鉴 2016，第 439-52 页;格里普·L，“联合国及地区的流离失所危机应对”，SIPRI 年鉴 2017，第 280-82 页。
8 见戴维斯·I 和安东尼·I，“欧洲武装冲突”，SIPRI 年鉴 2018，第 62-63 页。
9 关于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成员的简要说明和名单，见本卷附件 B 第 2 节。其他和平提议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和平倡议，伊朗和土耳其的斡旋努力，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关于伊朗和平努力的最新研究，见马穆鲁·C 和阿比洛夫·S，“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和平进程:为什么伊朗的调解努力失败了?”，《当代中欧与东欧杂志》第 26 卷第 1 期(2018)，第 33-49 页。
10 见克里门科(注 4)。
11 古尔巴诺夫·I，“阿塞拜疆纳希切万周边局势恶化”，《欧亚日报》，2018 年 6 月 4 日。
12 《马西斯邮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中再部署 7 名停火观察员，2018 年 1 月 26 日。
13《经济学人》，“亚美尼亚革命还在继续，反对派领导人已接近掌权”，2018 年 5 月 3 日；德瓦尔·T，“亚美尼亚革命与卡拉巴赫冲突”，卡内基欧洲，2018 年 5 月 22 日;希里耶夫·Z，“对于阿塞拜疆来说，亚美尼亚政治动荡是一把双刃剑”，国际危机组织，2018 年 5 月 25 日。
14CivilNet 网站，“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外长在布鲁塞尔会晤”，2018 年 7 月 12 日;Tert.am 网站，“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外长在纽约会晤”，2018 年 9 月 27 日。
15 瓦尔坦尼安·O，“亚美尼亚选举促进与阿塞拜疆和平的希望”，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12 月 10 日。
16 安斯巴·R，“格鲁吉亚向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示好并非毫无问题”，查塔姆研究所，2018 年 11 月 26 日;梅纳贝·G，“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拒绝格鲁吉亚的和平计划”，《欧亚日报》2018 年 4 月 18 日。
17 国际危机组织(ICG)，“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是时候讨论贸易问题了”，《欧洲报告》No.249（ICG:布鲁塞尔，2018 年 5 月 24 日)。
18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第 89 届事件预防和应对机制会议在埃尔涅提举行”，2018 年 9 月 14 日新闻稿;格思里·S 和莫里森·T，“俄罗斯指责格鲁吉亚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政治化”，《今日格鲁吉亚》，2018 年 9 月 20 日。
19 克里门科·E，“后苏联时代冲突:最新进展”，SIPRI 年鉴 2017，第 140-50 页;克里门科(注 4)，第 11-15 页。
20 见戴维斯和安东尼(注 8)。
21 联合国大会第 72/282 号决议，“外国军队完全无条件撤出摩尔多瓦共和国领土”，2018 年 6 月 13 日。
22《经济学人》，“独立十年，科索沃依旧充满暴力”，2018 年 2 月 15 日;麦克道威尔·A，“科索沃非法进入该地区后逮捕塞尔维亚政客”，《卫报》，2018 年 3 月 26 日。
23 桑托拉·M，“关于科索沃种族分裂的讨论让老巴尔干幽灵复活”，《纽约时报》，2018 年 9 月 19 日;沃克·S 和麦克道威尔·A，“美国支持的科索沃土地交换边境计划遭到各方反对”，《卫报》，2018 年 9 月 3 日。
24 苏克·B，“科索沃议会投票决定组建一支抵抗塞尔维亚和北约的军队”，《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14 日。
25 拜提奇·F，“在众多争议声中，科索沃对塞尔维亚征收更多关税”，路透社，2018 年 12 月 28 日报道。
26 基特桑迪尼斯·N，“马其顿同意改名以解决与希腊的争端”，《纽约时报》，2018 年 6 月 12 日。
27 BBC 新闻，“马其顿公投:国家更名投票未达到门槛”，2018 年 10 月 1 日；梅托迪娃·A，“虚假信息如何危害马其顿公投”，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博客，2018 年 10 月 2 日；蒂斯达尔·S，马其顿公投结果是俄罗斯的又一次胜利，《卫报》，2018 年 10 月 1 日。
28 乌克兰冲突最初及其极具争议的起因，见威尔逊(注 1)和克勒姆(注 1)。苏联的州为一个类似于州或省的行政区划。
29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乌克兰人权状况报告:2018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2019 年 3 月 12 日。见多罗什·S，“有多少俄国人死在顿巴斯?”， BBC 乌克兰，2017 年 6 月 15 日(俄语)。
30 国际危机组织(ICG)，“没有人想要我们”:被孤立的乌克兰东部平民，欧洲报告 No.252（ICG:布鲁塞尔，2018 年 10 月 1 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乌克兰人道主义公报》No.28(2018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31 联合国乌，克兰，乌克兰人道主义协调员，“就乌克兰东部三名儿童死亡这一悲剧发表声明”，2018 年 10 月 1 日。
32 古尔德·J，美国和乌克兰就新型致命武器进行“密切讨论”，《国防新闻》2018 年 11 月 18；自由欧洲电台/乌克兰自由电台，[兵工厂 LDPR，战争步入第五个年头，武装分子“军队”是什么样子?]， 2018 年 8 月 6 日(俄语);乌克兰外交部，“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侵略，你应该知道的 10 个事实”。
33 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欧安组织驻乌克兰特别监测团(SMM)最新消息”，截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 19:30，2018 年 8 月 11 日。
34 莱德曼·J，“美国同意向乌克兰运送致命武器，此举激怒俄罗斯”《军事时报》，2017 年 12 月 23 日;罗金·J，“特朗普政府批准向乌克兰出售致命武器”，《华盛顿邮报》，2017 年 12 月 20 日;UAWire 网站“美国禁止乌克兰在顿巴斯使用标枪导弹系统”。
35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波罗申科希望在几周内拥有美制尖端武器”，2018 年 2 月 28 日。
36 古尔德(注 32)。
37 埃格纳什·M，“美国及其盟友推动乌克兰建设现代化军队”，《星条旗》，2017 年 7 月 6 日;英国国防部，“英国扩大对乌克兰武装力量的培训”，新闻发布，2017 年 7 月 17 日;加拿大政府，“UNIFIER 行动”。
38 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波罗申科签署法律，允许外国军队在 2018 年进入乌克兰进行演习”，2018 年 1 月 29 日。
39《经济学人》，“解局俄罗斯和乌克兰海军冲突”，2018 年 12 月 1 日;BBC 新闻，“刻赤海峡船只被劫持后，俄乌紧张局势加剧”，2018 年 11 月 26 日。
40 威尔逊·A，“战争的海峡?”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亚速海发生冲突，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评论，2018 年 10 月 2 日。
41 古伯特·S，“乌克兰不切实际的戒严令”，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评论;费里斯-罗特曼·A，“随着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对峙加剧，乌克兰将实施戒严令”，《华盛顿邮报》，2018 年 11 月 26 日。
42 克雷默·A·E，“乌克兰声称俄罗斯在东部边境有大规模军事集结”，《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15 日。
43 特别监测团每周就乌克兰危机提交特别报告;见 < https://www.osce.org/ukrainecrisis >。乌克兰冲突和危机管理，见安东尼·I，《欧洲安全》，SIPRI 年鉴 2017，第 137 - 38,146 - 49 页;威尔逊(注 1);安东尼·I，佩罗-弗里曼·S，“乌克兰冲突及其影响”，SIPRI 年鉴 2015，第 55-98 页。
44 国际危机组织(注 30)。
45 关于维持和平建议，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同时见劳森·E，“考虑在顿巴斯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会议报告，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2019 年 2 月。
46 史波尼克，“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诺曼底四次会谈发表讲话:会晤是有益的”，
2018 年 6 月 12 日。
47 塔斯社，“俄罗斯对诺曼底四国政治领导人柏林-拉夫罗夫会晤感到满意”，2018 年 11 月 27 日。
48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欧安组织轮值主席萨迪克代表出席中日韩三方接触小组会议后发表特别新闻声明”，2018 年 12 月 4 日。

第 5 节.中东和北非武装冲突和和平进程

伊恩·戴维斯

2018 年，中东北非地区活跃武装冲突涉及 7 个国家：埃及（高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伊拉克（国际化内战）、以色列（低强度、国家间武装冲突）、利比亚（国际化内战）、叙利亚（重大国际化内战）、土耳其（高强度国家间和次国家级武装冲突）和也门（重大国际化内战）。[1]其中许多冲突相互关联，涉及地区和国际大国及众多非国家行为主体。[2]冲突造成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2018 年，三重问题叠加影响下，各国都试图加强自身安全，但却引发反制措施，使得外部环境愈发不安全，从而出现安全困境：（a）与不断变化中的外部联盟和利益网络的地区间竞争；（b）来自暴力圣战组织的持续威胁；以及（c）水资源竞争日益加剧、气候变化影响日益严重。[3]本节首先简要讨论以上三个问题，然后逐一介绍 2018 年各武装冲突及相关和平进程推进情况。

总体走向

时至今日，中东地区武装冲突的累积效应令人震惊。叙利亚内战造成至少 40 万人丧生，自 2011 年以来，内战还造成逾 560 万难民和 66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4]在伊拉克，从 IS 手中解放每一寸领土都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基础设施代价。也门内战的炮火使得大量民众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危险。利比亚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即使是政局相对稳定的国家，如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也因领国武装冲突蔓延而饱受社会经济问题、年青人抗议之苦。[5]2018 年，尤其是对于中东北非的每一个国家(MENA)，阿拉伯之春恶果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挑战，较 7 年前来的更为苦涩。[6]

联盟和对手的变化

2018 年，MENA 地区最具破坏和高风险的国家间博弈依旧是伊朗一己之力单挑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和美国四国小组。四国都将伊朗视为破坏地区稳定的因子，希望自己能成为地区霸主。四国竭力挑战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而伊朗国内，人们对地区挑战和动荡根源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自 1979 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就一直被敌对势力环伺，伊朗也一直采取“激进防御”的策略--利用地区盟国和代理人为杠杆，阻断或击退对手，御敌于领土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对外部势力的强力反推。今天，伊朗的国防战略由伊朗部队或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担纲。[7]伊朗和反伊组织之间的权力争斗在 2018 年以各种方式演绎。

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在 5 月退出 2015 年伊核协议，恢复制裁（包括对与伊朗有业务往来国家的二级制裁），更加强硬的言论和军事行动威胁。[8]美国一直在推动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新的逊尼派穆斯林安全和政治联盟，姑且称为“中东战略联盟”，但经常被人们叫做“阿拉伯北约”（将其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应），以制衡伊朗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美国希望，由沙特实际操盘，新生安全联盟将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以及埃及和约旦。然而，沙特主导的对卡塔尔的持续封锁仍是一大障碍，尤其海湾国家内部的裂痕迫使卡塔尔站队伊朗。阿曼似乎也不太可能加入。[9]然而，巴林外交部长哈立德·本·艾哈迈德·阿勒哈利法 10 月宣布，拟议的联盟将于次年成立。[10]

中东地区军费和武器进口第一大国--沙特，携手阿联酋（以其他一些海湾国家）已经在伊拉克、黎巴嫩和也门战场同伊朗周旋。[11]例如，2016 年沙特重新与伊拉克建立外交关系（1990 年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入侵科威特后中断了与伊拉克的外交关系），此后，双方加强接触，试图削弱伊朗的影响。[12]

以色列抗伊的主战场是黎巴嫩和叙利亚。2018 年，以色列曾多次袭击叙利亚境内伊朗结盟目标，并威胁将袭击黎巴嫩境内伊朗支持的真主党。[13]2018 年 5 月，黎巴嫩举行自 2009 年以来的首次立法选举，与真主党结盟的政党在选举获胜席位从约 44%增至 53%。[14]真主党已成为伊朗防御战略中的急先锋，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政治主导地位和军事力量，使得它可在黎巴嫩国家军事指挥系统之外部署一支民兵武装，其能力远胜于黎巴嫩武装部队，有效的将伊朗（以及大量火箭和导弹储备）防御力量推进至以色列边界。[15]

2018 年，伊朗的主要战略是巩固其在中东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叙利亚东北部以及与卡塔尔和土耳其的关系得以改善。其目的就是通过前瞻性的战略防御策略，以避免遭受对手惩罚性措施。因此，伊朗于 2018 年 4 月恢复了有限的导弹测试并与卡塔尔签署海上安全协议。[16]按照美国的说法，伊朗还利用伊拉克的什

叶派代理人威胁美领馆。[17]2018 年，伊朗同抗伊同盟相互对峙，严重对抗始终处于爆发的边缘。9 月 22 日，在伊朗阿瓦士的一次阅兵式袭击事件中，至少有 25 人丧生，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伊朗指责美国与某一海湾国家相互勾结，发动对伊袭击。阿拉伯分离主义团体和 IS 均声称这一袭击负责。[18] 抗伊同盟也并非铁板一块，尤其是美国和沙特。10 月，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在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馆被暗杀，沙特外交政策不仅饱受美国国会和媒体炮轰，而且也使得沙特政治信誉颜面扫地。[19] 国际社会本就对沙特干预也门事务颇多微词，年末又因为同加拿大的人权之争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20]

最后，土耳其在 2018 年与伊朗和俄罗斯结盟也意义重大。此举使其在叙利亚与美国及其库尔德盟友之间重新找到平衡(见下文“叙利亚武装冲突”)。

暴力圣战组织

尽管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折戟沉沙，但是 2018 年在全球 70 个国家仍活跃着约 10 万至 23 万萨拉菲圣战分子，其中包括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圣战分子。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圣战组织战斗人员人数增加了 4 倍。[21]这些人因将圣战包裹为其他形式逊尼派伊斯兰武装行为而饱受诟病。虽然战斗人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更多的是在当地的作战。[22]在 MENA 地区，打击圣战组织的斗争远未结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溃败后，圣战分子化整为零，变身为一个约 2 万多人的秘密网络。[23]鉴于其隐蔽性和“外国战斗人员”（加入外国武装冲突的个人）已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很难准确评估其规模。然而“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此，军事上的胜利很可能也只是暂时缓和伊斯兰武装问题。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之间的冲突也在继续，特别是在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总体而言，基地组织在上述地区的影响似乎正在恢复，而伊斯兰国则在继续减弱（见图 2.2）。[24]

水资源压力和其他气候变化影响

MENA 地区环境、气候变化和安全问题之间相互联系是“复杂、多维，并朝多个方向发展”。[25]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的竞争加剧了 MEAN 地区现有紧张局势，并引发了新的潜在冲突。与其他地区相比，MENA 地区气候影响更为严重：预计气温将上升，干旱将比全球平均水平时间更长、程度更深和频度更高。[26]尽

管多数湖泊和河流跨越国界，MENA 地区几乎没有跨界水资源协议。60%以上人口生活在地表高水压或极高地区（即用水量大于补充水量的地区）。[27]以上诸多因素进一步推升粮食安全问题。[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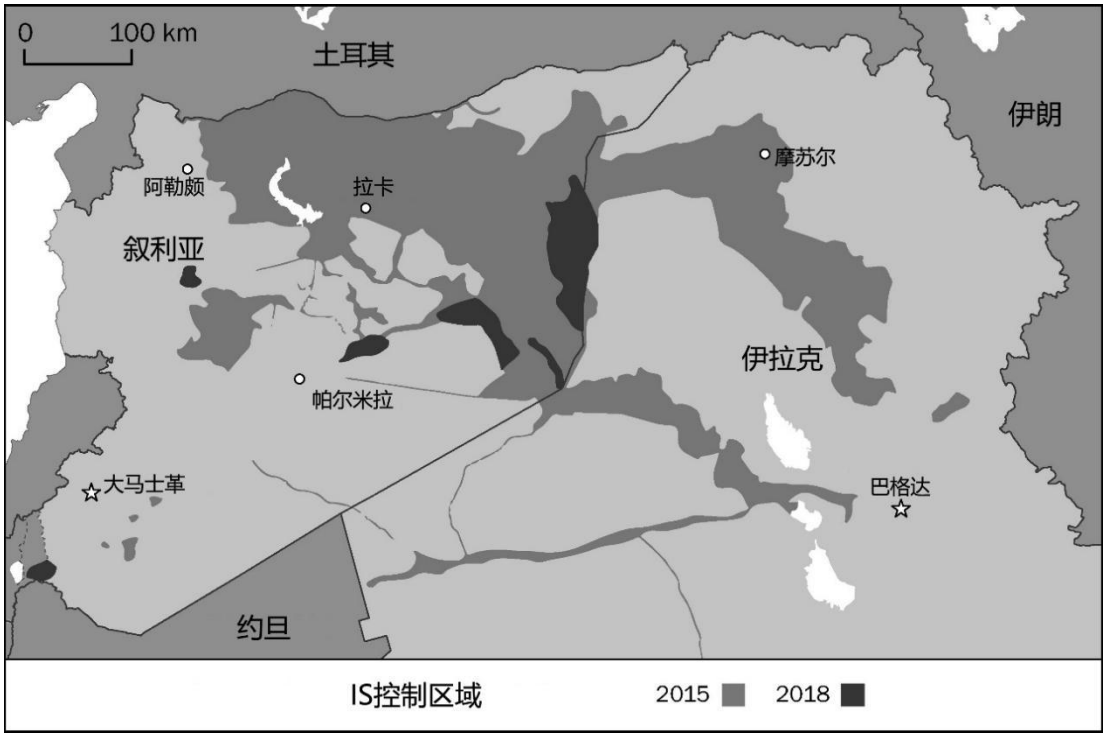


图 2.2 2015 年至 2018 年间 IS 失去的领土

来源：《哈里发的兴衰：2015 年至 2018 年间的领土流失》，《建立信任：地中海和平与稳定的挑战》，罗马 2018 地中海 MED 对话，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2018 年，第 14 页。

一些情况下，气候变化和水资源压力成为 MENA 地区武装冲突的直接或间接诱因：叙利亚干旱（加上取消对农民的补贴）、阿拉伯之春前夕埃及不断飙升的粮食价格，2013 年，也门大部分农村冲突都与水有关。[29]以水源为武器对付平民的做法早已司空见惯，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也是如此。[30]

2018 年，伊拉克南部暴力抗议活动与水和能源供给中断直接相关。[31]黎巴嫩，贝卡河谷的叙利亚难民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紧张局势。[32]2018 年 4 月，埃及政府水务管理措施引发农民示威游行，而在北非更是屡见不鲜。2018 年，北非共有数百起抗议皆源于水资源短缺。[33]伊朗由于供水不畅，2018 年也动乱频现。[34]加沙，97%的饮用水都受到污染。[35]

埃及武装冲突

阿拉伯人口第一大国埃及（2018 年 9800 万人），时常站在中东政治舞台中

央。2011 年，执政近 30 年后，穆巴拉克总统在阿拉伯之春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黯然下台。继任者穆尔西总统又在 2013 年 7 月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2014 年 5 月，退役陆军元帅前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西西当选总统。[36]

2013 年，西奈半岛北部爆发叛乱，袭击的重点目标是国家安全部队。然而，2014 年西奈激进分子包围 IS（当地分支是 IS-西奈半岛或 IS-西奈省）之后，发生大规模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时间，包括 2015 年俄罗斯客机爆炸事件，共造成 224 人死亡。[37] 2014 年 10 月以来，西奈北部进入紧急状态，2017 年底，西奈半岛叛乱成为埃及国内最大安全威胁。[38]

2018 年，据信约有 2000 名圣战分子活跃在西奈，尽管 IS 围剿之战几乎不为外人所知。[39] 2018 年 2 月，埃及武装部队发起一场新军事行动，即“西奈 2018”综合行动，打击叛乱：有未经证实的指控称，西奈 2018 行动使用了集束弹药。[40] 一年多来，埃及首次爆发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12 月一名不明身份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发动炸弹袭击，造成 4 人死亡。埃及安全部队随后在 3 次单独突袭行动中击毙 40 名疑似武装分子。[41]

2018 年一季度，塞西总统通过监禁、恐吓等手段，除掉了 5 名总统首选人；3 月 29 日，塞西以 97%的选票连任，但投票率仅为 41%。[42]2018 年年末，埃及面临数十年来最为恶劣的人权状况，西奈半岛内战随之爆发。

伊拉克武装冲突

2018 年，尽管 2017 年 12 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溃 IS，但铲除盘踞伊拉克北部农村地区 IS 残余的军事行动还在继续。[43]城市中的 IS 炸弹袭击也零星出现。[44]据 2018 年 11 月联合国报告，IS 控制时期，伊拉克全境中的 200 多个坟冢中，有多达 12000 具尸体。[45]IS 控制的另外两个城市摩苏尔和塔尔阿法尔，在断壁残垣和巨大牺牲后被夺回。[46] 2018 年 2 月国际认捐大会承诺为伊拉克重建提供近 300 亿美元费用（包括赠款、贷款和投资承诺），当然相较伊拉克政府想要的 880 亿美元依旧是杯水车薪。[47]对解放区圣战分子及其家人的报复，反过来又加剧了伊拉克潜在的宗派紧张局势。[48]

反 IS 武装本身也是支离破碎：除美国主导的全球反达伊沙联盟所支持的伊拉克军队外，还包括库尔德佩什麦加和哈什德沙比，也被叫做人民动员部队，是一个由伊拉克国家资助的伞式组织，主要由什叶派民兵（伊朗支持）以及逊尼派、

基督教、沙巴克、雅兹迪和土库曼民兵组成。[49] 联合国估计，由于“恐怖主义和与冲突相关的暴力行径”，伊拉克平民伤亡人数在下降，2018 年死亡人数 10 年来首次低于 1000 人，这也证实了伊拉克安全局势在改善（见表 2.4）。尽管伊拉克似乎在 2018 年步入冲突后阶段，但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LED）描绘出的却是一副喜忧参半的画面：虽然“有组织的政治暴力事件”较 2017 年下降近 50%，但 2018 年仍有 6000 多人的死亡记录，均与暴力冲突相关。[50] 伊拉克依旧风雨飘摇，国家机构羸弱不堪。

预计 2018 年的地区和全国选举将有助于促进民族间和解，但早期迹象喜忧参半。第一，在解决库尔德边界问题或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共同分享伊拉克石油和天然气收入，似乎也没什么进展。[51] 第二，尽管逊尼派内部本就龃龉不合，但多数逊尼派成员还是有意愿参与国家政治进程，以寻求更大的权力下放。第三，什叶派似乎已经分崩离析，各子派别纷纷同各种非什叶派政党结成同盟，这也导致新总理（前石油部长和什叶派政治家阿德尔·阿卜杜勒·马赫迪）的推选和新政府的组建一拖再拖。[52] 这些政治变革是否会削弱伊朗伊拉克的政治影响，还有待观察。9 月下旬，美国以伊朗和伊朗支持的伊拉克部队存在安全威胁为由，关闭了位于巴士拉的美国驻伊领馆，美国在伊拉克共有三处外交机构。[53]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否认伊朗应对这些威胁负责。[54]

表2.4　2009-2018年伊拉克恐怖主义和冲突相关暴力平民致死数量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3056	2953	2771	3238	7818	12 282	7515	6878	3298	939

资料来源：联合国伊拉克，“2018 年 12 月联合国伊拉克伤亡数字”，2019 年 1 月 3 日。

巴以冲突

1967 年阿以战争，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领土，这段历史不仅波及面广而且错综复杂。[55]2017 年 12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不顾国际社会一致反对，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宣布美国大使馆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此举引发加沙、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各地巴勒斯坦人强烈抗议。[56] 2018 年，以色列在被占领土扩大定居点依旧是一个争议问题。[57]

加沙冲突

2018 年，以色列与哈马斯和加沙地区其他巴勒斯坦组织之间摩擦和武装冲突不断，达到 2014 年以色列--加沙战争后的最高水平。巴勒斯坦逊尼派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下属社会服务部门(达瓦哈)和军事部门(卡萨姆旅)---自 2007 年法塔赫-哈马斯冲突以来一直是加沙地带事实的管理当局。[58] 哈马斯和以色列在 2008-2009、2012 和 2014 年多次交手。十多年来，加沙还遭受以色列和埃及双重封锁，造成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加沙成为人们口中的“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59]

2018 年，美国几乎取消了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以及其他人道主义项目的援助，以此作为对巴勒斯坦领导人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政治进程进行报复，也进一步加剧加沙社会压力（80%人口依靠国外援助应对日常生活所需）。[60]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承诺增加援助资金，填补美国的资金缺口。[61]

2018 年 3 月 30 日，大规模抗议活动爆发，被称为“回归之旅”(难民们要全有权返回其在以色列的原籍地)。以军在加沙-以色列边界围栏沿线各处对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火（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共造成 17 人死亡，1400 多人受伤。[62]联合国秘书长、欧洲联盟（EU）高级代表、联合国人权组织和加沙定居点家庭要求对以军士兵使用武力展开独立调查。[63] 以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拒绝了这一要求。[64]

5 月 15 日，巴勒斯坦人继续举行抗议活动，以纪念灾难日 70 周年（纪念 1948 年战争期间约 75 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以色列家园）。4 月 18 日，以色列人庆祝独立 70 周年。[65] 由于以军坚持武力镇压巴勒斯坦每周的抗议活动，伤亡人数继续飙升。[66] 灾难日纪念日前夕，特朗普女儿和女婿飞往耶路撒冷，为新设美使馆剪彩。同日，至少有 60 名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在边界围栏附近的抗议活动中丧生，约 2700 人受伤。[67]联合国发表各种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呼吁国际刑事法院（ICC）对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多种恶劣行径展开全面调查。2015 年就已开始对以色列 2014 年战争行为和将以色列公民迁往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定居点情况展开初步调查。[68]

尽管暴力活动仍在继续，但每周一次的示威活动仍在边界沿线直至岁末。尽管 11 月抗议活动有所减少，以换取以色列有限的援助让步。[69]加沙卫生官员表示，这段时间，以军共打死 210 多名，打伤 18000 多名参加抗议的巴勒斯坦人。[70]受伤者中约有 2000 人因腿部严重枪伤接受治疗，许多伤员伤口感染多种抗药

性细菌。[71]抗议活动中，一名以军士兵被巴勒斯坦人流弹打死。

从年中 7 月直到年底，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和以色列（空袭加沙）之间频繁的擦枪走火很可能演变为全面的军事对抗。[72]国际刑事法院警告以色列，将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罪行进行调查。[73]以色列对国际法庭的声明嗤之以鼻，对检察官的公正性提出质疑。[74]人权观察指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约旦河西岸）和哈马斯（加沙）都对异见者实施虐待，其背后就是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的世代宿怨。[75]

11 月 11 日，以特种部队伪装成援助人员入侵加沙，造成 1 名以色列军官和 7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当地的哈马斯指挥官，引发哈马斯的火箭弹报复和随后的以色列空袭。[76]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了约 400 枚火箭弹和迫击炮，以色列战机对加沙 100 多个目标发动袭击，随后双方签订停火协议，最终导致利伯曼辞职。[77] 2018 年底，约旦河西岸的动荡局势使得加沙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停火协议依旧只是一捅就破的一纸文书。据报道，自 2017 年 12 月 6 日起的 12 个月内，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共逮捕 5600 名巴勒斯坦人。[78]

和平进程

自冲突爆发以来，和平之声断断续续，从未停歇。2003 年以来，巴以和平协议的基础是一个两国解决方案，即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79]双方最近一次直接谈判在 2013-14 年，但 2014 年 4 月谈判破裂。[80]据报道，2018 年初，美国政府正准备由特朗普女婿、美国中东和平特使贾里德·库什纳主持新和平倡议。然而，时至岁末，翘首以盼的“世纪协议”依旧难产。[81]两国解决方案是否仍然源自美国当前固化的思维模式，甚至是否可行，都越来越令人怀疑。[82] 2018 年 3 月的一项调查，现在反对两国解决方案的巴勒斯坦人占多数，57%的巴勒斯坦表示，以色列定居点不断扩大，这一解决办法已不具现实可能性。尽管如此，还是只有 28%的巴勒斯坦人支持一国解决办法---建立一个阿拉伯人占多数、平权的单一国家。[83]7 月，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有颇具争议的法令，将以色列定为犹太人民的国家家园，这对两国方案是一个潜在打击。法令还规定，“以色列的民族自决权由犹太人独有”，“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希伯来语是以色列唯一官方语言，同时保留阿拉伯语的特殊地位。阿拉伯立法者将该法令描述为披着合法外衣的种族隔离法令。[84]

2018 年 7 月起，埃及和联合国也展开了更具针对性的外交努力，避免加沙再度爆发以巴战争。调解工作双管齐下：一路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恢复执行 2014 年停火协议并将其锚定长期可持续停火之中，同时促成哈马斯和法塔赫和解，推动巴勒斯坦统一以及巴权力机构返回加沙。[85]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在年末表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握手言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86]

利比亚武装冲突

2011 年在西方军事援助，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被武装叛乱推翻。其后，利比亚一直硝烟难散。[87]根据 2015 年利比亚政治协议（LPA），联合国支持的民族和睦政府（GNA）于 2016 年在的黎波里成立，总理法耶兹·萨拉杰领导新政府。四大民兵组织组建成一个松散的联盟，而 GNA 倚靠的正是这一联盟：特别威慑部队、的黎波里革命营、纳瓦西旅和中央安全机构阿布斯利姆旅。[88]2018 年初，这四大民兵组织控制了利比亚国家机构最后家底及其在的黎波里的组织机构。[89] GNA 遭遇政体对手，利比亚东部托布鲁克的众议院对 GNA 和 LPA 不予承认。众议院由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把控，他自封为利比亚国防军司令。利比亚国防军是一支由部落或地区武装组成的杂牌军。哈夫塔尔得到了埃及和阿联酋的军事支持，政治上有法国和俄罗斯撑腰。[90]与此同时，利比亚南部，图阿雷格族和图布族民兵为争夺控制权，尤其是在乍得边界地区，两派打的一塌糊涂。[91]时至 2018 年年底，利比亚全境基本形成三分天下之势（见图 2.3）。

2017 年 9 月的联合国行动计划中，联合国驻利比亚支助团(UNSMIL)促成了对 LPA 拟议修正案的对话，但各方未能就军事指挥安排、不同治理主体相对权力、治理机制及其他宪法问题达成共识。[92] 2017 年底，哈夫塔宣布将不再遵守 LPA，这又加大了两大政府同各色民兵武装爆发新冲突的可能——2018 年年中已有先例(见下文)。[93]

暴力冲突死灰复燃

2018 年 6 月，利比亚沿海地区爆发新冲突，比利亚石油出口大部分都依赖沿海码头。利比亚国民军被迫退守，随后又重新夺回了位于锡德拉和拉斯拉努夫的石油出口码头。迫于国际社会压力，加上利比亚 GNA 做出让步---包括请求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对利比亚中央银行资金给付独立审查进行监管。

94

8 月下旬，的黎波里爆发冲突，主角却是联合国支持的 GNA 下属不同民兵组织派别。[95]第 7 旅是 GNA 国防部于 2017 年组建的民兵组织，从的黎波里东南 65 公里的塔胡纳镇抽调，向首都发动攻击。此举意味着向 GNA 内政。[96]100 多人在炮火中丧生，利比亚总理于 9 月 12 日提出一揽子经济改革，UNSMIL 才达成另一项停火协议。[97]

图 2.3 2018 年利比亚敌对势力控制领土

作者：雨果•阿勒尼斯，《指北针》。
资料来源：全球警报地图(Liveuamap)，《跨越地中海的利比亚纷争》，《经济学家》，2018 年 11 月 8 日。

权力真空使得暴力袭击卷土重来。2018 年共发生 10 多起暴力袭击事件，IS 激进组织位列其中。例如，2018 年 9 月，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遇袭，2 名员工死

亡，10 人受伤。12 月，的黎波里外交部遇袭，至少 3 人死亡。[98]3 月，美国对利比亚南部疑似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实施空袭。[99]

和平进程

法国和意大利都试图竭力影响利比亚和平进程，2018 年两国各自主办了一场峰会。意大利的利益主要集中在比利亚西部，绿溪天然气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西西里。法国则倾向于同哈夫塔尔合作，认为他更有能力稳定国家局势，防止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邻近的萨赫勒地区(法国已在该地区部署了大量部队打击圣战分子)。[100]意法两国能源公司也在争夺利比亚石油大单。[101]

5 月 29 日，法国在巴黎主办了一次首脑会议，利比亚 LPA 领导下核心政治机构的三位领导人——GNA 总理萨拉吉、众议院议长阿吉拉·萨利赫和高级国务委员会（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咨询机构）主席哈立德·米什里以及哈夫塔尔聚首巴黎。2018 年 9 月 16 日，会议达成八点宣言，四位领导人同意但未签字。与会各方都同意构建宪法框架以推进大选，同时确定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前举行大选。[102]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以及欧盟、阿盟和非盟都支持《巴黎宣言》，一是担心 IS，而是担心利比亚战事后大量难民涌入欧洲。[103]

与此同时，UNSMIL 授权全国大会进程(NCP)在 2018 年 4 月至 7 月间举行一系列公众协商，其重点是国家政府、安全、治理和选举进程优先事项。利比亚全国 43 个地点共举行 70 多场会议，6000 多名利比亚人参会，会议还着重强调妇女、国内流离失所者、少数民族和青年的参与。[104]一项在线活动吸引了 13.1 万脸书用户和 1400 名推特用户。104UNSMIL 团长加桑·萨拉姆指出 NCP 达成重要共识：利比亚全国就新选举必要性达成广泛协议。[105]然而，意英美等国以及许多利比亚人，都认为巴黎峰会商定的时间表并不现实，原因就是当前利比亚暴力水平无法预测，选举的宪法框架基础尚未完成。[106]

意大利提出另一项计划，包括推迟大选，并在 2019 年 1 月组织一场利比亚全国大会（如 NCP 设想的那样）。11 月 12 日至 13 日，意大利在巴勒莫首脑会议，众多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代表和来自 38 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大会，共同推动这一议程。哈夫塔尔只出席了第二天的会议，随后只在主要首脑会议期间与萨拉吉举行了一次小型首脑会议。[107]首脑会议并未取得重大突破，对联合国行动计划的任何调整似乎都难以弥合各方分歧，无论是在利比亚各派别和国际外部势力之间，

还是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分配。

叙利亚武装冲突

2011 年以来，叙利亚阿拉维派精英政治角力在漫天硝烟的混战中拉开帷幕。冲突虽是源于“阿拉伯之春”，但逐渐演变为一场席卷地区和国际大国的群雄逐鹿。[108] 虽然战火远未平息，但 2018 年由于叙利亚政府的步步逼近和 IS 的土崩瓦解，局势明显得到缓和。[109]然而，随着反对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政府的武装力量削弱，以色列空袭将叙利亚内战推向另一方向，即土耳其边境军事行动以及伊朗经营多年的军事存在。IS 残余势力的安全威胁贯穿 2018 全年。[110]

总体而言，叙利亚冲突仍是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冲突之一。虽没有可靠的伤亡统计数字，但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共有 40 万叙利亚人死于战火，而 ACLED 估计，2018 年约有 30200 人因战争死亡。[111] 近 30%的有组织暴力都来自于战争 ，大多数都来自单一国家。叙利亚仍然是平民伤亡最多的国家：2018 年共有 7100 多人丧生。[112]非政府组织将巨大的平民伤亡归咎为大型炸弹和导弹等爆炸性武器、间接射击武器（迫击炮、火箭和火炮）以及简易爆炸装置（IED）——特别是在人口稠密地区。[113]2011 年至 2018 年间，叙利亚有 79206 人被爆炸性武器炸死或炸伤，其中 85%（67263 人）为平民。真实数字可能还要高得多。[114]清除地雷和其他爆炸性武器残留物可能需要耗时 50 年。[115]

联合国秘书长在今年 10 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及叙利亚内战中“针对儿童的暴力行为令人深感不安”，其中包括 2013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8 年 6 月底期间，已核实的 12537 起针对儿童的“严重侵犯行为”。报告所述严重侵犯行为包括招募儿童参与军事行动、杀害和致残、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袭击学校和医院、绑架和拒绝人道主义援助。[116]

武装冲突仍是人道主义需求的驱动因素。随着叙利亚多数地区大规模战斗结束，2018 年前 10 个月，约 12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得以回归家园。然而，在其他地区，大规模流离失所现象贯穿全年。尽管在 1 月至 11 月间，超过 42000 名难民返回，但时至 2018 年年末，叙利亚半数人口依旧颠沛流离，超过 560 万难民（主要由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收容）和 600 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117]正如联合国高级官员在 4 月的一次认捐大会所说，全球四分之一难民来自叙利亚，四分之一的叙利亚人是难民。[118]

2018 年，约有 1310 万人（叙利亚人口的一半以上）急需人道主义援助，670 万人面临严重粮食问题，另有 450 万人可能面临严重粮食短缺风险。[119]其他评估显示，随着叙利亚许多地区安全形势的改善，今年下半年叙利亚粮食安全问题略有缓解。[120]2017 年 IS 衰落之后，2018 年潜在冲突的魅影在西北、西南和东北三大战线重新浮现——战斗人员组成复杂、组织形式多变。地区和世界大国直接干预也有所增加：西南部有伊朗、以色列和俄罗斯；西北部有俄罗斯和土耳其；东北部有土耳其和美国。[121]

外部军事力量在叙利亚战场的角力，时不时使得局势更为错综复杂，很可能成为冲突扩大的导火索，尤其是在各方空军相互博弈之时：据报道，美国在 2 月对亲政府武装的空袭造成约 100 人死亡，这是叙政府军和俄雇佣军混编部队；7 月 24 日，以色列击落了一架正在戈兰高地边界附近对叛军实施空袭的叙利亚飞机，声称叙战机“严重违反”1974 年联合国非军事化协定；9 月，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被一枚叙利亚导弹误射击落，该导弹原本射向正在执行对叙攻击任务的以色列战机。俄方最初归罪以色列。[122]

西北部

在西北部，政府军(得到伊朗和俄罗斯的支持)与多个反政府武装作战，重点打击农村省份伊德利卜和大马士革郊区(东古塔)。1 月、2 月，叙政府军和反叛武装在伊德利卜发生激战，造成逾 10 万人流离失所，而在东古塔，40 万平民被困，无法获取人道主义援助。[123]俄罗斯和叙政府军空袭造成数百人伤亡，有人指控叙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124] 2 月 24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叙利亚全境停火 30 天，2 月 26 日，俄罗斯宣布将在东古塔建立人道主义走廊。[125]

3 月初，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和伊朗民兵支持下，控制叙利亚东部大半领土。[126]根据俄罗斯斡旋达成的协议，约 1500 名叙反对派武装人员和 6000 名家属撤离至叛军占领的伊利布省。[127]4 月，500 名叙利亚人因毒气中毒症状接受治疗。此前政府军曾对东古塔的杜马镇发动化武袭击。作为报复，一周后，法英美三国对疑似叙化武设施发动空袭。[128]政府军夺回东古塔，北部霍姆斯的叛军同意谈判投降。

今年 8 月，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国准备对叛军控制下的伊德利卜省发动进攻，伊德利卜省约有 300 万平民（包括 100 万来自其他地区的叙利亚国内流离失所者）

以及大约 10 万名武装叛军和各派别圣战分子。联合国警告，袭击伊德利卜可能会造成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危机，其规模在叙利亚长达七年的内战前所未有。[129] 9 月 17 日，俄罗斯和土耳其签署一项协议（伊朗和美国都表示赞同），旨在建立一个非军事缓冲区，以保护伊德利卜平民，并对缓冲区实施监控。[130]尽管提前撤出重武器，但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激进武装组织，都未在 10 月 15 日的最后期限前撤出缓冲区，继续发生暴力的潜在风险大增。[131]

11 月在阿勒颇发生的另一起疑似化武袭击事件，伤及 100 多人。其来源和所使化学物质尚不清楚，但俄罗斯和叙利亚都指责是反政府武装实施了化武袭击。[132]

西南部

6 月中旬，在俄罗斯空军夹持下，叙政府军力度收复了西南部大片领土。两周激战之后，超过 27 万人流离失所。[133]2017 年 7 月，约旦、俄罗斯和美国谈判达成一项停火协议，西南部地区就在协议范围之内。当然停火协议从未实现从刀枪入库到马放南山。约旦与俄罗斯举行会谈之后，7 月 7 日在南部签订新停火协议，俄罗斯部署军警协助协议实施。[134]尽管 10 月重新开放主要边境关口，但是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就业困难同时也是因为安全缺乏保障，难民大多不愿回到故乡。[135]

以色列一直致力于在自己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之间维持一个缓冲区，2018 年以色列逐步加大了对叙境内伊朗资产的空袭。[136] 伊朗支持的武装部队在叙中部 T-4 空军基地遭以色列空袭，一架以空军 F-16 战机被叙防空导弹击落，使得以色列加大对叙利亚防空系统空袭力度。[137]2018 年 9 月，以色列情报部长以色列·卡茨声称，“过去两年中，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共发动 200 余次军事行动”。[138]

东北部

同其他两个冲突地区相比，叙东北部在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控制下保持了相对稳定，主体为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人民保护部队(YPG)。[139]3 月，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叛军控制了以前由库尔德人占领的阿夫林省。两个月前，土耳其军队越过土叙边境，进攻阿夫林。[140]几乎 2018 年全年，美国支持的 SDF 都

在努力夺回被 IS 占领的最后一块领土。尽管在 10 月有 IS 间或的反扑以及来自土耳其围剿库尔德人武装的威胁，使得 SDF 行动稍受阻碍，但 SDF 依旧攻城拔寨。12 月中旬，SDF 夺回哈金，这是叙利亚东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最后一个被 IS 控制的城镇。[141]

12 月 19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从叙利亚撤回约 2200 名美军。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并不同意撤军，愤然辞职，尽管最后报告显示美国也只是部分撤军。[142] 法国和英国都在叙利亚有驻军。[143] 美军撤出将 SDF/YPG 暴露在土耳其(12 月 12 日威胁将对叙北部库尔德人采取军事行动)和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武装或叙政府军(志在收复叙利亚全境)枪口之下。[144]SDF 同时暗示，由于美军撤军，SDF 可能不得不释放多达 3200 名本土和外国 IS 囚犯。[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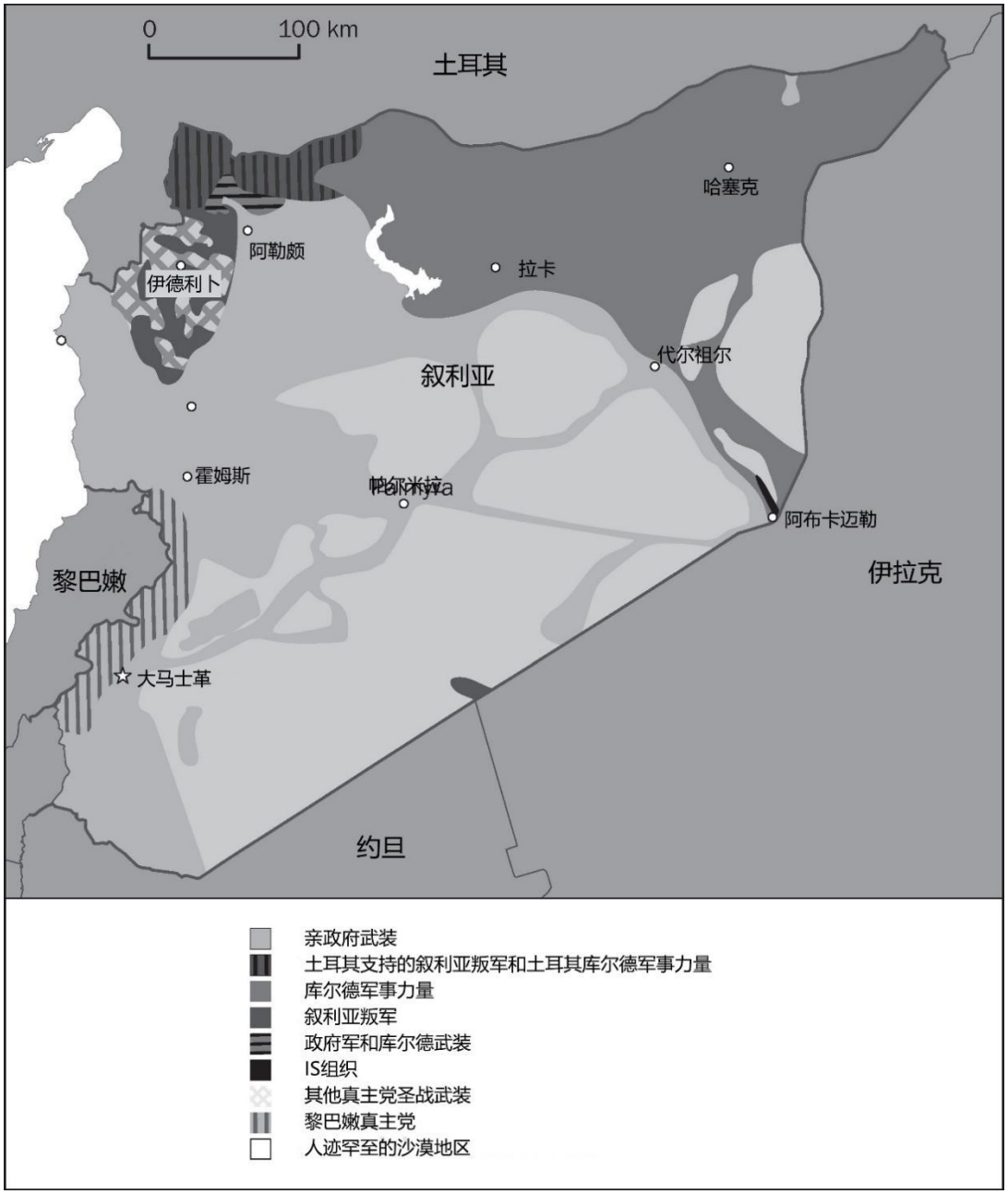


图 2.4　叙利亚领土控制，2018 年 12 月 31 日

作者：雨果·阿列尼乌斯，《指北针》。

资料来源：美国总检察长，坚定决心行动及其他海外应急行动：美国总检察长提交美国国会的报告，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华盛顿特区），第 25 页。

领土控制

2018 年底，叙利亚战争的复杂性反映在各种势力控制领土上（见图 2.4）。叙利亚政府军控制了叙利亚南部和西部（约占全国的 60%），真主党在黎巴嫩边境附近的一些政府控制区活动自卫队/青年党控制了东北部，但曼比吉以西的领土受到叙利亚政府军和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争夺。土耳其和土耳其

支持的部队控制了阿夫林和曼比吉以北的领土叙利亚的反叛组织，以及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哈雅特·塔利尔·沙姆和伊斯兰国，仍在阿勒颇、哈马和伊德利卜省的部分地区。伊斯兰国也存在于哈金周围的一小部分沙漠地区。

和平进程

正如 2018 年的冲突发生了变化，和平努力也发生了变化。联合国以前是和平谈判的主角，最近与阿斯塔纳集团（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并行 2018 年底，协议和停火的脆弱补丁依然存在（主要由阿斯塔纳集团在 2017 年调解），法国、德国、俄罗斯和土耳其领导人参与了新一轮和谈（四方首脑会议）。

在联合国主持下，叙政府同反对派之间的和平谈判在 2017 年无果而终，但 2018 年 1 月进一步会谈如期举行。[146]诚然有上述各轮谈判，诚然有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的努力斡旋，叙政权过渡却始终毫无进展。[147]联合国的核心工作是搭建叙利亚宪法编撰委员会，但 2018 行将落幕却依旧没有着落。[148]同样，阿斯塔纳进程也没有进展。2017 年 12 月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第 8 轮会谈已经结束，双方同意于 2018 年 1 月下旬在俄罗斯索契举行和谈。[149]然而，反对派组织大多拒绝参会，谈判也没能取得突破。[150]2018 年举行的阿斯塔纳进程也是一样。[151]比较成功算是地方性停火协议和缓和紧张局势倡议。

2017 年 5 月，伊俄叙土四国达成协议，在叙利亚西部设立四个“冲突降级区”。[152]得益于 9 月 17 日俄土协议夹持(见上文)，时至 2018 年 12 月底，只有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唯一一个降级区得以保留。2018 年 3 月至 7 月间，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帮助下，一手动用陆军空军联合作战，一手同向降军谈判，叙政府军一举收复三地（霍姆斯省、东古塔和与约旦南部边界地区）。根据早先达成的冲突降级协议（伊俄土于 2017 年 9 月在阿斯塔纳联合宣布），土耳其在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间向伊德利卜省 12 个观察点部署军队，沿前线将叛军和政府军分隔开来。随后在叙政府一侧，相应布置 10 个俄罗斯观察哨和 7 个伊朗观察哨。[153]

今年 4 月，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安卡拉举行会议，商讨叙利亚新宪法和加强降级区安全的方法。[154]据报道，与此同时，美国正在组建一支阿拉伯部队，以取代叙利亚东北部驻扎的剩余美军。[155]美国政府试图努力找到支持 SDF 和修复美土关系的平衡点，而土方传达出来的信息时常模棱两可。无论如何，2018 年 6

月 4 日，美土宣布曼比伊治理和安全计划制定和执行路线图。[156] 10 月，美土开始实施联合巡逻，11 月美军在叙北部设立观察哨，协助土耳其确保边界安全。[157] 然而，12 月美军宣布撤离计划，也暗示上述举措在 2019 将不再延续。

最后，随着美国在叙利亚舞台被边缘化，四国领导人于 2018 年 10 月 27 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新一轮和平会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法国总统马克龙、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德法两国此前并未积极参与解决叙利亚危机，首次坐到谈判桌前，为会谈平添几分新意，两国承诺能否贯彻，现在还不得而知。[158] 四方首脑峰会最后发表声明，呼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由叙利亚主导的叙利亚自己的政治进程”，同时重申联合国呼吁年底前召开宪法委员会大会。[159] 然而，细节问题上依旧存在分歧，尤其是对于叙全境无处不在的紧张局势和国内国外鱼目混珠各色玩家，各方看法不尽相同。2018 年年底，叙利亚危机实质性解决道阻且长。

土耳其库尔德人武装冲突

2016 年 8 月以来，土耳其一直在叙利亚北部参与军事行动。2017 年 10 月，土耳其陈兵伊德利卜省（伊朗和俄罗斯阿斯塔纳协议），并于 2018 年 1 月将部队推进至叙西北部库尔德控制区阿夫林省（见上图）。埃尔多安总统不顾美国和北约盟国反对，表示打算留在叙利亚直到“摆平一切”。[160]

土耳其对叙北部库尔德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以及对支持库尔德武装或是扩大库尔德人自治区的任何提议土耳其都是敏感万分，都应置于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人武装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1984 年以来，土耳其东南部一直是土安全部队和库尔德工人党(PKK)角力的主战场，自然也是焦点所在，间或双方也会停火一段时间。事实上 2013 年以来，双方一直都未交火。2015 年 7 月库尔德-土耳其和平进程（也称解决进程）崩塌，一声枪响，新一轮暴力循环开启。[16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称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间，土库战斗造成 35 万至 50 万人流离失所。[162]

2018 年暴力依旧。土耳其政府数据，一般都是吹嘘自己对库尔德人战无不胜的形象，而实际上 2018 年上千次的各类交火中，PKK 也仅仅被消灭 1300 人。[163] 另外两个独立消息来源数据则描绘出不一样的风景：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统计，563 人死亡(其中平民 17 人，PKK 武装分子 420 人，安全部队 126 人)，2015 年 7

月冲突再度爆发以来至少 4200 人死亡，而 ACLED 估计，仅 2018 年就有 1975 人死于政治暴力。[164] 土库冲突的终结很大程度决定土耳其是否能和叙利亚 YPG 和平相处，但就最近几年局面来看，各方握手言和基本无望，尤其是埃尔多安正着力协调正发党和民族运动党的战略关系。[165] 2016 年 11 月起，库尔德人民民主党联合主席塞拉哈丁·德米尔塔斯就被监禁，和平大门就此关闭。[166]

也门武装冲突

当前的也门的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根源复杂且极具争议。[167] 2014 年，数年的战火摧残，暴力不断积聚，也门陷入新内战。国际社会承认的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政府与伊朗支持的胡赛武装和忠于前总统萨利赫的军队共同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控制了也门首都萨那和全国大部地区。胡赛叛乱始于 2014 年，当时扎伊迪派领导人侯赛因·巴德丁·胡塞发动起义推翻也门政府。尽管胡赛本人在暴动中被杀，但自此以后，叛乱分子就被称为胡赛武装(其正式名称为安萨尔·阿拉)。

2015 年 3 月，沙特为首的联军对哈迪总统进行武装军事干预。谁料祸起萧墙，联军内部土崩瓦解。除 UAE 外，联军还包括巴林、埃及、科威特、约旦、摩洛哥、卡塔尔（2017 年前）、塞内加尔和苏丹。各国要么直接提供地面部队，要么进行空中打击。[168] 各色和平倡议和停火努力都未能带来和平，直至 2017 年年底，联军对胡赛武装控制区实施部分封锁，最终造成毁灭性人道主义后果。

除开北部地区的兄弟相残的内战，也门另外两场武装冲突，虽各自独立却相互关联。首先是中央政府同同南方运动之间的内战，南方运动是南部亚丁、哈德拉马特和谢布瓦分裂组织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例如，2018 年 1 月，南部运动在港口城市亚丁同政府军交战，2015 年以后亚丁成为也门政府所在地。[169] 南部运动的政治代表是南部过渡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2017 年 5 月由前亚丁省长艾德鲁斯·祖巴迪在被哈迪总统解雇后成立。余下就是全国范围的反恐运动，其目标是包括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在内的激进伊斯兰组织。[170] 至少是从 2009 年开始，美国就开始对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或其前身)进行定期空中打击。2014 年至 2018 年，美国至少执行空袭 238 次，造成 16 至 41 名平民死亡。[171]

人道主义危机

2018 年，也门人道主义状况急剧恶化，按照联合国标准，也门连续成为全球人道主义状况最为恶劣的国家。2016 年底至 2018 年 12 月，也门霍乱肆虐，共发现 136 万例疑似病例并有 2800 例死亡记录。此外，也门 80%人口(2400 万人)需要特定人道主义保护救援，其中 1430 万人急需救援(如饥荒风险)。较 2017 年，2018 年急需救援人数增加了 27%。联合国警告，也门危机“可能演变为百年一遇的饥荒”。[172] 援助机构估计，自 2015 年以来已有 85000 名 5 岁以下儿童饿死。[173] 估计约 330 万人流离失所，较 2017 年的 220 万人大幅增长，其中包括 6.85 万人逃离胡赛控制的也门第四大城市和红海主要港口及 6 月以后西海岸其他地区的战斗而流亡（见下文）。[174]

武装冲突不断升级，有组织暴力政治事件较 2017 年增加 25%。无差别袭击和潜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激增，带来大量平民伤亡。[175]ACLED 估计自 2016 年以来，也门战争已造成 6 万多人丧生，而 2018 年就有约 30700 人。[176] 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监测项目在 2015 年 3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1 月 8 日，共收录 17700 起平民伤亡(6872 人死亡，10768 人受伤)。[177] 可以肯定的是，上述统计肯定低估了真实伤亡程度，战争带来的伤病、营养不良和其他危机所致间接伤亡均为计入。

2018 年武装冲突

硝烟弥漫 4 年后，焦点逐渐集中到两个地区：a）红海沿岸，政府军在 UAE 支持下，由南至北推进，剑指荷台达，也门 70%以上粮食进口均通过荷台达；（b）沙特-也门边境，战火蔓延沙特城市，特别是首都利雅得也被置于胡赛导弹半径之内。

也门政府盟友得到实打实的国际支持。2017 年 12 月，美特种部队部署沙特，帮助沙特定位并摧毁胡赛导弹发射场。[178] 美国提供了包括情报收集、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在内的一揽子援助。[179] 法英和其他欧洲国家向沙特和 UAE 提供大量军备。[180]

2016 年年末以来，胡塞武装一直对沙特境内目标实施弹道打击。2017 年共确认 4 次导弹袭击，2018 年上半年至少 11 次。[181] 4 月，冲突加剧：沙特为首的联军加大空袭力度，胡塞武装则相应加大了对沙特境内目标的导弹攻击。[182]

6 月，UAE、沙特和其他盟国发动攻势攻下荷台达，美国为联军提供空中打击目标情报。[183] 据报道，联军于 6 月 16 日占领荷台达机场。尽管四天后围绕机

场的战斗仍在继续（并于 11 月再次开始）。[184]6 月 23 日，UAE 宣布暂停对荷台达的攻击，以便联合国斡旋谈判。时至 9 月，交战双方终于坐到了瑞士日内瓦的谈判桌前。[185]与此同时，荷台达外围几个咽喉地带战斗还在继续。沙特联军的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8 月 2 日一天就有至少 30 人在空袭中丧生。8 月 9 日，狂轰滥炸击中一辆校车，51 人丧生，其中 40 人都是儿童。[186]这次袭击中使用的 500 磅激光制导 MK82 炸弹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187]

联军建立了一套类似 2016 年 8 月的调查机制---事件评估联合小组---但在 2018 年的一份报告中，人权观察组织猛烈抨击这一组织未达到国际标准，同时还缺乏可信度。人权观察同时警告法英美，如果他们继续向也门提供武器，无异于自己成为参与非法袭击的刽子手。[188] 2018 年的另一份报告中，联合国也门问题知名国际和地区专家小组痛斥正在也门犯下战争罪行或是助纣为虐。但报告(2014 年 9 月至 2018 年 6 月)指出，沙特和 UAE 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最多。[189]

9 月 9 日，尽管有联合国斡旋，谈判依旧破裂。胡塞武装代表连续三天缺席。此后，战斗再次升级，并持续到 10 月。[190]11 月伊始，新一轮攻势拉开大幕，联军增兵近 1 万人。[191]11 月 14 日，联军挺近荷台达前曾稍作停顿，其原因就是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联合国马不停蹄的穿梭外交斡旋。[192]尽管如此，零星战斗依旧未曾停歇，直至 12 月 13 日联合国斡旋下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和平进程

2016 年科威特谈判破裂以来，也门和谈举步维艰。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伊斯梅尔·乌尔德·谢赫·艾哈迈德（毛里塔尼亚）在 2018 年 2 月主持了三轮会谈，但均未成功。随后被马丁·格里菲斯（英国）接替。[193]与此同时，焦点转至国际人道主义救援。4 月，联合国秘书长在日内瓦召开认捐大会，为人道主义行动募集 20 亿美元认捐（约一半来自沙特阿拉伯和 UAE）。[194]

2018 年 6 月起，军事上对荷台达推进，同时为恢复和谈间或做些努力。联合国特使试图撮合胡塞武装首领同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政府哈迪总统能在新框架下展开新一轮会谈(9 月)，但胡赛武装未能出席日内瓦的和谈前磋商会。10 月，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见上文“总体事态发展”）引发对沙政策反弹，并促使西方大国开始对海湾联盟施加政治压力。10 月下旬，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都呼吁缓和敌对行动，

恢复谈判。[195] 11 月 9 日，美国暂停联军飞机也门空袭任务的空中加油，尽管这一举动远未达到两党强烈要求的停止一切战争支持的诉求。[196]联合国特使格里菲斯借势重新安排和平谈判，12 月 6 日至 13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最终实现和谈。联军同意将胡赛伤员转运至国外就医后，胡赛武装同意出席和谈。[197]

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兜兜转转的谈判，最终达成斯德哥尔摩协议，其中包括几项建立信任措施：承诺交换近 5000 名囚犯，荷台达省立即实现停火，红海贸易走廊非军事化，将荷台达港移交联合国管理，重新开放荷台达萨那人道主义走廊。[198]

一个小型联合国停火监督团将监督停火，略有推迟后在 12 月 18 日生效。[199]重新部署协调委员会，即胡赛-哈迪联合工作组-旨在执行斯德哥尔摩协议荷台达条款，于 12 月下旬首次举行会议。

双方原定于 2019 年 1 月再次会晤，就争议城市塔伊兹以及结束战争的谈判框架举行会谈。尽管瑞典会谈后保持谨慎乐观，但是前进的道路依旧充满风险。尽管各方都在努力，但在解除武装、战后安置复员等问题上还是存在重大分歧。[200]如何将南部过渡委员会也纳入和平进程也是一大挑战。[201]外部势力如何遏制其入场参战代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美国参议院于 12 月 13 日以 56 票对 41 票通过一项动议，要求美国停止对沙特为首的盟军的军事支持。尽管该决议要成为法律，仍会面临重重阻碍，但这却标志着美冲突政策可能发生重大转向。[202]10 月以来，英国发起的联合国安理会冲突决议正在审议之中，预计将于 2019 年年初进行投票，为《斯德哥尔摩协议》提供国际支持。[203]

1 冲突定义和类型见本章第 1 节。
2 希特曼·J，处理 MENA 地区交叉冲突(国际危机组织:布鲁塞尔，2017 年 12 月 22 日)。
3 安全困境，见唐·S，“安全困境:概念分析”，《安全研究》，第 18 卷第 3 期(2009)，第 587-623 页。关于圣战主义定义，见“什么是圣战主义?”， BBC 新闻，2014 年 12 月 11 日。
4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叙利亚紧急情况”。叙利亚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伤亡数字。
见斯佩恰·M，“战争硝烟中叙利亚死亡人数为何总是影影绰绰”，《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13 日。
5 格雷厄姆·哈里森·E，“点燃阿拉伯之春的怒火重燃”;《卫报》，2018 年 1 月 21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恢复公众对突尼斯政治体系的信心，中东和北非简报 No.62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8 月 2 日)。
6 中东地区重建、遣返与和解面临的挑战，见中东政治科学(POMEPS)与卡内基中东中心项目:冲突后政治重建，2018 年 9 月。
7 国际危机组织(ICG)，动荡中东下伊朗的首要任务，中东报告 No.184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4 月 13 日)；艾哈迈迪·H，“特朗普时代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生存》杂志，第 60 期 No.2(2018)，第 133-150 页。
8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见本卷第 7 章第 3 节。拉姆齐·A，“特朗普在推特上威胁伊朗，警告鲁哈尼可怕的“后果””，《纽约时报》，2018 年;达格瑞斯·H，“第二轮对伊朗制裁的目标是银行、石油和航运”，大西洋理事会，2018 年 10 月 26 日。
9 对卡塔尔的封锁始于 2017 年;见戴维斯·I，“中东和北非武装冲突”，SIPRI 年鉴 2018，第 66-67 页。半岛电视台，“美国计划重振“阿拉伯北约”对抗伊朗”，2018 年 7 月 28 日;普拉丹·P·K，“卡塔尔危机与不断加深的地区裂痕”，《战略分析》，第 42 卷第 4 期(2018)，第 437-442 页。
10 半岛电视台，“巴林称‘阿拉伯北约’将于明年成立”，2018 年 10 月 27 日;《经济学人》，“阿拉伯新军事联盟前景黯淡”，2018 年 10 月 6 日;埃洛·A，“阿拉伯北约有什么障碍?”，《国防新闻》，2018 年 11 月 20 日。
11 埃斯塔米·A，“沙特阿拉伯重新崛起成为地区强国”，《国际观察》，第 53 卷第 4 期(2018)，第 75-94 页；魏泽曼·P，“沙特阿拉伯、军备与中东冲突”，SIPRI 评论，2018 年 12 月 14 日。
12 国际危机组织(ICG)，沙特阿拉伯:回到巴格达，中东报道 No.186(ICG:布鲁塞尔，2018 年 5 月 22 日)
13 国际战略研究所，“日益紧张的以色列-伊朗关系”，《战略评论》，第 24 卷第 3 期(2018 年 5 月)，第 7-8 页；国际危机组织(ICG)，“以色列、真主党和伊朗:防止叙利亚再次爆发战争”，中东地区报告 No.182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2 月 8 日);拉宾·Y，“通过快速突袭，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将在未来与真主党的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J-Wire 网站，2018 年 12 月 9 日。
14 哈穆德·C·E，“黎巴嫩 2018 年选举”，国会研究服务局(CRS)， 2018 年 5 月 11 日;维曼·H，“黎巴嫩选举，基本上都是好消息”，国际危机组织，2018 年 5 月 9 日。
15 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黎巴嫩相互关联的挑战”，《战略评论》，第 24 卷第 25 期(2018 年 8 月 25 日)。关于联合国在黎巴嫩的和平使命，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
16 法尔斯新闻，“伊朗、卡塔尔同意在波斯湾加强海上巡逻”，2018 年 4 月 12 日;埃拉斯托·T，“剖析国际社会对伊朗导弹的担忧”，SIPRI 背景文件，2018 年 11 月 15 日。
17 高埃特·N，“蓬佩奥因伊拉克袭击美军而威胁伊朗”，CNN，2018 年 9 月 21 日。
18 《纽约时报》，“遭受猛烈袭击之后，伊朗总统谴责海湾国家和美国”，2018 年 9 月 23 日。
19《经济学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计算”，2018 年 6 月 9 日;丘洛夫·M，“中东:随着伊朗计划巩固成果，沙特阿拉伯的地位被削弱”，《卫报》，2018 年 12 月 27 日。
20 切科·L，“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表示，加拿大正寻求退出与沙特的武器交易”，《卫报》，2018 年 12 月 17 日。
21 琼斯·S，“萨拉菲圣战分子威胁的演变:当前和未来来自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挑战”，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2018 年 11 月。伊斯兰国及其目标、行动和分支机构，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国际军事行动，见戴维斯·I,“伊斯兰国的目标、目标和运作方式与国际反应”，SIPRI 年鉴 2016，第 22-39 页;戴维斯·I,“2016 年的伊斯兰国:一个失败的“哈里发国”，但确实一个日益增长的国际威胁?”， SIPRI 年鉴 2017，第 89-104 页。

22 海勒·S，“正确估计跨国圣战分子的威胁”，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12 月 12 日。

23 联合国，“尽管遭受重击，ISIL 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秘密网络”，联合国反恐负责人告诉安理会，新闻发布，SC/13463，2018 年 8 月 23 日；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 ISIL(达伊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第七次报告，以及联合国为支持成员国应对这一威胁所作的一系列努力，S/2018/770，2018 年 8 月 16 日。

24 范德海德·L，温特·C 和马赫·S，“胜利的代价:伊斯兰国领土崩溃的政策影响”，国际反恐中心报告，2018 年 11 月；伯克·J，“既没有攻城略地，又无法招兵买马，伊斯兰国走向死亡的边缘”，《卫报》，2019 年 2 月 17 日。

25 沙尔·J,“中东和北非地区危机、环境、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汇总”,SIPRI 和平安全视点 No.2019/4,2019 年 7 月。

26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集团《2016－2020 年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世界银行:华盛顿，2016);《经济学家》，“气候变化让阿拉伯世界更加悲惨”，2018 年 5 月 31 日；沙尔(注 25)。

27 世界银行,“超越稀缺:中东和北非水安全”(世界银行:华盛顿,2017);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阿拉伯区域水资源共享管理概况”，可持续发展目标 6.5 进展情况通报(ESCWA:贝鲁特，2018)。

28 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SCWA)，“阿拉伯远景 2030:展望”，ESCWA 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E/ESCWA/SDPD/2017/1(ESCWA:贝鲁特，2017)。

29 史密斯·D，“中东地区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劳特利奇中东安全手册”(劳特利奇:伦敦，2019)。

30 施瓦茨坦·P，“气候变化和水资源危机促使 ISIS 在伊拉克招募人员”，《国家地理》，2017 年 11 月 14 日。

31 国际危机组织 (ICG)，“如何应对伊拉克夏季丛林大火”，中东问题简报第 61 期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7 月 31 日);哈桑·K，博恩·C 和诺德奎斯特·P，“伊拉克:气候安全风险评估”，气候安全风险专家工作组，2018 年 8 月。

32 艾尔-卡雷赫·J,“贝卡地区水冲突:可能性及诱发因素评估”,AUB 政策研究所，政策简报 No.3 (IFI-AUB 政策研究所:贝鲁特，2018 年 7 月)。

33 马尔卡·H，水的压力:马格里布的水、抗议和国家合法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华盛顿特区，2018 年)。

34 希特曼·J，“伊朗阿瓦兹阅兵式遭受攻击，加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国际评论，国际危机组织，2018 年 9 月 24 日。

35 里纳特·Z，“专家警告加沙 97%的饮用水被污水、盐污染”，《国土报》，2018 年 1 月 21 日。

36 BBC 新闻，“埃及国家概况”，2019 年 1 月 7 日。

37 BBC 新闻，“俄罗斯飞机失事:我们知道什么”，2015 年 11 月 17 日。

38 法新社，“检查站爆炸后，埃及宣布西奈半岛进入紧急状态”，《卫报》，2014 年 10 月 25 日。

39 马尔辛·J 和艾尔-卡雷赫·A，“埃及对伊斯兰国的隐蔽战争使得西奈半岛人民颠沛流离”；“尽管得到以色列大力支持，埃及仍在西奈半岛苦苦挣扎。”2018 年 11 月 21 日。

40《经济学家》，“埃及在西奈半岛发动进攻”，2018 年 2 月 15 日;塔费耶克·F，“26 名武装分子在西奈半岛最新行动中丧生，173 人被捕:武装部队”，《埃及独立报》，2018 年 4 月 25 日;国际特赦组织，“埃及:国际特赦组织证实在西奈半岛北部使用禁用集束炸弹”，2018 年 3 月 1 日。关于集束弹药，见本卷第 9 章第 2 节。

41 巴斯比·M，“埃及军队在旅游车爆炸事件后，击毙了 40 名疑似武装分子”，《卫报》，2018 年 12 月 29 日。

42《经济学家》，“埃及的选择:是选择塞西总统，还是选择崇拜塞西的人”，2018 年 3 月 22 日;戴维森·J 和托尔巴·A，“埃及的塞西在没有真正反对派的情况下赢得了 97%的选票”，路透社，2018 年 4 月 2 日。

43 BBC 新闻，“伊拉克宣布围剿伊斯兰国的战斗结束”，2017 年 12 月 9 日。

44 见艾尔-格哈巴希·T 和萨利姆·M，“两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袭击巴格达，造成 27 人死亡”，《华盛顿邮报》，2018 年 1 月 15 日。

45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UMAMI)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OHCHR)，挖掘暴行:前 ISIL 控制领土上的乱葬岗(UNAMI/OHCHR:日内瓦，2018 年 11 月 6 日)。

46 见戴维斯(注 9)，第 70-72 页。

47 科克·M 和哈里斯·G，伊拉克需要 880 亿美元用于重建，《纽约时报》，2018 年 2 月 13 日;格雷厄姆·哈里森·E，“捐赠大会承诺提供 300 亿美元帮助伊拉克进行 ISIS 后的重建”，《卫报》，2018 年 2 月 15 日。

48 托布·B，“战后伊拉克 ISIS 的复仇运动”，《纽约客》，2018 年 12 月 24 日;丘洛夫·M，“他们不应得到宽恕”:伊拉克与被指控的“伊斯兰国女性”展开激烈的斗争”，《卫报》，2018 年 5 月 22 日。关于伊拉克人继续支持伊斯兰国的问题，见卡尔滕塔勒·K，西尔弗曼·D，达格尔·M，“身份、意识形态和信息:伊拉克民众支持伊斯兰国的根源”，《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第 41 卷第 10 期(2018)，第 801-824 页。

49 曼苏尔 R 和范维恩·E，“摩苏尔之战后伊拉克安全部队之争”》(岩石战争);国际危机组织(ICG)，“伊拉克准军事组织:重建一个正常运作的国家挑战重重”，中东报告 No.188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7 月 30 日)。全球反达伊沙联盟网站 www.theglobalcoalition.org

50 道奇·T，“伊拉克:危险中生活的一年”，《生存》，第 60 卷第 5 期(2018)，第 41-48 页;岸信介·R 和帕夫利克·M，“ACLED 2018:回顾之年”，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 2019 年 1 月 11 日。
51 国际危机组织(ICG)，恢复联合国对伊拉克争议内部边界调解，中东地区报告 No.194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12 月 14 日)。
52 半岛电视台，“伊拉克:议会选举巴勒姆·萨利赫为新总统”，2018 年 10 月 2 日;易卜拉欣·A，“伊拉克什叶派集团在投票后数月仍处于分裂状态”，半岛电视台，2018 年 8 月 5 日。
53 凯斯林·B 和戈登·M·R，“美国以伊朗威胁为由关闭驻伊拉克领事馆”，《华日街日报》，2018 年 9 月 29 日。
54 沃尔夫·J，“伊朗外交部长就关闭领事馆一事炮轰特朗普政府官员”，路透社，2018 年 9 月 30 日。
55 见施莱姆·A，“铜墙铁壁: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诺顿出版社:纽约，2014);萨尔·N，“他们唯一能理解的语言: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达成暴力妥协”(大都会出版社:纽约，2017);安兹萨卡·S，“防止巴勒斯坦:从戴维营到奥斯陆的政治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新泽西州，2018)。
56 见戴维斯(注 9)，第 72-73 页。也见佩尔松·A，“巴勒斯坦在国家建设进程的尽头：技术上成功，政治上失败”，《地中海政治》，第 23 卷第 4 期(2018)，第 433-452 页。
57 半岛电视台，“特朗普时代以色列定居点活动激增:美国摩立特集团”，2019 年 1 月 2 日。
58 2007 年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冲突，也被称为巴勒斯坦内战，是巴勒斯坦两个主要政党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 2007 年分裂。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领导下的法塔赫仍然控制着约旦河西岸。
59 S·罗伊，“加沙地带:政治经济进展”，第三版（巴勒斯坦研究:华盛顿特区，2016);霍宁·R，“加沙: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挪威难民委员会，2018 年 4 月 26 日。
60 伊夸特·A，“对巴基斯坦援助及其限制”，《译文》，2017 年 10 月 9 日;美国国务院，“关于美国向 UNRWA 提供援助的声明”;“报告:美国终止对 UNRWA 的所有资助”，《中东监测》，2018 年 8 月 29 日。
61 半岛电视台，“尽管美国削减了 UNRWA 经费，但捐助方仍将增加对该机构的支持和资助”，2018 年 9 月 2 日。
62 库博维奇·Y，“以色列军队将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前在加沙边境部署 100 多名狙击手”，《国土报》，2018 年 3 月 30 日;萨尔·N，“加沙抗议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转变”，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4 月 2 日。
63 《卫报》，“加沙之死:联合国秘书长呼吁‘透明’调查”，2018 年 3 月 31 日。
64 霍姆斯·O 和巴罗沙·H，“联合国和欧盟呼吁对加沙流血事件进行调查，以色列予以抵制”，《卫报》，2018 年 4 月 1 日。
65《经济学家》，“70 岁的以色列”，2018 年 5 月 17 日。
66 阿布海韦拉·I 和哈伯金·D·M，“袭击边境围栏的计划在加沙拉开血腥的帷幕”，《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27 日。
67 维克·K，“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开幕，加沙边境尸横遍野”;《经济学家》，“加沙以色列边境人们以死抗争”，2018 年 5 月 17 日。
68 BBC 新闻，“以色列对加沙的回应“完全不成比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18 年 5 月 22 日;BBC 新闻，“巴勒斯坦人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全面调查以色列的战争罪行”，2018 年 6 月 13 日;联合国新闻，“联合国大会敦促加强对巴勒斯坦人的保护，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2018 年 6 月 13 日。
69《经济学家》，“以色列大选在即”，2018 年 11 月 15 日;哈伯金·D·M，“加沙局势缓和，美元和原油随即而来”，《纽约时报》，2018 年 11 月 9 日。
70 这些数字涵盖了从 2018 年 3 月 30 日抗议活动开始到 2018 年 11 月 12 日这段时间。见半岛电视台，“加沙抗议:最新动态”，2018 年 11 月 12 日。
71 戴维斯·M 和格雷厄姆-哈里森·E，《卫报》，2018 年 12 月 31 日。
72 海勒·A，“以色列与加沙哈马斯武装分子交火”，美联社，2018 年 7 月 15 日;国际危机组织 (ICG)，“避免加沙战争”，中东简报 No.60 (ICG: 2018 年 7 月 20 日，布鲁塞尔);克什纳·I，“以色列发射火箭袭击加沙”，《纽约时报》，2018 年 10 月 17 日。
73 鲍勃·Y·J，“ICC 对以色列在加沙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发出严厉警告”，《耶路撒冷邮报》，2018 年 10 月 17 日。
74 阿伦·R，“以色列谴责 ICC 检察官对贝都因村战争罪的警告”，《以色列时报》，2018 年 10 月 18 日。
75《人权观察》，“两个当局，一条道路，如出一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肆意逮捕、滥用酷刑”，2018 年 10 月。
76 哈伯金·D·M 和巴洛沙·H，“以色列对加沙的致命袭击威胁到刚刚开始的停火”，《卫报》，2018 年 11 月 13 日;BBC 新闻，“加沙地区的特别行动失败将以色列和哈马斯推向战争边缘”，2018 年 11 月 14 日。
77 霍姆斯·O 和巴罗沙·H，“以色列和哈马斯在激烈暴力冲突后同意加沙停火”，《卫报》，2018 年 11 月 13 日;BBC 新闻，“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因加沙停火协议辞职”，2018 年 11 月 14 日。
78 哈伯金·D·M，“西岸枪击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哈马斯扩大战斗的担忧”，《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13 日;《中东观察》，“自特朗普耶路撒冷决定以来，以色列在今年就逮捕了 5600 名巴勒斯坦人”，2018 年 12 月 7 日。
79 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前美国特使解释 2014 年中东和平谈判失败的原因”，2017 年 6 月 8 日。

80 白宫，“白宫加沙会议解读”，2018 年 3 月 14 日。
81 加德纳·D，“特朗普的‘世纪协议’对巴勒斯坦没有任何好处”，《金融时报》，2018 年;米勒·A，“以巴冲突并非破产清算”，《法律战》，2019 年 1 月 23 日。
82 杰雷吉安·E·P,马沙尔 M 和布朗·N·J，“两个国家还是一个国家?”重新评估以色列-巴勒斯坦僵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2018 年 9 月。
83 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中心，民意测验 No. 83，2018 年 3 月 27 日。
84 路易斯·J 和兰多·N，“激烈辩论后，以色列通过了富有争议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案”，《国土报》，2018 年 7 月 19 日。
85《经济学家》，“一连串的外交活动会推动巴以和平吗?”2018 年 8 月 23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重建加沙停火协议》，中东地区 191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11 月 16 日)。
86 联合国新闻，“安理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去年是我们离巴以和平协议最近的一次”，2018 年 12 月 18 日。
87 库珀曼·A,“奥巴马在利比亚的溃败:善意干预为何以失败告终”,《外交事务》,2015 年 3/4 月;哈米德·M,“每个人都说，对利比亚的干预是一个失败。但是他们错了”，布鲁金斯学会，2016 年 4 月 12 日。
88 2016 年和 2017 年利比亚冲突，见史密斯·D，“中东和北非:展望中的 2016”，SIPRI 年鉴 2017，第 83-84 页;戴维斯(注 9)，第 74-75 页。“的黎波里民兵联盟的兴起”，见拉谢·W 和伊德里斯·A，“民兵的首都:的黎波里的武装组织占领利比亚”，《轻武器调查简报》，2018 年 6 月。
89 拉谢·W 和伊德里斯·A(注 88)。
90《经济学家》，“利比亚的仇恨跨越地中海”，2018 年 11 月 8 日。
91 蒂比亚纳·J 和格拉米齐·C，“迷失在国境线上:图布和利比亚南部边境的其他武装组织和走私分子”，《轻武器调查》，2018 年 12 月。
92 布兰查德·C·M，“利比亚:过渡时期与美国政策”，国会研究服务局(CRS)国会报告 RL33142 号国会(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8 年 5 月 2 日)，第 3 页。UNSMIL 是 2011 年 9 月成立的一个政治特派团，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
93 半岛电视台,“哈夫塔: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政府授权已经到期”,2017 年 12 月 18 日;埃尔·阿姆拉尼·I，“哈利法·哈夫塔驳回联合国支持的协议，利比亚面临新风险”，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7 年 12 月 21 日。
94 温图尔·P，“利比亚敦促联合国在敌对派系冲突后阻止石油外销”，《卫报》，2018 年 6 月 27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利比亚石油新月会摊牌之后”，《中东和北非地区报告》No.189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8 月 9 日)。
95 联合国驻利比亚支援团，“SRSG 加桑·萨拉姆向安理会通报情况”，2018 年 9 月 5 日;半岛电视台，“利比亚:武装组织争夺的黎波里激烈冲突相互拉锯”，2018 年 8 月 27 日。
96 拉加万·S，“利比亚‘超级民兵’之间的战斗升级，危及西方的和平努力”，《华盛顿邮报》，2018 年 10 月 2 日。
97 法国 24 电视台，“利比亚停火结束的黎波里长达一个月的战斗”，2018 年 9 月 26 日;国际危机组织，“利比亚经济改革力度不足”，观察名单更新，2018 年 10 月 25 日。
98 马尔辛·J 和福孔·B，“伊斯兰国在利比亚致命回归危及石油产量”，《华尔街日报》，2018 年 9 月 18 日;半岛电视台，“利比亚:的黎波里外交部大楼遇袭 3 人死亡”，2018 年 12 月 26 日。
99 沃尔什·D 和施密特·E，“战火蔓延，美国在利比亚南部打击基地组织目标”，《纽约时报》，2018 年 3 月 25 日。
100 关于萨赫勒地区冲突，见本章第 6 节。
101《经济学家》(注 90)。
102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法耶兹·萨拉吉、阿吉拉·萨利赫、哈立德·梅什里、哈利法·哈夫塔尔在纽约发表联合声明，2018 年 5 月 29 日。
103 国际战略研究所，“联合国在利比亚的选举赌博”，《战略评论》，第 24 卷第 18 期 (2018)， 第 4-6 页。
104 阿伦尼·A 和图萨·F，“寻求利比亚谈判解决方案”，Aspenia 在线，2018 年 9 月 13 日。NCP 会议报告阿拉伯语版，<http: multaqawatani.ly>。
105 联合国驻利比亚支援团(注 95)。
106 国际战略研究所(注 103);史密斯·R 和帕克·J，“利比亚纸牌屋:没有制度的选举”，《法律战》，2018 年 8 月 19 日。
107 通多·L 和温图尔·P，“特朗普、普京缺席，意大利峰会陷入混乱”，《卫报》，2018 年 11 月 12 日;德梅奥·G，“巴勒莫会议:对意大利新政府的外交考验”，布鲁金斯学会，2018 年 11 月 19 日。
108 关于 2016 年和 2017 年叙利亚冲突，见史密斯·D，《中东和北非:展望中的 2016》，SIPRI 年鉴 2017，第 83-84 页;戴维斯(注 9)，第 76-79 页。
109 要了解叙利亚政府在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原因，见齐塞·E，“为什么巴沙尔赢得了叙利亚战争?”，《战略评估》，第 21 卷第 2 期(2018 年 7 月)，第 65-74 页。
110 施密特·E，“数千名 ISIS 武装分子逃往叙利亚，很多人期望东山再起”，《纽约时报》，2018 年 2 月 4 日;布罗特曼·A，“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与伊斯兰国的威胁”，《全球风险观察》，2018 年 12 月 30 日。
111 斯佩恰(注 4);休谟·C，玛格丽森·R 和切瑟·S，“统计叙利亚和伊拉克伤亡人数:进程与挑战”，国会研究服务局(CRS)视点，2016 年 4 月 12 日;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数据导出工具”。
112 岸信介和帕夫利克(注 50)。

113 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问题，也见本卷第 9 章第 1 节。
114 达森・J，叙利亚爆炸性武器的影响，武装暴力行动，2019 年 1 月。
115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清除中东简易爆炸装置，2017 年 5 月 22 日至 24 日，周一至周三”，《威尔顿公园报告》WP1548，2017 年 6 月。
116 联合国安理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儿童与武装冲突:秘书长报告”，2018 年 10 月 30 日。
117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2019-2020 年地区战略展望”，2018 年 12 月 20 日。
118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布鲁塞尔，联合国呼吁增加对叙利亚弱势群体和难民的支持”，2018 年 4 月 24 日。
119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WFP 叙利亚局势报告 No.1，2019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 月。
12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监测冲突局势国家粮食安全:FAO/WFP 联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最新情况”，2019 年 1 月，第 23-24 页。
121《德国之声》，“外国势力想从叙利亚战争中得到什么？”，2018 年 4 月 12 日;菲奇・A 和拉斯穆森・S，“伊朗与叙利亚签署深化军事合作协议”，《华尔街日报》，2018 年 8 月 27 日。关于外国资助叙利亚内战的问题，见贝隆尼・A・M，马林斯・C・A，“现金为王:叙利亚内战中的资金支持和优先目标的变迁”，《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第 41 卷第 12 期(2018)，第 990-1010 页。关于俄罗斯中东政策，见斯捷潘诺娃・E，“俄罗斯与中东冲突:区域化和对西方的影响”，《国际观察》，第 53 卷第 4 期(2018)，第 35-57 页;桑顿・R，“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东地中海的军事承诺”，《俄罗斯国际关系》，第 163 卷第 4 期(2018)，第 30-38 页。
122 雅法・J，“普京的影子军队在叙利亚遭遇挫折”，《纽约客》2018 年 2 月 16 日;路透社，“以色列称击落的叙利亚飞机违反了 1974 年戈兰高地的非军事化协议”;兰多・N，库博维奇・Y 和蒂邦・A，“普京表示以色列没有击落俄罗斯飞机;内塔尼亚胡表示哀悼”，《国土报》，2018 年 9 月 19 日。
123 卡明・布鲁斯・N 和格拉德斯通・R，“叙利亚最后一个主要叛军据点战火纷飞”，《纽约时报》，2018 年 1 月 11 日;《经济学家》，“叙利亚战争再度升温”，2018 年 2 月 22 日。
124 巴纳德・A 和加尔・C，“叙利亚空袭造成数年来最惨重伤亡”，《纽约时报》，2018 年 2 月 20 日;BBC 新闻，“叙利亚战争:对叛军控制的伊德利卜镇的氯攻击”，2018 年 2 月 5 日。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也见本卷第 8 章第 1 节。
125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01(2018)号决议，S/RES/2401(2018)，2018 年 2 月 24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毫无价值”的东古塔决议，2018 年 2 月 25 日；麦克道尔・A 和斯塔布斯・J，“俄罗斯下叙利亚东部古塔每日停战数小时，以便平民撤离”，路透社，2018 年 2 月 26 日。
126 阿布杜拉欣・R，“叙利亚政权在反对派据点攻城略地”，《华尔街日报》，2018 年 3 月 21 日。
127 埃尔-哈利迪・S，“消息人士称叙利亚反对派同意撤离古塔镇”，路透社，2018 年 3 月 21 日。
128 奈西蒂・S，“WHO:500 名叙利亚患者表现出接触有毒武器症状”，路透社，2018 年 4 月 11 日;博杰・J 和博蒙特・P，“叙利亚: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化学武器袭击进行回应”，《卫报》，2018 年 4 月 14 日;BBC 新闻，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延后 OPCW 访问现场，2018 年 4 月 18 日。关于俄杜马以及法英美对话务袭击的反应，参见本卷第 8 章第 1 节。
129 莱德尔・E・M，“联合国:伊德利卜袭击可能引发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美联社，2018 年 8 月 28 日;《经济学家》，“叙利亚拔掉最后叛军据点之战迫在眉睫”，2018 年 9 月 6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拯救伊德利卜于灭顶之灾”，中东简报 No.63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9 月 3 日)。
130 国际危机组织，“叙利亚欢迎俄土就伊德利卜达成协议”，声明，2018 年 9 月 18 日；“土耳其和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达成协议”，《经济学家》，2018 年 9 月 20 日。
131 半岛电视台，“叙利亚伊德利卜缓冲区最后期限已过，士兵却没离开”，2018 年 10 月 15 日。
132 哈伯德・B，“叙利亚敦促联合国谴责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纽约时报》，2018 年 11 月 25 日。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也见本卷第 8 章第 1 节。
133 路透社，“叙利亚南部流离失所人数攀升至 27 万人:联合国”，2018 年 7 月 2 日;夏欣・K，“德拉陷落后，叙利亚人被困在“可怕”的沙漠中”，《卫报》，2018 年 7 月 13 日。
134 埃尔-哈利迪・S，“约旦将与俄罗斯就南叙利亚协议举行会谈”，路透社，2018 年 7 月 2 日;易卜拉欣・A，“叙利亚南部叛军达成协议结束暴力”，半岛电视台，2018 年 7 月 7 日。
135 斯威斯・R・F 和哈伯德・B，“阿萨德重申控制权，重新开放与约旦边境口岸”，《纽约时报》，2018 年 10 月 15 日;《人权观察》，“叙利亚:居民重返家园受阻”，2018 年 10 月 16 日。关于难民对重返家园的态度，见叶海亚・M，“听不见的声音:叙利亚难民需要什么才能踏上归途”，卡耐基中东中心，2018。
136 格罗斯・J・A，“空袭叙利亚空军基地，目标是真主党军火库”《以色列时报》，2018 年 5 月 24 日。
137 福尔摩斯・O，“以色列战机坠毁后对叙利亚发动大规模袭击”，《卫报》，2018 年 2 月 10 日。
138 威廉姆斯・D，“以色列称在过去两年内对伊朗在叙利亚的目标实施了 200 次空袭”，路透社，2018 年 9 月 4 日。
139《经济学家》，“叙利亚库尔德人能继续控制他们的领土吗?”，2018 年 1 月 25 日。
14 加尔・C 和巴纳德・A，“叙利亚反对派在土耳其支持下夺取阿夫林控制权”，《纽约时报》，2018 年 3 月 18 日；《经济学家》，“在拿下阿夫林后，土耳其在叙利亚寻找新目标”，2018 年 3 月 22 日。
141 比尔金索伊・Z，“土耳其打击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北部占领的阵地”，《军事时报》，2018 年 10 月 28 日；施密特・E，“打击叙利亚境内 ISIS 的最后残余力量陷入停滞，令美国大为失望”，《纽约时报》，2018 年 11 月 6 日；丘洛夫・M，“ISIS 从叙利亚最后一个城市据点撤离”，《卫报》，2018 年 12 月 14 日。

142 兰德勒·M，库珀·H 和施密特·E，“特朗普宣布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并宣布‘我们战胜了 ISIS’”，《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19 日;吉布斯-内夫·T 和施密特·E，“五角大楼考虑使用特种部队继续在叙利亚执行任务”，《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21 日。
143 法国在叙利亚有大约 1000 名士兵，而英国尚未披露驻扎部队人数。见惠灵顿·T，“随着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却把法英撇下了''，法国 24 电视台，2019 年 2 月 23 日。
144 土耳其认为 YPG 是库尔德工人党延伸，不想在边境上再出现一个库尔德人有密切联系的库尔德自治实体。埃尔迪布·S，“美国计划从叙利亚撤军，人声鼎沸的叙利亚战场一下乱了阵脚”，美联社，2018 年 12 月 24 日;麦凯南·B，“叙利亚军队在受土耳其威胁的库尔德城镇外围集结”，《卫报》，2018 年 12 月 28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避免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发生混战，中东简报 No.66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12 月 21 日)。
145 萨阿德·H 和诺德兰·R，“库尔德战士讨论释放近 3200 名 ISIS 囚犯”，《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20 日;半岛电视台，库尔德人领导的部队“可能无法控制 ISIL 囚犯”，2018 年 12 月 21 日。
146 卡明布鲁斯·N，“错失良机”:叙利亚和谈再次受挫”，《纽约时报》，2017 年 12 月 14 日。
147 法国 24 电视台，“联合国叙利亚和平进程目的何在?”， 2018 年 9 月 25 日;联合国新闻，“叙利亚政府对联合国角色的“不同理解”，“非常严峻的挑战”—特使，2018 年 10 月 26 日。
148 半岛电视台，“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将于 2018 年成立，2018 年 12 月 20 日。
149 法国 24 电视台，“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同意在 2017 年 1 月举行叙利亚和谈”，2017 年 12 月 23 日。
150 巴纳德·A，“俄罗斯举行的叙利亚和谈:1500 名代表，大多数支持阿萨德”，《纽约时报》，2018 年 1 月 30 日;温图尔·P，“俄罗斯叙利亚和平会议上演闹剧”，《卫报》，2018 年 1 月 30 日。
151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联合国叙利亚特使称阿斯塔纳叙利亚问题谈判“错失良机”，
2018 年 11 月 29 日。
152 俄罗斯外交部，“关于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建立缓和地区的备忘录”，2017 年 5 月 6 日。
153 《自由报每日新闻》，“土耳其完成伊德利卜观察哨建设”，2018 年 5 月 16 日;马库森·M，“伊德利卜省与叙利亚动荡的未来”，《政策简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8 年 9 月。
154 哈非西·P，尔科云·E，“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正在努力寻找共同点”，路透社，2018 年 4 月 3 日。
155 戈登·M·R，“美国为叙利亚寻求阿拉伯武装和资金支持”，《华尔街日报》，2018 年 4 月 16 日。
156 国际危机组织(ICG)，“达成稳定叙利亚东北部局势协议的前景”，中东地区简报 No.190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9 月 5 日)。
157 巴尔多·L·C，“美国、土耳其将很快在叙利亚北部开始联合巡逻”，《军事时报》，2018 年 10 月 21 日;拉姆夫·K，“美国军方将在叙利亚北部设立新的观察哨”，《军事时报》，2018 年 11 月 21 日。
158《沙巴日报》，“伊斯坦布尔峰会呼吁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在年底前成立”，2018 年 10 月 27 日。
159 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总统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2018 年 10 月 27 日。
160 施瓦茨·F，“美国呼吁叙利亚边境保持克制，土耳其总统对此不予理睬”，《华尔街日报》，2018 年 1 月 22 日。
161 关于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政治中的角色，见奥兹尔·S 和耶尔马兹·A，“中东库尔德人，2015”，SIPRI 年鉴 2015，第 53-71 页。
16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土耳其东南部地区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人权状况报告”，2017 年 2 月。
163 阿文杜克洛格鲁·M·E，“2018 年被击毙的 100 名恐怖分子骨干:土耳其人”，阿纳多卢通讯社，2018 年 11 月 15 日。
164 国际危机组织，“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冲突:眼见为实”;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LED)，“土耳其”，ACLED 数据库。
165 关于 2016 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见萨林·M，“土耳其在 2016 年寻求稳定与合法性”，SIPRI 年鉴 2016，第 151-75 页。高蒂耶-维拉尔斯·D，“平息叛乱后，埃尔多安承诺加强土耳其实力”，《华尔街日报》，2018 年 6 月 25 日。
166 半岛电视台，“尽管有《欧洲人权法案》，土耳其法院仍将塞拉哈廷·德米尔塔斯监禁”，2018 年 11 月 30 日。
167 见戴维斯(注 9)，第 80-82 页。同时见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门:冲突与和平的驱动因素”，中东与北非项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讨会总结，2016 年 11 月 7 日至 8 日;奥卡比·A，“也门人道主义噩梦:冲突的真正根源”，《外交事务》，2017 年 11 月/ 12 月。
168 关于 UAE 所扮演的角色，见阿卜杜勒·阿哈德· G，“也门濒临崩溃:阿联酋如何从内战中浑水摸鱼”，《卫报》2018 年 12 月 21 日。
169《经济学家》，“亚丁叛乱加速也门分裂”，2018 年 2 月 1 日;BBC 新闻，“也门战争:亚丁致命内斗”，2018 年 1 月 29 日。
170 肯德尔·E，“当代也门圣战武装分子的威胁如何演变?”，中东研究所，政策文件 2018-7,2018 年 7 月。
171 新闻调查局，“也门无人机袭击”。
17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2019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也门”;BBC 新闻，“也门可能正遭遇 100

年来最严重的饥荒”，2018 年 10 月 15 日。
173 麦凯南·B，“也门:多达 85000 名儿童死于饥饿”，《卫报》，2018 年 11 月 21 日。
174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注 172)。
175 岸信介和帕夫利克(注 50)。
176 岸信介和帕夫利克(注 50);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根据最新 ACLED 数据，也门战争死亡人数现已超过 6 万人”，新闻发布，2018 年 12 月 11 日。
17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敦促大国结束也门饥饿和平民杀戮”，新闻发布，2018 年 11 月 10 日。
178 库珀·H,吉布斯-内夫·T 和施密特·E,“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秘密帮助沙特抗击也门叛军”,《纽约时报》，2018 年 5 月 3 日。
179 关于美英对联军的援助，见巴赫曼·J·S，“对生活的“同步攻击”:沙特联军在也门进行“隐蔽而全面的”种族灭绝，以及美国和英国的连带责任”,《第三世界季刊》，2019 年。
180 科克伦·P,“欧盟国家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出售武器，价值是对也门援助的 55 倍”,《中东之眼》，2018 年 11 月 12 日;斯宾塞·R，“英国在也门冲突中的分裂角色”,《泰晤士报》，2018 年 3 月 8 日。关于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转让武器，见本卷第 5 章第 2 和第 3 节。
181 联合国安理会，也门问题专家小组最后报告，S/ 209 /83，2019 年 1 月 25 日。
182 阿尔莫沙·S，“也门的一场婚礼遭遇空袭，造成 20 多人死亡”,《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23 日。关于伊朗支持胡塞武装并向其提供导弹和其他武器的指控，见施密特·E，“美国海军上将称，伊朗正在向也门走私越来越强大的武器”,《纽约时报》，2017 年 9 月 18 日。
183《经济学家》，“也门生命线荷台达之战打响”，2018 年 6 月 14 日;麦克基迪·E 和齐布拉维·T，“沙特联军无视联合国警告，开始攻击也门港口城市”，CNN，2018 年 6 月 14 日;尼森鲍姆·D，“美国加强在也门战争的介入，向海湾盟国提供空袭援助”,《华尔街日报》，2018 年 6 月 12 日。
184 美联社，“沙特联军占领也门荷台达机场”,《电讯报》，2018 年 6 月 16 日;菲奇·A，“沙特联军在荷台达机场击退胡塞叛军”,《华尔街日报》，2018 年 6 月 20 日。
185 美联社，“阿联酋官员承认也门港口建设活动暂停”，2018 年 7 月 1 日。
186 卡尔福德·M·A 和科尔·M,“沙特加强对也门港口的包围，并对援助组织发出警告”,《纽约时报》，2018 年 8 月 2 日;博格·J，“正是美国提供的炸弹，炸死了 40 名乘坐校车的也门儿童”,《卫报》，2018 年 8 月 19 日。
187 埃尔巴吉尔·N，“造成也门 40 名儿童死亡的炸弹来自美国”，CNN，2018 年 8 月 17 日。
188 人权观察，“隐藏在联盟背后:未能对也门非法袭击进行可信的调查并提供纠正措施(人权观察:纽约，2018 年 8 月)。
189 人权理事会，“也门人权状况，包括 2014 年以来的侵犯和虐待”，2018 年 8 月 17 日，A/HRC/39/43。关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监狱中普遍存在酷刑的证据，见迈克尔·M·侯赛因，“刑满释放人员:也门叛军监狱中普遍存在酷刑”，美联社，2018 年 12 月 7 日。
190 温图尔·P，“沙特领导的联军部队再次从胡塞叛军手中夺取也门重要港口”,《卫报》，2018 年 9 月 11 日；索尔兹伯里·P，“也门荷台达攻势:曾经可以避免，现在却迫在眉睫”，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9 月 20 日。
191 阿尔德鲁比·M，“阿拉伯联军将派出 1 万军队把荷台达从胡塞解放出来”,《国民报》，2018 年 10 月 30 日；BBC 新闻，“也门战争:争夺重要港口胡达达的战斗加剧”，2018 年 11 月 7 日。
192 菲奇·A 和巴塔蒂·S，“随着国际压力加大，沙特停止了对也门的进攻”,《华尔街日报》，2018 年 11 月 15 日。
193 联合国，“秘书长任命英国马丁·格里菲思为也门特使”，新闻发布，2018 年 2 月 16 日;赖因尔·J，“马丁·格里菲思是谁?”,《中东之眼》，2018 年 2 月 23 日。
194 博蒙特·P，“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向也门提供近 10 亿美元援助”,《卫报》，2018 年 4 月 3 日。
195 哈里斯·G，施密特·E 和格拉德斯通·R，“美国和英国寻求也门停火，以缓和与沙特的关系”,《纽约时报》，2018 年 10 月 31 日;《经济学家》，“也门停火的一线希望”，2018 年 11 月 1 日。
196 罗德里戈·C·M，“美国停止在也门为沙特飞机加油”,《国会山》，2018 年 11 月 9 日;哈里斯·G，“参议员们，对哈苏吉被杀感到愤怒，在也门战争中抵制总统”,《纽约时报》，2018 年 11 月 28 日。
197 高巴里·M 和雅各比·A·E，“胡赛武装散兵游勇撤退之后，也门谈判在瑞典重启”，2018 年 12 月 2 日。
198 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斯德哥尔摩协定全文”，2018 年 12 月 13 日;沃尔什·D，“也门和平谈判由签署释放 5000 名囚犯协议拉开帷幕”,《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6 日。
199 麦凯南·B，“联合国也门代表团赶赴荷台达监督停火”,《卫报》，2018 年 12 月 14 日；BBC 新闻，“也门危机:荷台达冲突后推迟停火”，2018 年 12 月 16 日。关于联合国赴也门特派团，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
200 索尔兹伯里·P，“让也门荷台达协议坚持下去”，国际危机组织，2018 年 12 月 19 日。
201 福斯特·R，“也门和平进程:南部过渡委员会深陷困境”，牛津研究小组，2018 年 11 月 27 日。
202 博格·J，“参议院投票结束对沙特阿拉伯打击也门提供军事支持”,《卫报》，2018 年 12 月 13 日。
203 博格·J，“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勒索’后，也门停火决议在联合国受阻”,《卫报》，2018 年 11 月 29 日;索尔兹伯里·P，“瑞典取得进展后，也门急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12

月 13 日。

第 6 节.撒哈拉以南非洲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

伊恩·戴维斯和尼尔·梅尔文

2018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至少有 11 个国家爆发活跃武装冲突：布基纳法索（低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喀麦隆（高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中非共和国（内战）、刚果民主共和国（DRC）（高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埃塞俄比亚（高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马里（高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尼日尔（低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尼日利亚（高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索马里（内战）、南苏丹（内战）和苏丹（低强度、次国家级武装冲突）。[1]有几个国家，尤其是布隆迪和莫桑比克，政治暴力强度高。由于伊斯兰极端组织、其他武装组织和犯罪网络的流串，许多武装冲突呈现出跨国家、跨地区的特征。同时极端赤贫、社会动荡、经济脆弱、种族和宗教关系紧张，诸多不利因素叠加极端天气，政府腐败、经济政策低效、相互争夺自然资源，上述国家陷入水深火热之境地。武装冲突肆虐外，2018 年还有三大跨境问题影响着地区安全：（a）非洲反恐行动持续国际化；（b）选举相关暴力活动的规模和频度变化；（c）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影响越来越大。

本节将就上述三大问题展开论述，随后梳理 2018 年各武装冲突事态发展。鉴于冲突及地区层面的相互交织重叠，喀麦隆和尼日利亚武装冲突将置于乍得湖区域背景，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武装冲突置于萨赫勒区域背景，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武装冲突则置于两国 2018 年 7 月和平协定背景。其他冲突将在国家层面展开论述。

大事记

反恐与安全活动国际化

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多边和平行动最多的区域。[2]然而，跨国圣战分子和犯罪网络威胁使得常规形式冲突更为加剧。反过来，这又使得非洲多边和双边反恐行动有所增加。[3]西非跨国圣战威胁（见下文“乍得湖地区武装冲突”和“萨赫勒地区武装冲突”）和非洲之角尤为明显，伊斯兰暴力正蔓延到坦桑尼亚和莫桑

比克。[4]

非洲之角，反恐和反海盗一直是过去十年众多外部行动者的优先考虑。非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印度、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和英国）以及若干中东国家（埃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粉墨登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博弈升温，代理人间擦枪走火风险激增。[5]2018 年美国非洲安全布局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宣布在未来几年将部署在非洲的 7200 名军事人员削减 10%（尽管 2018 年美国在索马里增兵），更多依赖武装无人机（UAV）并期望地区和欧洲盟国伙伴能更多的分担危机管理和反恐责任，尤其是法国。[6]

中国和 UAE 越来越深的介入南部非洲安全和经济事务。[7]如 UAE 借助政治联盟、援助、投资和军事基地协定扩大其在非洲之角利益，对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平协定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索马里和也门的建设性影响却聊胜于无。[8]

选举暴力

至少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权力争夺就已成为常态。自那时算起，该地区众多国家都已连续举行三次以上大选。有的国家顺风顺水、风平浪静，可有些则是惊涛骇浪，暴力事件不断。选举暴力的原因是多层面的，但是大体可分为两类：（a）新民主政体及新兴民主政体的基本权力架构（如非正式的庇护制度、治理不善、排他性政治和在中央集权坍塌后，国家失去政治权力导致的社会经济不确定性）；以及（b）选举进程本身（如带病选举，选举欺诈和选举进程规则薄弱）。[9]一项关于 1990 年至 201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选举相关暴力的研究发现，相较比例代表制，多数投票制国家和小选区选举，更易爆发选举暴力活动。尤其是当社会存在明显的经济不平等，而核心民族政治集团又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之时。[10]

2018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 19 个国家计划举行全国（总统和/或议会）选举或宪法全民公投，其中许多国家要么深陷冲突漩涡之中或是刚刚抽身，要么就是有选举暴力冲突的历史；然而，绝大多数选举还是和平的，尽管有 7 次选举全部或部分推迟到年底后再举行（见表 2.5）。

至少在 2018 年，选举似乎为人们在治理不力和社会不公等诸多问题上的不满和愤懑提供了一个和平发泄的渠道，这类情绪最终演变为暴力也只是一小部分。

例如，一些评论人士预计马里选举会导致暴力或政治危机，尽管选举出现徇私舞弊的指控，但最终也未演变为暴力冲突。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肯尼亚，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反对派领导人奥廷加 3 月 9 日举行会晤。这也是该国 2017 年争议大选以来的首次会晤，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诺解决“民族关系恶化”和“剑拔弩张的敌对和仇视”问题。兜兜转转的暴力选举之殇，肯尼亚遍体鳞伤。[11]

表 2.5 2018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选举

国家	选举类型	日期	结果
布隆迪	立宪公民投票	5 月 17 日	一些选民受到恐吓，暴力程度低，反对派抵制
喀麦隆	总统选举	10 月 7 日	
	参议院	3 月 25 日	基本为和平选举
	国民议会	10 月	延期至 2019 年 10 月
乍得	国民议会	11 月 30 日	延期至 2019 年 5 月
科摩罗	立宪公民投票	7 月 30 日	基本为和平公投；公投后安茹安岛爆发武装冲突
民主刚果 DRC	总统/国民议会	12 月 30 日	和平选举，但有指控选举舞弊；选举后的暴力风险
科特迪瓦	参议院	3 月 24 日	和平选举，但反对派抵制
吉布提	国民议会	2 月 23 日	和平选举
埃斯瓦蒂尼 b	议院	8 月 25 日（首轮） 9 月 21 日（第二轮）	和平但限制性极强
加蓬	国民议会	10 月 6 日； 10 月 27 日(附加投票)	和平选举
几内亚比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1 月 18 日	延期至 2019 年 3 月
马达加斯加	总统选举	11 月 7 日； 12 月 19 日（附加投票）	和平选举
	国民议会	11 月	延期至 2019 年 5 月
马里	总统选举	7 月 29 日； 8 月 12 日(附加投票)	和平选举
	国民议会	12 月	延期至 2019 年 4 月
毛里塔尼亚	国民议会	9 月 1 日； 9 月 15 日(附加投票)	和平选举
卢旺达	众议院	9 月 3 日	和平选举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国民议会	10 月 7 日	和平选举；选举后爆发小规模暴力冲突

塞拉利昂	总统/众议院	3 月 7 日	和平选举
	总统选举	3 月 31 日(附加投票)	和平选举
南苏丹 a	总统/国会	7 月	延期至 2021 年
多哥	立宪公民投票	12 月 16 日	无限期推迟
	国民议会	12 月 20 日	和平选举；但反对派抵制
津巴布韦	总统/国民议会/参议院	7 月 30 日	相对和平；选举零星爆发暴力

a 这些选举原定于 2015 年 7 月在南苏丹举行，但推迟到 2018 年 7 月。
b 在伊斯瓦蒂尼，政党是被禁止的，几乎所有候选人都效忠国王姆斯瓦蒂三世。
资料来源：自由之家，“2019 年世界自由”数据库；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选举指南”数据库；伯克·J，“中非领导人调整民主以巩固权力”，《卫报》，2018 年 5 月 22 日；半岛电视台，“科摩罗：平民逃离昂儒昂岛，远离饱受冲突蹂躏的城市”，2018 年 10 月 18 日；以及《经济学家》，多哥总统选举受挫，2019 年 1 月 5 日。

然而，2 月几内亚举行 2005 年后首次地方选举。反对派指责总统阿尔法·孔戴和执政党操纵选举，今年剩余时间政治暴力零星爆发，至少有 18 人死于政治暴力。[12]

2018 年非洲最受关注的选举之一是津巴布韦 7 月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这也是 2017 年 11 月穆加贝总统下台后的首次选举。选举前的 6 月 23 日，执政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领导人埃默森·姆南加格瓦的集会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引发民众对投票安全问题的担忧。[13]尽管如此，与几年前选举爆发的系统性暴力相比，当前的投票还算平静。投票后两天，军方开始镇压反对派支持者，6 人死亡。人们对大选的乐观情绪也随风而逝。[14]民主变革运动对总统大选结果提出重大挑战，并指责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行为不当，但时至 8 月大选结果在津巴布韦宪法法院得以通过。[15]

2018 年选举相对顺利是否意味着撒哈拉以南非洲选举暴力呈现下降趋势，现在还不得而知。定于 2019 年举行的数个议会和总统选举依旧气氛紧张，如尼日利亚和南非，2019 年年底形势就会更加明朗。[16]

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

虽然非洲二氧化碳排放仅占全球排放 4%，但非洲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和政治脆弱的双重影响。根据一项研究，在 21 个面临这种最高风险双重负担国家中，12 个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哥拉、喀麦隆、乍得、科特迪瓦、DRC、埃塞俄比亚、几内亚、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南苏丹苏丹和乌干达。[17]《2016-2020 年非洲和

平与安全框架路线图》强调气候变化是影响和平与安全的跨领域因素之一。[18]撒哈拉以南非洲重度干旱频发、饥荒、山洪暴发已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导致人口大规模迁徙。不断变化的降水模式加剧了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水资源短缺。[19]2018 年，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提议设立气候与安全问题特使。[20]

乍得湖地区武装冲突

乍得湖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与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接壤。失业、贫穷和冲突等多重因素与环湖地区环境变化和环境退化相互作用，过去 40 年间，环湖地区缩小 90%。[21]博科圣地叛乱从尼日利亚蔓延到整个乍得湖地区，造成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和潮水般跨境人员流动。[22]2018 年初，乍得湖地区约有 1070 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 580 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2018 年下半年，安全形势好转，这一数字下降到约 300 万。[23]在联合国支持下，9 月在德国召开的人道主义大会，共筹得约 21.7 亿美元资金，以及多边金融机构提供的 4.67 亿美元追加优惠贷款，用于这一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济、发展和建设和平。[24]

博科圣地

叛乱组织博科圣地于 2002 年在尼日利亚出现，2009 年开始暴力起义，随后蔓延到乍得湖地区其他国家。[25]尽管尼日利亚军队在 2015-16 年间陆续夺回被博科圣地控制的领土，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德·布哈里也多次表示该组织已被击溃，时至 2018，博科圣地却依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26]打击博科圣地的生力军是多国联合特遣部队，主要由来自贝宁、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军事力量组成，其具体任务就是消灭博科圣地叛乱。[27]私营军事和安保公司投身战场。[28]尼日利亚当局日益认识到，结束武装冲突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手段。但是，构建透明的解除武装、遣返复员、重返社会策略，去激进化工作却始终鲜有涉及。[29]

叛乱期间，超过 2 万人被杀，210 万人流离失所。[30]2009 年至 2017 年年间，博科圣地多次袭击学校等教育机构，杀害教师约 2300 人，摧毁学校约 1400 所。[31]2018 年 2 月,该组织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达基抓捕 113 名儿童，后又释放了其中 107 人。[32]与博科圣地战斗的尼日利亚安全部队同样犯下侵犯人权的罪行。如在军方为国内流离失所者设立难民营中，妇女成为暴力和其他严重虐待行为的

受害者。按照大赦国际的说法，这些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33]

2016 年一个被称为“伊斯兰国西非省”的派别自立门户，从博科圣地脱离出来。2018 年下半年的一系列袭击中，伊斯兰西非省羽翼渐丰。[34] 例如 9 月份，其军队在对一个军事基地的袭击中，至少打死 30 名尼日利亚士兵，并在另外一次战斗中，一举拿下古邓巴利镇。[35]12 月下旬，伊斯兰西非省尼日利亚东北部近乍得边界的巴加镇，并占领附近的一个多国联合特遣部队基地。[36]2018 年，乍得和喀麦隆也继续受到博科圣地叛军滋扰，尽管暴力程度很大程度得以缓和。[37]

尼日利亚多重安全挑战

除东北部的博科圣地叛乱外，动荡中的尼日利亚还面临其他错综复杂的安全挑战，其中包括极端贫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诉求，定居农民和中东地带游牧牧民之间的暴力冲突（从东至西横跨尼日利亚国土三分之一面积），以及尼日尔三角洲武装激进组织的再度活跃。[38]2018 年，农牧民冲突比博科圣地叛乱更为致命，严重威胁尼日利亚稳定和团结。联邦警察常常无力维持和平局面，2018 年尼日利亚多靠军队应对国内安全挑战。2018 年一年时间，尼日利亚全国大部地区共有 36 个洲部署军队。[39]欧洲避难支援办公室 2018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尼日利亚境内百姓受到的迫害和侵犯行为，以及过去几年中各武装派别犯下的诸多滔天罪行。[40]

基督教农民和穆斯林牧民为了土地，争斗不断。牧民们面对土地沙漠化、局势动荡和牧场萎缩，不断向南迁徙扩大定居点。这也导致了 2018 年上半年的冲突升级，1300 多人死亡，并直接导致中部大部分地区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41] 6 月爆发武装冲突，5 天时间冲突双方你来我往，仅高原州一地就有超过 200 多人丧生。暴力升级背后的原因是少数民族民兵增加，联邦政府应对不力。2017 年 11 月，反放牧法出台，迫使贝努埃州和塔拉巴州的牧民迁至邻近的纳萨拉瓦州和阿达马瓦州，与当地农民发生冲突。[42]

联邦政府增派了警察和军队，并与牧民和农民领袖及相关州政府就如何结束暴力冲突进行了磋商。作为一个长效机制，尼日利亚政府在 2018 年 1 月提出建立“牛场”，为全国牧民腾出空间，并于 6 月 19 日公布了一项全国畜牧业改造计划(2018-2027)。[43]然而，有着这些措施的实施，却未能阻挡住暴力的脚步。

另外一方面，2018 年 9 月，至少有 45 名什叶派抗议者在首都阿布贾和邻国

纳萨拉瓦被尼日利亚安全部队枪杀，而在 12 月西北部赞法拉州犯罪暴力活动升级，40 多人死亡。[44] 2019 年大选期间和选举后，同样也存在爆发抗议和暴力的风险。主要的竞选人有是现任总统穆罕默德·布哈里，执政的进步党全国代表大会领导人，以及前副总统阿蒂库·阿布巴卡尔，人民民主党党首。他曾领导人民民主党长达 16 年直至布哈里上台。2011 年选举后，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逐渐演变为对尼日利亚北部少数民族的袭击，800 多人在袭击中丧生。[45]

喀麦隆英语地区武装冲突

1922 年至 1960 年间，法国管理着喀麦隆大部地区，但英国依旧是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保护国。两个地区合计人口 300 万人，约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主要讲英语并有自己的法律和教育制度。两大地区局势一直紧张，要求成为安巴宗尼亚自治共和国的诉求至少可追溯至 1985 年，最终在 2017 年 9 月演变为暴力冲突。2017 年 10 月 1 日，激进英语国家分裂者宣布独立，象征着冲突走向高潮。[46]冲突最初是英语教师和律师举行游行，抗议在英语学校和法庭使用法语，抗议活动很快升级为分离主义民兵的武装叛乱。2018 年，战斗导致近 200 名安全部队成员、600 多名分离主义分子和至少 500 名平民丧生。[47]据联合国资料，来自英语地区的 43.7 万尼日利亚人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约 3 万名难民。[48]

10 月大选基本风平浪静，保罗·比亚总统(已执政 36 年)赢得大选。动荡的时局使得选民惶惶不安，投票率极低，尤其是在两个英语地区；西北和西南地区官方投票率分别约为 5%和 16%。[49]议会和市政选举推迟到 2019 年 10 月举行。[50]

人们希望由宗教领袖牵头的英语地区大会将是朝着全国对话和解进程迈出的第一步。然而，8 月大会推迟，11 月再次延期，其原因就是喀麦隆政府拒绝授权大会，但又未有明确信号何时将会授权。[51]政府似乎不太愿意坐到谈判桌前，更加倾向于用枪炮来教训分离主义分子，冲突有升级陷入全面内战的危险。

萨赫勒武装冲突

对萨赫勒地区的定义不尽相同，但这里指的是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自 2011 年利比亚解体和 2012 年马里北部冲突爆发以来，贫穷、有组织犯罪、暴力极端主义和政府治理不力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该地区变得越来越为脆弱、越来越为动荡。[52]经济增长乏力(尼日尔在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 2018 年人类发展计划中处于最底层)，布基纳法索、乍得和马里接近底层，这些国家还要遭受气候变化对传统农业和畜牧业的冲击、粮食安全和冲突加剧等风险。[53] 马里大部地区都有暴力极端分子肆虐，并逐步蔓延至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邻国。极端组织同农村叛乱日益相互交织，两者愈发加剧了各种族间紧张局势；极有可能蔓延到萨赫勒地区其他国家，甚至进一步延伸。有鉴于此，萨赫勒也是若干多边和平行动和反恐行动的舞台，其中包括法国 4000 人的区域反恐行动巴尔坎行动和五国集团萨赫勒联合部队(JF-G5S)。[54] JF-G5 实际效用有限，单纯倚仗军事手段，伙伴国之间协调不力，具体任务分配上分歧不断，当下的 JF-G5 效果究竟几何，让人怀疑。[55]

布吉纳法索圣战暴力的兴起及其向尼日尔的蔓延

全副武装的圣战分子主要活跃在两个地区：(a)2015 年以来，主要活跃在布吉纳法索马里北部边界；以及(b)2018 年越来越多活跃在东部靠近尼日尔边界，主要的圣战组织是安萨鲁尔伊斯兰组织，它与马里的安萨尔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56]然而，东部武装冲突，战斗人员身份仍不甚清楚。2016 年 1 月以来，布吉纳法索发生 230 多起袭击事件，主要是针对安全部队的袭击，共有 250 多人丧生。[57]如 2018 年 3 月 2 日在首都瓦加杜古，针对军事总部和法国大使馆共发生多起袭击事件。[58]2018 年 12 月 31 日，攻击事件爆发愈发密集，多个省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59]

北部和东部一些地区，鉴于安全形势，法院和学校都已被迫关闭，警察和海关人员巡逻也是险象环生。圣战武装组织和国家安全部队都有被指控存在侵犯人权。[60] 布基纳法索武装部队对圣战武装实施空袭和地面行动进行清剿。此外，2018 年 10 月，巴尔坎行动在北部和东部进行了两次反恐干预。[61]

尼日尔一直是萨赫勒境内武装犯罪和极端伊斯兰组织的关键过境点。[62]2015 年以来，上述武装组织不断加大对袭击力度，尼日尔不堪其扰。首当其冲就是博科圣地，至 2017 年以来又受到布基纳法索和马里边境附近武装组织袭击。2018 年，边境暴力事件使 52000 名尼日利亚人流离失所。[63]法国的巴尔坎行动和美国军队都支持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在国内开展反恐行动。美国还在 2018 年初向尼日尔部署武装无人机。[64]

马里武装冲突

马里武装冲突错综复杂、涉及面光，但其根源在于经年累月的图阿雷格人叛乱和 2012 年的北部危机。[65] 目前，武装冲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a）与 IS 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圣战组织分支不断扩大，主要分布在马里北部和中部；（b）莫普蒂和塞古地区(马里中部)的颇尔族班巴拉族和多贡族彼此之间、内部之间的冲突，以及梅纳卡省地区(马里北部，靠近尼日尔边界)的托莱比(主要是颇尔族游牧民)和达乌萨哈克（图阿雷格部落）彼此之间、内部之间的冲突。马里中部武装冲突也是马里全境自 2017 年年初以来，安全形势不断恶化的诱因之一。[66]

2015 年 6 月，平台(2012 年图阿雷格叛乱爆发后，宣布效忠马里政府的武装组织联盟)同反对派武装联盟--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CMA)达成和平协议。CWA 成立于 2014 年，是代表图阿雷格分裂分子参与和平进程。协议签订后，马里政府在联合国、国际捐助者和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MA)支持下，发起了一系列和平倡议。[67] 2017 年 9 月，CMA 马里稳定团和平台就停火、战俘交换和其他建立信任机制达成一致。[68] 然而，2018 年初，马里和平进程依旧岌岌可危，伊斯兰暴力极端分子和反政府武装对马里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人员发起袭击。[69]

2018 年，暴力事件升级同时愈发扩散。圣战暴力激增体现在对马里政府军大张旗鼓的袭击(定期)和对巴尔坎行动部队(4 月)以及 JF-G5S 行动总部(6 月)的袭击。[70] 马里中部，民间“自卫”性质的民兵组织相互间大打出手，数百名平民惨遭涂炭。[71] 一项独立研究发出警告，大规模暴行风险越来越大，而毒品及各类非法交易又成为马里北部武装冲突的温床。[72]

据联合国安理会专家小组，马里人道主义局势依然“形势严峻、岌岌可危、兵凶战危、波诡云涌”，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水平高于 2012 年安全危机爆发以来的任何时候。2018 年共有 520 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2017 年为 380 万人。[73] 2018 年，国内流离失所者倍增，达到 14 万人，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的马里难民超过 13.7 万人。[74] 联合国专家小组同时还发现，马里军队的反恐行动引发出“令人担忧的侵犯人权行为模式”，包括杀戮平民。[75] 2018 年 8 月至 12 月，联合国小组观察到侵犯人权行为大幅增加，尤其是在莫普蒂和梅纳卡地区。[76]

尽管武装冲突和圣战分子袭击事件不断增加，马里中部和东北部尤甚，7 月

29 日大选依旧拉开大幕。8 月 12 日的第二轮选举，尽管受到投票率极低和程序不规范的影响，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还是赢下第二个五年任期。[77]原定于 12 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推迟到 2019 年举行。[78]

凯塔连任，马里政府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宪法审查和各级地方政府选举，上述举措(2018 年 3 月通过)皆为具体实施 2015 年和平协议路线图。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3 号决议要求，马里政府和联合国于 10 月签署马里和平协定。[79]旨在加快路线图执行，并为此于 11 月启动解除军备、武装人员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同时举办安全部门改革高级讲习班。[80]然而，由于马里中部和北部地区安全局势再度恶化，粮食短缺、人道主义危机，同时协议推进举步维艰，和平协议已然岌岌可危。

中非共和国武装冲突

2013 年以来，CAR 武装冲突主要是穆斯林塞莱卡武装集团(2013 年夺取政权)和基督教反巴拉卡武装集团之间的宗教和种族暴力。尽管塞莱卡在 2014 年将权力移交至过渡政府，但暴力仍未停歇。尽管有联合国和平行动驻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CA)，CAR 依旧还是军阀割据的局面。[81]2016 年福斯坦－阿尔尚热·图瓦德拉当选总统，被视为 CAR 进步的迹象。但 2017 年，祸起萧墙。塞卡人民复兴阵线内部两大派别兵戎相见，中非复兴联盟和中非和平联盟之间的冲突升级，同时反巴拉卡和塞莱卡的几个武装组织之间同样爆发冲突。2017 年 6 月，政府和 14 个武装组织中的 13 个都缔结了和平协定；然而，暴力很快卷土重来。[82]2017 年 7 月，非盟和合作伙伴共同制定了一份全新的 CAR 和平和解路线图，但依旧无法挽回局势。[83] 2018 年，CAR 全境 80%都被各大武装组织所控制，来回往复，不停易手，其目的就是争夺背后的资源(黄金和钻石开采地、运输路线和牧民迁徙走廊)。无论是 MINUSCA 还是羽翼未丰的欧盟训练国家军队，都还无法控制局面。即便是以前和暴力冲突绝缘的首都班吉，穆斯林和基督教帮派之间的战斗也在 4 月和 5 月升级。[84]武装组织不仅打得你死我活，而且还把枪口对准平民、联合国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及设施。[85]暴力已造成严重流离失所(几乎 65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和 57.6 万邻国难民)和粮食安全问题(约 290 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86]

尽管在地方斡旋最终带来了短暂的和平，一些武装组织和民间组织之间紧张

局势得到缓解，但非盟路线图推进方面进展甚微。政治和解迟迟不见成果，图瓦德拉总统向俄罗斯寻求支持。2018 年初，俄罗斯向 CAR 提供军事训练和轻武器弹药，两国签署了几项秘密双边协议。[87]俄罗斯鼓励苏丹在 2018 年 7 月和 8 月在喀土穆与 CAR 武装组织和政府代表展开新和谈。俄罗斯-苏丹倡议在非盟和欧盟，特别是法国眼中，无异于是另起炉灶，是对自己和平努力的破坏，特别是俄苏两国允许武装组织和政府代表加入“论坛商店”。[88]年中，中法俄美又宣布将向 CAR 政府提供武器和/或军事装备，有的甚至已经开始运送。联合国禁止向 CAR 菲政府军提供或转让武器，但允许向政府安全部队提供武器，前提是此类武器必须事先得到联合国相关制裁委员会的批准。[89]

2018 年，CAR 的各大城市在隆隆炮火中迎来新的一年。各武装派别间、武装组织和维和人员之间都是一片混战，首都班吉紧张局势也在加剧。尽管非盟和联合国努力试图通过外交努力将 CAR 拉回和平轨道，但依旧不能排除 CAR 恢复全面内战的可能性。[90]

民主刚果共和国武装冲突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非洲第二大国家，人口约 8000 万。刚果近代史是一部内战和腐败史，背后是刚果巨大矿产资源的争夺战。1998-2003 年第二次刚果战争结束以来，刚果东部冲突不断，至今仍有数十个武装组织，联合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维和部队自 2000 年就已部署刚果。[91]2001 年，约瑟夫·卡比拉担任刚果总统，2006 年和 2011 年两次赢得连任。据 2016 年《全面和包容各方的政治协定》(又称《圣西尔维斯特协定》)，卡比拉继续留任，原定 2016 年 12 月的大选推迟至 2017 年底举行。2017 年 3 月，在野党与国会最大党总统多数党联盟的新一轮谈判失败后，天主教会不再进行调停。2017 年 11 月，总统大选改期至 2018 年 12 月 23 日。[92]

2018 年初，政治僵局持续，多个省份暴力事件升级，导致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据估计，Kasai 地区(由 5 个省组成)有 320 万人继续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威胁，76.2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估计北基伍省、南基伍省和坦噶尼喀省共有 20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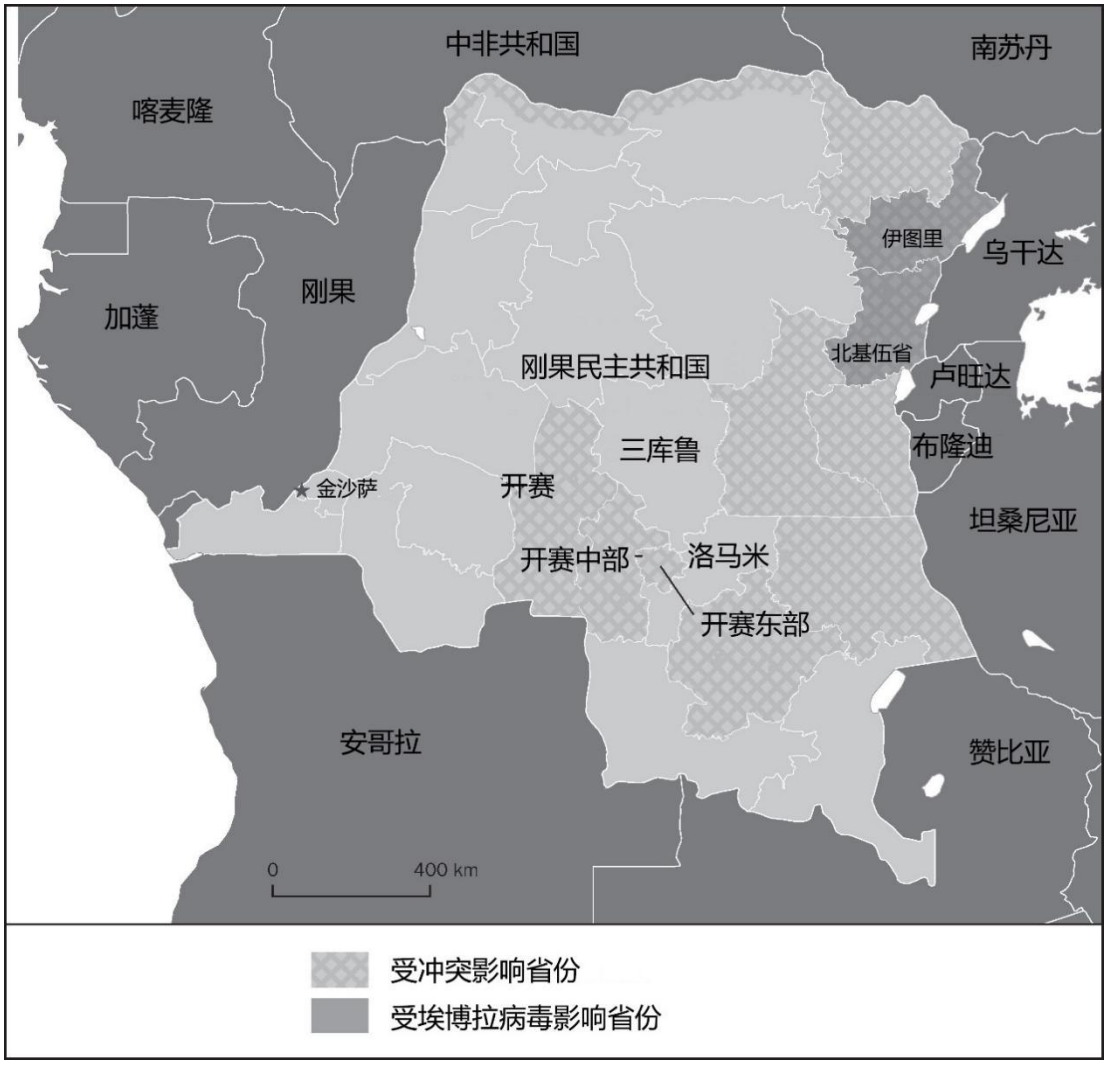


图 2.5 2018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受冲突和埃博拉病毒影响地区

作者：雨果•阿勒尼斯，《指北针》

2018 年上半年，DRC26 个省中至少有 10 个省的政府崩溃并爆发武装冲突，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东部多个武装组织内部冲突最为严重(见图 2.5)。[94]Kasai 地区，早期民族冲突遗留问题和人们对暴力死灰复燃的恐惧，使得 230 万儿童急需人道主义援助。[95]4 月的 DRC 高级别人道主义大会筹得善款 5.3 亿美元，而联合国表示 DRC 人道主义危机需要 17 亿美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DRC 政府对大会表示抵制，指责援助机构夸大危机严重程度。[96]

表 2.6 2018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霍乱、麻疹和埃博拉病例

	霍乱	麻疹	埃博拉
病例	26 784	51 796	500

死亡	831	711	289

注：霍乱和麻疹数据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 日。 埃博拉数据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10 日。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通报：刚果民主共和国” [人道主义公报：民主刚果]。No.41，2018 年 11 月。

2018 年下半年，DRC 东部在 8 月爆发新的埃博拉疫情，12 月大选在即，局势骤紧，DRC 再次风声鹤唳。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叠加本就肆虐的麻疹和霍乱疫情，2018 年 5 月早些时候 DRC 西北部就已爆发埃博拉疫情，现在一起全面迅速爆发，三大疫情夺去 1800 多人生命(见表 2.6)。[97]尽管 DRC 在应对埃博拉病毒方面有着长期的斗争经验，但这轮疫情——自 1976 年世界首次埃博拉疫情记录以来的第 10 次——证明难以控制，原因就在于核心疫区正好位于基伍省北部武装冲突区域（见图 2.5）。[98]如 10 月 DRC 东部贝尼市及其周边地区民兵袭击事件增多并引发骚乱，疫情防控举步维艰。11 月，贝尼地区针对乌干达反叛组织民主力量联盟的联合军事行动中，8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和至少 12 名刚果士兵丧生。[99]

8 月，卡比拉总统宣布将遵守宪法，不参加 12 月的总统选举，但人们仍然对投票的公平性和可信性表示怀疑。[100]反对党未能团结一致选出一名总统候选人，内政部长伊曼纽尔·拉马扎尼·沙德利非常可能坐收渔利。反对党两位候选人，一位是变革联盟的费利克斯·齐塞凯迪（齐塞凯迪的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和维塔尔·卡梅雷的刚果民族联盟组成的联合党），另外一位就是觉醒联盟的马丁·法尤卢（马丁得到两位反对党领袖的支持，他们都被禁止成为总统候选人：让-皮埃尔·本巴，2016 年被国际刑事法院宣判犯下战争罪，2018 年 6 月被上述法院推翻判决，以及莫伊塞·卡通比）。[101]

原定 12 月 23 日举行的大选终于在 12 月 30 日拉开大幕。尽管大选前几周，反对派支持者与安全部队或执政联盟追随者之间的暴力事件有所增加，但选举当天还算平静。然而，暴力升级的风险依旧，尤其是一些地区由于埃博拉疫情和暴力冲突影响，投票推迟至 2019 年 3 月。此举实际上剥夺了 125 万潜在选民（共 4000 万选民）大选投票权利。[102]1 月初，费利克斯·齐塞凯迪宣布获胜，这也是 DRC 独立 59 年来的首次通过选举实现权力移交，但落选的马丁·法尤鲁指控选举有舞弊，拒绝承认大选结果。[103]除开政治不确定性，DRC 从 2019 年就开始面临旷日持久和错综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估计有 1280 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104]

埃塞俄比亚武装冲突及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平协定

2018 年，艾哈迈德·阿里当选埃塞俄比亚总理，埃塞俄比亚政坛经历剧变。2014 年以来，埃塞俄比亚紧张局势一路升温，阿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台。[105] 阿比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生态，甚至整个地区也是耳目一新。这个夏天与厄立特里亚的突破性和平协议，下半年政治自由化扎实推进，努力与武装组织握手言和，为非洲之交地缘政治新气象打下扎实基础。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埃塞俄比亚境内日益加剧的种族暴力、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厄立特里亚政治制度改革之后，都让巩固地区和平前景蒙上阴影。

埃塞俄比亚政治变革

3 月 27 日，执政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中央委员会选举阿比为 EPRDF 主席，并任命为候任总理。此前几年埃塞俄比亚全国民族间制止暴力肆虐，尤其是爆发了对最大民族奥罗莫和第二大民族阿姆哈拉的抗议之后，阿比借势崛起。人民的愤懑背后是埃塞俄比亚沦落为非洲最贫穷国家之一的经济窘境，以及人们对执政长达 27 年的 EPRDF 出离的愤怒。

2014 年抗议活动大幕开启，也直接证明由少数民族提格瑞安精英掌控的 EPRDF 政权早已无力阻止暴力蔓延。这也反映出时任总理梅莱斯·泽纳维(自 1988 年就一直领导 EPRDF)2012 年去世后，EPRDF 内部早已是内耗不断。

2018 年年初，埃塞俄比亚各地抗议和暴力活动仍在继续。2 月，运动领袖海尔马里亚姆·德萨勒根毫无征兆的宣布辞去总理和 EPRDF 主席职务。第二天，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期 6 个月。[106] 尽管如此，暴力仍未平息，本就举步维艰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4 月 2 日，即 3 月 EPRDF 中央委员会大会之后，埃塞俄比亚议会确认阿比为总理，随后宣誓就职。

履新总理，阿比迅速宣布新政治议程，包括经济改革、民主化进程和扩大国内政治空间，其中包括释放数千名政治犯和放松对反对派的政治镇压。执政伊始的几个月，同厄立特里亚缔结和平协定迅速让阿比站稳脚跟。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平协定

2018 年 6 月 5 日，埃塞俄比亚 EPRDF 执行委员会宣布接受并全面执行厄立

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 2002 年的裁决。7 月 8 日至 9 日，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首脑会议在厄立特里亚阿斯马拉举行，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和埃塞俄比亚总理艾哈迈德出席了会议。首脑会议结束，两国领导人发表了《和平与友谊联合宣言》，正式结束了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战争(1998-2000 年)和边界冲突(2000-2018 年)状态，全面恢复外交关系。[107] 7 月，阿费沃基总统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

首脑会议和高级别互访后，两国恢复航班、重新开放大使馆和重新建立通讯联系。美国和 UAE 为破冰在外交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08] 2018 年 9 月 11 日，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境口岸自 1998 年以来首次重新开放。[109]

7 月首脑会议之后，埃塞俄比亚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解除对厄立特里亚实施了 9 年的制裁。11 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投票决定解除对埃制裁。[110] 12 月，埃塞俄比亚宣布开始将部队撤出埃厄边界。[111]

和平协议为埃政府同反对派武装和解奠定了基础，许多反对派组织都已在厄立特里亚安营扎寨。9 月，金波特 7 号和奥罗莫解放阵线的战士已经踏上返乡的归途。[112] 10 月，埃塞俄比亚与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缔结和平协议。[113]12 月，欧加登解放阵线领导人返回埃塞俄比亚。[114]

巩固地区和平面临的挑战

埃塞俄比亚政治变革进程是与厄立特里亚达成和平协定的核心要素。然而，阿比的当选并没能马上解决掉埃塞俄比亚内部问题，如暴力冲突、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两大顽疾。随着民兵组织招兵买马，甚至愈演愈烈，冲突进一步升级。[115] 9 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和邻近地区爆发种族冲突，35 人死亡，数百人被捕。[116] 执政的 EPRDF 似乎无力改变埃塞尔比亚种族联邦制(联邦制宪法组织的根基是种族)，也就难阻止日渐加剧的暴力冲突。与此同时，阿比还面临着来自奥罗莫族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诉求。[117]

尽管经济出现增长，但是埃塞俄比亚仍面临着一场经济危机，外债超过 240 亿美元，失业率高企、外汇储备低、指着从海湾国家融新钱还旧账。[118] 定于 2020 年举行的大选，找到办法遏制暴力蔓延、应对羸弱的经济结构将是巩固地区和平和稳定的关键之所在。同样，厄立特里亚独裁政治制度亟待变革，以确保和平进程深植社会，不再只是一纸精英协议。[119]

索马里武装冲突

2018 年间，索马里联邦政府在国际社会支持下，继续努力稳定索马里局势。安全仍是首要任务，特别是打击伊斯兰暴力运动青年党。美国加强军事介入，尤其是有针对性的消灭伊斯兰教暴徒。尽管有证据显示伊斯兰组织伤亡惨重，但是索马里武装暴力依旧有增无减，这也表明 2018 年的索马里依旧深陷武装冲突的泥潭，不能自拔。大规模流离失所仍在继续，仅 2018 年就有 32 万多人流离失所，2018 年年末国内流离失所人口达 260 万人之巨。[120]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大量涌入索马里，2018 年面临粮食安全威胁人口数量较 2017 年减少一半，但仍有 180 万之巨。[121]

维稳措施

2018 年，联邦政府在国际社会支持下，继续努力稳定国家局势，特别是从 2017 年末开始，加强了对暴力伊斯兰组织的军事清剿。[122]2018 年 1 月 18 日，联邦政府部长会议通过一份包容性政治路线图，旨在应对国家政治分裂，并为 2020-21 年普选铺平道路。[123]联邦政府和国际伙伴制定了一项全面的安全过渡计划。根据计划，索马里政府机构将逐步接管国家安全事务。[124]

7 月，联合国安理会授权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AMISOM)任务展期，并授权对特派团进行改组，增加警察人数。[125]11 月，AMISOM 官员通过一项安全过渡计划，在 2021 年完全撤出索马里之前，将安全事务逐步移交索马里部队。[126]7 月 16 日至 17 日，索马里高级别伙伴关系论坛在布鲁塞尔举行。[127]在努力促进政治包容和安全过渡的同时，特别关注经济复苏和改革问题，改善妇女和青年的就业机会，加强教育和提升人道主义状况。[128]国际捐助者同样为上述目标，提供了财政援助。[129]

美国军事集结

2018 年，美国加强了对索马里的军事介入。[130]新建多处军事设施，特别是无人机和特种部队行动中心-Baledogle 营地。[131]五角大楼报告，2018 年索马里发生 45 起袭击事件，高于 2017 年的 35 起和 2016 年的 14 起。[132]然而，新闻报道显示，美国当局统计之外的袭击事件数量应该更大，并大多涉及平民伤亡。[133]

索马里青年党

2018 年，青年党暴力事件总体有所下降。[134] AMISOM、索马里国民军和美国军事行动三管齐下，重挫伊斯兰组织。[135] 尽管面临的军事压力不断加大，青年党却显示出极大 的韧性，扩大袭击目标范围，对硬目标和软目标实施高伤亡袭击。[136] 与此同时，青年党与 IS 索马里分支机构之间大打出手。12 月，青年党宣布对索马里境内所有 IS 相关武装分子宣战。[137]

危机中的索马里联邦制

索马里是一个联邦共和国，有一个中央当局（联邦政府）和六个联邦成员国，分为 18 个行政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索马里会经历 30 年内战，为什么会始终四分五裂。1991 年，索马里兰宣布单方面独立，联邦政府不予承认。

沙特和 UAE 为首的海湾国家同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经济封锁，卡塔尔外交危机爆发。今年 4 月，卡塔尔支持的联邦政府同 UAE 关系交恶，随后发酵，危机蔓延至索马里。摩加迪沙机场，索马里安全人员在一架 UAE 飞机上缴获 960 万美元，两国关系开始恶化。[138] 随后几个月，索马里同 UAE 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包括对 UAE 在索马里分离领土--苏马里兰上的军事基地的袭击。[139] 不同海湾国家派别站队索马里联邦不同分支，这也引发了人们对索马里岌岌可危局势的更多担心。[140]

2018 年 5 月，索马里半自治的邦特兰地区和索马里兰之间的战斗造成数十人死亡。[141] 10 月，曾在 5 月爆发暴力事件的地区再次爆发部落间冲突，凸显出索马里暴力的多层面属性。[142] 6 月，联合国安理会警告，“内部和外部压力有可能破坏索马里政治团结”。[143] 9 月，联邦各州中止了与联邦政府的合作。[144]

12 月，前青年党激进分子穆可塔·罗博被联邦政府禁止参加地方选举，后来被捕。[145] 罗博被捕后，其支持者同安全部队爆发了两天的冲突，多达 15 人丧生。[146] 12 月 30 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尼古拉斯·海索姆致信联邦政府，要求了解罗布被捕期间及随后暴力事件中联邦安全部队的动向。联邦政府随后驱逐了特别代表，指控他干涉索马里内政。[147]

南苏丹武装冲突与 2018 年 9 月和平协议

2011 年 7 月 9 日，南苏丹脱离苏丹获得独立，此前 2005 年双方达成协议，结束了非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之一。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UNMISS）成立于 2011 年 7 月 8 日。[148] 南苏丹独立后，内战继续（2013-2015 年）。最终于 2015 年签订和平协议结束内战，但暴力顽疾依旧以武装冲突的形式继续肆虐。武装冲突主要爆发在两大集团之间，总统萨尔瓦·基尔（丁卡族）领导的南苏丹政府及其同盟，前副总统里克·马查尔（努尔族）领导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和努尔族白军。尽管内战和随后冲突主要为丁卡族和努尔族间的分歧，但全国各地潜在冲突态势差异极大，反对派组织化大多整为零同时更为本地化。[149]

2017 年 5 月，基尔总统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启动全国对话进程，由一个由 8 个国家组成的区域贸易集团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进行监督。[150] 尽管局势混沌一片，暴力升级不断，政府和反对派武装组织还是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签署了停火协议。[151] 然而，一纸协议很快就被撕碎。2013 年以来，至少 8 份停火协议无疾而终。

较 2014 年初峰值，现在的暴力事件已经开始减少，但 2018 年暴力事件仍然普遍存在。[152] 政府武装部队和武装反对组织共招募 19 000 多名儿童兵，仅 2018 年上半年就报告约 2300 起性暴力案件。[153] 独立研究估计，自 2013 年 12 月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近 40 万人死于冲突（约一半直接死于暴力，另一半间接死于暴力）。南苏丹官员声称，2 万人死亡估算过于夸大。但 2 万人的估算数同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LED）估算的冲突相关死亡总数 22500 人基本一致，含 2018 年 1541 人。[154] 约 460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约 230 万人是难民逃往邻国，成为非洲最大的难民危机，也是世界第三大难民危机（仅次于叙利亚和阿富汗）。[155] 此外，2018 年有 710 多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匮乏。[156]

2018 年 2 月，美国对南苏丹实施单方面军备限制，以此向基尔总统施压，迫使其结束内战。联合国安理会随后于 2018 年 7 月实施了武器禁运。[157] 后在安理会内部受到质疑，主要是因为它为和平谈判和民族对话倡议带来不确定影响。对话倡议于 2017 年 11 月在地方和区域两级启动，并将于 2018 年末召开一次全国性大会。但随后改为四次会议：三次区域性会议（2019 年 2 月和 3 月）和一次全国性大会（日期待定）。[158]

6 月，基尔总统和马查尔签署一项初步框架协定，用以执行其他停火协议并

努力建立新的过渡政府。[159] 深入的和平谈判带来了的是，9 月 12 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签署《解决冲突振兴南苏丹协定》。[160] 在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和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的斡旋下，协议大大减少了南苏丹大部分地区的暴力冲突。[161] 一个由非洲国家占主体的联合监督和评估委员会，负责监督协议执行。停火和过渡安全监测与核查机制，负责对停火情况进行调查，并向改组后的联合监督和评估委员会和 IGAD 提交报告。

然而，新的和平协议依旧存在争议和分歧。这也需要进一步谈判，以组建统一政府，过渡安全安排和统一的国家军队，并在三年过渡期后，于 2022 年举行总统大选。尽管已有全国对话倡议，还是存在一种可能，未来谈判依旧会沦为基尔-马查尔两人的博弈，而并非是广泛的全民参与，而这两人竞争在过去并未成为持续和平的基础。[162] 2016 年也有类似协议出台，并组建一个的团结政府，可惜这一短寿政府几个月后便寿终正寝。

腐败同样可能破坏这一协定，美国抽身事外也是如此。[163] 三驾马车（挪威、英国和美国）是为了达成 2005 年南苏丹独立协议而组建。作为幕后大佬，美国本应发挥重要的外交作用，但自 2016 年以来，美国就再未向南苏丹派驻高级特使。[164] 苏丹长期的危机也可能加剧南苏丹的动荡局势（见下文“苏丹武装冲突”）。

2018 年年末，2018 年 9 月协议能够成为南苏丹冲突一劳永逸的持久解决方案，尚未可知。联合国 2018 年最终报告对南苏丹冲突的描述是，尽管冲突有限且多为局部规模，但仍在继续。同时 2018 年最后三个月，性暴力时间仍在继续。[165]

苏丹武装冲突

苏丹近代史就是一部暴力冲突史。2018 年，苏丹政府仍被卷入两场低强度武装冲突：达尔富尔武装冲突和南部科尔多凡州及青尼罗州武装冲突。在达尔富尔，2003 年开始，政府军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个武装组织交战。根据联合国-非盟驻达尔福尔特派团报告，尽管苏丹政府军在 3 月至 5 月期间袭击了杰贝尔马拉地区的反叛分子，造成至少 23 名平民死亡，2018 年达尔富尔暴力规模及分布显著降温。[166]

2018 年，苏丹政府与苏丹北方人民解放运动（已分裂为两派）在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两个边境州的武装冲突，进入第七个年头，但这一年几乎没有或根本

没有重大战斗报道。7 月，苏丹政府将 2015 年与所有反叛组织的单边停火协议延长至 2018 年底。[167] 据报道，11 月南苏丹总统基尔将对苏丹政府与反叛组织之间的和平谈判进行调解。[168]

尽管 ACLED 估计，2018 年苏丹冲突共导致 1046 人死亡，但其中许多人可能是死于政治暴力而非武装冲突(武装冲突正逐步降温)。[169]政治镇压和腐败继续破坏着苏丹的和平与繁荣。时至年末，经济形势恶化，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1989 年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巴希尔总统正面临着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挑战。安全部队对抗议民众报以武力，据报道数十人被打死。[170] 截至 2018 年年底，超过 550 万苏丹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近 190 万人国内流离失所者，共有 120 万难民流落邻国，其中包括南苏丹的 27 万人和乍得的 34 万人。苏丹本身收容了 90 多万难民，大多数来自南苏丹。[171]

1 冲突定义和类型见本章第 1 节。北非武装冲突见第 5 节。
2 多边和平行动，见本卷第 3 章。
3 多边反恐或“非和平”行动，见本卷第 3 章。
4 国际危机组织(ICG)，韦斯特盖特袭击五年后的青年党:仍然是东非的一大威胁，非洲报告 No.265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9 月 21 日);《经济学家》,“莫桑比克蠢蠢欲动的伊斯兰叛乱可能会变得更为致命”，2018 年 8 月 9 日。
5 见梅尔文・N,“非洲之角地区新的外部安全政治”，SIPRI 视点 No.2019/2,2019 年 4 月。关于日本在该地区所扮演的角色，见共和党众议员梅森・R,“吉布提及其他:日本战后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与加强军事能力风险的再度校定”,《亚洲安全》第 14 卷第 3 期(2018)，第 339-357 页。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反恐活动国际化，见戴维斯・I,“撒哈拉以南非洲武装冲突”，SIPRI 年鉴 2018，第 85-87 页。
6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宣布军队优化”，新闻发布会 NR-325-18，2018 年 11 月 15 日;舍费尔・A 和奎恩斯・M,“美国在非洲“转移负担”战略也验证了法国扩大欧洲战略自治的雄心壮志”，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大西洋彼岸》，2019 年 1 月 23 日；大西洋两岸;阿贾拉・O,“美国在阿加德兹的无人机基地:对尼日尔的安全威胁?”,《俄罗斯日报》第 163 卷第 5 期(2018)，第 20-27 页;《经济学家》,“法国可能率先打击圣战分子”，2018 年 9 月 20 日。
7 科夫里格・M,“中国扩大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足迹”，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10 月 24 日。
8 国际危机组织(ICG)，非洲之角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东简报 No.65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11 月 6 日)。关于阿联酋在也门的作用，见本章第 5 节。
9 北欧非洲研究所,“非洲的选举暴力”，政策说明 2012/3;科伐奇・M・S 和比亚内森・J,“非洲选举中的暴力:民主与大人物政治之间”(北欧非洲研究所和 ZED 出版社：乌普萨拉和伦敦，2018 年)。
10 费尔德・H 和霍格伦德・K,“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选举制度与选举暴力”,《英国政治科学杂志》，第 46 卷第 2 期(2016 年 4 月)，第 297-320 页。
11 国际危机组织(ICG),“肯尼亚领导人和解后，道阻且长”，非洲简报 No.136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3 月 13 日)。
12 《非洲时报》,“人权组织再次就几内亚政治暴力发出警告”，2018 年 11 月 1 日。
13 伯克・J,“津巴布韦总统将集会袭击归咎于格蕾丝・穆加贝的派系”,《卫报》,2018 年 6 月 27 日;庇古・P,“津巴布韦大选前紧张局势加剧”，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8 月 21 日。
14 布罗克・J 和德苏鲁图・M,“津巴布韦南加古瓦赢得穆加贝下台后的首次选举”，路透社，2018 年 8 月 2 日;《经济学家》,“津巴布韦的镇压暴露了南加古瓦政权的动荡”，2018 年 8 月 9 日;庇古・P,“选举后津巴布韦政府合法性岌岌可危”，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8 月 21 日。
15 伯克・J,“津巴布韦法院拒绝反对派废除选举结果的企图”,《卫报》，2018 年 8 月 24 日。
16 奥尼什・N 和格布列吉丹・S,“杀手与权力:南非领导人自相残杀”,《纽约时报》，2018 年 9 月 30 日。
17 见美国国际开发署,“全球脆弱性与气候风险交汇”，2018 年 9 月，第 11-13 页。
18 非洲联盟委员会,“2016-2020 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非盟委员会，和平与安全司:亚的斯亚贝巴，2015 年 12 月)，第 20-21 页。

19《经济学家》,“萨赫勒地区的饥荒越来越频繁”，2018 年 10 月 25 日。关于水资源短缺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见贝萨达·H 和沃纳·K,“非洲水危机对粮食安全与管理影响评估”,《国际水资源开发杂志》，第 31 卷第 1 期(2015)，第 120-133 页。
20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774 次会议”，主题为“气候变化与非洲冲突的关系及其对安全的影响”，2018 年 5 月 29 日。
21 加奥·H,“论乍得湖萎缩的原因”,《环境研究快报》，第 6 卷 No.3 (2011)。
22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乍得湖盆地地区局势的报告,S/2017/764, 2017 年 9 月 7 日;安格尔布兰特·H,“博科圣地势力范围外的尼日利亚和乍得湖地区”，北欧非洲研究所政策说明 No.3:2017,2017 年 6 月。
23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乍得湖盆地紧急情况”，2018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乍得湖流域危机-粮食安全形势”应急响应协调中心/DG ECHO 每日地图，2018 年 12 月 19 日。
24 联合国新闻,“非洲乍得湖盆地:承诺提供超过 21 亿美元，以全面应对危机”，2018 年 9 月 4 日。
25 关于博科圣地的崛起和政府的回应，见霍根多恩·E·J,“为了帮助击败博科圣地，欧盟应该推动良好的治理和问责制”，国际反恐政策中心简报，2018 年 10 月;希基·S，艾伯特·C 和克拉克·M,“遥远的战争与博科圣地叛乱”，牛津研究小组公开简报，2018 年 1 月;泽恩·J,“妖魔化博科圣地:连绵不绝的非洲叛乱分析”，西点反恐中心，2018 年 5 月。
26 2017 年的博科圣地叛乱分子，见戴维斯(注 5)，第 95-96 页。
27 关于多国联合工作组，见范德利恩·J,“多边非和平行动”，SIPRI 年鉴 2018，第 141-42 页。
28 瓦兰·C,“扭转战争潮流:私营军事和安全公司对尼日利亚平息博科圣地叛乱的影响”,《非洲安全评论》第 27 卷第 2 期(2018)，第 144-57 页。
29 克拉布·G 和塔普利·M,“尼日利亚去激进化和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概念”,《第三世界季刊》，第 39 卷第 11 期(2018)，第 2053-68 页;阿莱·T,“尼日利亚东北部的遣返与和解挑战”，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2018 年 5 月 31 日;布雷琴马赫·S,“实现尼日利亚东北部和平:重新融入社会的挑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8 年 9 月 5 日。
30《经济学家》,“博科圣地正变得越来越极端”，2018 年 11 月 22 日。
3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加拿大分部,“博尔诺战火下的教育，尼日利亚”，2017 年 10 月 5 日。
32 麦克莱恩·R,“博科圣地组织将 100 多名上月被绑架的女学生遣返回国”,《卫报》，2018 年 3 月 21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防止博科圣地绑架尼日利亚学生，非洲简报 No.137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4 月 12 日)。
33 大赦国际,“他们背叛了我们”:尼日利亚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妇女被博科圣地强奸、饥饿和拘留，2018 年。
34 波斯汀·R,“尼日利亚与伊斯兰国的军事斗争:第一部分——袭击激增”,《国防邮报》，2019 年 1 月 15 日。
35《卫报》,“伊斯兰武装分子在袭击基地时杀死了多达 30 名尼日利亚士兵”;2018 年 9 月 9 日;《卫报》,“尼日利亚军方称博科圣地袭击后“恢复正常”，2018 年 9 月 9 日。
36 麦克莱恩·R,“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发动一系列袭击”,《卫报》，2018 年 12 月 28 日。
37 半岛电视台,“博科圣地在乍得杀害 18 人，绑架 10 人”，2018 年 7 月 22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喀麦隆偏远的北部地区:打击博科圣地翻开新篇章，非洲报道 No.263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8 月 14 日)。
38 博蒙特·P 和亚伯拉罕·I,“石油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超越印度，成为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卫报》，2018 年 7 月 16 日。
39 关于尼日利亚军队的人权记录,见佩鲁斯·德·蒙克洛·M,“尼日利亚军队的杀戮场:吸取了什么教训?”,《非洲安全》，第 11 卷第 2 期(2018)，第 110-126 页。
40 欧洲庇护支援办公室，原产国信息报告-尼日利亚，针对个人(欧洲庇护支援办公室:马耳他，2018 年 11 月)。
41《经济学家》,“尼日利亚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2018 年 6 月 7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制止尼日利亚不断升级的农牧民暴力”，非洲报告 No.262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7 月 26 日)。关于牧民的好战性，见奥科利·A·C 和奥加伊·C·O,“尼日利亚牧民的战斗和人道主义危机:理论简报”,《非洲安全评论》第 27 卷第 2 期(2018)，第 129-143 页。
42 国际危机组织(注 41)。
43 胡图·亚哈亚·H，尤素福·V·A 和布哈里·S,“耕牛的殖民地:联邦政府计划如何结束农牧民冲突”,《每日信报》，2018 年 1 月 28 日;阿莱·Y,“联邦政府将在 10 个州建设 94 个牧场”,《国民报》，2018 年 6 月 20 日。
44《经济学家》,“一个神秘的什叶派组织让尼日利亚感到担忧”，2018 年 11 月 15 日;麦克莱恩·R,“尼日利亚士兵射杀数十名非暴力什叶派抗议者”,《卫报》，2018 年 11 月 1 日;半岛电视台,“身份不明的枪手在尼日利亚赞法拉州杀死 17 人”，2018 年 12 月 24 日。
45 国际危机组织(ICG),“尼日利亚 2019 年大选:六个国家在观望”，非洲报道 No.268(ICG:布鲁塞尔，2018 年 12 月 21 日)。
46 伊亚雷·T 和埃松巴·F,“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分离主义运动势头强劲”,《纽约时报》，2017 年 10 月 8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喀麦隆的英语母语危机已到了最后关口”，非洲报告 No.250 (ICG:布鲁塞尔，2017 年 8 月 2 日)。

47 松戈·P，“这是一场种族灭绝”:战火肆虐的喀麦隆，村庄被烧毁，《卫报》，2018 年 5 月 30 日。国际危机组织，“2019 年非盟 8 大目标”，2018 年 2 月 6 日。
48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2019 年人道主义应对计划: 喀麦隆(摘要)，2019 年 1 月。
49 《经济学家》，“非洲最年长的总统正在喀麦隆竞选连任”，2018 年 11 月 5 日；国际危机组织“喀麦隆分裂选举后不确定性加剧”，2018 年 11 月 5 日。
50 尼日利亚新闻 24 网站，“喀麦隆议会选举延期”，2018 年 7 月 3 日。
51 国际危机组织，“喀麦隆:筹备召开的英语国家大会应得到国内国际支持”，2018 年 9 月 17 日;《喀麦隆日报》，“安巴佐尼亚战争:喀麦隆错失了摆脱英语国家危机的黄金机会”，2018 年 11 月 23 日。
52 沃尔特·O·J,“撒哈拉萨赫勒地区战争与冲突”，《西非国家报》第 10 期(OECD 出版:巴黎,2017)。
5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与指标，2018 年最新统计，2018 年，表 1;世界粮食计划署，“随着萨赫勒地区数百万人粮食安全状况加剧，联合国粮食机构负责人承诺加倍努力减少贫困和饥饿”，新闻发布，2018 年 8 月 17 日。
54 关于萨赫勒和平行动，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博厄斯·M,“萨赫勒对手的优先事项-在安全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北欧非洲研究所，政策说明 No.3，2018 年 4 月 19 日。
55 美国之音，“萨赫勒地区 G5 部队与资金协调斗争”，2018 年 6 月 25 日；戈尔曼·Z 和肖扎尔·G，在萨赫勒地区建立区域安全体系结构，SIPRI 评注，2018 年 6 月 25 日; 鲁布辛·N,“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对恐怖主义的适当反应？”，非洲争议建设性解决中心，2018 年 9 月 18 日。
56 恩塞比亚· H 和韦斯·C，“安萨鲁尔伊斯兰与布基纳法索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叛乱”，《反恐哨兵报》，第 11 卷第 3 期(2018 年 3 月)，第 21-26 页。关于布基纳法索的深入研究，见哈格伯格·S，“一切都是物是人非:《新布基纳法索》中政治实践与民主文化的人类学视角”，乌普萨拉非洲研究论文第 1 期，乌普萨拉大学，2018。
57《经济学家》，“布基纳法索，西非的关键国家，正在输掉反恐战争”，2018 年 12 月 13 日。
58 德帕涅·R,“布基纳法索圣战暴力升级令人担忧”，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3 月 5 日;哈格伯格·S，“脆弱的安全关系还是致命的关系?”，松田博客，2018 年 3 月 23 日。
59《非洲时报》，“布基纳法索宣布 6 个省进入紧急状态”，2018 年 12 月 31 日。
60《人权观察》，“白天我们害怕军队，晚上我们害怕圣战分子”:布基纳法索伊斯兰武装分子和安全部队的暴行”，2018 年 5 月。
61 凯利·F，“帕玛附近的罢工的报道浮出水面，法航在布基纳法索的行动被坐实”，
《国防邮报》，2018 年 10 月 9 日。
62 德特西埃·S，“萨赫勒冲突站在十字路口:尼日尔动荡、恐怖主义和武器贩运”，《小型武器调查》，2018 年 1 月。
63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今年尼日尔西部 5 万多人因暴力流离失所”，2018 年 12 月 13 日。
64 凯利·F，“法尼联合空袭和地面行动在通戈附近击毙 15 名“恐怖分子”，《国防邮报》，2018 年 12 月 30 日；路透社，“美国证实在尼日尔部署武装无人机”，2018 年 7 月 30 日。
65 关于马里冲突的演变和复杂性，见达尔桑托·E 和范德·海德·E·J，“地区冲突的复杂性不断升级:将地缘政治与马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非洲安全》，第 11 卷第 3 期(2018)，第 274-291 页;思肯斯·E，“马里和平进程实施:建设和平的复杂案例”，SIPRI 年鉴 2016，第 155-188 页。
66 托比·A,“马里中部:暴力、当地视角和不同的叙述”，SIPRI 和平与安全观点 No.2017/5,2017 年 12 月。
67 MINUSMA 的作用，也见本卷第 3 章第 1 节和第 2 节。
68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马里局势的报告，S/2017/1105, 2017 年 12 月 26 日，第 2 页。
69 关于马里 2017 年局势进展，见戴维斯(注 5)，第 92-94 页。和平进程进展，见思肯斯(注 65)。
70 《经济学家》信息部，“联合国-法国军事基地多次遭受圣战袭击”，2018 年 4 月 25 日;《卫报》，“马里地区反恐基地遇袭，至少 6 人死亡”，2018 年 6 月 29 日。
71《人权观察》，“我们曾经是兄弟”:马里中部自卫组织滥用职权，2018 年 12 月。
72 易卜拉欣·I·Y 和萨帕塔·M，“危险地区:预防马里大屠杀”，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预警国家报告，2018 年 4 月;国际危机组织 (ICG)，“马里北部毒品走私、暴力和政治”，非洲报告 No.267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12 月 13 日)。
73 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安理会第 2374(2017)号决议设立的马里问题专家小组最终报告，S/2018/581, 2018 年 8 月 9 日，第 42 页。
74 欧洲委员会，“欧洲公民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马里”，2019 年 3 月 10 日。
75 联合国(注 73)，第 37 页。另见路透社，“马里称，在发现乱葬岗后，一些士兵牵涉其中”，2018 年 6 月 20 日。
76 联合国安理会，马里问题专家小组中期报告，S/ 209 /137，2019 年 2 月 21 日，第 20-22 页。
77 半岛电视台，“马里: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赢得总统连任”，2018 年 8 月 16 日。
78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马里局势的报告，S/2018/1174, 2018 年 12 月 28 日。
79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3(2018)号决议，S/RES/2423(2018)号决议，2018 年 6 月 28 日。
80 联合国(注 78)。
81 MINUSCA，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
82[中非共和国 82 和平政治协议]，博客文章，2017 年 6 月 19 日(法语)。

83 2017 年 CAR 局势进展，见戴维斯(注 5)，第 87-88 页。
84 扎诺雷利·G，“中非共和国班吉暴力冲突”，武装冲突定位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 2018 年 5 月 16 日。
85《人权观察》，“中非共和国:反政府武装杀害平民”，2018 年 10 月 12 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中非共和国危害平民和人道主义人员事件不断上升”，2018 年 8 月 6 日。
8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安全威胁下工作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人道主义救援:中非共和国” No.41(2019 年 1 月)。
87 维诺格拉德·C，“非洲中部一场争夺影响力的新战役，俄罗斯似乎就要赢了”，《华盛顿邮报》，2018 年 5 月 31 日。
88 普利彻塔·M，“法国和俄罗斯在中非共和国战火纷飞的时候却袖手旁观”，《世界政治评论》，2018 年 11 月 28 日;国际危机组织评论，“中非共和国:从谈判走向和平”，2019 年 1 月 28 日。
89 见本卷第 10 章第 2 节;凯利 F，“中非共和国接受中美军车”，《国防邮报》，2018 年 10 月 19 日；路透社，“俄罗斯将向中非共和国派遣更多军事训练人员和装备”，2018 年 11 月 2 日；《青年非洲》，“中非共和国:法国 2400 万欧元的援助和武器”，2018 年 11 月 2 日。
90 拉特克利夫·R，“杀戮、虐待、令人难以置信的性暴力”:对 CAR 全面战争的恐惧与日俱增”，《卫报》，2018 年 11 月 16 日。
91 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和平行动，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
92 刚果独立国家选举委员会，[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选举日程安排的决定 065/CENI/BUR/17，2017 年 11 月 5 日（法语）。2017 年民主刚果最新进展，见戴维斯（注 5），第 89-91 页。
93 紧急电信集群(ETC)、“刚果民主共和国(DRC) -冲突”，ETC 情况报告 No.1，报告期 20/11/17 至 29/11/17。
94《经济学家》，“血腥的刚果战争，可能又要重燃”，2018 年 2 月 15 日;伯克·J，“战争永远不会停止”——数百万人在刚果分崩离析之际逃离流血冲突，《卫报》，2018 年 4 月 3 日。
95UNICEF，“卡赛:儿童危机——应对民主刚果冲突的影响”，儿童预警，2018 年 5 月。
96 伯克·J，“DRC 消极面对援助会议，称危机言过其实”，《卫报》，2018 年 4 月 13 日。
97 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埃博拉:刚果民主共和国”，CRS 视点，2018 年 10 月 4 日。
98 《经济学家》，“努力为刚果叛军控制地区提供埃博拉疫苗”，2018 年 11 月 29 日。
99 《纽约时报》，“8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刚果埃博拉疫情爆发地区遇难”，2018 年 11 月 15 日。
100 《经济学家》，“总统将变成傀儡”，2018 年 12 月 13 日;霍贝克·H，“卡比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选举扑克中摊牌”，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8 月 16 日。
101 国际危机组织(ICG)，刚果民主共和国:曼巴地震，《非洲简报》No.140 (ICG:布鲁塞尔，2018 年 6 月 15 日);伯克·J，“刚果人民虽然担心选举舞弊，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投票站”，《卫报》，2018 年 12 月 30 日。
102 国际危机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选举:推翻一个危险的决定”，声明，2018 年 12 月 28 日。
103 伯克·J，“刚果选举亚军将齐塞克迪的胜利斥为“选举政变””，《卫报》，2019 年 1 月 10 日。
104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OCHA)，“关于 OCHA DRC”。
105 见戴维斯(注 5)，第 91-92 页。
106 半岛电视台，“埃塞俄比亚总理辞职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2018 年 2 月 16 日。
107 葛布瑞丹·S，“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宣布战争结束”，《纽约时报》，2018 年 7 月 9 日。
108 菲克·M 和康威尔·A，“为创造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平局面，阿联酋伸出援手”，路透社，2018 年 8 月 8 日。
109 BBC 新闻，2018 年 9 月 11 日，“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境 20 年后重新开放”，2018 年 11 月 14 日。
110 BBC 新闻，“联合国解除对厄立特里亚制裁，厄立特里亚局面取得突破”，2018 年 11 月 14 日。
111 马绍·A，“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埃塞俄比亚将从厄立特里亚边境撤军”，路透社，2018 年 12 月 14 日。
112 沙班·A·R·A，“埃塞俄比亚前叛军组织金波特 7 号从厄立特里亚基地撤退”，《非洲新闻》，2018 年 9 月 3 日;沙班·A·R·A，“与七国集团一样，埃塞俄比亚政府欢迎奥罗莫解放阵线返回家园”，《非洲新闻》，2018 年 9 月 16 日。
113 马绍·A，“埃塞俄比亚与来自天然气丰富地区的叛军签署和平协议”，路透社，2018 年 10 月 21 日报道。
114 沙班·A·R·A，“前奥加登叛军领导人从厄立特里亚返回埃塞俄比亚”，《非洲新闻》，2018 年 12 月 1 日。
115 法新社，“随着埃塞俄比亚改革推进，种族暴力蔓延”，《东非》，2018 年 10 月 25 日。
116 艾哈迈德·H 和戈尔茨坦·J，“种族暴力导致埃塞俄比亚数千人被捕”，《纽约时报》，2018 年 9 月 24 日。
117 路透社，“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将其推上权位的年轻人”，《东非》，2018 年 11 月 2 日。
118 非洲开发银行集团，“埃塞俄比亚经济展望”。
119 穆勒·T，“与埃塞俄比亚的和平会给厄立特里亚带来政治开放吗?”，《世界政治评论》，2019 年 2 月 19 日。
120UN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索马里”，实况报道，2019 年 1 月 1 日至 31 日;挪威难民委员会，“2018 年共有 32 万索马里人因冲突和动荡逃离家园”，新闻发布，2019 年 2 月 28 日。
12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监测冲突局势国家粮食安全:FAO/WFP 联合向联

合国安理会提交的最新情况”，2019 年 1 月，第 16-18 页。
122 美国之音“官员:索马里准备对青年党发动大规模进攻”，2017 年 10 月 26 日。
123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索马里问题报告，S/2018/411，2018 年 5 月 2 日。
124 联合国驻索马里支助办事处，“索马里召开高级别安全会议审议安全过渡计划”，2017 年 12 月 4 日;联合国驻索马里支助办事处，“索马里问题伦敦会议公报”，2017 年 5 月 11 日。
125“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2431(2018)号决议，安理会延长非盟索马里特派团任务期限，授权削减驻索马里部队”，2018 年 7 月 30 日。
126 奥卢什·F，“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准备撤离”，《东非》，2018 年 11 月 12 日。
127 欧盟委员会，“国际社会加强对索马里稳定与发展计划的支持”，新闻发布，2018 年 7 月 17 日。
128 欧洲对外行动署，“索马里稳定与发展计划:国际社会加强支持”，2019 年 7 月 19 日。
129 沙班·A·R·A，“美国宣布对索马里投资超过 9 亿美元”，《非洲新闻》，2018 年 12 月 19 日;欧洲委员会(注 127)。
130 戈德鲍姆·C，“特朗普式反恐战争愈演愈烈”，《大西洋月刊》，2018 年 9 月。
131 戈德鲍姆·C，“大规模军事基地建设表明，美国在索马里的影子战争只会愈演愈烈”，Vice 新闻，2018 年 5 月 3 日。
132 斯佩贝尔·A，“美军的轰炸正把索马里人赶出家园”，《外交政策》，2019 年 3 月 7 日。
133 斯佩贝尔·A，“美军在索马里秘密空袭行动内幕”，《民族周刊》，2019 年 2 月 7 日。
134 马特菲斯·H，“不是一声呜咽，而是一声巨响:青年党卷土重来以及国际社会对叛军的打击”，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2019 年 1 月 27 日。
135 伯克·J，“美国空袭未能削弱青年党对索马里的控制”，《卫报》，2018 年 11 月 11 日。
136 帕夫利克·M，“反扑:青年党仍然是一个严重威胁”，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ACLED)， 2019 年 2 月 11 日。
137 哈桑·M·O，“索马里青年党向亲伊斯兰国组织宣战”，《美国之音》，2018 年 12 月 21 日。
138 谢赫·A，“索马里解散阿联酋资助和培训数百名士兵的项目”，路透社，2018 年 4 月 11 日。
139 国际危机组织(ICG)，“索马里和海湾危机”，非洲报告 No.260(ICG:布鲁塞尔,2018 年 6 月 5 日)。
140 比沃·E，“索马里正在沦为阿联酋和卡塔尔争夺影响力的代理人战争中的一枚棋子”，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竞争，见本章第 5 节。
141 哈桑·A，“数十人在索马里两个地区的土地争端冲突中丧生”，路透社，2018 年 5 月 25 日。
142 哈桑·A，“逾 50 人在索马里分裂地区部族冲突中丧生”，路透社，2018 年 10 月 23 日。
143 莱德尔·E，“联合国警告索马里政治团结面临危险”，美联社，2018 年 6 月 7 日。
144 哈桑·M·O，“索马里地区政府暂停与联邦政府的联系”，《美国之音》，2018 年 9 月 8 日。
145 国际危机组织，“索马里西南部政府:新总统上任，危机重重”，评论，2018 年 12 月 24 日。
146 法国 24 电视台，“索马里驱逐联合国高级特使罗博，招致批评”，2019 年 1 月 2 日。
147 谢赫·A，“索马里命令联合国高级官员离开”，路透社，2019 年 1 月 2 日。
148 目前联合国在南苏丹的和平行动，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
149 国际危机组织(ICG)，痛苦的工具(3):南苏丹冲突和饥荒，非洲简报 No.124 (ICG:布鲁塞尔，2017 年 4 月 26 日)。关于领土、边界和身份在冲突中的作用，见贾斯廷·P·H 和德弗里斯·L，“管理不明确的界线:地方边界是南苏丹冲突的(再)来源”，《边界研究杂志》，第 34 卷第 1 期(2019)，第 31-46 页。关于南苏丹少数民族聚居区费尔提特，见乌尤斯克·S，“认同与自决:南苏丹的强烈反对”，《轻武器调查简报》，2018 年 12 月。
150 路透社，“南苏丹基尔宣布单方面停火，释放囚犯”，2017 年 5 月 22 日。政府间发展管理局详情，见本卷附件 B 第 2 节。
151 马绍·A，“南苏丹政府，叛军组织签署停火协议”，路透社，2017 年 12 月 21 日。关于 2017 年南苏丹局势，见戴维斯(注 5)，第 99-100 页。
152 博蒙特·P，“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诞生于残暴，却在谋杀、强奸和纵火中溺亡”，《卫报》，2018 年 6 月 24 日。
153 人权观察，“南苏丹:交战各方违背了对儿童兵的承诺”，2018 年 2 月 5 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南苏丹本提乌局势的声明”，2018 年 12 月 3 日。
154 凯基·F，“南苏丹危机死亡率估计，2013 年 12 月- 2018 年 4 月:统计分析”，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2018 年 9 月;“南苏丹内战:估计近 40 万人死亡”，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CRS) 观察;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数据导出工具”。
155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南苏丹局势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31 日”。
15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南苏丹:人道主义快照”，2018 年 8 月。
157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南苏丹武器限制声明》，新闻发布，2018 年 2 月 2 日。关于联合国武器禁运，见本卷第 10 章第 2 节。
158 温布努·C·H，“南苏丹国家对话倡议:评估进展和陷阱”，非洲建设性解决争端中心;南苏丹国家对话网站，<https: www.ssnationaldialogue.org>。
159 国际危机组织，“非洲峰会推动南苏丹和平前景”，峰会联合声明，2018 年 6 月 30 日;《经济学家》，“南苏丹停火很少能持续”，2018 年 7 月 5 日。

160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复兴协定”,2018 年 9 月 12 日。另见温布努·C·H,“通过《振兴和平协定》恢复南苏丹和平：了解促成因素和可能的障碍”，非洲建设性解决争议中心，2019 年 2 月 11 日。
161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南苏丹问题的报告(2018 年 9 月 2 日至 11 月 30 日)，S/2018/1103, 2018 年 12 月 10 日。
162 韦斯滕多夫·J·K,“政治舞台上的和平谈判:妇女在苏丹-南苏丹和平进程中被排斥在外的影响”,《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第 72 卷第 5 期(2018)，第 433-454 页。
163《经济学家》,“南苏丹邻国洗劫内战胜利果实”，2018 年 12 月 13 日。
164 博斯韦尔·A,“南苏丹:纸面和平”，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12 月 14 日。
165 联合国(注 161);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南苏丹性暴力的声明”，SC/13611, 2018 年 12 月 7 日。
166 亨利·J,“苏丹最近对达尔富尔凸显出保护的必要性”,《人权观察》,2018 年 5 月 10 日;联合国安理会，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秘书长报告，S/2019/44, 2019 年 1 月 14 日。
167 路透社,“苏丹将与叛军停火延长至年底:声明”，2018 年 7 月 12 日。
168 法新社,“饱受战争蹂躏后，南苏丹总统斡旋苏丹和谈”,《东非》，2018 年 11 月 6 日。
169 武装冲突位置&事件数据项目(ACLED),“数据导出工具”。
170 泰勒·M,“动荡不堪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苏丹能否处理好民众对经济的不满情绪?”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8 年 2 月 23 日;国际危机组织(ICG),“改善苏丹和平过渡前景”,《非洲简报》No.143 (ICG:布鲁塞尔，2019 年 1 月 14 日)。
17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苏丹:人道主义快照”，2018 年 12 月 1 日;“苏丹:南苏丹难民潮应对，2018 年 11 月 1-30 日”，2018 年 12 月 20 日。

第三章.和平行动和冲突管理

概述

表面看，2018 年变化不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驻伊拉克特派团是唯一新成立的多边和平行动，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UNMIL）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驻莱索托王国预防特派团 (SAPMIL)两项和平任务终止。2018 年活跃多边和平行动数量为 60 项，创下 2013 年以来最低。UNMIL 的终止尤其值得关注，原因就是一项相对成功的大规模联合国和平行动样板。2018 年，多边和平行动人员数量变化不大，仅下降 0.8%，至 144791 人。这也是连续第三年人员部署下降。尽管下降趋势趋缓，尤其是近年来人员部署数量逐年下降，但这一趋势在 2018 年似乎已趋于平稳。

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涌动。2015 年 4 月，联合国维和人员接近 11.5 万人的峰值水平，但过去三年一直是大幅减少。2018 年的降幅相对较小，为 2.9%。联合国维和人员数量降至 95488 人，为 2009-18 年期间的最低水平。但是与此同时，在区域组织和联盟以及国家特设联盟主导的非联合国多边和平行动人员数量增加了 3.7%，达到 49303 人。人员增加大部分归功于北约对阿富汗坚决支持特派团(RSM)的增兵。此外，在 2018 年非洲和平行动人员部署总数连续第三年下降，这次下降了 1.9%，降至 5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共 104238 人。尽管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的 66%依旧部署在非洲，全球所有和平行动人员的 72%都部署在非洲，但是联合国远离非洲的趋势已然形成。

其主要原因在于围绕在联合国和平行动的负能量久久挥之不去，行动预算、人员伤亡以及人们对军事化手段解决方案的日渐推崇，不一而足。然而，随着联合国维和预算削减接近尾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开源节流尚未结束。预算从 2016-17 年的 79 亿美元削减至 2018-19 年的 67 亿美元，主要是因为本就已缩编的特派团也行将结束，而非采取新手段或是提高效率。然而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和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MONUSCO),如不再设立新的特派团，我们仍可预见进一步削减规模和预算。

2018 年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恶意杀戮致死人数较 2017 年大幅度减小。27 敌对冲突死亡人数不到 2017 年的一半，为 2012 年以来的最低值。然而，2017 年

是一个极端年份，人员部署数量也有所下降。2018 年敌对冲突死亡率回落至 2013-16 年水平。此外，令人担忧的是，虽然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MA)的情况明显改善，但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CA)和 MONUSCO 死亡人数依旧相对较多。

迷恋军事手段的倾向，部分责任应归咎于特朗普政府。2018 年伊始，人们越来越强调欧盟和北约的军事训练和指导，如 NMI 和 RSM 都是旨在提升地方部队自身能力，地方联盟基础为主体的多边非和平行动---如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JF-G5S）和打击博科圣地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MNJTF）。诚然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挑战，但训练国家军队以及建立多边非和平行动打击叛乱分子和恐怖分子是否有效，仍有待观察。目前，萨赫勒地区局势只能说是进一步恶化，JF-G5S 和 MNJTF 受到持续攻击，政府军深陷多起严重侵犯人权事件。而此时此刻，联合国还在继续醉心于“维和改革”。为落实克鲁兹关于减少敌对死亡报告精神，联合国秘书处已开始着手对旨在预防和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的行动进行战略审查，并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架构改革。秘书长和平行动（A4P）架构下，联合国成员国、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形成合力，最终就平民保护、安全保障、任务表现及问责制等议题发表“共同承诺宣言”。虽然联合国秘书处正强力推进改革，以保持联合国和平行动相关性，但培训和指导特派团以及多边非和平行动领域面临重重挑战。现在，还不清楚联合国和平行动将走向何方，也不能肯定其他类型特派团是否将成为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和平安全的重要工具。

第 1 节.和平行动全球趋势和发展

蒂莫·斯密特

2018 多边和平行动

2018 年，联合国、区域组织和联盟以及各国特设联盟共开展 60 项多边和平行动（见图 3.1）。[1]较上年减少 3 次，是 2013 年以来多边和平行动最少的一年。就行动启动和行动终止而言，2018 年波澜不惊。2018 年活跃的 60 项行动中，1 项为新行动，2 项于年内终止（见下文）。相比之下，2017 年共有 5 项新行动，4

项在年内终止部署。[2]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驻伊拉克特派团（NMI）为 2018 年唯一新多边和平行动。NATO 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正式启动 NMI。[3] 当时计划，NMI 最初规模为 580 人，并于 2019 年 4 月形成完全作战能力。[4] 然而，2018 年随后的日子里，NATO 并未公布 NMI 部署的任何更多细节，因而也就无法在年底核实其最终实力。2018 年结束的两项和平行动为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UNMIL)和南非非洲共同体(SADC)莱索托王国预防特派团(SAPMIL)。2018 年 3 月大幕落下之时，UNMIL 已活跃整整 15 年，而 SSAPMIL 部署还不到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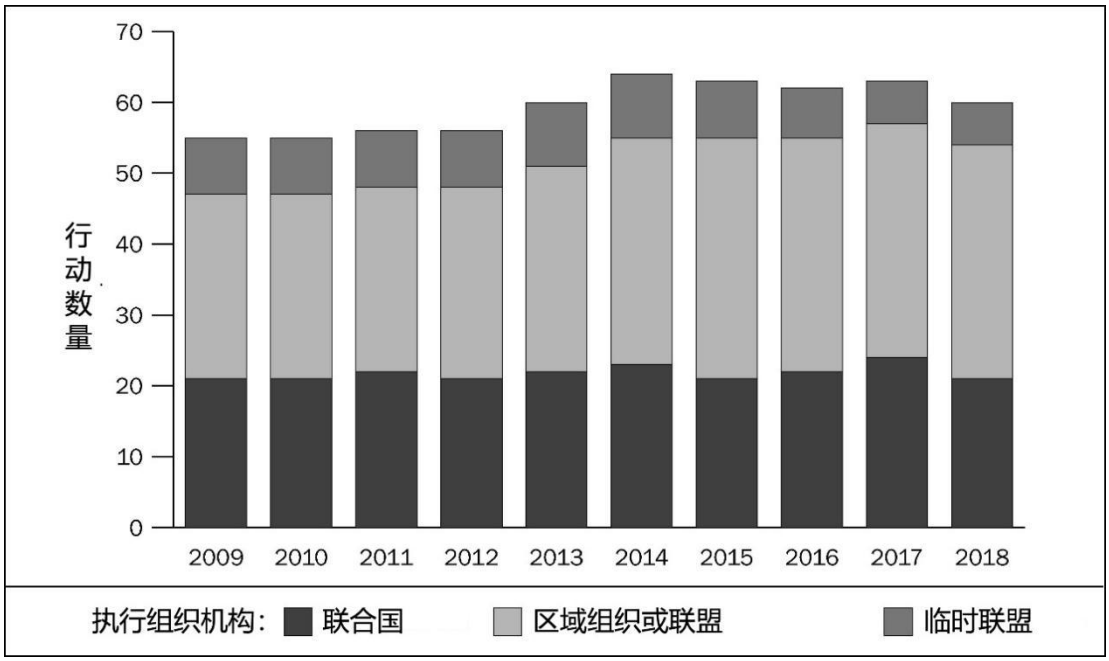


图 3.1　执行组织机构分列多边和平行动数量，2009-18 年

多边和平行动组织主体

2018 年，联合国共主导 21 项多边和平行动。[5]较上年减少 3 项，2017 年间，联合国共终止 3 项和平行动。[6]2018 年，联合国和平行动---UNMIL 结束部署。2003 年，第二次利比亚内战和谈甫一结束，UNMIL 就即刻进驻。UNMIL 的撤离也标志着联合国在包括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在内的西非沿海地区维持和平行动告一段落。这些国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都是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派遣主力军。2018 年，联合国并未展开新的和平行动，不过 2018 年 12 月联合国向也门派出了一支“先遣队”。安理会依照荷台达协议（UNMHA），于 2019 年 1 月组建先遣队。

2018 年，区域组织及联盟共主导 33 次多边和平行动，这一数字和上年完全相同。属于此类的新行动是 NMI。由于太平洋岛屿论坛（PIF）主导的所罗门群岛区域援助团于 2017 年终止，区域和平行动数量并未增加。2018 年 12 月，欧盟决定扩大欧盟利比亚边境援助团（EUBAM 利比亚）任务范围，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和平行动。（此前只重点关注边境管理，故难言和平行动）但是，该决定和新授权直至 2019 年 1 月 1 日才生效。[7] 2018 年，共有 8 个区域组织及联盟执行多项行动，符合多边和平行动范围要求：（a）欧盟执行 12 项此类行动；（b）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9 项；（c）非盟 4 项，不含达尔富尔混合行动；（d）北约 3 项；（e）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2 项；（f）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GAD），美洲国家组织（OAS）和 SADC，各 1 项。

2018 年，特设国家联盟共开展 6 项多边和平行动。6 项行动均为 2017 年和平行动的同批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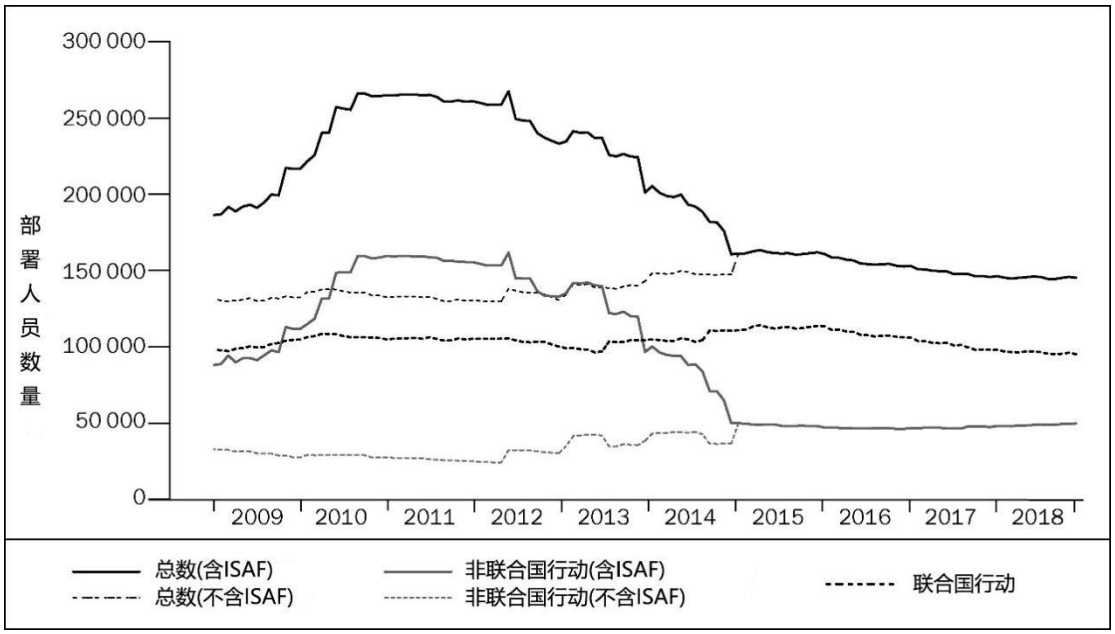


图 3.2　多边和平行动人员数量，2009-18 年

ISAF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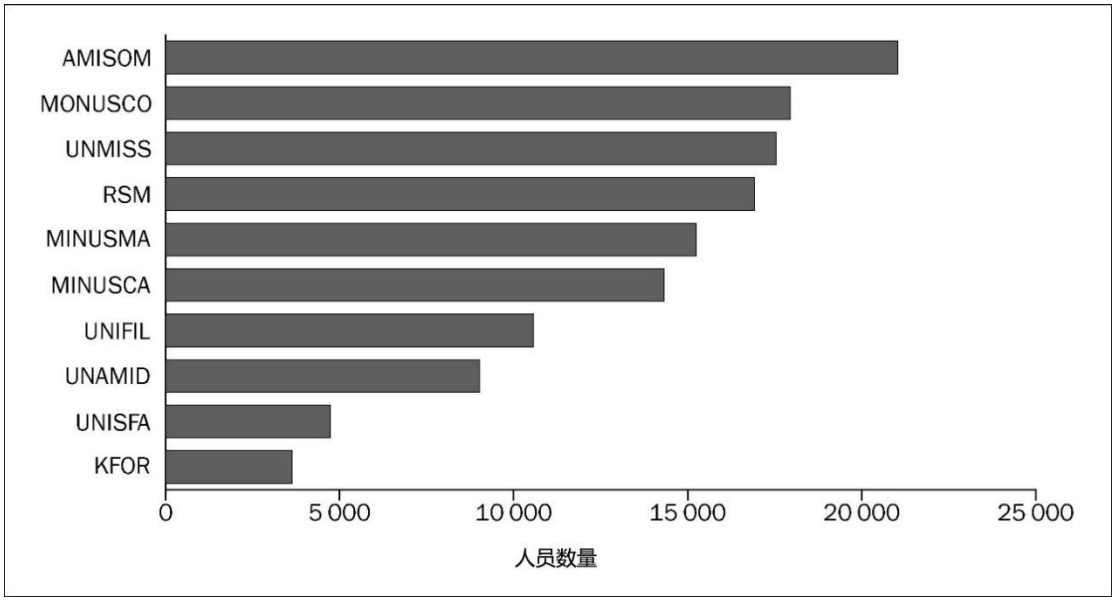


图 3.3 最大规模的多边和平行动，2018 年 12 月 31 日

AMISOM =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MONUSCO=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UNMISS=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RSM=坚定支持特派团；MINUSMA=联合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CA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UNIFIL=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AMID=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ISFA=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KFOR =驻科索沃部队。

多边和平行动人员

2018 年，所有多边和平行动人员构成均保持相对稳定，约为 14.5 万人（见图 3.2）。[8] 这也是 2009-18 期间最低的一年，然而，以北约主导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其峰值兵力超过 13 万人，在 2009-14 年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将 ISAF 划归统计之外，2018 年多变和平行动人员数量则略高于 2009-13 年。2018 年多变和平行动所有部署人员，约有三分之二为联合国主导行动。其余三分之一人员为区域组织及联盟或国家特设联盟行动。部署人员中，约有 86%名军事人员，8%警察，6%是国际文职人员。

2009-18 年人员部署趋势

2018 年，多边和平行动中人员总数波动不大。2018 年，人员总数小幅下降 0.8%，从 145911 人降至 144791 人。[9]这也是全球范围内连续第三年出现人员部署下降。然而，较 2017 年 4.5%的降幅（从 152 822 降至 145 911）和 2016 年的 5.7%（从 162107 降至 152822），这一降幅微不足道。连续三年下滑，究其原因是联合国减少了维和人员数量，特别是非洲维和人员数量（见第 2 节）。

2018 年，联合国主导的多边和平行动人员数量下降 2.9%，从 98354 人降至 95488 人，也因此降至 2009-18 年期间最低水平。2015 年 4 月，联合国维和人员达到近 11.5 人的峰值水平。2016 年至 2018 年间，联合国维和人员削减近 2 万人，主要是达尔富尔、民主刚果(DRC)和海地大幅度削减人员，同时还有联合国部队从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撤出。人员缩编，一方面是同自 2016 年以来联合国维和预算连年下滑密不可分，同时另一方面，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UNOCI）和 UNMIL 的分批撤出时间表本就早已确定。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MINUSTAH)、MONUSCO 和 UNAMID 缩编问题也都提前商定过。

非联合国主导的多边和平人员数量

2018 年，区域组织及联盟或国家特设联盟主导行动人员部署，增加了 3.7%，从 47557 人增至 49303 人。人员增长主要是因为北约增兵阿富汗坚决支持特派团（RSM)。SAPMIL 行动结束对非联合国主导多边和平行动人员数量影响甚微，因为其规模本就只有 250 人。自 2014 年 12 月 ISAF 行动结束以来，非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部署水平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维持在 4.5 万---5 万人。

最大规模多边和平行动

2018 年，10 大多边和平行动人员部署占据全部人员总数的 90%。10 大行动中，7 项为联合国维和行动，7 项部署在非洲国家。2018 年全年，10 大行动排名变化不大。UNAMID 年初为第 5 大，到了年底也还是第 8 大规模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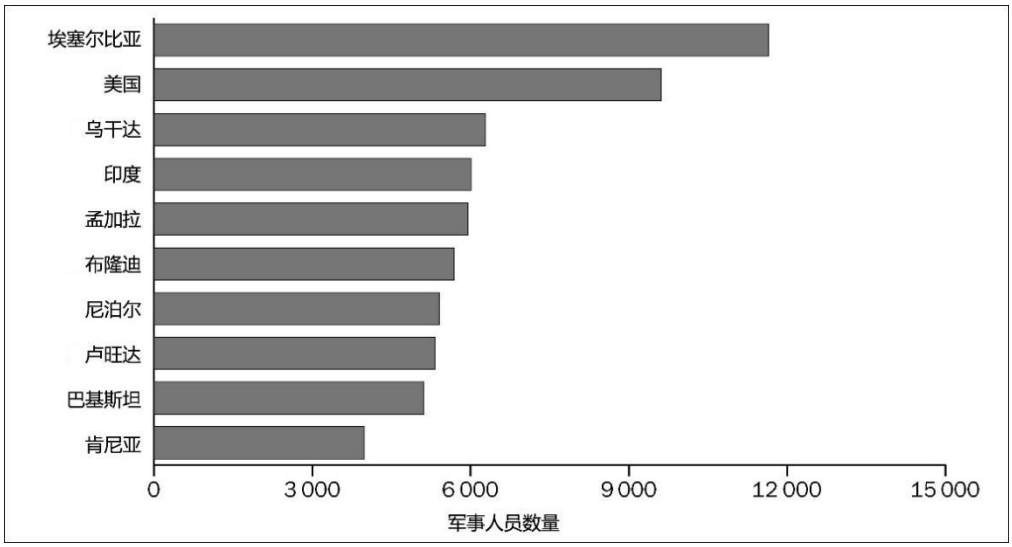


图 3.4 和平行动最大军事人员派遣国，2018 年 12 月 31 日

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AMISOM）为 2018 年第一大规模的多边和平行动（见图 3.3）。这也是唯一一项兵力超过 2 万人的和平行动；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共部署 20889 人。联合国安理会已授权在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将 AMISOM 军事人员削减 1000 人，但随后被推迟至 2019 年 2 月（见第 2 节）。AMISOM 为 2015 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多边和平行动。

除 AMISOM 外，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还有 6 项多边和平行动 1 万多人。2018 年初，UNAMID 部署 14 886 人，但至 12 月 31 日，兵力逐渐减少到 8971 人。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UNISFA）和北约领导的驻科索沃部队（KFOR）也位列 10 大和平行动之一，不过这两大和平行动 2018 年各自人员都不足 5000 人。

最大的部队派遣国

埃塞俄比亚仍然是 2018 年多边和平行动最大的部队派遣国(TCC)（见图 3.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埃塞俄比亚先后向多边和平行动派遣 11646 名军事人员。较 2017 年减少了 825 人，主要是由于 UNAMID 缩编。几乎所有埃塞俄比亚军事人员都被部署在 AMISOM,UNAMID,UNISFA 和 UNMISS。这些行动都是在埃塞俄比亚的邻国索马里、苏丹（达尔富尔和阿卜耶伊）和南苏丹展开。从 AMISOM 开始，埃塞俄比亚自 2014 年以来一直都是第一大 TC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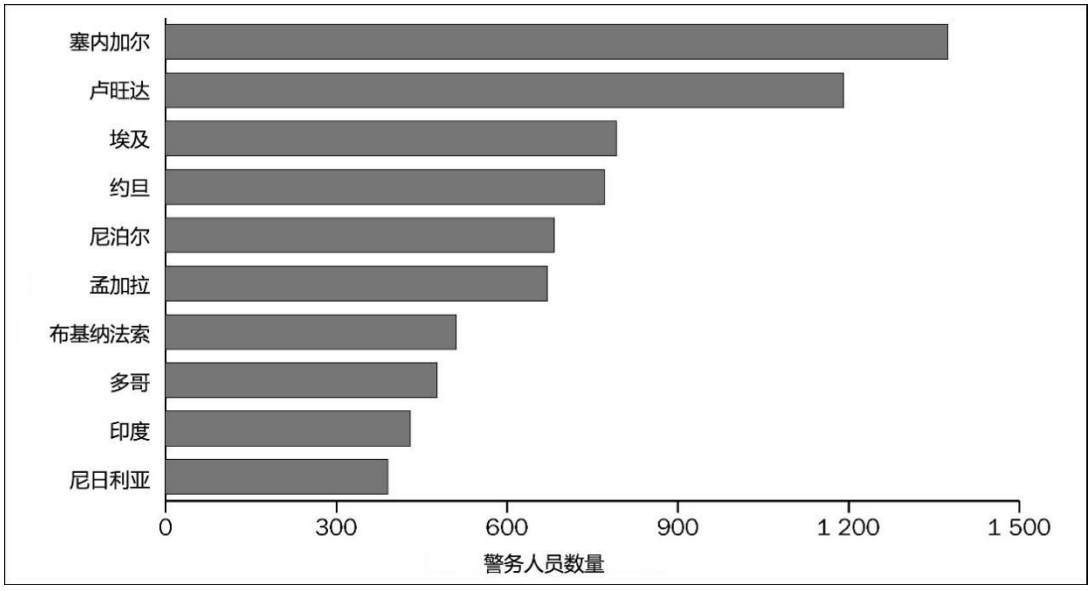


图 3.5 和平行动最大警务人员派遣国，2018 年 12 月 31 日

美国是 2018 年多变和平行动第二大 TCC，也是 10 大 TCC 中唯一的一个北半

球国家。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美国共派遣 9617 名军事人员，其中大部分部署在 RSM。2018 年，美国宣布计划撤回一半驻扎在阿富汗的军队（见第 2 节）。这也将影响其 TCC 位次。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除美国外，多边和平行动的 10 大 TCC 均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或南亚国家。布隆迪、肯尼亚和乌干达因 AMISOM 而位列 10 大 TCC 前列。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过去十年的派遣人数持续下降，但仍为联合国和平行动主要 TCC。相比之下，尼泊尔近年来加大了派遣力度，跻身 2018 年 10 大 TCC。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10 大 TCC 派遣总数占到多边和平行动所有军事人员数量半壁江山。

第一大警察派遣国

塞内加尔是 2018 年多边和平行动第一大警察派遣国(PCC)（见图 3.5）。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塞内加尔共向多边和平行动派遣了 1375 名警察。其中大多数部署在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团(MINUJUSTH)，MINUSCA，MINUSMA，MONUSCO，UNAMI 以及 ECOWAS 冈比亚特派团(ECOMIG)。自 2016 年 4 月起，塞内加尔就一直是第一大 PCC。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卢旺达这 4 个 10 大 TCC，同时也位列 10 大 PCC 国家。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多边和平行动中警察中，6 成来自 10 大 PCC 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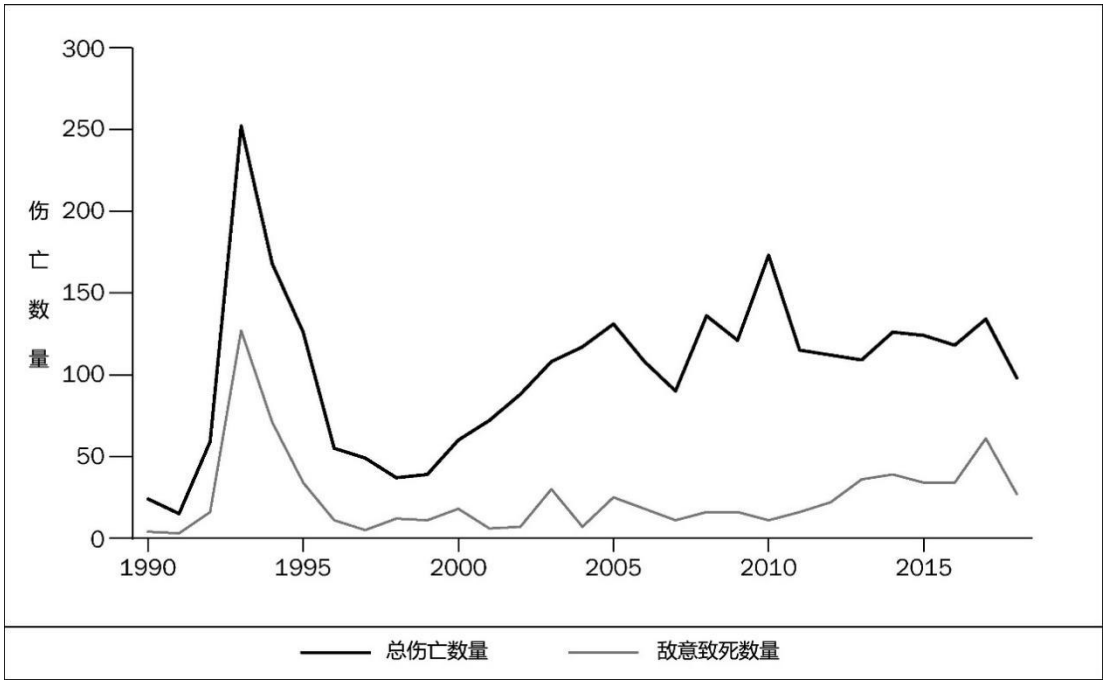


图 3.6　1990-2018 年联合国和平行动死亡数量

联合国和平行动死亡人数

2018 年，联合国内部展开激烈辩论，议题为关于加强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报告的调查结果和建议。[10] 报告于 2017 年 12 月完成，并于 2018 年 1 月正式发表，是对暴力行为造成联合国维和人员伤亡进行独立高级审查的结果。报告审查由退休中将卡洛斯·阿尔贝托·多斯桑托斯·克鲁兹（巴西）领导，这一报告也被人们称为克鲁兹报告。[11]

克鲁兹报告中的一些报告存在争议，并非普遍接受。[12] 比如，报告表示“敌对势力不理解武力以外的语言”，并呼吁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对联合国维和核心原则（各方一致同意的公正性以及只会在自卫情况下采取武力措施）采取更为灵活的诠释，在高风险任务环境中，允许主动使用或先发制人采取“压倒性武力”。[13]

2018 年 1 月，联合国秘书处就落实克鲁兹报告提交首份行动计划，并于 2018 年 4 月提交修订版。该行动计划就当前最受威胁的 4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MONUSCO, MINUSCA, MINUSMA, UNMISS 和 UNAMID——列出相应应对措施。有些已被采纳或即将实施，目的就是减少人员伤亡。[14]

死亡人数趋势

联合国称之为“恶意行为”（敌意致死）导致的联合国维和人员死亡人数在最近几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见图 3.6），2018 年 1 月发布的克鲁兹报告十分及时。事实上，2013—17 年间，联合国和平行动每年遭受的敌意死亡比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多。近年来，约半数敌意致死来自 MINUSMA--2013 年 7 月以来一直活跃在马里。驻马里联合国维和人员经常遭到武装组织、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的袭击，其手段之残忍，让人觉得这更像是一个需要平息叛乱的国度，而非只是需要维持和平。迫击炮密集轰炸、简易爆炸装置(IED)和车载 IED 以及层出不穷的自杀式袭击。[15]

2017 年，联合国维和人员敌意致死人数显著增加，共有 59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死于暴力行为。除一人外，所有人都是在 MINUSCA, MINUSMA 或 MONUSCO 被害。2017 年 12 月，15 名坦桑尼亚 驻 MONUSCO 人员在 DRC 基伍省营地遇袭身亡。[16] 这是 1993 年 6 月 22 名巴基斯坦士兵在摩加迪沙被武装分子打死以来，联合国维和

人员遭受的最为致命袭击。[17]2018 年 1 月，联合国启动特别调查，发现民主力量联盟（ADF）叛乱组织可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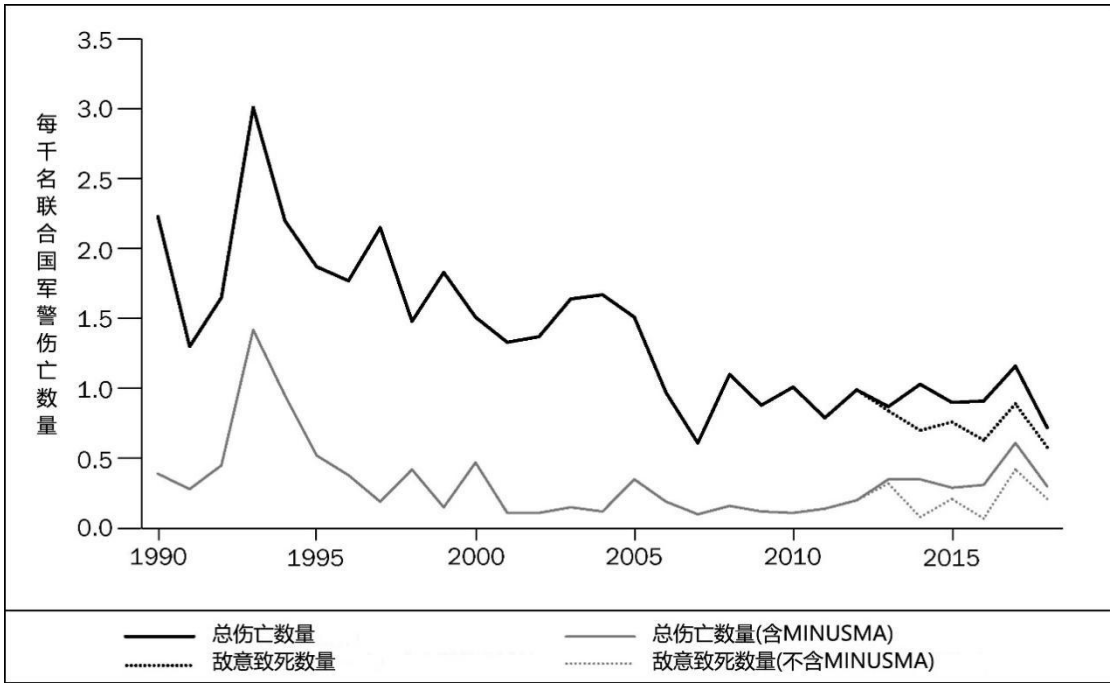


图 3.7　1990-2018 年联合国和平行动中军警人员死亡率

MINUSMA=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2018 年敌意致死人数出现下降。联合国维和行动共发生 27 起敌意致死时间，不及 2017 年一般，为 2012 年以来死亡人数最低的一年。敌对死亡人数下降。联合国维和行动共发生 27 起敌对死亡事件，不到 2017 年的一半，是 2012 年以来单年死亡人数最低的一次。阵亡的 27 名军事人员来自 MINUSCA（7 人死亡）、MINUSMA（11 人死亡，2013 年以来的最少死亡人数）、MONUSCO（8 人死亡）和 UNMISS（1 人死亡）。MONUSCO 共有 8 名军事人员阵亡，其中 7 位死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联合刚果政府军对北基伍 ADF 的联合军事行动中。[19]2018 年敌意致死的 27 名军事人员，其中 20 名来自非洲国家，7 名来自南亚国家。[20]

年死亡率趋势

2013-18 年间，每 1000 名军警人员（即军事人员和警察）的敌意致死率高于 2001 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见图 3.7）。然而，与上世纪 90 年代相比，高死亡率也并未达到畸高的程度。2013-18 年区间，如果将 MINUSMA 剔除统计，情况就会大不一样。MINUSMA 敌意致死人数占到总数一半，但这些年军事人员只占所

有部署人员的 10%-15%。如果不是 MINUSMA，2013-18 年敌意致死率将大大降低。事实上，如没有这一任务，2014 年的年死亡率将低至 0.08‰，2016 年为 0.07‰，这将是整个 1990-2018 年期间敌意致死最低年死亡率。这也意味着，从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部署数量来看，近年来，联合国所有其他维和行动敌意致死人数都相当低。

然而，2017 年的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敌意致死人数急剧增加。MINUSCA 和 MONUSCO 一样，一年间遭受了大量的敌意致死。由于 2017 年在联合国各和平行动中军警人员数量普遍较少，因此 2017 年年度敌意致死率增速更为惊人（从 2016 年的 0.31‰飙升至 2017 年的 0.61‰）。

2018 年，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军警死亡率远低于 2017 年。所有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敌意致死率为每 1000 人 0.3 人，剔除 MINUSMA 后，降至每 1000 人 0.21 人。虽然情况较上年显著好转，但由于 2017 年相当极端，因此 2017 年并非一个好的对标参照。事实上，2018 年，无论是否将 MINUSMA 纳入统计口径，都同 2013-16 年水平类似。

维持和平行动倡议

2018 年 3 月 28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联合国维和行动举行高级别辩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一项新倡议，即维和行动（A4P）。古特雷斯呼吁在集体参与实现“重大飞跃”，以便联合国维持和平适应现代和平行动角色的变换以及适应挑战日渐增大的环境。[21] 在克鲁兹报告和 2015 联合国和平行动高级别独立小组最终报告成果基础之上，古特雷斯认为，集体参与应侧重于现实的期望和任务、任务执行更为坚决、更为安全，对政治解决方案基于更大支持以及确保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结构合理、 装备齐备、训练有素。[22]

安理会辩论中，秘书长指出，联合国秘书处已为实现上述目标采取了重要步骤。古特雷斯特别提到克鲁兹报告各项建议的初步执行情况，如业绩问责措施、联合国维和行动战略审查、2017 年性剥削和性虐待预防及应对策略，以及旨在提升联合国和平安全框架效率的改革措施。改革措施在 2018 年 7 月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23]

在发起 A4P 倡议时，秘书长请联合国成员国及其他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如区域组织，做出承诺，致力改进联合国维和行动。2018 年夏，联合国成员国及相

关国际组织进行了广泛磋商，最终形成“共同承诺宣言”。《宣言》包括 24 项原则和承诺，重点是提升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治影响、加强平民保护、强化安全保障、加强业绩和业绩问责、应对维和冲击、提升伙伴关系和专业素养。[24] 2018 年 9 月 25 日，秘书长大会第 73 次会议期间，就 A4P 举行了一次高级别会议。《共同承诺宣言》已得到 146 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其中包括所有主要的 TCC 和 PCC 国家、众多行动进驻国和安理会所有成员国。[25]

1 利用 SIPRI 收集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和平行动趋势。根据 SIPRI 定义，多边和平行动必须具有下列明确目的:
(a) 作为执行已达成和平协定的推动工具;(b)支持和平进程;或(c)协助预防冲突或建设和平努力。不包括斡旋、真相调查团或选举援助团以及由非居民个人或谈判小组组成的特派团。由于 SIPRI 所有数据均为不间断统计，并在获取更为精准的信息时进行调整，本章统计数据并不重视和 SIPRI 年鉴或其他出版物的过往版本完全一致。
2 范德・李・金和斯密特 T,“和平行动与冲突管理”，SIPRI 年鉴 2018:军备、裁军与国际安全(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第 103 页。
3 北约，“继续通过在伊拉克的新任务加强伊拉克安全架构”，2018 年 10 月 31 日。
4 加拿大政府，“加拿大武装部队指挥官将被任命为北约驻伊拉克新司令”，2018 年 8 月 22 日。
5 这包括联合国在阿富汗、哥伦比亚、几内亚比绍、伊拉克、利比亚和索马里的所有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

特派团。非盟(AU)和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被视为联合国行动而非非盟行动，因为它是在联合国维和机构内指挥下，并由联合国维和预算全额资助，尽管联合国与非盟在维和任务上拥有共同的政治权力。
6 这是联合国驻科特迪瓦行动(UNOCI)，即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MINUSTAH)和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UNMC)。
7 欧洲理事会，理事会决议(CFSP) 2018/2009, 2018 年 12 月 17 日。
8 本章所述人员规模分析基于国际人员数量估算(军事、警务和国际文职人员)，2009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的活跃和平行动在每月月底的人员部署数量。SIPRI 年鉴往年版本中，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即每年年底多边和平行动国际人员部署数量，或是有鉴于一项行动在一个日历年期间结束，则使用该行动结束时国际人员年度数据。因此本章数据并不一定与 SIPRI 过往年鉴数据完全一致。
9 2017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0 多斯桑托斯克鲁兹·C·A，菲利普斯·W ·R 和库西马诺·S，加强联合国维和人员人身安全：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联合国独立报告（联合国：纽约，2017 年 12 月 19 日）；联合国，“执行加强维和人员安全报告行动计划摘要”，2018 年 1 月。关于克鲁兹报告内容更为详细讨论，见范德·李·金和斯密特·T（注 2），第 109-12 页。
11 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任命巴西的卡洛斯·阿尔贝托·多斯桑托斯·克鲁兹中将领导对维和人员伤亡情况的审查”，SG/A/1772*- BIO/5045*-PKO/688, 2017 年 11 月 17 日。
12 见布泰利·A，“敌对势力:克鲁兹的报告，战略背景下被忽视的因素”，IPI 环球天文台网站，2018 年 2 月 5 日。
13 多斯桑托斯·克鲁兹，菲利普斯和库西马诺（注 10），执行摘要。
14 联合国秘书长(注 11);联合国，“加强联合国维和人员人身安全:伤亡报告行动计划”，2018 年 4 月 9 日。
15 关于马里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16 马汉巴·F，“叛军在刚果杀死 15 名维和人员，这是近年来联合国遭遇的最严重袭击”，路透社，2017 年 12 月 8 日。
17 格莱斯顿·R 和考威尔·A，“至少 15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刚果遇难”，《纽约时报》，2017 年 12 月 8 日。
18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致记者关于最近 MONUSCO 维和部队遇袭特别调查结果的说明”,2018 年 3 月 2 日。
19 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刚果民主共和国选举前发生暴力冲突，造成蓝盔士兵死亡”，2018 年 11 月 15 日。
20 2018 年，敌对行为关联的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死亡人数来自孟加拉国(6)、布基纳法索(3)、布隆迪(2)、乍得(2)、马拉维(6)、毛里塔尼亚(2)、尼日尔(1)、巴基斯坦(1)、卢旺达(1)和坦桑尼亚(3)。
21 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就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集体行动，在安理会高级别辩论中的发言”，2018 年 3 月 28 日。
22 联合国秘书长(注 21)。
23 联合国秘书长(注 21);联合国大会第 72/262 C.III 号决议, A/RES/72/262 C，2018 年 7 月 18 日。
24 联合国，“联合国维和行动共同承诺宣言”。
25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维和行动高级别会议致记者的说明”，2018 年 9 月 26 日。

第 2 节.和平行动区域趋势和发展

蒂莫·斯密特

2018 年的 60 项多边和平行动并未均匀的分布在世界不同地区（见表 3.1）。非洲有 24 项，欧洲 18 项，中东 10 项，亚洲和大洋洲 5 项，美洲 3 项。非洲不仅和平行动数量第一，同时也规模第一（见第一节）。这也体现在各区域和平行动部署人员数量上。据估计，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球部署总数为 144 791 人，72%被派驻非洲特派团。相比之下，尽管欧洲紧随非洲之后，位列第二，但部署人数却只占 6%。

非洲

2018 年，非洲共派驻 24 项多边和平行动，较上年减少一项（见图 3.8）。2018 年，非洲多边和平行动部署人员数量减少 1.9%，从 106240 人减至 104238 人。非洲大陆人员部署连续第三年下降，达到五年来的最低水平（见图 3.9）。

2009 年以来，2018 年非洲首次没有新增和平行动。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UNMIL）于 2018 年 3 月结束（见下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莱索托王国预防特派团于 2018 年 11 月结束。大约 250 人的 SAPMIL 特派团于 2017 年 12 月正式成立，为期六个月，2018 年 5 月开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展期。[1] 应莱索托政府请求，SADC 在 2017 年 9 月向莱索托派驻特遣队，随后成为 SAMPIL，其目的就是在莱索托国防军司令遇刺后，协助稳定国家次序、恢复法治。[2]

2009-18 年非洲多边和平行动人员

21 世纪头十年半，多边和平行动的一个长期趋势就是对非洲大陆日益关注。这一点尤其凸显在非洲哦国家和平行动人员部署数量不断增加。然而，这一趋势在 2016 年被打破，2017 年和 2018 年的非洲多边和平行动人员部署数量连续下降也佐证了这一趋势发生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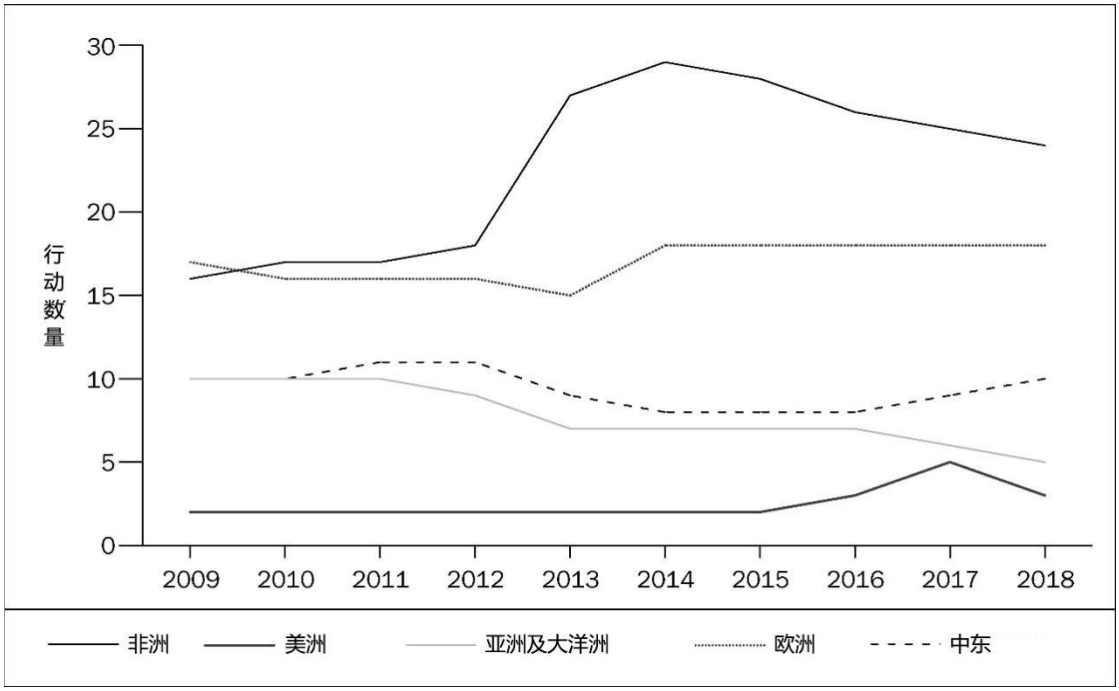


图 3.8　2009-18 年区域多边和平行动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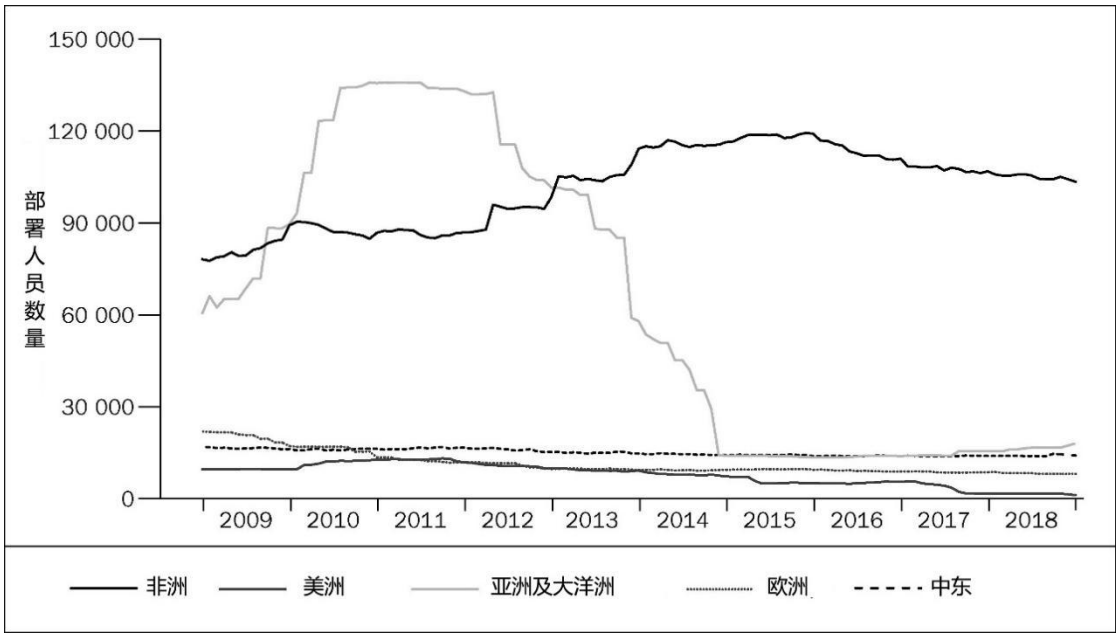


图 3.9 2009-18 年区域多边和平行动部署人员数量

非洲多边和平行动，200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人员部署数量从 8 万人激增至 12 万人，2012 年至 2014 年，增长尤为迅速。人员激增期间，非盟（AU）索马里特派团（AMISOM）和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UNMISS）人员规模翻了一番，并向马里和中非共和国派驻区域和平行动特派团。此类区域特派团——非洲主导的马里国际支助团（AFISMA）和中非共和国国际支助团（MISCA）——不久就被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MA）和联合国中非共和

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CA）取代。

表 3.1 2018 年区域和组织类型和平行动和人员部署数量

执行机构	非洲	美洲	亚洲及大洋洲	欧洲	中东	世界
行动数量	24	3	5	18	10	60
联合国 a	11	2	2	2	4	21
区域组织或联盟	13	1	1	14	4	33
临时联盟	—	—	2	2	2	6
部署人员 b	104238	1433	17296	8126	13698	144791
联合国 a	80405	1405	348	1020	12310	95488
区域组织或联盟	23833	28	16910	5974	97	46842
临时联盟	—	—	38	1132	1291	2461

a 联合国数据包括由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联合国政治事务部和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特派团(NAMID)领导的和平行动。
b 人员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料来源：SIPRI 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http://www.SIPRI.org/databases/pko/>。

许多参与非洲多边和平行动的联合国人员本身就是非洲人。200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间，非洲国家对和平行动的人员派遣从 3.5 万人增至 7.5 万人。非洲和平行动中，非非洲国家人员数量保持相对稳定。这也意味着 2009 年至 2015 年间增加的部署人员数量，非洲国家或所或少都有贡献，非洲国家派遣人员数量在和平行动人员占比，从一半升至三分之二。

2015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间，非洲多边和平行动部署人员数量从 12 万人降至 10.4 万人。很大程度是因为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UNOCI）和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UNMIL）撤出，以及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加速缩编。AMISOM 和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MONUSCO）人员编制也有所下降，不过幅度较小，2018 年未出现下降。2016-18 年间，MINUSCA，MINUSMA 和 UNMISS 规模继续扩大。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

2018 年 3 月 30 日，UNMIL 终止。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最后一次延长 UNMIL 任务授权，定于 2016 年 12 月结束 UNMIL。[3] 特派团已将安全责任移交利比里亚安全部门，并进行相应改组。[4] UNMIL 的最后延期将保证特派团得以继续留驻，直至 2017 年 10 月利比里亚大选结束。共有一个文职部门和一支多达 434 名军事人员和 210 名警察的部队留守，其中包括两支建制警察部队（FPU）。[5] 大选得以和

平进行，乔治·韦厄（两轮）赢得选举，并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宣誓就任总统。最后几个月里，UNMIL 一面继续助力利比里亚和平过渡，一面进行撤离准备工作。UNMIL 运用宣传策略，告知大众自己将撤离利比里亚，以及联合国将如何运用国家工作队在后 UNMIL 时代，介入利比里亚事务。[6]

2018 年 UNMIL 顺利关闭标志着联合国在西非地区维和任务取得阶段性胜利。此前，联合国分别在 2017 年和 2014 年关闭了科特迪瓦和塞拉利昂的和平行动。三个国家都经历过 90 年代和/或 21 世纪初期内战，都在达成武装冲突和平协议后，进驻多项和平行动。这些和平行动常被誉为促进持久和平的成功典范：内战并未再度爆发，民主选举得以举行，联合国和平行动得以缩编和退出。[7]

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MINUSMA 和国际和地区各方，一道在马里展开行动。除 MINUSMA，2018 年马里共被派驻 3 项多边和平行动：非盟马里萨赫勒特派团（MISAHEL）、欧盟马里共同安全与防卫政策 (CSDP)特派团（EUCAP 萨勒赫-马里）和欧盟马里培训团（EUTM-马里）。马里同时还活跃着 4000 人规模的法国反恐行动巴尔哈内行动和 5000 人的五国集团萨赫勒联合部队(JF-G5S)，同时还有 G5S 的其他成员国。[8] MINUSMA 为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行动。其人员规模从 14086 人增加到 15315 人（其中军事人员 12811 人，警察 1761 人）。这仍然少于核定的 13289 名军事人员和 1920 名警察的授权规模。[9]

尽管各类和平行动轮番上阵，2018 年的马里安全局势继续恶化。[10]2018 年 6 月，联合国安理会延长 MINUSMA 任务授权期限，重申其首要任务是协助《2015 年马里和平和解协议》的执行，并要求 MINUSMA 相应安排好自己的政治工作方向。[11] 安理会同时注意到马里中部安全形势和国家政权两个层面，都出现了螺旋式下降。因此，安理会鼓励但却未授权调整 MINUSMA 的北马里姿态，其目的就是对联合国马里中部存在进行“优化和再平衡”，同时强调马里北部仍是特派团的重中之重。[12]

2018 年 5 月至 6 月，MINUSMA 为 JF-G5S 提供了有限的行动和后勤支持。[13]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 2017 年 12 月 8 日第 2391 号决议要求，2018 年 2 月，联合国、欧盟和萨赫勒 G5 国家，已就此达成技术协议。[14] 协议涵盖 MINUSMA 对 JF-G5S 在诸多方面的支持，涉及医疗救治、伤员转运、工程及后勤。然而，JF-G5S 只向

MINUSMA 发出 9 次协助请求。

2018 年 6 月 29 日 JF-G5S 马里塞瓦雷总部遭到恐怖袭击后，JF-G5S 暂停了行动。[15]此外，MINUSMA 不仅为 JF-G5S 提供行动和后勤支持，同时还对严重侵犯人权指控展开调查。[16] MINUSMA 对 2018 年 5 月马里中部莫普蒂事件展开调查，结论是，JF-G5 指挥下的马里士兵“在 Boulkessy 牲畜市场草率和/或武断的处决了 12 名平民”，以报复先前在袭击一名士兵被打死。[17]

联合国利比亚支援团

2018 年，UNSMIL 加大了在利比亚的存在和活动，同时也保留了其在突尼斯的总部。为保护利比亚东部的黎波里的 UNSMIL 营地，一支从尼泊尔调拨的 200 人警卫部队于 2017 年 12 月部署到位。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于 2018 年 2 月解除了利比亚疏散状态。[18]UNSMIL 驻利比亚国际人员（尽管是轮换制）有所增加，随后数月迅速降至 140-200 人规模。2018 年 8 月 27 日的黎波里多地爆发武装组织暴力冲突，UNSMIL 却再度削减规模。尽管 UNSMIL 努力调解，并最终于 9 月 4 日达成停火协议，但冲突还是持续了近一个月。[19]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

2018 年，联合国安理会将 MINURSO 任务授权延长两个 6 个月，而非像以前那样直接延长一年。美国对 MINURSO 在解决西撒哈拉冲突上，政治进程推进迟缓十分不满，摩洛哥与萨圭亚·哈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依旧剑拔弩张。2018 年 4 月，当任务授权展期到期之时，美国坚持只给 6 个月延期，表示“不能再像往常一样”，并暗示如不能尽快恢复西撒哈拉政治谈判，将否决进一步延期。[20]2018 年 10 月，摩洛哥、波利萨里奥阵线、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同意恢复谈判，MINURSO 再获 6 个月延期。2018 年 12 月，联合国秘书长西撒哈拉问题个人特使主持下，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21]12 月 5 日和 6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轮会谈并未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但各方同意在 2019 年一季度恢复谈判。[22]

联合国 DRC 稳定特派团

2018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将 MONUSCO 任务授权再延长一年，MONUSCO 保留

了 16875 名军事人员和 1441 名警察的核定规模。[23]与上年不同的是，MONUSCO 规模并未缩减。截至 2018 年年底，MONUSCO 军事人员 15851 人，警察 1362 人，国际文职人员 833 人。

2018 年，MONUSCO 的优先战略目标为保护平民和协助执行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全面包容政治协定。协定执行协助包括为立法和总统大选提供政治和技术支持，这将是 DRC 的首次民主权力移交。选举原定于 2017 年 12 月举行，但随后推迟至 2018 年 12 月 23 日。2018 年 12 月 30 日，大选最终在相对平静中拉开大幕。[24] DRC 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在金沙萨的一座仓库发生火灾,包括约 8000 台投票机在内的大量选举设备被毁，选举不得不再次推迟一周。[25]

尽管 MONUSCO 在 2018 年保留了类似数量的军警人员，但对特派团和军事干预旅(FIB)进行了重大重组。2018 年 8 月，MONUSCO 遣散了约 1500 名士兵，随后补充了两个快速部署营。[26]2018 年，FIB 和 MONUSCO 快速部署营举行了几次联合作战部署，践行“投射保护”新理念。[27] 这一概念源自 2017 年克鲁兹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保障报告（见第一节），但 MONUSCO 主要是通过防范和威慑行动保护平民。[28]

联合国驻 CAR 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MINUSCA 在 2018 年几乎是完全达到核定规模，上年军事人员和警察就分别增至 11650 人和 2080 人。[29] 截至 2018 年年底，MINUSCA 共有 11628 名军事人员、2049 名警察和 607 名国际文职人员。CAR 政治和安全局势依然岌岌可危。[30] 独立战略审查之后，联合国秘书长就 MINUSCA 任务提出几项建议，任务授权将于 2018 年 11 月后延长。秘书长建议，MINUSCA 应：（a）加强政治作用和能力，支持非盟主导的 CAR 和平进程；（b）向经欧盟驻中非共和国培训团（EUTM RCA）或其他双边伙伴培训并经 EUTM RCA 认证的国家武装部队和警察提供有限的后勤支持，以便部署至 MINUSCA 并与之在重点优先领域进行合作；以及（c）支持选举进程，以促成定于 2020 年和 2021 年举行的下一次地方、立法和总统选举。[31] 上述建议最终被纳入新的任务，新的任务授权并未按计划在 11 月延长，而是于 12 月开始延长。

推迟的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延长 MINUSCA 任务的决议条款和文本上存在重要分歧。分歧主要是在法国和俄罗斯之间。自 2012 年武装冲突爆

发以来，法国一直活跃在其前殖民地 CAR 的政治军事事务中。2013 年至 2016 年，法国在 CAR 部署了红蝴蝶行动，法国成为 2014-15 年欧盟驻 CAR 军事行动(EUFOR RCA)的最大兵源派遣国。2018 年，俄罗斯成为 CAR 政治军事舞台的重要玩家，俄罗斯向 CAR 武装部队捐赠武器和军事装备，派遣 175 名军事教官提供战斗训练，并于 2018 年 10 月宣布将再派遣 60 名教官。俄罗斯和苏丹 HIA 于 2018 年 7 月和 8 月在喀土穆安排与 CAR 武装组织会晤。俄罗斯不满意法国在 2018 年 11 月提出的关于延长 MINUSCA 任务的决议草案，因为俄罗斯认为该草案未能充分提及俄方在 CAR 武装部队训练中的作用。俄方还认为，草案歪曲了 2018 年 8 月的喀土穆会议，会议强调非盟主导的和平进程是政治解决 CAR 冲突的唯一可行框架，并避免平行进程的干扰。[32]安理会最终能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通过了微调后的决议，俄罗斯和中国弃权。[33]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

联合国安理会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延长 UNMISS 任务期间，维持核定兵力 1.7 万人，其中保护一支 4000 人的区域保护部队(RPF)和 2101 名警察。[34]然而，UNMISS 在 2018 年并未完全部署到位，尽管其总人员数从 15389 人大幅增至 17577 人（14904 名军事人员、1 778 名警察和 895 名国际文职人员）。[35]2018 年年初，一项独立战略审查完成。据估计，UNMISS 至少半数人员和资源用于保护和管理收容所，那是 2013 年冲突爆发以来 20 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家园。这也意味着对于收容所之外的大批南苏丹百姓，UNMISS 也就爱莫能助了。[36]

2018 年南苏丹的主要事件是 9 月 12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了《关于解决南苏丹冲突的振兴协定》。[37]该协定由苏丹调解，是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于 2017 年 5 月开始的政治进程的结果。2015 年的最初协议在 2016 年已经破裂。联合国秘书长在 2018 年 12 月关于南苏丹的季度报告中，对在签署恢复活力的协定后维持停火表示谨慎乐观，尽管停火和过渡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CTSAMVM）报告说，一些签署国之间的冲突有限，而且也只是局部零星冲突。[38]

IGAD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 9 月 12 日特别首脑会议上决定，提请安理会全面启动 UNMISS RPF。此外，元首表示将提请对 RPF 及其组成进行审查，以使 IGAD 成员国苏丹、乌干达、吉布提和索马里能向其派遣部队。[39]安理会已于 2016 年批准组建一支 4000 人的 RPF 部队，但时至 2018 年，依然只有 2200 名军事人员，

包括孟加拉国的一个工程单位、尼泊尔一个连以及中国和卢旺达各一个营。[40] 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行动的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对 IGAD2018 年 11 月的请求作出回应,称调整 RPF 授权具有自由裁量权,但这不能损害联 UNMISS 保护平民的优先任务、统一指挥控制权，不能牺牲部队派遣国(TCC)标准。[41] IGAD 参谋长宣布，经安理会授权，肯尼亚、乌干达和苏丹将向 RPF 派遣 499 名人员，吉布提和索马里派遣 99 名。[42] 2018 年 12 月 20 日，非盟和安理会表示全力支持 IGAD 建议。[43]

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2018 年，UNAMID 继续缩减规模，缩小在达尔富尔的活动范围。去年，联合国安理会对 UNAMID 进行调整，大幅削减核定兵力。特派团将采取“双管齐下”的新策略，特派团将保持在动荡的杰贝尔马拉地区的军事存在，继续其武装维和使命。但在达尔富尔其他地区则侧重于稳定和和平建设层面。这也就将 UNAMID 分为了两大阶段，特派团将逐渐关闭若干军事基地,；余下 16 个步兵营中的 8 个也将陆续撤离。[44]

UNAMID 第二阶段从 2018 年 1 月一直持续到 6 月。在这一阶段，特派团核定兵力进一步缩减，军事人员从 11 395 人减至 8 735 人，警察从 2 888 人减至 2 500 人。为实现这一目标，UNAMID 撤离了 3 个步兵营，关闭了其在北达尔富尔、东达尔富尔和西达尔富尔的区总部，并从 7 个大本营撤出了军事人员，仅留下了警察部队。[45] 军事人员被重新整编为杰贝尔马拉特遣旅，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开始运作，总部设在扎林盖，安全援助部队总部设在尼亚拉。[46]

2018 年，一项非盟-联合国联合审查建议进一步削减 UNAMID 规模，重新定义优先目标和行动范围以及 2020 年过渡和退出框架。[47] 安理会在决定将 UNAMID 授权延期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时，采纳了这些建议。安理会决定将 UNAMID 军事人员削减至 4050 名，同时维持 2500 人的警力规模。不过，安理会同时表示，明年的缩编是有先决条件的，分布的且可随条件变化做出调整。[48] 2018 年 10 月，联合国秘书长在他的 UNAMID 90 天报告中，对过渡及 2020 全面撤出给出了基准及指标。[49] 2018 年下半年，UNAMID 关闭了 5 处营地并撤回约 3000 名军事人员。截至年底，UNAMID 共有 6045 名军事人员，2296 名警察和 630 名国际文职人员。

非盟索马里特派团

2018年，AMISOM仍是规模最大的多边和平行动（见第1节）。截至年底，AMISOM共有人员20889名：军事人员20161名、警察662名、国际文职人员66名。大致同去年年底相当，安理会在2013年11月将特派团规模从17731人提升至22126人，随后第一次削减规模。[50]2014年，AMISOM组建了一支4395名埃塞俄比亚军事人员的队伍，并派驻索马里，届时AMISOM规模达到峰值。[51]

从一开始，安理会就将AMISOM定位为短期措施，并且就是一种退出策略，这一点在随后所有的决议中都有体现。最初的计划是在18-24个月内将上限维持在22126名军警规模，随后又考虑进一步降低上限。[52]然而，第一次决定削减AMISOM规模是在2017年8月，联合国通过第2372号决议。[53]决议决定将安全事务逐步移交给索马里国家安全部队(SNSF)，而此时AMISOM的最高目标---降低青年党和其他武装组织威胁之目标，其实并未能实现。决议同时呼吁分两个阶段削减AMISOM核定兵力：到2017年12月31日，将军警数量从22126名减至21126名；到2018年10月30日，从21126名再减至20126名。

2018，AMISOM采取进一步措施，做好移交准备工作最终撤出索马里。特派团领导层支持索马里联邦政府(FGS)同包括联合国索马里支助特派团(UNSOM)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在2018年春的索马里过渡方案准备工作。过渡方案为AMISOM逐步将安全事务移交SNSF设定了时限。安理会对2018年3月27日制定的过渡方案表示欢迎，并与2018年4月30日获得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通过。[54]

尽管如此，有人还是表达了关切，SNSF羽翼尚未丰满，AMISOM就削减规模，过渡时间表设置并未切合实际。2018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索马里特别代表兼UNSOM特派团团长警告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过于激进的撤军计划，受伤害的只会是得之不易的索马里和平成果，青年党坐收渔翁之利。[55]2018年3月，AMISOM的5个TCC在一份联合公报中表达了相似的关切，都要求撤销其削减AMISOM规模的决定。[56]2018年上半年，AMISOM非盟-联合国联合战略审查建议将2018年10月30日撤出1000名军警人员的最后期限向后延期。[57]与此同时，青年党用行动表示，它仍是索马里和平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2018年4月1日，青年党对下谢贝利地区的AMISOM驻地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多名恐怖分子携带两枚自杀式汽车炸弹发动袭击，据报道造成46名乌干达AMISOM士兵死亡。[58]

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在2019年2月28日前，将AMISOM军警定员从21126人

降至 20126 名。但是，安理会明确表示对这一举措实属遗憾，并再次强调不希望出现任何再度拖延。联合国 2372 号决议同时对非盟根据索马里过渡计划修改 AMISOM 行动构想(CONOPS)，表示欢迎。[59] 2018 年 11 月 30 日，AMISOM 军事行动协调委员会核准新 CONOPS。新 CONOPS 基于索马里国家过渡计划制定，并设置了过渡框架以便逐步向 SNSF 移交安全事务，最终实现 2018 年至 2021 年全面撤出。[60]

美洲

2018 年，美洲共执行 3 项多边和平行动：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团(MINUJUSTH)、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 (UNVMC)和美洲国家组织（OAS）哥伦比亚和平进程支助团（MAPP/OEA），较上年减少 2 项和平行动，但是只不过是因为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UNMC）和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MINUSTAH）已于 2017 年终止并分别由 UNVMC 和 MINUJSTH 接替。2018 年，美洲多边和平行动人员数量从 1606 人减少至 1433 人，下降 11.4%。人员部署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

联合国海地司法援助团

MINUJUSTH 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接替 MINUSTAH 时，最初的任务期限定为 6 个月，最初核定警力为 1275 人，由 7 支 FPU 和 295 名警官组成。与 MINUSTAH 不同，MINUJUSTH 并未配备军事人员。MINUJUSTH 任务是协助海地政府加强法治，支持和组建海地国家警察(HNP)队伍，并对人权事务进行监督。MINUJUSTH 完成交接之后，FPU 驻扎海地，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7 章对平民实施保护，尽管其能力和行动范围都较为有限。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秘书长在 2018 对 MINUJUSTH 进行评估，并制定一项两年退出战略。[61]

2018 年 4 月，安理会将 MINUJUSTH 授权期限延长至 2019 年 4 月 15 日。但 2018 年 10 月 15 日之前，授权内容和强度并未改变。之后 FPU 规模由 7 支缩减至 5 支。[62] 安理会同时要求秘书长在其 MINUJUSTH 两年退出策略 90 天报告中，对 11 大标准和 46 项指标推进情况进行逐一汇报。

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

2017 年 9 月 26 日 UNVMC 接替 UNMC。[63] 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

量人民军(FARC-EP)同意(作为2016年11月24日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要求联合国在第一支政治特派团(UNMC)完成2016年6月23日商定的相互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的核查之后，派驻第二支政治特派团(UNVMC)。[64]

UNVMC最初授权仅限于对哥伦比亚政府和FARC-EP2016年和平协议某些条款的执行情况进行核查，特别是第3.2章关于FARC-EP成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融合，以及关于个人和集体安全保障的第3.4章。[65]然而，2017年10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扩大了UNVMC授权范围，将其扩大至哥伦比亚政府同民族解放军(ELN)的临时停火遵守情况进行监督。2017年9月4日，政府同ELN达成协议，停火将于10月1日起生效至2018年1月9日。[66]诚然停火期间并未爆发重大交火，但停火期满后，ELN立刻重拾枪炮。[67]停火期满后，UNVMC立即停止所有核查监督活动，执行监督任务的联合国观察员也第一时间撤出特派团。[68]安理会在2018年9月延长UNVMC授权至2019年9月25日，授权内容并未作出任何调整。[69]

亚洲和大洋洲

2018年，亚洲和大洋洲共执行5项多边和平行动，较上年减少1项。2018年，亚洲大洋洲和平行动人员数量增加11.8%，从15467人增加到17296人。

其中大部分人数为北约主导的阿富汗坚定支持特派团(RSM)。亚洲大洋洲其他多边行动包括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国际监测小组（IMT)、朝鲜半岛的中立国监督委员会（NNSC）、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UNAMA）和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小组（UNMOGIP)。NNSC由来自瑞典和瑞士的10名军事观察员组成。

坚定支持特派团

2015年1月1日，RSM接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此成为亚洲大洋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多边和平行动。RSM为北约主导的非军事特派团，旨在为阿富汗国家安全和国防军（ANSDF）提供“训练、顾问和协助”。[70]北约原计划部署两年，却不料在2016年12月31日黯然离开阿富汗。但是，北约国家和政府首脑2016峰会决定RSM“延长至2016年之后”，并在2018年布鲁塞尔峰会宣布RSM还将继续驻扎，直至当地情况已完全好转满足撤出条件。

从最初的基于时间节点撤军转变为基于条件撤军，反映出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战略也发生了类似转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卸任前，曾决心结束美国在阿富

汗的军事存在。但是时至 2016 年年末，奥巴马政府得出结论，离开阿富汗为时尚早。依据就是 ANSDF 在应对死灰复燃的塔利班似乎积弱难返，很难离开北约和美国的帮衬，特别是低空军事支持。2017 年 8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一项新的南亚战略，其中包括加大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给与部队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应留尽留。[71]

2018 年，RSM 从 15046 人增加到 16910 人。许多欧洲北约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和英国，都追随美国的步伐，加大了派遣力度。[72]2018 年，美国在阿富汗共部署兵力 14000 名，其中 8475 名在 RSM，余下的人员部署在反恐特派团--自由哨兵行动(OFS)。然而特朗普下令在 2018 年 12 月撤回约一半的兵力。一旦实施，不但同美国 2017 年南亚战略背道而驰，而且会对 RSM 在阿富汗的持续存在带来巨大的不确定。[73]

欧洲

2018 年，欧洲共部署 18 个多边和平行动，所有行动均为上年部署之延续。其中多项行动多年来一直部署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他们都在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后经历了多年的武装冲突，也大多是部署在争议领土。最近一个部署在欧洲的多边行动是为应对 2014 年爆发的乌克兰冲突。严格意义而言，此类特派团大多规模较小。对应的欧洲维和人员也较其他行动相对较少。2018 年，参加欧洲多边和平行动人员从 8597 人减少到 8126 人，降幅为 5.2%。

联合国在乌东和平行动反复出现的问题

继续讨论在乌东部署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可能性。乌克兰政府自 2015 年以来一直在推动建立这样一个特派团。[74] 俄罗斯政府在 2017 年 9 月提出反对意见，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沿接触线部署，将俄罗斯支持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与乌克兰其他地区隔开，以保护欧安组织特别监察团(SMM)非武装观察员。[75] 2018 年 2 月，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一份报告，具体阐述了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组建一支联合国或多国部队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此后这一问题更加吸引人们的关注。[76]

尽管如此，2018 年，联合国驻乌维和部队在乌行动范围或授权多大，在乌东接壤俄罗斯的边界的分子主义分子控制区究竟有多大行动空间，联合国安理会及其常任理事国并未达成共识，分歧依旧。[77] 事实上，2018 年乌俄关系持续恶化。

2018 年 11 月乌克兰利用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身份召开紧急会议，应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附近亚速海扣押 3 艘乌克兰海军舰。乌俄关系降低冰点。[78]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

澳大利亚谢丽尔 •皮尔斯少将于 2018 年 11 月被任命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UNFICYP）新部队指挥官，值得注意。[79]皮尔斯是继挪威克里斯汀 •隆德少将之后第二位联合国维和部队女指挥官，谢丽尔曾在 2014-16 年担任 UNFICYP 部队指挥官，联合国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使、UNFICYP 负责人和 UNFICYP 警察部门负责人也都是女性。[80]这也意味着，2019 年 1 月皮尔斯少将就任部队指挥官时，特派团整个高层都是女性。[81]

中东

2018 年，中东地区共有 10 项多边和平行动，较 2017 年增加 1 项。2018 年，派驻人员人数减少 2.2%，从 14001 人降至 13698 人。

NATO 伊拉克特派团

NMI 为 2018 年新设多边和平行动。北约国家和政府首脑决定于 2018 年 7 月布鲁塞尔峰会组建 NMI，特派团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正式启动。[81]NMI 总部设在巴格达，一旦全面运作，将定员约 580 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布鲁塞尔峰会上宣布，加拿大任 NMI 首年指挥，并派遣至多 250 名人员。[82]北约预测，NMI 将在 2019 年初实现全面运作。[83]北约并未透露 2018 年余下时间 NMI 的具体部署细节，我们也无法预测其在 2018 年年底的兵力部署。

NMI 授权向伊拉克安全机构提供咨询意见，并为伊拉克武装部队提供培训，重点是伊拉克军民联防合作和安全部门改革。训练部分将在伊拉克军事院校推行“教员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简易爆炸装置处置、军民联防计划、装甲车维修及军事医学。[84]2015 年起，北约就开始在阿曼执行名为北约伊拉克训练和能力建设任务 (NCBT-I)，定期向伊拉克安全部门、机构及军官提供军事训练和顾问。NMI 为 NCBT-I 的延续。[85]此前，北约曾在 2004 至 2011 年期间，在伊拉克执行过一项军事训练任务，即北约驻伊拉克训练特派团(NTM-I)。

《斯德哥尔摩协定》与联合国也门和平行动的第一步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向也门部署一支“先遣队”，开始执行也门政府和胡塞运动于 2018 年 12 月在瑞典谈判达成协议（统称为斯德哥尔摩协议）执行情况的监督任务。[86]随后联合国于 2019 年 1 月组建联合国支持荷台达协议特派团(UNMHA)。[87]

1 南部非洲国际关系与合作司，“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双三驾马车峰会公报》，2018 年 4 月 24 日。
2 SADC，“南共体秘书处向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报了向莱索托部署特遣队的情况”，2018 年 1 月 25 日。
3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33 号决议，2016 年 12 月 23 日。
4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特别报告，S/2016/968, 2016 年 11 月 15 日。
5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33 号决议(注 3)。
6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最后进展报告，S/2018/344, 2018 年 4 月 13 日;福尔蒂·D，康诺利·L，特派团任务已经结束，但联合国仍在行动：利比里亚维和过渡（国际和平研究所：纽约，2018 年 12 月）。
7 联合国，“15 年的使命圆满成功，联合国维和人员利比里亚时，利比里亚政局稳定，人民感恩联合国”，联合国新闻，2018 年 3 月 29 日。
8 2018 年，JF- G5 还未完全具备作战能力。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萨赫勒地区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的报告，S/2018/1006, 2018 年 11 月 12 日。
9 联合国安理会第 2295 号决议，2016 年 6 月 29 日，第 15 段。
10 关于马里和更广泛的萨赫勒地区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11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3 号决议，2018 年 6 月 28 日。
12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马里局势的报告，S/2018/541, 2018 年 6 月 6 日。
13 联合国安理会(注 8)。
14 联合国安理会(注 8);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 2391 号决议，2017 年 12 月 8 日。
15 联合国安理会(注 8)。
16 联合国安理会(注 8)，第 31 段。
17 费利克斯·B 和罗斯·A，联合国表示马里军队在一个集贸市场处决了 12 名平民，路透社，2018 年 6 月 26 日。
18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利比亚支助团的报告，S/2018/140, 2018 年 2 月 12 日，第 87 段。
19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利比亚支助团的报告，S/2019/19, 2019 年 1 月 7 日。关于利比亚的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20 联合国安理会，第 8246 次会议， S/PV.8246，2018 年 4 月 27 日，第 2 页;“撒哈拉西部:授权续期”，蓝色背后是什么？2018 年 4 月 27 日。
21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40 号决议，2018 年 10 月 31 日;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西撒哈拉局势的报告，S/2018/889, 2018 年 10 月 3 日。
22 迈尔斯·T，“弥足珍贵的联合国西撒哈拉谈判，却未能取得突破”，路透社，2018 年 12 月 6 日。
23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09 号决议，2018 年 3 月 27 日。
24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25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秘书长报告，S/2019/6, 2019 年 1 月 4 日，第 8 段。
26 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秘书长报告，S/2018/882, 2018 年 10 月 1 日，第 60 段。
27 联合国安理会(注 26)。
28 联合国安理会(注 26)。
29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87 号，2017 年 11 月 15 日，第 32 段。
30 关于中非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31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中非共和国局势的报告，2016 年 6 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S/2018/922, 2018 年 10 月 15 日。
32 “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MINUSCA)续期”，蓝色背后是什么？，2018 年 12 月 6 日。
33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48 号决议，2018 年 12 月 13 日。
34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06 号决议，2018 年 3 月 15 日。
35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南苏丹问题的报告(2018 年 9 月 2 日至 11 月 30 日)，S/2018/1103, 2018 年 12 月 10 日，第 55 段。
36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授权展期的特别报告，S/2018/143, 2018 年 2 月 20 日。关于南苏丹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37 IGAD，“恢复《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定》”，2018 年 9 月 12 日。
38 联合国安理会(注 35)，第 13 段。在《关于解决南苏丹冲突的协定》生效后，停火和过渡时期安全安排监测机制(CTSAMM)更名为停火和过渡时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CTSAMVM)。
39IGAD，“第三十三届政府间发展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会议公报”，2018 年 9 月 12 日，第 11 段。
40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南苏丹问题的报告(2018 年 6 月 4 日至 9 月 1 日)，S/2018/831, 2018 年 9 月 11 日，第 61 段。
41 联合国安理会，第 8403 次会议，S/PV.8403，2018 年 11 月 16 日。
42 《苏丹论坛报》，“IGAD 军事领导人决定在南苏丹部署 1600 多名士兵”，2018 年 11 月 23 日；联合国(注 35)，第 8 段。
43 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公报，第 820 次会议，PSC/PR/COMM.(DCCCXX)，2018 年 12 月 20 日，第 4 段。
44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63 号决议，第 1-7 段;联合国安理会、非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达尔富尔非盟-联合国混合行动战略审议的特别报告，S/2017/437, 2017 年 5 月 18 日，第 53-54 段。
45 联合国安理会，S/2017/437(注 44)，第 54 段;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报告，S/2018/389, 2018 年 4 月 25 日，第 45 段。
46 联合国安理会，S/2017/437(注 44)，第 53 段。
47 联合国安理会，非盟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达尔富尔非盟-联合国混合行动战略审议的特别报告，S/2018/530，2018 年 6 月 1 日。
48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9 号决议，2018 年 7 月 13 日。
49 联合国安理会，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秘书长报告，S/2018/912, 2018 年 10 月 12 日。
50 联合国安理会第 2124 号决议，2013 年 11 月 12 日。
51 威廉姆斯・P・D,“加入 AMISOM:为什么 6 个非洲国家向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派出部队？”,《东非研究杂志》第 12 卷第 1 期(2017 年 12 月 20 日)，第 172-92 页;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埃塞俄比亚部队正式加入 AMISOM”，新闻发布，2014 年 1 月 22 日。关于索马里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52 联合国安理会第 2124 号决议，2013 年 11 月 12 日。
53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2 号决议，2017 年 8 月 30 日。
54 非盟和平与安理会公报，第 769 次会议，PSC/PR/COMM。(DCCLXIX)，2018 年 4 月 30 日，第 4 段;联合国安理会第 2408 号决议，2018 年 3 月 27 日。
55 联合国安理会第 8165 次会议，S/PV.8165，2018 年 1 月 24 日，第 4 页。
56 乌干达外交部，“非盟索马里特派团 (AMISOM)派遣国 (TCCS) 峰会公报”，2018 年 3 月 2 日。
57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非盟主席报告：非盟-联合国索马里特派团联合审议委员会第 782 次会议，PSC/MIN/RPT(DCCLXXXII)，2018 年 6 月 27 日。
58 伯克・J 和穆明・A・A,“索马里青年党袭击造成数十名乌干达士兵死亡”,《卫报》，2018 年 4 月 1 日。
59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31 号决议，2018 年 7 月 30 日。
60 非盟，非盟索马里特派团，“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索马里评估团代表”，新闻发布，PR/80/2018, 2018 年 11 月 26 日;AMISOM，“讨论 2018 - 2021 年 AMISOM 行动理念的重要会议”在内罗毕开幕，2018 年 10 月 30 日。
61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50 号决议，2017 年 4 月 13 日。
62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10 号决议，2018 年 4 月 10 日。
63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66 号决议，2017 年 7 月 10 日。
64 哥伦比亚政府，“关于结束武装冲突和建立稳定持久和平的最后协议”，2016 年 11 月 24 日，第 6.3.3 段，第 225 页。关于哥伦比亚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2 节。

65 哥伦比亚政府(注 64)，第 3.2，3.4 段;联合国安理会第 2366 号决议，2017 年 7 月 10 日，第 2 段。
66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的报告，S/2018/279, 2018 年 4 月 2 日，第 62 段。
67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的报告，S/2017/1117, 2017 年 12 月 27 日，第 65-67 段;联合国(注 66)，第 62 段。
68 联合国，S/2017/1117(注 67)，第 79 段。
69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35 号决议，2018 年 9 月 13 日。
70 NATO,“北约与阿富汗关系”,《媒体背景》，2018 年 12 月。
71 赫斯菲尔德·戴维斯·J 和兰德勒·M，“特朗普阐述了新的阿富汗战争战略，但几乎未涉及细节”。关于阿富汗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见本卷第 2 章第 2 节。
72 麦卡斯基尔·A，“应美国要求，英国将在阿富汗的驻军增加近一倍”，路透社，2018 年 7 月 10 日;《德国之声》，“德国国防部长告诉驻阿富汗部队做好长期准备”，2018 年 3 月 25 日。
73 吉本·内夫·T 和马沙尔·M,“官员表示，美国将从阿富汗撤出大约 7000 名士兵”,《纽约时报》，2018 年 12 月 20 日。
74 戈旺·R，联合国能将乌克兰统一起来吗?(哈德逊研究所:华盛顿特区，2018 年 2 月)。
75 “乌克兰简报”，蓝色的背后是什么，2018 年 5 月 25 日;埃斯克里特·T，“普京提议的联合国乌克兰维和部队必须完全部署到位:默克尔”，路透社，2017 年 9 月 16 日。
76 戈旺(注 74)。
77 蓝色的背后是什么? (注 75)
78 联合国，“俄罗斯联邦最高政治官员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敦促乌克兰对被劫持船只事件保持克制”。关于乌克兰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4 节。
79 联合国秘书长，“澳大利亚少将谢丽尔·皮尔斯: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指挥官”，2018 年 11 月 8 日。
80 联合国秘书长，“挪威克里斯汀·隆德少将: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UNTSO)特派团团长兼参谋长”，2017 年 10 月 6 日。
81 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秘书长报告 S / 2019/37,第 36 段。
82 NATO，“北约继续通过在伊拉克的新任务加强伊拉克安全架构”，2018 年 10 月 31 日。
83 NATO(注 82)。关于伊拉克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84 NATO，“北约伊拉克任务”，简报，2018 年 12 月。
85 NATO，“北约在伊拉克的训练和能力建设活动(NTCB-I)”，《媒体背景》，2017 年 12 月。
86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51 号决议，2018 年 12 月 21 日。关于也门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87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52 号决议，2019 年 1 月 19 日。

第 3 节.2018 年多边和平行动表

蒂莫·斯密特

表 3.2 展示的是 2018 年 60 项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其中包括本年度启动或终止的和平行动。

该表列出联合国授权行动、区域组织和联盟授权行动以及国家特设（非常设）联盟开展的各类行动。联合国行动分为三组：（a）由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维和部）管理的观察员和多层面和平行动；（b）特别政治和建设和平特派团；（c）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

该表参考了 SIPRI 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http://www.sipri.org/databases/pko>，提供自 2000 年以来所有联合国和非联合国和平行动数据信息，如地点、部署情况和行动日期、任务、参与国、人员数量、预算和死亡人数。

表 3.2. 2018 年多边和平行动

除另有说明，所有数据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或其自身终止日期。2018 年停止的行动以斜体显示，不计入合计数据中。

行动名称	起始时间	地点	军事人员	警察	文职人员
联合国和平行动			**72217**	**8075**	**3964**
UNTSO	1948	中东	142	—	77
UNMOGIP	1951	印度/巴基斯坦	44	—	23
UNFICYP	1964	塞浦路斯	804	68	37
UNDOF	1974	叙利亚（戈兰）	939	—	49
UNIFIL	1978	黎巴嫩	10317	—	239
MINURSO	1991	西撒哈拉	224	1	75
MONUSCO	1999	DRC	15851	1362	833
UNMIK	1999	科索沃	8	10	93
UNMIL	2003	利比里亚	—	—	155
UNISFA	2011	阿卜耶伊	4545	41	136
UNMISS	2011	南苏丹	14904	1778	895
MINUSMA	2013	马里	12811	1761	743
MINUSCA	2014	CAR	11628	2049	607
MINUJUSTH	2017	海地	—	1005	157
联合国政治特派团			**1086**	**76**	**1099**
UNAMA	2002	阿富汗	1	—	280
UNAMI	2003	伊拉克	241	—	306

UNIOGBIS	2010	几内亚比绍	1	12	62
UNSMIL	2011	利比亚	234	2	174
UNSOM	2013	索马里	539	14	152
UNVMC	2017	哥伦比亚	70	48	125
联合国/非盟			**6045**	**2296**	**630**
UNAMID	2007	苏丹（达尔富尔）	6045	2296	630
非盟					123
AMISOM	2007	索马里			66
MISAHELa	2013	马里			11
MISACa	2014	CAR			9
非盟布隆迪观察团	2015	布隆迪			37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1271**	**271**	
ECOMIB	2012	几内亚比绍	396	146	—
ECOMIG	2017	冈比亚	875	125	—
欧盟			**1494**	**314**	**722**
EUFOR ALTHEA	2004	波黑	560	—	17
EUBAM 拉法	2005	巴勒斯坦领土（拉法过境点）	—	1	8
EUPOL COPPS	2005	巴勒斯坦领土	—	20	39
EULEX 科索沃	2008	科索沃	—	166	124
EUMM 格鲁吉亚	2008	格鲁吉亚	—	—	201
EUTM 索马里	2010	索马里	128	—	10
EUCAP 萨赫勒-尼日尔	2012	尼日尔	—	35	80
EUTM 马里	2013	马里	640	—	52
EUAM 乌克兰	2014	乌克兰	—	44	98
EUCAP 萨勒赫 马里	2015	马里	—	40	71
EUTM RCA	2016	RCA	166	—	1
EUAM 伊拉克	2017	伊拉克	—	8	21
北约			**20552**	**—**	**—**
KFOR	1999	科索沃	3462	—	—
RSM	2015	阿富汗	16910	—	—
NMI	2018	伊拉克	..	..	..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	**—**	**114**
CTSAMVM	2015	南苏丹	—	—	114
美洲国家组织			—	—	**28**
MAPP/OEA	2004	哥伦比亚	—	—	28
欧安组织			**—**	**—**	**1122**
OSCE 斯科普里特派团	1992	北马其顿	—	—	35
OSCE 摩尔多瓦特派团	1993	摩尔多瓦	—	—	10
OSCE PRCIO	1995	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	—	6
OSCE 波黑特派团	1995	波黑	—	—	33

OSCE 阿尔巴尼亚观察团	1997	阿尔巴尼亚	—	—	19
OMIK	1999	科索沃	—	—	84
OSCE 塞尔维亚特派团	2001	塞尔维亚	—	—	21
OSCE SMM	2014	乌克兰	—	—	893
OSCE 俄罗斯古科沃和顿涅茨克检查站观察团	2014	俄罗斯古科沃和顿涅茨克检查站	—	—	21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	**—**
SAPMIL	2017	莱索托	—	—	—
特设国家联盟			**2266**	**3**	**192**
NNSC	1953	韩国	10	—	—
MFO	1982	埃及（西奈半岛）	1117	—	111
JCC	1992	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沿岸）	1120	—	—
OHR	1995	波黑	—	—	12
TIPHa	1997	巴勒斯坦领土（希伯伦）	—	—	63
IMT	2004	菲律宾（棉兰老岛）	19	3	6

- =不适用;..=信息无法获取;
AMISOM=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CAR=中非共和国;CTSAMM =停火和过渡安全安排监督机制;DRC =刚果民主共和国;ECOMIB=西共体驻几内亚比绍特派团;EUAM乌克兰=欧盟驻乌克兰特派乌克兰安全部门改革顾问团;EUBAM法拉 - 欧盟拉法过境点边界援助团;EUCAP 萨赫勒马里-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卫政策（CSDP）马里团;EUCAP 萨赫勒尼日尔=欧盟 CSDP 驻尼日尔使团;EUFOR ALTHEA =欧盟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军事行动;EUFOR RCA =欧盟在中非共和国军事行动;EULEX 科索沃 - 欧盟驻科索沃法制特派团;EUMAM RCA - 欧盟驻中非共和国军事顾问团;EUMM 格鲁吉亚 - 格鲁吉亚欧盟监测团；EUPOL 阿富汗 - 欧盟驻阿富汗警察特派团;EUPOL COPPS =欧盟巴勒斯坦领土警察特派团;EUSEC RD 刚果 - 欧盟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全改革咨询援助团;EUTM 马里=欧盟驻马里军事训练特派团;EUTM 索马里=欧盟驻索马里军事训练特派团；IGAD MVM - 南部苏丹 IGAD 监测和核查机制;IMT =国际监督小组;JCC- 维和部队联席指挥委员会；KFOR-联合国驻科索沃部队;MAPP / OEA - 美洲国家组织支持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特派团;MFO=多国部队和观察员；MINURSO=西撒哈拉全民公决联合国监督特派团;MINUSCA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维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MA -联合国马里多维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TAH=联合国海地维稳特派团；MISAC =非盟驻中非共和国特派团;MISAHEL-非盟马里和萨赫勒地区特派团;MONUSCO - 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NNSC - 中立国监督委员会;OHR-人权事务高级代表办公室;OMIK=欧安组织驻科索沃特派团;欧安组织 SMM =欧安组织乌克兰特派团;PRCIO -欧安组织明斯克会议冲突处理办公室轮值主席私人代表;RAMSI =所罗门群岛援助团;RSM-毅然援助特派团；TIPH-在希伯伦的临时国际存在;UNAMA-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UNAMI-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UNAMID- 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DOF -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FICYP -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UNIFL-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SFA - 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UNMIK - 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特派团;UNMIL -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UNMISS=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UNMOGIP =联合国印度巴基斯坦联合国军事观察组;UNOCI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UNSMIL=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UNSOM - 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UNTSO - 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
a 数据时点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数据来源：SIPRI 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 <http://www.sipri.org/databases/ pko/>.
资料来源：
多边和平行动数据来自以下类别公开渠道：:
(a)相关组织秘书处提供的官方信息;
(b)多边行动自身提供的信息，有的来自官方出版物，有的来自 SIPRI 问卷的书面回复。
(c)相关行动派出国政府提供的信息。
有些情况下，SIPRI 研究人员可通过电话采访和邮件通讯的方式，收集来自参与国家的组织机构或政府部门的其他信息。在此基础上，SIPRI 还广泛对公开次级资料进行甄选，包括专业期刊、研究报告、新闻机构和国际、地区和地方报纸。

第二部分 军费与军备 2018

第四章 军费开支

第五章 国际武器转让与武器生产

第六章 世界核力量

第四章 军费开支

概述

据估算，2018 年世界军费开支为 18220 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1%，即人均 239 美元（见第 1 节）。军费总支出连续第二年增长，并首次突破 1.8 万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2.6%，较 2009 年增长 5.4%。

2018 年总开支增长主要受美洲和亚洲及大洋洲支出模式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和中国军费大幅增长。欧洲支出增长 1.4%，主要是由于西欧军费开支的增长。除三个国家外，欧洲其他国家支出都出现增长。非洲军事开支减少（下降 8.4%）。尽管 SIPRI 连续四年无法提供中东地区总开支估计金额，但数据可查的 11 个中东国家综合军事开支减少 1.9%。

2017 年至 2018 年间，除欧洲外，所有地区军事负担---军事支出 GDP 占比都有所下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一直致力于到 2024 年将军费支出提至 GDP2.0%的指导性水平。平均而言，2018 年，美洲国家军事负担最低，GDP 占比 1.4%；欧洲平均军事负担为 1.6%，非洲亚洲及大洋洲为 1.7%，中东国家为 4.4%。

2018 年，美国、中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和法国军费支出占全球军费支出 60%。美国军费开支 7 年来首次出现增长，2018 年达到 6490 亿美元。美国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 36%，为第二位中国军费开支的 2.6 倍。美国军费开支增长源于两大因素：军事人员军饷增长 2.4%；以及大规模安规武器采购计划逐步实施，无论是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

2018 年，中国军事拨款约为 2500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了 5.0%，自 2009 年以来增长了 83%。中国军费开支与中国经济发展大致同步：自 2013 年以来，中国每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1.9%用于军事。随着 2018 年经济增速放缓至 28 年来的最低水平，未来几年其增速可能放缓。

2018 年，沙特阿拉伯的军费负担为全球第一，GDP 占比 8.8%。2018 年，中国军费开支下降 6.5%，至 676 亿美元。印度支出 665 亿美元，2014 年以来其军费开支持续增长，现为世界第 4 大军费支出国。法国军费支出为 638 亿美元，为

2018 年世界第五大军费支出国。

2018 年，俄罗斯军费支出为 614 亿美元，较 2016 年(冷战后的峰值)下降 22%，俄罗斯自 2006 年以来首次跻身世界军费五强。

2017 年至 2018 年，布基纳法索（52%）、牙买加（40%）和亚美尼亚（33%）的军费增幅最大，而南苏丹（50%）、苏丹（49%）和贝宁（28%）的军费降幅最大。

由于军费报告率继续下滑，国际一级军费支出透明度仍然令人关切（见第 2 节）。2018 年，联合国军费支出报告率继续下降。军事支出报告的回应继续下降。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中，只有 36 个国家在 2018 年提交了军费支出报告，2002 年的 81 份报告为历年之最。相比之下，在国家一级，SIPRI 试图收集军费支出信息的 168 个国家中，2018 年能找到数据的国家 155 个，其中 150 份数据来自政府官方文件。

军费支出透明度不仅意味着数据公开，同时数据还需具备全面性、易获得性和各军事活动经费筹措相关细节。将军事预算分解为军事和非军事活动，是提高军费支出透明度的重要步骤。例如，巴西的一个个案研究强调的那样，对军队执行警察任务的资源分配，进行准备的分类，有利于提升军费数据的准确性（见第 2 节）。

南天

第 1 节.全球军费情况

南天，奥德•弗莱兰特，亚历山德拉•库伊莫娃，皮埃特•D•韦泽曼和西蒙•T•魏泽曼

据估计，2018 年全球军费开支首次突破 1.8 万亿美元。[1]实际支出总额 18220 亿美元比 2017 年高出 2.6%，比 2009 年高出 5.4%（见表 4.1 和图 4.1）。[2]世界军费开支在 2014 年创下 2009 年后的低点，然后拐头向上，逐年增加。2018 年，由于全球 GDP 大幅增长（6.0%），全球军费支出 GDP 占比降至 2.1%（见图 4.2）。[3]人均军费支出从 2017 年的 230 美元增至 2018 年的 239 美元，同期世界人口增长 1.1%，超过了军费增长速度。

2018 年全球军费增长主要是因为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军费增长。2018 年，美国支出增长 4.4%，至 7350 亿美元，为 2010 年以来的首次增长。亚洲和大洋洲军费支出增长 3.3%，达到 5070 亿美元。自 1988 年获得可靠的区域估计数以来，亚洲大洋洲地区军费开支每年都在增加。上述两大地区的增长主要是由于美国和中国军费开支大幅增加。欧洲军费开支也增加 1.4%，2018 年达到 3640 亿美元。2018 年支出唯一出现下降的地区是非洲，下降 8.4%至 406 亿美元。

SIPRI 连续第 4 年无法估计中东地区军费总开支。由于两个支出大户（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以及两个受冲突影响国家（叙利亚和也门）数据缺失，所以无法作出可靠的估算。不过，在有据可查的 11 个中东国家中，2018 年军费总支出下降 1.9%，至 1450 亿美元。11 个国家中有 7 个国家减少了支出，但土耳其大幅增加，部分抵消了这一影响。

表 4.1. 2009 -2018 年地区军费开支

2009-2018 年度数据按照 2017 年美元固定价格和汇率计算（单位 10 亿美元）；最右边一栏记为*的 2018 年数据按照当时美元价格计算（单位 10 亿美元）；由于四舍五入的惯例，数字总额和各项之和可能不完全一致。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8*
全球总计	**1689**	**1722**	**1728**	**1715**	**1691**	**1687**	**1715**	**1715**	**1735**	**1780**	**1822**
非洲	（35.9）	（37.6）	（40.6）	（41.5）	（45.7）	46.9	（43.8）	（42.9）	（42.7）	（39.2）	（）
北非	（11.5）	（12.7）	（15.8）	17.1	19.9	20.8	（21.2）	（21.4）	（21.1）	（19.9）	
撒哈拉以南非洲	24.4	（25.0）	（24.8）	（24.3）	（25.8）	（26.1）	22.5	21.5	21.7	19.3	
美洲	840	864	854	811	755	714	701	694	693	723	
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6.1	6.5	6.8	7.4	7.8	8.5	8.9	8.2	7.7	8.4	
北美	783	802	793	748	689	647	635	631	627	655	
南美	51.5	55.1	54.4	55.9	58.3	58.4	57.5	54.6	57.9	59.7	
亚洲和大洋洲	338	346	360	374	393	415	438	460	478	494	
中亚和南亚	64.3	65.2	66.4	66.8	67.0	70.5	72.3	78.0	83.7	87.2	
东亚	218	225	237	250	266	283	298	310	323	336	
大洋洲	24.4	24.7	24.3	23.5	23.3	25.1	27.5	30.0	30.1	29.2	
东南亚	30.8	31.2	32.2	33.5	36.9	36.6	40.2	41.6	41.3	41.0	
欧洲	337	331	326	329	324	327	338	350	343	348	
中欧	19.4	18.7	18.2	18.0	17.8	18.8	21.3	21.6	23.4	26.1	
东欧	55.5	56.4	60.6	69.7	73.1	78.5	84.6	89.3	73.1	71.9	
西欧	263	256	247	241	233	230	232	240	246	250	
中东	137	143	147	159	174	185	。。	。。	。。	。。	
GDP 占比(%)	2.6	2.5	2.4	2.3	2.3	2.1	2.3	2.3	2.2	2.1	
非洲	2.0	1.8	1.7	1.8	2.0	2.2	1.9	1.9	1.8	1.7	

美洲	1.6	1.5	1.5	1.5	1.5	1.4	1.4	1.4	1.4	1.4	
亚洲和大洋洲	1.8	1.7	1.6	1.6	1.7	1.7	1.8	1.8	1.7	1.7	
欧洲	1.8	1.6	1.6	1.6	1.5	1.5	1.6	1.6	1.5	1.6	
中东	4.6	4.3	4.3	4.6	4.7	4.8	5.4	5.2	4.9	4.4	
世界人均军费开支（当前美元$）											
世界军事负担（以当前美元计算世界军费开世界 GDP 占比）	228	237	248	245	242	239	226	230	230	239	

()=国家数据总数占区域总数 90%以下; ..=由于不确定性和缺失数据畸高而未能提供数据;GDP=国内生产总值。

注:根据 SIPRI 军费开支数据库数据，世界、地区、组织和收入群体的总数据估计。当一个国家的军费支出数据数年缺失时，大多数情况下假定该国军费支出变化速度与其所在区域变化一致。更多详细信息的来源和方法可以在网站获取。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copy_of_sources_methods

当无任何估算数据时，国家就被排除在总数之外。这些国家包括古巴、厄立特里亚、朝鲜、卡塔尔、索马里、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区域和收入群体的总数涵盖了所有年份的同一组国家。各组织的总数只包括在本年度内的成员国。地理区域和分区域的范围是基于 SIPRI 军费开支数据库中国家的分组。相关来源和方法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SIPRI 网站。

资料来源:SIPRI 军费开支数据库;2019 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8 年 9 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7 年世界人口展望”，2018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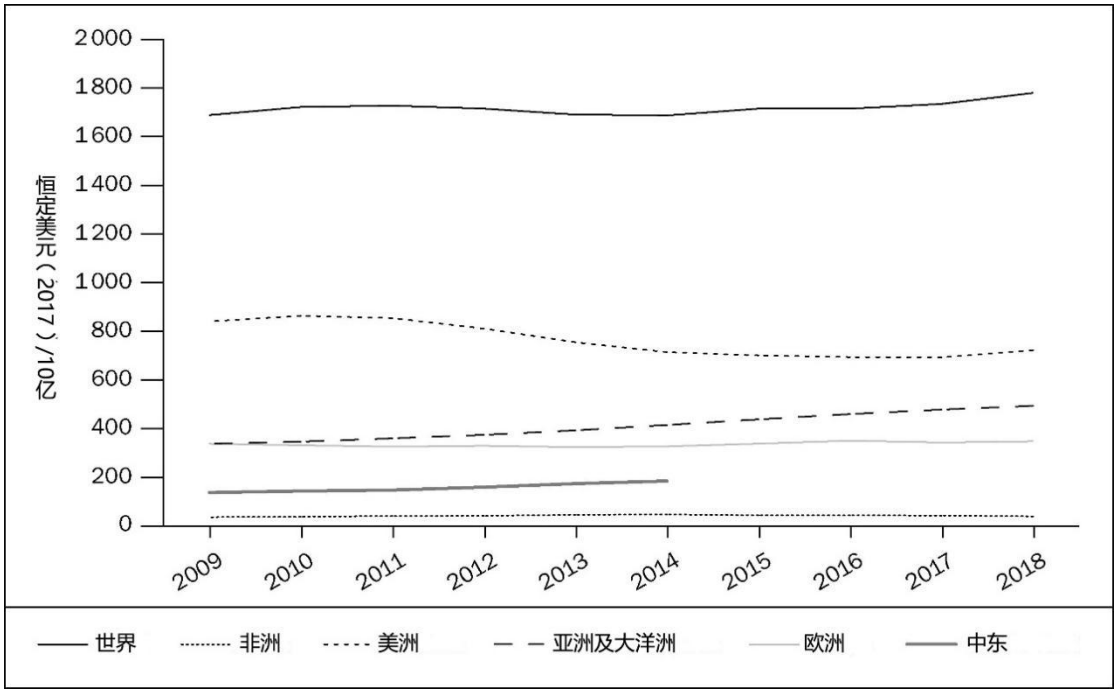


图 4.1　2009-18 年地区军费支出

注：由于数据高度不确定，因此未给出 2015-18 年中东军费支出估计数。但中东估计数已列入世界军费开支总和。

资料来源：SIPRI 军费支出数据库，2019 年 4 月。

2018 年军费支出增长可以从增幅最大、降幅最大两个维度的绝对值比较中一探究竟。2017 年，美国军费增加 278 亿美元，中国军费增加 113 亿美元，土耳其军费增加 43 亿美元。相比之下，降幅最大的国家其降幅绝对值则要小得多：降幅最大的沙特减少 46 亿美元，其次是俄罗斯的 23 亿美元和苏丹的 21 亿美元。

2009-18 年军费支出趋势

2018 年全球军费支出总额，连续第二年出现年度增长。2018 年增幅为 2.6%，是过去 10 年中最大的一次，超过了 2010 年的 2.0%。2009-18 十年间，世界军费支出增长了 5.4%，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2009 年至 2011 年增长，2011 年至 2014 年下降，2014 年至 2018 年增长（见表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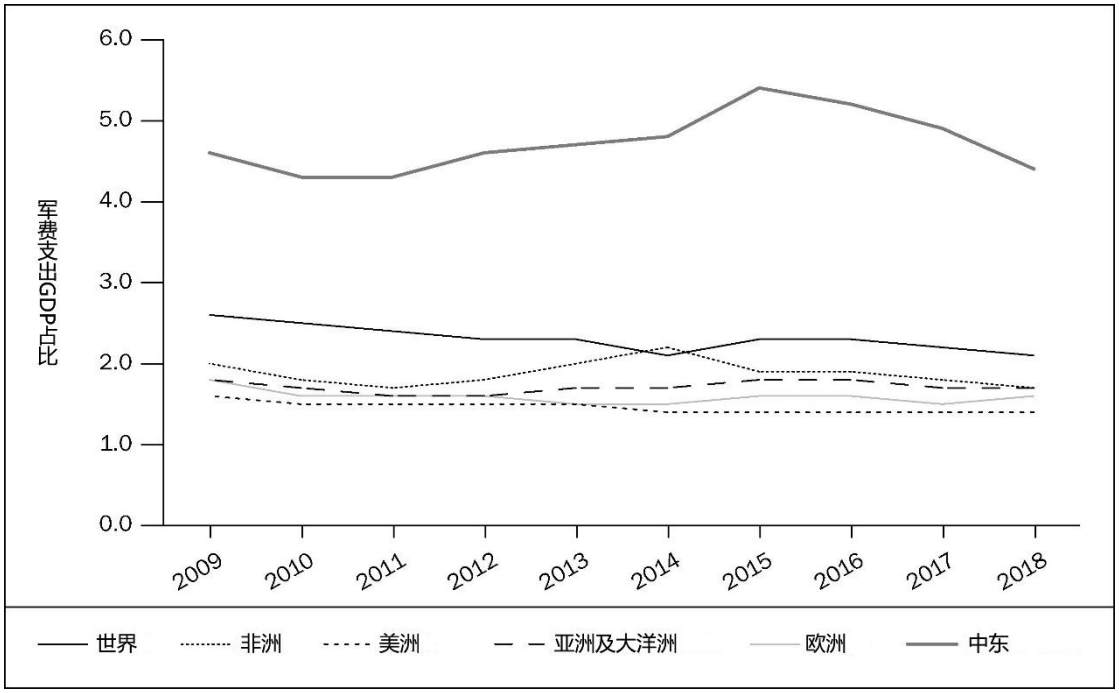


图 4.2　2009-18 年地区军费支出 GDP 占比

资料来源：SIPRI 军费支出数据库，2019 年 4 月。

2009 年至 2018 年期间，美国、中国、沙特阿拉伯、印度、法国和俄罗斯这五六个军费大国，常占到世界军费总开支的三分之二左右，因此对全球军费开支趋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美国为支持“全球反恐战争”而增加军费预算，导致世界军费开支出现上升。直至 2011 年，美国决定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世界军费随后开始下降。亚洲和大洋洲，军费开支继续增长，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印度军费开支增加。这也直接推动了 2009 年至 2011 年间世界军费支出的增长。俄罗斯军费开支在 2009-16 年间也有所增加，但随着 2010 年以来其主战武器现代化进程放缓，2017 年和 2018 年军费开支随之相应减少。2009 年至 2015 年，沙特阿拉伯军费开支稳步增长，但由于油价暴跌，2016 年军费开支也大幅下降。这导致中东地区支出大幅下降，部分对冲了全球增长趋势，但全球军费增长趋势主要受到亚洲、大洋洲和欧洲支出水平上升的影响。在西欧，2008-2009 年经济危机后的最初几年，紧缩措施导致一些传统军费大国削减军费开支，最明显的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

2009-18 十年间，只有三个次区域军费开支减少（见表 4.2）：撒哈拉以南非洲（21%）、北美（16%）和西欧（4.9%）。所有其他次区域，军事开支都在增长。增幅最大的三个是北非（74%）、东亚（54%）和中美洲及加勒比（39%）。

表 4.2. 2018 年地区军费开支核心数据统计

区域/次区域	军费开支 2018(US$b)	变化(%)a		主要变化,2017(%)a			
		2017-18	2009-18	增加		减少	
世界	**1822**	**2.6**	**5.4**				
非洲 b	(40.6)	-8.4	9.2	布基纳法索	52	南苏丹	-50
北非	(22.2)	-11	-21	津巴布韦	19	苏丹	-49
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	21.6	0.9	-6.8	尼日利亚	18	贝宁	-28
				乌干达	17	民主刚果	-27
美洲 c	734	4.4	-14	牙买加	40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8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8.6	8.8	39	多米尼加	13	阿根廷	-2.3
北美	670	4.4	-16	墨西哥	10		
南美	55.6	3.1	16	巴拉圭	8.7		
亚洲和大洋洲 d	507	3.3	46	哈萨克斯坦	16	缅甸	-8.9
中亚和南亚 e	85.9	4.2	36	柬埔寨	13	斯里兰卡	-8.4
东亚 f	350	4.1	54	巴基斯坦	11	马来西亚	-8.2
大洋洲	29.1	-2.9	20	越南	7.4	印度尼西亚	-6.3
东南亚	41.9	-0.8	33				
欧洲	364	1.4	3.1	亚美尼亚	33	俄罗斯	-3.5
中欧	28.3	12	35	波黑	26	希腊	-3.1
东欧	69.5	-1.7	29	拉脱维亚	24	北马其顿	-2.1
西欧	266	1.4	-4.9	保加利亚	23	法国	-1.4
中东 g	..	..	..	土耳其	24	伊拉克	-16
				黎巴嫩	6.8	巴林	-11
				科威特	6.6	伊朗	-9.5

（）=不确定的估计；[] - 估计数字；b-10 亿。

a 该名单标出了每个地区整体增加或减少幅度最大的国家，而非次区域。 2018 年军费开支不足 1 亿美元的国家，或非洲低于 5000 万美元的国家不包括在内。

b 数据不包括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

c 数据不包括古巴。

d 数据不包括朝鲜、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e 数据不包括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f 数据不含朝鲜。

g 2015-18 年 SIPRI 无中东估算数据。中东(不含叙利亚)估算数粗略并入全球合计数。

资料来源：SIPRI 军费开支数据库，2019 年 4 月。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军费急剧下降是该次区域军事开支最大的两个国家安

哥拉和苏丹开支减少的结果。在北美（即加拿大和美国），下降的唯一原因是2011-17年美国军费下降。西欧支出下降，主要是因为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降幅超过了德国的增幅。

相比之下，北非出现增长是因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支出增加。在东亚，中国继续增加军费，但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军费增长率下降。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支出较高主要是因为墨西哥及其扫毒战（见下文）。

尽管军费增长5.4%，但2018年2.1%的世界军费负担较2009年下降0.5个百分点（见表4.1）。这一下降主要是由于2009年经济衰退时GDP水平极低。因此，虽然从绝对值来看，当前的世界军费开支越来越多，但与2009年相比，世界也只是将总资源中的一小部分用于军事（见图4.2）。平均而言，2018年，美洲国家军费负担最低，占GDP1.4%；欧洲平均军费负担为1.6%，非洲和亚洲及大洋洲平均军费负担为1.7%，就可查数据，中东国家平均军费负担为4.4%。

2018年军费支出大国

2018年世界军费支出15强与2017年大体持平，但排名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见表4.3）。[4] 最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自2006年以来首次排在5强之外。2018年，排名前15位的国家共支出147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支出81%。军费开支两强仍为美国（占世界支出36%）和中国（14%），各自在全球支出中的占比较2017年提升了1个百分点。尽管沙特在2018年的军费开支绝对降幅最大（见上文），但位列世界军事支出三强。2018年，印度支出为665亿美元，从2009年的第9位上升至第4位。过去十年间，中国军费增长了29%。尽管法国军费支出略有下降（1.4%），但由于俄罗斯从第4位降至第6位，法国排名反而上升一位，升至第5位。法国和俄罗斯排名的变化部分原因也来自于汇率变化：虽然卢布对美元贬值，但欧元却升值了。

表4.3　2018年军费支出最高的15个国家

按当前价格和汇率计算，支出数据和GDP均为美元。变化是按实际价值计算，以不变美元为口径。因四舍五入，数字合计可能会与所述总数略有出入。

排名		国家	军费开支 2018 ($b,MER)	变化 2009-18 (%)	GDP占比(%) b		世界占比
2018	2017a				2018	2009	2018(%)
1	1	美国	649	-17	3.2	4.6	36

2	2	中国	[250]	83	[1.9]	[2.1]	[14]
3	3	沙特	[67.6]	28	[8.8]	9.6	[3.7]
4	5	印度	66.5	29	2.4	2.9	3.7
5	6	法国	63.8	1.6	2.3	2.5	3.5
小计	**前 5**		**1097**	**..**	**..**	**..**	**60**
6	4	俄罗斯	61.4	27	3.9	3.9	3.4
7	7	英国	50.0	-17	1.8	2.4	2.7
8	9	德国	49.5	9.0	1.2	1.4	2.7
9	8	日本	46.6	2.3	0.9	1.0	2.6
10	10	韩国	43.1	28	2.6	2.7	2.4
小计	**前 10**		**1347**	**..**	**..**	**..**	**74**
11	13	意大利	27.8	-14	1.3	1.6	1.5
12	11	巴西	27.8	17	1.5	1.5	1.5
13	12	澳大利亚	26.7	21	1.9	1.9	1.5
14	14	加拿大	21.6	12	1.3	1.4	1.2
15	15	土耳其	19.0	65	2.5	2.5	1.0
小计	**前 15**		**1470**	**..**	**..**	**..**	**81**
世界			**1822**	**5.4**	**2.1**	**2.6**	**100**

[] - 估计数字; ..-数据不可用或不适用;b-10 亿; GDP-国内生产总值;
a 2017 年排名是基于 2018 年 SIPRI 军事开支数据库最新数据。因此，可能与 2018 年 SIPRI 年鉴或 SIPRI 其他出版物排名不同。
b 军费开支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是根据 2018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对 2018 年 GDP 经估算得出。
资料来源:SIPRI 军事开支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9 年 4 月，
<https:// 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2/weodata/download.aspx>。

根据军费支出规模，前 15 强国家可分为 4 大类。美国和中国是支出两强，两国的军费支出总额是随后 13 个国家总和的 1.5 倍还多。其次是沙特、印度、法国和俄罗斯 4 个国家，其 2018 年的支出分别约为 600-700 亿美元；总支出大体相当于中国。第 3 类包括英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其 2018 年支出分别为 400-500 亿美元。第 4 类包括意大利、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土耳其 5 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支出约为 200-300 亿美元。

2009 年至 2018 年间，15 强中除 3 个国家外，其余 12 个国家均增加了军费开支。这 3 个国家是美国（负 17%）、英国（负 17%）和意大利（负 14%）。过去十年的两个高增长国家，中国（83%）和土耳其（65%）。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印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韩国的支出增长相对温和（即 10%-39%），法国、德国和日本小幅增长（即小于 10%）。

2018 年世界军费开支 15 强中，沙特的军费负担最重，GDP 占比 8.8%，而日本军费负担最低，为 0.9%。2018 年，所有 15 强国家军事负担都低于 2009 年。[5]

这一现象可以用 2009 年以来的全球经济衰退来解释，2009 年各国 GDP 要么出现负增长（如俄罗斯、沙特、美国），要么低于常规增速（如中国、印度）。特别是 2009 年，许多国家费事负担达到顶峰。美国军费负担降幅最大，从 2009 年 GDP4.6% 降至 2018 年的 3.2%。

美国

经过七年的下降，美国军费开支增长 4.6%，达到 6490 亿美元。[6]美国仍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军费支出国，其军费支出是第二大军费国中国的 2.6 倍（见下文）。不过，2018 年美国军费开支仍比 2010 年峰值水平降低 19%。2009-18 年的 10 年间，美国军费开支下降了 17%。进入 2010 年，美国军费预算方案在国会就一直磕磕绊绊，国会内部对军费预算分歧不断，国会和政府对军费水平也是各持一词。[7]

2010 年军费峰值是由于美国加强了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增派军事人员、加强武器装备。增兵是为了打击塔利班，并最终改善阿富汗安全环境。目的是美国能在 2014 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军。从 2011 年开始，美国军费逐年下降，直至 2017 年下降 23%。

2010 年军费峰值是由于美国加强了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增派军事人员、加强武器装备。增兵是为了打击塔利班，并最终改善阿富汗安全环境。目的是美国能在 2014 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军。[8]从 2011 年开始，美国军费逐年下降，直至 2017 年下降 23%。

2017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通过增加海外应急行动资金（OCO），为国防部追加预算 150 亿美元。虽然 2011 年预算控制法（BCA）对某些预算项目进行了限制，以减少美国的巨额赤字，但 OCO 不在其列。[9]这也是规避 BCA 预算限制的一种常规操作。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2018 年报告，1970 年至 2000 年间，包括海外军事行动在内的非基础预算约占 DOD 拨款总额 2%。[10]2001 年后，DOD 开始对 OCO 和基础预算资金区别对待。2001-18 年期间，每年非基础预算约占 DOD 总资金 20%。

2018 年，两党绕开 BCA，通过了一项为期两年的预算协议，协议增加了包括 DOD 在内的整个政府预算。[11]尽管达成短期一致，但在军费支出水平上依旧政治

分歧不断。

2018 年美国军费支出增加可归咎于两大核心因素。首先是按照法定公式自动计算得出的军饷增幅。[12] 2018 年军饷增加 2.4%，增幅较前几年大，但仍低于 2008-2010 年 3.4%-3.9%的水平。[13] 第二个因素是，常规武器采购和核武现代化的昂贵的军购项目逐步展开。根据美国国会估计，2017-2046 年期间，仅核武现代化一项总成本将达 1.2 万亿美元（2017 年美元）。如全面铺开，美国军费将比没有核武现代化的时候高出约 50%，因而美国军费开支将大概率大幅增长。[14]

DOD 在 2018 年国防战略摘要中对预算决策背后的驱动因素进行了介绍。[15] 美国安全战略面对的国际安全环境，其特点是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对美国带来挑战，国际规则和美国“竞争性军事优势”正受到侵蚀。[16]

中国

作为全球第二大军费支出国，中国 2018 年向军方拨款估计为 2500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5.0%。中国军费支出占全球军费支出 14%。SIPRI 中国军费数据同中国官方出版物数据不尽相同。中国官方数据不含 SIPRI 认为应列入军费开支的重要科目。其中包括人民武装警察（最大的新增科目）支出，复员军人支出；武器装备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军事建设；武器装备进口。因此，SIPRI 中国军费支出估计数通常比中国政府国防预算公布数据高出 40%左右：2018 年 1.1 万亿人民币（1750 亿美元）。[17]

1989-2018 年，SIPRI 收录有中国军费开支数据。从 1989 年起的 30 年里，中国军费绝对增长率（按 2017 年不变价格计算为 2200 亿美元）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实际增长率为 1140%。1989 年，中国军费开支与巴西、伊朗和沙特处于同一水平（见表 4.4）。时至 1999 年，中国军费支出超越俄罗斯，与意大利相当。到 2009 年，中国支出仅次于美国。2018 年，中国军费支出为伊朗的 19 倍、巴西的 9 倍和沙特的近 4 倍。

尽管中国军费自 1989 年以来增长了 10 倍有余，但军费增长始终与经济发展保持一致。这也符合中国政府的一贯原则，即军费开支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军费资金不应占用其他民用需求。[18] 1989-2018 年间，中国军费 GDP 平均占比 2.0%，始终保持在 1.7-2.5%的区间。自 2013 年以来，中国每年将 GDP 的 1.9%

用于军费。

表 4.4 1989-2018 年中国和特定国家军费支出

军费数据以美元计，按现行价格和汇率计价。变动以实际价值为准，以不变美元(2017 年)计。

	军费支出(当前美元/10 亿)				变化%
	1989	1999	2009	2018	1989-2018
中国	11.4	21	106	250	1140
巴西	8.8	9.9	25.6	27.8	71
伊朗	16.3	6.7	12.6	13.2	191
意大利	17.7	21	34	27.8	-10
俄罗斯	...	6.5	51.5	61.4	32a
沙特	12.7	18.3	41.3	67.6	199
美国	304	281	669	649	5.4

. . =数据缺失

a 由于俄罗斯当时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没有 1989 年军费数据。俄罗斯数据为 1992-2018 年。

资料来源：SIPRI 军费支出数据库，2019 年 4 月。

自 2013 年中国军费支出达到 2009 年后的峰值水平--9.3%，此后年增长率一直稳步放缓。2018 年 5.0%的增长率为 1995 年以来的最低年增长率。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降至 28 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果中国继续遵循上述原则，未来几年其军费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19]

地区趋势

非洲

2018 年，非洲军费支出连续第四年下降，下降 8.4%，估计为 406 亿美元。[20]这也创下地区军费降幅之最。虽然非洲军费支出较 2009 年增长 9.2%，但仍比 2014 年峰值降低 16%（见表 4.1 和 4.2）。2018 年，北非军费总支出为 222 亿美元。较 2017 年（见图 4.3）下降 5.5%，为连续第二年下降。不过，2018 年支出比 2009 年高出 74%。

2018 年，阿尔及利亚军费总额为 96 亿美元，是迄今为止北非乃至整个非洲军费之最。虽然从名义上讲，阿尔及利亚军费开支自 2016 年以来一直保持不变，但通胀意味着其 2018 年军费开支实际下降 6.1%。阿尔及利亚政府数据可靠性值得怀疑：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连续三年公布的军费预算数字完全相同，但不太可能向军方拨付同样数额的资金。地区通胀和安全形势的不断变化意味着军费开支可能已经增加，因此 222 亿美元可能被低估。

2018 年，阿尔及利亚邻国军费支出几乎没有变化：摩洛哥军费支出 37 亿美元（增长 0.1%），突尼斯 8.44 亿美元（下降 0.4%）。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是非洲军事负担最高和第三高的国家，分别占到其 GDP 的 5.3%和 3.1%。

撒哈拉以南非洲，2018 年军费开支为 184 亿美元，较 2017 年下降 11%，比 2009 年下降 21%。军费大幅下降意味着，北非（只有 4 个国家）开支首次超过撒哈拉以南非洲（有 45 个国家）。[21] 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军事开支增加的国家数量同军费开支减少的国家数量大致相同。糟糕的经济状况仍然是军费削减首要驱动力，而军费增加则仍来源于其背后的武装冲突。

安哥拉和苏丹支出减少是主要原因。虽然两个国家都提供了官方军费预算，但这些数据可能都不可靠。石油收入可能是这两国军队获得国家预算外拨款的主要渠道。[22] 如果安哥拉和苏丹不计入军费总支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军费支出 2017-2018 年间将保持不变。

2018 年，安哥拉军费支出连续第四年出现下降，降至 20 亿美元。较 2017 年下降 18%，比 2014 年的峰值水平下降了 68%。至 2014 年年中以来，油价低迷使得安哥拉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为稳定宏观经济、遏制财政收入下滑，安哥拉实施了经济改革。[23]2018 年年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了 37 亿美元贷款，以支持安哥拉经济改革，但高企的债务(内债和外债)仍是一个头疼的问题，预计安哥拉在 2019 年将会继续削减政府开支(包括军费)。[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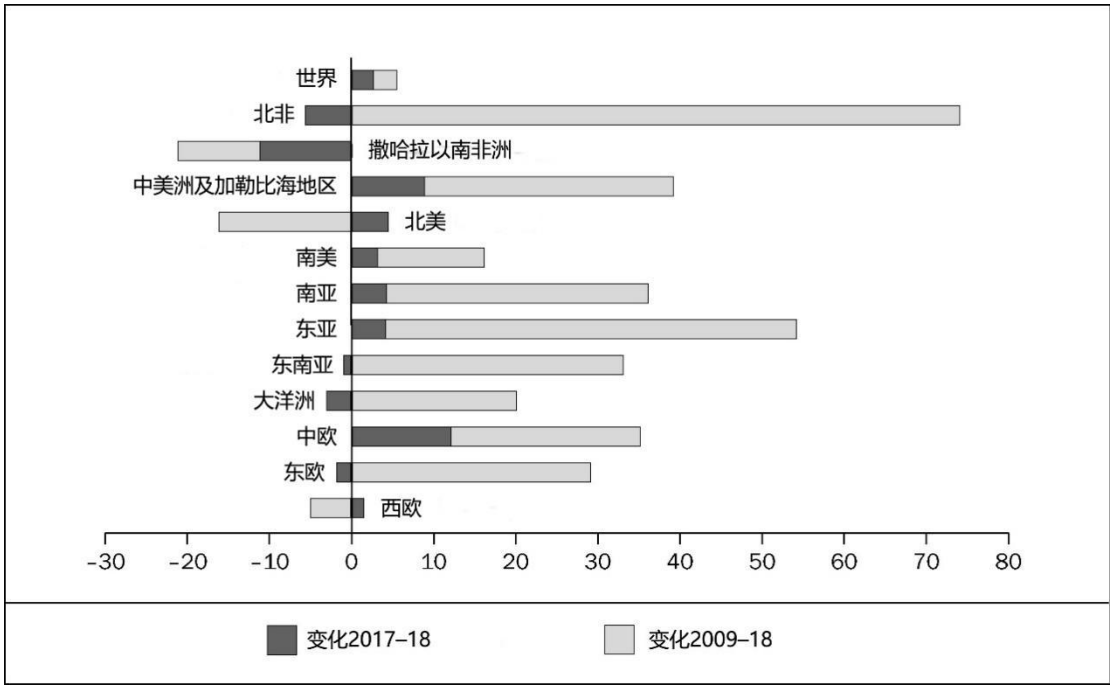


图 4.3　2009-18 年和 2017-18 年次区域分列军费支出变化

注：由于 2015-18 年数据高度不确定，因此未给出中东军费支出估算值。但中东估算数已列入全球总计。
资料来源：SIPRI 军费支出数据库，2019 年 4 月。

苏丹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同时还深陷达尔富尔持续暴力冲突以及针对奥马尔•巴希尔总统的抗议活动激增。[25]这也使得过去五年，苏丹军费起起落落，其中三年(2014,2015 和 2018)的军费开支实际减少了两位数，两年(2016,2017)军费增长。2018 年军费支出下降 49%，降至 10 亿美元。[26]这是非洲 2018 年的最大绝对降幅和第二大相对降幅。预计苏丹经济困局还将继续。苏丹必须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以满足 IMF 和世界银行的重债穷国减债计划的要求。[27]

2018 年，南苏丹（－50%）、贝宁（－28%）和刚果共和国（－27%）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军事开支也出现显著下降。即使在次区域最大的军费支出国南非，2018 年军费也下降了 5.2%，降至 36 亿美元。

南苏丹自 2009 年以来，第七次出现军费下降，背后的动因是连年内战导致经济陷入混乱。[28]南苏丹经济问题包括真实 GDP 收缩、粮食价格飙升，货币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29] 2018 年南苏丹 5940 万美元的军费支出仅为 2011 年峰值的 4.2%。然而，南苏丹军费数据仅指其国家预算报告中的数字；但据报道，南苏丹军费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非预算渠道，直接由该国国有石油公司出资。[30]此类开支的确切数字，尚未可知。

贝宁，2018 年用于武装部队基础设施项目和武器装备开支下降了 68%，军费开支也相应有所下降。[31]刚果共和国，与许多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囊中羞涩依旧是预算削减的最大动因。[32] 2018 年军费支出 2.92 亿美元，较峰值水平的 2014 年下降 57%。

与上述军费削减不同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些国家在 2018 年增加了军费开支。其中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二大军费国尼日利亚，6 年来首次增加军费开支，增幅 18%，达到 20 亿美元。尼日利亚面临包括博科圣地在内的众多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33]

2018 年，布基纳法索军费支出增加 52%，达到 3.12 亿美元，是世界上相对增幅最高的国家。2017 年，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 5 倍。这也与布基纳法索武装部队参加五国集团萨赫勒（G5 萨赫勒）联合部队，对博科圣地等激

进组织采取集体军事行动有关。[34]

美洲

2018 年，美洲军费开支 7350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4.4%，但仍比 2009 年低 14%（见表 4.1 和 4.2）。两个军费大国（加拿大和美国）支出占到区域军费总额绝大部分（91%），南美 7.6%，中美洲和加勒比 1.2%。全球军费 15 强中有 3 个国家在美洲：美国（排名 1）、巴西（排名 12）和加拿大（排名 14）。

2018 年，北美军费总额 6700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4.4%（见图 4.3）；然而，仍比 2009 年低 16%。相比之下，2009-18 年间，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军费增长 39%，南美洲增长 16%。2017 年至 2018 年间，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增长 8.8%（达到 86 亿美元），南美洲增长 3.1%（达到 556 亿美元）。

美洲，2018 三大军费正增长国都在中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牙买加增长了 40%，多米尼加共和国 13%，墨西哥 10%。墨西哥军费开支占中北美和加勒比地区 77%。2018 年，墨西哥年度军费增长 10%，增至 66 亿美元，这是 2015 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十多年来，墨西哥警察和宪兵，同时部署军队清剿贩毒集团，行动日渐军事化。[35]2017 年《内部安全法》正式将军事参与警务合法化，但 2018 年 11 月，国家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法令。鉴于事态发展，武装部队在反毒活动中究竟是何角色，尚不明晰。

南美洲军费大国，巴西（50%）、哥伦比亚（19%）、智利（10%）和阿根廷（7.5%）。2018 年，四国军费总额占到次区域支出的 87%。南美洲只有两个国家军费出现下降：阿根廷（－2.3%）和委内瑞拉（见下文）。[36]

2018 年，巴西军费增长 5.1%，至 278 亿美元。[37]这是继 2017 年增长 6.5% 之后再次实现正增长。尽管巴西经济持续放缓，公共开支受限，但巴西军费开支仍有所增加。2016 年，宪法修正案实施了一项新的财政制度，对未来 20 年的政府总开支实施限制。[38]然而，与其他政府开支部门命运不同，军费并未受到影响。2018 年巴西军费增加，而医疗和教育总支出下降 3.8%。[39]

巴西军方经常参与全国各地的警方行动，但此类行动经费均不列入国防部（MOD）年度国家预算。SIPRI 不将部队参与警务活动支出视为军费开支，故也不将此类支出计入巴西军费开支（相关详细讨论，见第 2 节）。

委内瑞拉经济萎靡、政治社会危机四伏，军费在国家预算分配时仍处于强势特权地位。[40]有证据表明，军费预算优先于教育、住房及粮食等重要社会需求。[41]随着2018年委内瑞拉通胀飙升至千分之几，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急需追加预算。军事部门不仅是最早获得追加资金的部门，同时也是获得额外预算最多的部门之一。[42]由于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GDP估算严重偏差，2018年SIPRI第一次未对委内瑞拉军费做出现值或连续美元估算，同时也未对其军费GDP占比进行估算统计。[43]根据政府预算，与2017年相比，军费支出（以当地货币计）下降了81%，但仍低于住房（97%）和教育支出（87%）降幅。[44]

亚洲及大洋洲

2018年，亚洲及大洋洲军费开支达5070亿美元。军费总额占到全球军费开支28%，2018年全球军费15强中，有5个位于该地区：中国（排名2）、印度（排名4）、日本（排名9）、韩国（排名10）和澳大利亚（排名13）。与2017年相比，2018年支出增长了3.3%，延续了1988年以来的持续升势。这一地区也是1988年以来，唯一一个保持年度增长的地区，2009年至2018年的增长率为46%，也是所有地区中的最高增长率。[45]其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军费支出的强劲增长。2018年中国军费支出占到该地区中支出的49%，高于2009年的31%（见上文）。

2009年至2018年，所有四个次区域都有大幅增长：东亚增长54%，中亚、南亚36%，东南亚33%，大洋洲20%（见图4.3）。2018年，中亚、南亚和东亚军费支出分别增长4.2%和4.1%，继续保持了两个次区域（中亚、南亚自1992年以来，东亚自1995年以来）连续的增长趋势。相比之下，2018年东南亚（下降0.8%）和大洋洲（下降2.9%）军费支出略有下降。

2009年至2018年间，亚洲和大洋洲军费相对增幅最大的国家是柬埔寨（191%）、蒙古（115%）和孟加拉国（102%）。印度尼西亚（99%）、中国（83%）、越南（76%）、巴基斯坦（73%）、吉尔吉斯斯坦（72%）、缅甸（57%）、哈萨克斯坦（53%）和菲律宾（50%）也出现高增长（40%至100%）。该地区共有8个国家在过去10年削减了军费开支：阿富汗、文莱达鲁萨兰国、斐济、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斯里兰卡、台湾和东帝汶。

2018年，印度军费总额为665亿美元，含MOD开支及内政部下辖若干大型

准军事力量开支。[46]2017 年，印度超越法国，跻身世界军费 15 强，2018 年一跃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四大军费国（见表 4.3）。印度 2018 年军费支出连续第五年正增长，较 2017 年增长 3.1%，较 2009 年增长 29%。尽管如此，2018 年的印度军费负担仍处于 60 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仅占到印度 GDP2.4%，而 2017 年和 2009 年分别为 2.5%和 2.9%。印度政府不断加码军费的主要动机是印巴和印中紧张局势和地区博弈。印度政府大力采购国内外先进武器装备，大力提升国防武装力量。[47]然而，由于大部分军费预算都用来给付军饷，近年来印度面对庞大的军购机构，现在的军费预算已然有些力不从心。方方面面给政府施压，力图将军费 GDP 占比提升至 3%，印度议会国防常务委员会就是急先锋。[48]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认为增加预算根本不可行。预算编制完全可以更为合理，军购流程更为透明，军事人员更为精简，在当前的预算水平上都能开源节流。[49]

2018 年，日本军费支出为 466 亿美元，与 2017 年几乎持平（微降 0.1%）。自 2009 年以来，日本军费增长 2.3%，到目前为止，为东亚地区最低增长率。[50]日本计划在 2019 年至 2023 年间，保持类似水平军费支出。[51]日本军费支出 GDP 占比 0.9%，而 2019 年至 23 年预算计划，其目标就是将军费负担降至 GDP1%的临界值。1987 年起，日本官方就已宣布这一临界值，但 1976 年至 1987 年间，都未实现。[52]然而，日本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 或北朝鲜），以及美国的压力，敦促日本将军费提升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为其成员国制定的 GDP 占比目标。[53]

韩国，自 2000 年以来军费上升趋势仍在延续。2018 年，韩国军费支出达到 431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5.1%，较 2009 年增长 28%。包括支付给驻韩美军的 8.5 亿美元，分摊 28500 名驻韩美军费用，相当于驻韩美军非人员支出的 41%。[54]自韩国 1991 年开始分摊驻韩美军费用，这一支出几乎每年都在增加。[55]韩美就 2019 进一步增加分摊金额达成协议，尽管并未达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的金额（增加 3 倍）。[56]

2018 年，澳大利亚 2018 年军费开支为 267 亿美元，较 2009 年高出 21%，但比 2017 年低 3.1%。过去十年，澳大利亚军事开支，含主战武器采购大幅增加。尤其是 2014-17 年间，为应对亚太地区安全威胁，厉兵秣马、加紧军备。[57]

亚洲及大洋洲的一些军费小国，如马来西亚、阿富汗和东帝汶，过去几年中

军费显明显下降。

尽管与邻国中国在南中国海权利问题上摩擦不断，但马来西亚 2018 年 35 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较 2017 年还是减少了 8.2%，较 2009 年下滑 18%。[58]2018 年军费削减已是马来西亚连续第三年削减军费开支，马来西亚军费 GDP 占比也降至 1.0%，创下历史最低水平。这些都源于马来西亚努力降低预算赤字和债务。[59]

2018 年，阿富汗军费开支为 1.98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6.7%，但比 2009 年下降 26%。阿富汗军费负担 GDP 占比从 2009 年的 2.1%下降到 2018 年的 1.0%。考虑到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叛乱组织之间冲突的激烈程度，军费持续下降和较低的军费负担可能让人颇为意外。[60]然而，阿富汗战争大部分经费由美国承担。据估计，自 2001 年阿富汗开打以来，美国至少花费了 1-2 万亿美元。[61]根据美国国防部，2019 年美国将拨款 52 亿美元支持阿富汗军队，并计划花费约 390 亿美元用于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62]

2018 年，东帝汶军费开支下降 20%，降至 2060 万美元（较 2009 年减少 63%）。这也是 SIPRI 数据中亚洲及大洋洲国家的最低军费支出水平。军费下降部分是源于外国捐助者提供了部分军费。[63]

欧洲

2018 年，欧洲军费总开支为 3640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1.4%，较 2009 年增长 3.1%（见表 4.1 和 4.2）。欧洲军费开支约占全球军费支出 20%，仅次于美洲、亚洲和大洋洲。世界军费 15 强有 5 个国家在欧洲：法国（排名 5）、俄罗斯（排名 6）、英国（排名 7）、德国（排名 8）和意大利（排名 11）。相当多的中欧和西欧国家在 2018 年增加了军费开支，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2018 年，西欧军费开支为 2660 亿美元，占欧洲军费总开支近四分之三。与 2017 年相比上升 1.4%，但较 2009 年相比下降了 4.9%（见图 4.3）。西欧 20 个国家（不包括微型国家）中，2018 年只有 3 个国家削减了军费开支：希腊（－3.1%）、法国（－1.4%）和意大利（－1.4%）。增幅最大的国家是爱尔兰（11%）、荷兰（10%）和卢森堡（9.8%）。

从名义上看，法国军费预算与 2017 年持平，实际减少 1.4%。不过，其 2018

年638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较2009年增长1.6%。2014-18年间，法国军费增长9.3%，2009-14年间下降7.1%。自2014年起，法国军费增加是因为2015年1月7日至9日和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法国对外军事行动和国内大规模军事行动产生相关费用。[64]

2010年后，法国军事行动超出正常行动范围的补充费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其他各部门根据“部门间团结”原则所提供的预算资金。这也是所有部委都达成一致的一个分摊预算及迅速解决灾难性事件的惯例。如恐怖袭击或核电站故障或是额外突发海外军事行动(军事干预或和平行动)。[65]国防部是这一操作的唯一受益方。国防部从其他部门获得资金，用于支付法国数年来海外军事行动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其中35%来自国防部预算，其他部门贡献了65%。然而，这一做法在2018年发生了变化，国防部必须自行负担法国军事行动所产生的所有补充费用。[66]

2017年至2018年间，英国军费增长1.0%，达到500亿美元。然而，在2009-18年的十年间，英国军费实际减少了17%（见表4.3）。经历了头几年的急剧下降之后，自2015年以来，英国军费开支或多或少保持了稳定。英国主战武器现代化的长期计划，包括昂贵的核潜艇现代化项目。[67]过去五年，军费预算原地踏步，脱欧又给英国经济带来冲击。武器现代化计划在2030年形成战力，而英国是否有能力负担武器现代化，人们表示怀疑。[68]

作为西欧第三大军费国，德国在2018年将军费开支提高了1.8%，增至495亿美元，较2009年高出9.0%，GDP占比1.2%。德国政府2016年决定，德国应在全球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将致力于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德国宣布将致力于实现北约军事支出GDP2%的长期目标，但并未设定明确的时间表。[69]2018年，国防部长乌苏拉•冯•德莱恩宣布，这一长期目标仍然有可能实现，但当前目标是到2025年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1.5%。[70]

中欧，283亿美元的军费总额仅占欧洲军费7.8%。2018年，该次区域军费支出较2017年增长了12%，较2009年增长了35%。军费增加主要是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71]该次区域几个国家的军费相对增长率是2009年以来欧洲最高。波兰是中欧迄今第一大军费国，占中欧军费总额41%。2009年至2018年间，波兰军费增加了48%。罗马尼亚是该次区域第二大军费国，增

加了 112%。立陶宛十年来增长率最高：156%。

2018 年东欧军费开支为 695 亿美元，较 2017 年减少 1.7%，但较 2009 年增加 29%。这是继 1998 年以来东欧军费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此前一直稳步增长。不过，该次区域只有摩尔多瓦和俄罗斯两个国家削减了军费开支。东欧四个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和乌克兰军费负担相对较高，为 GDP3.8%至 4.8%。这一水平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1%）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

2018 年，俄罗斯军费开支为 614 亿美元，占该次区域军费总额近 88%。包括俄罗斯准军事组织（国民警卫队和边境服务局）开支，占俄军费总额 9.2%。俄罗斯从 2010 年开始实施重大军事现代化计划，致使 2016 年之前，俄军费开支逐年有大幅增长。[72] 然而，2016 年峰值之后，俄罗斯军费开支在 2017 年下降 19%，2018 年再次下降 3.5%。名义本币计，俄罗斯 2018 年军事拨款较 2017 年减少 0.8%。因此，俄罗斯 2.8%的通胀率也促成了其实际军费下降。2018 年军费负担下降，从 2017 年 GDP4.2%降至 2018 年 3.9%，回落至 2014-15 年和 2009 年的水平（见表 4.3）。俄罗斯计划在 2019 年增加约 4.0%的军费开支，并在 2020 年保持稳定。[73]2018 年，武器装备采购开支占总预算的比例仍高达 40%。2019-21 年，预计军购资金略有下降，但由于预计军费总预算降幅会更大，因此军购占军费中预算份额将会更大。[74]

2014 年初以来，乌克兰武装冲突不断。[75]2018 年，乌克兰军费开支为 48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21%，较 2013 年增长 53%。2018 年之前，连续两年略有下降。2018 年军费增长，主要是因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进行改革，其中就包括军备采购。[76] 然而，2018 年，军购占比仍低于 15%。[77]

2018 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军费增加，其主要驱动力是两国连绵不绝的武装冲突。[78] 2018 年，阿塞拜疆军费为 17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6.2%，亚美尼亚军费增加 33%，达到 6.09 亿美元。亚美尼亚军费负担从 2017 年的 GDP3.8%上升至 2018 年的 4.8%，这也是其 1991 年独立以来的最高占比。两国都已为 2019 年追加军费预算。[79]

中东

由于卡塔尔、叙利亚、阿联酋和也门 4 个国家数据缺失，SIPRI 自 2014 年

以来一直未提供中东军费支出估计数。根据卡塔尔和阿联酋目前已知的大型武器装备采购和前几年的军费水平，卡塔尔和阿联酋都被认为军费支出相当可观。

有数据的 11 个中东国家，2018 年军费总额为 1450 亿美元。[80]2009 年至 2015 年，这些国家军费总额每年都在增加，2016 年则大幅下降。石油是中东几个军费大国的主要收入来源，2014 年油价崩塌似乎是背后的主要原因。[81] 2017 年军费开支再次上升，但 2018 年下降了 1.9%。

2018 年，全球军费 15 强有两个国家位于中东：沙特阿拉伯（排名第 3）和土耳其（排名第 15）。沙特是中东迄今为止最大军费国，2018 年沙特军费总额估计为 676 亿美元（见表 4.3）。2018 年，沙特军费负担 GDP 占比为 8.8%，世界第一。[82]2009-18 年间，沙特军费支出规模起起落落。从 2009 年首次出现 72%的正增长，逐步攀升至 2015 年峰值，随后在 2016 年出现 28%的下滑，原因是油价杀跌导致政府收入锐减。2017 年小幅增长 11%，随后 2018 年再次下滑 6.5%。

2009 年至 2018 年间，土耳其军费大涨 65%，达到 190 亿美元。仅 2018 年就上升了 24%，为全球军费 15 强增幅之首。2018 年，军费负担增长 0.4 个百分点，占 GDP2.5%。土耳其 2018 年军费负担较 2015 年高出近 40%，2015 年也为土耳其军费负担最低水平，但也与 2009 年基本持平。军购支出急速增加。国防工业支持基金是一个专门支付一些列武器生产和装备采购相关支出的专项基金，2016 年后基金预算扩大了 77%，在 2018 年达到 42 亿美元。[83]军费增加的同时，土耳其还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采取了大规模军事行动。[84]

如有相关数据，阿联酋也可能在 2018 年跻身 15 强。2014 年，阿联酋已是中东第二大军费国，据最新估计，2014 年阿联酋军费开支为 228 亿美元（当前美元计）。阿联酋 2018 年军费开支很可能与当年也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时相当，甚至更高。也门军事行动费用并未计入 2014 年军费，阿联酋那时还置身叙利亚战事，2014 年阿联酋也大量进口了各类主战武器。[85]

2018 年，以色列军费开支 159 亿美元，较 2017 年相比微增 0.7%。2015 年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军费达到峰值之后，以色列军费支出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下降了 13%和 1.0%。2018 年，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以安全威胁不断加大，并且以色列经济增长强劲为由，宣布计划在未来几年将以色列国防军和情报部门综合预算 GDP 占比提升 0.2%至 0.3%。[86]这也将比 2018 年综合预算还高出

11 亿美元。[87] 由于计划预算增长并未进行详细分类，其对军费开支的影响尚不清楚。

到 2014 年，伊朗的军费开支比 2006 年的峰值稳步下降了 30%。随后，到 2017 年，军费开支增长 32%。然而，随着伊朗经济陷入衰退，通胀率从 2017 年的 10%升至 2018 年的 30%，2018 年军费开支再次下降 9.5%，达到 132 亿美元。

中东其他几个国家军费数据无法获取，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错综复杂、波诡云涌的也门内战，也门军费开支也不为人知。[88] 然而，也门政府军--宣布效忠于国际公认的也门政府--军费却也是捉襟见肘。[89] 同时政府军和受政府控制的准军事组织都可从阿联酋获取资金和武器装备，但具体金额不详。[90] 这类资金都被阿联酋计入军费开支。

多年来，阿曼一直是世界军费负担最重的国家。然而，根据最新消息，SIPRI 已调低阿曼军费开支估算数。阿曼财政部和阿曼中央银行公布的年度文件，其中包括国防和安全预算以及实际支出数据。除军费支出，还包括警察、海关和其他不属于 SIPRI 定义的相关支出。国防和安全预算中用于此类非军事活动的资金比例不得而知。然而，根据武装部队和警察规模的相关公开数据判断，SIPRI 当前估计，大约国防和安全预算的 75%用于军费开支。这也导致 2018 年阿曼军费负担 GDP 占比为 8.2%，仍未 2018 年世界军费 GDP 占比第二高的国家。

2018 年埃及军费开支为 31 亿美元，较 2017 年减少 7.3%，较 2009 年减少 20%。2016 年至 2017 年间，埃及镑贬值 78%，2018 年通胀率达到 21%，至少部分解释了埃及军费减少的原因。然而，目前仍不清楚埃及如何做到一面参加西奈半岛重大军事行动、加大主战武器装备军购，同时又做到降低军费。[91] 可能政府公布的预算数据不包含所有的军费开支。或者说，埃及部分军购资金来源于外国军援资金。自 1975 年以来，美国向埃及提供了大量军援；2018 年军援达到 12 亿美元，与过去十年间大多数年份基本持平。[92] 沙特也向埃及提供了大量的财政和经济援助。据报道，援助包括对埃及军购的资金支持，其中就有 2018 年订购两艘新护卫舰。[93] 然而，埃及和沙特两国都未正式证明这一点。

1 SIPRI 对全球 168 个国家 2018 年军费开支数据进行了统计，共有 155 个国家获得了相关数据。关于世界和区域总数估计数的更多详情见表 4.1。
2 2018 年各项军费支出均以 2018 年当期美元计价。除另有说明，2017 年军费开支增减数均以不变美元表示，经常被描述为“实际价值”变化或经通胀调整后的数字。2018 年世界军费支出以 2018 年当期美元(18220 亿美元)和 2017 年不变美元(17800 亿美元)计算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由于美元对世界其他货币整体贬值所致。SIPRI 所有军费数据都可以在 SIPRI 军费数据库中免费获得。本文所述数据来源和生成方法均在 SIPRI 网站上有所介绍，并在第 2 节 4.1 栏中进行了总结。
3 GDP 估算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2018 年 9 月。
4 阿联酋很可能位列 15 大军费开支国之一，最有可能在 11-15 之间。但自 2014 年以来数据缺失，这也意味着无法对其军费开支做出合理估计，因此被排出前 15 名。
5 根据四舍五入惯例，表 4.3 中，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和土耳其 2009 年和 2018 年的军费开支 GDP 占比变化不大。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2009 年全球军事负担还是更高。
6 美国军费数据是基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数据得出，其中包括能源部的核支出，以及国务院在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IMET)、维和和外国军事融资 (FMF) 方面的支出信息。
7 罗森博格•Y，“一个四分五裂的国会如何管理国防预算?”，《财政时报》，2018 年 11 月 20 日。
8 白宫，“总统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未来向全国发表讲话”，2009 年 12 月 1 日;佩罗•弗里曼•S，伊斯梅尔•O 和索米拉诺•C，“军费开支”，SIPRI 年鉴 2010，第 177-200 页。
9 思肯斯•S 和佩罗•弗里曼•S，“美国军费开支与 2011 年预算危机”，SIPRI 年鉴 2012，第 162-66 页;亨利夫•B，雷比茨基•E 和马汉•S•M，“2011 年预算控制法”，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向国会提交报告(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1 年 8 月 19 日)。
1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海外应急行动资金及其对国防开支的影响(CBO:华盛顿，2018 年 10 月)。
11 丹尼尔斯•S•P 和哈里森 T，“理解 2018 年两党预算法案及其对国防支出的意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018 年 2 月 20 日。
12 卡普•L，“国防部长：军饷上调”，《焦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2018 年 12 月 17 日。
13 美国国防部，国防部人事和战备副部长办公室，军事赔偿，“年度工资调整”。
1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美国核力量成本管理方法，2017 年至 2046 年(CBO:华盛顿，2017 年 10 月)。关于核现代化，见本卷第 6 章第 1 节。

15 美国国防部(DOD),,“2018 年美国国防战略纲要:增强美国军事竞争优势”(DOD:华盛顿特区，2018 年 1 月)。国防战略本身是保密的。
16 美国国防部(注 15)，第 1-3 页。
17 关于 SIPRI 中国军费开支估算方法见 SIPRI，“SIPRI 中国估算”。
18 中国国务院，“2008 年中国国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北京，2009 年 1 月)第 12 章。
19 郭•L，“中美贸易战开打，中国经济增速降至 1990 以来的最低点”，《卫报》，2019 年 1 月 21 日。
20 这一地区的军费开支总额不包括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这两个国家不可能获得可靠数据。
自 2003 年以来，SIPRI 就未收录厄立特里亚军费开支数据。虽然索马里军费预算是以美元计算，但并未收录其 GDP 或通胀数据，因此不可能将该国包括在地区或全球总预算之中。
21 撒哈拉以南非洲军费总支出不包括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这两个国家据信支出较少，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见注 20)。
22 沙里夫•K，“军方，政治领导人在幕后操纵安哥拉深海石油交易”，《邮卫报》，2016 年 4 月 19 日；努巴报道，“苏丹经济:为战争设计的年度预算”，2016 年 2 月 16 日。
2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安哥拉:2018 年第 4 条磋商工作人员报告，IMF 国别报告 No.18/156(IMF:2018 年 4 月 25 日，华盛顿)。
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 执行董事会批准安哥拉扩展基金机制下 37 亿美元的展期安排”，新闻发布 No.18/463，2018 年 12 月 7 日;麦考布，“安哥拉政府下令削减 2019 年预算下的公共开支”，2019 年 1 月 15 日。
25 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 2019 年十大冲突担忧(ACLED:威斯康星州麦迪逊，2019 年 2 月 1 日)，第 21 页;鲍多•S，“苏丹经济崩溃咎由自取:腐败的经济陷入危机，巴希尔政权急于巩固权力”(华盛顿特区,2018 年 11 月)，第 3 页。
26 以当地货币计，2017 年至 2018 年，苏丹军事预算名义下降 17%。
27《苏丹论坛报》，“苏丹呼吁 IMF 帮助缓解经济困境”，2018 年 7 月 17 日;巴尔多(注 25)，第 5 页。
28 关于南苏丹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有关非盟、欧盟和联合国对南苏丹实施武器禁运见本卷第 10 章第 2 节。
29 奥杜哈•J，“经济危机使得南苏丹人食不果腹”，《东非》，2017 年 10 月 29 日。
30 全球见证组织，“尼罗河上的抓捕”(全球见证组织:伦敦,2018 年 4 月)，第 7-8 页;米里•D，“活动人士指责南苏丹利用石油现金资助冲突”，路透社，2018 年 3 月 6 日。
31 贝宁经济和财政部，“公共财政文件”。
3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 工作人员结束对刚果共和国项目的谈判任务”，新闻发布，No.18/137，2018 年 4 月 19 日;艾里安•C 和罗斯•A，“由于经济增长滞后，刚果共和国将在 2018 年削减 9%开支”，路透社，2017 年 12 月 28 日。
33 关于尼日利亚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34 法国欧洲与外交部，“萨赫勒 5 国联合部队和萨赫勒联盟”，《法国外交》，2019 年 2 月。关于萨赫勒地区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35 李•B，伦威克•D 和拉布拉多•R•C，“墨西哥的毒品战争”，外交关系委员会，2019 年 1 月 24 日；伊米森•P，“向墨西哥毒品宣战”，《异见》，2018 年 1 月 11 日。
36《内部安全法》，2017 年 12 月 21 日，《德国之声》，“墨西哥规定军事打击卡特尔是非法的”，2018 年 11 月 16 日。
37 拉波萨•K，“这就是巴西经济的失败之处”，福布斯，2018 年 9 月 7 日。
38 2016 年第 95 号宪法修正案，2016 年 12 月 15 日。
39 关于巴西预算，见巴西规划发展和管理部，联邦预算秘书处，“综合规划和预算制度”。
40 梅里莫普洛斯•E，“危机中的委内瑞拉:这个国家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半岛电视台，2019 年 1 月 22 日。
41 透明委内瑞拉，“政府批准向军队提供 2018 年国家预算外额度”，2018 年 7 月 4 日。
42 透明委内瑞拉，今年批准的额度超出 2018 年预算 691%，2018 年 6 月 5 日。
43 SIPRI 军事开支数据库只提供以当地货币计算的名义预算(注 3)。委内瑞拉以美元计算的军费开支估计数用于计算区域和世界总开支。
44 透明委内瑞拉，“窥探：国家预算法的秘密”，2018 年 9 月 27 日。
45 2009-18 年朝鲜、土库曼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 2009-18 年数据缺失，且上述国家数据也未计入亚洲和大洋洲总数之中。塔吉克斯坦和缅甸数据，虽不完整但也显示呈现上升趋势，并已列入总数。
46 此类准军事部队包括阿萨姆步枪队、边境安全部队、印藏边境警察和边境武装部队。总计近 100 万人，而国防部下辖武装部队只有 140 万人。国际战略研究所，“2018 年军事平衡”，(劳特利奇：阿宾顿，2018)，第 265-66 页。
47 杰特雷•A，印度财政部长，“2018 - 2019 年预算”，2018 年 2 月 1 日；马格努斯•G，“一带一路引发印中对抗”，《日经亚洲评论》，2018 年 2 月 27 日。关于印巴博弈和其他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关于本土军事工业，见杰克逊•S 和格林鲍姆•M，“印度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工业”，SIPRI 年鉴 2012(注 9)第 239-46 页。关于印度从国外购买武器，见本卷第 5 章第 3 节。
48 贝赫拉•L•K，“研究将国防支出 GDP 占比提升至 3%的可行性和可承受性”，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问题摘要》，2018 年 8 月 20 日；迪贝•A•K，“高陆军将领:国防预算削减粉碎了我们的希望”，《今日邮报》，

2018 年 3 月 14 日;拉格瓦什•V，“印度国防预算将会增加，但会被人员成本吞噬”，《国防新闻》，2018 年 2 月 5 日。
49 贝赫拉(注 48);夏尔马•S，“解决印度国防预算问题的方法是:提升国防拨款，降低士兵数量”，《经济时报》，2018 年 1 月 22 日。
50 SIPRI 中日本数据不包括国防部在大型海岸警卫队上的支出，这支队伍被视为是武装警察。
51 日本防卫省，“中长期防卫计划(2019 - 2023 财年)”，2018 年 12 月 18 日;高桥•K，“日本将在未来 5 年国防开支超过 2400 亿美元”，《简氏防务周刊》，2018 年 12 月 18 日。
52Nippon.com，“日本国防预算和 1%的预算限制”，2018 年 5 月 18 日。
53 普莱尔•C，“超越 1%:日本国防支出”，《外交官》2018 年 4 月 3 日;加藤•M，“执政党内阁呼吁将日本国防预算增加一倍”，2018 年 6 月 6 日。
54 张•S•Y，“美韩军事谈判可能让联盟付出代价”，东亚论坛，2019 年 2 月 13 日。
55 张(注 54)。
56 韩联社，“美国希望韩国为一年的 USFK 支付 12 亿美元:信源”;张(注 54)。
57 澳大利亚国防部(DOD)， 2016 白皮书(DOD: 堪培拉, 2016);格林•A，“澳大利亚国防军 4 年时间里在美制武器装备上花费超过 100 亿美元”，ABC 新闻，2017 年 12 月 28 日。见本卷第 5 章第 2 节和第 3 节。
58 见田纳西•S，“东亚和东南亚的脆弱和平，SIPRI 年鉴 2013,第 28-40 页。
59 拉扎克•N，马来西亚总理兼财政部长，“2018 年预算演讲”，2017 年 10 月 27 日。
60 关于阿富汗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61 萨哈迪•J，“阿富汗 16 年的财政成本”，CNN 商业，2017 年 8 月 22 日;阿马迪奥•K，“阿富汗战争成本、时间表和经济影响”，《负债表》，2019 年 1 月 2 日;北卡罗来纳州，“美国 9/11 后战争至 2019 财年的预算成本：5.9 万亿美元”，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2018 年 11 月 14 日。
62 托马斯•C，阿富汗：背景信息与美国政策概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国会报告 R45122(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9 年 2 月 26 日)，第 10 页。
63 澳大利亚国防部(DOD)，2018 年亚太地区防务经济趋势，(国防部:堪培拉，2018 年 12 月)，第 26-27 页。
64 法国审计法院，“2012 – 2015 年法国对外事务”，提交给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审计法院:巴黎，2016 年 10 月)，第 7 页;法新社，“莱瓦卢瓦袭击后的哨兵行动”，《世界报》，2017 年 8 月 10 日;法新社，“2015 年 11 月 13 日的袭击时间在法国前所未有”，《解放报》，2015 年 11 月 14 日。
65 法国国民议会，“2018 年修正财政法案”[提议] ，2018 年 11 月 7 日，第 139 页。
66 2018 年修正财政法案第 2018-1104 号，2018 年 12 月 10 日，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杂志，2018 年 12 月 11 日。
67 关于英国新型核潜艇建造计划，参阅本书第 6 章第 3 节。
68 米尔斯•C 和登普西•N，英国战略核威慑成本，简报 No.8166(下议院图书馆:伦敦，2019 年 1 月 22 日);沃尔夫•M，“帮助英国脱欧已知的未知因素”;查尔莫斯•M，“英国国防和 2018 年预算”，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 2018 年 10 月 30 日。
69 德国国防部(MOD)，关于安全政策和联邦国防军未来的 2016 年白皮书，(MOD: 柏林,2016 年 6 月)。
70 德国联邦议会，"今年的国防预算增加到 1880 亿欧元以上"，2018 年 7 月 5 日。
71 佩扎德•S，“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乌克兰危机后的威胁认知、反应和策略”(兰德公司:圣莫尼卡，加利福利亚, 2017)，第 5-29 页。
72 关于 2017-27 年修订后的计划见康诺利•R 和布罗格•M，“俄罗斯新国家军备计划:到 2027 年对俄罗斯武装力量和军事能力的影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伦敦，2018 年 5 月);卢津•P，“俄罗斯的 GPV-2017 国家武器计划”，里德尔，2018 年 4 月 18 日。关于 2010-20 年的最初计划，见佩罗•弗里曼•S，“俄罗斯军费开支、改革和改组”，SIPRI 年鉴 2013(注 58)，第 142-45 页。
73 库珀•J，“2017 年和 2018 年俄罗斯军费开支，2019 年及未来的武器采购和前景”，《战争中心的变化》，牛津大学，2019 年 2 月。
74 库珀(注 73)。
75 关于乌克兰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4 节。
76《国防快讯》，“乌克兰国防部 2018 年批准预算为 31 亿美元”，2018 年 3 月 26 日;魏泽曼•S•T，库伊莫娃•A，“乌克兰与黑海安全”，SIPRI 背景文件，2018 年 12 月。
77 按照 SIPRI 定义，军备采购支出占乌克兰 31 亿美元武装预算的 21%，但还不到乌克兰全部军费支出的 15%。
78 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4 节。
79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亚美尼亚国防预算 2019 年增长 26.6%”，2018 年 11 月 6 日;阿塞拜疆趋势通讯社，“阿塞拜疆将增加国防和国家安全支出”，阿塞新闻，2018 年 10 月 23 日。
80 列入估计数的 11 个国家是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2014 年，这 11 个国家的军费支出占该地区总支出的 87%。
81 田•N 和洛佩斯•达•席尔瓦，“债务、石油价格和军事开支”，SIPRI 年鉴 2018，第 171 - 78 页。
82 魏泽曼•P•D,“沙特阿拉伯，军备与中东冲突”，SIPRI 背景文件，2018 年 12 月 14 日。
83 土耳其财政部,预算和财政控制总局(2019 年预算理由)(财政部:安卡拉,2018 年 10 月),第 348 页。关于土耳其军费开支和军事政策，见魏泽曼•S•T 和库莫娃•A，“土耳其与黑海安全”，SIPRI 背景文件，2018 年

12 月。
84 关于土耳其在叙利亚冲突中的作用及其与库尔德人的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85 联合国安理会，也门问题专家小组最终报告，S/2019/83，2019 年 1 月 25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1973(2011)号决议，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最终报告 S/2018/812，2018 年 9 月 5 日。关于阿联酋在也门武装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关于其武器进口，见本卷第 5 章第 3 节。
86 以色列外交部:内塔尼亚胡总理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介绍“2030 年安全理念”，2018 年 8 月 15 日。
87 阿米特•H，“扭转政策，内塔尼亚胡寻求国防开支长期稳定增长”，《国土报》，2018 年 8 月 16 日。
88 关于也门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89 联合国，S/209/83(注 85)，第 49 段。
90 联合国，S/209/83(注 85)，第 52-54 段;雅各布•A，“阿联酋正在组建也门地区军队，但各国却打着各自的算盘”，路透社，2017 年 5 月 3 日。
91 关于埃及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关于埃及武器进口，见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
92 夏普•J•M，“埃及：背景及埃美关系”，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国会报告 RL33003(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8 年 6 月 7 日)，第 19-24 页;李•M，“美国将向埃及提供 12 亿美元军事援助”，美联社，2018 年 9 月 9 日。
93 埃利巴•A，“海上力量:埃及米斯特拉尔级战舰交易的重大意义”，金字塔在线，2015 年 10 月 4 日;墨菲•M，“蒂森克虏伯为埃及建造护卫舰”，《商报》，2011 年 11 月 7 日;卡比罗尔•M，“埃及 Meko A200 轻型护卫舰合同”，《论坛报》，2018 年 11 月 5 日。

第 2 节.军费透明度

南天，洛佩斯•达席尔瓦和彼得•D•韦兹曼

政府军费支出透明度具备多重功能。在国际一级，军费透明度是安全领域的信任工具。在国家一级，是国家治理通畅、军费管理完备、政府问责透明的一个关键环节。[1]

本节首先介绍了 2018 年国家间透明度机制(联合国军费支出报告)参与度下降。然后，从国家一次看，有多少政府公布了军费支出的相关数据，数据如何变动。以巴西国防部将军费支出用于非军事目的，作为典型案例进行研究。虽然军队执行非军事安全任务效果并不理想，但巴西在公开文件中对这一开支进行了详细记录。因此，巴西就树立了一个军费开支充分透明的正面例子，充分透明有助于区分军事支出和非军事支出。

联合国军费支出报告

1980 年，联合国大会同意制定一份年度报告，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可以在自愿基础上提供其军费支出数据。报告现在被称为联合国军费支出报告，其目的就是提高军事活动透明度，提高军事活动的预测能力，减小军事冲突风险，提升公众对裁军事务的认识。[2]

2002 年，提交报告的国家最多，共有 81 个国家提交。[3]2017 年，193 个联合国成员国，只有 42 个国家提交了 2016 年军费信息。2018 年，参与国家数量进一步减少：只有 36 个国家提交了 2017 年军费报告。[4]非洲没有任何国家提交 2017 年军费报告，全球 5 大军费国中有 3 个国家未提交报告：美国、沙特和俄罗斯。实际上，2017 年军费 15 强国家中，只有 7 个国家提交军费报告：中国、法国、印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土耳其。

每两年，联合国大会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一份军费支出报告。2017 年 12 月通过的一项新决议，要求秘书长（通过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向成员国发放一份问卷，以确定它们在军费透明度方面的优先事项、阐明不提交军费报告的原因以及军费报告改进办法。[5]截止 2018 年 7 月，只有 9 个国家（中国、捷克、芬兰、匈牙利、牙买加、列支敦士登、马达加

斯加、瑞士和土耳其）对问卷做出回复，但回复内容尚未公布。[6] 大部分未提交军费报告的国家都没有对问卷做出回应，这也使得人们怀疑，联合国军费报告究竟能不能成为构建国际军事信任的工具。

国家军费透明度

国家报告是一国在官方政府文件中公布其军费支出信息的过程。军费透明度是民主问责和国家治理的很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议会和公众深入了解军费预算经费使用方式及预算决策至关重要。[7]

方框图 4.1. 定义、来源和方法

SIPRI 军事支出数据的核心宗旨是提供军费支出财政占比的可靠数据指标。

尽管缺乏翔实的数据，确实很难确立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共通军费支出定义，但 SIPRI 将定义定位为指导方针。在可能的情况下，SIPRI 国家军费支出包含以下经常项目及资本支出：（a）武装部队，包括维和部队；（b）国防部和其他从事国防项目的政府机构；（c）准军事机构，如被认定为接受过军事训练或已配备军事装备；（d）军事空间活动。此类数据应包括人员支出，含军事及文职人员薪金、军事人员退休金、军事研究/发展以及军事援助等各类社会服务。如有分类数据，则剔除民防和既往军事活动经常开支，如退伍军人福利、复员、转业、武器销毁和军事人员参与非军事活动（如警务）。

事实上，这一定义并非适合所有国家，而多数情况下，SIPRI 局限在使用各国提供的数据。因此，我们优先考虑对单个国家界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以便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一致，而非根据设定一个各国通用的标准而不断调整各单一年份数据。鉴于上述困难，军费支出最适合的是进行长时间跨度的纵向对比，而非在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短期的横向比较。

SIPRI 数据为各国政府提供的官方数据。数据来源于官方出版物，如预算文件、公共财政统计、国家设计机构报告和政府对 SIPRI 问询调查表的回复，或是各国提交军费报告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北约等机构报告。只有在少数情况，无法获得原始政府文件(如无网络公开信息)；但此类文件可在各类报纸或新闻媒体中获取。

一般而言，除有令人信服的反证，SIPRI 都认为国家数据真实可靠。如遇官方数据口径同 SIPRI 数据定义出现不一致，或是时间序列出现不一致，则需要对数据进行重新评估。

SIPRI 试图对全球 168 个国家的军费支出做出估算，其中 155 个国家都能找到相关数据。[8]150 个国家相关数据来自于政府官方文件。无官方文件国家中，有 5 个国家数据来自其他来源，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关报告或引用政府信息的媒体报道。[9]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29 个国家，数据来源一是北约公开报告，二是成员国公开政府文件。SIPRI 数据来源也是上述两大渠道。

从政府报告中获取数据的 150 个国家中，政府出版物在政府预算的全面性、报告的可查阅性和分类科学性等方面千差万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例子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10]

全面性是指政府军费预算报告和实际军事活动支出两个维度。最具透明度的情况，应有一份处于预算，一份预算修正和一份显示实际支出的最终文件。一些国家（如尼日利亚和苏丹）只公布初步预算，而其他国家（如加纳和南非）则提供所有三类文件。如有预算数据和实际支出数据，议会和公众就能评估可能的预算超支或是预算不足，并对预算缺口提出质疑。支出过多或不足都表明预算决策不力，也可能表明国防政策和军事用途发生了变化。例如，武装冲突国家都会对最初预算进行修正。

在国家层面，报告可获取性和分类精细化程度上，同样存在巨大差异。一些国家(布基纳法索和马里)，很容易在政府网站找到预算文件，预算文件对军费支出品类也有着详细的分类。而其他情况下(如埃斯瓦蒂尼和冈比亚)，网站要么不存在，要么很难找到相关文件。即便存在预算文件，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笼统的军费支出总额数据。

军费支出透明度不仅要求政府公开国防部支出数据，而且要求政府其他部门详细阐明其是否参与军事活动(见方框图 4.1)。例如，一国准军事部队通常由内政部管理，我们很那界定其支出规模。其他划归于政府预算其他科目下的军事活动支出，包括教育或产业部门的军事研发支出、财政部管辖的军购贷款，以及由预算外资金给付的军队养老金。

反过来，我们同样很难界定究竟有多少国防开支被用于非军事行动。例如，

这部分支出就可能涵盖用于救灾或警务行动的军事资产。这些任务往往很难同一般军费预算区分开来。但如有相关数据，就能抽丝剥茧，对军队的不同作用、对如何评价军费支出，提供一个更具深度的视角。为说明这一点，特此就巴西军方如何运用特别拨款参与警务任务作出说明。

巴西军方参与警务任务开支

据官方记录，自 1992 年以来，巴西武装部队共执行 135 次警务任务。[11]此类行动被称为 GLO（法律和秩序保障）行动。据巴西国防部称，GLO 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同时在必要时允许使用有限武力。[12]

GLO 行动的法律依据是 1999 年的第 97 号补充法令，该法令于 2004 年和 2010 年两次修订。[13] GLO 行动仅在总统明确命令下方可执行。其触发条件是常规执法手段无效；军队被暂时授权履行警察职责权力，直至恢复正常。[14] 请求 GLOD 行动，州政府必须正式承认警察或国民警卫队等非军事安全工具，“不可用、不存在或不足以正常履行其宪法使命”。[15] 随后，州长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并只能由总统批准。巴西武装部队 GLO 行动只应在安全形势处于极端紧急威胁中才能部署。然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1992 年至 2019 年间，28%的 GLO 行动是为了提供公共安全保障，只有 17%的行动是处理城市暴力问题。[16]

根据 GLO，巴西武装部队为 2012 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2017 年教皇方济各访问，2014 年世界杯等国际体育赛事提供安保。值得商榷的是，在社会并未遭受直接威胁之时，就动员军队参与此类日常活动，无端中贬低了 GLO 的严肃性。参与里约热内卢(1994 至 1995，目前仍在进行之中)和北里约热内卢(2017)的扫毒行动以及埃斯皮里托圣托(2017)的暴力失控，或许更符合 GLO 的目标设定。[17] 自 90 年代初以来，巴西警方一直在同毒品相关暴力作着不懈斗争，GLO 也一直在紧急状态下同警方通力合作，驱赶或抓捕贩毒分子和其他武装犯罪集团分子。[18]

GLO 的具体实施及经费均由行政部门管辖，并无需接受议会监管。对 GLO 实施预算外管理也是巴西惯常的操作。此类行动经费并不在军费支持预算内，而是通过年内追加拨款。有些 GLO 行动持续时间较短、成本低，有些则会牵扯大量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并且持续时间超过一年，耗资巨大。例如里约热内卢马累贫

民窟的清剿行动，从 2014 年 4 月一直持续到 2015 年 6 月，耗资近 4.5 亿雷亚尔（2 亿美元）。[19]

2009 年至 2018 年间，49 项 GLO 行动共耗资 24 亿雷亚尔（约合 10.64 亿美元）。最烧钱的一年（以当地货币计算）当属 2014 年，共耗资 5.59 亿雷亚尔（2.38 亿美元）（见表 4.5）。

对军队执行警务任务所需资源进行准确的分类，是军费透明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全面记录有助于国家资源划拨监管审查。GLO 行动开支并未列入 SIPRI 定义下的军费开支，原因就在于此类行动均为警务性质。然而，比利时、法国、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吉尔吉斯斯坦和墨西哥等国，军队执行警方任务十分常见（法国见第 1 节）。巴西将此类行动同军费预算分开并列，但其他许多国家并未单独列报。这样的分类为军事活动和武装部队进行非军事活动资金需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研究人员、民间团体和政策制定者都应将巴西的做法视为这一领域的典范。

表 4.5　2009-18 年巴西军队调拨执法和秩序保障行动拨款

	GLO 数量	军费支出中 GLO 划拨		
	行动数量	雷亚尔现值 M	美元现值 M	定值美元(2017)M
2009	0	. .	. .	. .
2010	6	180	102	88.2
2011	8	408	244	187
2012	6	205	105	89.3
2013	3	446	207	183
2014	8	559	238	216
2015	2	6.7	2	2.4
2016	4	66.5	19.1	21.6
2017	7	334	105	105
2018	5	152	41.6	46.1
合计	49	2358	1064	938

GLO =军队执法和秩序保障

资料来源：巴西国防部（国防部），联合行动负责人，【GLO 人员和成本（2010-2019 年）】，2019 年 1 月 16 日。

军队越俎代庖，频繁执行警察职责，模糊了军队和警察的角色界限。巴西社会大多已将军队参与警方行动视为常态。[20] 此类行动开支透明化也可以向世人展示，如何将军队部署到警察岗位，如何将稀缺资源转移到更可持续、更温和的选项，如解决经济不平等或是解决巴西各州面临的财政困难。

结语：提高军费支出透明度

提高军费支出透明度的方法有很多。在国际层面，更多的国家可以向联合国提交军费开支报告。而在国家层面，虽然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正式公开文件中积极公开其军费预算，但所有国家在报告的全面性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将军费预算分解为军事和非军事活动，是提升军费支出透明度的重要步骤。在非军事活动中动用军事力量，在发展中国家已是司空见惯。巴西的案例表明，将非军事活动支出同军事支出分开，有力提升了军费支出数据的准确性。由于非军事活动支出不应算作军费开支，因此，未分类国家的军费支出很可能被高估。

此外，巴西 GLO 行动也凸显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是否该动用武装部队维持国内安全，而国内安全传统意义上是警察的职责。这样做不仅模糊了军队和警察的职能界限，同时也使得两者之间的能力和组织结构模糊不清。[21] 此类活动的经费筹措的透明度，也是迈向军队警察脱钩的一小步。

1 布罗姆利•M 和索米拉诺•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军费开支和武器采购透明度”，SIPRI 政策文件 No.31(SIPRI，2012 年 1 月)，第 1-5 页。

2 .联合国大会，政府专家小组对《联合国军费开支报告》编制和最新进展进行了审议，A/72/293, 2017 年 8 月 4 日，第 2 段。

3 联合国大会，政府专家小组对《联合国军费开支标准报告》推进及最新进展的报告，A/66/89, 2011 年 6 月 14 日，第 26 页;联合国裁军事务厅(UNODA)军事开支数据库。

4 联合国大会，“军事情况客观情报，包括军费开支透明度”，秘书长报告，A/73/154, 2018 年 7 月 12 日。这份报告共列出 31 份意见书。截至 2018 年 3 月，又提交了 5 份报告:其中 2 份(印度和秘鲁)已被纳入联合国在线数据库(注 3)，3 份(加拿大、中国和法国)尚未被纳入数据库。联合国裁军事务厅(UNODA)，私人信件，2019 年 3 月 15 日。关于 2017 年报告，见田•N， 洛佩斯•达•席尔瓦•D 和魏泽曼•P，“军费数据透明度”，SIPRI 年鉴 2018，第 180 页。

5 联合国大会，“关于军事问题的客观信息，包括透明度”，第 72/20 号决议，2017 年 12 月 4 日，A/RES/72/20, 2017 年 12 月 11 日，第 8 段(c)。联合国问卷 A/72/293(注 2)，附件 1。

6 联合国，A/73/154(注 4)，第 7 段。

7 田•N，魏泽曼•P 和云•Y，撒哈拉以南非洲军费开支透明度，SIPRI 政策文件 No.48(SIPRI，2018 年 11 月)，第 18-19 页。

8 SIPRI 无法收录 2018 年军费开支信息的 13 个国家：古巴、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几内亚比绍、朝鲜、老挝、利比亚、卡塔尔、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在 155 个可收集数据的国家中，有 3 个国家的军费开支为零:哥斯达黎加、冰岛和巴拿马。出于操作原因，SIPRI 未收录一些最小国家军费开支数据。

9 这 5 个国家：文莱达鲁萨兰国、埃塞俄比亚、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10 这些例子取自田、魏斯曼和云(注 7)。

11 巴西国防部(MOD)，联合行动负责人，“GLO 历史”，2019 年 1 月 16 日。

12 巴西国防部(MOD)，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部，“法律与秩序保障”(MOD:巴西利亚，2013)，第 14 页。

13 1999 年 6 月 9 日第 97 号补充法，1999 年 6 月 10 日；2004 年 9 月 2 日第 117 号补充法，2004 年 9 月 3 日；2010 年 8 月 25 日第 136 号补充法，2010 年 8 月 26 日；1988 年《巴西宪法》第 142 条就预见了 GLO 行动，以前的巴西宪法也有类似规定。马蒂亚斯•S•K 和古齐•A•C，法律自治：国家宪法中的武装力量，《巴西社会学报》，第 25 卷 No.73(2010 年 6 月)，第 41-57 页。

14 补充法 No.97(注 13)，第 15 条。

15 补充法 No.97 经 2004 年修订(注 13)，第 15 条第 3 段。

16 巴西国防部(注 11)。

17BBC 新闻，“巴西警察罢工:警察们的妻子在圣埃斯皮里托领导抵抗”，2017 年 2 月 11 日;福瑞迪•J，“巴西授权军队进驻三个州，时长 180 天”，《里约时报》，2017 年 2 月 21 日。

18 萨姆塞特•I，“为了法律和秩序保障”:巴西武装部队和公共安全，迈克尔森研究所(CMI)工作文件 2014:11 (CMI: 卑尔根, 2014)，第 11-13 页;古尔门迪•A，“军事干预里约及人权”，法律意见书，2018 年 10 月 22 日。2018 年 2 月，巴西总统米歇尔•特梅尔为应对公共安全危机，将巴西国家警察的职责移交给了联邦政府。但是，这并非 GLO 行动，而且这次干预的资金(估计超过 8 亿雷亚尔)不由军方管理。伦敦奥•E 和达灵顿•S，“巴西军方被任命负责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安全事务”，《纽约时报》，2018 年 2 月 16 日。

19 G1，[武装部队占领了 15 个定居点，里约热内卢]，2014 年 4 月 5 日。除另有说明，所有数字均以当前美元或当前雷亚尔计。

20 埃斯塔尔克•M，72%的里约热内卢州居民希望扩大联邦干预，2018 年 9 月 7 日。

21 伊斯顿•M，“模糊的军事和警察身份”(ELEVEN 国际出版社:海牙，2010)，第 79-110 页;和萨姆塞特(注 18)。

第五章.国际武器转让和武器生产

概述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主战武器国际转让总量增长了 7.8%，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见第 1 节）。这种增长是 21 世纪初开始的稳步上升趋势的延续。

2014-18 年，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为全球五大武器出口国，占全球武器出口总额 75%。自 1950 年以来，美国和俄罗斯（或 1992 年之前的苏联）一直占据全球武器出口榜首，并与西欧出口国一道，一直占据世界武器出口十强（见第 2 节）。亚洲和大洋洲为主要的进口国，占 2014-18 年全球主战武器进口总量 40%。中东地区占进口总量 35%。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中东地区武器流入增长了 87%。相比之下，上述两个时期，流向所有其他区域的武器却呈现出下降趋势：流入美洲的武器减少 36%，欧洲减少 13%，亚洲和大洋洲减少 6.7%，非洲减少 6.5%。五大武器进口国为沙特阿拉伯、印度、埃及、澳大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合计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额的 35%（见第 3 节）。

从近年来的趋势判断，2018 年武器转让官方公开透明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积极进展（见第 4 节）。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交武器进出口报告的国家数目仍然极少，各国家和区域报告机制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批准《武器贸易条约》，履行其武器进出口报告义务的国家数目也在增加。然而，提交报告的缔约国比例在 2018 年却有所下降。

虽然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并未显示其对应财政价值，但许多武器出口国还是公布了其武器出口的财政价值数据（见第 5 节）。本章其他各节专注 2018 年数据，第 5 节重点阐述 2017 年数据，这也是最新的数据更新年份。根据 2017 年数据，SIPRI 估计 2017 年全球武器贸易总额至少达到 950 亿美元。

此外，本章还对全球军火工业（不含中国公司）发展情况进行了回顾，并概述了顶级军火生产商和军事服务公司的发展情况（见第 6 节）。第六节重点论述了 2017 年的发展情况，这也是可获数据最近的一年。2017 年，跻身 SIPRI 百强的公司销售总额达 3980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2.5%。2017 年军售百强总体增长，主要是由若干头部军购大户推动，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同时还有一些身陷武装冲突的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军购开支增加推动。

西蒙•T•魏泽曼 奥德•弗莱兰特

第 1 节.2018 年全球武器转让趋势 [1]

西蒙•T•魏泽曼，奥德•弗莱兰特，亚历山德拉•库伊莫娃，南天和皮耶特•D•魏泽曼

2014-18 年五年间，主战武器的国际转让量较 2009-13 年间增长 7.8%。[2]这也是 2000 年代初开始的稳步上升趋势的一种延续（见图 5.1）。

SIPRI 数据库中的 5 年期最高转让量发生在 1980-84 年。1980-84 年之后，转让量逐步下降，直至 2000-2004 年，这一数字较峰值下降了 56%。最近五年（2014-18 年）总数较 2000-2004 年高出 52%，为 1989-93 年冷战结束五年以来的最高值。然而，2014-18 年的总量仍较 1980-84 年总量低 33%。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中东武器流入量增加了 87%，该地区在全球武器总量中的占比从 20%上升到 35%。这一比例高于 1979-83 年至 2014-18 年的 8 个五年期（见表 5.1）。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流向所有其他地区（非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以及欧洲）的武器呈现下降趋势，它们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也有所下降。2014-18 年间，亚洲和大洋洲仍然是武器进口总量最高的地区（40%）。

2014-18 年，五大武器出口国分别是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见第 2 节）。五大武器进口国是沙特阿拉伯、印度、埃及、澳大利亚和阿尔及利亚（见第 3 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头部出口国集团结构相当稳定。自 1950 年武器转让数据库建立以来，SIPRI 共界定 131 个“行为主体”(128 个国家、两个非政府武装组织和一个国际组织)至少在一年内交付过主战武器。然而，1950 年至 2018 年期间，只有 9 个国家武器交付量达到全球总量的 1.0%或以上：美国、苏联（或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中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只有 27 个国家在这一期间占全球总量 0.1%或以上。

表5.1. 1979-2018年区域及次区域分列主战武器进口全球份额占比

高于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位；低于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1位。由于四舍五入惯例，百分比可能不完全匹配总计数值。

接收区域	1979－83	1984－88	1989－93	1994－98	1999－2003	2004－2008	2009－13	2014－18
非洲	15	7.0	3.7	2.8	5.1	6.9	9.0	7.8
北非	11	2.3	2.1	1.1	2.2	2.7	5.3	5.9
撒哈拉以南非洲	4.4	4.7	1.6	1.7	2.9	4.1	3.8	1.9
美洲	9.7	9.9	7.5	8.5	8.8	11	10	6.2
北美	1.7	4.6	4.0	4.0	4.0	4.1	4 .5	-
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	2.2	1.4	0.7	0.6	0.7	0.5	-	-
南美	5.8	3.8	2.8	3.9	4.0	6.1	5.3	2 .4
亚洲及大洋洲	21	29	38	41	46	40	47	40
中亚	-	-	-	0.2	0.4	0.3	0.7	1.6
东亚	7.8	11	18	23	24	20	11	10
大洋洲	0.9	1.8	1.6	1.5	4.0	2.5	3.8	4 .8
南亚	7.2	12	14	7.5	12	11	21	14
东南亚	5.4	3.5	3.8	8.1	5.2	5.9	11	9.4
欧洲	25	24	26	18	20	21	14	11
中欧	10	10	5.6	1.5	1.9	4.6	1.4	-
东欧	1.8	3.3	1.5	0.3	0.3	1.1	1.7	-
西欧	13	11	19	16	18	15	10	-
中东	27	29	25	30	20	21	20	35
其他	1.2	1.3	0.1	0.1	0.1	0.1	0.4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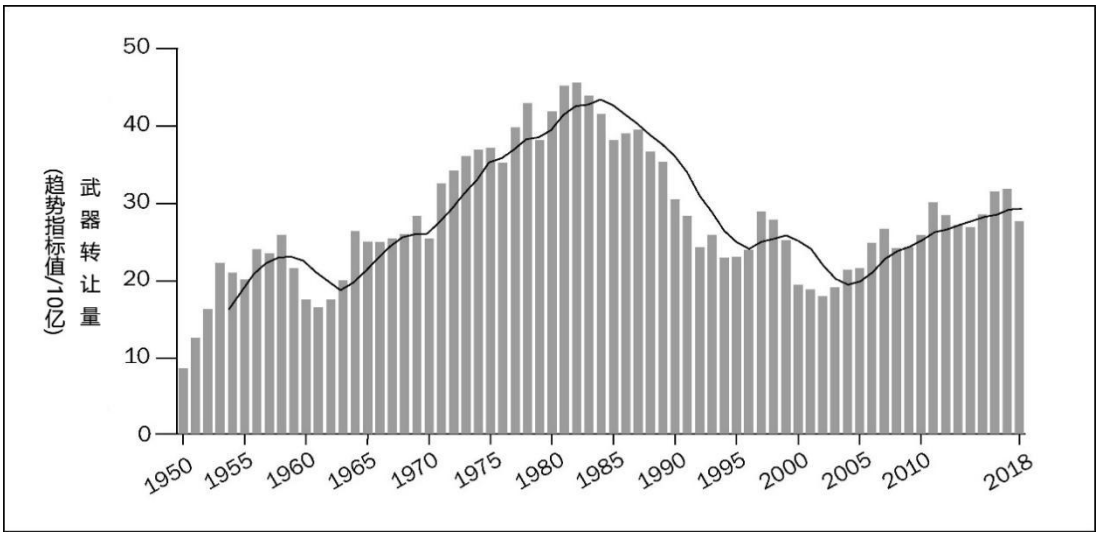
－ = 无武器接收.

注：由于同比交付量可能波动，因此本表比较了连续5年的交付量。这为衡量主战武器转让趋势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尺度。

“其他”是指不设在一个区域内的国际组织（或一些非国家行为者），以及无法划归至某一特定区域的身份不明接收者。

资料来源：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2019 年 3 月。

图5.1 1950-2018年主战武器国际转让趋势



注：条形图显示为年度总计，折线图显示5年移动平均值(折线图中的每个数据点表示前5年期平均值)。关

于SIPRI趋势指标值解释，见方框5.1。
资料来源：SIPRI武器转让数据库，2019年3月。

1954-58 年至 2014-18 年，共计 13 个五年期中，只有 16 个国家曾经位列世界武器出口 10 强。其中有 9 个国家，在上述 13 个五年期中，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都位居 10 强之列。美国、苏联（或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和意大利在所有 13 个五年期内，长期盘踞 10 强。德国自 1959-63 年开始，也一直为世界武器出口 10 强。

2009-18 十年期间，SIPRI 已确认共有 77 个国家为主战武器出口国。其中 13 个国家的武器出口占同期全球武器出口总额的 1.0%或以上，共有 30 个国家的武器出口占到 0.1%或以上。2009-13 年间或 2014-18 年间，只有 11 个国家进入 10 强。11 个国家中有 9 个国家在这两个五年间都进入了 10 强。这 9 个国家都有着完备的军工工业，或是长期出口大量二手主战武器。9 个国家中有 8 个国家有公司进入 SIPRI 武器生产或军事服务企业全球百强。第 9 个国家中国，如有相应数据，也应有公司列入百强（见第 6 节）。[3]

方框图 5.1 方法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含 1950 年至 2018 年的主战武器交付信息，交付对象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武装组织。每年出版最新数据，更新 SIPRI 年鉴信息以及 SIPRI 其他出版物相关数据。SIPRI 对“转让”之定义涵盖销售，授权制造，武器援助，赠予以及大部分形式武器贷款和租赁。转让是指必须用于军事用途:接收方必须是另一个国家、非国家武装组织或国际组织的武装部队或准军事部队或情报机构。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只包括“主战武器”,它被定义为(a)大多数飞机(包括无人驾驶),（b）大多数装甲车,(c)100 毫米以上口径火炮,(d)传感器(雷达、声纳及众多被动电子传感器),(e)防空导弹系统和较大口径防空炮,(f)制导导弹、鱼雷、炸弹和炮弹,（g）大多数舰船(h)战斗机、其他大型飞机、战舰、大型支援舰艇及武装装甲车用发动机;(i)大多数装甲车辆用炮塔机枪及火箭弹,(j)侦察卫星(k)空中加油系统,(I)舰炮，火箭发射系统及反潜武器。

鉴于传感器，发动机，炮塔，加油系统或舰炮以及其他系统(d,h,i,j,k,l)均为安装在平台之上(汽车、飞机或船只),如果上述装备同平台不是出自同一供应商，则视为单独项计入武器装让数据库。

SIPRI 创建了使用同一单位衡量主战武器转让量指标的独特系统，趋势指示值(TIV)。TIV 的目的是体现军事资源的转移。每一件武器都有其特有的 TIV。二手和二手但已现代化的武器，其 TIV 赋值较低。SIPRI 通过将单件武器 TIV 乘上给定年份的武器数量，计算特定年份武器转让量。SIPRI TIV 数据并不代表武器转让销售价格。

1950 年以来，美国和俄罗斯（以及 1992 年之前的苏联）一直是最大的两个武器出口国，美俄两国出口额分别占 1950-2018 年全球出口总额的 35%和 31%。1991 年冷战结束以来，美俄一直是全球最大武器出口国。

最大进口国较最大出口国构成更为多样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动也更大。1950 年以来，SIPRI 已界定 225 个武器进口行为主体（202 个国家、48 个非国家武装组织和 5 个国际组织）在至少一年内进口了主战武器。其中，1950 至 2018 年间，共有 26 个行为主体接收武器，另外 3 个国家在 1950 年建国或获得独立后，一直都在接收主战武器。1950 年至 2018 年期间，共有 33 个武器接收国的武器进口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量的 1.0%或以上，84 个武器接收国占到 0.1%或以上。1954-58 年至 2014-18 年的 13 个五年期中，34 个国家至少有一个五年期曾位列 10 大武器进口国。其中只有 5 个国家在过去的 13 个五年期中，超过一半时间位列 10 大武器进口国。没有一个个国家在所有 13 个五年期，一直位列 10 大武器进口国。

2009-18 年的 10 年期间，SIPRI 共界定 183 个国家为主战武器进口国。其中，27 个国家的武器进口量占到全球武器进口总量 1.0%或以上，77 个国家占 0.1%或以上。2009-13 年或 2014-18 年，共有 14 个国家进入 10 大武器进口国。其中 6 个国家在两个五年间都进入了 10 大武器进口国。

1 除注明外，本章提及的武器交付和订单信息均取自 2019 年 3 月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 1950 年至 2018 年间主战武器转让数据。SIPRI 武器转让数据是指实际交付的主战武器，包括销售、许可证项下的生产、援助、赠予及租赁。SIPRI 采取趋势指标值(TIV)来比较不同类型武器交付数据，并确定其总体趋势。TIV 能更好地反映国际武器转让数量——基于对武器能力的评估，而非其财务价值评估。主战武器定义和 TIV 及其计算说明见方框 5.1。武器转让数据库每年进行更新，故本章数字可能不完全吻合 SIPRI 年鉴过往版本之数据。

2 由于每年交付数量可能波动，SIPRI 比较的是连续多年周期，通常 5 年时间。这样可以为衡量主战武器转让趋势提供更稳定的标准。5 年移动平均数也用来衡量较长时期内的武器转移趋势。

3 尽管据估计，至少有 10 家中国军火公司武器销售已跻身 SIPRI 百强。但由于 SIPRI 武器行业数据库所涵盖的数据并不完整，目前尚未将它们收录在内。

第 2 节.2018 武器供应国

西蒙•T•魏泽曼，奥德•弗莱兰特，亚历山德拉•库伊莫娃，南天和皮耶特•D•魏泽曼

2014-2018 年，SIPRI 共确定 67 个国家为主战武器出口国。这一时期最大的五个武器供应国为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2014-18 年，五国主战武器出口总量占到全球出口总量 75%（见表 5.2）。2009 至 2013 年，这五国也是五强，占全球出口总量的 74%。然而，由于 2009-13 年和 2014-18 年间武器转让总量有所增加，2014-18 年，五强出口量较 2009-13 年增加了 10%。美、法、德武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武器出口略有增长，俄罗斯武器出口有所下降。2014-18 年，美国和俄罗斯是最大的出口国，合计占全球出口 56%。2014-18 年，前 25 大武器出口国占到全球武器出口的 99%。

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国家在全球武器出口中的比重很小，仅占 2014-18 年主战武器出口总 13%。2014-18 年度前 25 强武器出口国中，17 个国家位于北美和欧洲，3 个在亚洲和大洋洲，3 个在中东，1 个在非洲，1 个在南美（见表 5.2）。[1] 欧洲-大西洋地区武器供应国扎堆的特征横亘整个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1950-2018）。2014-18 年度排名 25 强也大多曾出现在该地区。

美国

2014-18 年的五年间，美国是世界第一大主战武器出口国，自冷战结束（1991 年）以来，美国在任何五年期间始终处于这一地位。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中国主战武器出口增长 29%，全球武器出口总额占比从 30%升至 36%。美国与其他所有出口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2009 年，美国 13 种武器出口额较同期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俄罗斯高出 12%。2014-18 年，美国较俄罗斯高出 75%。

2014-18 年，中东为美国武器最大市场，占到美国武器出口的 52%（见表 5.3），其次是亚洲和大洋洲（30%）、欧洲（11%）、美洲（4.2%）和非洲（2.9%）。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美国对中东的武器出口增长了 134%。美国对非洲的武器出

口也增长了 26%，而对亚洲和大洋洲（－16%）、欧洲（－8.1%）和美洲（－4.8%）武器出口则有所下降。

2014-18 年间，美国向至少 98 个国家交付主战武器。其覆盖面之广，远胜于其他任何武器出口国。2014-18 年，美国还向叙利亚反叛武装输送了少量轻型装甲车和反坦克导弹。2014-18 年度全球最大的 50 个武器进口国中，只有 10 个国家在此期间未向美国订购或接收主战武器。

目前为止，2014-18 年美国第一大武器接收国为沙特阿拉伯，占美国武器出口总量的 22%，为美制武器第二大接收国澳大利亚的 2.8 倍（见表 5.4）。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美国对沙特武器出口增长了 474%，其中包括 56 架 F-15SA 战斗机。由于仍有大量未完成订单，未来五年，美国向沙特的武器输出都将保持高位，如 98 架 F-15SA 战机。美国国会对沙特参与也门战争，特别是对其人道主义影响的担忧，最终导致两党议员联合小组在 2018 年 10 月提交一项法案，其目的就是阻止美国向沙特转让先进武器。[2]美国对沙特目标和行为的担忧因记者遇害而加剧，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更加加重了美国对沙特行事方式和打击目标的忧虑。[3]10 月法案并未获得通过，但是这一方案本身就凸显出国会内部以及国会同特朗普政府间在向沙特武器问题存在着重大分歧。[4]2018 年底，另一项压缩对沙特盟军的武器支持也提交参议院讨论，并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获得通过。[5]2014-18 年间，美国出口多型主战武器，其中飞机占比 53%（见表 5.5）。飞机出口涵盖多种机型，但战斗机占比最高，占 2014-18 年美国主战武器出口总额 24%。其间，美国共向 14 个国家交付 252 架先进战机，其中包括 8 个国家共 83 架 F-35 战机。

表 5.2.　2014 年-2018 年前 50 位主战武器提供国

该表格包括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在 2014-2018 年的 5 年间主战武器出口。排名根据 2014 - 2018 年出口总额。数字为 SIPRI 趋势指标值(TIVs)。百分之十以上的百分比已被四舍五入到最近整数位，低于 10%的百分数则舍去。由于四舍五入，数字合计可能不一定和总数相符。

排名		供应商	出口额(TIV,百万)		2014-18 占比(%)	较 2009—2013 年变化(%)
2014-18	2009-13a		2018	2014-18		
1	1	美国	10508	52480	36	29
2	2	俄罗斯	6409	30064	21	-17
3	5	法国	1768	9948	6.8	43
4	3	德国	1277	9324	6.4	13

5	4	中国	1040	7633	5.2	2.7
6	6	英国	741	6171	4.2	5.9
7	7	西班牙	1188	4692	3.2	20
8	10	以色列	707	4517	3.1	60
9	9	意大利	611	3366	2.3	-6.7
10	11	荷兰	369	3064	2.1	16
11	9	荷兰	466	2747	1.9	-11
12	8	乌克兰	224	1951	1.3	-47
13	15	瑞士	243	1443	1.0	20
14	20	土耳其	364	1405	1.0	170
15	12	瑞典	134	1003	0.7	-62
16	14	加拿大	84	816	0.6	-33
17	16	挪威	64	714	0.5	-12
18	2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13	510	0.3	103
19	34	捷克	64	486	0.3	472
20	18	白俄罗斯	56	469	0.3	-26
21	22	澳大利亚	38	453	0.3	3.9
22	17	南非	149	450	0.3	-35
23	24	巴西	111	352	0.2	21
24	23	芬兰	68	297	0.2	-9.1
25	41	葡萄牙	3	256	0.2	457
26	30	约旦	--	227	0.2	19
27	40	印度	46	217	0.1	343
28	53	印度尼西亚	15	196	0.1	2338
29	39	保加利亚	7	182	0.1	225
30	33	丹麦	27	115	0.1	22
31	19	乌兹别克斯坦	--	102	0.1	-84
32	31	新加坡	--	97	0.1	-33
33	28	伊朗	--	87	0.1	-58
34	38	塞尔维亚	--	71	<0.05	21
35	25	波兰	21	67	<0.05	-75
36	29	奥地利	5	66	<0.05	-66
37	54	斯洛伐克	12	63	<0.05	1160
38	21	比利时	16	58	<0.05	-87
39	..	希腊	--	30	<0.05	..
40	..	埃及	—	30	<0.05	..
41	..	智利	<0.05	20	<0.05	..
42	35	新西兰	6	17	<0.05	-77
43	51	马来西亚	--	15	<0.05	<0.05
44	..	吉尔吉斯斯坦	--	14	<0.05	..
45	32	爱尔兰	--	13	<0.05	-87
46	..	格鲁吉亚	--	13	<0.05	..
47	47	文莱达鲁萨兰国	—	12	<0.05	-50
48	58	哥伦比亚	—	10	<0.05	..

49	..	厄瓜多尔	2	8	<0.05	..
50	..	阿曼	—	7	<0.05	..
..	..	17 个其他国家	15	113	0.1	..
		合计	27588	146291	..	7.8

. .-不可用或不适用; - -未交付。

注: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与主战武器实际交付有关。为了便于对不同武器交付数据进行比较，并确定其一般趋势，SIPRI 使用了一个趋势指标值(TIV)。其数值只是武器转让量的一个指标，而并非武器转移的财务价值。因此，它不能与财务统计数字比较。TIV 计算方法可参见方框图 5.1 相关描述。

a 2009-2013 年度供应商排名与 SIPRI 2014 年年鉴排名有所不同，因为年度数据随后进行了修订。

资料来源：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2019 年 3 月。

美国还向沙特交付了 56 架 F-15SA 战机，新加坡 8 架；F-16C 埃及 12 架，伊拉克 36 架，阿曼 12 架。

从现有订单数量可得出结论，在可预见的未来战斗机将继续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武器品类。如 2018 年，日本和比利时决定分别采购 105 架和 34 架 F-35 战机，斯洛伐克则订购 14 架 F-16 战机。截至 2018 年底，美先进战机共有 891 架订单或计划订单。此类订单多为 F-35 战机，F-35 的交付对美国出口影响越来越大。上述订单正全面排产，美军及外售交付都在增长。2017 年，美国共生产 66 架 F-35，其中 30 架为出口版本。2018 年，共生产 91 架，到 2023 年，年产能将达到 160 架。[6] 老式战机的升级版也同样热卖，前文提到的斯洛伐克 F-16 订单和印度的 114 架或更多的 F-16 战机就是佐证，这还不包括将在印度建成一条完整的 F-16 生产线。[7] 此外，以色列宣布计划在 2018 年购买 20 至 25 架 F-15IA。[8]

表 5.3. 2014 年-2018 年 10 大主战武器接收国和提供国

数据为 2014-18 年 5 年间武器供应国向接收国出口数量占该供应国出口总量占比。高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低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1 位。由于四舍五入，数据累加可能不一定完全契合。更多详情，见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相关网页。

	供应国									
接收地区	美国	俄罗斯	法国	德国	中国	英国	西班牙	以色列	意大利	荷兰
非洲	2.9	17	8.5	7.3	20	1.4	0.8	1.1	12	6.6
北非	2.5	14	6.8	7.2	11	1.2	-	-	10	5.9
撒哈拉以南非洲	0.4	2.6	1.7	0.1	8.8	0.1	0.8	1.1	2.3	0.7
美洲	4.2	1.4	8.7	11	4.0	4.3	9.1	10	9.5	31
南美	1.1	1.0	4.7	3.6	3.8	2.5	2.2	3.3	7.7	4.0
亚洲及大洋洲	30	60	29	30	70	29	60	61	21	20
中亚	0.1	4.2	1.1	0.5	3.7	-	2.6	<0.05	1.2	1.1
东亚	13	15	6.7	20	-	7.5	2.1	2.7	0.1	-
大洋洲	8.0	-	3.5	0.8	-	0.6	42	0.1	4.8	-
南亚	5.5	29	10	1.2	52	8.4	0.3	46	8.1	0.9
东南亚	3.9	12	8.0	7.7	14	13	13	12	7.2	18
欧洲	11	5.8	9.4	27	0.2	5.9	0.1	25	15	15
欧盟	8.7	<0.05	8.9	26	0.2	5.8	0.1	7.5	11	14
中东	52	16	44	25	6.1	59	29	1.8	43	28
其他	<0.05	-	-	-	-	-	0.6	0.6	0.2	-

..=不可用或不适用;- =零;<0.05 = 0 和 0.05 之间

注："其他"是指无法划归单一区域的国际组织（或非国家行为者），以及无法划归特定区域的身份不明接收方。

资料来源: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2019 年 3 月。

2014-18 年，导弹占美国武器出口总量 19%。其中包括交付 400 枚巡航导弹和 124 枚弹道导弹，射程均在 250 至 400 公里之间，另有约有 36500 枚反坦克导弹和 53500 枚制导炸弹。

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核心供应商。在 2009-18 年的 10 年间，美国向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韩国、台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交付爱国者 PAC-3 系统，同时还向阿联酋交付了陆基 THAAD 系统。2017-18 年，波兰、罗马尼亚和瑞典订购了美制爱国者 PAC-3 系统，沙特阿拉伯订购了 THAAD 系统，日本订购了大量 SM-3 导弹，并决定采购两套陆基宙斯盾系统，以应对朝鲜可能装备的核弹道导弹威胁。[9]

2018 美国武器出口政策

面对国际武器市场的激烈竞争，美国军火公司努力游说政府减少武器出口政策限制，简化、加快出口许可证程序。奥巴马政府似乎被他们说服，开始对武器出口许可证制度进行修改和简化，以期加快决策速度。[10]特朗普政府正在继续这一进程，并在 2018 年推出了加快对外军售（FMS）计划决策措施。[11] 对外国买家减税降费，也成为美国大力提升军售竞争力的重要举措。[12] 与此同时，为促进出口并增强美国相对中俄的竞争力，特朗普政府也开始减少对武器出口决策的干预，形成较为宽松的武器出口政策环境。[13]对于上述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应对之道就是可以强化武器出口带来的直接经济回报和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14] 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在 2108 年初放宽了对无人机(UAV)和武装无人机(UCAV)出口限制，部分原因就是提升美国在无人机市场的竞争力，尤其是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见下文)。[15] 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新规将“最大限度减少美国在全球航空航天市场竞争时所面临的官僚和行政桎梏”。[16]

表 5.4. 2014－18 年世界 25 大主战武器出口国及主要客户

高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位；低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1 位。

排名		全球武器出口占比(%)		占比变化 2009-13 2014－18a	主要客户（总出口占比%）		
2014－18	出口国	2014-18	2009-13		第 1	第 2	第 3
1	美国	36	30	29	沙特(22)	澳大利亚(7.7)	阿联酋(6.7)
2	俄罗斯	27	27	-17	印度(27)	中国(14)	阿尔及利亚(14)
3	法国	6.8	5.1	43	埃及(28)	印度(9.8)	沙特(7.4)
4	德国	6.4	6.1	13	韩国(19)	希腊(10)	以色列(8.3)
5	中国	5.2	5.5	2.7	巴基斯坦(37)	孟加拉(16)	阿尔及利亚(11)
6	英国	4.2	4.3	5.9	沙特(44)	阿曼(15)	印尼(11)
7	西班牙	3.2	2.9	20	澳大利亚(42)	土耳其(13)	沙特(8.3)
8	以色列	3.1	2.1	60	印度(46)	阿塞拜疆(17)	越南(8.5)
9	意大利	2.3	2.7	-6.7	土耳其(15)	阿尔及利亚(9.1)	以色列(7.6)
10	荷兰	2.1	1.9	16	约旦(15)	印尼(15)	美国(11)
11	韩国	1.8	1.0	94	印尼(17)	伊拉克(17)	英国(15)
12	乌克兰	1.3	2.7	-47	中国(27)	俄罗斯(23)	泰国(14)
13	瑞士	1.0	0.9	20	沙特(19)	中国(18)	印尼(9.3)
14	土耳其	1.0	0.4	170	阿联酋(30)	土库曼斯坦(23)	沙特(10)
15	瑞典	0.7	1.9	-62	沙特(16)	阿联酋(14)	阿尔及利亚(10)
16	加拿大	0.6	0.9	-33	沙特(22)	印度(13)	阿联酋(7.6)
17	挪威	0.5	0.6	-12	阿曼(28)	芬兰(23)	美国(21)
18	阿联酋	0.3	0.2	103	埃及(41)	约旦(10)	也门(7.6)
19	捷克	0.3	0.1	472	伊拉克(40)	美国(17)	越南(9.9)
20	白俄罗斯	0.3	0.5	-26	越南(37)	苏丹(18)	缅甸(12)
21	澳大利亚	0.3	0.3	3.9	美国(53)	印尼(25)	阿曼(8.8)
22	南非	0.3	0.5	-35	美国(21)	阿联酋(21)	印度(9.8)
23	巴西	0.2	0.2	21	阿富汗(32)	印尼(25)	黎巴嫩(9.1)
24	芬兰	0.2	0.2	-9.1	波兰(56)	英国(7.1)	瑞典(6.7)
25	葡萄牙	0.2	＜0.05	457	罗马尼亚(89)	比利时(7.0)	乌拉圭(2.7)

<0.05=介于 0 和 0.05 之间。

a 数字显示了这两个时期内每个供应商武器出口总额变化。

资料来源：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2019 年 3 月。

就美国同其客户以及盟国的关系而言，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近些年来，美国试图将其全球武器出口第一大国的身份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威胁对那些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或部件的国家，美国将停止对其出口美制武器或相关部件。在国会获得压倒性支持后，特朗普总统于 2017 年 8 月 2 日签署《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17] 法案不仅支持美国对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制裁，同时赋予美国政府权力，拒绝向那些也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外，美国政府可以阻止美国政府机构或美国公司参与任何涉及俄罗斯武器的交易。美元是国际武器交易种种的惯用结算方式，这一法案很可能对通过美国银行进行结算的俄罗斯和第三国之间的武器交易，产生重大影响。

2018 年，该法案似乎已经对某些国家的武器采购决策产生了影响。如 2018 年 12 月，菲律宾放弃了更为廉价的俄罗斯直升机，而选择了美国，其原因就是预计到美国制裁将影响到美元结算。[18] 为规避美国手握美元大棒对俄罗斯武器合同的制裁，俄罗斯已经开始使用卢布或是其贸易伙伴货币进行军售结算。[19]

表 5.5 2014-18 年六大主战武器供应商(类别)

本表列出 2014-18 年 5 年间，按 SIPRI 武器类别划分的 6 个最大主战武器供应商出口份额。高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位；低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1 位。由于四舍五入，单项百分比总计可能不能完全匹配。

	飞机	空防系统	装甲车	火炮	发动机	导弹	传感器	舰船	其他
美国	53	6.7	12	0.3	3.4	19	2.5	1.7	0.6
俄罗斯	50	6.9	11	0.3	7.3	12	1.7	8.9	1.7
法国	35	1.8	3.9	0.7	4.4	12	14	27	2
德国	11	1.3	14	2	8.7	7.5	3	52	0.1
中国	29	9.6	16	2.8	<0.05	16	2.9	24	0.5
英国	62	0.8	0.3	1.1	7.2	7.7	1.7	17	1.8
世界	43	60	11	0.9	4.6	14	4.8	15	1.3

<0.05 =0 到 0.05 之间

注："其他"包括海军武器、卫星、装甲车炮塔和空中加油系统。

关于 SIPRI 主战武器类别更多详情，见 SIPRI 网站武器转让数据库网页。

资料来源：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2019 年 3 月。

我们很难预测美国将如何一以贯之的执行这一新政，因为美国的一众盟友也在采购俄罗斯武器。例如，土耳其因从俄罗斯购买 S-400 地空导弹(SAM)系统，受到美国的压力。作为报复，美国于 2018 年 8 月暂停向土耳其交付 F-35 战机。[20] 然而，土耳其明确表示不准备放弃 S-400 协议，哪怕美国威胁要实施制裁。[21]

俄罗斯和伊朗已向土耳其抛出橄榄枝，联合开发第五代战机，以替代 F-35。[22] 这一案例也凸显出一个问题，大型武器装备涉及研发国和生产国众多，改变武器出口决策并非如同想象的那么简单。土耳其是 F-35 项目的合法合作伙伴，而且 F-35 的一些部件目前只在土耳其生产，因此目前美国将对土耳其采取何种法律手段，其实际影响力究竟几何，都未可知。[23]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其作为美国安全合作伙伴和武器出口大户，重要性与日俱增。然而，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印度的主战武器供应国，目前依然如此。CAATSA 的出台，让印度对未来同俄罗斯的武器关系心存忌惮。一边是对俄罗斯武器的高度依赖，一边是忌惮印美关系。[24] 时至 2018 年岁末，美国的立场仍不明朗。2018 年 8 月，美国警告印度，俄罗斯 S-400 订单可能会产生负面后果，并提出了美国的替代方案。[25] 印度对军事能力丧失的担忧也得到了美国军方的认同。[26] 2018 年 9 月，美国和印度外交和国防部长的面谈，似乎已经解决美国制裁问题，预计美国将给予印度 CAATSA 豁免。[27] 然而，2018 年 10 月，印度媒体报道称，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只有在印度“大幅度减少对俄罗斯武器依赖”的情况下，CAATSA 豁免才有可能，也就是满额完成 114 架战斗机订单需求，订购美国 F-16。[28]

俄罗斯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俄罗斯主战武器出口下降 17%，全球出口占比从 27%降至 21%。2014-18 年，俄罗斯向 48 个国家交付了主战武器，但其武器出口总量的 55%集中流向三个国家：印度、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在区域一级，2014-18 年，亚洲和大洋洲占俄罗斯武器出口的 60%，非洲占 17%，中东占 16%，欧洲占 5.8%，美洲占 1.4%。

2014-18 年度俄罗斯武器出口下降，部分原因是印度和委内瑞拉武器进口普遍减少，而他们正是俄罗斯前几年武器出口的主要接收国。尽管印度在 2014-18 年间仍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接收国，但俄罗斯对印度的武器出口在 2014-18 年度和 2009-13 年度间下降了 42%。对委内瑞拉的武器出口在 2009-13 年间下降了 96%，委内瑞拉是俄罗斯第 5 大武器接收国（另见第 3 节）。[29]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俄罗斯对中东主战武器出口增长了 19%。2009-13

年，俄罗斯占该地区进口总额的 15%，而 2014-18 年，降至 9.6%。过去几年里，俄罗斯一直试图通过武器交易加强与中东国家的往来，包括埃及和伊拉克，以对抗美国对该地区武器市场的统治。2014-18 年，埃及和伊拉克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接收国，分别占俄罗斯中东武器出口的 46%和 36%。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对伊拉克的交付量增加 780%，而对埃及的交付量则增加了 150%。俄罗斯向埃及交付的主战武器包括 3 套 S-300 防空导弹系统、27 架米格-29M 战斗机和 34 架 Ka-52 武装直升机。伊拉克从俄罗斯进口 19 架米-28N 战斗直升机和 73 辆 T-90S 坦克。未来几年，俄罗斯对中东的交付数量可能仍将居高不下。据俄罗斯武器出口署透露，俄罗斯武器出口协议大多通过该机构，2018 年末，俄罗斯未交付武器总金融价值达到创纪录的 500 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阿拉伯国家武器合同。俄罗斯还将武器出口视为其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工具：俄罗斯认为，增加对中东的武器出口，将提升俄罗斯武器的辨识度，强化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地位。[30]

西欧和欧盟

西欧五大武器出口国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在 2014-18 年度的武器转让总量占全球武器转让总量 23%，而 2009-13 年度为 21%。

2014-18 年度前 25 大武器出口国中有 16 个欧洲国家（见表 5.2 和 5.4）。16 个国家中有 10 个是欧盟（EU）成员国。2014-18 年，欧盟所有 28 个成员国的武器出口总量较 2009-13 年提升 9.9%，欧盟成员国在全球出口总额占比则从 26%增至 27%。

欧盟成员国已就武器出口管制的“统一高标准”和“趋同”达成一致。然而，欧盟成员国各自武器出口政策仍存在重大差异。[31]2018 年，这些差异在对沙特和阿联酋的武器出口时，表现得最为明显（见下文）。[32]尽管有着这些担忧，中东依旧是西欧三大出口国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法国对该地区的武器出口增长 261%，德国和英国分别增长 125%和 30%。

法国

2014-18 年间，法国是世界主战武器第三大供应国，占全球总量 6.8%。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法国武器出口增长 43%。法国武器出口总量的 44%

流向中东，亚洲和大洋洲 29%，欧洲其他国家 9.4%，美洲 8.7%，非洲 8.5%。2014-18 年间，法国共向 78 个国家交付主战武器。在此期间，埃及是法国武器的最大接收国（见表 5.4），其次是印度。法国对埃及的武器转让占法国主战武器出口总量的 28%。2014-18 年交付埃及的主战武器是一艘弗里姆护卫舰、20 架阵风战斗机和两艘米斯特拉尔大型两栖攻击舰。2014-18 年间，法国约 9.8%的武器出口流向印度。印度购买或交付的主战武器是天蝎座级潜艇、幻影-2000 战斗机、轻型直升机和导弹。2009 年至 2013 年，埃及和印度都不再是法国武器的重要进口国：法国武器出口占同期埃及武器进口的 2.0%，不及印度的 1.0%。

法国对武器出口的态度仍然像 2009-13 年那样强硬，但 2014-18 年期间，有大量重大交付，同时接收国也更为多样化。2009-13 年，法国主战武器三大接收国是中国、摩洛哥和新加坡。2014-18 年，三大接收国成了埃及和印度和沙特。

2018 年，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法国的武器接收国表示关切，特别是对埃及侵犯人权事件、武装镇压和卷入武装冲突尤其担忧。[33]然而，法国政府不为所动，法国政府加紧向埃及交付船只和战斗机，并向沙特交付装甲车。[34] 2018 年 6 月，法国武装部部长在国家出口报告中明确指出，人道主义局势问题或卷入武装冲突确实是武器出口许可证决定评估标准之一。然而，报告同时表明，武器出口必须要确保法国国家安全和武器工业财政生存与发展。[35]

德国

2014-18 年间，德国为全球第四大主战武器供应国。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其出口总量增长了 13%，全球出口总量占比从 6.1%升至 6.4%。2014-18 年间，德国共向 72 个国家提供了主战武器。德国武器出口 30%流向亚洲和大洋洲，欧洲其他国家 27%，中东 25%，美洲 11%，非洲 7.3%。2014-18 年，舰船尤其是潜艇，占到德国武器出口的 52%。德国共向哥伦比亚、埃及、希腊、以色列、意大利和韩国 6 个国家交付 16 艘各型潜艇。2014-18 年间，舰船交付占到德国武器出口总量的 42%。

从 2016 年初开始，一些批评沙特在也门使用军事力量的欧洲国家，相继宣布对沙特实施严格的武器出口限制。2018 年，德国成为对沙特最大的武器出口国。2018 年 11 月，德国暂停了对沙特的武器出口，包括停止欧洲其他国家武器

所需的德制武器部件出口。[36]2014-18 年，沙特仅占德国武器出口的 3.2%，这也表明此类限制对德国武器出口总量的影响聊胜于无。去年 11 月禁令实施时，德国向沙特出口主战武器的最大未完成订单是巡逻艇。德国停止对沙特的武器出口，也招致欧洲其他国家的批评，揶揄德国妨碍了他们对沙特的武器销售。例如英国就曾抱怨，由于台风战机依赖德国部件，德国的立场妨碍了英国同沙特敲定 48 架台风战机的大订单。[37]

德国对沙特的武器禁售，也突显出欧盟成员国内部武器出口政策的分歧，对未来联合武器开发和生产的潜在影响。在业已成型的主战武器合作框架之下，法德已同意共同开发一种新型坦克和六代战斗机。但 2018 年下半年，两国出现分歧，其核心焦点就是向第三方国家出口新型武器之时，究竟适用何种条款。[38]尽管如此，两国都明确表示，1971 年至今的德布里-施密特协议依然允许法国和德国各自按自身条款独立出口联合开发的武器，直至两国在双边或是更为广泛的欧盟内部基础之上达成新的出口规则。[39]

英国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英国武器出口增长 5.9%。2014-18 年，英国为全球第 6 大主战武器出口国。其武器出口 59%流向中东，其中大部分为向沙特和阿曼交付的战斗机。飞机，主要为战斗机，占到英国主战武器出口半壁江山，2014-18 年占英国武器出口总量 62%（见表 5.5）。

沙特占到英国武器出口总量的 44%，而 2009-2013 年为 41%。与德国一样，英国也强烈反对向沙特出口武器，尤其是因为沙特在也门战争中使用了英国武器。[40]尽管嘴上骂个不停，英国还是在 2018 年继续向沙特出口武器，并努力扩大销量。2018 年 3 月，英国政府与沙特签署 48 架台风战机意向备忘录。[41]2017 年年中以来，卡塔尔一直同沙特剑拔弩张，2017 年卡塔尔订购了 24 架台风战机。

中国

中国主战武器出口在 2004-2008 年和 2009-13 年间增长了 195%，但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仅增长了 2.7%。尽管中国武器出口量似乎已到平台期，但中国主战武器出口国数量却是大幅增加，甚至在 2014-18 年间也是如此。2014-18

年，中国共向 53 个国家交付主战武器，较 2009-13 年的 41 个国家和 2004-2008 年的 32 个国家有所增加。

2014-18 年，中国武器出口总量的 70%流入中东，非洲 20%，中东 6.1%，美洲 4.0%。2014-18 年，巴基斯坦是中国武器最大接收国（37%），巴基斯坦也是自 1991 年以来所有五年区间，中国武器的最忠实拥趸。随后是孟加拉国（16%）和阿尔及利亚（11%）。中国武器的接收国虽然众多，但接收的主战武器大都不多：2014-18 年的 53 个接收国中有 39 个国家，中国武器出口总量占比不及 1.0%。由于许多国家，包括 2014-18 年度 10 大武器进口国中的 4 个国家(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和越南)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出于政治原因，没有或者说几乎不可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采购中国武器，中国武器必然处处受限。尽管如此，中国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武器出口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包括开拓新客户。新技术在各类主战武器中得到运用，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 UCAV：2014-18 年，中国以巨大优势成为这一细分市场最大出口国。2009-13 年，中国共向 2 个国家出口了 10 架 UCAV，2014-18 年向 13 个国家出口 153 架 UCAV。与之相比，同期美国在 2009-13 年和 2014-18 年仅分别出口 3 架和 5 架，接收国均为英国。2014-18 年，伊朗向叙利亚交付了 10 架 UCAV，同期阿联酋向阿尔及利亚交付 2 架 UCAV。2014-18 年，中国的 UCAV 大多交付至中东国家，而中东国家的另外一个武器提供国美国，却一直不愿向其出售 UCAV。[42]

其他武器供应国

非欧洲和北美国家在主战武器序列中占比极小：2014-18 年，其世界武器出口总量占比仅 13%，2009-13 年为 11%。2014-18 年，前 25 大武器出口国中有 8 个国家为非欧洲或北美国家：中国、以色列、韩国、土耳其、阿联酋、澳大利亚、南非和巴西（按出口量排序）。这些国家中，只有中国和以色列位列主战武器出口世界 10 强。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以色列武器出口增长了 60%，这也是全球武器出口十强中增幅最大的一个。几十年来，以色列一直位列全球武器出口国 15 强。2014-18 年间，以色列向至少 37 个国家交付主战武器。然而，其武器出口总量 46%进入印度一个国家。

非欧洲和北美国家采取了国家投资本国军火企业的政策，其目的就是更独立于外部军火供应商，这也被视为促进自身军工企业发展的手段之一。此类政策背后往往也带有扩大武器出口的考量。如韩国将武器工业视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引擎”，在 2018 年创建了国防出口促进中心，助力武器出口。[43]土耳其国家发展政策，即 2023 年远景计划，其中规定的目标是将土耳其武器出口收入提升至澳大利亚、以色列水平。[44]澳大利亚于 2018 年 1 月启动国防出口战略，目标为 2028 年跻身世界十大军事装备出口国。[45]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韩国和土耳其的武器出口大幅增长，分别增长 94%和 170%。2014-18 年，韩国首次向几个欧洲国家芬兰、挪威和英国交付主战武器。同一时期，土耳其增加了对中东其他国家的武器出口。

总体而言，豪情万丈的武器出口增长政策通常很难长期执行，近些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非头部出口国的武器出口总量总是出现大幅波动。例如，瑞典在 2014-18 年，跌落至世界武器出口 15 位，而 1999-2003 年，它曾是第 7 大武器出口国，2014-18 年瑞典武器出口较 1999-2003 年度下降 57%。不过，瑞典将在 2019 年开始部分交付巴西的 36 架“鹰狮”战斗机订单，瑞典未来几年排名可能会上升。2014-18 年，巴西是全球第 23 大武器出口国，而在 1984-88 年，巴西武器出口峰值之时，巴西为第 13 位。

1 SIPRI 区域报道更多相关细节，见 SIPRI 网站武器转让数据库网页。

2 巴茨•D，“美国立法者考虑通过法案禁止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路透社，2018 年 10 月 24 日。

3 BBC 新闻，“贾马尔•哈苏吉:关于沙特记者之死，你需要知道的一切”，2018 年 12 月 11 日。

4 艾布拉姆森•J，“参议院反对特朗普的沙特政策”，《今日军控》，2019 年 1 月/ 2 月。

5 威廉姆斯•A，“参议员们准备应对美国背书沙特在也门的行动”《金融时报》，2018 年 12 月 5 日；埃德蒙森•C 和萨维奇•C，“众议院投票决定停止援助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战争”，《纽约时报》，2019 年 2 月 13 日。关于也门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6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五角大楼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交付第 300 架 F-35 飞机”，新闻发布，2018 年 6 月 11 日。

7 古尔德•J，“购买 F-16 战机，斯洛伐克切断俄罗斯硬件供应”，《国防新闻》，2018 年 11 月 18 日;辛格•S，“华盛顿让德里知道:购买我们的 F-16 战机，别和俄罗斯做生意”，《印度快报》，2018 年 10 月 20 日。

8 菲什曼•A，“空军将用升级的 F-15 IA 来填补 F-35 隐形战机的空缺”，Ynet 新闻，2018 年 11 月 19 日。

9 凯莉•T 和库博•N，“日本购买美国雷达用于导弹防御系统”，《日本时报》，2018 年 7 月 1 日;霍农•J•W，“日本宙斯盾海岸防御系统”，兰德博客，2018 年 8 月 20 日。见本卷第 6 章第 9 节。

10 弗格森•I•F 和克尔•P•K，美国出口管制制度与出口管制改革，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国会报告 R41916(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9 年 3 月 5 日更新);塞利格曼•L，“特朗普推动武装无人机出口，却收效甚微”，《外交政策》，2018 年 12 月 6 日。

11 对外军售 (FMS)是指美国对国外的“政府对政府”军售，其中美国政府在谈判、签署和执行合同时充当美国军工业和外国买家之间的中间人。塔克•P，“五角大楼正在加速对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盟国的武器出口”，《国防一号》，2018 年 5 月 23 日。

12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DSCA)为外国买家管理 FMS 合同。弗雷斯特•C，“美国审计机构针对 DSCA 政府指控”，《简氏防务周刊》，2018 年 8 月 8 日。有关 FMS 系统的概述，见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对外军品销售:对间接费用使用的财务监督需要加强》，GAO-18- 553 (GAO:华盛顿特区，2018 年 7 月)。

13 塔克(注 11)。

14 斯通•M 和曾格尔•P，“国会审议向沙特阿拉伯出售精确制导弹药:信源”，路透社，2018 年 5 月 23 日;卡弗利•J，“美国武器销售政策:海外安全，而非国内就业”，《触礁战争》，2018 年 4 月 6 日。

15 美国国务院，“美国无人机系统出口政策”，简报，2018 年 4 月 19 日。

16 斯通•M，“唐纳德•特朗普将向更多美国盟友出口武装无人机”，Live Mint 网站，2018 年 3 月 20 日。

17 有关 CAATSA 文本和其他美国官方相关信息，见美国财政部网站或美国国务院网站。

18 莫加托•M，“迫于制裁压力，菲律宾将购买美国直升机，而不是俄罗斯：官方信息”，路透社，2018 年 12 月 7 日。

19RT，“卢布:俄罗斯在与中国的主要武器交易中逐步淘汰美元”，2019 年 1 月 29 日。

20 霍斯特•P 和赫歇尔曼•K，“美国立法暂时禁止向土耳其交付 F-35”，《简氏防务周刊》，2018 年 8 月 22 日，第 6 页；“美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关系现状”，2018 年 11 月 26 日。

21 RT，“马蒂斯:美国不建议土耳其购买俄罗斯导弹防御系统”，2018 年 8 月 28 日;埃尔甘•U，“土耳其将于下月从美国接收首架 F-35 战斗机”，《赫里耶特每日新闻》，2018 年 5 月 9 日。

22 赫歇尔曼•K，“土耳其拒绝放弃 S-400 以换取 US 解除对 F-35 的封锁”，《简氏防务周刊》，2018 年 9 月 5 日，第 12 页。

23 赫歇尔曼•K，“如果美国不交付 F-35 战机，土耳其将行使法律权利”，《简氏防务周刊》，2018 年 8 月 22 日，第 6 页。

24 比赫拉•L•K 和巴拉干德兰•G，“CAATSA 对印度同美国、俄罗斯的国防关系的影响”，《印度防务评论》，2018 年 5 月 14 日。

25 RT， “美国官员暗示将对印度从俄罗斯购买 S-400 导弹的计划实施制裁”，2018 年 8 月 31 日。

26 印度报业托拉斯 (PTI)，“五角大楼挥舞制裁大棒，影响到印美关系”，《印度斯坦时报》2018 年 4 月 5 日。

27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印美关系的第一个 2+2 对话的“决定性时刻”:马蒂斯，《经济时报》，2018 年 9 月 12 日报道。

28 辛格(注 7)。

29 俄新社，[俄罗斯石油出口：俄罗斯武器需求的增长]，2018 年 11 月 12 日（俄语）。
30 库伊莫娃•A，“俄罗斯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武器出口:趋势与驱动因素”，欧洲-地中海研究委员会(EuroMeSCo)政策概要 No.95(2019 年 4 月 1 日)。
31 详情见欧洲议会对外政策司司长，《关于武器出口管制共同立场 944/2008/CFSP 进一步发展》研讨会报告(欧洲议会:布鲁塞尔，2018 年 7 月 17 日)。
32 更多详情见本卷第 10 章第 4 节。
33 人权观察，“2018 年世界报告:埃及，2017 年大事件”;大赦国际，埃及:法国如何使用武器镇压异见人士(大赦国际:伦敦，2018 年 9 月);伊登•P，“备受争议的法国和德国对中东武器销售”，《新阿拉伯》，2019 年 1 月 29 日。关于埃及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34 伊登(注 33);《法国 24 小时》，“法国反驳国际大赦对埃及武器出口的批评”，2018 年 10 月 18 日。
35 法国武装力量部，[向议会提交的关于法国武器出口的报告，2018](法国武装力量部:巴黎，2018 年 6 月)。
36 更多详情见本卷第 10 章第 4 节。
37 沙拉尔•A，“柏林的武器政策可能导致欧洲防务项目面临‘无德国’的风险”，路透社，2019 年 3 月 4 日。
38 施普伦格•S，“出口限制成为未来德法战机的痛点”，《防务新闻》，2018 年 10 月 28 日;斯派格•S，“欧洲下一代战斗机正处于争吵阶段”，《防务新闻》，2018 年 11 月 7 日。
39 《明镜周刊》，德国-法国秘密文件重新组织出口，2019 年 2 月 15 日。关于制定新的共同出口规则的更多详情，见本卷第 10 章第 4 节。
40 丘特尔•A，“英国提供的精确制导武器在沙特领导的也门战争中大受欢迎”，《防务新闻》，2016 年 10 月 17 日。更多细节见本卷第 10 章第 4 节。
41 曼斯•H 和霍林格•P，“沙特打算从 BAE 购买 48 架台风战斗机”，2018 年 3 月 9 日，《金融时报》;沙拉尔(注 37)。
42 达布里士•A•B，“中东地区武装无人机:该地区的扩散和规范”》，不定期报，(英国皇家联合服务学院：伦敦，2018 年 12 月)。
43 格雷瓦特•J，“韩国启动军事出口机构”，《简氏国防工业》，2018 年 11 月。
44《土耳其国防报》，“土耳其能实现 2023 年 250 亿美元的目标吗?”，第 10 卷 No.65 (2015)。
45 澳大利亚国防部(DOD)，国防出口战略(DOD:堪培拉，2018 年 1 月)。

第 3 节.2018 武器接收国

西蒙•T•魏泽曼，奥德•弗莱兰特，亚历山德拉•库伊莫娃，南天和皮耶特•D•魏泽曼

2014-18 年，SIPRI 确定 155 个国家为主战武器进口国。此外，还有 3 个国际组织和 6 个非国家反叛武装在 2014-18 年获得武器。2014-18 年五大武器进口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埃及、澳大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量的 35%（见表 5.6）。其中，沙特和印度在 2009-13 年和 2014-18 年两次跻身世界进口五强之列。区域一级，2014-18 年亚洲和大洋洲占全球进口 40%，其次是中东（35%）、欧洲（11%）、非洲（7.8%）和美洲（6.2%）。

非洲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非洲国家武器进口下降了 6.5%。该区域占 2014-18 年全球武器进口总量 7.8%（见表 5.1）。阿尔及利亚占非洲武器进口 56%，摩洛哥 15%，尼日利亚 4.8%。

北非

北非四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占非洲武器进口的 75%。[1]上述四国武器进口总量在 2009-13 年和 2014-18 年间增加了 20%。

2014-18 年，俄罗斯为北非第一大武器出口国，占北非武器进口总量的 49%，美国 15%，中国 10%，法国 7.8%，德国 7.7%。

阿尔及利亚主战武器进口在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增长了 55%。2014-18 年，俄罗斯武器占阿尔及利亚武器进口半壁江山（66%），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自 1952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就牢牢占据其武器市场（见表 5.7）。1961 年至 2013 年间，阿尔及利亚 87%的武器进口来自俄罗斯（或苏联）。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俄罗斯向阿尔及利亚交付的主战武器增加了 14%，但其他武器供应国的增速更快。中国和德国在 2014-18 年成为阿尔及利亚重要的武器供应国，分别占阿尔及利亚主战武器进口总量 13%和 10%，而在 2009-13 年，两国所占比例均不及 0.5%（见表 5.8）。2014-18 年间，中国共向阿尔及利亚交付 3 艘护卫

舰，德国交付 2 艘护卫舰和 269 辆装甲运兵车(APC)。

阿尔及利亚 APC 订单共 1000 辆，采取的是许可证形式授权在阿尔及利亚生产和组装。中国还向阿尔及利亚交付了 10 架 UCAV，上述武器都不属于俄罗斯出口武器。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摩洛哥主战武器进口量下降 35%，原因是一些重大军购计划执行完毕，但仍远高于 2009 年之前 20 年交付总量。2014-18 年，美国（62%）和法国（36%）一直是摩洛哥的主要武器供应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两国也一直是摩洛哥最大的两家武器供应商。

撒哈拉以南非洲

该地区五大武器进口国分别为尼日利亚、安哥拉、苏丹、喀麦隆和塞内加尔。2014-18 年，五国进口总量占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武器进口的 56%。2009-13 年，乌干达、苏丹、南非、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为该地区五大进口国。五国中，乌干达、南非和埃塞俄比亚的武器进口在 2014-18 年出现下降（降幅为 88%至 96%不等），主要是因为几个重大军购计划执行完毕。

2014-18 年，俄罗斯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武器进口总量的 28%，中国 24%，乌克兰 8.3%，美国 7.1%，法国 6.1%。2009-13 年，乌克兰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大的武器供应国；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中国对该地区的武器出口却下降了 79%。

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饱受武装冲突影响，并且有些国家还接收到外部军事援助，但上述国家主战武器进口数量却相对较少。[2]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萨赫勒五国集团（G5 萨赫勒），便是一个典型。G5 成立了一支联合部队，对诸如博科圣地之类的反政府武装采取集体军事行动。[3] 2014-18 年，G5 国家武器进口总额占全球总量的 0.2%。在此期间，G5 共接收 26 架军用飞机，其中包括 5 架轻型战斗机和 2 架武装直升机以及 179 辆轻型装甲车。此类武器的交付仅占同期全球同品类武器转让的极小部分。但考虑到 G5 国家本身武器存量基数有限，新购武器数量就显得十分可观。

表 5.6　2014-18 年世界前 50 位主战武器接收国

该表格包括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在 2014-2018 年的 5 年间主战武器进口。排名根据 2014-2018 年进口总额，数字为 SIPRI 趋势指标值(TIVs)。百分之十以上的百分比已被四舍五入到最近整数位，低于 10%的百分数则舍去。由于四舍五入，数字合计可能不一定和总数完全一致。

排名			出口额 (TIV,百万)		2014-18	自 2009-13 年变化（%）
2014-18 年	2009-13 年 a	接收国	2018 年	2014-18 年	占比	
1	4	沙特	3810	16869	12	192
2	1	印度	1539	13876	9.5	-24
3	14	埃及	1484	7429	5.1	206
4	8	澳大利亚	1572	6793	4.6	37
5	11	埃尔及利亚	1318	6441	4.4	55
6	2	中国	1566	6103	4.2	-7.0
7	5	阿联酋	1101	5425	3.7	-5.8
8	17	伊拉克	596	5350	3.7	139
9	9	韩国	1317	4492	3.1	-8.6
10	15	越南	546	4240	2.9	78
11	3	巴基斯坦	777	4012	2.7	-39
12	22	印尼	354	3590	2.5	86
13	10	土耳其	685	3408	2.3	-21
14	38	卡塔尔	816	2949	2.0	225
15	47	以色列	498	2875	2.0	354
16	6	美国	613	2646	1.8	-47
17	28	台湾	129	2426	1.7	83
18	43	阿曼	316	2359	1.6	21.3
19	16	英国	533	2352	1.6	2.3
20	39	意大利	311	2193	1.5	162
21	23	日本	696	2100	1.4	15
22	7	新加坡	510	1857	1.3	-63
23	24	阿塞拜疆	330	1846	1.3	15
24	13	摩洛哥	387	1766	1.2	-35
25	36	孟加拉	100	1703	1.2	75
26	33	加拿大	215	1505	1.0	42
27	35	泰国	578	1475	1.0	46
28	20	希腊	65	1423	1.0	-30
29	63	科威特	88	1393	1.0	348
30	54	哈萨克斯坦	309	1311	0.9	232
31	41	约旦	215	1266	0.9	61
32	25	挪威	537	1211	0.8	-22
33	18	阿富汗	240	1103	0.8	-48
34	44	墨西哥	26	1011	0.7	40

35	29	巴西	304	947	0.6	-28
36	27	缅甸	192	872	0.6	-40
37	49	芬兰	130	860	0.6	64
38	40	波兰	171	816	0.6	2.5
39	50	土库曼斯坦	-	765	0.5	59
40	20	挪威	92	743	0.5	303
41	91	菲律宾	95	728	0.5	-65
42	14	马来西亚	25	698	0.5	334
43	71	秘鲁	156	573	0.4	-46
44	79	俄罗斯	26	566	0.4	63
45	38	哥伦比亚	142	566	0.4	148
46	27	西班牙	49	552	0.4	47
47	33	荷兰	16	500	0.3	-51
48	52	尼日利亚	-	486	0.3	-83
49	74	白俄罗斯	4	448	0.3	31
50	45	苏丹	70	445	0.3	-64
..	..	115 个其他国家	1939	8928	6.1	..
		总计	27587	146291	..	7.8

. .-不可用或不适用; - -未交付。

注: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与主战武器实际交付有关。为了便于对不同武器交付数据进行比较，并确定其一般趋势，SIPRI 使用了一个趋势指标值(TIV)。其数值只是武器转让量的一个指标，而并非武器转移的财务价值。因此，它不能与经济统计数字相比。TIV 计算方法可参见方框图 5.1 相关描述。

a 2009-2013 年度供应商排名与 SIPRI 2014 年年鉴排名有所不同，因为年度数据随后进行了修订。

资料来源：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2019 年 3 月

虽然外部行动者军事援助并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独有，但必须支出的是，向撒南非洲国家提供武器往往只是军援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非主战武器交付才是军援计划的重头戏。例如，2017 年和 2018 年，美国不仅向乍得交付了主战武器(装甲车和侦察机)，还交付了无线电、指挥和控制设备。[4]2018 年，中非共和国(CAR)收到了来自法国和俄罗斯的轻型武器，小型武器和车辆等非致命性武器则来自比利时，中国和美国。[5]一些评论员指出，此类军援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工具，其目的就是扩大在自然资源丰富受援国的影响力。例如，有媒体报道称，2018 年俄罗斯和法国竞相向 CAR 提供武器供应的动机就是为了争夺影响力。

表 5.7 2014-2018 年 10 大常规主战武器接收国及对应提供国

表中所示数据为接受国所占各供应国武器出口总量占比。只显示世界十大武器接收国总进口量占比 1%以上的供应国。较小的供应商按“其他”分组。高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数位；低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1 位。因四舍五入，数据累加可能无法完全契合。

提供国	接收国									
	沙特	印度	埃及	澳大利亚	阿尔及利亚	中国	阿联酋	伊拉克	韩国	越南
白俄罗斯	--	---	---	---	---	---	---	0.8	---	4.1
保加利亚	0.1	---	<0.05	---	---	---	---	2.1	---	---
加拿大	1.1	0.8	0.4	0.4	---	---	1.1	---	---	---
中国	0.7	---	0.4	---	13	..	2.2	0.3	---	---
智利	---	---	---	---	---	---	---	3.6	---	1.1
法国	4.3	7.0	37	5.0	0.4	10	10	---	1.2	---
德国	1.8	0.8	6.1	1.1	10	0.9	2.4	0.6	39	---
以色列	---	---	---	---	---	---	---	---	2.7	9.1
意大利	1.3	0.2	0.1	2.4	4.8	---	2.2	3.2	---	---
荷兰	0.3	0.2	0.6	---	0.6	---	3.1	---	---	---
俄罗斯	---	58	30	---	66	70	1.5	33	---	78
南非	0.1	0.3	<0.05	---	0.3	---	1.7	<0.05	---	---
韩国	<0.05	0.3	0.8	---	---	---	---	8.0	..	2.8
西班牙	2.3	---	2.6	29	---	---	---	0.6	2.2	0.8
瑞典	1.0	---	---	0.2	1.6	---	2.7	---	0.9	---
瑞士	1.6	0.3	---	1.8	---	4.3	---	---	---	---
土耳其	0.8	---	---	---	---	---	7.8	---	---	---
阿联酋	---	---	2.8	---	0.5	---	..	---	---	---
英国	16	3.6	---	0.6	1.1	4.3	0.1	---	3.0	---
乌克兰	---	0.8	---	---	<0.05	8.6	---	---	---	2.0
美国	68	12	19	60	0.4	---	64	47	51	1.3
乌兹别克斯坦	---	---	---	---	---	1.7	---	---	---	---
其他	0.4	0.3	0.2	0.2	0.5	---	0.6	0.8	---	0.5

--- =无数据,<0.05=0 到 0.05 之间

数据来源：SIPRI 数据库，2019 年 3 月

表 5.8. 2014-18 年世界前 40 位主战武器进口国及其对应三大出口国

高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最接近整数位；低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1 位。

排名		武器进口占比%		2009-13 至	主要供应国（进口占比%），2014-18		
2014-18	进口国	2014-18	2009-13	2014-18a 变化%	第 1	第 2	第 3
1	沙特	12	4.3	192	美国(68)	英国(16)	法国(4.3)
2	印度	9.5	13	-24	俄罗斯(58)	以色列(15)	美国(12)
3	埃及	5.1	1.8	206	法国(37)	俄罗斯(30)	美国(19)
4	澳大利亚	4.6	3.6	37	美国(60)	西班牙(29)	法国(5.0)
5	阿尔及利亚	4.4	3.1	55	俄罗斯(66)	中国(13)	德国(10)
6	中国	4.2	4.8	-7	俄罗斯(70)	法国(10)	乌克兰(8.6)
7	阿联酋	3.7	4.2	-5.8	美国(64)	法国(10)	土耳其(7.8)
8	伊拉克	3.7	16	139	美国(47)	俄罗斯(33)	韩国(8.0)
9	韩国	3.1	3.6	-8.6	美国(51)	德国(39)	英国(3.0)
10	越南	2.9	1.8	78	俄罗斯(78)	以色列(9.1)	白俄罗斯(4.1)
11	巴基斯坦	2.7	4.8	-39	中国(70)	美国(8.9)	俄罗斯(6.0)
12	印尼	2.5	1.4	86	英国(19)	美国(18)	荷兰(13)
13	土耳其	2.3	3.2	-21	美国(60)	西班牙(17)	意大利(15)
14	卡塔尔	2.0	0.7	225	美国(64)	德国(15)	法国 (7.4)
15	以色列	2.0	0.5	354	美国(65)	德国(27)	意大利(8.9)
16	美国	1.8	3.7	-47	德国(22)	荷兰(13)	法国 (11)
17	台湾	1.7	1.0	83	美国(100)	德国(0.2)	意大利(0.1)
18	阿曼	1.6	0.6	213	英国(39)	美国(30)	挪威(8.5)
19	英国	1.6	1.7	2.3	美国(71)	韩国(17)	德国(4.5)
20	意大利	1.5	0.6	162	美国(59)	德国(26)	以色列(7.5)
21	日本	1.4	1.3	15	美国(95)	英国(3.1)	瑞典(1.5)
22	新加坡	1.3	3.7	-63	美国(46)	法国(21)	西班牙(11)

23	阿塞拜疆	1.3	1.2	15	俄罗斯(51)	以色列(43)	土耳其(2.8)
24	摩洛哥	1.2	2.0	-35	美国(62)	法国(36)	意大利(0.6)
25	孟加拉	1.2	0.7	75	中国(70)	俄罗斯(18)	美国(3.2)
26	加拿大	1.0	0.8	42	美国(63)	荷兰(16)	德国(6.9)
27	泰国	1.0	0.7	46	韩国(20)	乌克兰(18)	中国(18)
28	希腊	1.0	1.5	-30	德国(67)	美国(20)	法国 (8.4)
29	科威特	1.0	0.2	348	美国(87)	俄罗斯(3.4)	瑞士(2.9)
30	哈萨克斯坦	0.9	0.3	232	俄罗斯(84)	西班牙(5.5)	法国 (3.0)
31	约旦	0.9	0.6	61	荷兰(37)	美国(30)	意大利(5.8)
32	挪威	0.8	1.1	-22	美国(76)	韩国(9.3)	意大利(6.2)
33	阿富汗	0.8	1.6	-48	美国(66)	俄罗斯(18)	巴西(10)
34	墨西哥	0.7	0.5	40	美国(63)	法国(9.4)	荷兰(8.9)
35	巴西	0.6	1.0	-28	法国(26)	美国(17)	英国(15)
36	缅甸	0.6	11	-40	中国(61)	俄罗斯(20)	白俄罗斯(6.5)
37	芬兰	0.6	0.4	64	美国(37)	荷兰(19)	挪威(19)
38	波兰	0.6	0.6	2.5	德国(28)	芬兰(20)	意大利(16)
39	土库曼斯坦	0.5	0.4	59	土耳其(43)	中国(31)	俄罗斯(13)
40	秘鲁	0.5	0.1	303	韩国(34)	俄罗斯(22)	意大利(14)

<0.05 = 0 至 0.05 之间；a 数据所示为两个时间段，武器进口总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2019 年 3 月

美洲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美洲国家主战武器进口下降了 36%。尽管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武器出口国，并且有能力生产所有类型武器，但 2014-18 年，美国却也是美洲主战武器最大进口国，占地区武器进口总量的 29%。其中大部分(69%)交付武器均为在北约伙伴国授权下美国本地生产。然而，随着几个大型军购项目接近尾声，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美国武器进口下降 47%，从全球第 6 大进口国滑落至第 16 位。

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及南美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主战武器进口增长了 49%。相比之下，同期南美各国武器进口下降 51%。2014-18 年，上述两个次区域武器进口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量 3.4%。美国依旧是两次区域的最大出口国:2014-18 年，美国占南美国家武器进口总量 17%，占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武器进口 47%。同一时期，法国和德国是南美的另外两大武器供应国，分别占南美武器进口的 13%和 9.7%。继美国之后，荷兰成为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第二大武器供应国，2014-18 年占次区域武器供应总量的 16%。[6]

墨西哥占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武器进口总量 72%。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墨西哥武器进口增长了 40%，主要原因是墨西哥军方使用进口武器打击贩毒集团。2014-18 年，美国为墨西哥第一大武器供应国，占墨西哥武器进口总量 63%。

2014 - 18 年，巴西占南美武器进口总量 27%，成为次区域最大武器进口国。2009-13 年 至 2014-18 年,巴西武器进口总量下降了 28%。2014 年，严重经济衰退席卷巴西，可能会导致 2014-18 年部分武器交付延后。[7] 巴西的大宗海外军购包括 36 架瑞典鹰狮 E 战斗机，5 艘法国潜艇以及其他一些主战武器采购。然而，囊中羞涩的巴西不得不面临武器迟迟无法交付的窘境。

2009-13 年，委内瑞拉是南美最大的武器进口国。2009-13 年至 2014-18 年，委内瑞拉爆发严重经济危机，武器进口下降 83%。2018 年已是委内瑞拉连续第二年没有任何主战武器进口。

亚洲和大洋洲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亚洲和大洋洲国家武器进口总量下降 6.7%。该区域各国武器进口总量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量 40%，而 2009-13 年，这一比例达到 47%。2014-18 年世界武器进口十强中，半数为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印度、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和越南。

2009-13 年和 2014-18 年间，中亚武器交付总量增加 154%，大洋洲增加 36%，东亚增加 1.1%，而南亚及东南亚分别减少 25%和 6.2%。

澳大利亚

随着澳大利亚对亚太地区安全威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澳大利亚大宗军购已经拉开大幕。[8] 于是，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澳大利亚武器进口增长了 37%，飙升至 195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4-18 年，澳大利亚为全球第四大武器进口国，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量的 4.6%。2014-18 年，美国和西班牙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分别占澳大利亚武器进口的 60%和 29%。2014-18 年度，澳大利亚各军种都有新主战武器列装，但主要集中在飞机和舰船。美国交付的 10 架 F-35 战斗机和 8 架 P-8 反潜攻击机占澳大利亚武器进口的 53%。西班牙交付的两艘大型两栖攻击舰和两艘驱逐舰，占其进口总量的 29%。至少还有 62 架美国 F-35 战斗机、12 艘法国潜艇、1 艘西班牙驱逐舰和 9 艘英国护卫舰等待交付，数量仍很庞大。然而，其中 21 艘舰船交付期已规划至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到 2050 年左右。

南亚

尽管印巴冲突从未停歇，但两国 2014-18 年的武器进口都低于 2009-13 年。[9]

2014-18 年度，印度是全球第二大主战武器进口国，占全球进口总量的 9.5%。2009 - 13 年至 2014-18 年，印度武器进口下降了 24%，部分原因是外国武器供应商许可证项下本土生产武器延期交付，如俄罗斯 T90S 坦克和苏-30 战斗机订单以及法国潜艇订单。[10] 2014-18 年，俄罗斯占到印度武器进口的 58%，而 2009-13 年为 76%。2018 年，尽管面对美国的强力施压，印度还是向俄罗斯订购了 S-400

导弹系统。但与此同时，印度取消了参与俄罗斯苏-57 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制计划。印度原计划订购至少 100 架俄五代战机（FGFA），但近年来人们对该协议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11]以色列、美国和法国都在 2014-18 年加大了对印武器出口，美国和欧洲也都提出苏-57 的替代提议，包括印度本土生产以及技术转让。[12]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巴基斯坦武器进口下降 39%。中国是巴基斯坦第一大武器供应国，2014 年至 2018 年，中国占巴基斯坦主战武器进口总量 70%。自 1965 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武器供应商。2009-13 年，美国占巴基斯坦主战武器进口 28%，但近年来美国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或向巴销售武器装备。[13]2018 年，美国暂停或取消了若干对巴一揽子军事援助，包括交付 12 架 AH-1Z 武装直升机。[14]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美国对巴基斯坦武器出口下降 81%，仅占到 2014-18 年巴基斯坦武器进口总量 8.9%。美国交付量下降是导致巴基斯坦两期武器进口总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巴基斯坦继而转向其他武器供应商。如 2018 年，巴基斯坦向土耳其订购了 4 艘护卫舰和 30 架武装直升机。然而，由于直升机引擎部件为美国设计，美国拒绝向巴基斯坦出口直升机，巴直升机订单也因此遇到一些麻烦。[15]

中国

尽管近年来，中国本土武器生产能力突飞猛进，但 2014-18 年间，中国仍是全球第六大武器进口国，占全球进口总量的 4.2%。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中国武器进口总量下降了 7.0%。2014-18 年度，俄罗斯占到中国武器进口 70%。中国在某些武器技术上仍然依赖进口。中国从俄罗斯订购了数套 S-400 远程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首批于 2018 年交付。中国目前生产的大多数战斗机和大型运输机所需发动机均从俄罗斯采购，大型海军舰艇发动机仍部分从法国和乌克兰采购，获得生产许可后在本土生产。中国武器工业在这些领域还未发展出与外国供应商相匹敌的技术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新一代战斗机(J-20 和 J-31)的原型机仍采用俄罗斯发动机，其原因就是自主研发发动机的开发由于技术问题而被推迟。然而，中国已经成功地完成独立知识产权的生产设备进口替代。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在发动机研发上也会有所突破。[16]

欧洲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欧洲国家武器进口下降了 13%。部分原因是 2008 年前后席卷全球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长期影响，导致许多欧洲国家缩减军购计划。2014-18 年，欧洲国家武器进口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量的 11%。虽然许多欧洲大国都具备相当规模的武器工业，但大都继续进口武器。然而，时至 2018 年，俄罗斯不再进口主战武器，也未同外国武器供应商签订采购大单。2014 年之前，俄罗斯一直从乌克兰进口武器，并开始从其他欧洲国家进口武器。2014 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也为上述武器贸易关系画上了句号。2014 年起，欧盟开始对俄罗斯实施武器禁运。[17]

多年来，欧盟内部一直在努力提高欧洲在武器开发和军购透明度。例如，欧盟在 2017 年设立欧洲防务基金，旨在促进欧盟成员国在军事装备研发和生产方面的合作。[18]然而，欧盟成员国继续从欧盟以外国家购买大量主战武器。2014-18 年，欧盟成员国进口的主战武器中，41%来自美国，12%来自其他非欧盟国家。未来几年，美国仍将是欧盟成员国的主要供应商，主要原因是美国向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荷兰和英国总共需交付 296 架 F-35 战斗机。2018 年，欧盟和美国武器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仍在继续:例如，比利时和斯洛伐克决定采购美国战斗机，而英国订购了美国反潜攻击机，而非选择欧盟成员国提供的同类替代品。比利时采购美国战机的决定也招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批评，马克龙认为“此举在战略上违背了欧洲的利益”。[19]

中北欧

尽管 2014 - 18 年对欧洲武器进口总体下降，但欧洲许多国家——特别是与俄罗斯关系日益紧张的中欧和北欧国家——自 2014 年以来实施了大型军事采购计划。2014-18 年，挪威在 2008 年从美国订购的 52 架 F-35 战机中的首批 16 架正式交付。挪威还向美国订购了 5 架海上巡逻/反潜战斗机，从德国订购了 4 艘潜艇。2018 年，波兰和罗马尼亚分别向美国订购了 30 枚和 54 枚短程弹道导弹。波兰订单实际是 2015-16 年向美国订购的 138 枚空基巡航导弹(ALCM)的后续订单。2018 年，波兰、罗马尼亚和瑞典向美国订购了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

尽管乌克兰武装冲突爆发，但 2014-18 年乌克兰进口的主战武器非常少。

2014 年冲突爆发之时，美国、加拿大和大多数西欧和中欧国家明确表示，虽然道义上支持乌克兰，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向乌克兰提供大量致命武器装备。然而到了 2017 年，一些国家愿意为乌克兰提供数量有限的致命性武器，如 2018 年捷克向乌克兰交付二手装甲车，美国交付了反坦克导弹。[20]

中东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中东国家武器进口增长了 87%。2014-18 年，全球十大武器进口国中，有 4 个国家来自中东:沙特阿拉伯，地区武器进口总量 33%流入沙特、埃及(15%)、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11%)和伊拉克(11%)。美国占到地区武器进口总量的 54%,俄罗斯 9.6%,法国 8.6%。中东面临着来自美国、西欧和中欧的巨大政治压力,尤其反对向卷入也门战争的沙特和阿联酋(见第 1 节)出口武器，中东武器进口却依旧保持增长。

海湾地区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海湾地区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武器进口大幅增长。增长背后的核心推动来自于伊朗与沙特、阿联酋之间的相互戒备;以及始于 2015 年的也门战争。此外，自 2017 年年中以来，卡塔尔与沙特和阿联酋之间的敌对关系。[21]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沙特武器进口增长了 192%，成为 2014-18 年度全球第一大武器进口国。沙特武器进口 68%来自美国。2014-18 年，沙特接收的主战武器包括 56 架美国战斗机和 38 架英国战斗机。2019-23 年计划交付武器包括美国 98 架战斗机、7 套导弹防御系统和 83 辆坦克;加拿大 737 辆装甲车;西班牙 5 艘护卫舰;以及来自乌克兰的短程弹道导弹。

2014-18 年，阿联酋为世界第 7 大武器进口国。阿联酋武器进口 64%来自美国。2014-18 年交付的武器，包括美国的 5 套导弹防御系统和 1671 辆 APC，以及法国的 3 艘护卫舰。一些装甲车随后由阿联酋转手提供给也门民兵组织。

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卡塔尔武器进口增长了 225%。2014-18 年，美国占卡塔尔武器进口的 65%。卡塔尔还从其他武器供应商进口了少量武器，包括德国的坦克、法国的战斗机和俄罗斯的短程防空系统。2019-23 年计划交付的主

战武器包括 93 架战斗机(美国 36 架，法国 33 架，英国 24 架)和来自意大利的 4 艘护卫舰。

2014-18 年度，伊朗占中东武器进口总量的 0.9%。自 2010 年以来，伊朗一直受制于联合国武器禁运，禁运计划将持续至 2020 年底。[22]伊朗武器工业可生产某些类型主战武器，如弹道导弹，或对现有武器装备进行现代化改造，如上世纪 70 年代进口的美制战机。然而，这些武器的性能水平受到广泛质疑。事实证明，伊朗的弹道导弹，包括 2017 年和 2018 年提供给也门胡塞武装的导弹，实际作战中并不那么精准。[23]此外，伊朗在 2018 年展示了一架新型战机，并声称为国产机型，许多西方观察家注意到，实际上可能也就是伊朗 70 年代采购美国轻型战机的改进型。[24]

伊拉克和叙利亚

尽管 2014-18 年伊拉克和叙利亚各自的冲突仍在延续，但两个国家武器进口趋势却有着显著差别。[25] 2014-18 年，伊拉克为全球第八大武器进口国，而叙利亚排名第 60 位。伊拉克接收了各式各样主战武器——包括作战飞机和武装直升机——主要来自美国和俄罗斯。2009-13 年至 2014-18 年间，伊拉克武器进口增长 139%。相比之下，叙利亚武器进口同期下降 87%。2009-13 年，俄罗斯向叙利亚提供了高价值防空系统和反舰导弹;2014-18 年，俄罗斯主要向叙利亚提供二手装甲车等低价值武器。俄罗斯并未向叙利亚提供主战武器，而是部署军事力量直接支持叙利亚政府。然而，2018 年俄罗斯向叙利亚交付了三套远程防空系统，这是自 2013 年以来俄罗斯首次向叙利亚出口高价值武器。

中东导弹转让

中东许多国家已经获取并将继续获取射程在 250 至 500 公里之间的陆基或空基导弹。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本土可生产某些型号导弹，中东大量进口其他类型导弹。2014-18 年，埃及从法国订购了 ALCM;科威特从英国采购 ALCM;卡塔尔从法国订购了 ALCM 并从中国采购短程弹道导弹;沙特阿拉伯从英国和美国获得了 ALCM，并从乌克兰采购短程弹道导弹;土耳其进口美国 ALCM;阿联酋从美国进口短程弹道导弹。

1 自 2014 年以来，利比亚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府，分别控制着利比亚的西部和东部。各自都进口主战武器。相关详细信息，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2 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3 关于 G5 萨赫勒部队，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参见范德•李•J，“多边非和平行动”，SIPRI 年鉴 2018，第

139-41 页。

4 美国驻非洲司令部，2018 年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态势声明。

5 联合国安理会，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99(2018)号决议的最终报告，S/2018/1112，2018 年 12 月 14 日，第 41 页。

6 洛格里•P 和卢埃•S，“法国向中非提供武器，支持结束禁运”;博蒙特•P，“俄罗斯对非洲影响力的争夺让西方官员措手不及”，《卫报》，2018 年 9 月 11 日。

7 格罗泽劳•V，“巴西潜艇计划的最新进展”，《海洋》，2017 年 7 月 21 日;比勒•D，“巴西的高与低”，彭博社，2018 年 10 月 5 日。

8 关于澳大利亚国防政策和威胁感知见澳大利亚国防部(DOD)，2016 年白皮书(DOD:堪培拉，2016);2015 年国防白皮书外部专家小组，“防范不确定性:澳大利亚国防态度”(DOD: 堪培拉，2015);麦德卡夫•R 和布朗•J，“2035 年国防挑战:保障澳大利亚生命线”，(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悉尼，2014 年 11 月)。

9 关于印巴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10 辛格•S,“阵风来袭，HAL 的苏霍伊推迟 3 年面市，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该公司表示将如期”,《印度快报》，2018 年 10 月 2 日；印度政府，国防常务委员会，国防部:拨款需求(2017-18):兵工企业，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印度质监总局，需求报告 No.20,30(印度政府:新德里，2017 年 3 月);巴苏•N,“PMO 批评国防部的 375 亿美元天蝎座潜艇项目资金，迟迟不能到位”,《印度商业快报》，2018 年 1 月 30 日。

11 普比•M，“DRDO 的技术吹嘘使印俄飞机交易减少 90 亿美元”,《经济时报》，2018 年 6 月 13 日;加迪•F•S，“印度退出与俄罗斯的联合隐形战机项目”,《外交官》，2018 年 4 月 23 日。

12 米格拉尼•S,“洛克希德公司将推出为印度配置的新型 F-21 战斗机”，路透社，2019 年 2 月 20 日; 麦克利里•P，“印度正在大力发展新战机;洛克希德，波音想印度工厂承诺”,《防务快讯》，2019 年 2 月 12 日。

13 伊克巴尔•A，“巴基斯坦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黎明》，2018 年 4 月 19 日。见魏泽曼•S，“2017 年武器转让”，SIPRI 年鉴 2018，第 207 页。

14 穆罕默德•A 和兰迪•J，“美国暂停向巴基斯坦提供至少 9 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路透社，2018 年 1 月 4 日；斯图尔特•P 和阿里•I，“五角大楼取消对巴基斯坦创纪录的军事援助”，路透社，2018 年 9 月 1 日;《亚洲军事评论》，“巴基斯坦陆军攻击直升机选项”，2018 年 12 月 7 日。

15 贝克迪尔•B•E，“外交争端危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之间 15 亿美元的直升机交易”,《国防新闻》，2018 年 8 月 13 日；格尔居吕•E，“ATAK 引擎瞄准 15 亿美元销售额”,《赫里耶特每日新闻》，2018 年 11 月 30 日；《亚洲和军事评论》(注 14)。

16 周•E•K,“中国可能已经解决了一件随时可能阻止其军事崛起的威胁”,《国家利益》，2018 年 1 月 20 日;格茨•B，“中国的乌克兰喷气发动机”,《华盛顿时报》2018 年 8 月 15 日。

17 更多详情见本卷第 10 章第 2 节。

18 欧洲委员会，“欧洲防务基金”，2018 年 6 月 13 日。

19 法新社，“马克龙对比利时购买 F-35 表示遗憾”,《费加罗报》，2018 年 11 月 26 日。

20 魏泽曼•S•T 和库伊莫娃•A，“乌克兰与黑海安全”，SIPRI 背景文件，2018 年 12 月，第 12 页。

21 关于中东和北非的州际博弈，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22 见 SIPRI 武器禁运档案。

23 宾尼•J，“试验场:评估伊朗在叙利亚和也门的武器性能”,《简斯防务周刊》，2018 年 8 月 1 日。

24 达德利•D，伊朗“新型”战斗机引起了人们的嘲笑，因为观察家们注意到它与 60 年代的美国战机很相似,《福布斯》，2018 年 8 月 21 日。

25 关于伊拉克和叙利亚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第 4 节.武器转让透明度

马克•布罗姆利和西蒙•T•魏泽曼

武器转让- -出口/进口- -的官方公开数据对于评估各国武器出口、武器采购和国防政策极为重要。过去的 25 年中，通过参与地区或国际报告机制全球约有 170 个国家以各类国家报告形式公开其武器进出口信息（尽管多数情况下，只是涵盖一年或几年信息）。[1]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自 1990 年起已有 36 个国家完成至少 1 份国家武器出口报告。[2]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 2018 年提交 2015 年至 2017 年国家武器出口报告，这种情况此前还从未出现。同时报告类型和细节水平也未能出现进步。[3]1990 年代初以来，一些区域报告机制获得通过或是已经建立(最为明显的是西非、美洲和欧盟)。[4]可惜的是，2018 年，此类地区机制未见任何实质进展。国际武器转让领域的核心报告机制为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UNROCA)和 2013 年武器贸易条约(ATT)报告机制。本节将重点分析这两大机制的现状。[5]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UNROCA（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机制于 1991 年启动，并于 1993 年开始报告(为统计 1992 年武器转让)。UNROCA 的目标是在各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并“防止武器装备过度和破坏稳定”。每年，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要求在自愿的基础上，就其某些类型武器，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最致命”武器的进出口情况予以上报。[6]此外，还提请各国提供关于武器持有及军购情况更多背景资料。自 2003 年起，还要求各国提供小武器及轻武器(SALW)进出口背景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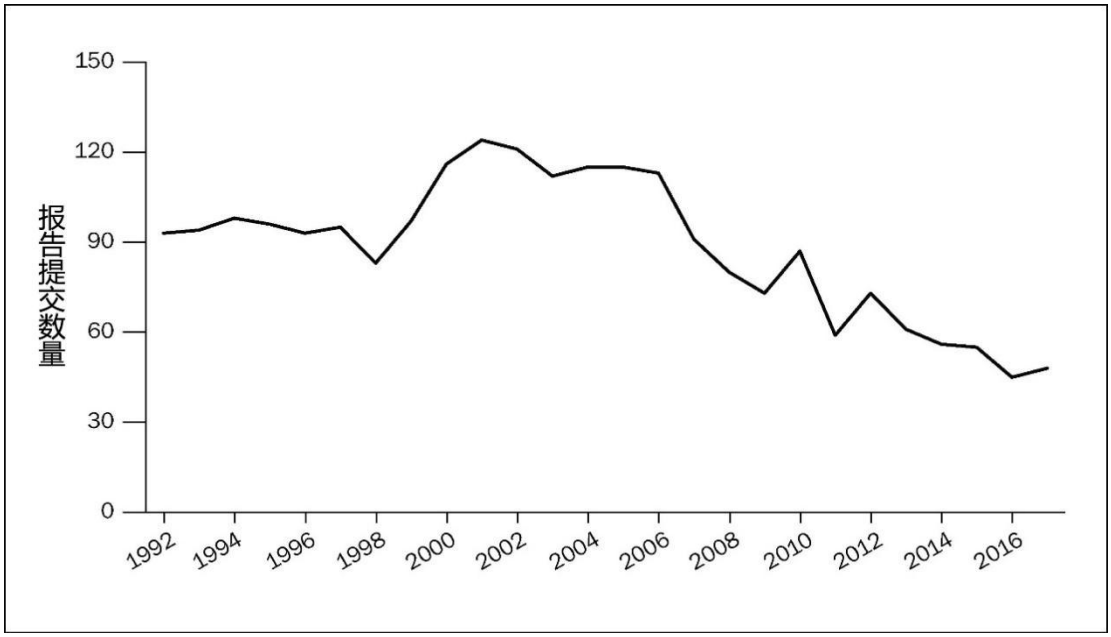


图 5.2.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UNROCA),报告提交数量, 1992 – 2017

注:年份为报告涵盖年份，而非报告提交年份

资料来源：UNROCA 在线数据库（新旧版本）；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 UNROCA 历年报告。

报告可在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UNODA)网站上公开查阅。近年来，要确定哪些国家向 UNROCA 提交报告已变得十分困难，原因就是 UNDOA 网站 3 个不同位置都可查询相关信息：旧网站在线数据库，2018 年年底还可访问；新的在线数据库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向 UNROCA 提交的年度报告。[7]

自本世纪初至中期以来，报告水平有所下滑，当时每年提交报告国家数量超过 100，而 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为 45 和 48(见图 5.2)。与自 1993 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一样，2017 年非洲和中东国家报告水平极低。非洲 54 个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提交 2017 年报告，中东 15 国只有一个国家提交 2017 年报告。2013-17 年 5 年期间，所有其他地区报告数量均呈下降趋势(见表 5.9)。[8]

表 5.9. 区域分列提交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数量，2013-17 年

各年栏为报告所涵盖年份，而非提交报告年份。最左一栏括号内数字为各地区联合国成员国数量。括号内其他数字为已提交报告的联合国成员国地区占比。高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最近的整数位；低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1 位。

地区 a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非洲 (54)	1 (1.9%)	0 (0.0%)	2 (3.7%)	1 (1.9%)	1 (1.9%)
美洲 (35)	9 (26%)	8 (23%)	8 (23%)	5 (14%)	4 (11%)
亚洲 (28)	7 (25%)	8 (29%)	7 (25%)	5 (18%)	5 (18%)
欧洲 (47)	41 (87%)	37 (79%)	32 (68%)	32 (68%)	36 (77%)
中东(15)	3 (20%)	2 (13%)	1 (6.7%)	2 (13%)	1 (6.7%)
大洋洲 (14)	1 (7.1%)	1 (7.1%)	5 (36%)	0 (0.0%)	1 (7.1%)
合计(193)	62 (32%)	56 (29%)	55 (28%)	45 (23%)	48 (25%)

a 更多 SIPRI 地区提交相关信息，见 SIPRI 网站武器转让数据库。

注：只有国家主体提交数量才被计入.

资料来源：UNROCA 在线数据库（新旧版本）；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 UNROCA 历年报告。

SIPRI(见第 1 节)指出，大多数主战武器大宗出口国提交了 2017 年报告——2017 年十大出口国中只有一个国家(以色列)未向 UNROCA 提交 2017 年报告。然而，2017 年十大进口国中只有三个国家提交报告: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9]

OSCE 国家和 UNROCA 报告机制

联合国大会决议决定构建 UNROCA 机制，呼吁各国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展开合作，旨在加强和协调国际社会在提升军备公开度和透明度的各项举措。[10]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OSCE)大力推进 UNROCA，并努力提升 OSCE 成员国参与度。例如，自 1997 年以来，OSCE 成员国已同意向彼此公告 UNROCA 提交情况，并定于每年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通气。[11]近年来，OSCE 成员国的 UNROCA 报告提交占比日益提升。OSCE 成员国报告提交数量从 2001 年的 52 份降至 2017 年的 40 份，但其在所有报告中的占比却从 42%升至 83%(见图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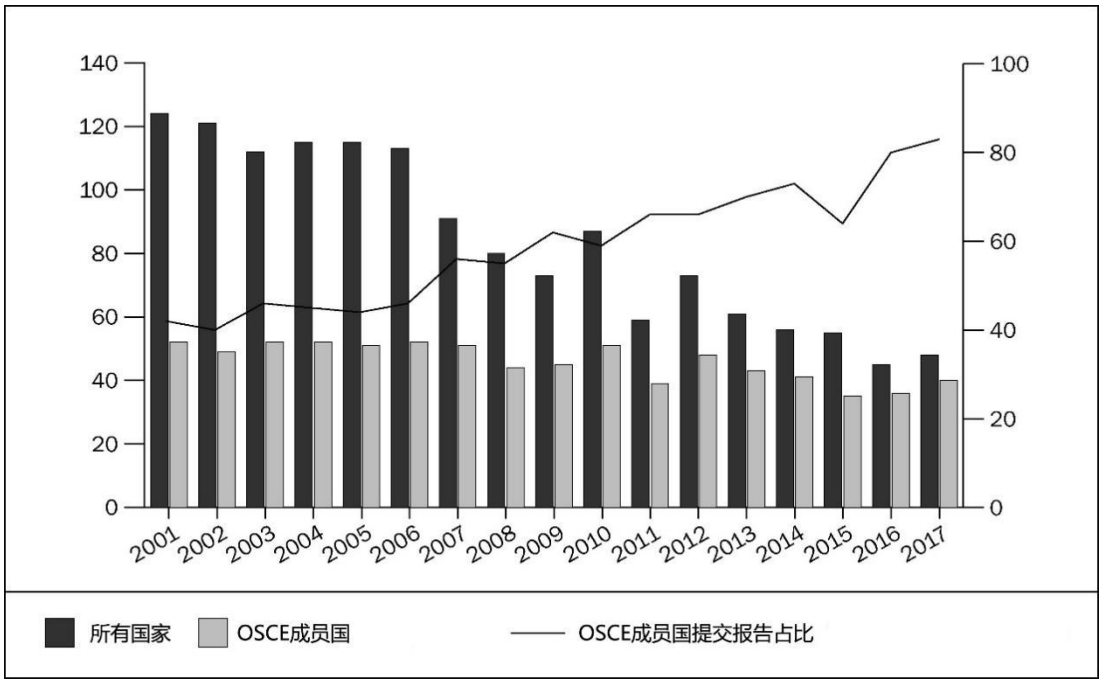


图 5.3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提交数量(UNROCA)，2001－17

OSCE =欧安组织

注：数据截至 2019 年 4 月 1 日。一些国家延期提交报告，随着 2017 年延后提交的国家陆续提交报告，最终数字可能会高于本图所述数据。由于 2001 年是 UNROCA 报告提交高峰期，数据涵盖 2001-17 年。图中所示年份为报告期年份，并非报告提交年份。本图只计入国家主体提交数量。

资料来源：UNROCA 在线数据库(新旧版本)；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历年 UNROCA 报告。

2016 年，OSCE 成员国同意就 UNROCA 进行公开交流。[12] OSCE 已在 OSEC 网站直接全文张贴

提交国名单。[13] 57 个成员国中有 36 个国家通过 OSCE 交流平台提交 2016 年 UNROCA 文件，2017 年又升至 38 个国家。但是，并非所有这些报告都能在 UNODA 网站找到。此外，OSCE 成员国在 UNODA 网站的报告，并非都能在 OSCE 网站检索到。截至 2019 年 1 月，OSCE 官网和 UNODA 网站合计可检索 OSCE 成员国共计 49 份 2017 年武器转让报告。其中 29 份为两个网站都能获取，9 份只能在 OSCE 网站检索，11 份只能在 UNDOA 检索获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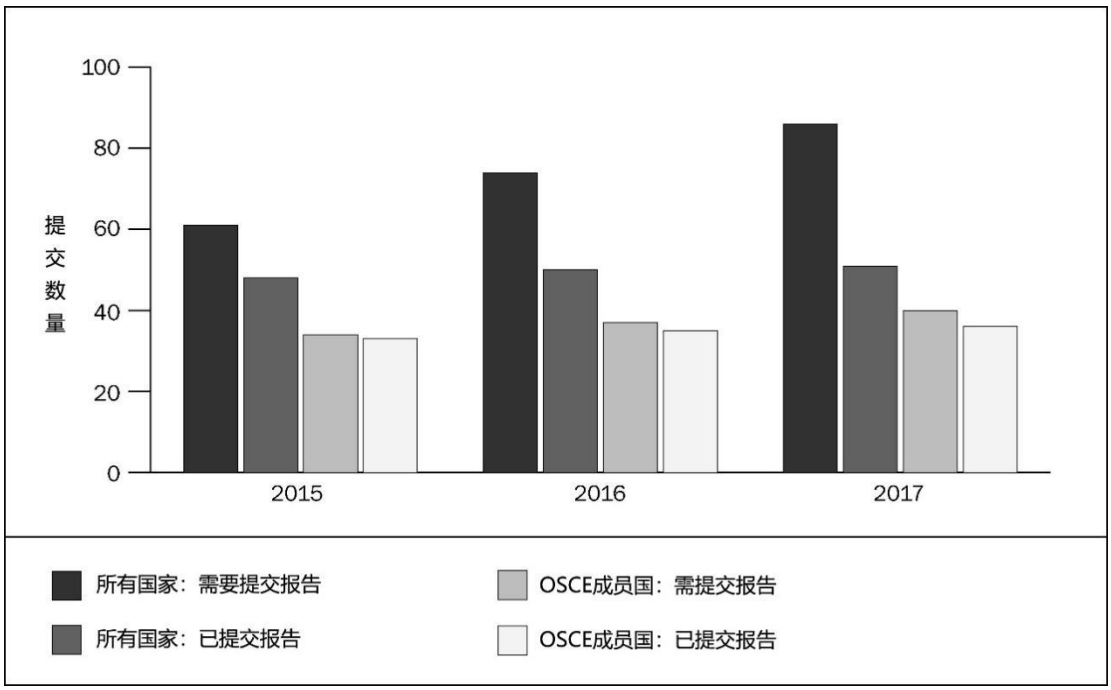


图 5.4 提交报告的武器贸易条约(ATT)缔约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成员国数量，2015-17 年

注：年份是指报告所涵盖的年份，而非报告提交年份。

资料来源：ATT 秘书处，ATT 年度报告数据库，数据截至 2019 年 1 月 9 日，2019 年 1 月 21 日查询。

武器贸易条约框架下武器转让报告

ATT 第 13 条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向 ATT 秘书处提交武器进出口年度报告。在应提交报告的三年期间(2015-17 年)，随着缔约国数量增加，有义务提交年度报告的国家数量也相应有所增加(见图 5.4)。但这三年中，每年提交的报告数目几乎保持不变。因此，实际提交武器转让报告国家占比从 2015 年 79%降至 2017 年的 59%。[14] 同 UNROCA 相比，OSCE 成员国中的 ATT 缔约国们，较其他国家更倾向于向 ATT 秘书处提交武器转让报告。2017 年，OSCE 成员国中有 89%的应向 ATT 提交报告的国家实际完成提交，而非 OSCE 成员国实际提交占比仅为 29%。

1 本节只讨论武器转让领域的公开报告文书。保密信息交换，如欧安组织和瓦森纳协定下的信息互换，并未收录在内。

2SIPRI 收集了所有已公开发表的武器转让国家报告，所有数据均可在国家报告数据库查询。

3 有些国家不发表其武器出口的国家报告，而是公布其武器出口总金融价值数据。此类国家包括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和俄罗斯。

4 主要的区域报告机制:(a)根据《2006 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和其他相关物资的公约》制订的文书;(b)美洲国家组织文书;(c)欧盟年度报告。相关区域报告文书的更多详细资料，见布罗姆利•M 和魏泽曼•S，“武器转让透明度”，SIPRI 年鉴 2016，第 595-603 页。

5 联合国大会，第 46/36L 号决议，1991 年 12 月 6 日。

6 此类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系统、战斗机、攻击直升机、军舰、导弹和导弹发射器。此类报告均在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UNODA)网站上公开发表。

7 新版本在线数据库可见 UNROCA 网站。见联合国，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秘书长报告”，A/73/185, 2018 年 7 月 18 日。

8 一些国家在以前几年就延迟提交报告，本节中所述 2017 年武器转移报告提交国延迟提交国家的数量很可能高于往年数据。

9 关于报告趋势的更多细节和报告内容定性分析见魏泽曼•S•T，“向联合国提交 2017 年常规武器登记报告”，SIPRI 背景文件，2019 年 6 月。

10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46/36L 号决议，1991 年 12 月 6 日。

11OSCE，“决议 No.13/97:进一步提高武器转让透明度，FSC.DEC/13/97，1997 年 7 月 16 日。12OSCE，决议 No.4/16:出版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常规武器转让和杀伤地雷领域的交流资料，FSC.DEC/4/16/Corr.1，2016 年 9 月 21 日。

13OSCE，常规武器转让资料互换。

14 ATT 秘书处，ATT 年度报告数据库，“截至 2019 年 1 月 9 日状况”，已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通过。有关各国根据 ATT 提交年度报告的相关问题更多详情，见本卷第 10 章第 1 节。

第 5 节.各国武器出口的金融价值

马克•布罗姆利、德拉比、彼得•魏泽曼

表 5.10 为 2008-17 年各国武器出口金融价值官方数据。这些国家包括提供有关武器出口、武器出口许可证或武器出口协议的金融价值数据，这些数据至少涵盖 5 年时间，且数据平均值超过 1000 万美元。这些数据来源于政府或官方行业机构的直接报价或与他们的直接沟通。所述数据覆盖范围折射出原始源语言特点。在这一领域，各国做法各不相同，但“武器出口”一词一般是指实际交付武器的财政价值;“武器出口许可证”一般指国家出口许可证当局颁发武器出口许可证的财务价值;“武器出口协议”是指合同或其他武器出口协议的财务价值。

表 5.10 中国家武器出口数据是基于国家定义和方法，因此不一定具有可比性。[1]数据转换为(2017)美元，基准为使用报告年度美元汇率和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根据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就武器出口金融价值，提供官方数据的这些国家之武器出口总和占到全球主战武器交付总量的 9 成以上。如将表 5.10 数据合计，则可粗略估算出全球军火贸易财务价值。然而，使用这种方式呈现的数据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如上所述，所使用的数据集基于不同的定义和方法，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其次，有几个国家(如英国)不公布武器出口数据，只有武器出口协议或许可证，而其他国家(如中国)没有公布武器出口、武器出口许可证或武器出口协议的任何数据。尽管如此,通过现有可用武器出口金融价值数据以及估计的协议或许可证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 2017 年全球武器贸易总额至少为 950 亿美元。当然，实际数字可能会更高。[2]

表 5.10.　2008-2017 年各国武器出口额（基于国家政府和工业部门统计数据）

表中数字系 2017 定值美元(百万)。如无特别说明，表中年份均系日历年。

国家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数据备注
奥地利	350	552	555	651	624	735	737	385	722	426武器出口
	1 578	3 571	2 632	2 472	2 132	3 317	1 240	1 243	4 496	2 251武器出口许可证
比利时	2 226	1 749	1 493	1 265	1 329	856	6 199	1 279	1 411	831武器出口许可证
波黑	47	37	15	62	56	54	92	120	117	. .武器出口
	97	73	42	86	63	156	177	264	344	. .武器出口许可证
保加利亚	250	230	384	350	300	328	554	1 608	1 146	1 368武器出口
	792	502	441	338	479	686	1 137	733	1 422	1 558武器出口许可证
加拿大[a]	595	542	445	698	1 113	696	746	547	553	793武器出口
克罗地亚	. .	. .	80	53	70	120	98	45	84	76武器出口
	. .	356	663	232	326	995	662	438	428	508武器出口许可证
捷克	317	278	323	277	376	402	587	646	778	643武器出口
	354	619	671	524	364	458	688	851	389	571武器出口许可证
丹麦	272	400	560	359	305	1 093	202	154	229	230武器出口许可证
爱沙尼亚	10	5	1	5	1	1	4	5	5	2武器出口
	10	13	3	530	4	4	5	16	10	72武器出口许可证
芬兰	155	138	88	147	80	312	306	112	149	118武器出口
	562	297	91	279	162	481	311	415	111	220武器出口许可证
法国	5 238	5 858	5 515	5 525	4 587	5 421	5 284	6 950	7 886	7 453武器出口
	10 980	12 958	7 620	9 872	6 608	9 603	11 289	19 408	15 748	7 788武器出口许可证
德国	2 380	2 125	3 155	1 947	1 298	1 303	2 504	1 783	2 826	2 976武器出口[b]
	13 899	11 172	8 175	16 353	12 176	11 651	8 955	14 702	7 801	7 368武器出口许可证[c]
匈牙利	25	27	28	27	37	45	46	53	21	49武器出口
	198	202	205	236	370	717	594	1 472	665	655武器出口许可证
印度d	225	78	. .	. .	92	123	169	332	227	. .武器出口
爱尔兰	52	71	36	41	64	87	118	49	71	28武器出口许可证

国家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数据备注
以色列	7 202	8 455	8 206	6 342	. .	6 881	5 860	5 895	6 638	9 200武器出口协议
意大利	2 963	3 500	917	1 550	4 129	3 873	4 574	3 686	3 225	3 231武器出口
	9 441	10 623	4 840	7 973	5 706	3 002	3 642	9 041	16 533	10 675武器出口许可证
韩国	1 177	1 332	1 335	2 596	2 512	3 594	3 740	3 662	2 612	3 120武器出口协议
立陶宛	52	70	22	73	26	22	26	31	46	80武器出口
	78	125	34	77	27	31	21	68	104	67武器出口许可证
黑山	28	13	9	. .	4	4	12	5	1	. .武器出口
	33	13	15	6	7	8	15	13	9	. .武器出口许可证
荷兰	834	900	1 006	1 169	1 128	353	344	679	639	746武器出口
	2 098	2 087	1 359	630	1 291	1 345	2 837	1 001	1 599	903武器出口许可证
挪威	786	818	682	695	712	591	484	419	436	648武器出口
巴基斯坦e	59	16	19	11	14	14	18	62	32	. .武器出口
	27	. .	38	26	30	23	58	97	69	. .武器出口协议
波兰	614	2 208	680	1 286	868	1 199	1 264	1 455	1 386	1 213武器出口许可证
葡萄牙	118	25	30	38	43	246	215	219	674	182武器出口
	127	44	31	47	71	204	350	78	276	66武器出口许可证
罗马尼亚	138	156	183	198	114	247	218	185	204	217武器出口
	198	262	226	279	246	414	342	252	272	296武器出口许可证
俄罗斯	9 506	9 712	11 241	14 929	16 228	16 520	16 152	14 996	15 320	15 000武器出口
塞尔维亚	265	160	216	189	200	183	324	400	460	. .武器出口
	687	516	849	432	479	855	830	838	944	. .武器出口许可证
斯洛伐克	63	70	22	15	34	43	50	65	68	77武器出口
	118	170	86	45	100	170	368	325	235	257武器出口许可证
斯洛文尼亚	10	8	9	14	5	4	12	13	18	26武器出口
	10	19	16	18	12	13	4	36	49	57武器出口许可证
南非	813	1 053	1 279	1 378	1 379	344	284	222	289	258武器出口许可证
西班牙	1 558	2 138	1 679	3 683	2 679	5 460	4 400	4 267	4 577	4 877武器出口
	4 213	5 068	3 332	4 349	10 556	6 037	5 036	12 246	6 268	23 657武器出口许可证

国家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数据备注
瑞典	2 193	2 024	2 144	2 335	1 538	1 929	1 201	915	1 310	1 314武器出口
	1 659	1 657	2 063	1 829	1 251	1 588	676	607	7 378	950武器出口许可证
瑞士	759	764	691	1 071	797	523	637	480	427	454武器出口
土耳其	656	766	713	890	1 281	1 463	1 708	1 717	1 714	1 739武器出口
英国	9 119	12 906	10 125	9 428	14 833	16 120	14 492	12 166	8 130	11 541武器出口订单f
	4 113	5 495	4 224	10 608	3 654	7 309	3 552	9 197	4 462	8 470武器出口许可证
乌克兰	911	914	1 076	1 094	1 093	1 052	. .	589	786	. .武器出口
美国g	51 492	24 504	20 453	21 294	18 735	21 389	20 112	21 903	21 561	30 563武器出口h
	31 081	33 102	23 835	28 157	66 956	24 708	32 491	46 415	28 102	49 371武器出口协议i
	38 926	41 101	38 315	47 810	35 841	21 883	65 266	76 478	50 902	51 578武器出口许可证j

. . = 无可用数据

注：本表所列国家是指在所涵盖 10 年区间内，至少有 6 年提交了相关官方数据的国家，即“武器出口”、“武器出口许可证”、“武器出口协定”或“武器出口订单”财务数据，其中至少一项数据集平均值为 1000 万美元以上。本表各国武器出口数据不一定具有横向可比性，其原因在于数据统计口径和定义存在巨大差异。

a 加拿大的数据不包括对美国的出口。.

b 数据只包括根据德国法律规定项下的“战争武器”出口。

c 数据包括国际合作项目武器出口许可证。

d 印度数据涵盖 4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期间（如 2016 年数据涵盖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期间）。 2009 年数据涵盖 2009 年 4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e 巴基斯坦数据涵盖了 4 月 1 日次年 3 月 31 日期间(如 2016 年数据为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f 数据包括国防设备和额外的航空航天设备及服务。

g 美国数据为 10 月 1 日至次年 9 月 30 日期间(如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h 数据包括政府间海外军售计划中出售品类，以及美国公司直接向外国政府军售。

i 数据只包括在政府间海外军售项下销售。

j 数据只包括美国公司直接向外国政府的军售。

资料来源:公开发布信息或与政府或官方行业机构直接沟通。来源完整列表和所有可用金融武器出口数据见 SIPRI 网站信息。

1 国际上对“武器”并没有统一定义，各国政府在收集和报告相关武器出口金融价值数据时采用不同的清单。此外，关于如何收集和报告此类数据没有统一方法。有些国家报告已签发或使用的出口许可证，另一些国家报告使用海关采集数据。

2 如武器出口数据可获得，就使用该数据。就加拿大而言，2017 年武器出口数字翻了一番，因加拿大武器出口数字并不包含对美国的出口。加拿大当局声称，美国占加拿大军事技术出口一半以上。如果 2017 年武器出口数据无法获取，但 2016 年数据可获取，则使用 2016 年数据。如遇 2017 年或 2016 年无武器出口数据，则使用 2016 年“武器出口协议”或“武器出口订单”数据(如有)。根据对过往各国公开的武器出口和武器出口协议或订单数据分析，使用武器出口协议或订单完整数字，但会有一年滞后期。如无武器出口协议或订单数据，则使用 2017 年“武器出口许可证”数据。根据对各国公布的武器出口和武器出口许可证数据报告的分析，近年武器出口许可证使用了一半。德国的武器出口数据，也采用了这种许可证估算方法，尽管德国已公开武器出口数据。德国的武器出口数据只包括“战争武器”出口，这是一种比出口许可证涵盖范围更有限的商品和服务类别。因此，该数据低估了德国武器出口总额。

第 6 节.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

奥德•弗莱兰特和南天

2017 年武器工业发展概况

SIPRI 武器销售百强——世界头部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公司(不含中国)排名---2017 年全球武器贸易总额 3980 亿美元。[1] 较 2016 年增长 2.5%，这也标志着世界武器百强销售总额连续三年保持增长(见表 5.11)。2017 年百强销售总额较 2002 年增长 44%，但较 2010 年峰值降低 9.9%。[2]2017 年百强销售额的增长是几个军购大国的采购大单推动，特别是美俄以及几个深陷冲突的中东国家。[3]

2002 年以来，美国每年都会对百强军售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2017 年百强企业中，接近一半(42 家)的总部在美国，其销售额占到百强销售总额 57%。此外，有 5 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进入十强，其销售额占到百强销售总额 35%(见表 5.12)。美国总部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突显出美国国防部巨大的武器需求，同时也凸显出美国总部企业对世界百强销售趋势的重大影响。

百强武器销售年度趋势也受到西欧公司的影响。2017 年，百强西欧武器制造商销售总额增长了 3.8%，达到 949 亿美元。增长主要来自法国和德国公司武器销售大幅增长。尽管如此，英国总部公司的武器销售依然为西欧之首，达到 357 亿美元，占 2017 年百强销售总额 9.0%。然而，2017 年是俄罗斯公司纳入百强排名的第一年(377 亿美元)，俄罗斯公司销售总额超越英国，进入百强。俄罗斯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武器生产国。

表 5.11 2008-17 年 SIPRI 百强武器销售趋势

高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最近整数位；低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1 位。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武器销售，当前美元价格和汇率										
合计($b.)	392	405	420	419	404	406	396	372	376	398
变化(%)	12	3.1	3.9	-0.2	-3.8	0.6	-2.4	-5.9	1	5.9
武器销售，连续美元价格(2017)和汇率										
合计($b.)	407	434	442	418	399	392	380	383	389	398
变化(%)	7.2	6.8	1.7	-5.4	-4.5	-1.7	-3.1	0.8	1.5	2.5
累积变化自 2008 (%)	0	6.8	8.5	3.1	-1.4	- 3.2	-6.3	-5.5	-4.0	-1.5

注:本表中的数字指的是 SIPRI 年度百强公司,意味每年引用的数据中公司为动态变化,排名也在相应变化。

除开 2016 年和 2017 年，因这两年排名为 2017 年列表排名。
资料来源：SIPRI 军事工业数据库，2018 年 12 月。

2017 年，全球十强军售总额为 1980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1.0%(21 亿美元)。2017 年全球百强销售总额，十强占到半壁江山。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是俄罗斯公司首次跻身十强：排名第 10 位的阿尔马斯-安泰也是第一家进入十强的非美国或西欧公司。十强构成极为稳定：自 2002 年以来，直至 2017 年，十强排名几无变化。2017 年 SIPRI 一致数据采集达标，首次将俄罗斯公司计入百强排名。

头部武器制造国

美国

美国被 SIPRI 列为头部武器生产国(见表 5.2)。2017 年，位列百强的 42 家美国公司的武器销售总额增长了 2.0%，达到 2270 亿美元，占销售总额的 57%(见表 5.12)。考虑到美国采购预算规模，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可能仍将是全球最大武器生产国(以武器销售衡量)。除了正在执行的耗资巨大、品类繁多的武器计划外，美国还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宣布新计划，尤其是核武库全面现代化，其中包括投送系统(轰炸机、潜艇和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 2017 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此项横亘 30 年的计划预计将耗资 1.2 万亿美元。[4]

表 5.8.SIPRI 百强军火商占地区和国家军火销售份额（2016 年至 2017 年）a

军售数据为定值美元(2017)。高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最近整数位；低于 10%的百分比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1 位。由于四舍五入，数字总计并不一定完全契合。

公司数量	地区/国家 b	武器销售($10 亿.)		武器销售变化 2016-2015(%)c	武器销售百强占比 2017(%)
		2017	2016		
42	美国	227	222	2.0	57
24	西欧	94.9	91.4	3.8	24
7	英国	35.7	34.9	2.3	9.0
6	法国	21.3	19.1	11	5.4
2	跨欧洲 d	14.7	15.1	-2.7	3.7
2	意大利	10.5	10.4	0.8	2.6
4	德国	8.3	7.5	10	2.1
1	瑞典	2.7	2.8	-5.3	0.7
1	西班牙	0.9	0.7	23	0.2
1	瑞士	0.9	0.8	5.6	0.2
10	俄罗斯	37.7	34.7	8.5	9.5
17	其他老牌供应商	27.9	30.0	-6.9	7.0
5	日本	8.7	8.8	-0.1	2.2

3	以色列	7.9	8.2	-3.9	2.0
4	韩国	5.5	7.1	-23	1.4
1	新加坡	1.7	1.7	-1.5	0.4
1	波兰	1.2	1.2	-1.8	0.3
1	澳大利亚	1.0	1.0	2.1	0.3
1	乌克兰	1.0	1.1	-11	0.3
1	加拿大	0.8	0.8	3.8	0.2
7	新兴供应商	11.1	10.3	8.1	2.8
4	印度	7.5	7.1	6.1	1.9
2	土耳其	2.6	2.1	24	0.7
1	巴西	1.0	1.1	-10	0.2
100	总计	398	389	2.5	100

注：军火销售计价单位美元 b，按当前价格和汇率计算。由于四舍五入，分项数据并不一定总是与表尾合计数一致。

a 尽管众所周知，几家中国军火制造企业规模之大，足以跻身 SIPRI 百强，但缺乏可比较的、足够精确的数据，使得我们无法将其列入其中。

b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销售数字指总部设在该国家或该地区的百强军售情况，包括在其境外子公司的军售情况，并不反映在该国或地区实际生产的武器销售量。

c 本栏给出了 2016 年至 2017 年军售变化值，以 2017 年定值美元计。

d 被归类为“跨欧洲”的两家公司是空客集团和 MBDA。

资料来源：SIPRI 武器工业数据库，2018 年 12 月。

方框图 5.2 SIPRI 武器生产商分类

为评估武器生产能力趋势及发展，SIPRI 对武器百强生产商进行了分类。分类基于公司总部所在国。“头部”、“老牌”和“新兴”等术语均用来概括该国武器生产活动的广度，旨在反映一国武器生产能力等级。

头部武器生产商

“头部武器生产商”是指总部设在该国的公司。头部武器生产商的特征为在飞机/航空航天、地面系统、水面平台及系统、导弹和弹药、核心电子系统和军事服务等所有重点武器生产领域拥有全面的国家武器生产能力。

其他老牌武器生产商

“其他老牌武器生产商”包含跻身世界武器生产及军事服务百强公司的所在国。此类国家拥有成熟的武器生产能力，多数情况下拥有主战武器生产能力，但并未计划进一步拓展其能力。

新兴武器生产商

“新兴武器生产商”包含位列世界武器生产及军事服务百强公司所在国。此类国家已计划构建一定是你的武器生产能力并在武器采购上实现更大程度

的自给自足。发展跨部门的国际武器生产能力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一国在经历 50 年内军事工业化后，从新兴武器生产商一跃化身为老牌武器生产商的最新例证就来自韩国。

正在实施的常规武器计划包括新一代航空母舰，艘舰于 2017 年 5 月交付海军，耗资 130 亿美元，以及一型新式加油机(KC-46)，预计耗资 444 亿美元。[5]

截止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仍是全球最大的武器生产商，2017 年洛马武器销售额为 449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了 8.3%。业绩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F-35 战机、导弹和反导弹系统以及宙斯盾海战系统的持续交付。一面是洛马武器销售额的增长，一面是波音销售额下滑 11%，2017 年世界武器两强的差距扩大至 180 亿美元，而 2016 年仅为 114 亿美元。波音公司 2017 年武器销售下降部分原因是前文所述 KC-46 加油机交付延迟和 C-17 运输机交付完毕。[6]

2017 年，美国企业宣布了几宗大型并购。联合技术公司收购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收购轨道公司 ATK 公司特别吸引眼球。[7]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并购轨道 ATK 公司是为了获得其导弹和电子能力，而联合技术公司收购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则是为了加强自身航空航天业务。[8]公司进行合并和收购往往有其特定诉求。2017 年，美国公司大肆收购，其目的很可能是为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军购大年中，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

尽管 2017 年大型并购依旧活跃，但最近美国军事服务公司整合趋势有所放缓。过去几年中，一些大型武器生产公司已将其军事信息技术和服务活动剥离，以便聚焦核心业务，即武器生产与系统集成。收缩战线的主要动机似乎是此类业务收入远不及预期。[9]许多情况下，被剥离出来的小公司随后合并成更大的军事服务公司。然而，2017 年唯一一例是 DXC 的成立(百强排名第 82 位)，它便是计算机科学公司和惠普企业服务的相关部门合并之后成立。[10]

西欧

2017 年，百强的 7 家英国公司武器销售总额合计 357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2.3%，其主要原因是 BAE 系统公司、劳斯莱斯和 GKN 的武器销售出现增长。英国宇航系统公司(BAE)百强排名第 4，牢牢占据英国武器生产商第一的位置。2017 年，BAE 武器销售额增长 3.3%，达到 225 亿美元。GKN 武器销售在 2017 年

实现 20%的增长—这也创下英军企年度最高涨幅。2017 年是 GKN 武器销售连续第二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全球飞机部件需求旺盛，其中包括军机复合结构件、F-35 发动机部件。[11]相比之下，巴布科克国际公司连续两年大幅增长后，在 2017 年回落 1.9%，主要是由于英国国防部军购合同延迟，以及英国国防部贸易实体(英国国防装备与保障部)重组，导致对英海军武器销售被推迟。2017 年，百强中的 6 家法国公司武器销售总额增长 11%，达到 213 亿美元。[12]尽管六家公司在 2017 年都实现正增长，但战斗机制造商达索和造船商海军集团武器销售飙升最为引人注目。2017 年，达索武器销售额增长了 48%，达到 21 亿美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度和卡塔尔的战斗机订单。[13]海军集团增长 15%，达到 41 亿美元，可归因于法国、巴西和印度的潜艇和护卫舰排产，以及埃及护卫舰订单。

两家意大利百强武器公司莱昂纳多集团和芬坎蒂尼造船厂，2017 年武器销售较 2016 年大致持平。列奥纳多是世界头部武器生产商之一，2017 年武器销售额为 89 亿美元。虽然其国防电子和航空业务部门略有增长，但直升机业务销售额在 2017 年有所下降，拖累了整体业绩。

2017 年，四家百强德国公司武器销售额增长 10%，达到 83 亿美元。增长主要来自于克劳斯-马菲-威格曼(KMW)武器销售增长 61%——这也创下 2017 年百强最大增幅。KMW 武器销售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德国国内对装甲车辆的需求不断增长，以及向卡塔尔交付坦克。四家德国公司中有一家百强新晋企业:排名第 74 位的亨索尔特一家投资基金(KKR)收购从事军用电子产品生产的空客集团德国分公司后成立。[14]

空客集团武器销售额在 2017 年下降 13%，降至 113 亿美元。空客集团在法国和德国拥有武器生产设施，因此被归类为“跨欧洲”公司。业绩下降可归因于上文提到的出售其德国军事电子部门，以及 A400M 军用运输机延期交付。

俄罗斯

2017 年，十家百强俄罗斯公司武器销售额合计 377 亿美元，占百强武器销售总额的 9.5%。2017 年俄罗斯武器主要进口国为印度、中国和越南。[15]2017 年，俄罗斯军售总额较 2016 年增长 8.5%。[16]总体而言，自 2011 年俄军方加大武器采购力度以来，俄军企武器销量就开始相应出现增长。

如前所述，生产防空系统(S-400 地空导弹系统)的俄罗斯阿尔马兹-安泰为 SIPRI 开始在百强中收录俄罗斯企业以来，第一次有俄罗斯军企跻身十强。得益于俄罗斯旺盛的国内需求，2017 年俄罗斯武器销售总额增长了 17%，达到 86 亿美元。

跻身百强的其他 9 家俄罗斯公司中，共有 8 家实现了武器销售正增长，其中 3 家增幅超过 15%：联合引擎公司(25%)、高精度系统公司(22%)和战术导弹公司(19%)。2017 年，唯一一家武器销售下降的俄罗斯公司为乌拉尔车辆制造厂，销售额下降 33%，从 2016 年的第 53 位跌至 2017 年的第 66 位。业绩下滑可能是由于俄罗斯新型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延期交付。

俄罗斯在 2007 年启动了一项军企整合举措。[17]旨在在特定武器领域组建超级企业(如联合飞机公司和联合造船公司，两家企业分别为 2017 年俄罗斯第二和第三大军火生产商。2017 年，兼并重组继续推进，目前已接近完成：联合仪器制造公司(UIMC)与俄罗斯电子公司合并，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将继续以俄罗斯电子公司的名义进行运营。2017 年，新公司跻身百强，排名第 47 位。新公司承接了 UIMC 大部分武器生产业务及部分俄罗斯电子公司相关业务。未来几年，俄军工企业还将进行进一步整合。

其他老牌武器生产商

2017 年百强公司中，有 17 家公司被 SIPRI 划为其他老牌武器生产商国家(见表 5.2)。2017 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以色列、波兰、新加坡、韩国和乌克兰均被划为这一类别。2017 年，此类公司所在国家武器销售合计总额为 279 亿美元，较 2016 年减少 6.9%。SIPRI 武器行业数据库覆盖的这段时间里，此类公司在百强销售的占比逐年增加，从 2002 年的百强销售总额的 5.8%增至 2017 年的 7.0%。占比提升的原因在于过去 16 年间，此类武器生产商的销量提升(81%)较百强中的其他公司(44%)要快。与前几年一样，日本在 2017 年依旧是其他老牌武器生产商类别中的第一大国。2017 年，5 家日本公司进入百强，武器销售总额达到 87 亿美元，占百强总量的 2.2%。日本最大的三家武器生产公司——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和富士通——武器销售保持平稳。另外两家公司的趋势正好一升一降:NEC 上升 7.8%,而 IHI 公司下降 7.6%。尽管 2014 年日本取消了历史悠久的武

器出口禁令,但这并未能在很大程度上刺激日本的海外军售市场，日本企业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以来本国的自身消化。富士通是一个例外，通过向海外国家军队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而获得巨额海外收入。[18]

2017 年,色列的 3 家上榜公司武器销售合计 79 亿美元,百强总销量占比 2.0%。考虑到以色列国土面积较小,其武器销售成绩仍相对亮眼:尽管 2017 年总体下滑 3.9%，但以色列军企武器销售总额仍与百强中的德国或日本大致相当。这也是以色列国内需求高、海外客户群体大、军品品种繁多的共同作用。

过去几年，韩国武器工业逐步走向成熟，现已覆盖所有主要武器生产领域，包括船舶、飞机、地面系统、电子和弹药。2017 年，4 家韩国公司入围百强，合计武器销售总额为 55 亿美元，百强武器销售总额占比 1.4%。然而，2017 年 4 家公司业绩都出现了下滑，较 2016 年整体下降了 23%，为 2017 年百强公司中降幅最大的国家。韩国航空工业公司(KAI)和 DSME 的武器销售降幅最大。KAI 武器销售猛烈下挫 53%(约 10 亿美元)，占韩国武器销售总体下降的 60%。KAI 从 2016 年的百强第 50 名跌至 2017 年的第 98 名。KAI 的几个韩国军队大单执行完毕，而新型直升机延期交付。

同 2016 年一样，澳大利亚、加拿大、波兰、新加坡和乌克兰各有一家公司入选 2017 年百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公司武器销售略有增加，新加坡和波兰公司则略有减少。乌克兰大部分武器都来自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该集团 2017 年武器销售下降 11%，其主要原因是乌克兰不断高企的通胀。

新兴武器生产商

2017 年，共有三个国家有公司跻身军火百强，被 SIPRI 列为新兴武器生产国：巴西、印度和土耳其（见方框 5.2）。2017 年与 2016 年相比，此类国家 7 家公司军售总额增长了 8.1%，达到 111 亿美元。2002 年至 2017 年期间，新兴武器生产国武器销售增长强劲：同期武器销售增长 161%，百强销售占比从 1.0%上升到 2.8%。

巴西和印度等新兴武器生产国已明确表达发展本土武器生产能力雄心壮志。印度目标是建设全品类武器生产强国（即海军、空军、陆军、电子和弹药）的“国防”工业中心。[19]然而，印度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末就提出建设成为世界重要武

器生产国之计划，然而凌云壮志却步履蹒跚，国家武器生产能力建设方面进展迟缓，印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外国武器供应。[20]

作为新兴武器生产国的翘楚，共有 4 家公司跻身百强。2017 年，4 家合计军售总额达 75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6.1%。印度最大的两家武器生产商印度军械工厂和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为 2017 年新兴武器生产国的冠亚军（分别位列第 37 和 38 位）。自 2002 年以来，两家公司和巴拉特电子携手晋级百强。印度第 4 的巴拉特电子以 8.8 亿美元的军售成绩进入 2017 年百强（排名第 94 位）。4 家企业均为国有企业，几乎完全依赖印度国内武器需求。2017 年，印度武器销售总体增长是由于印度武装部队现代化，并尽可能采购本土武器装备。[21] 土耳其国内武器需求旺盛，也大力发展本土军事工业，并努力降低外部依赖。[22]这也在 2017 年得到体现，位列百强的两家土耳其公司军售总额增加 24%，这两家公司分别为生产电子产品的阿塞尔桑公司和生产飞机的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百强中唯一一家南美军火公司是排名第 84 位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2017 年军售下降 10%，降至 9.5 亿美元，主要原因是雷亚尔和美元的汇率波动带来更的汇兑损失。

追踪跨国公司军售

许多大型武器生产公司都在外国开设子公司，目的是向外驻特定国家或公司客户提供武器，或更为便利的深耕国外市场。然而，国际子公司数量、地点、活动和收入往往缺乏透明度。这也使得以下环节很难确定（a）武器生产确切地理位置；（b）一国实际武器生产量；以及（c）特定国家武器销售数字。某些情况下，武器公司会在年报中列出国内国外生产分公司列表，但此类公司是负责生产、维护、管理或是宣传游说，并未进行明确说明。例如，全球最大武器生产企业洛马公司便是如此。此外，洛马以及众多的头部企业，并未具体说明其国内或国外子公司是否参与武器生产相关活动或参与民品生产。此外，入选百强的国家，此类子公司的具体销售数据均未被披露。在子公司信息缺失的情况下，SIPRI 将包括子公司军售在内的所有军售总额，均计入公司总部所在国。这就会给人一种印象，该公司的所有销售业绩均在自总部所在国，但事实上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总部位于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就是典型例子。BAE 系统公司在国外有着多家

子公司，其中最大的一家子公司设立在美国。美国 BAE 系统销售数据每年都未进行披露，2017 年也是如此。但是 2016 年，美国 BAE 军售占到 BAE 集团（母公司）总业绩 45%。[23]

头部武器生产商的高度化，BAE 系统集团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2016 年，BAE 美国子公司共有 32000 员工。[24]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澳大利亚造船企业奥斯塔尔，其主要收入来源源自在美国造船厂为美国海军生产军船。根据奥斯塔尔 2017 年年报，美国业务占到其总营业额的 90%。[25]

子公司缺乏透明度的例子比比皆是。许多大型武器生产国，特别是军工企业总部设在美国、西欧或其他老牌武器生产商所在国（如澳大利亚和以色列），都在其年报或网站中标明其在不同国家有一个或若干分公司；然而，极少提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此类子公司可为公司代表处或维修点或武器生产机构，可以是公司的一切外驻形式。

世界百强同财富 500 强比较

各国政策决策者眼中，武器工业向来是“大企业”，是吸纳就业、促进研发和出口创汇的大户。[26]澳大利亚和法国等一些国家国防部一直在据此不断要求国家增加军费预算。[27]有一种方法可以说明武器生产堆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即将生产武器的军工企业同那些不生产武器的头部企业进行比较。SIPRI 将百强武器生产商同 2017 年《财富》全球 500 强（见表 5.13）中所列全球制造业最大头部公司进行了比较。[28]我们能进行这样的比较，其核心在于对于多数制造型企业而言，其研发生产过程非常相似。但是，我们也应指出，武器工业同民用工业之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其中包括：（a）军工业客户群主要针对各国国防部，因此销售规模也往往有限；（b）军工业生产时限与民用工业相比往往跨度较长；（c）向其他国家转让武器往往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

2017 年《财富》全球 500 强排行榜上，全球头部制造业 15 强公司年度销售总额为 23110 亿美元。这几乎是 2017 年 15 强武器生产国（2320 亿美元）军售总额的 10 倍。另一数据对比更能说明问题，全球头部制造业 15 强公司销售额几乎是百强武器制造企业军售总额（3980 亿美元）的 6 倍。入选世界《财富》500 强的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公司丰田，2017 年销售额达到 2550 亿美元，仅仅丰田一

家就比 2017 年世界 15 强军工企业军售总额高出 10%。

全球最大的武器生产公司洛马公司，2017 年《财富》全球 500 强排名第 178 位。洛马军售仅占丰田汽车总销量的 18%，占苹果 21%--苹果是 2017 年《财富》全球 500 强中排名最高的美国制造企业。我们将世界第一武器生产商与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巨头比较，也突显出军火工业在就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其实并不大：洛马全球雇员总数约为 10 万人，而丰田公司约为 36.4 万人。[29]

表 5.13 《财富》500 强中的 15 强制造企业与 SIPRI2017 年百强中的 15 强武器生产商对比

武器销售和总销售数字保持不变（2017 年）美元。由于四舍五入的惯例，数字加起来可能不等于规定的总数。

排名 a	制造业 15 强	总销售额 (b 美元)	排名 b	军工 15 强	军售额 (b 美元)	总销售额中军售占比(%)
1	丰田	255	1	洛马	44.9	88
2	大众	240	2	波音	26.9	29
3	苹果	216	3	雷神	23.9	94
4	三星电子	174	4	BAE 系统	22.9	98
5	戴姆勒	169	5	诺斯罗普·格鲁曼	22.4	87
6	通用汽车	166	6	通用动力	19.5	63
7	福特	152	7	空客集团	11.3	15
8	鸿海精密	135	8	泰雷兹	9.0	51
9	本田	129	9	莱奥纳多集团	8.9	68
10	通用电气	127	10	金刚石-安泰	8.6	94
11	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	125	11	联合技术	7.8	13
12	上汽集团	114	12	L-3 通信公司	7.8	79
13	尼桑	108	13	亨廷顿英戈尔斯工业	6.5	87
14	BMW	104	14	联合航空	6.4	83
15	中国中铁	97	15	联合造船厂	5.0	89
15 强销售总计		2311			232	

a 根据 2017 年《财富》全球 500 强企业总销售额排名。

b 公司根据 2017 年 SIPRI 百强总销售额进行排名。

c 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并未在《财富》500 强中单独上市，而是作为控股公司 Exor 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财富》，财富全球 500 强，2017 年；SIPRI 军事工业数据库，2018 年 12 月。

可作为劳动强度指标的单雇员营收，丰田为 70 万美元，而洛马只有 45 万美元。[30]2017 年，通用电气在武器百强(第 22 位)和《财富》500 强(按总销售额计，位列全球第 10 大制造业公司)都名列前茅。不过，通用电气 2017 年军售仅占其总销售额的 3.0%。这也表明，仅凭军工板块，通用不会跻身《财富》全球 500 强。

西欧头部武器生产公司，喜忧参半。以英国为例，2017 年英国最大的两家制造业公司 BAE 系统和劳斯莱斯，同时也是全球最大武器生产商之一。BAE 系统是 2017 年军工百强第四大武器生产商，也是 2017 年《财富》全球 500 强第 452 位，劳斯莱斯武器百强第 17 位，并未入选 2017 年《财富》500 强。BAE 武器销售总额为 229 亿美元，占其销售总额 98%，而劳斯莱斯武器销售额仅占其总销售额 23%。

以法国为例，按总销售额及其最大制造业企业是汽车制造商标致。按 2017 年《财富》全球 500 强数据，标致总销售额为 597 亿美元。相比之下，法国最大武器生产商泰利斯，2017 年公布的销售总额为 178 亿美元，其中 90 亿美元为武器销售。因此，最大军企泰勒斯 2017 年军售仅占最大制造业企业标致总销量的 15%。

德国最大的武器生产公司莱茵金属公司，2017 年武器销售额为 34 亿美元。相比之下，同年《财富》500 强中最大的德国制造业企业是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大众 2400 亿美元总销售额雄踞亚军。

毫无疑问，我们进行这样的比较略显粗糙，只能作为武器工业和民品制造业销售规模比较的一般性指标。然而，民品公司销售规模和覆盖面之广、对民生影响之大，各国指望军企拉动经济的决策者们，需要对军企对国民经济重要性究竟几何仔细掂量。[31]

1 本节重点介绍 2017 年(而非 2018 年)的情况，因为这是 SIPRI 全球 100 强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公司武器销售数据统计的最新年份。SIPRI 估计，几家中国武器生产企业的规模足以跻身 100 强。然而，由于缺乏可比较和足够准确的数据，无法将它们计入排名。“武器销售”的定义是向国内外军事客户销售军事产品及服务;销售数据只计入有排名靠前的公司。除另有说明，本节所有财务数据(包括武器销售数据)均以 2017 年名义(当期)美元计，而变动百分比和份额占比均以 2017 年不变美元(即实际价值)表示。有关 SIPRI100 强更多细节，见 SIPRI 军火工业数据库，2018 年 12 月。见弗拉伦特•A，“SIPRI 全球 100 强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公司，2017 年”，SIPRI 简报，2018 年 12 月。

2 尽管 2016 年和 2017 年排名变化是基于 2017 年百强入围公司名单(即年度比较是同批公司),长期比较(如 2002 年和 2017 年或 2010 年和 2017 年)，是基于各年度入围公司名单(即非同批公司之间的比较)。SIPRI 军火工业数据库中的数据采集始于 2002 年，因为 2002 是 SIPRI 获取俄罗斯军工企业数据相对完备的第一年。

3 关于中东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美国核力量成本管理方法，2017 - 2046 (CBO:华盛顿，2017 年 10 月)。美

国核现代化计划更多详情，见本卷第 6 章第 1 节。

5 奥鲁克•R，海军福特(CVN-78)级航空母舰计划:背景信息和国会议题，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国会提交报告 RS20643(美国国会，CRS:华盛顿，2019 年 2 月 6 日);美国政府问责局(GAO)， KC-46 加油机现代化:项目成本稳定，但进度可能会进一步推迟，GAO-18-353 (GAO:华盛顿特区，2018 年 4 月)。

6 卡帕西奥•A，克勒夫•R 和卡维尔•O，“美国空军参谋长称波音加油机将不能按时交付”，彭博社，2017 年 10 月 17 日。2017 年波音改变报告以来，武器销售估算方法与 2016 年相比发生变化，这也可能部分解释了这两年之间的差异。

7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以 92 亿美元收购轨道公司 ATK，新闻发布，2017 年 9 月 18 日;联合技术公司，“联合技术公司将以 300 亿美元收购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2017 年 9 月 4 日。

8 贝拉米•W，“联合技术公司完成对罗克韦尔柯林斯公司的收购”，航空电子国际，2018 年 11 月 27 日;德拉默塞德•M•J，“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将以 78 亿美元收购轨道公司 ATK”，《纽约时报》，2017 年 9 月 18 日。

9 韦克曼•N，“莱多斯完成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IT 业务 46 亿美元的交易”，华盛顿科技公司，
2016 年 8 月 16 日。

10 DXC 技术，“CSC 与 HPE 企业服务部完成合并，组建 DXC 技术”，新闻发布，2017 年 4 月 3 日。

11GKN 于 2018 年 3 月被出售给梅尔罗斯投资公司，BBC 新闻，“工程巨头 GKN 以 80 亿英镑的价格卖给了梅尔罗斯”，2018 年 3 月 29 日。

12 卡拉塔尤德•A，“Babcock 股价因营收预警下跌”，市场瞭望，2018 年 7 月 19 日。

13 伯杰•F，“阵风:改变游戏规则的三大出口成功”，BFM 商业，2017 年 12 月 7 日。

14 空客集团，“空客完成对 KKR 国防电子业务剥离”，新闻发布，2017 年 3 月 1 日。

15 魏泽曼•P•W，“2017 年国际武器转让趋势”，SIPRI 简报，2018 年 3 月。

16 这包括 2017 年成立的新公司俄罗斯电子公司在 2016 年“形式上”的武器销售。

17 见佩罗•弗里曼•S 和思肯斯•E，“武器生产”，SIPRI 年鉴 2008，第 275-77 页。

18 富士通，“富士通在国防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2013 年。

19 巴德瓦杰•D，“印度国防工业:一个遥远的梦想”，观察家研究基金会，2018 年 5 月 7 日。

20 莫汉蒂•D•R，改变时间吗?21 世纪印度国防工业，波恩国际军工转产中心(BICC)，论文 No.36 (BICC:波恩，2004)。

21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政府采取措施实现国防部门自给自足”，《经济时报》，2018 年 7 月 12 日。

22 贝克迪尔•B•E，“单干:土耳其坚定致力于国防自给自足”，国防新闻，2017 年 4 月 23 日。

23BAE 系统公司，“关于我们”，已于 2018 年 11 月通过。

24BAE 系统公司(注 23)。

25 奥斯特尔有限公司，2018 年年报，2018 年，第 20 页。

26 洛克伦•J，“国防部门评估显示，国防工业对英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工程与技术》，2018 年 7 月 9 日。

27 澳大利亚国防部(DOD)，国防出口战略(DOD:堪培拉，2018 年 1 月);拉米容•V，“法国:军火销售冠军”，《挑战》，2017 年 5 月 16 日;邓恩•P，“加大国防对英国繁荣的贡献:国防大臣报告”，(英国国防部:伦敦，2018 年 7 月)。

28《财富》杂志，2017 年“财富全球 500 强”。制造业包括将货物、材料或物质转化为新的产品，如消费品(即电子产品)或机械产品的公司。然而，专门从事食品、化工和生物产品的公司不包括在内。

29 丰田，2017 年年报，2017，第 18 页;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17 年年报，2018 年，第 8 页。

30 雇员营收比值越低，一个行业或公司的劳动密集型程度就越高。

31 沃尔夫•H，“SIPRI 武器生产数据分析:若干扩张建议”，《和平与安全经济学杂志》，第 13 卷第 2 期(2018 年 10 月)。

第六章 世界核力量

概述

2019 年初，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 或朝鲜）九个国家拥有大约 13865 枚核武器，其中 4120 枚已部署作战部队(见表 6.1)。约 2000 枚武器处于高度战备状态。

总体而言，核弹头库存继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美俄根据 2010 年《关于进一步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新 STARTA）的规定裁减了战略核武器，并各自进行了单方面裁减。与此同时，美俄都在推进耗资巨大的全面核武现代化计划，对核弹头、导弹和空基投送系统以及核武器生产设施的升级换代（见第 1 节和第 2 节）。2018 年，美国国防部制定了新型核武器研发方案，并对现有核武库进行调整，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执行更为宽泛的军事任务。

其他拥核国家核武库规模则要小得多（见第 3 至第 9 节），但大都正在发展或部署新型核武系统，或已宣布此类计划。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被外界认为正在扩大其核武库规模。朝鲜继续将其军事核计划列为国家安全战略核心，不过在 2018 年，朝鲜宣布暂停试验核武器以及中远程弹道导弹运载系统。

在各国核武库及国家核能力状况的可靠信息上，存在天壤之别。美国已披露其核武库存及核武装力量大量信息，英法国也公布了一些相关信息。尽管俄罗斯与美国互换了相关信息，但俄罗斯并未按照新 START 要求披露其核武装力量的详细品类分类情况。中国现在的信息公开较以往频度更高，但很少涉及其核武数量及未来核武工业体系发展计划信息。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就其导弹测试稍有提及，但其各自核武库状态及规模仍是语焉不详。朝鲜承认进行了核武和导弹试射，但未公开其核武能力信息。以色列长期以来对其核武库的政策就是避而不谈。

表 6.1 世界核力量，2019 年 1 月世界核力量

所有数据均为近似值。如表 6.1-6.10 说明所示，本报告所列估数据均来自公开信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国家	第一次核试验年份	部署弹头 a	储存核弹头 b	其他核弹头	总核武库
美国	1945	1750c	2050d	2650e	6450
俄罗斯	1949	1600f	2730g	2170e	6500
英国	1952	120	80	---	200
法国	1960	280	10	10	300
中国	1964	---	290	---	290
印度	1974	---	130-140	…	130-140
巴基斯坦	1998	---	150-160	…	150-160
以色列	…	---	80-90	…	80-90
朝鲜	2006	---	…	（20-30）	（20-30）h
总计 i		3750	5550	4565	13865

.. – =无数据或数据不适用; – =零; () =数据不确定

a 部署态，是指安装在导弹上的弹头或存放在有现役战斗力基地的弹头。

b 处于中央存储态，在完成部署态之前还需完成若干准备工作（如运送和装载至发射装置）。

c 此处数据包含大约 1600 枚战略核弹头（约 1300 弹道导弹和 300 枚轰炸机弹头），同时还有 150 枚非战略核弹头部署在欧洲，以装备美军和北约其他国家空军。

d 这一数字包括储备在美国的 80 枚非战略核弹头。

e 这一数字为等待拆解的退役核弹头。

f 这一数字包括近 1400 枚弹道导弹核弹头，以及 200 枚重型轰炸机装备核弹头。

g 这一数字包含 900 枚用于战略轰炸机和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核弹头，以及用于近海海军、空军和防空部队的约 1850 枚非战略核弹头。

h 尚无公开证据表明朝鲜已经制造或部署具备战斗力的核弹头。

i 估算时取区间最大值。

核武器的原材料为裂变材料，可以是高浓缩铀(HEU)，也可以是分离钚。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已具备同时生产出核武级 HEU 和钚能力;印度和以色列主要为钚;巴基斯坦主要为 HEU，但正在提升其钚生产能力。朝鲜生产出了用于武器级钚，但也可能具备了高浓缩铀生产能力。所有拥有民用核工业体系的国家均有能力生产裂变材料(参见第 10 节)。

香农•N•凯勒，汉斯•M•克里斯滕森

第 1 节.美国核武装力量

汉斯•M•克里斯滕森

截至 2019 年 1 月，美国保持了约 3800 枚核弹头库存，大体同 2018 年 1 月持平。[1]其中包括大约 1750 枚已部署核弹头，其中大约 1600 枚为战略核弹头，150 枚非战略弹头。除已部署核武，美国还保留了大约 2050 枚核弹头。另有约 2385 枚已退役弹头待拆解，总计约 6185 枚核弹头规模(见表 6.2)。

至 2018 年 2 月 5 日，即 2010 年《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新 START）规定的弹头最终数量限制期限之前，美国一直在恪守条约义务。据报告，2018 年 2 月 5 日时间窗口之时，美国共部署 660 战略核武发射装置，共装备 1393 枚核弹头。[2]新 START 框架下部署态核弹头数量与本年鉴估算数量并不一致，其原因就是轰炸机空基部署核武并不计入条约弹头数。

美国核姿态评论

美特朗普政府于 2018 年 2 月发表《核态势评论》(NPR)，聚力推动始于上届政府的大规模核武现代化计划。然而，2018 年 NPR 和 2010 年开始的两届政府 NPR 在若干政策上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不再一味的单纯寻求削减核武数量，同时对核武战略角色的理解上也有所转变：2018NPR 制定了新型核武研发计划，同时对现有核武库进行调整。和 2010NPR 追求的将核武限制在战略威慑这一唯一目标不同，2018NPR 强调的是“扩大”美国的核威慑选择。如威慑无效，美国也必须拥有挫败核攻击和“非核战略攻击”的能力。[3]对待非核攻击，美国将采取核武优先使用原则。

2018NPR 声明“非核战略攻击包括但不限于对美国、盟国或伙伴平民人口或基础设施的攻击，以及对美国或盟国核部队及其指挥及预警控制机构的攻击”。[4]美国核能力被设定为“应对核及非核战略威胁的潜在快速增长或出现，包括化学、生物、网络和大规模常规侵略”。[5]根据 2018NPR，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将增强适应其自身特点的核威慑方案的灵活性和适用范围....当前，扩大美国核选择灵活性，包括低当量武器选择，对于维持可靠核威慑力量以应对区域攻击尤为必要。[6]

表 6.2　　2019 年 1 月美国核力量

型号	名称	部署数量	首次部署年份	射程（公里）a	弹头 x 当量	弹头数量 b
战略力量						3600
轰炸机		60/107c				850d
B-52H	同温层堡垒	42/87	1961	16000	20x 空基巡航导弹 5-150kt e	528
B-2A	幽灵	18/20	1994	11000	16xB61-7，-11，B83-1 炸弹 f	320
洲际弹道导弹		400				800g
LGM-30G	民兵 3					
	Mk-12A	200	1979	13000	1-3xW78335kt	600h
	Mk-21SERV	200	2006	13000	1xW87300kt	200i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潜射弹道导弹		240j				1920k
UGM-133A	三叉戟 2（D5/D5LE）					
	Mk-4	…	1992	＞7400	1-8xW76-0100kt	46
	Mk-4A	…	2008	＞7400	1-8xW76-1100kt	1490
	Mk-4A	…	（2019）	＞7400	1-8xW76-2 小当量	…
	Mk-5	…	1990	＞7400	1-8xW88455kt	384
非战略力量						230L
F-15E	攻击鹰	…	1988	3840	5xB61-3，-4m	70
F-16C/D	战隼	…	1987	3200n	2xB61-3，-4	70
F-16MLU	战隼（北约版）	…	1985	3200	2xB61-3，-4	30
PA-200	龙卷风（北约版）	…	1983	2400	2xB61-3，-4	30
核弹头总计						3800o
部署态核弹头						1750p
储备核弹头						2050
退役等待拆卸核弹头						2385
核武库总计						6185q

. .=无数据或不适用;()=数据不确定; ALCM=空基巡航导弹; ICBM=洲际弹道导弹;kt =千吨，NATO=北约，SERV=安全加强型再入大气层载具; SLBM=潜射弹道导弹;SLCM =海基巡航导弹;SSBN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注：由于条约计数规则，美国新 START 条约声明中的数据不一定与表中所含数据完全一致。

a 最大不加油航程。所有具备核武平台能力的飞机均可空中加油。实际航程取决于机型和武器载荷。

b 表中的总弹头数量为指派给具备核投送平台的总数量，其中只有部分已部署在导弹和空军基地。

c 轰炸机有两个数字：其一为已指定为执行核投送任务的轰炸机，其二为具备核投送能力的整体轰炸机数量。美空军拥有 66 架具备核投送能力轰炸机(20 架 B-2S 和 46 架 B-52HS),其中在役不超过 60 架。

d 轰炸机基地共部署了 300 枚核弹头(200 枚空基巡航导弹和 100 枚核炸弹)，其余均储存在中央仓库。炸弹总库存数量高于 2017 年 SIPRI 年鉴数据，以对 ICBM 弹头数量估计进行重新修正，但许多重力炸弹不再完

全活跃，并计划在 2020 年 B61-12 列装后退役。
e B-52H 不再投送核重力炸弹。
f B-2 轰炸机为指定投送核重力炸弹的唯一机型。战略轰炸机携带弹头最大当量为 B-61-7（36 万吨）、B61-11(40 万吨)以及 B83-1（120 万吨），但其当量也可调整。很多 B83-1 已被转至非活跃库存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决定，一旦 B61-12 部署，B83-1 就将退役，但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内保留 B83-1。
g ICBM 弹头中，只有约 400 枚被部署在发射井中，余下的都存放中央仓库。
h W78 弹头中只有 200 枚被部署，其余均存放在中央仓库。
i 另有 340 枚 W87 可能划为长期储备，以便将来进行可替代互换弹头。
j14 艘 SSBN 中，有 2 艘为轮班正常大修。他们不承担核投送任务。其他 2 艘或更多将在任何时间承担战备值班，有时也会不携带核弹头。到 2018 年核弹头数量将会将至 240 枚。
K 此类弹头中，约 950 枚部署在潜艇，其余都存储在中央仓库。虽然在新 START 条约下，每个可携带 8 枚核弹头 D5 导弹都将计数，同时也有飞行测试曾经监测到曾搭载 14 枚弹头，美海军已将其将至 4-5 枚核弹头。现在所有战备态 W-76 核弹头均为 W76-1 型新型核弹头。一旦 2019 年，W76-1 生产完工，则所有的 W76-0 系列都将退役。
l 数据基于作者对 SIPRI 年鉴 2018 中 200 枚的评估进行的修订。作者估计，B61 库存正在下降，但速度比之前想象的要慢。大约 150 枚战术炸弹被认为部署在美国海外 6 个北约空军基地。剩余炸弹保存在美国中央仓库中。一旦部署 B61-12，B61 旧版本将被送回美国。
m 战术核炸弹最大当量不等，B61-3 (17 万吨)，B61-4 (5 万吨) 和 B61-10 (8 万吨)。所有当量均可下调，B61-10 于 2016 年退役。
n 大多数资料都列出了 2400 公里的不加油航程，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F-16 航程数据为 3200 公里。
o 在这些核武弹头中，大约 1750 弹头枚被部署在弹道导弹、轰炸机基地以及欧洲各地，剩余的为中央集中储存。
p 本表中部署态弹头数量与新 START 中宣布的数量有所不同，因为新 START 将一个虚构的数字划归轰炸机，而不计算轰炸机基地武器数量或非战略武器。
q 除上述成品核弹头，美国还有大约 20 吨钚储存在德克萨斯州的潘太克斯核工厂,可能有 4 吨铀的二级分离物储设施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 Y-12 掩体设施区。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各种预算报告和新闻稿;美国能源部，各种预算报告和计划;美国国防部，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各种文件;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和美国能源部，个人通信;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作者的估算和评估。

如国会批准，新的核武能力包括对三叉戟 2D5LE 潜射弹道导弹(SLBM)少量核弹头进行改进，“以确保具备穿透敌防御系统的快速反应能力”。[7] 按照 2018NPR，这一能力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一个错误认识”，即美战区防御威慑中存在一个可利用的“短板”。[8] 该计划似乎是将现有的 W76--1 10 万吨级当量两级热核弹头改为单级核弹头，即缩减弹头数量以降低当量，将爆炸当量控制在 5-7 千吨级别(见下文)。[9]

NPR 明确表示，从长远看，美国还将追求一种潜射巡航核导弹（SLCM），以“提供必要的非战略区域军事存在，“使美国拥有确定性反应能力”，符合 1987 年苏美《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INF 条约)，以应对“俄方不断违反中导条约”的威胁。[10] 关于新导弹，NPR 指出，美国“将立即组织力量重塑美国应对能力，启动需求研究并着力开展对替代品的分析....尽快对 SLCM 进行现代化改造”。[11] 美国对海基巡航导弹的研发可能会推动俄罗斯认真对待其非战略核武的削减，这点类似以前西方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直接导致 1987 年的 INF 条约。[12]

NPR 指出，上述中短期核武能力建设计划将为美国“提供一个更具多样化特征的核武库，大大增强....[美国]核威慑和防护能力；扩大美应对核或非核战略攻击的可靠选择范围并通过向潜在对手发出信号，表明其压制性有限核升级概念并无优势，从而增强美核武威慑力”。[13]

美核武库已有约 1000 枚可搭载低当量弹头的重力炸弹和空基巡航导弹(ACLM)，但 NPR 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表明现有核武库能力不足；仅仅表达美国急需新的核威慑力。[14]美海军拥有核 SLCM（战斧对地攻击巡航导弹，TLAM/N），但因被认为此型导弹有些多余，已于 2011 年退役。[15]除数量有限的轰炸机重力炸弹(见下文)外，所有其他非战略核武都已退役。尽管俄罗斯拥有庞大的非战略核武库，美国还是认为此类核武已无军事必要。当美国将如 TLAM/N 的核 SLCM 纳入核武库之时，俄罗斯开始开发陆基巡航导弹(SSC-8 或 9M729)，美国指责俄方此举自 2008 至 10 年违反了中导条约。也正因如此，我们不太明白为何美国现在就认为，重新祭出 SLCM 就能扭转俄罗斯核战略。而且，美国战略司令部已加大了美国对北约战略轰炸机的支持力度，以提升其核威慑力，应对俄方挑衅和侵略行为。[16]此类轰炸机装备有核 ALCM，并将接受新型 LRSO(远程对峙)导弹，该型导弹将具有与 NPR 提出的 SLCM 大致相同的战力(见下文)。

俄罗斯如何决定其非战略核武库规模和构成似乎取决于美国常规武装力量优势究竟有多大，而并非取决于美国非战略核武库或弹头当量。[17]相反，在欧洲和亚洲寻求一种新型 SLCM“以提供所需的非战略区域存在”，尤其同美国常规远程打击能力相结合，这也愈发强化了俄罗斯对非战略核武的依赖，甚至有可能诱发中国对发展此类核武的兴趣。

待命值班巡逻的攻击潜艇上舰安装新型 SLCM，需经安装核认证和发射控制单元安装到位。海基和陆基人员需经专门培训和认证才能进行武器装备维护和操作。价格昂贵、精密复杂的后勤需求，将对美海军财政和作战资源造成进一步的压力。此外，核 SLCM 重建可能会引起某些国家的担忧。冷战时期，美国有核舰船访问外港时，这些港口不允许核武进入其领土，也就经常导致严重的政治争端。[18]比如，新西兰一贯奉行拒绝一切有核舰船靠泊其港口的政策，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引发新美外交关系严重紧张，直至最近才逐渐有所修复。[19]

核武现代化

2018NPR 证实，特朗普政府打算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上届政府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其中一些已在推进之中。核武现代化方案的目的就对所有核运载系统进行升级换代。具体而言，计划引进新型(哥伦比亚)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新型核战略轰炸机(B-21 突击机)，新型远程自动控制导弹(上文 LRSO)，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地面战略威慑系统，GBSD)，以及新型核战术战斗轰炸机(F-35A)。同时计划升级美国国防部指挥和控制系统，以及能源部国家核安全局(NNSA)核弹头及其配套基础设施。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18 年 1 月公布的一项数据估算，2019 至 28 年，美核武库及其配套设施现代化及运营将耗费 4940 亿美元，比 CBO 2017 估算的 2017 至 26 年期间预算高出 940 亿美元。这一增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核武现代化计划逐年推进以及 2018 年 NPR 新增核武器项目预期成本的增长。[20]核武现代化(及维护)计划将在 2028 年之后继续进行。根据 CBO 估算，未来 30 年将花费总计 1.2 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CBO 的估算已经考虑了通膨因素，但其他渠道估计数预测，总费用将接近 1.7 万亿美元。[21]NPR 承认，现代化方案费用估算各不相同，但方案是“负担得起的优先事项”，并强调总费用只占国防总预算的一小部分。[22]不过毫无疑问的是，面对有限的资源、常核武器现代化项目彼此间的相互竞争，还有不断激增的赤字，都将对雄心勃勃的核武现代化构成重大挑战。

轰炸机

美国空军目前拥有 169 架重型轰炸机:62 架 B-1B、20 架 B-2A 和 87 架 B-52H。其中，66 架(20 架 B-2A 和 46 架 B-52H)具备核投送能力，尽管只有 60 架(18 架 B-2A 和 42 架 B-52H)执行核投送任务。据估计，战略轰炸机共有约 850 枚核弹头，其中 300 枚部署在轰炸机基地。美轰炸机正在装备新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以改进与其他部队和美国国家指挥中心的互联互通。[23]下一代远程攻击轰炸机，即 B-21 突击机的研发正在顺利推进。B-21 将可搭载目前正在研发中的 B61-12 制导核重力炸弹和 LRSO 巡航导弹(见下文)。[24]同时 B-21 也能够进行载人和无人操作，尽管核投送任务为载人操作。新型轰炸机计划在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服役。[25] B-21

将替换德克萨斯州戴斯空军基地、南达科他州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和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的 B-1 和 B-2 轰炸机。[26]

为装备轰炸机，美空军正在开发一种极具争议的新型核 ALCM——LRSO，计划从 2030 年开始部署。美国防部官员称，LRSO 需要能使美轰炸机具备面对现今防空系统之时，仍可对目标实施打击，并可在区域场景中提供灵活多变的攻击选项。然而，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这种远程打击任务完全可以使用非核远程巡航导弹来执行，如增程型联合空面防区外导弹(JASSM-ER)。[27]美空军计划采购 1000 枚 LRSO 导弹，其中大约一半将装备核弹头，其余用于测试发射。[28]

陆基弹道导弹

截至 2019 年 1 月，美国在 450 座发射井中共部署了 400 枚民兵 3 型洲际弹道导弹(ICBM)。已被清空的 50 个发射井依旧处于待命状态，如有必要即可将储备导弹重新装填。[29]

民兵 3 型洲际弹道导弹装备一枚弹头:一枚 335-ktW78/Mk12A 或一枚 300-kt W87/Mk21。携带 W78 弹头的导弹能最多再加挂两枚弹头，即最多可搭载三枚分导弹头(MIRV)。据估计，ICBM 部队共装备 800 枚核弹头，其中 400 枚为导弹部署。

民兵 3 系列导弹在 2015 年完成了长达十年的升级工作，延寿至 2030 年左右。此外，还在对 W87/Mk21 重返大气层载具的新型保险、引信和火控（AF&F）模块进行升级。[30]

空军也开始着手研发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称为陆基战略威慑力量(GBSD)，计划于 2028 年开始替代民兵 3。[31]空军计划采购 642 枚导弹，其中 400 枚为部署态，50 枚储备，其余用于发射测试和备件。31GBSD 的研发和生产预期成本日益飙涨，预计 2017 年将达到 1000 亿美元，高于 2015 年最初估计的 623 亿美元。[32]

美空军和 NNSA 先前的 W78 延寿计划，是一项极具争议的可互换弹头 I (IW-I) 。现在为装备 GBSD，这一项目将会和 ICBM 以及海军弹头结合起来。然而，时至 2018 年 8 月，美国核武器委员会(国防部和能源部联合行动的协调机构)却取消了 IW-I 计划，并将 W78 替代计划更名为 W87-1，以体现 W87 使用的是钚弹芯和钝感炸药，以此区别于 W78 所使用的传统烈性炸药。W87-1 项目预计将耗

费 89 亿至 156 亿美元。[33]

2018 年，美空军民兵 3 飞行测试出现若干异常。第一次发生在 2 月 5 日，加利福尼亚范登堡空军基地的一次发射试验被取消。[34]4 月 25 日试射成功，但 7 月 30 日一枚民兵 3 在发射后不久发生爆炸。[35]11 月 6 日的试射成功。[36]两次试射，模拟弹头都成功击中了位于 6760 公里外马绍尔群岛科瓦贾-莱因环礁的罗纳德•里根弹道导弹防御试验靶场。除民兵 3 现场实射，3 月 21-22 日在怀俄明州沃伦空军基地进行了一次模拟 SELM 发射，其中包括使用 E-6B 水星指挥机上的机载发射控制系统来发射导弹。[37]每 6 个月就会轮流在 3 个 ICBM 基地进行 SELM 试射。

弹道导弹潜艇

美国海军在 2017 年末完成了对俄亥俄级 SSBN 导弹发射管的缩管工作(从 24 具降至 20 具)。[38]缩管是新 START 所要求，即部署战略发射器不超过 700 具/套。削减后，海军 SSBN 舰队可以部署多达 240 枚战略导弹。

美国海军共拥有 14 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SSBN)，其中 8 艘部署在华盛顿州的基特萨普海军潜艇基地，6 艘部署在乔治亚州国王湾海军潜艇基地，携带三叉戟 2 型 (D5)潜射弹道导弹(SLBM)。通常情况下，14 艘潜艇中 12 艘为巡航值班态，任何时候都有 2 艘进行燃料补给。通常约有 8 至 10 艘 SSBN 游弋，其中 4 至 5 艘在指定区域进行巡逻警戒，并可在接到发射指令后 15 分钟内发射导弹。

自 2017 年以来，美国海军一直在使用一型名为 D5LE (LE 意为“延寿”)增强型三叉戟版本，取代三叉戟 2 型 D5。首批 D5LE 在 2017 年 2 月装备马里兰号(SSBN-738)。[39]新版 D5LE 装备了 Mk-6 制导系统，旨在提高打击精度。俄亥俄级潜艇直至其服役期满(2042 年)都将装备 D5LE，同时 D5LE 也将部署在英国的三叉戟潜艇上(见第 3 节)。同时 D5LE 还将现行装备在新的哥伦比亚级 SSBN，计划首舰将于 2031 年开始巡航值班。但 D5LE 最终将被一种新的 SLBM 所取代，目前命名为 SWS（战略武器系统）534 或 D5LE2。[40]2018 年 NPR 报道，海军“将在 2020 年开始研究，以确定一种成本效益高、高效可靠的 SLBM，在哥伦比亚 SSBN 整个服役期……[可部署]”。[41]

三叉戟 SLBM 携带两型基本弹头:455-ktW88 型或 100-ktW76-1 型(仅存少量

老式 W76-0 型库存)。W76-1 装备了一种新型引信，可提升瞄准效能。据估计，SSBN 舰队共装备约 1920 枚弹头，其中半数为部署态。每枚 SLBM 最多可携带 8 枚弹头，但通常携带弹头较少。美国海军并未透露每艘潜艇携带弹头数量。但实际上，根据任务要求，单枚平均携带 4 至 5 枚弹头。新 START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9 月，SSBN 舰队共携带 950 枚弹头。[42]

如前所述，2018 年 NPR 透露，美国已经开始研发 W76 弹头的低当量版本(W76-2)。[43] 2018 年年底开始生产，2019 年 9 月将交付美海军。[44] 尽管美国海军战争计划中，一直就有单弹头 SLBM 库存，但是美核武库新增的低当量 W76-2 也反映出美国在应对俄罗斯使用低当量战术核武威慑时的一种新思路。[45]

2018 年 3 月 28 日，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从内布拉斯加号(SSBN-739)上试射了两枚三叉戟 2 型 D5LESLBM。这也是潜艇反应堆换料大修后，重新投入战略巡航的确认步骤之一。[46]

非战略核武器

美国有一款基本型非战略武器—B61 重力炸弹，共有两种改进型:B61-3 和 B61-4。第三次改款(B61-10)在 2016 年 9 月退役。[47]估计约有 230 枚战术 B61 炸弹库存。[48]

欧洲 5 国的 6 个北约空军基地，美军共部署略约 150 枚:意大利的阿维亚诺;德国的比切尔;意大利的加迪;土耳其的印吉利克;比利时的科林·布格尔;荷兰的福尔科。比利时和荷兰空军(F-16 战斗机轰炸机)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空军(PA-200 旋风战斗机)装备美国 B61 炸弹执行核打击任务。土耳其 F-16 也被认为具备核能力，但土空军是否仍在执行核打击任务尚不确定。和平时期，炸弹由美空军人员负责保管。2016 年 7 月土耳其未遂政变期间，人们对因瑟利克基地核武器安全性表示担忧。2017 年底有报道称，这些武器可能已被“悄悄撤回”。[49]报道尚未得到证实，因瑟利克已被列入 2019 核储存基地升级计划。

剩余 80 枚 B61 炸弹储存在美本土基地，供美国战斗轰炸机使用，以备支持包括中东和东北亚在内的欧洲以外的盟友。

北约已经批准一项核姿态现代化计划，计划将于 2022-24 年在欧洲部署美 N61-12 制导核重力炸弹(美正在研发)。[50] B61-12 将使用 B61 -4 的核爆包，最高

当量约为 5 万吨，但配备有导引尾翼套件，以增加其精度，并赋予其有限的突防能力。B61-12，似乎也具备一定的穿地能力。当 B61-3 或 B61-4 都束手无策之时，B61-12 便可以去敲掉最难啃的危险目标，不失为更为高效的战场利器。[51]

B61-12 炸弹综合飞行测试已在 F-15E、F-16 和飓风战斗轰炸机上进行。[52]B61-12 也将集成在美制 F-35A 战斗轰炸机上，预计将在 2024-26 年获得核认证。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已经决定购买 F-35A 战斗轰炸机。据推测，其中一些随后将被会肩负起核投送任务。[53]德国在 2019 年 1 月宣布，已经决定不购买 F- 35A，并且正在考虑一旦 PA-200 飓风在 2030 年左右退役，就转用欧洲战机或购买 F/A-18 来进行换代。[54]

如前所述，2018 年，也就是 TLAM/N SLCM 退役后的第 7 个年头，NPR 呼吁发展核 SLCM。[55]如果新型 SLCM 是由国会出资，则很可能会部署在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上。

1 克里斯滕森•H•M，“尽管言辞激烈，美国的核储备仍在继续下降”，美国原子科学家联盟 FAS 战略安全博客，2018 年 3 月 22 日。
2 美国国务院，“关于实施新 START 的关键事实”，简报，2018 年 2 月 5 日。关于新 START 的摘要及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3 节。见本卷第 7 章第 2 节。
3 美国国防部 (DOD)，2018 年核态势评估(DOD:华盛顿特区，2018 年 2 月)，第 21、38 页。
4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21 页。
5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21、38 页。
6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38,54 页。
7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55 页。
8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55 页。
9 作者评估基于与美国政府官员的私人交流。
10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55 页。
11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55 页。
12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55 页。关于 INF，见本卷第 7 章第 2 节。
13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55 页。
14 克里斯滕森•H•M，“推动新的核武器能力存在缺陷”，FAS 战略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17 年 6 月 29 日。
15 参见克里斯滕森•H•M，“为新型核巡航导弹选择 W80-1 弹头”，FAS 战略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14 年 10 月 10 日。
16 克里斯滕森•H•M，“增加核轰炸机行动”，FAS 战略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16 年 9 月 25 日。
17 克里斯滕森•H•M，“俄罗斯核力量:继续壮大还是实施现代化?”，Russia Matters(俄罗斯事务)网站，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17 年 9 月 14 日。
18 有关冷战期间核载具舰船参观的国际争端的背景资料，见克里斯滕森•H•M。“既不确认也不否认政策:核外交”，工作论文(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华盛顿特区，2006 年 2 月)。
19 罗布森•S，“因核问题长达 30 年的不和终于结束，美国海军将重返新西兰”，《星条旗》，2016 年 7 月 21 日。
2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9 年至 2028 年美国核力量预计成本”，2019 年 1 月，第 1 页。

21 见赖夫•K，“美国核现代化计划”，军备控制协会，简报，2018 年 8 月更新。
22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11，51-52 页。
23 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兰德•R 发表声明，向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主题：国防部核力量 2019 财年态势，2018 年 3 月 22 日。
24 美国国防部 (DOD)，监察长，对购买远程攻击轰炸机的审计，DODIG-2015-170(国防部:华盛顿，2015 年 9 月 8 日)，第 2,4,6 页。
25 格特勒•J，美国空军 B-21 突袭机远程攻击轰炸机，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国会报告 R44463(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8 年 10 月 12 日更新)，第 10 页。
26 美国空军公共事务部长，“空军为 B-21 飞机选址”，2018 年 5 月 2 日。
27 LRSO 相关背景资料，见克里斯滕森•H•M，“LRSO:核巡航导弹任务”，FAS 战略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15 年 10 月 20 日;克里斯滕森•H•M，“忘了 LRSO 吧: JASSM-ER 可担负这项工作”，FAS 战略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15 年 12 月 16 日;赖夫•K，“研究新型核空射巡航导弹的缺陷理论”，《今日军控》，第 8 卷第 2 期(2016 年 6 月 12 日)。
28 美国空军，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的演讲，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议题:国防部核力量 FY19 态势，兰德将军声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2018 年 4 月 11 日，第 13 页。
29 空军技术，“美国空军拆除最后 50 枚民兵 III 洲际弹道导弹，满足 NST 要求”，2017 年 7 月 3 日。
30 帕迪拉•M，“桑迪亚瞄准 2018 年首次 Mk21 引信飞行试验”，《桑迪亚实验室新闻》，第 70 卷，第 6 期(2018 年 3 月 16 日)。
31 赖夫•K，“空军草拟后续洲际弹道导弹计划”，《今日军控》，2015 年 7 月 8 日。
32 赖夫•K，“新洲际弹道导弹替换成本披露”，《今日军控》，2017 年 3 月。
33 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NNSA)， W78 替代计划(W87-1):钝感烈性炸药成本估算与使用，国会报告(NNSA:华盛顿特区，2018 年 12 月)，第 3、7 页。
34 罗宾斯 G，“周二晚上的民兵导弹发射突然取消”，《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2018 年 2 月 6 日。
35 《国防邮报》，“美国空军测试民兵 3 洲际弹道导弹”;史卡利•J，“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的民兵导弹试验以失败告终”，Noozhawk(美媒)，2018 年 7 月 31 日。
36 琼斯•J 和迈尔斯•D，美国空军第 30 航天联队公共事务，“从范登堡发射的民兵 3GT 228GM”，国防可视化信息发布服务中心，2018 年 11 月 6 日。
37 瓦格纳•A，“书中的另一个 SELM”，F.E.沃伦空军基地，2018 年 8 月 29 日。
38 美国海军官员，与作者的私人信函，2018 年。
39 美国海军，美国众议院核力量军事委员会，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战略系统项目主任，本尼迪克特•T(海军中将)声明，2017 年 5 月 25 日。
40 彼得森•J，“海军战略导弹司令部启动新型导弹概念研制”，《海权》， 2017 年 5 月 24 日。
41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49 页。
42 美国国务院，“新 START 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总数”，简报，2018 年 9 月 1 日。
43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55 页。
44 里昂•D，“NNSA 已开始建造低当量潜艇弹头”，《核安全与威慑监测》，第 23 卷第 4 期。(2019 年 1 月 25 日)。
45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55 页。
46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现代化后的洛克希德•马丁三叉戟 2D5 导弹试验合格，适用于潜艇巡逻”，新闻发布，2018 年 3 月 28 日。
47 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NNSA)， 2018 财年库存管理计划，国会报告(NNSA:华盛顿特区，2017 年 11 月)，图 1-7，第 1-13 页。
48 估算基于 SIPRI 年鉴 2018 中作者对 200 枚 B61 炸弹的数量修正作出。作者估计，B61 的库存正在下降，但速度较之前认为的要慢。
49 哈蒙德•J，“英特利克空军基地的未来”，国防网 Real Clear Defense, 2017 年 11 月 30 日。
50 关于美国和北约非战略核力量现代化的概述，见安德烈森•S，《核威胁倡议》(NTI)，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的北约核态势(NTI:华盛顿特区，2018 年 1 月)。
51 克里斯滕森•H•M 和麦金齐•M，“视频显示 B61-12 核弹的探地能力”，FAS 战略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16 年 1 月 14 日。
52 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 B61 延寿项目”，简报，2018 年 12 月。
53 埃莫特•R，“比利时选择洛克希德公司的 F-35 而非欧洲战斗机”，路透社，2018 年 10 月 25 日。
54 沙拉尔•A，“德国将 F35 从战斗机采购清单中剔除，波音 F/A-18 和欧洲战机双雄对决”，路透社，2019 年 1 月 31 日。
55 美国国防部(注 3)，第 55 页。

第 2 节.俄罗斯核武装力量[1]

汉斯•M•克里斯滕森

截至 2019 年 1 月，俄罗斯共保留了约 4330 枚核弹头，其中约 2500 枚为进攻性战略弹头，约 1600 枚部署在陆基、海基弹道导弹以及轰炸机基地。俄罗斯还拥有大约 1830 枚非战略(战术)核弹头，所有这类核弹头均集中储存。[2]估计另有 2170 枚退役弹头等待拆解，俄总核武库存约为 6500 枚(见表 6.3)。根据《2010 年俄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措施条约》(新 START)的要求，2018 年 2 月，俄罗斯报告称，其部署的 527 个战略发射平台共部署 1444 枚核弹头。[3]新 START 框架下，部署态弹头数量却与上述数量存在出入，其原因就是轰炸机基地部署的核弹头并不在条约统计口径之内。

战略轰炸机

俄罗斯远程航空司令部拥有大约 13 架图-160(海盗旗)、30 架图-95MS16(熊式-H16)和 25 架图- 95MS6(熊式-H6)轰炸机，其中一些可能尚未形成完全战力，有些还在进行各类升级。各型轰炸机最大载荷接近 785 枚核弹头，鉴于其中一些轰炸机尚未形成完全战斗力，我们估算其最大实际载荷会小一些---615 枚，其中大约 200 枚可能储存在两个战略轰炸机基地。俄罗斯西部萨拉托夫附近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和东部别洛戈尔斯克附近的乌克兰空军基地。轰炸机现代化项目，包括航电、发动机和远程核导弹和常规巡航导弹升级工作，正顺利推进，尽管较原计划划略慢。似乎几乎所有图-160 和部分图-95 将被升级，以维持大约 50-60 架的战力编制。升级后的轰炸机可搭载新式 Kh-102 (AS-23B)核空基巡航导弹(ALCM)。[4]计划于 2019 年底交付的 Tu-95 改进版被称为 Tu-95MSM。[5]俄罗斯政府还宣布计划恢复图-160 生产线，以生产多达 50 架图-160 改进型-图-160M2，计划 2020 年后开始批量生产。[6]新型轰炸机将替代老迈的图-95(MS16 和 MS6)，并逐渐过渡到下一代轰炸机，亚音速战略轰炸机--PAK-DA，计划 21 世纪 20 年代末交付空军，最终将取代所有图-95 和图-160 以及部署非战略核弹头的图-22(见下文)。[7]

表 6.3 2019 年 1 月俄罗斯核力量

所有数据均为近似值，是作者评估值。弹头总数和小计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 5 枚弹头数量。

型号/俄罗斯名称（北约名称）	部署数量	首次部署年份	射程（公里）a	弹头当量	弹头数量 b
战略进攻力量					2500c
轰炸机	50/68d				615e
图-95MS6（熊式-H6）	14/25	1981	6500-10500	6xAS-15A 空基巡航导弹，炸弹	84
图-95MS16（熊式-H16）	25/30	1981	6500-10500	16xAS-15A 空基巡航导弹，炸弹	400
图-160 （海盗旗）	11/13	1987	10500-13200	12xAS-15B 空基巡航导弹或 AS-16 短程空基导弹，炸弹	132
洲际弹道导弹	318				1165f
RS-20V(SS-18 撒旦)	46	1992	11000-15000	10X500-800 千吨	460
RS-18(SS-19 匕首)	20	1980	10000	6X400 千吨	120
RS-12M 白杨(SS-25 镰刀)	63g	1985	10500	1X800 千吨	63
RS-12M2-M(SS-27)	60	1997	10500	1X800 千吨	60
RS-12M1 白杨-M(SS-27)	18	2006	10500	1X800 千吨	18
RS-24(SS-27 Mod2)	90	2010	10500	4X100 千吨	396
RS-24(SS-27 Mod2/井基)	12	2014	10500	4X100 千吨	48
RS-26 白杨(SS-X-28)	…	（2018）	5500+	MIRV(..X 千吨)	..
RS-26 萨尔马特白杨(SS-X-29)	…	（2020）	10000+	MIRV(..X 千吨)	..
潜射弹道导弹	10/160h				720h
RSM-50 波浪（SS-N-18M1 黄貂鱼）	1/16	1978	6500	3X50 千吨	48
RSM-54 蓝天（SS-N-23M1）	6/96	1986/2007	9000	4X100 千吨	384
RSM-56 布拉瓦（SS-NX-32）	3/48	2014	＞8050	6X（100 千吨）	288
非战略力量					1830i
反弹道导弹，空中/沿海防御	1124				385
53T6（SH-08， 羚	68	1986	30	1X10 千吨	68

羊）					
S-300/400 (SA-20/21)	1000j	1980/1992	…	1X 不足千吨	290
3M-55 红宝石 (SS-N-26)	48	(2014)	400+	1X(…千吨)	24
SSC-1B(SPEAL)	8	1973	500	1X350	4
空中武器 k	340				540
图 -22M3(逆火式 -C)	100	1974	…	3X 空对地导弹，炸弹	300
苏 24M/M2(剑客-D)	120	1974	…	2X 炸弹	120
苏 34（后卫）	110	2006	…	2X 炸弹	110
米格-31K 捕狐犬	10	1983	…	1XASM	10
陆军武器	160				851
圣甲虫导弹（SS-21 ）	12	1981	120	(1X10-100 千吨)	5
伊斯坎德尔导弹（SS-26 ）	132	2005	350m	(1X10-100 千吨)	66
9M729(SSC-8)导弹	16	2016	2350	1X..千吨	16
海军武器					820
潜艇/水面/舰艇/空中	海基巡航导弹，反潜武器，地对空导弹，深水炸弹，鱼雷 m				
总库存					4330
部署态弹头					1600o
预备态弹头					2730p
退役等待 拆卸的弹头总数					2170
核武库弹头总数					6500

…=不可用或不适用;()=不确定;ABM=反弹道导弹;ALCM=空射巡航导弹;ASM=空对地导弹; ASW=反潜作战; ICBM =洲际弹道导弹;kt -吨;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SAM -地对空导弹; SLBM=潜射弹道导弹;SLCM -海上发射巡航导弹;SRAM -短程攻击导弹。

注：本表所列为估计可部署于投送系统的弹头总数。 其中只有部分为部署态，并且其数量并非一定符合新 START 条约计数规则。

a 飞机航程只用于说明问题；真正的作战航程在机型和武器载荷的不同条件下，各有不同。

b 该数据表示分配给投送系统的可用弹头总数（已部署和预备态）。

c 战略弹头中约有 1600 枚部署在弹道导弹和轰炸机基地，及核潜艇。 其余核弹头均集中储存。

d 第一个数据是根据新 START 条约归属轰炸机类的部署弹头估计数；第二个数字为武库中具备核投送能力的轰炸机总数。

e 轰炸机最大可能划拨核弹头为 785 枚，但只有部分轰炸机为完全服役状态，这里假设只有 615 枚核弹头分配给远程轰炸机部队，其中约 200 枚可能部署在两个战略轰炸机基地，其余核弹头均为集中存储。

f 在可用于作战洲际弹道导弹的 1165 枚弹头中，有近 860 枚为部署态，其余弹头则为储存态。

g 这一数据不确定，因为几个 SS-25 部队正在进行 SS-27 Mod 2 升级。

h 其中两艘德尔塔级 SSBN 可在任何特定时间进行大修，且不携带指定核导弹及弹头。可能只有一艘德尔塔 3 核潜艇巡航。

i 据俄罗斯政府称，非战略核弹头不与其投送系统一起部署，而是保存在中央储存设施中，此类设施常设置在基地周围。

j 俄罗斯全境至少有 80 处 S-300 发射点，每个发射点平均配备 12 具发射架，配 2-4 枚拦截导弹。 每个发射架都有若干备份弹。

k 图表数据中的飞机，其中只有部分被认为具备核武作战能力。大多数能携带超过 1 枚核武器。其他具备核投送能力的可能机型包括苏-25 蛙足和米格-25 狐蝠。

l 这一估计基于作者在 SIPRI 年鉴 2018 中的评估修定。新估算数较低是基于对弹头分配的调整假定。然而

作者估计，由于部署了额外的发射台架，弹头数量正在增加。
m 虽然许多非官方消息和新闻媒体报道称 SS-26 射程近 500 公里，但美国空军、国家航空和航天情报中心（NASIC）将射程列为 350 公里。
n 只有潜水艇被认为搭载了核鱼雷。
o 请注意，由于条约计数规则的要求，此表中部署态核弹头数据与新 START 条约数据并不相同。
P 储备弹头包括 1830 枚中央储存的非战略弹头。
资料来源:俄罗斯国防部新闻稿;美国国务院，START 条约谅解备忘录，1990 年至 2009 年 7 月;新 START 条约综合数据发布，各年;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弹道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2017 年 7 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监听台;俄罗斯新闻媒体;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 http://www.russianforces.org/ >;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力量对比》(劳特利奇出版社:伦敦，历年); 科克伦,T.B.等，《核武器数据手册》，第 4 卷，《苏联核武器》(哈珀和罗出版公司:纽约,1989 年);《简氏战略武器系统》，各期;;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作者估算。

2018 年，俄战略轰炸机继续在北极、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空进行远程航行，其中包括两架图-160 轰炸机于 12 月访问委内瑞拉。[8]2018 年，另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2018 年 11 月在俄罗斯北部上空，图-160 轰炸机一次性试射 12 枚 Kh-101(AS-23A)ALCM。[9]此次试射由于发射了大量巡航导弹，特别的意味深长。

陆基弹道导弹

截至 2019 年 1 月，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控制着俄罗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武装部队—共有 3 个军，下辖 12 个导弹师，总计部署 318 枚各型及改进型 ICBM(见表 6.3)。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共装备 1165 枚弹头，但据估计，已被削减至 860 枚弹头，约占俄罗斯部署战略核弹头 54%。美国空军国家情报与空间中心(NASIC)估计，与近年来有关俄罗斯频繁核“集结”说法不同，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导弹数量将继续减少，其深层次原因是军控协议、导弹老化，资源限制等多重因素。[10]自俄罗斯继续裁减削减其洲际弹道导弹部队以来，尽管多年来一直低于新 START，今后是否继续削减或是将以何种速度推进都有待观察。

俄罗斯 ICBM 重大现代化已完成三分之二，其目的就是对所有前苏联时期导弹进行替换，尽管并非是一一对换。20 年前就开始的核武现代化计划推进不及预期。2018 年底，约 70%的部队已完成升级，76%的部队计划在 2019 年底完成升级。[11]所有苏联时期剩余 ICBM 计划在 2024 年前完全撤出，尽管其使用寿命预计 2025 至 27 年才到期。[12]除新导弹采购，现代化还包括对发射井、发射控制中心、卫戍及配套设施的全面重建。[13]

俄罗斯当前 ICBM 现代化主要集中在 RS-12 多弹头版本，称为 RS-24 亚尔斯(SS-27 改进型 2)，已完成 3 个师的换装（新西伯利亚师、塔吉尔师和捷伊科沃），另外还有 2 个师（伊尔库茨克和约什卡尔奥拉）正在进行中。到 2020 年，还将

有 2 个师开始升级（巴尔瑙尔和维波列佐沃有时被称为博洛戈夫斯基）。[14]第一个井基 RS-24 团(井舱 10 座)已在科泽尔斯克完成列装，第二个井基发射团(井舱 10 座)还处于建设初期，其中 2 座井舱已在 2018 年底完成。[15]俄罗斯正在研发 RS-12 的第三个改进型，称为 RS-26 亚尔斯-M，RS-26 为 RS-24 的轻量版本，但 RS-26 的研发和最终部署都已推迟。[16]俄罗斯也正在研发一种新型液体燃料助推，井基“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被称为 RS-28(撒旦 2)，以替代 RS-20V(SS-18)。RS-28 导弹将携带新型弹头，如变轨弹头，其目的就在于突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尽管新式滑翔载具常被称为先锋（如，美国《2018 年导弹防御审查报告》将“先锋”同其他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一并列为导弹），但可能实际只是滑翔武器载具系统（即助推器和有效载荷）。[17]据俄罗斯报道，滑翔载具将于 2019 年首次部署在杜巴罗夫斯基导弹团的两型 RS-18B(SS-19 改 4) 洲际弹道导弹上，争取 2027 年完成两个团 12 枚滑翔载具导弹部署。[18]一旦 RS-28 部署任务展开，将取代 RS-18。[19]由于其巨大的尺寸(据报道长 4.5 米)，每枚导弹只能携带一架滑翔载具。[20]

俄罗斯通常每年机型两次大规模公路机动 ICBM 演习。2018 年的两次演习对所有现役导弹师进行了拉练演习，涉及 RS-12M 白杨 (SS-25)，RS-12M1 白杨-M (SS-27 改 1) 和 RS-24 机动发射平台。[21]发射器均部署在远离导弹基地的纵深地带，且部署时间较往年更长。俄罗斯 ICBM 部队同时还参加了规模更大的协同军事演习，参演部队还涉及核动力导弹潜艇 SSBN 及核轰炸机。[22]

弹道导弹潜艇和海基弹道导弹

俄罗斯海军拥有 10 艘现役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其中几艘在任何时间都可能会停港检修)。俄罗斯 SSBN 舰队包括 7 艘苏联时期 SSBN 和 3 艘(远期计划为 10 艘)新型 SSBN，计划将在未来 10 年逐渐替换掉所有苏联时期潜艇。941 型(台风级)SSBN 已被改造为潜射弹道导弹(SLBM)试射平台，但并未携带核弹头。[23]

俄罗斯 SSBN 舰队目前主力舰为 6 艘 667BDRM 海豚级战略核潜艇(北约代号：德尔塔 IV 级)，隶属俄罗斯北方舰队。一艘海豚级 667BDR 在 2017 年完成漫长的大修，归队后并入俄罗斯北方舰队。[24]

为取代老旧苏联时代 SSBN，俄罗斯正在建造“北风之神”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舰队(955/A 型)。其中 3 艘已于 2015 年末投入使用:2 艘隶属太平洋舰队，1

艘隶属北方舰队。7 艘改进型正在建造中，称为北风之神 A(955A 型)，预计将在 2019 年及随后 10 年陆续交付。每艘北风之神级 SSBN 将携带 16 枚 RS-56 布拉瓦(SS-N-32)潜射弹道导弹。俄罗斯的目标很可能是维持一支同美国规模相当的 SSBN 舰队。

非战略核武器

截至 2019 年 1 月，俄罗斯非战略武装部队共装备约 1830 枚弹头。这一数据同美国特朗普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 NPR 中公布的“接近 2000 枚”的描述十分吻合。按照 NPR 的分析，俄罗斯“核武库中此类弹头的数量稳步提升，同时核投送能力显著增强”。俄罗斯生产、部署、试射陆基巡航导弹，违反了[1987 年苏美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INF 条约)](见下文)。[25]

俄罗斯大力发展非战略核武器，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常规军事力量的短板。俄罗斯核战略体系中非战略核武器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包括俄罗斯可能会先发制人，都已经有过大量相关论述。例如，NPR 就表示，俄罗斯威胁首先使用有限核武，暗示着一种错误的预期，即胁迫性或首先使用有限核武可使美国和北约瘫痪，并以此迫使冲突的天平倒向有利于俄罗斯的一方。[26]然而，一些评论人士认为，美国国防部对俄罗斯使用此类武器的意愿有点杞人忧天了。[27]

俄罗斯继续发展核常通用武器也表明俄军继续将非战略核武视为其军事战略的重要环节。近年来，俄海军最大动作就是部署新型远程口径对地攻击型导弹海基核版本，即 3M-14 (SS-N-30A)。[28]虽然常规版正在大规模列装俄军舰船和潜艇，诚然部署速度不及预期，但一线主力核动力攻击潜艇(如阿库拉级，奥斯卡级，亚森级和塞拉类)都将部署口径导弹海基核版本，以取代 S-10 石榴石(SS-N-21) SLCM。[29]据报道，俄罗斯研发增程版 3M-14，代号口径-M。[30]

据估计，俄罗斯海军共装备约 820 枚非战略核武器弹头，包括对地攻击型巡航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反潜火箭、深水炸弹，以及舰艇、潜艇和海军航空兵装备的鱼雷。

3M-55 宝石(SS-N-26)潜射弹道导弹已被计入俄非战略核武库，因为 NSACI 认为其具备“核可能”，并指出 3M-55 已被用于潜艇、舰艇和海防部队(见表 6.3)。[31] 3M-55 型将取代核常通用的 SS-N-9 (P-120)、SS-N-12 (P-500)和 SS-N-19

(P-700)反舰巡航导弹。[32]

俄罗斯空军估计共有 530 颗核武弹头，装备在图-22M3(逆火)中程轰炸机、苏- 24M(击剑手 D)战斗轰炸机和新式苏-34(后卫)战斗轰炸机。新型具备核能力的空地导弹（Kh-32）正在研制中，以取代图-22M3 上使用的 Kh-22N（AS-4）。[33]俄罗斯空军也在研制一种超音速空基弹道导弹。[34]2018 年 5 月，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 10 架米格-31 飞机搭载匕首导弹执行“试验性作战任务”。[35] 2018 年 6 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对匕首试验性作战任务状态表示质疑，并坚称导弹只在南部军区装备。[36] 据估计，具备核常双重打击能力的俄罗斯 S-300 和 S-400 防空部队、莫斯科 A-135 导弹防御系统和海防部队(装备量很少)共装备约 385 枚核弹头。上述所有部队均已完成现代化。[37]

据估计，俄罗斯短程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共装备约 85 枚核弹头。[38]陆基非战略核武装力量包括具备核常双重打击能力的伊斯坎德尔-M(SS-26)短程弹道导弹，已完成 10 个以上导弹旅的列装工作，取代圣甲虫导弹(SS-21)。2004 年开始部署，到 2018 年底，伊斯坎德尔已完成 10 个旅的部署任务，其中包括西部战区 5 个旅、中部战区 2 个旅和东部战区 3 个旅。西部战区的第 6 个旅刚开始升级工作，东部战区第 4 旅换装工作正有序推进，伊斯坎德尔旅总数将达到 12 个。[39]

陆军非战略核武器还包括一种新型核常兼备 GLCM，称为 9M729（SSC-8），为伊斯坎德尔 M 家族 9M728（SSC-7）的改进型。美国称俄新型巡航导弹违反了《中导条约》。[40]俄罗斯拒绝这一指控。

1 本节数据基于作者评估。

2 俄罗斯核武储存设施最新概况，见波德维格•P 和塞拉特•J,“把核武锁起来：欧洲非战略核武零部署”(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日内瓦，2017)。

3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部声明”，2018 年 2 月 5 日。关于新 START 概要及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3 节。同时见本卷第 7 章第 2 节。

4 国际文传电讯社，2018 年，俄罗斯三位一体核威慑中空基核威慑由 5 架战略轰炸机实施，2018 年 12 月 23 日(俄文);阿什利•R，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公开声明:全球威胁评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18 年 3 月 6 日，第 12 页。

5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图波列夫公司获得了一份深度现代化 Tu-95MS 战略导弹的国家合同，2018 年 8 月 13 日(俄文)。

6 俄罗斯国防部，未来几年，整个图-160 战略轰炸机中队将被现代化的导弹航母所取代，2017 年 11 月 16 日(俄文)。

7 塔斯社，[PAK DA 和图-160M2 的秘密：俄罗斯之盾威力几何？]，2017 年 12 月 22 日(俄语)。

8 俄罗斯国防部，[从俄罗斯联邦机场飞往委内瑞拉共和国国际机场的远程飞机]，2018 年 12 月 10 日(俄语)。

9 俄罗斯国防部，[莫斯科，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领导下，国防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举行]，2018 年 12 月 18 日(俄语)。

10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2017 年 7 月)，第 27 页。

11 纳斯汀•P，[战略导弹部队指挥官下达 2019 年任务]，俄罗斯红星电视台，2018 年 12 月 18 日(俄语)。

12 塔斯社，[取代“撒旦”:为什么俄罗斯最强大的火箭要退役]，2018 年 3 月 12 日(俄语)。

13 阿扎诺夫•R，“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是俄决定性的防御力量”，塔斯社，2017 年 12 月 19 日。

14 吉洪诺夫•A， [被它们捕获，丝毫不意外]，《红星报》，2018 年 5 月 28 日(俄语);俄新社，[战略导弹部队指挥官宣布完成泰吉尔连接的重新武装]，2018 年 3 月 29 日电(俄文)

15 作者评估基于卫星图像。

16 塔斯社[信源:2027 年前，先锋将在国家武器装备序列中取代 Rubezh]，2018 年 3 月 22 日 (俄语)。

17 美国国防部(DOD),导弹防御计划回顾 2018(DOD:华盛顿特区,2018),第 7 页。有关先锋项目历史资料，见波德维格•P，“先锋系统正在测试，据说已经完全准备好部署”，俄罗斯核武装力量，2018 年。

18 塔斯社[信源:第一批先锋系统将于 2019 年投入使用]，2018 年 10 月 29 日(俄语);
塔斯社，“先锋高超音速导弹系统将于 2019 年装备巴罗夫斯基师”，2018 年 12 月 17 日。

19 克拉姆尼克•I，“先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战略武器问题”，《消息报》，2018 年 12 月 29 日(俄语)。

20 塔斯社，[高超音速导弹系统“先锋”:档案]，2018 年 7 月 19 日(俄语)。

21 见俄罗斯国防部，“战略导弹部队负责将亚尔斯导弹系统撤至阵地”2018 年 12 月 11 日(俄语)。

22 格里什琴科•N，[俄罗斯大规模发射洲际导弹]，《俄罗斯日报》，2018 年 10 月 26 日(俄语)。

23 萨拉诺夫•V，退役“阿库拉”：俄罗斯为何放弃最大的潜艇，俄新社，2018 年 1 月 24 日(俄语)。

24 《今日海军》，“俄罗斯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梁赞号重新服役”，2017 年 2 月 16 日。

25 美国国防部 (DOD)，2018 年核态势评估(DOD:华盛顿特区，2018 年 2 月)，第 9 页。

26 美国国防部(注 25)，第 30 页。

27 见奥利克•O，“莫斯科的核谜题:俄罗斯的军火库到底瞄准谁?”，《外交事务》，第 97 卷，第 6 期(11 月/12 月，2018);泰尔特雷•B，“俄罗斯的核政策:为错误的原因担忧”，《生存》，第 60 卷，第 2 期(2018 年 4 月)，第 33-44 页;文布鲁斯加德•K，“俄罗斯降低核门槛就是一个神话”，《岩石战争》，2017 年 9 月 22 日。

28 人们对通常所说的 Kalibr-口径导弹命名相当混乱。Kalibr-口径实际并不是导弹，而是一系列武器，除 3M-14（SS-N-30/A）陆上攻击版本外，还包括 3M-54（SS-N-27）反舰巡航导弹和 91R 反潜导弹。更多详情见美国海军，海军情报办公室（ONI），俄罗斯海军：历史性转变（ONI:华盛顿特区，2015 年 12 月），第 34-35 页；美国空军，国家航空和航天情报中心（注 10），第 37 页。

29 科特•A，(击沉“尼米兹”:为什么俄罗斯巡航导弹潜艇是危险的)，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 2018 年 3 月 28 日(俄语)。

30 “俄罗斯正在研制射程超过 4500 公里的新型 Kalibr-M 巡航导弹:信源”，2019 年 1 月 8 日。

31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注 10)，第 37 页。

32 美国海军，海军情报办公室(注 28)，第 34 页。

33 美国国防部(注 25)，第 8 页。

34 塔斯社，“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试射 Kinzhal 高超音速导弹”，2018 年 3 月 11 日。

35 俄罗斯国防部，[由 10 架携带高超音速导弹“匕首”的米格-31，执行远程拦截实验战斗任务]，2018 年 5 月 6 日(俄语)。

36 俄罗斯电视台 1 台，“普京打消人们对俄罗斯新型“超级武器”的质疑”，2018 年 6 月 7 日。
翻译自俄语，《BBC 监听》。

37 诺维奇科夫•N，“俄罗斯国防部长总结 2017 年现代化进展”，《简氏防务周刊》，2018 年 1 月 4 日。

38 这一估计是基于 SIPRI 年鉴 2018 修订数据。新估算较低是基于弹头分配调整之假设。但作者估计，由于部署了更多的发射平台，弹头数量正在增加。

39 作者根据卫星图像观察作出评价。

40 美国国务院军控核查与合规局，“INF 条约:概览”，简报，2017 年 12 月 8 日，第 1 页。关于 INF 条约摘要及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3 节。关于 INF 条约争议见本卷第 7 章第 2 节;凯尔•S，“俄美核军控与裁军”，SIPRI 年鉴 2018，第 321-24 页。

第 3 节.英国核武装力量

香农•N•凯勒 汉斯•M•克里斯腾森

截至 2019 年 1 月，英国核储备约有 200 枚核弹头(参见表 6.4)。英国 2015 战略防御与安全审查(SDSR)表示，英国政府再次重申其决定削减核武库规模。英国战备态核武弹头数量已减至 120 枚一下。2025 年左右，英国核武库整体规模含非战备态弹头，将降至 180 枚以下。[1]

英国核威慑力量完全由海基力量组成:4 艘先锋级三叉戟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2]按照英国持续海上威胁(CASD)核态势要求，将保持 1 艘 SSBN 全天候战备值班巡逻。第 2 艘和第 3 艘可快速出海。由于需要轮转全面检修和维护，第 4 艘的出海时间会更长。

先锋级三叉戟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配备 16 枚 UGM-133 三叉戟 2D5 潜射弹道导弹(SLBM)。英国本身拥有导弹所有权，但可通过租赁方式同美国海军分享位于美国佐治亚州国王湾战略武器库的 58 枚三叉戟潜射导弹。[3] 2010 年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SDSR)的限制下，先锋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在巡逻时装备不超过 8 枚导弹和 40 枚核弹头。[4]导弹处于“去目标化”模式(即目标数据需要在发射前加载至制导系统)和降低警戒等级，这也意味着发射导弹需要提前几天发出通知。[5]

三叉戟替代项目

2016 年，英国下议院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一项动议，支持英国政府 4 艘新型潜艇“以旧换新”替换 4 艘先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6]尽管承认英国 he 威慑力量将“如同过去的 60 年一样，对今天的英国安全至关重要”，但动议并未最终批准上述潜艇更新计划。为严格控制成本，英国政府先前曾宣布，将分阶段批准此项投资，而非单一的“一揽子”决议。[7]

被称为“继任者”的新型潜艇与先锋级潜艇类似，弹舱将设计 12 具导弹发射筒，较先锋级的 16 具有所削减。为节约成本，英美海军将联合开发通用型导弹舱室，新舱室也将随后装备在新哥伦比亚级 SSBN。2018 年，有报道称，舱室导弹发射管制造存在技术问题。[8]三叉戟 2D5 导弹更换并未计入无畏号研制和采

购计划。但是英国正在参与美国海军当前项目，即将三叉戟 II D5(D5LE)导弹延寿至本世纪 60 年代初期。[9]

无畏级潜艇原计划 2028 年开始服役，但现在调整至 2030 年后。推迟服役为 2015 年 SDSR 宣布的拓展研发和军购计划的一部分，先锋级 SSBN 服役时间相应延长。[10]

2015 年 SDSR 重申，至少在本世纪 30 年代末之前，无需为三叉戟 II 导弹换装英国制造的霍尔布鲁克弹头。预计议会将在 2019-20 年就新弹头作出决定，并继续换代研发。[11]研发工作英美就弹头安全、制造技术等方面开展联合研发，打造成联合研发样板工程。[12]同时，英国原子武器研究所(AWE)已开始实施一项计划，改进霍尔布鲁克弹头性能并延长服役周期。霍尔布鲁克弹头以美制 W76-1 弹头为蓝本，并与美国核武器实验室合作，使用美国 Mk4A 分导技术。耗资巨大的无畏级潜艇计划，从一开始就处在风口浪尖。[13]2015 年，英国国防部(MOD)估计无畏级潜艇总成本为 310 亿英镑(474 亿美元)，并预留了 100 亿英镑(153 亿美元)储备资金，以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增长。[14]2018 年 3 月，MOD2018-19 年预算从应急基金中划拨 6 亿英镑(8 亿美元)追加资金，以保证无畏计划如期进行。[15] MOD 在 2018 年 12 月向议会提交的最新报告中表示，无畏级潜艇开发、设计和早期制造阶段共花费 55 亿英镑(73 亿美元)。[16]

表 6.4 2019 年 1 月英国核力量

型号	名称	部署数量	首次部署年份	射程（公里）a	弹头当量	弹头数量
潜射弹道导弹 b						
D5	民兵 2	48	1994	＞7400km	1-8X100 千吨 c	200d

kt=千吨

a 飞机航程只用于说明问题；真正的作战航程在机型和武器载荷的不同条件下，各有不同。

b 在役 SSBN 共搭载不超过 8 枚三叉戟 II 导弹和 40 枚核弹头。永远保持一艘潜艇在任何时候处于战斗值班状态。

c 英军版弹头被称为霍尔布鲁克，为美国 W76-1 弹头的改进版，可进行当量调减。

d 目前库存的 200 枚弹头中，共有部署态 120 枚核弹头。到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将核弹头武库数量减少至 180，目前正在推进之中。

资料来源:英国国防部，白皮书，新闻稿及网站;英国下议院，英国议会议事录，各种问题;《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及作者估算。

根据 2018 年的一份非政府机构报告，鉴于无畏级项目成本、时间双超支，现有预算规模已很难覆盖，继而将在 2025 年后对 MOD 装备预算产生巨大的压力。[17] 2018 年 5 月，英国国家审计署报告称 MOD 国防核计划面临 29 亿英镑(计 39 亿

美元)的“负担能力差距”。这一数字包括无畏级潜艇和新型核动力攻击型潜艇，以及相关生产、运营和维护以及潜艇退役费用。[18]

1 英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与战略防御及国防安全评论 2015:一个安全与繁荣的英国”，Cm 9161(文具公用局:伦敦，2015 年 11 月)，第 4.66 段。

2 HMS 先锋级于 1994 年 12 月服役，而最后一艘复仇者级 2001 年 2 月服役。米尔斯•C，《取代英国战略核威慑:无畏级的进展》，简报 8010(英国下议院图书馆:伦敦，2018 年 5 月 22 日)，第 9 页。

2 “先锋号”于 1994 年 12 月服役，而最后一艘“复仇号”于 2001 年 2 月服役。米尔斯•C，“英国战略核威慑力量换代：无畏级的进步”，简报 8010（下议院图书馆：伦敦，2018 年 5 月 22 日），第 9 页。

3 埃里森•G，“不，美国并未控制英国核武器”，英国国防杂志，2017 年 7 月 20 日。

4 英国政府，“在一个不确定性时代保护英国:战略防御与安全评论》，Cm 7948(文具公用局:伦敦，2010 年 10 月)，第 538 页。

5 英国政府，“英国核威慑:你需要知道什么”，政策文件，2018 年 2 月 19 日更新。

6 英国议会，下议院，“英国核威慑力量”，汉萨德上校，第 559 卷，第 613 期，2016 年 7 月 18 日。

7 英国政府(注 1)，第 4.75 段。

8 里昂•D，“哥伦比亚级导弹管的焊接问题比 BWXT 想象的更为严重”，《国防日报》，2018 年 11 月 8 日。

9 米尔斯(注 2)，第 7 页。

10 英国政府(注 1)，第 4.65 段。

11 英国国防部，“英国未来的核威慑:无畏级计划”，2017 年议会更新，2017 年 12 月 20 日，第 2 页。

12 英国国防部(注 11)。

13 英国国防部，“英国未来的核威慑力量”，2018 年议会，2018 年 12 月 20 日，第 3 页;核信息服务，“AWE: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2016 年 6 月，第 26-28 页。

14 英国政府(注 1)，第 4.76 段。

15 梅塔•A 和丘特尔•A，“英国追加资金，但军事方面的挑战依然存在”，《国防新闻》，2018 年 3 月 29 日。

16 英国国防部(注 13)，第 3 页。较 2017 年，总额增加了 13 亿英镑(17 亿美元)。

17 芬威克•T，“预算飙升:三叉戟对英国国防的成本风险”(英美安全信息委员会:伦敦，2018 年 9 月)。

18 英国国家审计署(NAO)，国防核企业:前景展望，审计长报告，HC 1003, 2017-2019(NAO:伦敦，2018 年 5 月 22 日)。据估计，国防核项目支出约占 2018-19 年国防预算总额 14%。

第 4 节.法国核武装力量

香农•N•凯勒 汉斯•M•克里斯腾森

法国核武库有大约 300 枚核弹头，近年来一直稳定在这一水平。弹头装备 48 枚潜射弹道导弹(SLBM)和 54 枚陆军和海军战斗机空基巡航导弹(ALCM)(见表 6.5)，构成了法国战略和战术核武能力。[1]

法国核威慑力量的中坚力量来自于战略海洋部队(FOST)。主要由 4 艘凯旋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组成，每艘潜艇装备 16 枚潜射弹道导弹。凯旋级 1997 年列装，取代先前的可畏级潜艇。法国海军保持连续海上核威慑态势，保持在任何时候都有一艘导弹核潜艇处于战斗值班状态。自 1972 年建立 FOST，法国已完成 500 次战略核威慑潜艇巡逻。[2]

法国继续推进其导弹核潜艇部队及配套核弹头现代化。2018 年 7 月，法国海军完成了凯旋级潜艇改装，以便搭载 M51 导弹，取代老迈的 M45。[3]M51 共有两个版本。M51 最多可搭载 6 枚 TN-75 分导弹头，单枚当量 10 万吨。改进型 M51.2，行程更大、精度更高，已被证实在 2016 年服役，2017 年形成完全战力。[4]M51.2 是为了搭载新型隐身海洋核弹头(TNO)，据报道当量可达 15 万吨。[5]据信，导弹弹头数已被压缩，以提升打击灵活性。法国已经开始精度更高的改进型 M51.3 的研发，计划 2025 年形成战力。[6]

法国正着手下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初步设计工作，命名为 SNLE 3G，将装备 M51.3。计划建造 4 艘，首舰计划 2023 年开始建造。[7]其目标就是于 2035 年前，完成对凯旋级潜艇的换装。[8]

法国核力量空基骨干机型为陆军和空军战斗机。具备核投送能力的幻影 2000N 在 2018 年 8 月退役后，陆军中队目前就只剩下阵风 BF3 一根独苗。[9]所有阵风 BF3 通常都驻扎在圣迪泽尔空军基地。法国海军还在戴高乐航母部署了一个阵风 MF3 战斗机中队。

阵风战机装备了增程版空地导弹(ASMP-A，改进型中程空地导弹)，2009 年服役。法国生产了包括试射导弹在内的 54 枚 ASMP-A。[10]ASMP-A 中期改款定于 2020。导弹装备空基核弹头(TNA)，据报道最大当量 30 万吨。[11]法国武装部已经开始研究新型导弹，第四代空基导弹(ASN-4G)，具备更强的隐身性和机动性，以应对空

防技术的潜在进步。[12]

2018 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重申，法国政府致力于法国海空核威慑力量远期现代化。[13]2018 年 7 月，议会批准后，马克龙签署了 2019-2025 年军事规划法。[14]

表 6.5 2019 年 1 月法国核力量

型号	部署数量	首次部署年份	射程（公里）a	弹头 x 当量	弹头数量
陆基飞机					
阵风 BF3b	20	2010-2011	2000	1x300 千吨空基核弹头	40
航母舰载机					
阵风 MF3	10	2010-2011	2000	1x300 千吨空基核弹头	10
潜射弹道导弹 c					
M51.1	32	2010	＞6000	4-6x100 千吨 TN-75 弹头	160d
M51.2	16e	2016	＞6000f	4-6x100 千吨 海基核弹头	80
M51.3g	0	（2025）	＞（6000）	至 6x150 千吨 TN-75 核弹头	0
预备					10g
总计					300h

( ) =数据不确定; kt=吨; TNA=空基核弹头; TNO=海基核弹头。
a 飞机航程只用于进行说明；真正作战航程取决于机型和武器载荷，各有不同。
b 阵风 BF3 携带 ASMP-A 空基巡航导弹。幻影 2000N 于 2018 年 8 月正式退役。计划在 2020 年对 ASMP-A 进行中期升级。
c 法国产潜射弹道导弹(SLBM)只够装备 3 艘现役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第四艘 SSBN 可能会在任何给定时间进行检修和维护工作。M45SLBM 于 2016 年退役。
d 虽然 M45 和 M51SLBM 都可携带多达 6 枚弹头，但为提高目标的灵活性，据信已经将弹头数量减少。
e 法国海军正从 M51.1 过渡到 M51.2。2017 年 12 月，武装部队部长佛罗伦萨・帕利表示，M51.2 已经投入使用。
f 据法国国防部称，M51.2 射程远超 M51.1。
g M51.3 正在研发中，尚未列装。
h 奥朗德总统已在 2015 年 2 月的演讲中，明确法国核弹头数量上限为 200 枚。
资料来源:奥朗德•F，关于核威慑的演，参观战略空军，2015 年 2 月 25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国防与国家安全的演讲，2008 年 6 月 17 日; 无畏号核动力弹道导弹核潜艇下水仪式，演讲，瑟堡，2008 年 3 月 21 日；希拉克,法国总统，在访问战略部队时的讲话，2006 年 1 月 19 日，兰迪华・勒・朗格，布列斯特;法国外交部，各类出版物;法国国民议会,各种国防法案;《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和作者估算评估。

该法案拨款 370 亿欧元(437 亿美元)用于法国核武力量维护和现代化。[15]这也标志着法国在 2014-19 年 230 亿(271 亿美元)核武及相关设施拨款的基础之上，大幅度追加资金。[16]按照新法案核武拨款计划，2019-23 年总资金耗费将达到 23 亿欧元(271 亿美元)。[17]

1 奥朗德•F，法国总统弗朗索瓦，核威慑力量演讲：视察战略核武装力量，2015 年 2 月 25 日。法国认为其所有核武器都是战略性的，无论其射程。

2 法国武装部队，第 500 次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巡逻，2018 年 10 月 12 日。

3 海军认证网站，“法国海军最后一艘 SSBN”“鲁莽号”升级为 M51 潜射弹道导弹;格罗泽劳•V，布雷斯特：SNLE 鲁莽号重新下水服役， 《海洋》，2018 年 7 月 19 日。第四艘潜艇，可惧号，在其建造期间为 M51 导弹配备了发射管。

4 法国武装部队，武装部队部长弗洛伦斯•帕利在阿里安格鲁穆罗工厂发表演讲，第 6 页；法国武装部队，2016 年 9 月 20 日，第 6 页；[凯旋级/M51 SSBN 武器系统在作战条件下验证]新闻发布，2016 年 9 月 20 日更新。

5 海军认证(注 3)。

6 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弗罗伦斯•帕利演讲(注 4)。

7 格罗泽劳•V，“下一代法国 SNLE 建设将于 2023 年启动”，2018 年 10 月 22 日。

8 奥朗德(注 1);勒德里安•J•Y，法国国防部长，“威慑力量 50 周年会议闭幕讲话”，法国国防部，巴黎。

9 法国武装部队，“空中威慑完全失效”，2018 年 9 月 5 日;休伯多•E，“告别幻影 2000N”，Air & Cosmos 网站，2018 年 6 月 22 日。

10 奥朗德(注 1)。

11 法国武装部队，军事规划法，2019-2025 年，新闻材料，2018 年 2 月，第 41 页。

12 法国武装力量，“核威慑”，2018 年 6 月 14 日，第 1 页;德兰•P，“法国研究核导弹替代”，《国防新闻》，2014 年 11 月 29 日。

13 马克龙•E，法国总统奥朗德，[关于国防政策的挑战和优先事项的讲话]，土伦，2018 年 1 月 19 日。

14 法新社，马克龙签署《2019-2025 军事规划法》，《费加罗报》，2018 年 7 月 13 日。

15 法新社，“法国将斥资 370 亿欧元升级核武库”，法国 24 台电视台，2018 年 2 月 9 日。7 年间批准的国防预算总额为 2950 亿欧元(3480 亿美元)。

16 [2014 - 2019 年军事规划法]，法国法令 No.2013-1168，2013 年 12 月 18 日

17 武装部队(注 11)。

第 5 节.中国核武装力量

香农•N•凯勒 汉斯•M•克里斯腾森

中国核武库规模维持在约 290 枚核弹头的总量，规模缓慢攀升。陆基、海基弹道导弹约为 250 枚弹头，其余分配给非现役部队，剩余弹头存储于非作战部队，包括正在开发的新系统，和未来在数量上将有所增加的实战体系和战备体系（见表 16.6）。中国也可能也具备一些核空袭能力(见表 6.6)。据信，中国核弹头与载具分离，即单独储存，不能实时发射。[1]

中国继续推进其核武现代化进程并适度扩大核武库规模，这是一项长期的计划，其目的就是发展更具生存能力、更具打击力的核武力量，这也符合中国可靠核报复战略方向。中国政府声称其目标为，通过提高“战略预警、指挥控制、快速反应、生存和保护”能力，“加强(中国的)战略威慑和核反击能力”。[2]同时，中国将弹道导弹防御、天基武器和精确制导常规打击系统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应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新技术研发。[3]

中国政府对国家核武装力量进行了重组，这也是军队指挥系统精简和武器装备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举措。2016 年初，组建中国第 4 大军种，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火箭部队(PLARF)。[4]PLARF 为中国三位一体核武装力量的指挥机构，并负责中国核弹头监管和操作控制。[5] PLARF 拥有中国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指挥权，同时负责维护核弹头和陆基导弹的存管和操作控制，以满足“全域战略威慑覆盖”的要求。[6]

中国官员强调，国家核指挥体系重组并不意味着其核政策或核战略发生改变。中国仍将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承诺将“核能力保持在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7]中国政府也无任何暗示其将改变长期奉行的核政策，即在和平时期保持低警戒水平的核力量，尽管中国军方内部出现一种声音-中国应提高警戒级别，并向更为主动的预发射姿态转变。[8]

路基弹道导弹

随着新型移动固体燃料模块取代日益老迈的井基液体燃料导弹，中国陆基弹道导弹核武库正逐步实现现代化。向生存能力更强的机动导弹的转变，是出于对

美国情报、监测和侦察能力(ISR)能力的现实担忧，以及精确制导常规武器对导弹固定发射阵地和及配套设施具备先发威胁。[9]

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中国军事发展年度报告，美国国防部(DOD)估计，2018年中国共部署75-100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10]DOD估算同上年无变化。井基两级液体燃料东风(DF)-5A和公路机动三级固体燃料DF-31A，是目前中国射程最长的洲际弹道导弹，也是中国唯一能覆盖美本土全境的弹道导弹。

中国正在研发新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公路机动型、三级固体燃料助推东风-41，估计射程可超过12000公里，同时也在研发其铁路机动和井基版。[11]据报道，2018年5月27日，PLARF从中国北方太原航天发射中心试射了一枚东风-41，飞行数千公里后击中位于西部戈壁靶场。这也是2012年以来，该系列导弹的第10次已知飞行试验。[12]试射成功也使得人们纷纷推测，东风-41已即将服役。[13]

表6.6 2019年1月中国核力量

型号/中国名称（美国名称）	部署数量	首次部署年份	射程（公里）a	弹头载荷	弹头数量b
陆基导弹c	129d				186
东风-4(CSS-3)	5	1980	5500	1x3.3Mt	10
东风-5A(CSS-4改进型1)	10	1981	12000+	1 x 4－5 Mt	10
东风-5B(CSS-4改进型2)	10	2015	12000	3x200 – 300 kt	30
东风-5C(CCS-4改进型3)	…	…	…	MIRV	…
东风-15(CCS-6 改进型1)	…	1994	600	(1 x 10－50 kt)	…e
东风-21(CSS-5 改进型2)f	40	1991	2100f	1x200-300kt	80
东风-21(CSS-5改进型6)	8	2016	2100	1x200-300kt	16
东风-26（CSS-…）	16	（2017）	＞4000	1x200-300kt	16
东风-31(CSS-10改进型1)	8	2006	＞7000	1x200-300kt	8
东风-31A(CSS-10改进型2)	32	2007	＞11200	1x200-300kt	32
东风-31AG(CSS-10改进型…)	…	（2018）	…	…	…
东风-41(CSS-X-20)	…	（2019）	（12000）	MIRV	…
海基导弹g	48				48h
巨浪-2(CSS-NX-14)	48	（2016）	＞7000	1x200-300kt	48
战斗机i	（20）				（20）
轰-6(B-6)	(20)	1965	3100	1x 炸弹/（ALCM）j	(20)
轰-20（B-20）	…	（2030）	…	…	…
强击机（..）	…	1972-…	…	1x炸弹	…

巡航导弹 k	…				…
(CJ-20 ALCM)	…	（2014）	＞1500	1x…	…
(SLCM)	…	…	…	1x…	…
总计	197				2901

- =无数据或不适用；（）=数据不确定；ALCM=空基巡航导弹;GLCM=陆基巡航导弹；kt=千吨；Mt=百万吨；SLBM=潜射弹道导弹

a 飞机航程只用于说明问题，真正的作战航程各有不同。

b 估计每具发射装置均搭载 1 枚核弹头，除 DF-5B，经评估可搭载 3 枚核弹头。一般情况下，核弹头均处于集中存储态，而并非部署在发射平台。所有估算数据均为大致估算值。

c 中国将导弹射程定义为短程导弹射程小于 1000 公里；中程导弹射程为 1000-3000 公里;远程导弹射程为 3000-8000 公里；洲际导弹射程大于 8000 公里。

d 只将核武发射装置平台计入数据，其中一些发射平台可搭载多枚弹头。

e 美国中情局 1993 年得出结论，中国“几乎可以肯定”已经为 DF-15 研发了一款弹头，尽管无法确定是否已经列装。

f 东风-21 改进型（CSS-5 1 型和 2 型）的射程据认为比通常报告 1750 公里要远，而其原型弹 CSS-5 改 1 已经退役。

g 2018 年推出的第五款 094 型 SSBN 尚未投入使用。

h 这一估算是基于中国已经为 094 级(晋级)核潜艇的巨浪-2 型潜射弹道导弹生产出核弹头。目前还没有权威消息表明，中国潜射弹道导弹已装备核弹头。

i 美国国防部 2018 年报告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已重新分配核任务。中国核武器试验计划(在试验中使用战斗机)中，轰-6 被用来投送核武器，而核炸弹的模型则陈列在军事博物馆。新轰-20 预计具有核能力。

j 2018 年，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称，中国正在研制两型空基弹道导弹，其中一种可能有核载荷。

k 美国政府官方文件对中国可能的核巡航导弹前后说法并不一致矛盾。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 2013 年将 CJ-20 列为具有核能力。2013 年，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将 CJ-10 列为“核常兼备”，但在 2017 年又将 CJ-10 列为常规武器。

l 据估计，中国核弹头总储量约为 290 枚弹头，而且正在缓慢攀升，除了 270 枚弹头被认为分配给作战部队外，估计还有 20 枚弹头正在储存或生产中，以装备更多的东风-26 和新型东风-41，这些弹头可能将取代一些较老旧的东风-21 和东风-31。

资料来源：美国空军，美国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历年；美国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历年；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历年；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美国中央情报局各类文件；克里斯滕森 H. M，诺里斯 R. S，麦克金兹 M. G，《中国核力量与美国核战争计划》（美国科学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华盛顿特区，2006 年 11 月）；“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谷歌地球；作者估算和评估。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已对少量 ICBM 进行改装，使其具备可搭载多弹头分导弹头(MIRV)的能力。中国已优先部署 MIRV 提升突防能力，以应对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至少是可制衡印度和俄罗斯的导弹防御技术。[14]中国对 80 年代初服役的液体燃料井基东风-5A 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改进，以便能够搭载分导弹头。[15]东风-5A 衍生版，即东风-51 改进型东风-5B，已确信具备分导能力。[16]其改进二型东风 5C，据报道已在 2017 年携带 10 枚假体弹头进行了飞行测试。[17]在老迈的东风-5B 上部署分导弹头不过是权宜之计，其背后是公路机动型东风-41 研发的滞后。[18]东风-41 可携带 6-10 枚分导弹头，虽然其实际能力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19]同样，也有未经证实的报道指出，东风-31A 洲际弹道导弹的改进型东风-31AG 可装备分导弹头。[20]然而，分导弹头需要对东风-31A 进行重大修改，按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NASIC)的说法，东风-31A 只能携带一枚弹头。[21]

因此东风-31AG 很可能是现役东风-31A 的改进型。

2018 年，PLARF 宣布部署新型东风-26 中程弹道导弹(IRBM)，该型导弹能够对地面目标实施常规或核打击，同时也可对海面舰船进行常规打击。[22]东风-26 估计最大射程超过 4000 公里并覆盖包括美国关岛在内的西太平洋军 事目标。[23]

PLARF 目前部署了一型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DF-21 为两级固体燃料助推机动导弹，于 1991 年首次列装。其改进型 DF-21A 自 1996 年开始部署。[24]美国国防部报告显示 DF-21 的新版本于 2016 年部署。[25]

弹道导弹核潜艇

中国继续奉行发展和部署海上核威慑力量的长期战略目标。根据美国国防部 2018 年中国军力年度报告，中国海军(PLAN)目前已有 4 艘 094 型 SSBN 在役。[26]第 5 艘船体结构有所改良，2018 年正式亮相，第 6 艘可能正在建造之中。[27]鉴于现役 094 和下一代 096 舰(见下文)的预期寿命，PLAN 可能会同时有两型 SSBN 同时在役。[28]

094 型 SSBN 最多可携带 12 枚三级固体燃料巨浪-2SLBM。巨浪-2 是东风-31 的海基版，其估计最大射程超过 7000 公里，据信搭载单一核弹头。2018 年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国防部确信 PLAN 已在 4 艘 094 型 SSBN 部署巨浪-2。[29]2018 年 2 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表示，“解放军海军第一次具备了远程海基核能力”。[30]

人们纷纷猜测，究竟何时 094 型 SSBN 将携带巨浪-2 核弹头 SLBM 开始核威慑巡逻。尽管 2016 年就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很快将开始核威慑巡逻，但时至 2018 年依旧没有证据证实。[31]美国国防部年度报告推测，自 2014 年起 094 实现带弹巡逻就已是箭在弦上，但 2018 年报告未提及此事。中国在 SSBN 上例行部署核武器，将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时期将核弹头集中储存做法的一次重大转向。

中国海军正在研发新一代 SSBN, 096 型潜艇。美国国防部在 2018 年表示，中国很可能在本世纪 20 年代初开始建造 096。[32]各种报道在设计参数上出入极大，但 096 较比 094 舰体更大、更安静、导弹发射管更多。

096 据传将装备巨浪-2 后续版本，巨浪-3SLBM。[33]新导弹技术据信为移植中国陆基版东风-41 洲际弹道导弹，其最大射程可能超过 9000 公里。据报道，2018

年 11 月 24 日，PLAN 在渤海海域从一艘经过改装的常规潜艇试射巨浪-3，这也是巨浪-3 型导弹的首次公开试射。目前，中国方面还未公开透露 096 型将携带多少枚导弹或将建造多少艘 096 型潜艇。[34]

空基核力量及巡航导弹

根据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力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解放军空军(PLAAF)目前并未赋予核任务。[35]这也是对 2017 年军力报告的更新，2017 年军力标高表述为“PLAAF 可能具备少量核能力”。[36] 中国军方正在建造其第一架远程战略轰炸机。[37] 该型战机被命名为轰-20，据报道轰-20 具备可媲美美 B-2 的隐身性能。[38] 专家分析，轰-20 将于 20 年代初期首飞，2025 年左右开始批量生产。[39]

当前，解放军共部署数型陆基、海基核空基巡航导弹。NASIC 在其 2017 年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评估中，并未标注任何一型具备核能力的巡航导弹。[40] 此前 2013 年 NASIC 将陆基东海-10 (DH -10，也被称为长剑-10,CJ - 10)列入具备核常双重投送能力导弹序列。美国国防情报局(DIA)在其 2018 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正在研发两型空基弹道导弹，“其中一型可能装备核弹头”。[41]后被确定可能为东风-21 中程弹道导弹变种弹型，并被 DIA 指定为 CH-AS-X-13。[42]

1 斯托克斯•M•A,中国核弹头储运系统(2049 项目研究所:阿林顿，弗吉尼亚州，2010 年 3 月 12 日)，第 8 页;本•L,“中国为多边核裁军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今日军控》,第 41 卷第 2 期(2011 年 3 月)，第 17-21 页。

2 中国国务院，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北京，2015 年 5 月)，第 4 节。见路透社，“中国军方文件敦促增强核威慑能力”，2018 年 1 月 30 日。

3 萨尔曼•L，“中国高超音速滑翔计算”，SIPRI 评论，2017 年 8 月 15 日。

4 中国国防部，“中国建立火箭部队和战略支援部队”，2016 年 1 月 1 日。

5 吉尔•B 和黎明•A，“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部队:重塑中国战略威慑的方式”，《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第 73 卷第 2 期(2019 年 1 月);科尔德斯曼•A 和肯德尔•J，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部队：超越第二炮兵部队和核层面（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华盛顿特区，2016 年 10 月 13 日）。

6 中国国防部(注 4)。

7 新华社，“中国核政策，战略延续性:发言人”。见潘•Z，“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研究”，《和平与核裁军》，第 1 卷第 1 期(2018)，第 115-36 页。

8 见赫金博瑟姆•E，“中国不断发展的核威慑:美国的主要驱动力和问题”（兰德公司：加州圣莫尼卡，2017 年），第 131-33 页;古拉基•G，忧思科学家联盟，“中国军方呼吁保持核力量警惕”，2016 年 1 月。

9 奥康纳•S，“锋利的风: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现代化改变了威胁态势”，第 27 卷第 12 期(2015 年 12 月)，第 44-49 页。

10 美国国防部 (DOD)，“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8 年军事与安全”，国会年度报告(国防部:华盛顿特区，2018 年 8 月)，第 36 页。

11 孙•W，“中国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预计明年部署”，人民日报在线，2017 年 11 月 28 日;奥哈洛兰•J。“东风-41”，IHS 简氏武器:战略，2015 - 16(IHS 简氏:库尔斯顿, 2015)，第 21-22 页。

12 格茨•B。，“中国试飞新型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华盛顿自由灯塔报》，2018 年 6 月 6 日。

13 格茨(注 12);人民日报网站，“中国新型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跻身世界最先进导弹行列”，2018 年 6 月 8 日。

14 刘易斯•J，“迟来的拥抱，中国 MIRV”，M•克雷彭，T•惠勒和 S•梅森，“MIRV 武器的诱惑和陷阱:从第一核时代到第二核时代(史汀生中心:华盛顿，2016 年 5 月)，第 95-99 页。

15 美国国防部(注 10)，第 36 页。

16 奥哈洛兰(注 11)，第 7-8 页。

17 格茨•B，“中国测试搭载 10 枚分弹头的导弹”，《华盛顿自由灯塔报》，2017 年 1 月 31 日。

18 明尼克•W，“中国阅兵证明习已掌权”，《国防新闻》，2015 年 9 月 6 日。

19 奥哈洛兰(注 11)，第 21-22 页;格茨•B，“中国试飞新型多弹头导弹”，《华盛顿自由灯塔报》，2016 年 4 月 16 日;甘•N，“美国已触手可及:中国展示新型和改进型先进导弹系统”，《南华早报》，2017 年 7 月 24 日。

20 费舍尔•R，“中国媒体称，东风- 31AG 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携带多弹头”，《简氏国防周刊》2017 年 8 月 16 日第 9 页。

21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 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2017 年 7 月)，第 29 页。

22 邓•X，“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部队部署东风-26 弹道导弹”，《环球时报》，2018 年 4 月 26 日。

23 美国国防部(注 10)，第 31、49 页;威尔逊•J，“中国常规导弹打击关岛能力提升”，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参谋研究报告，2016 年 5 月 10 日，第 8 页。

24 奥哈洛兰(注 11)，第 15-17 页。导弹的两个后续版本被设计用于常规反舰和反介入/区域封锁(A2/AD)任务。

25 美国国防部 (DOD)，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 2016，国会年度报告(国防部:华盛顿特区，2016 年 5 月)，第 58 页。

26 美国国防部(注 10)，第 29 页。094 型 SSBN 被美国和北约命名为“晋”级。

27 塔特•A，“卫星图像显示葫芦岛部署有两艘 SSBN”，《简氏防务周刊》，2018 年 12 月 5 日第 6 页。

28 美国国防部(注 10)，第 76 页。

29 美国国防部(注 10)，第 76 页。

30 科茨•D，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声明:全球威胁评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18 年 2 月 13 日，第 7 页。
31 博尔格•J，“如遇中美关系紧张，中国将向太平洋派遣核潜艇”，《卫报》，2016 年 5 月 26 日。
32 美国国防部(注 10)，第 29 页。
33 邓普西•J 和博伊德•H，“超越 JL-2:中国研发潜射弹道导弹后续版本”，军事平衡博客，国际战略研究所，2017 年 8 月 7 日。
34 格茨•B，“中国试射新型潜射导弹”，《华盛顿自由灯塔报》，2018 年 12 月 18 日。
35 美国国防部(注 10)，第 77 页。
36 美国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 2017，国会年度报告(国防部:华盛顿特区，2017 年 5 月)，第 61 页。
37 中程战斗机是中国最早的核武投送平台，60 年代和 70 年代用战斗机进行过 12 次以上大气核试验。
38 塔特•A，“中国新型战略轰炸机技术要求细节浮出水面”，中国 H-20 战略隐形轰炸机（我们现在知道的一切），国家利益，2018 年 12 月 16 日。
39 美国国防部(注 10)，第 34、77 页;罗布林•S，中国 H-20 战略隐形轰炸机(我们现在知道的一切)，《国家利益》，2018 年 12 月 16 日。
40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注 21)。
41 阿什利•R，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公开声明:全球威胁评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第 8 页。
42 潘达•A，“中国核空基弹道导弹”，《外交官》，2018 年 4 月 10。

第 6 节.印度核力量

香农•N•凯勒和汉斯•克里斯滕森

据估计，印度共拥有 130-140 枚核武器(见表 6.7)。这一数字是根据印度武器级钚库存和在役核投送平台数量计算得出。人们普遍认为，印度正逐步扩大其核武库储备规模，同时也在大力推进其核弹头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武器级核武放射材料生产

印度核武被认为是基于单级钚内爆设计。钚是由孟买特罗姆贝的巴巴原子研究中心(BARC)40 兆瓦(MW(t))CIRUS 重水反应堆（该反应堆在 2010 年底被关闭）和 Dhruva100 兆瓦重水反应堆生产。据报道，印度计划在安得拉邦的维沙卡帕特南附近新建一座 100 兆瓦反应堆。[1]为提取钚，印度在 BARC 运营了一座武器级钚再处理工厂，并在其他地方设有三座军民两用钚分离工厂。[2]

印度原子能部门计划在 2039 年前，在三地建造 6 座双反应堆快速增殖反应堆。[3]此举将极大提升印度武器级钚生产能力。4 泰米尔纳德邦卡尔巴卡姆的英迪拉•甘地原子研究中心(IGCAR)，建成一座 500 兆瓦原型增殖反应堆(PFBR)。由于技术问题数次延迟，PFBR 预计将在 2019 年达到完全产能。[5]IGCAR 已经宣布，将在卡尔巴卡姆建造一个快速反应堆核乏料循环设施(FRFCF)以处理 PFBR 和未来快速增殖反应堆所产生的核乏料，工厂计划于 2022 年试车。[6]

印度目前正在扩大其铀浓缩能力。印度继续在迈索尔(卡纳塔克邦)Rattehalli 的稀有材料工厂(RMP)中小型气体离心机设施中进行铀浓缩，以生产高浓缩铀(HEU)作为军舰反应堆燃料。[7]印度已经开始在卡纳塔克邦建造一座新的工业规模离心机浓缩工厂，即特殊物质浓缩设施（SMEF）。这将是一座军民两用高浓缩铀生产设施。[8]印度不断扩大的离心机浓缩能力，其背后推手是建造军舰动力核反应堆计划。然而，工厂所生产的 HEU 同样也可以被用来制造热核武器或是裂变核武器。[9]

表 6.7　2019 年 1 月印度核力量

型号（美国/印度）	部署数量	首次部署年份	射程 a	弹头载荷 b	弹头数量 c
飞机 d	48				48
幻影 2000H	32	1985	1850	1x 炸弹	32
美洲虎 IS	16	1981	1600	1x 炸弹	16
陆基弹道导弹	60				60
大地-2	24	2003	250	1x12kt	24
烈火-1	20	2007	＞700	1x10-40kt	20
烈火-2	8	2011	＞2000	1x10-40kt	8
烈火-3	8	（2014）	＞3200	1x10-40kt	8
烈火-4	0	（2018）	＞3500	1x10-40kt	0
烈火-5	0	（2020）	＞5200	1x10-40kt	0
海基弹道导弹	14				16
丹努什	2	（2013）	350	1x12kt	4e
K-15（B-05）f	12g	2018	700	1x12kt	(12)
K-4	（4）h	…	3000	1x10-40kt	0
巡航导弹	…	…	…	…	…
无畏巡航导弹 i	…	…	（＞700）	…	…
总计					130-140j

…=无数据或不适用；（）= 数据不确定；kt=千吨。

a 飞机航程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根据飞机型号和武器负载的情况，航程各有不同。有时为了达到极限航程，不得不降低武器载荷。

b 印度核弹头当量尚不清楚。1998 年的核试验证明印度已经最高可达 1.2 万吨。从那时起，就有存在印度在不断提升弹头当量的可能性，可能提升至 4 万吨。尚无公开证据表明印度已经发展出两级热核弹头。

c 飞机和几型导弹都具双重性能。巡航导弹可搭载多枚弹头。作为估算，视作每具发射平台均配备一枚核弹头。核弹头并不装备在发射平台，而是保存在独立的储存设施中。所有估算均为近似值。

d 其他可能担负二次核打击任务的战斗机-轰炸机包括苏 30MKI。

e 丹努什导弹被认为是单弹头导弹。

f 一些消息来源将 K-15 潜射弹道导弹（SLBM）称为萨加里卡，这也是其导弹研发项目名称。

g K-15 和 K-4 在歼敌者号核动力 SSBN 才使用相同的 4 筒发射管。每个发射管可以容纳 3 枚 K-15，置于一个三连发装置，或是放置 1 枚体积更大的 K-4（一旦 K-4 投入使用）。 因此，根据美国空军国家航空和空间情报中心（NASIC），K-15 有 12 具发射器，而 K-4 有 4 具。

h 每根发射导管一旦部署到位，将装备 1 枚 K-4.

i 未经证实的报告表明，歼敌者级具备核投送能力。

j 将计划部署的弹头计算在内，印度弹头总储备约 130-140 枚。

资料来源：印度国防部，年度报告和新闻稿;国际战略研究所，2016 年军事平衡（劳特利奇出版社：伦敦，2016 年）；美国空军，国家航空和空间情报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 2013 年 5 月）；印度新闻媒体报道;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作者的估算和评估。

战斗机

战斗机是印度核打击能力中最为成熟的一环。据报道，印度空军已证实印度已将幻影 2000H 多用途战斗机作为核重力炸弹投送平台。[10]人们普遍猜测，印度空军美洲虎战斗机¬轰炸机可能也扮演着核投送角色。[11]

陆基导弹

1983 年起，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就开始其综合导弹发展计划，研发出两大系列陆基弹道核导弹：大地家族(尽管只有大地 II 被认为具备核能力)，大地导弹有公路机动型和短程导弹共 3 种版本；以及射程更大的固体燃料烈火导弹。后者设计目的旨在实现快速核反应，并已经大面积替换大地，肩负起核投送任务。

烈火 1 为一型单级公路机动导弹，射程 700 公里。烈火-1 具备核投送能力，2004 年首次装备印军，由印战略部队司令部(SFC)指挥。SFC 为印度核武器作战指挥和管理机构。2018 年 2 月 6 日和 10 月 30 日，印度两次试射烈火 1，这也是 SFC 常规交付试验操作。[12]

烈火 2 为一型两级固体燃料铁路机动弹道导弹，最大载荷 1 吨，最大射程 2000 公里。烈火-2 似乎长期受到技术问题困扰；2017 年，美国空军国家情报和航天中心(NASIC)估计，印度导弹发射平台部署还不到 10 架。[13] 2018 年 2 月 20 日，SFC 成功试射烈火-2。[14] 此前 2017 年的试射，导弹升空后不久就被迫中止测试。[15]

烈火-3 为铁路机动两级弹道导弹，最大射程超过 3200 公里。2011 年交付部队列装，最近的一次成功试射为 2017 年 4 月 27 日。[16]

印度正在研发两种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烈火-4 和烈火-5，这将使得印度导弹首次实现中国境内目标全覆盖。烈火-4 为公路机动型两级导弹，最大射程超过 3500 公里。SFC 在 2018 年 1 月 2 日和 12 月 23 日，两次试射烈火-4；12 月的试射为烈火-4 的第 7 次试射。[17]

DRDO 已将射程超过 5000 公里的公路机动三级烈火-5 导弹，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与其他烈火家族导弹不同，烈火-5 被设计为在新型机动发射筒存储和发射。这样一来，辅以其他设施，在面对危机之时，导弹发射准备时间得以大大缩短。[18] 2018 年，印度共进行了 3 次烈火-5 成功试射：1 月 18 日，6 月 3 日和 12 月 10 日。[19] 印度在卡拉姆岛(以前叫惠勒岛)综合实验靶场，从一辆卡车的密封发射筒上对烈火-5 进行试射。12 月的试射也标志着印度自 2012 年以来，烈火-5 在最终交付部队之前已连续 7 次成功试射。[20]

印度志在研发多弹头分导(MIRV)技术。但是，印度 DRDO 官员对于在烈火-5 或是未来射程更远、载荷更大的烈火-6 上是否部署 MIRV 技术，表述却自相矛盾。[21]烈火-6 尚处于设计阶段。[22]

海基导弹

印度继续发展其三位一体核力量的海基一级，以寻求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23]印度正在建造 4-6 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舰队，这也是印度 40 年来一直推行的先进技术海军的重要一步。[24]

印度第一艘自行建造核动力潜艇，歼敌者号，于 2009 年下水，并与 2016 年正式开始海试。[25]2018 年 11 月，印度政府宣布歼敌者号完成首次“威慑巡逻”。[26]然而，威慑巡逻时，印潜艇是否携带核弹头仍值得怀疑。[27]第 2 艘觅敌者号核潜艇的建造工作在 2017 年 11 月开始，正在维萨卡帕特南附近海军基地进行设备安装。[28]据报道，第 3、4 艘潜艇计划分别于 2020 年和 2022 年开始建造。[29]

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歼敌者级配备 4 具垂直发射系统，可携带多达 12 枚 K-15 潜射弹道导弹(也被称作 B05)。有报道称，觅敌者将会装备歼敌者 2 倍的发射筒，但卫星图片显示两型潜艇艇身尺寸并无差异。[30]2018 年 8 月 11 日至 12 日连续两天，印度在维萨查帕特南海岸从歼敌者共试射了 3 枚导弹。[31]

DRDO 正在开发一型两级射程 3500 公里的 SLBM，称为 K-4，并将最终取代 K-15。[32]2017 年 12 月 17 日，孟加拉湾水下平台试射 K-4 失败，印度官员并未公布失败原因。[33]该型导弹此前有过 4 次试射。DRDO 目前正在研发新型 K-5，预计射程超过 5000 公里，并已宣布将研发射程更远的 K-6。[34]

最大射程 400 公里，弹头重量 500 公斤的丹努什导弹就是大地 2 导弹的海基版本，具备核投送能力。由水面舰艇平台发射，可用作反舰武器并可打击沿岸目标。2018 年 2 月 23 日，一枚达努什导弹在孟加拉湾发射船上成功试射。此前最近一次测试为 2015 年 4 月。[35]印度西海岸卡尔瓦尔附近海军基地的两艘苏卡尼亚级海岸巡逻舰，已装备丹努什导弹，这也意味着丹努什已正式服役印度海军。[36]

巡航导弹

自 2004 年以来，DRDO 一直在研发具备核投送能力的远程亚音速巡航导弹，被称为无畏巡航导弹，共有陆基、海基和空基版，射程超过 1000 公里。因飞行控制软件和导航系统的技术问题，导致 2013 年开始连续出现多次试射失败，研发进度一再推迟。[37]

2017 年 11 月 7 日，印度国防部宣布 DRDO 在阿卜杜勒卡拉姆岛上的综合试验场成功试射了一枚无畏巡航导弹，“已经完成了所有任务目标”。[38]对于媒体报道无畏可携带核弹头的报道，印度政府也不置可否。[39]

1 国际裂变材料委员会，“各国:印度”，2018 年 2 月 12 日。

2 国际裂变材料委员会(注 1)。

3 印度政府，原子能部门声明，2018 年 7 月 18 日在人民院回答拉胡尔•谢沃尔提出核电站重点问题，第 2 页。

4 沙玛•R，“印度到 2039 年将拥有 6 座快中子增殖反应堆;首堆将于 2018 年投入使用”，《核亚洲》，2017 年 11 月 8 日;拉玛娜•M•V，“不惜一切代价建设快速反应堆:印度对增殖反应堆的执迷追求”，《原子科学家公报》，2016 年 11 月 3 日。

5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卡尔帕坎姆快中子增殖反应堆可能在 2019 年达到临界态”，《印度时报》，2018 年 9 月 20 日。

6《印度教教徒报》，“HCC 将在卡尔帕坎姆建造燃料处理设施”，2017 年 8 月 7 日;《世界核新闻》，“印度签订快中子反应堆燃料循环设施合同”，2017 年 8 月 8 日。

7 裂变材料国际委员会(注 1);海军技术，“印度为核潜艇建造反应堆”，2010 年 9 月 8 日。

8 奥尔布赖特•D 和凯勒赫-韦甘蒂尼•S，印度民用和军用钚及高浓缩铀库存，2014 年末(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华盛顿，2015 年 11 月 2 日)。

9 列维•A，“专家表示，印度正在建设一座生产热核武器的绝密核城市”，《外交政策》，2015 年 12 月 16 日。

10 坎帕尼•G，“新德里漫长的核之旅:保密和制度性障碍是如何推迟印度的武器化”，《国际安全》，第 38 卷第 4 期(2014 年春)，第 94,97 - 98 页。

11 科恩•S 和达斯古普塔•S，“瞄准谁：印度军事现代化”，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华盛顿，2010)，第 77-78 页;印度国防新闻更新，“美洲虎攻击机是印度唯一的战术核投送和地面攻击机”，《印度时报》，2018 年 10 月 30 日。

12 内加•R，“印度成功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1 型弹道导弹:10 个事实”，新德里电视台;2018 年 2 月 6 日；印度报业托拉斯 (PTI)，“成功试射烈火-1 弹道导弹”，《印度时报》，2018 年 10 月 30 日。

13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2017 年 7 月)，第 25 页。

14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印度试射中程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 2 导弹”，《印度教徒报》，2018 年 2 月 20 日。

15 潘迪特•R，“烈火-2 弹道导弹试验失败:信源”，《印度时报》，2017 年 5 月 4 日。

16《新印度快报》“印度在奥里萨邦海岸成功试射了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3 导弹”，2017 年 4 月 27 日。

17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 4 导弹成功试射”，《经济时报》，2018 年 12 月 23 日。

18 阿罗尔•S，“印度军事研究中心新任主任揭示了勇敢的新使命”，2013 年 7 月 13 日。

19 加迪•F•S，“印度试射烈火- 5ICBM”，《外交官》，2018 年 12 月 10 日。

20 劳特•H•K，“烈火 5 的成功试射为印度军队撑腰”，《新印度快报》，2018 年 12 月 11 日。

21 巴斯鲁•R 和桑卡兰•J，“印度迈向 MIRV 缓慢而不可阻挡的步伐”，M•克雷彭,T•惠勒和 S•梅森，“MIRV 的诱惑与陷阱:从第一核时代进入第二核时代”(史汀生中心:华盛顿特区，2016 年 5 月)，第 149-76 页。

22 印度国防更新，“烈火-6:印度洲际弹道导弹”，2017 年 6 月 18 日。

23 达文波特•K，“印度潜艇完成首次巡逻”，《今日军控》2018 年 12 月;《海军技术》，“歼敌者级潜艇”。

24 迪纳卡尔•P，“现在，印度拥有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印度教教徒报》，2016 年 10 月 18 日。

25 佩里•D 和约瑟夫•J，“歼敌号核潜艇在 10 个月前的一次事故后成了瘸子”，《印度教教徒报》，2018 年 1 月 8 日。

26 印度政府，印度政府总理办公室，新闻信息局，“总理祝贺歼敌者号核潜艇完成印度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2018 年 11 月 5 日；达文波特(注 23)。

27 乔希•Y，“天使与悬摆:歼敌者号与印度水下核武器的困境”，《岩石战争》，2019 年 1 月 14 日。

28 乌塔汉•S，“窥探印度最高机密和最昂贵的国防项目，核潜艇”，《今日印度》，2017 年 12 月 10 日。印度。这艘潜艇最初被认为命名为艾里达曼号，但当发射时它被命名为觅敌者。

29 乌塔汉(注 28)。

30 加迪•F•S，“印度下水第二艘弹道导弹潜艇”，《外交官》，2017 年 12 月 13 日;克里斯滕森•H•K，“印度第二艘 SSBN 只有四根导弹管”，FAS 战略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19 年 2 月 22 日。

31 鲁特•H•K，“印度核潜艇已具备战力，印度已加入三位一体核俱乐部”，《新印度快报》，2019 年 2 月 22 日。

32 杰哈•S，“印度的水下威慑”，《外交官》，2016 年 3 月 30 日;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注 13)，第 33 页。

33 巴比•M，“印度导弹计划受挫:一周两次失败，潜射导弹卡在潜艇”，印度 The Print 网站，2017 年 12 月 24 日。

34 劳特(注 31);乌塔汉(注 28)。

35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达努什”弹道导弹成功试射，《印度时报》，2018 年 2 月 23 日。

36 海军技术，“苏坎亚级近海巡逻艇”;潘迪特•R，“海军，印度空军装备大地级常规导弹”，《印度时报》，2006 年 8 月 22 日。

37 “脑洞大开研制的无畏级巡航导弹的缺点”，印度 OneIndia 网站；萨勃拉曼尼亚•T，“无畏级导弹测试完全失败”，《印度教教徒报》，2016 年 12 月 21 日。

38 印度国防部，新闻局，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成功地进行了这次飞行试验-无畏级亚音速巡航导弹，2017 年 11 月 7 日。

39 潘迪特•R，“印度成功测试其第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印度时报》，2017 年 11 月 8 日;加迪•F•S，“印度成功试射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国产巡航导弹”，《外交官》，2017 年 11 月 8 日。

第 7 节.巴基斯坦核力量

香农•N•凯勒 汉斯•M•克里斯腾森

为制衡印度“全天候威慑态势”，巴基斯坦继续优先发展和部署新的核武器及投送系统。据估计，截至 2019 年 1 月，巴基斯坦共拥有 150-60 枚弹头(见表 6.8)。尽管对其核弹头具体数量估算存在很大分歧，但未来十年内巴基斯坦核武库规模很可能会大幅增长。[1]

据信，巴基斯坦正在逐步增加其军事裂变材料储备，其中包括武器级钚和高浓缩铀(HEU)(见第 10 节)。阿基斯坦钚生产基地位于旁遮普省的库沙布。巴基斯坦有 4 座重水核反应堆和一个重水工厂。[2] 巴基斯坦似乎正在提高其核乏料再处理能力，也就是从辐照反应堆燃料中化学分离钚。巴基斯坦科学技术研究所(PINSTECH)新实验室下属的一个小型核乏料再处理工厂(位于拉瓦尔品第附近)已完成扩建。规模更大的再处理工厂，其目的是为旁遮普的恰希玛核电站进行配套，也已完工并可能已经开始运营，尽管 2018 年似乎建设仍未完工。[3]

旁遮普卡胡塔的可汗研究实验室(KRL)的气体离心机工厂，以及位于旁遮普加德瓦尔的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工厂都在进行浓缩铀工作。巴基斯坦卡胡塔的 KRL 工厂可能正在建造一座新的铀浓缩离心机。[4] 一个新的气体离心浓缩铀工厂正在 KRL 进行建设，但尚不清楚该工厂是否会生产民用或军用浓缩铀。[5]巴基斯坦天然铀资源匮乏，也限制了其核武级高浓缩铀的生产。[6]

战斗机

巴基斯坦空军(PAF)幻影 3/5 战斗机是最有可能具备核投送能力的飞机。幻影 3 已被用来试射具备核能力的阿拉德空基巡航导弹，而幻影 5 挂载核重力炸弹，则担负起空地打击任务。[7]

80 年代中期，巴基斯坦曾从美国采购了 40 架 F- 16A / B 战机。有人猜测，其中一些已被改装用来作为核武投送载具，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些 F-16 未来也将继续肩负起这一角色。[8]

巴基斯坦正在采购 JF-17 雷电战斗机，雷电是巴基斯坦同中国联合开发的低成本多用途轻型战斗机，以取代日渐老迈的幻影。有报道称，虽然巴基斯坦空军

PAF 可能打算将新型阿拉德巡航导弹(见下文)整合到雷电，但 JF-17 是否担负核投送角色尚不清楚。[9]

陆基导弹

巴基斯坦正在扩大其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核武库，其中包括一系列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目前部署的有阿卜达利导弹(也被称为哈塔夫-2)、加兹纳维导弹(哈塔夫-3)、沙欣 1(哈塔夫-4)、纳斯尔(哈塔夫-9)固体燃料助推公路机动型短程弹道导弹(SRBM)。沙欣 1 的一个改进增程型版本沙欣 IA，正在研发之中。

巴基斯坦共部署了两型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MRBM):液体燃料、公路机动的高里(哈塔夫- 5)，射程 1250 公里;两级助推、固体燃料、公路机动的沙欣 2(哈塔夫-6)，射程 2000 公里。[10]射程更远的沙欣 3 型导弹目前正在研发之中，于 2015 年首次试射。[11]射程 2750 公里，是迄今为止巴基斯坦测试的最远射程导弹。

表 6.8 2019 年 1 月巴基斯坦核力量

类型 美国/巴基斯坦	发射 平台数	首次服役 时间	射程 （km）a	弹头 当量 b	弹头 数量 c
飞机	36				36
F16A/Bd	24	1998	1600	单弹头	24
幻影 3/5	12	1998	2100	单弹头或拉阿德	12
陆基弹道导弹	102e				102
阿布达力(哈塔夫-2)	10	（2015）	200	1x12kt	10
加纳维（哈塔夫-3）	16	2004	300	1x12kt	16
沙欣 1（哈塔夫-4）	16	2003	750	1x12kt	16
沙欣 1A（哈塔夫-4）f	…	（2019）	900	1x12kt	…
沙欣 2（哈塔夫-6）	12	2014	2000	1x10-40kt	12
沙欣 3（哈塔夫-6）g	…	（2018）	2750	1x10-40kt	…
高里（哈塔夫-5）	24	2003	1250	1x10-40kt	24
纳赛尔（哈塔夫-9）	24	（2013）	60-70	1x12kt	24
Ababeel（哈塔夫-..）	0	…	2200	MIRV 或 MRV	0h
巡航导弹	12				12
巴布尔（哈塔夫-7）	12	（2014）	350i	1x12kt	12
巴布尔-2（哈塔夫-..）	…	…j	700	1x12kt	…
巴布尔-3（哈塔夫-..）	0	…k	450	1x12kt	0
拉阿德（哈塔夫-8）l	…	（2019）	350	1x12kt	…
总计					150-160 m

– 无数据或不适用；（）– 不确定的数字；ALCM – 空基巡航导弹；

GLCM – 陆基巡航导弹；SLCM-海基巡航导弹；MIRV-多弹头再入大气层载具；kt – 千吨。
a 飞机航程仅用于说明问题；实际航程将有所不同，取决于飞机型号和武器负载情况。为达到航程极值，通常不得不压缩载荷。
b 巴基斯坦核弹头当量不得而知。 1998 年巴基斯坦核试验总当量达到 1.2 万吨。 从那以后，巴基斯坦有能力进一步提高弹头当量。 没有公开证据表明巴基斯坦已研发出两级弹头
c 飞机和几型导弹均为核常兼备。 巡航导弹发射平台可发射一枚以上的导弹，我们的估算基于单枚对应单架发射装置。核弹头并未部署在发射架，而是储存在独立储存设施之中。
d 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巴基斯坦将其 80 年代从美国购入的 40 架 F-16 进行改装，执行核投送任务。
e 有些发射平台可能备多枚导弹，以便重装发射。
f 目前尚不清楚沙欣 1A 是否与沙欣 1 具有相同的番号。
g 目前尚不清楚沙欣 3 是否与沙欣 2 具有相同的番号。
h 按照巴基斯坦空军说法，此型导弹具备多弹头分导能力，即 MIRV 技术。
i 巴基斯坦政府公布的射程为 700 公里，为美国空军及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估算范围 350 公里的两倍。
j 巴布尔-2，在 2016 年 12 月 14 日首次试射，为巴布尔 GLCM 的改进型。
k 巴布尔-3 的首次试射是于 2017 年 1 月 9 日在水下平台进行。
l 2017 年，巴基斯坦军方展示了拉阿德-2 型导弹，据报道射程为 550 公里，新版本尚未部署。
m 含作战部队 150 枚弹头，沙欣 3 和拉阿德弹头预计总库存为 150-160 枚。
来源：巴基斯坦国防部；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局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2013 年 5 月）；国际战略研究所，2015 年军事平衡，（劳特利奇：伦敦，2015）；《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种问题；作者估算。

巴基斯坦国防综合体正在研制一款新型 MRBM-阿巴比，其气动弹体结构和固体燃料发动机均移植于沙欣。[12] 2017 年 1 月 24 日，巴基斯坦宣布阿巴比首次试射成功，其目的就是“验证武器系统的各种设计和技术参数”。[13] 该型导弹“运用分导技术，使之可搭载多弹头，”并可在地区弹道导弹防御(BMD)环境中，不断提升巴基斯坦弹道导弹生存能力。[14] 据报道，巴基斯坦国防综合体正在开发部署多弹头分导技术，以对抗印度未来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15]

巴基斯坦优先研发可携带核弹头的短程导弹，其目的是肩负战术核角色及任务。为追求“全方位威慑”姿势，巴基斯坦国防决策者们对核武寄予厚望，以期制衡印军事战略。印方策略就是通过调拨前线部队，可对巴基斯坦境内发动迅速且有限度的常规打击。[16]

巴基斯坦国防综合体正在研制两型可携带核弹头的短程弹道导弹，其设计理念是短程投送低当量核弹头：射程 200 公里的公路机动型阿卜达利(哈塔夫-2)导弹；射程 60 公里的公路机动型纳瑟(哈塔夫-9)导弹。2011 年，在单筒发射平台上对纳斯尔导弹进行了首次试射，但随后曝光了多筒移动发射平台，可实现 4 弹联发。[17] 射程为 70 公里的改进型版本，在 2017 年 5 月 5 日进行了试射。[18]

海基导弹

为确保其二次打击能力，巴基斯坦正在寻求通过发展海基核力量来抗衡印度三位一体核战略。2018 年 3 月 29 日，巴基斯坦宣布，已在印度洋部署的水下动态平台上，完成巴布尔潜射巡航导弹(巴布尔-3)的第 2 次试射。[19]据说巴布尔-3 是巴布尔-2 陆基巡航导弹的海基版，射程 450 公里。巴基斯坦公布的 2017 年 1 月进行的第一次试射的视频片段证实，巴布尔 SLCM 的设计目的是通过潜艇鱼雷管发射，而不是从一个罐式垂直发射系统发射。[20]它可能会部署在巴基斯坦海军的三艘现役柴电阿戈斯塔级潜艇。[21]巴基斯坦已从中国订购 8 艘不依赖外部空气而进行推进的常规动力潜艇，首艇预计 2022 年交付。[22]

2012 年，巴基斯坦组建海军战略部队司令部，核武器是“国家二次打击能力的守护者”。[23]目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海军是否已建立指挥和控制基础设施，以管理其潜艇为核心的巴基斯坦核力量，同时负责巡逻舰艇上核弹头的安全管控。[24]

陆基和空基巡航导弹

在海基巴布尔-3 的基础上，巴基斯坦还在继续研发两型具备核能力的巡航导弹，以发展其全方位核威胁姿态。巴布尔-2，被巴军方称为巴布尔武器系统-1(B)，为巴布尔(哈塔夫-7)增程版，该型导弹具备隐身特性，于 2016 年进行首次试射。巴军方于 2018 年 4 月 14 日成功试射巴布尔-2。[25]巴基斯坦宣称核常兼备的阿拉德 (哈塔夫-8)，射程超过 350 公里，自 2007 年以来共进行了 7 次试射。最近一次试射在 2016 年 1 月 19 日。[26]虽然最初试射是使用空军幻影 3 战斗机，有些报道指出导弹可能已被集成到雷电-17 战机。[27]2017 年巴基斯坦公布其改进型版本，阿拉雷-2 巡航导弹，据报道其射程更远。[28]

1 见圣达信 L 和阿肖克•K，“巴基斯坦对铀限制:巴基斯坦有多少核武器?”，《当代科学》，第 115 卷，第 6 期(2018 年 9 月 25 日);克里斯滕森•H，罗瑞斯•R 和戴蒙德•J，“巴基斯坦核力量 2018”，《原子科学家公报》，第 74 卷，第 5 期(2018 年 8 月);萨利克•N，“巴基斯坦 2025 年核力量结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地

区观察》，2016 年 6 月 30 日。

2 伯克哈德•S,洛奇•A 和帕比安•F，“库沙布更新”，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2017 年 9 月 7 日。

3 据报道，截至 2018 年 2 月，恰希玛再处理厂“正在建设中”。国际裂变材料委员会，“设施:后处理工厂”，2018 年 2 月。此外，由谷歌地球提供的 2018 年 9 月 19 日和 10 月 10 日拍摄的数字地球卫星图像显示，后处理大厅主建筑附近有重要的新建筑。

4 奥尔布赖特•D，伯克哈德•S，帕比安•F，“巴基斯坦不断扩大的铀浓缩项目”，《剪影》，

2018 年 5 月 30 日，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

5 奥尔布莱特、伯克哈德和帕比安(注 4)。

6 国际裂变材料委员会(IPFM)，“巴基斯坦可能正在建设新的浓缩设施”，IPFM 博客，2016 年 9 月 16 日。

7 克尔•P 和尼基丁•M•B，巴基斯坦核武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国会报告 RL3248(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6 年 8 月 1 日)，第 7 页。

8 见克里斯滕森、诺里斯和戴蒙德(注 1)。

9 费舍尔•R，“JF-17 Block II 推进新型加油探测器”，《简氏防务周刊》，2016 年 1 月 27 日。

10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2017 年 7 月)，第 25 页。

11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处，“沙欣 3 导弹试射”，PR-61/2015-ISPR, 2015 年 3 月 9 日。

12 国防综合体(也称为国家发展综合体或国家发展中心)及其监督组织国家工程和科学委员会(NESCOM)是负责巴基斯坦导弹发展计划的主要机构。核威胁倡议(NTI)，“国防综合体”，2011 年 9 月 27 日更新。

13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处，新闻发布，PR-34/2017-ISPR, 2017 年 1 月 24 日。

14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处(注 13);加迪•F•S,“巴基斯坦正在测试能够携带多个核弹头的新型弹道导弹”，《外交官》，2017 年 1 月 25 日。

15 塔斯莱姆•S，“没有印度 BMD 就没有巴基斯坦 MIRV”，史汀生中心，缓和倡议论文，2017 年 10 月 2 日。

16 艾哈迈德•M，“巴基斯坦的战术核武器及其对稳定的影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6 年 6 月 30 日;桑卡兰•J，“巴基斯坦的战场核政策:对夸大威胁的危险解决方案”，《国际安全》，第 39 卷第 3 期(2014/15 冬季)，第 118-51 页。

17 安萨里•U，“中断 7 年后，巴基斯坦举行阅兵式”;《国防新闻》，2015 年 3 月 24 日；哈罗恩•A，“巴基斯坦试射哈特夫-9”，《新闻调度台》，2014 年 9 月 26 日。

18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处，新闻发布 PR-344/2017-ISPR, 2017 年 7 月 5 日。

19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处，“巴基斯坦成功试射自主研制的海基巡航导弹巴布尔，射程 450 公里”，新闻发布 PR-125/2018-ISPR, 2018 年 3 月 29 日。

20 塔黑兰•S，“巴基斯坦向三位一体的海基推进”，《今日军控》，2018 年 6 月 1 日。

21 潘达•A 和纳朗•V，“巴基斯坦正在测试可携带核弹头的新型潜射巡航导弹。现在该做什么?”，《外交官》，2017 年 1 月 10 日。

22 卡恩•B，“中国证实向巴基斯坦出售潜艇”，力量防务新闻与分析集团，2016 年 10 月 16 日。

23 伊斯坎德尔•R，“雾里看花:印度洋的海军核动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华盛顿，2015 年 3 月)，第 17 页。

24 潘达和那郎(注 21)。

25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处，“巴基斯坦今天成功测试了自主研发的巴布尔巡航导弹的增程版本”，新闻发布 PR-142/2018-ISPR, 2018 年 4 月 14 日。

26 巴基斯坦公共关系，新闻发布 PR-16/2016-ISPR, 2016 年 1 月 19 日。

27 费舍尔(注 9)。

28 卡恩•B，“巴基斯坦正式推出远程雷神空基巡航导弹”，力量防务新闻与分析集团，2017 年 3 月 23 日。

第 8 节.以色列核武装力量

香农•N•凯勒 汉斯•M•克里斯腾森

以色列继续维持其一贯坚持的核不透明度政策：以色列既没有正式承认，也没有否认其拥有核武器。[1]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样，以色列从未加入过 1968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2]美国和以色列相关政府解密文件表明，自 60 年代早期，以色列就开始建立核武储备，其核武级钚来自于迪莫纳附近内盖夫核研究中心的以色列科研反应堆 2(IRR-2)。[3]缺乏安全保护的 IRP-2，1963 年开始投入使用，其历史运行和功率容量公开信息却寥寥无几。[4]反应堆主要用于产生氚。[5]以色列老迈的重水反应堆，尽管堆芯结构上存在许多问题，却仍在运行。[6]反应堆计划 2023 年关闭，但据报道，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正进行研究，设法延寿至 40 年代。[7]民间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维修现有反应堆或新建替代反应堆将受制于国际核心零部件出口限制。[8]

据估计，以色列拥有约 80 枚核武器（见表 6.9）。其中大约 30 枚为空基重力炸弹。弹头储存地点相关信息，外界知之甚少，据信至少有部分弹头为分拆存放。

约 50 枚弹头为陆基弹道导弹负责核投送。以色列核武库包括固体燃料两级杰里科 2 中程弹道导弹，据信这些导弹部署在耶路撒冷以东军事基地的洞穴中的移动发射装置。[9]射程超过 4000 公里，三级杰里科 3 型中程弹道导弹，于 2011 年宣布研制成功。[10]2013 年，以色列对装备新发动机的杰里科 3 进行了试验。消息人士认为，新发动机可将射程提升至 5500 公里，达到洲际导弹射程。[11]其具体研发阶段，尚不得而知。

表 6.9 2019 年 1 月以色列核力量

型号	射程（公里）a	有效载荷（公斤）	服役状态	弹头数量
飞机 b				…
F-16/A/B/C/D/I 猎鹰	1600	5400	共 205 架；有些被认为已装备核武	30
陆基弹道导弹				…
杰里科 2	1500-1800	750-1000	c 约 50 枚；1990 年首次部署	25

杰里科 3c	＞4000	1000-1300	2011-15 年列装，正逐步取代杰里科 2
海基弹道导弹			
…	…	…	以色列为德制海豚级柴电潜艇配备核弹头潜射巡航导弹，以色列官方予以否认
合计			80-90d

a 飞机航程只用于说明目的，真正的作战航程将有所不同。为达到最大射程，导弹的有效载荷将可能不得不降低。
b 以色列 25 架 F-151 飞机中的一些，也可以担负远程核发射任务。
c 装备新型发动机的增程版本，正在研发中。
d 根据 SIPRI 大致估算，以色列当前拥有大约 80-90 枚核弹头储备。
来源:科恩•A，路人皆知的秘密:以色列的原子弹交易(哥伦比亚大学);科恩•A 和伯尔•W，以色列已经迈过了核门槛，《原子科学家公报》，第 62 期，No.3(2006 年 5 月/6 月);科恩•A，以色列和原子弹(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98);奥尔布赖特•D，贝尔库特•F 和沃克尔•W，SIPRI，钚和高浓缩铀:全球库存、能力和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97 年);简氏战略武器系统，各种问题; 费特•S，以色列的弹道导弹能力，物理学和社会，第 19 期，No.3(1990 年 7 月);《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种问题;作者估算。

未经证实的报道称，以色列对其德制海豚级柴电潜艇进行了改装，以携带本国制造的海基核巡航导弹，使其具备二次打击能力。[12]如果真是这样，以色列核武库可能只有少量核弹头，不会超过 10 枚。德国和以色列官员一如既往予以否认。以色列从德国购买了 3 艘海豚级和 3 艘海豚-2 改进型潜艇，其中 5 艘已交付以色列海军。第 6 艘计划于 2019 年底前交付。[13]2017 年 10 月，德国政府宣布同意向以色列提供补贴，出售 3 艘新型海豚-2 潜艇，以取代 1999 年和 2000 年交付的首批 3 艘海豚级潜艇。[14]然而，据报道，德国政府保留取消这笔交易的权力，取决于以色列警方对潜艇交易腐败丑闻的调查结果。[15]3 艘新潜艇中的首艘预计将于 2030 年形成战力。[16]

1 关于这一政策在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见科恩•A，“以色列”，H•波恩，B•吉尔，H•汉吉，SIPRI，管理核弹:民用管控与核武器的民主问责(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第 152-70 页。

2 NPT 概要及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3 要了解以色列核武器计划历史，见科恩•A，“世人皆知的秘密:以色列核弹交易”(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2010)。

4 格拉瑟•A 和米勒•M,“估计以色列迪莫纳反应堆钚产量”,在棕榈沙漠举行的第 52 届核材料管理学会(INMM)年会上的报告，2011 年 7 月 17 日至 21 日。

5 国际裂变材料委员会 (IPFM)，2015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核武器和裂变材料的储存和生产(IPFM:普林斯顿，新泽西，2015 年 12 月)，第 26 页。

6 莱文森•C，“科学家称，以色列迪莫纳核反应堆存在 1537 处缺陷”,《国土报》，2016 年 4 月 16 日。

7 鲍勃•Y•J，“以色列核反应堆仍然安全吗?”,《耶路撒冷邮报》，2018 年 9 月 29 日。

8 凯利•R 和杜威•K，“以色列老化的迪莫纳反应堆替代方案评估”,《简氏情报评论》，2018 年 11 月 20 日。

9 O•哈洛兰•J，杰里科导弹，IHS 简氏武器:战略，2015 - 16(IHS 简氏防务:库尔斯登，2015)，第 53 页。

10 艾德•奥哈洛兰 10 号(注 9)。

11 本•大卫•A，“以色列试射杰里科 3 导弹”,《航空周刊和空间技术》，2013 年 7 月 22 日。

12 见科恩(注 3)，第 83 页;冯•伯格曼，“以色列在德制潜艇上部署核导弹”,《明镜周刊》，2012 年 6 月 4 日;吉林斯基•V，“以色列海基核武器构成风险”,《原子科学家公报》，2016 年 2 月 8 日。

13 欧波尔•B，“以色列海军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潜艇计划”,《国防新闻》，2017 年 4 月 19 日。

14 欧波尔•B(注 13)。

15 路透社，“德国为以色列提供潜艇资助”，2017 年 10 月 23 日;《德国之声》，“德国批准为以色列购买三艘潜艇”，2017 年 10 月 23 日。

16 拉平•Y，“以色列潜艇司令概述未来需求”,《简氏防务周刊》，2018 年 3 月 14 日。

第 9 节.朝鲜核武装力量

香农•N•凯勒和汉斯•M•克里斯腾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 或北朝鲜)，其核计划异常活跃，同时又极度不透明。据估计，朝鲜可能已经制造出多达 20 至 30 枚核武器(见表 6.10)。估算基于对朝鲜生产核武级裂变材料钚和高浓缩铀(HEU)数量的计算，以及对其武器设计和制造能力的假设。

军用裂变材料生产

2018 年，朝鲜继续生产武器级钚和高浓缩铀(见第 10 节)。[1]朝鲜钚生产和分离设施位于宁边核科学研究中心(YNSRC)。2018 年 2 月，商业卫星图像显示，位于 YNSCR 的老化的 5 兆瓦特电力(MW(e))石墨减速研究反应堆尽管正在进行维护，却依旧继续运行。[2]此外，位于勇边的放射化学实验室似乎在 2018 年 5 月就开始运作，从 5 兆瓦(e)反应堆的乏燃料棒中分离钚。[3]同时，卫星图像显示，邻近同样可以生产钚的实验轻水反应堆(ELWR)已于 2018 年开始运行或进行运行前测试。[4]

朝鲜的铀浓缩能力和高浓缩铀库存存在着极大不确定性。人们普遍认为，朝鲜领导人已将核武级高浓缩铀视为重中之重，以克服其武器级钚生产能力有限的短板。2018 年，卫星图像分析显示，朝鲜还在继续使用其 2010 年就已宣布关停的宁边核设施的天然气离心浓缩厂。[5]2018 年，美国民间研究人员确定了位于平壤附近降仙一处疑似秘密铀浓缩厂。[6]据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对此处核设施已经监视了十多年。不过，分析人士警告称，由于无法进入工厂，尚无法确认内部活动的性质和目的。[7]美国 2018 年 6 月一项情报评估得出结论，朝鲜可能拥有不止一处秘密铀浓缩厂，朝鲜想方设法隐瞒其核生产设施类型及数量。[8]

表 6.10 2019 年 1 月朝鲜具有潜在核力量

型号 a	射程（公里）	有效载荷（公斤）	状态	弹头数量
陆基弹道导弹				…
火星-7（芦洞）	＞1200	1000	单级,液体燃料。不足 100 个发射装置;首次部署于 1990 年。	
火星-9（飞毛腿 ER）	1000	500	飞毛腿导弹变种，加长弹身以增加燃料，可能承担核任务	
北极星-2（KN-15）	1000	…	二级固体燃料,发射筒发射。北极星-1 潜射弹道导弹的陆基版；2017 年进行了两次试射。	
火星-10（舞水端 BM-25）	＞3000	（1000）	研发中，单级液体助推，2017 年多次试射，未获成功。	
火星-12（KN-17）	＞3000	1000	研发中，单级液体助推	
火星-13（KN-08）b	＞5500	…	研发中，3 级洲际弹道导弹，不确定是否进行试射。	
火星-14（KN-20）	6700-10400	500-1000	正在研发中的 2 级液体燃料导弹;2017 年进行了两次测试。	
火星-15（KN-22）	13000	1000-1500	正在研发中的 2 级液体燃料导弹;2017 年试射。	
大浦洞-2c	12000	…	研发中; 2012 年 12 月和 2016 年 2 月，作为 3 级运载火箭将卫星送入轨道	
海基弹道导弹				
北极星-1 (KN-11)	…	…	研发中，两级固体助推，取代了之前的液体燃料版本。	
合计				（20-30）d

.. -无数据或不适用，（）=数据不确定，SLBM=潜射弹道导弹

a 没有任何公开证据表明朝鲜已经开发和测试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分级远程弹道导弹，并为此设计出尺寸足够紧凑的核弹头，或已列装具有完备战斗力的此类武器。

b 两级助推变种，KN-14，还在研发之中，并未进行试射。

c 两级助推的大浦洞-1 导弹曾在 1998 年试射，但未获成功。

d SIPRI 估计朝鲜储备的核材料，可生产 20-30 枚核弹头。

e 经过 6 次试验，其中 1 次试验当量超过 20 万吨，朝鲜可能拥有少量可运载核弹头。

资料来源: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简氏战略武器系统;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 2018(劳特里奇:伦敦，2018);《核笔记》,《原子科学家公报》，各种问题;作者的估算。

核弹头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 2018 年 1 月 1 日元旦致辞中宣布，朝鲜已成功完成组建“核自卫武装力量”。金正恩宣布，朝鲜将开始大规模生产和部署核弹头及弹道导弹，朝鲜核武的威力和可靠性已经得到证明。[9]

迄今为止，尚无公开证据证实朝鲜的言论，即朝鲜核弹头已足够紧凑(或小型化)装备弹道导弹。2017 年，美国国防情报局得出结论，朝鲜已成功完成此类弹头的设计和制造。[10]2018 年韩国国防白皮书中，恨过国防部指出，朝鲜似乎“在核弹头小型化能力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并未指出韩国是否确信朝鲜已生产或部署此类可用于弹道导弹的核弹头。[11]

自 2016 年以来，朝鲜一直声称自己研制并试验了热核武器(氢弹)。[12]最初，各国专家以及日本、韩国和美国情报机构均嗤之以鼻。[13]然而，时至 2017 年 9 月，朝鲜进行的一次试验性爆炸，其爆炸当量(爆炸能量)-20 至 30 万吨级，明显较此前 5 次试验爆炸的任何一次都要高。[14]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宣布，朝鲜氢弹试验成功，并已可装备洲际弹道导弹。[15]2018 年，一些民间分析人士根据对朝鲜核材料开源代码科学研究工作的分析得出结论，朝鲜可能有能力生产一个增强型裂变装置，也可能是一个两级热核装置。[16]

朝鲜暂停核爆和弹道试验

2018 年 4 月 20 日，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讲话中宣布，朝鲜将立即停止核试验核武器及远程弹道导弹研发。[17]金正恩同时宣布，朝鲜将关闭并拆除朝鲜东北部丰溪里的地下核武器试验场。[18]5 月 24 日，众多国际记者到场，朝鲜对丰溪里核武试验场隧道和建筑物进行了爆炸拆除。[19]也有一种猜测，2017 年 9 月的大规模试验核爆所造成的余震，使得试验场存在地质上的不稳定，因此本就无法再继续使用。[20]

弹道导弹

朝鲜正在努力扩大其弹道导弹部队并使其现代化，朝鲜导弹部队共装备 10

型国产中、短程和远程导弹系统。导弹系列要么已装备部队，要么正在研制之中。朝鲜还在开发潜射弹道导弹(SLBM)。近些年来，朝鲜一直致力于几个导弹家族系列研发，射程越来越长，投送平台越来越精密。据悉，朝鲜在 2018 年没有进行任何中远程导弹飞行试验。[21]宣布暂停试射此类导弹时，金正恩表示，不需要进行进一步试验，“核弹头以科学的方式和序列装备弹道火箭”，“运载和打击方式的发展也以科学的方式稳步推进”。[22]

中程弹道导弹

假设朝鲜真能生产一枚小型核弹头，一些观察人士估计，以朝鲜导弹的弹体尺寸、射程及作战性能状态，火星-7(又称芦洞中程导弹)最有可能担当核投送任务。[23]以前苏联时期飞毛腿导弹设计为原型,芦洞为单级液体燃料导弹，估计最大射程超过 1200 公里。朝鲜战略火箭部队在 2016 年，先后对芦洞导弹进行了 5 次实验发射。172017 年未进行任何试射。此外，朝鲜还研发了单级液体燃料火星-9，也被称为飞毛腿-ER(增程型)，可能也具备核投送能力。飞毛腿-ER 是基于火星-6(飞毛腿 C 变体)，弹体加长以增加燃料携带量，该型导弹射程约 1000 公里。[24]

火星-10 导弹，也被称为舞水端或 BM-25，为液体燃料单级助推导弹，估计射程超过 3000 公里。舞水端首次亮相是于 2010 年阅兵式，但直到 2016 年飞行测试前从未公开。2016 年开始飞行测试，屡试屡败。[25] 2016 年以后就再未进行任何飞行试验，究竟研发进展到何种程度，尚不得而知。

火星-12(美国国防部 DOD 编号 KN-17)是一种单级中程导弹。该型导弹据信装备了新的液体燃料助推发动机，同时融入多项新设计，可作为未来 ICBM 技术试验平台。[26]分析人士推测,该型导弹携带一个小型尾端增程装置(PBV)，一是增大射程，二是提升弹头精度。[27]该型导弹估计射程为 3000 公里，足以打击包括关岛在内的西太平洋美军基地。2017 年 9 月，一枚火星-12 导弹从发射车发射升空，而并非固定的混凝土发射平台，这也表明火星-12 战备级别可能已经更高。[28]

朝鲜正在研制一型潜射弹道导弹(SLBM)，命名为北极星 2 号(美国国防部编号 KN -15)，是北极星-1SLBM 的陆基版。导弹为两级固体燃料助推，射程超过

1000 公里。[29]2017 年进行了 2 次发射试验。分析人士指出，朝鲜研发北极星-2，其目的就是提升其核弹道导弹系统生存能力。相较液体燃料，固体燃料发射更为迅速，同时相关发射配套车辆更少，暴露在敌方监控下的机率也就更低。[30]2018 年，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工厂的大规模扩建工作已接近完工。[31]

洲际弹道导弹

外界普遍认为，朝鲜优先考虑制造和部署一种能够向美国本土目标发射核弹头的远程弹道导弹。可惜的是 ，迄今为止朝鲜还未表明已研发成功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32]

朝鲜最先推出火星-13(美国国防部代号 KN-08)是在 2012 年 4 月的阅兵式，火星-13 为公路机动型三级洲际导弹。尽管一些民间分析人士认为阅兵式上的导弹只是实物模型。[33]对其射程和载荷的估计只能说存在极大不确定性。截至 2018 年底，该型导弹还未进行试射。

朝鲜已研发火星-14(美国国防部代号 KN-20)，其原型机首次出现在 2015 年的平壤阅兵式上。[34]两级导弹使用的是和单级火星-12 导弹一样的高性能液体推进剂助发动机。[35]按照 2017 年 7 月进行了一次飞行测试，一名分析人士估计，火星-14 最大射程可达 10400 公里，取决于载荷大小及飞行轨迹规划。[36]然而，其他分析人士估计，当有效载荷达到 500 公斤时-大致相当于核弹头重量，导弹射程可能很难超过 8000 公里。这也意味着导弹从朝鲜发射将无法达到美国西海岸。[37]

朝鲜正在研发一种新型两级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美国国防部指定代号 KN-22)，其二级发动机明显比火星 14 更大，助推器引擎也更强大。2017 年 11 月 28 日进行了首次试飞，当时一枚火星-15 导弹被送入高层轨道，较以往朝鲜导弹飞的更高，飞的更久。有人估计火星-15 正常轨道的理论射程极值可达 13000 公里---足够覆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国东海岸其他目标。[38]导弹设计载荷较小，但如果增加载荷，其射程将大幅度缩短。[39]据朝鲜政府在核试验后发表的一份声明，火星-15 是“装备超大型重型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打击美国本土全境”，“完成导弹武器战略目标”。[40]

研制一型能威胁美国本土的战略洲际弹道导弹，是朝鲜孜孜以求的目标。2018 年，是朝鲜成果丰硕的一年。尽管如此，导弹性能和可靠性尚未得到验证。[41] 分析人士尤其指出，还没有证据证明朝鲜已掌握多弹头分导技术。[42] 根据韩国国防政策部副部长徐柱锡的说法，朝鲜仍然需要证明其他相关技术能力，如末段制导和弹头激活。[43]

潜射弹道导弹

朝鲜正在研制一种潜射弹道导弹(SLBM)，命名为北极星-1(美国国防部编号 KN－11)。导弹现定型为两级助推型，在液体燃料试射失败后转为使用固体燃料设计。[44]2017 年朝鲜成功的进行了一系列水下发射，旨在对导弹稳定性进行评估。同时也进行了若干水下发射管试射，但并未进行任何的飞行试验。[45]多数观察人士认为，朝鲜在设计、建造和部署一支潜射弹道导弹部队之前，还有大量技术难关需要攻克。目前，朝鲜有一艘新浦级实验潜艇在役，可搭载和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从 2017 年 11 月开始，新浦造船厂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似乎正在建造一艘新型柴电潜艇，体型更大且可发射洲际弹道导弹。[46]

1 布伦斯特罗姆•D，“朝鲜可能制造了更多核弹，但威胁却减少了:研究”，路透社，2019 年 2 月 12 日。

2 帕比安•F，贝穆德斯•J 和刘•J，朝鲜宁边核设施:5 兆瓦反应堆疑似运行中，可能新的军事营地已建成，北纬 38°，2018 年 3 月 5 日。

3 赫克•S•S，卡林•R• L 和谢尔宾•E•A，“朝鲜核计划通史:2018 年更新”，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2019 年 2 月 11 日，第 3 页。

4 奥尔布赖特•D 和伯克哈德•S，“朝鲜继续提升其制造反应堆能力”，《图片摘要》，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2018 年 4 月 5 日。

5 帕比安•F 和刘•J，“朝鲜宁边核设施：维护良好，但生产能力有限”，北纬 38°，2019 年

1 月 9 日，北纬 38 度;赫克，卡林和谢尔宾(注 3)，第 3 - 4 页。

6 潘达•A，“独家报道:揭秘朝鲜第一个秘密铀浓缩基地”，《外交官》，2018 年 7 月 13 日。

7 马登•M，“降仙麻烦不断”，北纬 38°，2018 年 8 月 3 日;奥尔布赖特•D，“降仙：疑似铀浓缩厂”，《图片摘要》，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2018 年 10 月 2 日。

8 库巴•C，迪拉尼安•K 和李•C•E，“美国官员表示，朝鲜增加了秘密核生产地点”，NBC 新闻，2018 年 7 月 1 日；中岛康介•E 和瓦里克•J，“美国官员称，朝鲜试图隐瞒其核计划的核心部分”，《华盛顿邮报》，2018 年 6 月 30 日。

9 朝鲜中央通讯社，“金正恩发表新年讲话”，2018 年 1 月 1 日。见本卷第 7 章第 1 节。

10 瓦里克•J，“美国分析人士称，朝鲜目前正在制造导弹核武器”，《华盛顿邮报》，2017 年 8 月 8 日。

11 柳•K•M，2019 年 1 月 16 日，“国防部新版白皮书删去了将朝鲜称为‘敌人’的措辞”，《韩民族日报》，2019 年 1 月 16 日。

12 朝鲜中央通讯社，“朝鲜氢弹试验成功”，2016 年 1 月 6 日。

13 凯勒•J，费森德•F 和华莱士•T，“为什么专家怀疑朝鲜测试了氢弹，《纽约时报》，2016 年 1 月 6 日；日本防卫省（MOD），2018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MOD:东京，2018），第 68 页。

14 NORSAR，“2017 年 9 月 3 日朝鲜核爆炸：修正震级评估”，2017 年 9 月 12 日。

15 朝鲜中央通讯社，“朝鲜核武器研究所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氢弹”，2017 年 9 月 3 日。

16 哈斯丁•J，李•H 和凯利•R，“朝鲜的锂研究网络及其对氢弹的探索”，《韩国防务分析杂志》，第 30 卷，第 3 期(2018 年 9 月)，第 337-52 页。

17 朝鲜中央通讯社，“金正恩出席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018 年 4 月 21 日。

18 2006 年 10 月，2009 年 5 月，2013 年 2 月，2016 年 1 月和 9 月，以及 2017 年 9 月，朝鲜在该地区进行了核试验爆炸。试验当量逐级增加。

19 韩联社，“朝鲜报告丰溪里核试验场被毁”，2018 年 5 月 24 日。

20 BBC 新闻，“朝鲜核试验场可能在坍塌后无法使用---中国科学家”，2018 年 4 月 25 日。

21 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朝鲜导弹试验数据库，2018 年 12 月访问数据库。朝鲜在 2017 年进行了 20 次此类导弹试验。

22 朝鲜中央通讯社(注 17)。

23 见菲茨帕特里克•M，“朝鲜暂停核试验?”，《香格里拉之声》，国际战略研究所，2014 年 5 月 27 日。

24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2017 年 7 月)，第 18、25 页。

25 萨维尔斯伯格•R 和基斯林•J，“朝鲜舞水端导弹:性能评估”，北纬 38°，2016 年 12 月 20 日。2016 年，朝鲜对舞水端系统进行了 8 次飞行测试。只有一次被判定为取得成功。余下试射中，导弹在发射时或升空后不久爆炸。

26 易•Y，“朝鲜洲际弹道导弹发展的一块垫脚石”，《韩民族日报》，2017 年 5 月 16 日;扎韦尔斯贝格•R，“快速分析火星-12 导弹”，北纬 38°，2017 年 5 月 19 日。

27 埃尔曼•M，“朝鲜火星-12 导弹发射:一个令人不安的进展”，北纬 38°，2017 年 5 月 19 日。

28 潘达•A，朝鲜对“火星-12”洲际弹道导弹信心大增，《外交官》，2017 年 9 月 17 日。

外交官，2017 年 9 月 17 日。

29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注 24)，第 25 页。

30 潘达•A，“这并非洲际弹道导弹，但朝鲜 2017 年第一次导弹试验意义重大”，《外交官》，2017 年 2 月 14 日。

31 施麦莱•D 和刘易斯•J，“朝鲜扩大其核心导弹基地”，《军控专家》，2018 年 7 月 2 日。

32 阿里•I，“美国将军说朝鲜并未公开其洲际弹道导弹的所有组件”，路透社，2018 年 1 月 30 日；阿克顿•J，“评估朝鲜在发展核武装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进展”，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8 年 5 月 4 日。

33 席勒•M 和凯利•R，“不断演变的威胁：朝鲜寻求洲际弹道导弹”，《简氏防务周刊》，2017 年 1 月 18 日，第 24 页。

34 席勒和凯利(注 33)。

35 据一名非政府分析人士说，朝鲜可能是通过在俄罗斯或乌克兰非法渠道获得这台发动机。埃尔曼•M，“朝鲜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秘密”，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客，国际战略研究所，2017 年 8 月 14 日。

36 赖特•D，“朝鲜洲际弹道导弹似乎能打到美国大城市”，万物核博客，忧思科学家联盟，2017 年 7 月 28 日。

37 埃尔曼•M，“朝鲜火星-14 洲际弹道导弹:新数据显示射程比众人认为的要短”，北纬 38° 网站，2017 年 7 月 28 日。

38 赖特•D，“重返大气层-朝鲜火星-15 导弹”，万物核博客，忧思科学家联盟，2017 年 12 月 7 日。

39 埃尔曼•M，“朝鲜第三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北纬 38° 网站，2017 年 11 月 29 日。

40 朝鲜中央通讯社，“朝鲜政府关于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成功的声明”，2017 年 11 月 29 日。

41 阿克顿(注 32)。

42 赖特(注 36);埃勒曼(注 37)。

43 金•C 和索洛维约夫•D，“首尔表示，朝鲜已将华盛顿置于射程之内，但关键技术还有待证实”，路透社，2017 年 12 月 1 日。

44 席林•J，“为朝鲜研制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北纬 38° ，2016 年 4 月 25 日。

45 赖亚尔•J，“朝鲜对潜艇导弹系统进行“史无前例”的试验”，《每日电讯报》，2017 年 8 月 1 日。

46 贝穆德斯•J，“朝鲜潜艇弹道导弹计划取得进展：有造船和导弹弹射测试的迹象”，北纬 38° ，2017 年 11 月 16 日。

第 10 节．2018 年全球裂变材料库存及生产

莫里茨•库特，齐亚•米安，帕维尔•波

国际裂变材料专家小组

对于所有类型核爆炸物，从第一代裂变武器到先进的热核武器，能够维持爆炸性裂变链式反应的材料都必不可少。这些裂变物质中最为常见的就是高浓缩铀(HEU)和钚。本节详细介绍了目前高浓缩铀(表 16.11)和分离钚(表 16.12)，包括武器级裂变材料，以及此类材料的当前生产能力细节(表 16.13 和表 16.14)。表中信息根据全球裂变材料报告(IPFM)最新估算。2018 年年底，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布了最新的关于民用钚和高浓缩铀库存的年度声明，数据截止至 2017 年年末。截至 2019 年 1 月，自 1997 年开始提交此类年度申报的中法英美，均未提交。

高浓缩铀和钚的生产都是从天然铀开始。天然铀的成分几乎全是不能进行非链反应的铀- 238 (U-238)同位素，而铀- 235 的含量约为 0.7%，但铀-235 的浓度可以通过浓缩法提升——最常见的办法就是使用气体离心机。经过浓缩的铀，若铀-235 含量低于 20%(通常为 3% - 5%)，则适合用于核电反应堆。如果铀-235 含量达到 20%以上，则被称为“HEU”（高浓缩铀），通常被认为是武器级铀的最低浓度。然而，为了尽量最大限度核爆物质质量，武器级铀通常浓缩到超过 90%含量。钚的生产是在反应堆中通过中子辐射铀-238，然后以化学后处理办法将其乏燃料中分离出来。钚的形态是多种同位素混合体，其中大部分可用于武器。武器设计师更倾向使用主要含钚-239 的同位素，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中子和伽马射线自发放射较低，其放射性衰变所消耗的热能较小。武器级布通常含有 90%以上的钚-239 同位素。核电厂反应堆乏燃料里的钚（反应堆级钚）一般只含 50%-60%的钚-239，但均已可用于核武器，甚至第一代核武器的设计原理就是如此。

表 6.11 2018 年全球高浓缩铀库存量

国家	库存量（吨）a	生产状况	说明
中国	14±3	1987-1989 年停产	
法国 b	30±6	1996 年停产	包括已宣布的 4.8 吨民用铀 c
印度 d	4.4±1.5	继续生产	包括海军核反应堆高浓缩铀
以色列 e	0.3	——	
巴基斯坦	3.6±0.4	继续生产	
俄罗斯 f	679±120	1987-1988 年停产	包括约 6 吨用于研究应用
英国 g	21.9	1962 年停产	包括 1.37 吨宣布为民用
美国 h	571（其中 92 吨为非军事用途）	1992 年停产	包括海军反应堆留存
其他国家 i	-15		
总量	1340		

HEU = 高浓缩铀

a 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丰度为 90%-93%的浓缩铀-235，通常被视为武器级。对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也进行了说明。上表数据均为截至 2017 年年末。

b 估计数不确定性只是针对约 26 吨军事库存，而并非针对申报的民用库存。最近一项分析大大降低武器级高浓缩铀的储存估计数提供了依据（高达 10±2 吨或低至 6±2 吨），有证据表明，皮埃尔拉特浓缩厂的有效运行期可能比先前设想的要短得多，武器级高浓缩铀的生产能力也比以前设想的要小得多。

c 截至 2019 年 1 月，未向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提交 2017 年底关于高浓缩铀库存的 INFCIRC/549 声明。这一数据是基于 2016 年声明。

修订后的估算是基于国际裂变材料小组（IPFM）对中国裂变材料生产和库存的新评估做出。

d 据信印度正在生产高浓铀（浓缩至 30-45％）用作海军反应堆燃料。估计高浓铀的浓度为 30％。

e 以色列可能在 1965 年或之前从美国获得了大约 300 公斤的武器级高浓铀。

f 这个估计可能低估了俄罗斯的高浓铀量，因为假定俄罗斯在 1988 年停止生产所有高浓铀。然而，俄罗斯可能在 1988 年之后还在继续生产民用和非武器军事用途高浓铀。海军反应堆废料不计入当前库存，因为其浓度低于 20％铀-235。

g 截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英国宣布储存 21.9 吨高浓铀，其平均浓缩没有给出。随着英国继续在海军反应堆中使用高浓缩铀，海军乏燃料将会越来越多。

h 美国高浓缩铀的数量为实际吨量，并非 93%浓缩当量等值换算。2016 年，美国宣布，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美国 HEU 库存为 585.6 吨，其中 499.4 吨用于国家安全或非国家安全项目，含核武器，舰船推进燃料，能源及科研用途。余下的 86.2 吨，其中 41.6 吨如果不是作为低浓度废料，就可能被稀释成低浓度铀，另外还有 44.6 吨的乏燃料。可供使用 HEU 存量降至约 484 吨。已宣布的 92 吨剩余 HEU 以及需要稀释的相关核材料中，75.1 吨已完成稀释和 20 吨将被海运至稀释地的核材料。

i 2017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年度报告列出了截至 2017 年年底的非核武国家全面保障措施下存储 HEU 共 169 项核心数量数据。考虑到材料浓缩程度的不确定性，多数为实验堆燃料，将其假设为 15 吨 HEU。其中大约 10 吨在哈萨克斯坦，并已受到辐照;它最初为略高于 20%的燃料。很可能，此材料经过辐照已不再是 HEU。

j 总数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 5 吨数量。

资料来源：2015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核武器和裂变材料库存及生产（IPFM：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5 年 12 月），中国:张·H。

法国：法国关于钚管理政策的来文，INFCIRC/549/Add.5/21，2017 年 9 月 29 日;菲利普.S，格拉泽.A，《气体扩散浓缩工厂的核考古学》，《科学和全球安全》，第 66 期，No2.（2014 年），第 27-49 页。以色列：迈尔斯.H，“以色列第一种裂变材料的真正来源”，《今日军控》，第 37 期，No.8（2007 年 10 月），第 56 页;另见吉林斯基 V， 马特森.R.J,“重访 NUMEC 事件”,《原子科学家公报》，第 66 期，No2，(2010 年 3 月/2010 年)。英国：英国国防部（MOD），英国国防高浓缩铀历史记录，2006 年 3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就其钚管理政策来文 INFCIRC/549/Add.8/18，2015 年 10 月 8 日。美国：美国能源（DOE），高度浓缩铀，达到平衡：1945 年至 1996 年 9 月 30 日美国高浓铀生产，采购和利用活动的历史报告（能源部：华盛顿特区，2001 年）;个人通讯，美国能源部，裂变材料处置办公室，国家核安全局;新闻秘书白宫办公室，情况说明：美国高浓缩铀库存透明度”，2016 年 3 月 31 日;艾恩·C·W，“美国剩余高浓缩铀处置状况”，核材料管理学会，2016 年 7 月 26 日，亚特兰大，第 57 届年会“无核武器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能源部，2019 财年国会预算申请（能源部，华盛顿特区，2018 年 3 月），第 474 页；“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7 年年度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维也纳，2017 年），附件表 A.4， 第 119 页。

表 6.12　2018 年全球分离钚存量

国家	军用库存（吨）	军用生产状况	民用库存（吨）a
中国	2.9±0.6	1991 年停产	0.04b
法国	6±1.0	1992 年停产	65.4（不包括国外存放）b
印度 c	0.57±0.15	继续生产	6.9±3.7（包括受保护监督的 0.4 吨）
以色列 d	0.92±0.13	继续生产	---
日本	——	——	47.3 吨（包括存放在英国和法国的 36.7 吨）
朝鲜 e	0.04	不确定	——
巴基斯坦 f	0.31±0.1	继续生产	——
俄罗斯 g	128±8（申报 40 吨过剩量）	2010 年停产	59.0
英国	3.2	1995 年停产	110.3（不包括外国拥有的 23.2 吨）
美国 h	79.8（申报 41.4 吨过剩量）	1988 年停产	8i
其他国家 j	——	——	2.3b
总量 k	-220（其中 81 吨为申报过剩）		-300

——=零或数据可忽略不计

a 一些国家将所拥有的民用钚储存在海外，主要是在法国和英国，但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按照 IAEA INFCIRC/549 宣言要求提交报告。这些国家包括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数据截至 2017 年底。截至 2019 年 1 月，中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尚未就 2017 年底的民用钚进行申报。这些国家数据是根据先前申报估算得出。

b 截至 2017 年年底，IAEA INFCIRC/549 报告并未提交至 IAEA。数据是根据 2016 年申报估算得出。

c 尽管印度核储备在不断增长，但由于其 Dhruva 反应堆性能新的公开信息，目前估计数较上年估算数有所减少。作为 2005 印度-美国民用核合作倡议的一部分,印度已经将分离钚归于军用范畴。尽管钚在这里被打上了民用的标签，因为用作增殖反应堆燃料，但在印度政府和 IAEA 在 2009 年 2 月 2 日签订的“仅限印度”的保障协议中，钚并未被置于安全保障之列。印度没有提交国际原子能机构 INFCIRC/549 号声明。

d 据信，至 2015 年年底以色列仍在运行迪莫纳钚生产反应堆，但可能主要用于氚生产，数据截至 2017 年底。

e 据报道，朝鲜在 2008 年 6 月宣布钚储备为 37 公斤。朝鲜在 2009 年恢复了钚的生产，但在 2009 年以来进行的 6 次核试验中，有 5 次可能消耗了一些材料。钚生产反应堆和放射性化学工厂似乎处于待命状态。

f 截至 2017 年底，巴基斯坦在其库沙布核电站运营 4 座钚生产反应堆。这一估计假设巴基斯坦在 2017 年从所有 4 个反应堆的冷却乏燃料中分离出钚。

g 不能用于武器的 40 吨钚包括储存在马雅克裂变材料储存设施的 25 吨武器来源钚,1995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4 月 15 日期间产生的约 15 吨武器级钚，随后最后一个钚生产反应堆关闭。根据 1997 年签署的美俄钚生产反应堆协议条款，目前储存在热列兹诺戈尔斯克的 1994 年后钚不能用于武器目的。俄罗斯承诺销毁 34 吨钚不可用钚。作为 2000 年美俄钚管理和处置协议的一部分，武器（包括储存在马雅克的所有 25 吨钚）于 2000 年结束。俄罗斯在其 INFCIRC / 549 声明中不包括不可用于武器的钚。 它也没有使它报告的钚作为平民可用于原子能机构的相应保障措施。

h 2012 年，美国宣布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美国政府拥有钚库存量为 95.4 吨。在 2016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 INFCIRC / 549 声明中，美国宣布 49 吨未经辐照的钚（分离和 MOX）作为库存的一部分，被认定为军事目的过剩。由于这些材料大部分以分类形式存储，因此被视为军用库存。美国认为总共有 61.5 吨钚被宣布为超出国家安全需求。其中包括 49 吨未经辐照的钚，4.5 吨作为废物处理的钚，自 1994 年以来因放射性衰变而损失 0.2 吨，以及 7.8 吨经辐照的政府拥有的钚。INFCIRC / 549 报告的钚还包括 2016 年从日本，德国和瑞士运往美国的 0.4 吨钚（分别为 331 千克，30 千克和 18 千克）。与 49 吨未经过辐照的多余钚一样，这种材料不会用于武器。但是，它没有被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因此它与军事材料一起计算在内。

i 美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下，将约 3 吨多余的钚储存在萨凡纳河核电站的 K 区材料储存设施中。此外，报告称，未经辐射的 MOX 燃料中含有 4.6 吨钚，还申报了 2016 年从日本、德国和瑞士运到美国的 0.4 吨钚（分别为 331 公斤、30 公斤和 18 公斤）。所有这些材料都被认定为民用用途。

j 估算是将 INFCIRC/549 报告中申报为“属于他人”的钚中减去“其他地方持有”的钚。
k 总数四舍五入至最近的 5 吨。
资料来源：2015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核武器和裂变材料库存及生产（IPFM：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5 年 12 月）。
民用库存(印度除外):各国向 IAEA 的申报，INFCIRC/549。中国:张・H，中国的裂变材料产品和库存（IPFM：普林斯顿，新泽西州，2017 年 12 月）。
朝鲜:凯斯勒・G，2008 年 7 月 2 日，《华盛顿邮报》;赫克・S，《我们对朝鲜核武器的真正了解》，《外交事务》， 2017 年 12 月 4 日。俄罗斯:2000 年 8 月 29 日和 9 月 1 日签署的《关于不再用于国防目的和有关合作项目下钚的管理和处置协定》(俄美钚管理和处置协定)，经 2010 年 4 月修订，于 2011 年 7 月生效。美国：国家核安全局（NNSA)，美国钚平衡，1944-2009（国家核安全局：华盛顿特区，2012 年 6 月)，冈特・A，“美国能源部，环境管理办公室，K 区概况/更新”，2015 年 7 月 28 日。

表 6.13 2018 年世界主要铀浓缩设施和能力

国家	设施名称及所在地	类别	状况	浓缩程序 A	浓缩能力（SWU/年）B
阿根廷 C	皮尔卡尼耶乌	民用	恢复运行	GD	20
巴西	雷森浓缩铀厂	民用	扩建	GC	35
中国 D	兰州	民用	运行	GC	2600
	汉中（陕西）	民用	运行	GC	2000
	峨眉山	民用	运行	GC	1050
	贺平	军民两用	运行	GD/CP	230
法国	乔治贝斯浓缩厂 2 期	民用	运行	GC	7500
德国	格罗瑙厂	民用	运行	GC	4000
印度	Rattehalli	军用	运行	GC	15-30
伊朗 E	纳坦兹	民用	有限运行	GC	3.5-5
	库姆（ 福尔多）	民用	闲置	GC	...
日本	六所村 F	民用	恢复运行	GC	75
朝鲜	宁边 G	。。	不确定	GC	8
荷兰	阿尔默洛	民用	运行	GC	5300
巴基斯坦	加德瓦尔	军用	运行	GC	...
	卡胡塔	军用	运行	GC	15-45
俄罗斯	安加尔斯克	民用	运行	GC	4000
	新乌拉尔斯克	民用	运行	GC	13300
	谢维尔斯卡	民用	运行	GC	3800
	泽列诺戈尔斯克 H	民用	运行	GC	7900
英国	卡本赫斯特	民用	运行	GC	4700
美国 I	尤尼斯	民用	运行	GC	4800

A 气体分离 （GC）是用于提高铀中的铀 235 含量的主要同位素分离技术，但还有一些设施继续使用气体扩散技术。（GD）

B SWU /yr 是一年的分离功；一个 SWU 是计量浓缩设施中把一定量的铀 235 分离成高低两种浓度的铀 235 所作的功。表中标出的能力范围是表示该设施正在努力扩大能力，或表示估量具有不确定性。

C 2015 年 12 月，阿根廷宣布计划恢复皮尔卡尼耶乌铀生产，该浓缩工厂曾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关闭。

D 2015 年对中国浓缩能力的最新评估发现了新的浓缩场所，表明中国当前的浓缩能力大大高于先前预估。2017 年报告对上述估算进行了修正。

E 2015 年 7 月，伊朗同意了一项“联合综合行动计划”，结束了纳坦兹铀浓缩作业，但保留了离心机运行，并对纳坦兹的 5060IR-1 离心机产能进行限制（相当于约 3500-5000 SWU /年），为期十年。

F 六所村离心机工厂正在进行新离心机技术技改，自 2013 年以来要么没有运行，要么一直在低负荷运行。由于维修问题，工厂于 2017 年 9 月暂停运营。

G 北韩在 2010 年透露了其宁边浓缩设施，运行状况未知。据信，朝鲜正在其他地方至少有一个在产浓缩设施。

H 泽列诺戈尔斯克正在为快堆和研究堆燃料的高浓缩铀生产运行级联。

I 派克顿（美国浓缩公司，USEC）和伊格尔罗克（法国阿海珐）的新离心浓缩厂分别因技术和财务原因而搁置。

资料来源：印度-亚洲新闻服务，’阿根廷总统为浓缩铀工厂剪彩’，商业标准，2015 年 12 月 1 日; 张・H，“中国铀浓缩复合体”，《科学和全球安全》第 23 期，No.3(2015),第 171-190 页;张・H，中国的裂变材料生产和库存（国际裂变材料小组：普林斯顿，新泽西州，2017 年 12 月）。增资能力数据基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综合核燃料循环信息系统（INFCIS）;铀浓缩网站;和国际裂变材料小组（IPFM），2015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核武器和裂变材料库存和生产（IPFM：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5 年 12 月）。

表 6.14 2018 年世界主要后处理设施

除特别标注外，所有设施均为轻水反应堆。

国家	设施名称或所在地	类别	状况	设计能力（Thm/yr）a
中国 b	兰州试验厂	民用	运行中	50
法国	La Hague(UP-2)	民用	运行中	1000
	La Hague(UP-3)	民用	运行中	1000
印度 c	卡尔巴卡姆（重水堆燃料）	军民两用	运行中	100
	塔拉普尔（重水堆燃料）	军民两用	运行中	100
	塔拉普尔（重水堆燃料）	军民两用	运行中	100
	特罗贝（重水堆燃料）	军用	运行中	50
以色列	迪莫纳（重水堆燃料）	军用	运行中	40-100
日本	JNC 东海	民用	将关闭 d	（以前为 200）
	六所村	民用	2021 年开始运行	800
朝鲜	宁边	军用	运行中	100-150
巴基斯坦	杰什玛（重水堆燃料）	军用	在建	50-100
	尼罗里（重水堆燃料）	军用	运行中	20-40
俄罗斯 e	马亚科 RT-1 奥焦尔斯克	民用	运行中	400
英国	BNFL B205 镁诺克斯反应堆	民用	2018 年将关闭	1500
	BNFL 塞拉菲尔德，索普	民用	2020 年将关闭	1200
美国	萨凡纳河工厂	民用	运行中	15

HWR -重水反应堆

a 设计能力是指该后处理厂按设计要求能够处理的最大乏燃料量，是以一年的重金属吨位(tHM/yr) 计量。tHM 是乏燃料中重金属数量的计量单位，在此处的重金属是铀。实际产量往往是设计产量的小部分。轻水堆乏燃料含量约为 1%的钚，重水堆和石墨堆乏燃料中约有 0.4%的钚。

b 中国正计划在酒泉建立一个年产能为 200tHM/yr 的后处理试点设施。

c 根据 2005 年签订的《印-美民用核合作倡议》，印度决定它所有的后处理厂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核查。

d 2014 年日本原子能机构宣布计划关闭其东海后处理厂的前端设备，进一步有效结束了进一步的钚分离活动。2018 年，日本核管理局批准核电站退役计划。

e 泽列诺戈尔斯克正在建设一个年产能为 250 tHM/yr 的试点实验中心。2018 年 6 月，启动了一条 5 吨/年的后处理试点生产线。第二条试验线预计将于 2020 年建成。

资料来源：设计能力数据基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综合核燃料循环信息系统（INFCIS）;和国际裂变材料小组（IPFM），2015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核武器和裂变材料库存和生产（IPFM：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5 年 12 月）。

第三部分：2018 不扩散、军备控制及裁军

第七章：核裁军、军备控制及不扩散

第八章：化学和生物安全威胁

第九章：常规军备控制

第十章：军民两用品和武器贸易管制

第七章 核军控和不扩散

概述

2018 年，在美国的一再敦促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 或北朝鲜)和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前，联合国多项决议也表示支持---即朝鲜实现可核查的放弃其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见第 1 节)。6 月，美国现任总统和朝鲜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首次首脑会晤，之后朝鲜承诺将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作为年内缓解政治军事紧张局面的重大举措，朝鲜宣布暂停核武及弹道导弹试验，并销毁核武试验场。

2018 年，俄美完成 2010 年《进一步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新 START)的实施工作。今年 2 月，两国宣布在最后期限前达到新 START 设定的最终削减下限。然而，保持住冷战结束后俄美核军控进展的势头似乎越来越渺茫。除非两国同意延长新 START 期限，否则新 START 到 2021 年就将寿终正寝。俄美两国对新 START 框架之外，进一步就核武削减进行谈判，似乎都没兴趣。俄美两国在导弹防御系统和先进常规武器打击系统上已是剑拔弩张，愈发凸显出两国在核军控目标及优先事项上存在着巨大分歧。

2018 年，俄罗斯和美国在冷战时期划时代条约-1987 年苏联和美国关于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的条约(中导条约-INF，见第 2 节)上龌龊不断，核军控前景也倍受质疑。美国声称，俄罗斯已经开发并部署了一种地面机动发射巡航导弹，该型导弹射程范围是条约所禁范围，而俄罗斯则一直认为这一指控毫无根据。今年 10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如果俄罗斯不及时回应美国的关切，美国将正式退出 INF。今年年底，人们越来越悲观地认为，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系统之际，俄美任何一方都不会自废武功。

2018 年，伊朗继续执行 2015 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伊核协议为一项八方协议，旨在限制伊朗扩散其敏感核活动，并使国际社会对伊核计划完全和平性质重拾信心(见第 3 节)。2018 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伊核协议危如累卵。5 月，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在协议下豁免的对伊制裁。伊朗向其他签字国发出呼吁，尤其呼吁欧盟，不要受到美国的干扰，至少确保伊朗在恪守伊核协议下应得的一定程度上的制裁豁免，这也

是伊朗在伊核协议框架下的主要利益诉求。

2018 年，世界各国努力推进的实现全球核军控长期目标的一大重心(见第 4 节)，仍为《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TPNW 于 2017 年开放签字。TPNW 是具备法律约束力的第一部禁止发展、部署、拥有、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条约。2018 年，一些国家就各自政府是否应加入 TPNW 进行了辩论。辩论的重心往往是评估拟议的禁核合规影响及其对核威慑安全战略及联盟关系的影响。条约将在 50 个国家签字批准后生效。

2018 年，核裁军、军控和不扩散相关多边条约和倡议也都有进展（见第 5 节）。4 月至 5 月，202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5 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提出了一项新的联合国裁军议程，确定若干优先任务，包括减少和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MD)。6 月，裂变材料禁产条约(FMCT)高级别专家筹备组完成既定任务，通过最终报告，就今后禁产条约谈判范围及实质性内容提出了建议。12 月，联大首次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在 2019 年召开一次关于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主题会议。

泰蒂·埃拉斯特，香农·N·基勒和皮特·托皮奇卡诺夫

第 1 节.朝美核外交

美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或 DPRK)因朝鲜长期发展核武和弹道导弹运载系统，两国关系一直紧张。2018 年，朝美重新开始外交接触，两国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其背景是南北朝鲜和平进程出现波折之时。[1]美国带领国际社会，一同谴责朝鲜核武及导弹计划，并要求朝方立即以可核查方式停止一切相关核活动。2006 年以来，美国就一直在安理会推动国际社会对朝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和其他惩罚措施，迫使朝鲜放弃其核武及导弹计划。[2]

2017 年底，朝美紧张局势似乎正在升级，甚至走到军事冲突边缘。2017 年，朝鲜进行了有史以来第 6 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核爆试验。朝方声称是热核武器(氢弹)，并进行了 23 次中远程弹道导弹试射。[3]美国特朗普政府强调，如果朝鲜胆敢以核武威胁美国，美国将选择对其实施预防性军事打击。[4]

与朝鲜重新展开对话和接触的这一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宣布，尽管遭受美国为首的国际制裁和极限施压，朝鲜已成功完成“核自卫队”组建。金正恩同时宣布，朝鲜将开始大规模生产和部署核弹头和弹道导弹，其“其威力和可靠性”都已得到验证，这也正是对美国“军事冒险”的最好震慑。[5]

与此同时，金正恩呼吁朝鲜和韩国针对朝鲜半岛严重紧张局势采取“果断措施”，促进和平与和解。韩国总统文在寅对金正恩作出回应，邀请朝鲜可在联合统一旗帜下，派运动员参加即将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6]此举被人们称作朝韩奥运外交，为朝韩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动作铺平道路。

一系列隔空喊话后，韩国在推动朝美直接对话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3 月 8 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朝鲜高级政务代表团。代表团转达了金正恩领导人的口信。金正恩建议双方尽快见面。金正恩已确认实现“半岛永久无核化”承诺，并承诺朝鲜停止一切核试验及导弹试验，包括在即将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期间停止一切相关试验。[7]

朝方代表团访美后，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已接受金正恩的邀请举行双边首脑会议。[8]美国政府官员随后表示，朝美首脑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将会在近期决定，同时“所有制裁和对朝最大压力”都将保持不变。[9]

4 月 20 日，金正恩在执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宣布，实现强大的核威慑力量意味着朝鲜先前执行的“齐头并进政策”（即朝鲜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发展核武的路线）将被一条“新战略线”所取代——新战略将只关注经济发展。[10]金正恩同时正式宣布立即停止核武及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并立即关闭和拆除朝鲜核武器试验场。后续工作目标为“公开透明的确保”停止核试验。[11]然而，金正恩并未表明朝鲜是否准备接受将朝核武及弹道导弹的可核查上限，作为与美国进行无核化谈判的前提条件。[12]

4 月 27 日，金正恩和文在寅在位于非军事区的板门店村举行了朝韩首脑会晤，这是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也是南北朝领导人有史以来的第三次会晤。两国领导人发表一项联合声明，承诺采取措施缓和朝韩军事紧张局势，开启“民族和解与建设和平的新时代”。两国领导人还确认了“通过彻底去核化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宣言》并未具体说明为实现这一目标应采取的具体步骤，但提到朝鲜最近宣布暂停其核武及导弹试验是“对半岛无核化非常有意义同时极其重要的重大举措”。[13]

朝美首脑会晤

会议筹备

经美国、朝鲜和地区其他相关国家政府官员讨论，最终达成协议，6 月 14 日将在新加坡举行金特峰会。[14]由于双方对无核化的含义存在分歧，朝美官员关于峰会可能达成协议的初步讨论很快陷入僵局。[15]

尽管有时存在表述上的不一致，但美方官员采取的是本方利益最大化立场，即要求朝鲜实现“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CVID)。[16]这也将要求朝鲜以最快速度消除所有核武器、裂变材料和相关生产和测试设施及远程弹道导弹。美国官员坚称，这是朝鲜朝着双边关系正常化迈出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步--包括最终取消制裁以及缔结一项结束 1950-53 年朝鲜战争的和平条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将 CVID 称为“利比亚模式”，即利比亚 2003 年与美国达成协议，公开并拆除其尚在襁褓中的核武计划，销毁生化武器，限制其弹道导弹射程和有效载荷，以换取美国随后解除其对制裁和其他限制。[17]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根据利比亚协议制定 CVID,博尔特炮制出的只是毫无必要的相互猜忌。因为协议执行后，事态的最终走向出乎意外，最终导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死亡。[18]

博尔顿的表态引发朝鲜强烈谴责。朝鲜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金桂冠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将核武国家朝鲜与处于核武发展初期的利比亚相提并论。声明警告称，

如果美国奉行旨在迫使朝鲜单方面“弃核”的战略，那么朝鲜领导人将重新考虑参加首脑会议的决定。[19]

此外，声明还解释到，朝鲜“多次明确表示，实现无核化的先决条件”是美国结束其数十年的“敌对政策”，并“提供安全保障”。[20]这也就首先要求美朝缔结永久和平条约正式结束朝鲜战争。据报道，朝鲜在上月放弃了将美军撤出韩国作为放弃核武的要求，已经做出重大让步。[21]

新加坡首脑会议联合声明

2018 年 6 月 12 日，特朗普和金正恩在各自代表团陪同下在新加坡会晤。[22]这是美国现任总统和朝鲜领导人之间首次会晤。

会晤结束后，金正恩和特朗普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特朗普总统“承诺为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重申了他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坚定不移的承诺”。声明同时表示，两国将举行“后续谈判”．．尽早落实首脑会议成果。[23]声明还表示，朝美两国将“共同努力，在分裂的半岛上建立一个持久稳定的和平制度”，其中包括举行会谈，以缓和紧张军事局面，最终达成一项结束朝鲜战争的正式和平条约。特朗普总统公开宣布“不再有来自朝鲜的核威胁”。[24]

联合声明中无核化承诺全球反应褒贬不一。尽管许多国家领导人称赞这是朝着化解朝美紧张局势迈出的积极一步。但是也有人指出，还需要观察后续具体措施来执行情况，是否能够保持当前积极的外交势头。[25]

在美国分析人士眼中，这份联合声明措施含糊、虚无缥缈，广为诟病。人们对金正恩承诺的“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表示相当怀疑，这一承诺和朝鲜领导人在上世纪 90 年代早期国际谈判中的承诺如出一辙。许多批评人士指出，金正恩在联合声明中对承诺采取何种具体行动实现这一目标或时间表闭口不谈。此外，联合声明并未提及无核化进程的先后顺序或核查机制。[26]考虑到人们相信朝鲜早就把敏感的核武器生产设施化整为零藏匿起来，后项遗漏尤其令人担心。[27]

新加坡首脑会议后续事态发展

朝美无核化僵局

新加坡首脑会议结束时，特朗普总统预测，朝鲜半岛无核化将“非常迅速”

铺展开始。[28]然而金特会后，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29]

一个核心障碍仍然是美国和朝鲜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既定目标范围和步骤顺序上长期存在分歧。以约翰博尔顿为首的美国官员坚持要求朝鲜提供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公开其核武器储备、核生产设施和导弹，以证明其无核化承诺。朝鲜拒绝在没有永久和平条约的情况下披露任何此类信息。据报道，金正恩表示，这样做等于给敌人一份军事打击目标清单。[30]

还有一个障碍与之关联，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在朝鲜实现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解除其核武及远程弹道导弹计划之前，制裁和其他对朝施压都将依旧。2018 年 9 月举行的安理会成员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赞正是制裁迫使朝鲜重回谈判桌。蓬佩奥誓言，在朝鲜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之前，美国不会同意放松对朝制裁。[31]

就朝鲜而言，在最初敦促美国正式宣布结束朝鲜战争后，朝鲜越来越坚持分阶段解除国际制裁，是逐步无核化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朝鲜官媒指责美国政府“违背”关系正常化承诺，尽管朝鲜不断释放外交善意，其中包括停止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归还朝鲜战争阵亡美军士兵遗体。[32]朝鲜外交部撰文警告，如果美国政府顽冥不化，继续把“先无核化，后解除制裁”列为优先事项，朝鲜不排除重拾经济和核武器发展的“双轨制”。[33]

和特朗普政府立场争锋相对，中国和俄罗斯表示力挺朝鲜，呼吁放松对朝国际制裁。[34]9 月联合国安理会大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最近“积极的事态发展”，这是分阶段、同步推进无核化的重要一步。俄罗斯和朝鲜副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协调朝鲜半岛无核化三方进程，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调整”对朝制裁。[35]

改善朝韩关系

一面是朝鲜与美国在无核化问题举步维艰，一面是朝韩政治和经济关系稳步改善，朝着达成朝韩和平解决方案的方向不断推进。与此同时，韩国为破冰无核化僵局作出了更加积极的努力。

9 月 18 日至 20 日，文在寅和金正恩在平壤举行了 2018 年第三次首脑会议。[36]会议取得一系列成果，两国通过了一项军事对军事协定，规定将采取一系列步骤，以缓和朝韩边界紧张局势，并减少意外冲突的风险。[37]平壤共同宣言中，两

国领导人同意在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的进程中密切半岛合作。金正恩特别承诺，在“有关国家”专家的监督下，拆除位于平安省北部东昌里的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和发射平台。金正恩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按照新加坡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精神，采取(未具体说明)“相应措施”，朝鲜愿意释放更多善意，如永久拆除宁边核设施。[38]

11 月 20 日，美韩成立联合工作组，就朝鲜政策进行“定期、系统和正式”沟通。[39]这一举动也引发了人们的猜测，韩美在如何处理对朝关系方面似乎存在着分歧。一些观察家担心，韩国希望加强韩朝接触，这似乎同美国希望清除朝鲜核武及相关生产设施的目的相违背。[40]

迈向第二次首脑会议

2018 年 9 月，无核化谈判进展寥寥无几，美国特朗普政府面临巨大压力。呼吁美国与朝鲜继续推进无核谈判进程的呼声越来越大。10 月，韩国外交部长提议政府立即放弃核查朝鲜核武、弹道导弹及相关生产设施的要求，继而先搁置对宁边核设施关闭的核查，推进无核谈判。[41]

韩国的提议正好也扣合了美国几位主流分析人士的担忧---特朗普政府施压朝鲜政府，要求其全面公开其核武设施可行性究竟几何。[42]分析人士指出，此类声明必须辅以一个强有力的核查协议，因为朝美之间本就互不信任，如何奢求两方能够在现实的谈判中达成一致。与其画地为牢，不如更为现实的让朝鲜采取切实措施，降低其核能力，以换取朝美关系正常化的扎实推进。[43]分阶段、完全无核化，即实现全面无核化，但这需要更为长期、更为循序渐进的推进，每走一步都给与朝鲜补偿。然而，这种“走走停停、循环往复、最终消除”的做法可能需要十多年才能走完漫漫无核化之路。[44]

2018 年 10 月 7 日，迈克·蓬佩奥和金正恩在平壤会晤，并同意举行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议。[45]约翰·博尔顿随后表示，第二次首脑会议十分必要，因为朝鲜并未“履行在新加坡作出的承诺”。[46]与外界预期相反，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表示美国不会坚持要求朝鲜在第二次首脑会议之前提供其核武及导弹基地完整清单。[47]时至今年年底，双方并未确定第二次首脑会议的日期或地点。

1 关于朝韩国和平进程，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2 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的制裁决议摘要，见基尔·S·N《对朝鲜的国际核不扩散制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18 年年鉴，第 330-32 页。

3 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相关详细信息，见基尔·S 和克里斯滕森·H，“朝鲜军事核能力”，SIPRI 年鉴 2018，第 280-87 页。见军控协会，“美朝核导弹外交年表”。
4 贝克·P 和崔·S·H，“特朗普威胁称，如果朝鲜危及美国，迎接朝鲜的将是‘炮火和怒火’”，《纽约时报》，2017 年 8 月 8 日。
5 “金正恩发表新年讲话”，朝鲜中央通讯社(KCNA)，2018 年 1 月 1 日。
6 崔·S·H，“朝鲜和韩国将联合参加奥运会”，《纽约时报》，2018 年 1 月 17 日。
7 白宫新闻办公室，“韩国国家安全顾问钟义荣的讲话”，华盛顿特区，2018 年 3 月 8 日。
8 菲尔德·A，中村·D 和金·S·M，“特朗普接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华盛顿邮报》，2018 年 3 月 8 日。
9 白宫新闻办公室，“副总统迈克·彭斯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华盛顿特区，2018 年 3 月 9 日。
10 “金正恩出席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KCNA，2018 年 4 月 21 日。
11 金正恩出席朝鲜劳动党第七次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注 10)。关于关闭朝鲜北部丰溪里核武器试验场的详情，见本卷第 6 章第 10 节。
12 毛特·A 和潘达·A，“朝鲜并未无核化”，《大西洋月刊》，2018 年 4 月 21 日。
13 韩国联合通讯社《韩朝峰会联合声明全文》，2018 年 4 月 27 日。
14 “特朗普-金正恩峰会将在新加坡圣淘沙岛举行”，BBC 新闻，2018 年 6 月 6 日。
15 菲尔德·A，“朝鲜对‘无核化’的定义与特朗普的定义相去甚远”，《华盛顿邮报》，2018 年 4 月 9 日。
16 斯托·瑟斯顿和毛特·A，“我们在谈论朝鲜无核化时谈的是什么”，NK News.org 网站，2018 年 5 月 18 日。
17 军控协会，“利比亚裁军与美国关系年表”，简报，2018 年 1 月更新。
18 贝克·P，“利比亚是裁军的榜样?朝鲜可不这么看”，《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29 日。
19 “朝鲜第一副外长新闻声明”，朝中社，2018 年 5 月 16 日。
20 “朝鲜第一副外长新闻声明(注 19)。
21 兰得勒·M 和崔·S·H，“朝鲜削减了军购，但美国对此反应谨慎”，《纽约时报》，2018 年 4 月 19 日。
22“特朗普-金正日峰会将在新加坡圣淘沙岛举行”(注 14)。
23 美国白宫新闻办公室，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正恩新加坡峰会联合声明，2018 年 6 月 12 日。
24 特朗普称朝鲜“不再有核威胁”，韩联社，2018 年 6 月 13 日。
25“赞美、乐观、嘲笑:世界对特金会莫衷一是”，CBC 新闻，2018 年 6 月 12 日。
26 潘达·A，“特朗普新加坡峰会对美国来说是一场失败”，每日野兽网站，2018 年 6 月 12 日;加卢奇·R，“对新加坡峰会的反应”，北纬 38° 网站，2018 年 6 月 12 日。
27 中岛康介·E 和沃里克·J，“美国官员称，朝鲜试图隐瞒其核计划的核心内容”，《华盛顿邮报》，2018 年 6 月 30 日。
28 兰德勒·M，“历史性会谈后，特朗普宣布取得进展”，《纽约时报》，2018 年 6 月 11 日。
29 关于朝鲜正在进行的核活动，见本卷第 6 章第 9 节。
30 科尔·B，“金正恩不会告诉特朗普武器在哪里，因为这等于给美国一个‘打击目标清单’”，《新闻周刊》，2018 年 7 月 11 日。
31 哈里斯·G，“蓬佩奥欢迎朝美会谈，但表示制裁必须继续”，《纽约时报》，2018 年 9 月 27 日。
32 “美国的‘压力外交’将一无所获”，《劳动新闻》，2018 年 8 月 6 日。
33 “美国朝鲜问题研究所:外交部敦促美国放弃愚蠢的白日梦”，朝中社，2018 年 11 月 2 日。
34 博格·J，“中俄呼吁联合国放松对朝制裁”，《卫报》，2018 年 9 月 27 日。
35 李·J·H，“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呼吁在无核化之前调整制裁”，《南华早报》，2018 年 10 月 10 日。
36 金正恩和文在寅于 5 月 26 日在板门店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孔·K 和李·H，“金正恩文在寅闪电会晤讨论如何重启特金峰会”，彭博社，2018 年 5 月 26 日。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37 朝鲜全国委员会，“执行历史性《板门店军事领域宣言》达成共识”，2018 年 9 月 18 日。
38《2018 年 9 月平壤联合声明全文》，《韩国时报》，2018 年 9 月 20 日。
39 韩美工作组讨论朝鲜问题。
40 钱德兰·N，韩国的和平努力看起来与朝鲜去核“不同步”，CNBC 新闻，2018 年 12 月 4 日。
41 哈德逊·J，“韩国公布美朝会谈僵局破冰计划”，《华盛顿邮报》，2018 年 10 月 3 日。其他设施中，宁边核设施为朝鲜钚生产反应堆所在地。
42 赫克·S，卡林·R 和塞宾·E，“朝鲜核项目通史”，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2018 年 5 月 24 日。
43 赫克·S，“为什么坚持公布朝鲜核清单是一个大错误”，北纬 38°，2018 年 11 月 28 日。
44 赫克，卡林和塞宾(注 42)。
45 杨·J-S，“美朝峰会”不久就将举行：蓬佩奥，《韩国先驱报》，2018 年 10 月 7 日。
46 伯恩·L，“朝鲜不履行承诺，需要第二次峰会:博尔顿”，NK News.org，2018 年 12 月 4 日。
47 格迪·J，“特朗普将于 2019 年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规划朝去核进程”，路透社，2018 年 11 月 15 日。

第 2 节.美俄核军备控制与裁军

彼得·托皮奇卡诺夫，香农·基尔和伊恩·戴维斯

2018 年，日渐崩塌的俄美核军控和裁军议程，几乎丧失另一核心支柱。10 月，美国宣布，如果俄罗斯未能及时回应美国对俄方的合规关切，美国将正式退出 1987 年中导条约(INF 条约)。[1]2018 年年底，美国越来越悲观地认为，互相指责的俄美双方，任何一方都不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来应对合规，也都不会诚心维护中导条约。关于俄美在规定的最后期限前完成 2010 年《关于进一步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新 START)的执行工作方面，出现了一些更为积极的进展。[2]然而，通过谈判在新 START 框架之上，进一步削减已部署的战略核武，前景并不乐观。本节介绍中导条约以及新 START 在 2018 年的最新动态。

俄美军控议程的崩溃，与俄美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政治安全关系恶化，以及近些年来国际安全环境剧烈变化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不无关系。其他核武国家，尤其是中国。同时导弹防御、精确制导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等新技术领域发展，为现有核军控协议带来新挑战。

新 START 实施的最终限制范围

2018 年，俄美继续实施新 START。根据条约，双方同意将各自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限制在 1550 枚以内，并将各自部署的战略导弹发射台架及装备有核弹头的重型轰炸机数量限制在 700 架以内(见表 7.1)。

新 START 包含透明度和核查措施，如每两年交换一次数据、发出通知和每年多达 18 次的现场督查，这些措施有助于双方建立对各自战略核力量规模和构成的相互信任。条约双边协商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至 20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执行相关的实际问题。双方都未公开会议成果细节。[3]

表 7.1. 新 START 下俄美战略进攻武器总数
截至 2011 年 2 月 5 日至 2018 年 9 月 1 日

数据种类	条约数量上限	俄罗斯		美国	
		2011 年 2 月	2016 年 9 月	2011 年 2 月	2018 年 9 月
完成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	700	521	517	882	659
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上的弹头 b	1550	1537	1420	1800	1398
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及重型轰炸机	800	865	775	1124	800

ICBM = 洲际弹道导弹; SLBM = 潜射弹道导弹
a 2018 年 2 月 5 日完成。
b 每架重型轰炸机，无论是配备巡航导弹还是重力炸弹，均只计为携带 1 枚弹头，即便其可携带更大的武器载荷。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军控、核查和合规，‘新 START 条约下战略武器合计数’,简报,2018 年 9 月 1 日。

综合 2018 年 9 月收集的一年两次的条约数据显示，俄美核武保有量均在最终条约限制范围内(见表 7.1)。美方正式确认，已于 2017 年 8 月完成核弹头和运载系统削减，并 2017 年 8 月达到新 START 限制数量。[4]俄方正式确认，已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完成削减目标。[5]

根据美国 2017 年数据，美国证明俄罗斯遵守了新 START。[6]然而，美国还是通过外交渠道和双边协商委员会提出了执行相关问题。[7]俄罗斯也表示在新 START 展期或是进行任何谈判之前，必须妥善处理好相关执行问题。新 START 历经 10 年起起落落，2021 年 2 月大幕落下。新 START 条约注明可不结谈判延期 5 年。而在俄美军控前景一片灰暗之际，时至今年年底，双方是否同意再延长 5 年还看不到任何迹象。[8]

美国将新 START 延期或其他双边战略核武限制同其他若干问题挂钩，首先是指责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见下文)。2018 年 10 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与俄罗斯同行在莫斯科举行的会晤中，博尔顿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美国将在条约到期前就新 START 未来做出决定。[9]

中导条约：走向尾声？

2018 年 12 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俄罗斯，在美国 10 月威胁退

出中导条约(INF)后，俄罗斯还有“最后的机会”遵守 INF。[10]北约成员国说服美国给予俄罗斯 60 天的宽限期，直至 2019 年 2 月中旬，以迅速解决美国对俄罗斯条约合规的关切。[11] 俄罗斯一如既往的对美方的指责表示反驳，并对美国提出反诉。本节重点介绍了双方各自的立场，并对 2018 年重大事件进行了回顾。

INF 合规问题

根据中导条约，苏联和美国同意不拥有、生产或试飞中短程(500 至 5500 公里)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条约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从欧洲移除此类核常导弹。

美国在 2013 年首次提出俄罗斯条约合规问题。美国在 2014 年首次公开指责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原因是俄罗斯试射了一种新型陆基巡航导弹(GLCM)，此型导弹正好在中导条约所禁止范围之内。[12] 美国国务院随后每年都进行合规性评估，并每年都会对俄罗斯提出指控。[13]

俄罗斯一贯驳斥美方指控，称其毫无根据，并且批评美国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或是俄罗斯违反条约的具体事实。[14] 俄美在这一问题上的龃龉不断。2017 年，美俄之争扩大到公开层面。[15] 尤其是，美国指控俄罗斯部署了一个新 GLCM，并将其命名为诺瓦特 9M729(北约命名为 SSC-8)。[16]

导弹技术参数外界众说纷纭，美国并未公布俄方涉嫌违反条约的任何证据。然而，专家届一致认为 9M729 类似于海基中程巡航导弹口径，也是伊斯坎德尔系统的组成部分。伊斯坎德尔系统可发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均符合中导条约。[17] 美国在 2017 年开始对俄实施制裁，并威胁退出中导条约，逼迫俄罗斯遵守条约。如果俄罗斯一意孤行，美方将开始研发自己的中程弹道导弹。[18]

用于其他类型的导弹

俄罗斯对美国指控进行了反驳。俄罗斯声称，美国正在东欧部署一个导弹防御拦截系统 Mk-41 导弹系统(陆基宙斯盾)，宙斯盾系统也可用于发射禁止的 GLCM；使用与被禁中程导弹具有类似特性的目标进行导弹防御试验；以及制造符合中导条约 GLCM 定义的武装无人机。[19] 美国对俄罗斯的指控嗤之以鼻，认为俄罗斯是在转移人们对其违反条约的注意力。[20] 至少有一位美国独立专家认为，如果美国在东欧的宙斯盾系统装备巡航导弹，确实会违反中导条约。[21]

尽管 2016 年 11 月和 2017 年 12 月，中导条约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核查委员会举行了两次会议，并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间在其他几个地点进行了多次讨论，但

俄美双方互相谩骂指责却从未停歇。[22]

2018 年核心事态发展：美国在退约上同北约的协调

综合各方信息，同时结合美国在 2018 年 2 月发表的《核态势评估》(NPR)，证实了美国确实在开发新的中程 GLCM。NPR 同时还确定美国弹道导弹核潜艇正在研发“低当量”核弹头的可能性。[23]NPR 表示，这种能力将提升美国的核威慑能力。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拟议中的新核系统可作为向俄施压的工作，促使俄罗斯重新遵守中导条约。[24]

美国也开始加强在北约内部的协调。2018 年 7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最终宣言，强烈谴责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北约 2016 华沙峰会就已强调 INF 条约的重大意义，并呼吁俄罗斯“通过确保全面、可核查的遵守条约，保持条约的可执行性”。新宣言指出“最公正合理的评估也得出结论--俄罗斯违反了条约，并敦促俄罗斯采取切实和透明的行动，妥善解决美方关切，并与美国积极开展技术对话”。[25]

人们希望，2018 年 7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约峰会之后立即举行的赫尔辛基峰会，能够为解决中导条约争端营造出良好的政治氛围。[26]会晤结束后，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对话正在变得更为“专业和认真”。[27]然而，尽管普京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两国领导人同意就包括中导条约在内的若干问题共同努力，但首脑会议并未能取得任何进展。[28]

北约在 10 月初举行的国防部长会议，再次谈到了对中导条约的担忧。这次会议反映出北约成员国就俄罗斯在中导条约危机中的作用达成广泛共识：成员国一致认为俄罗斯长期以来就透明度匮乏，并拒绝提供任何可信答案。最客观的评估也能证明俄罗斯违反中导条约。[29]

10 月 20 日，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以此回应俄罗斯对中导条约的长期违规行为，以及对中国不受约束的储存中程导弹的担忧。[30]虽然美国并未正式提交退约通知，但美国为期 6 个月的正式退约时间窗口已然开启，这也意味着美方可在任何时间向俄罗斯提交通知。[31]特朗普的此番声明似乎让北约成员国感到惊讶，据报道，许多成员国在 10 月 25 日召开的北大西洋理事会--北约的主要政治决策机构，表达了他们的关切。[32]约翰·博尔特在几天后，如期参加俄罗斯会谈，会谈未能取得任何突破。[33]

尽管对 9M729 巡航导弹研制成功，俄罗斯虽一直讳莫如深，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俄罗斯依旧否认 9M729 已被测试或其射程已在中导条约限制范围之列。[34] 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上，北约官员再次敦促俄罗斯重回遵守条约的正确轨道。[35] 11 月，美国提供了据称是俄方违反中导条约进行导弹试验的更多细节。按照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丹·科茨的说法，俄罗斯在固定发射架上测试了射程超过 500 公里的 9M729 导弹系统---这是中导条约许可的---随后又在轮式发射平台对 500 公里以下射程进行了试验。科茨声称，俄罗斯随后又进行了“两种类型的试验”，以“开发一型轮式机动发射型中程导弹(中导条约禁止)”。[36]

据说欧洲外交官试图充当俄美的说客，调和俄美矛盾以挽救风雨飘摇的中导条约。12 月 4 日北约外长会议上，欧洲北约成员国的立场似乎变得强硬起来。[37]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上宣布，美国认为俄罗斯“严重违反”中导条约，除非俄罗斯恢复遵守，否则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然而，蓬佩奥并未发布正式的退出通知，而是给出一个 60 天的窗口期。到期之后，美国可暂停参与中导条约。[38] 北约外长发表一份声明，“强烈支持美国认定俄罗斯严重违反条约义务”。[39]

12 月 5 日，普京总统指出，俄罗斯将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作出“相应”回应。俄罗斯武装部队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表示，美国在欧洲北约成员国领土上的导弹基地可能成为“随后军事交流的目标”。[40] 然而 12 月 14 日，俄罗斯外交部一名官员建议，俄罗斯准备与美国讨论互查事项，抢救中导条约。[41]

中导条约还有明天吗？

漫天乌云中的中导条约，似乎已然前景渺茫。我们很难界定具体的违约情况，不仅仅是因为条约规定的合规视察制度早在 2001 年就已中止，同时美国不断指责俄方的 9M729 导弹系统，只到目前技术细节始终未得到证实。[42] 要想美国改变其退出决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俄罗斯“重新履行”其中导义务。这又似乎不太现实，因为俄罗斯一直否认美国的指控，而且辩称美国自身就在违背条约。

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政府前高官和专家已经探讨了挽救条约的潜在可能。其中包括 9M729 导弹系统的核查，以确定其是否可飞行 500 公里以上，并允许俄罗斯官员视察北约导弹防御地点，甚至修改 Mk-41 发射装置，使其无法实际装载或发射进攻性导弹。[43] 已经探讨了挽救条约的潜在途径。建议包括使 9M729 导弹系统可供视察，以确定其是否能飞行 500 公里以上，并允许俄罗斯官员视察北约导

弹防御地点，甚至修改 Mk-41 发射器，使其无法实际持有或发射进攻性导弹。43 然而，到了年底，对于美国官员而言，只有亲眼目睹 9M729 导弹系统被销毁，才能满足他们对恢复遵守条约的要求。[44]

此外，似乎俄美双方都乐见中导条约的坍塌，部分原因是俄美两国都担心中国不断增加的核常导弹库存，大多是在中导条约禁止范围之内。[45]同时人们也担心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伊朗有可能获得中程导弹。尽管过去有声音支持扩大中导条约适用范围，使其能涵盖更多国家。2007 年美俄联合声明，支持赋予这一重要制度以“全球属性”，但目前似乎对条约多变化兴趣不大。[46] 比如说，中国就表示没有兴趣加入。[47]

终止中导条约有可能造成 8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军控危机，并可能进一步破坏核军备机制框架。还可能导致俄美两国在欧洲重新部署以前被禁止的武器系统，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欧洲和亚洲部署新的反导防御系统。[48]

1 关于 INF 概要和其他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3 节。
2 关于新 START 概要和其他相关细节，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3 节。
3 美国国务院，“新 START 双边磋商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媒体注，2018 年 4 月 19 日。
4 诺尔特·H，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新 START Treaty 核心限制条款生效，2018 年 2 月 5 日。
5 俄罗斯外交部，“弗拉基米尔·耶尔马科夫，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不扩散和军备控制司司长，第 73 届联大第一委员会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团长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声明,纽约”，2018 年 10 月 10 日。
6 美国国务院，“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实施情况年度报告”，2018 年 1 月。
7 美国国务院(注 6)。
8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新闻出版部关于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美国战略进攻性武器总数量最新数据的评论”，2018 年 2 月 27 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俄罗斯代表团关于“核武器”问题的发言。
9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和领事馆，“APNSA 约翰·博尔顿采访叶莲娜·切尔涅恩科，《生意人报》，非官方文本，2018 年 10 月 22 日。
10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出席北大西洋理事会外长会记者会，2018 年 12 月 4 日。
11 威廉姆斯·A，“美国和北约给俄罗斯 60 天时间来遵守核协议”，NBC 新闻，2018 年 12 月 4 日。
12 见凯勒·S，“俄美核军控”，SIPRI 年鉴 2015，第 540-45 页。
13 见美国国务院、军控核查与合规局发布的“INF 条约:概览”，2017 年 12 月 8 日。
14 见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对美国国务院关于遵守军控、防扩散和裁军协议与承诺的报告的评论”，2015 年 6 月 11 日。
15 见凯勒·S，“俄美核军备控制”，SIPRI 年鉴 2018，第 319-24 页。
16 论俄国核力量，见本卷第 6 章第 2 节。
17 波德维格·P，“INF 罪魁祸首：现在怎么办？”，俄罗斯核力量，2017 年 12 月 5 日;《中导条约》的罪魁祸首：现在怎么办？吉本斯·内夫·T，“据报道，这是俄罗斯刚刚部署的陆基巡航导弹”，《华盛顿邮报》，2017 年 2 月 15 日。
18 凯勒(注 15);赫尔曼·G，“特朗普批准对俄新制裁，原因是俄罗斯违反了冷战武器条约”，《政客》，2017 年 9 月 12 日;美国国务院，“特朗普政府 INF 条约综合战略”，新闻声明，2017 年 12 月 8 日。
19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对美国就 INF 条约的批俄言论发表评论”，2017 年 12 月 9 日。
20 美国国务院，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合规情况简报，“驳斥俄罗斯关于美国不遵守 INF 的指控”，2017 年

12 月 8 日。
21 波斯托尔·T·A,“俄罗斯可能违反了 INF 条约：美国人可能也这么做了”,《原子科学家公报》，2019 年 2 月 14 日。
22 特别核查委员会举行了 30 次会议。2016 年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 2003 年。
23 国防部长办公室，2018 年核态势评估(美国国防部:华盛顿特区，2018)。关于美国 NPR，见本卷第 6 章第 1 节。
24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发表书面声明，“五角大楼将新型核导弹视为对抗俄罗斯的谈判筹码”，CNBC，2018 年 2 月 6 日。
记录，2018 年 2 月 6 日;丹尼尔斯,J。2018 年 2 月 6 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
25 北约，NATO 成员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2018 年 7 月 11-12 日；NATO,《华沙峰会公报》，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2016 年 7 月 8-9 日。
26 佩达诺夫·S,[谢尔盖·里亚布科夫:美国的行为只能被描述为准备违反 INF 条约]，2018 年 6 月 28 日。
27[利亚布科夫认为，与美国的对话变得更为专业]，俄新社，2018 年 6 月 28 日(俄语)。
28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联合记者招待会发表讲话，2018 年 7 月 16 日。
29 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后举行新闻发布会，2018 年 10 月 4 日。
30 博尔格·J，“特朗普称美国将退出与俄罗斯签订的核武条约”，《卫报》，2018 年 10 月 21 日。
31 关于退出 INF 条约的法律途径，见 H·赫德和 E·恰奇科，“美国退出 INF 条约:事实与法律”,《法律战》，2018 年 10 月 25 日;安德森·S·R,“退出 INF 条约的三种方式”,《法律战》，2018 年 10 月 29 日。
32 埃莫特·R，“北约敦促特朗普官员不要退出核条约:外交官”，路透社，2018 年 10 月 25 日报道；北约，“北大西洋理事会讨论 INF”，新闻发布，2018 年 10 月 25 日。见塔赫兰·S,“INF 危机的应对选择”，军控协会出版，2018 年 12 月 14 日。
33 博尔格·J，“约翰·博尔顿敦促特朗普退出俄美核武条约”，《卫报》，2018 年 10 月 19 日;“俄罗斯核条约:导弹紧张局势下的莫斯科博尔顿”，BBC 新闻，2018 年 10 月 22 日;“博尔顿在同普京会晤后表示，美国将不顾俄罗斯的反对退出核武条约”，》《莫斯科时报》，2018 年 10 月 24 日。
34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就《中导条约》进展情况举行吹风会，2018 年 11 月 26 日”，2018 年 11 月 26 日。
35 北约，“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布鲁塞尔会议”，新闻发布，2018 年 10 月 31 日;“尽管美国威胁退出条约，北约还是敦促俄罗斯恪守 INF 条约”，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2018 年 10 月 31 日。
36 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国家情报局局长丹尼尔·科茨谈俄罗斯违反中程核力量条约 INF”，2018 年 11 月 30 日。
37 博尔格·J，“欧洲外交官为阻止美国放弃 INF 做了最后努力”，《卫报》，2018 年 11 月 18 日；见荷兰声明，荷兰对俄罗斯的不遵守行为有独立判断：“荷兰就俄罗斯违反 INF 作出结论”，第二议院，2018 年 11 月 27 日。
38 美国国务院，“北约总部新闻发布:国务卿迈克尔·R·蓬佩奥”，布鲁塞尔，2018 年 12 月 4 日。
39 北约，北约外长发布“关于中程核力量条约的声明”，新闻发布，2018 年 12 月 4 日；格拉默·R 和塞利格曼·L，“特朗普和北约罕见地团结一致，对抗俄罗斯违反武器条约”，《外交政策》，2018 年 12 月 4 日。
40 格罗夫·T，“普京威胁军备竞赛，美国准备退出核条约”，《华尔街日报》，2018 年 12 月 5 日；俄罗斯网站，“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出席 2018 俄罗斯志愿者颁奖典礼后回答媒体提问”，2018 年 12 月 5 日。
41“俄罗斯准备与美国讨论军控条约督查:RIA”，路透社，2018 年 12 月 14 日。
42 冈查伦科·R,“俄罗斯备受争议的 9M729 导弹系统: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德国之声》，2018 年 12 月 5 日;雷迪·A，“设计的重要性:INF 条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VERTIC 网站,No.162(2018 年冬季);多尔齐科娃·D，“核查在中程核力量条约争端中的作用”，RUSI 评论，2019 年 1 月 15 日。
43 埃拉斯托·T 和托皮奇卡诺夫·P,“俄美 INF 政策危及军控”，SIPRI 专题背景资料，2018 年 6 月 15 日。
44 博尔格·J，“俄罗斯导弹谈判失败后，美国将于下月开始退出核条约”，《卫报》，2019 年 1 月 16 日;“2018 年 10 月 2 日，美国驻北约大使凯·贝利·哈奇森举行记者会”，2018 年 10 月 2 日。
45 戈沙尔·D,“中国与 INF 条约”,《比较战略》第 35 卷第 5 期(2016)，第 363-70 页;泰勒·A，“中国如何影响特朗普退出俄美 INF 条约的决定”，《华盛顿邮报》，2018 年 10 月 23 日。
46 美国国务院，第 62 届联大关于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的俄美联合声明，2007 年 10 月 25 日。
47 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2018 年 12 月 5 日。
48 查默斯·M 和斯特凡诺维奇·D，“这是核武军控的终结吗?”，RUSI 新闻简报，第 38 卷第 10 期(2018 年 11 月/ 12 月)。

第 3 节.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执行情况

泰蒂·埃尔斯特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是国际防扩散外交的重大突破。它结束了自 2002 年以来一直围绕伊朗核计划的国际危机。2015 年 7 月，伊朗与 E3/EU+2(欧盟三个成员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即 E3)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剩下的三个常任理事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就 JCPOA 进行了谈判。欧盟促成协议达成。

JCPOA 大大限制了敏感核活动的扩散，并在伊朗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监测和核查制度。其目的是建立人们的信心，使人们相信伊朗核计划只出于民用目的，使其能够“得到与 1968 年不扩散条约的任何其他无核缔约国相同的待遇”。[1]

尽管伊朗在继续恪守 JCPOA，并已经核实确实如此，但美国特朗普政府于 2018 年 5 月退出了伊核协议。2018 年年末，美重拾核制裁大棒。自 2016 年 1 月 16 日 JCPOA 实施日起，特朗普及其前任巴拉克·奥巴马都曾中止了对伊相关核制裁。JCPOA 其他各方表示将继续支持伊核协议。

面对国内民众停止执行协议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伊朗政府呼吁欧洲提供保证，不管美国制裁的域外影响如何，伊朗将根据联合国制裁行动纲领，获得至少一定程度的制裁减免。然而，尽管欧盟决心捍卫 JCPOA，但欧盟为伊朗维护相关经济利益所作出的努力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伊朗恪守其 JCPOA 承诺

JCPOA 的目的是阻止伊朗高浓缩铀和钚的生产，两者均为发展核武的必经途径。更为具体地说，协议要求伊朗限制其铀浓缩活动，削减浓缩铀库存，并在国际支持下重新设计及重建阿拉克重水反应堆。JCPOA 还规定，伊朗还同意将《示范附加议定书》暂时适用于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从而接受原子能机构更为严格的检查。[2] IAEA 连续 13 份报告都证实伊朗遵守了 JCPOA，其中 4 份均为 2018 年发布。[3]

重水及乏燃料处置相关活动

重新设计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的决定是出于人们对核乏燃料的担忧，核乏燃料

可再加工生产武器级钚。JCPOA 中规定的反应堆重新设计使其能生产的钚量达到最低限度。为进一步解决相关问题，伊朗还同意将阿拉克反应堆生产所产生的所有乏燃料全部运往国外。伊朗还承诺不会储存过量重水(重新设计后的反应堆投产前估计需重水 130 吨，投产后为 90 吨)，并将所有超量重水出售给国外。这样的做法将一直持续到 2030 年。[4]

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8 年发布报告证实，伊朗遵守了上述承诺。伊朗未超过重水上限。[5]同时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使阿拉克反应堆恢复至先前设计。此外，反应堆原设计的天然铀芯块、燃料销和组件仍在库存中并未使用。[6]

铀浓缩及乏燃料相关活动

根据 JCPOA，伊朗承诺不会将浓缩铀浓缩至 3.67%丰度之上，将浓缩铀库存控制在 300 公斤以下，并将所有浓缩活动限制在纳坦兹一个地点。此些限制适用至 2030 年。伊朗还同意拥有不超过 5060 台工作态离心机，约为 JCPOA 前水平四分之一，并将所有非工作态离心机保存至 2025 年。调取库存也只是为了更换失效或损坏的离心机。

IAEA2018 年报告证实，伊朗继续履行其承诺，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定期进入纳坦兹和福多相关设施。[7](作为 JCPOA 的一部分，福多已从一个浓缩厂改建为核、物理和技术中心)。

离心机研发、制造和库存

根据 JCPOA 的限制规定，目前在伊朗运行的所有铀浓缩离心机均为所谓的第一代(IR-1)离心机。[8]然而，JCPOA 允许伊朗使用更为先进的(IR-4，IR-5，IR-6 和 IR-8)以不积聚浓缩铀的方式进行离心。这一限制将一直持续到 2025 年。[9]根据 IAEA2018 年报告，伊朗的研发活动均符合 JCPOA 限制要求。[10]

透明度、附加议定书及其他问题

2018 年，IAEA 再次确认，伊朗正继续恪守附加议定书，并正在议定书框架下对伊朗声明作出评估。伊朗继续允许 IAEA 使用在线及电子监测技术，并为机构视察员签发了长期签证。和以前一样，伊朗还允许 IAEA 对伊朗浓缩铀矿石(黄饼)的转运实施全程监控，黄饼正转运至伊斯法罕的铀转换设施。[11]

IAEA2018 年的所有报告都指出，根据附加议定书，IAEA 已获得对其需要访问的伊朗境内所有地点和设施的补充访问权。然而，IAEA5 月报告补充到，“伊朗在提供准入方面及时且积极的合作将有助于附加议定书的执行并能增强彼此间的信任”。[12]这一点被重新表述为“伊朗在提供准入方面及时且积极的合作促进了附加议定书的执行并增进了彼此间的信任”。[13]这一表述变化被视为伊朗合作方式的改进。[14]

2018 年 1 月，伊朗向 IAEA 通报了其发展海军核动力的计划。鲁哈尼总统于 2016 年底首次宣布了该计划，以其回应美国延长伊朗制裁法(ISA)。[15]根据修订后的 CSA 附件条款 3.1 要求，IAEA 要求伊朗对相关研发做出说明，建议伊朗提供初步设计信息，以防其决定建造与该计划相关的任何新设施。[16] 虽然先前版本的 3.1 条款只要求在修建新设施后，在向设施喂料核材料 180 天通知 IAEA 即可，但修订后的版本要求伊朗在建造初期就必须告知 IAEA。4 月，伊朗向 IAEA 报告，计划中的核推进发动机将用于民用目的，未来 5 年不涉及任何新设施。[17]作为其附加议定书的一部分，伊朗在 5 月提供了该核计划的补充材料。[18]

美国决定退出 JCPOA

对 JCPOA 观望了一年，起起伏伏、来回往复，美国最终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宣布退出该协定。[19]特朗普总统认为，JCPOA 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不够，同时既未能妥善解决伊朗导弹研发，也未能限制伊朗在中东的地区影响力。在他看来，退出的决定十分合理。[20]

其他各方却不这样认为，纷纷发表官方声明，强调将继续致力于维护 JCPOA，以此回应美国的退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德里卡·莫盖里尼指出，欧盟“将继续致力于继续全面有效执行伊核协议”，并对重新实施制裁表示严重关切。[21]E3 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和关切”，强调他们将继续致力于确保. . 与该协议有关的伊朗人民的长期经济利益。[22]

法国和荷兰爆发暗杀事件，伊朗同欧洲国家交恶。但是欧洲对 JCPOA 的支持，似乎并未受此影响。[23]2018 年，法国和英国与美国一道谴责伊朗导弹活动，表示伊朗 12 月 1 日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24]

俄罗斯对美国的决定“深感失望”和“严重关切”，认为这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践踏”，表明“美国对伊朗绝对合法的核活动口诛笔伐，不过是不想政治解决

伊核问题的烟雾弹”。[25]中国也对“美方的决定”深感遗憾，并呼吁“所有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 继续致力于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妥善处理分歧，尽快回到继续执行 JCPOA 的正确轨道上来。”[26]

伊朗总统鲁哈尼将美国退出 JCPOA 撤军，视为美国长期敌视伊朗的又一生动事例。尽管只要是符合伊朗的长期利益，伊朗还将继续恪守 JCPOA，但是鲁哈尼表示，如果“伊核协议仅仅是一纸协定，而不能保障伊朗的国家利益，伊朗将准备不受任何限制的开始工业浓缩工作。”[27]

美国重拾制裁大棒及其既定目标

退出 JCPOA 后，美国重拾制裁大棒。美国曾在 JCPOA 执行日和 2018 年 1 月 12 日之间，每 4 个月就对伊制裁进行一次豁免，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最终豁免文件。[28]该政策还将在 2018 年 6 月和 11 月，分两个阶段实施。

8 月 6 日实施的第一阶段再制裁包括针对与伊朗的美元交易；黄金或贵金属；石墨；铝和钢等原材料或半成品；煤炭；工业集成用软件；以及航运、保险和汽车工业。[29]11 月 4 日，美国全面重启对伊制裁，目标直指伊朗石油部门和中央银行。[30]美国向 8 个主要的伊朗石油进口国提供了临时豁免，但美国政府最终目标是将伊朗石油出口减少到“零”。[31]

据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表示，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最大施压”旨在“扼杀伊朗政权财政收入，防止其用于资助暴力和破坏稳定活动”，并说服伊朗放弃目前的革命进程。[32]5 月，蓬佩奥具体指出，美国希望伊朗立即停止铀浓缩；关闭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停止开发和试验具有核能力的导弹系统；停止弹道导弹扩散；结束对真主党、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支持；并从叙利亚撤军。[33]鉴于这一要求清单极不现实，一些观察家认为，美国的真实目的是颠覆伊朗政权，而不非仅仅是改变其行为。[34]

尽管特朗普政府反对 JCPOA，但美国还是批准豁免，允许伊朗与 JCPOA 其他各方按协议继续推进核合作。更为具体地说，美国允许“在阿拉克、布什尔和福多的不扩散项目继续进行”，以确保“监督伊朗民用核计划”，并增强“我们对伊朗核计划的控制并在我们寻求新的更为强力的协议之前，保持对伊朗政权的高压”。[35]由于美国不再参与 JCPOA 相关项目，据报道英国已经介入重建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的工作。[36]

制裁对伊朗经济的影响

美国对伊朗重新实施的制裁大多为域外制裁，旨在限制伊朗与他国政府、公司和国民之间的经济往来活动。为避免美国财政部采取惩罚性措施，几家在JCPOA后进入伊朗市场的外国大公司决定在美国制裁重启之前撤离伊朗。[37]出于同样的原因，国际银行和投资者也纷纷回避伊朗市场。

尽管国家治理不力和腐败等国内因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美国制裁大棒落下，沉重打击了伊朗经济的恶化。2018年，伊朗经济增长下降。[38]到8月，伊朗货币较2017年贬值80%。[39]通货膨胀率达到2013年前的水平。[40]与此同时，基本商品和食品价格大幅飙升。[41]此外，还有伊朗民众大为不满，如缺水停电，经济每况愈下引发更多的街头抗议。2017年就持续不断，2018年更是愈演愈烈。[42]

形势急转直下，鲁哈尼政府面临如山的压力。国内反对之声震耳欲聋，人们既不满政府同意JCPOA，又对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感到失望。[43]2018年7月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伊朗人认为，伊朗应该主动退出JCPOA，以强力回应美国，或是重新开始JCPOA禁止的部分活动。[44]然而，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国家认为这样做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他们也对政府继续留在JCPOA的决定表示支持。伊朗领导人一再辩称，只要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伊朗将继续留在JCPOA。例如，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在8月强调，JCPOA“仅仅是维护我们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如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当然可能被“搁置”。[45]

伊朗官员表示，他们特别希望欧盟为伊朗继续出售石油和维护金融渠道提供保障。[46]同时伊朗官员发出警告，对伊石油出口的全面封锁可能导致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从而阻止阿拉伯海湾国家石油出口。正如鲁哈尼总统去年12月所说，“如果美国想阻止我们的石油销售，那么波斯湾就不会有石油出口。”[47]

欧盟为JCPOA完整性不懈努力

尽管美国退出JCPOA，但欧盟依旧竭力挽回JCPOA。5月16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一项计划，其中包括更改1996年封锁法令，以保护欧洲公司免受美国域外制裁，并授权欧洲投资银行(EIB)在伊朗开展业务。[48]尽管两项措施均在8月实施，但实际效果不佳。欧洲投资银行的结论是，对伊投资风险太大。[49]与此同时，

由于缺乏具体有效执行机制，人们普遍认为封锁法令只是掩耳盗铃罢了。[50]

今年 9 月，E3 宣布一项计划，即建立一个所谓的“特殊用途工具”(SPV)，以为伊朗出口(包括石油)和进口相关款项支付提供便利，也让那些同伊朗进行合法生意的商家吃上了定心丸。[51]SPV，类似易货贸易运作方式，预计 11 月前准备到位，但时至 2018 年年末尚未实施。[52]

结语

尽管美国退出了 JCPOA，伊朗也认为伊核协议并未给伊朗带来协议承诺的经济利益，但伊朗在 2018 年还是继续恪守协议。然而，美国却宣布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作为制裁目标，尤其是使得 JCPOA 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虽然欧盟表现出空前的决心，要采取切实措施维护伊核协议，但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SPV 倘若真能在 2019 年顺利落地，可能会对美国的制裁起到有效的制衡，但其影响实质上也只能将损害降到最低。因此，JCPOA 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严重伊核协议究竟有多大价值，而非仅仅从经济回报考量。同时也取决于伊核协议能多大程度重塑“去核化”后的伊朗的国际形象，同时在伊朗与世界其他国家政治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伊核协议究竟作用多大。

1《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 2015 年 7 月 14 日，维也纳，转载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附件 A。背景资料见劳夫・T,“消除对伊核计划的担忧”,SIPRI 年鉴 2016,第 673-88 页;劳夫・T，JCPOA 执行情况，SIPRI 年鉴 2017，第 505-10 页;埃拉斯托・T，在伊朗执行 JCPOA，SIPRI 年鉴 2018，第 337-45 页。

2 一个无核国家与 IAEA 之间的全面保障协定(CSA)对该国领土上的所有和平核活动和所有核材料实施保障措施，以便核查它们是否被滥用于军事目的。此类协定使得 IAEA 框架下的核材料统计真实可信，该制度的目的在于核查一国受保障的核材料是否真实。1968 年的不扩散条约要求所有非核武缔约国与 IAEA 签订一项保障协定。大多数 NPT 成员国都签有一个核安全条约，许多国家还接收了其核安全条约的附加议定书，

旨在加强 IAEA 监控和阻止未申报核材料或核活动的能力。协议要求缔约国向 IAEA 提供其核燃料循环相关活动的所有资料，并授权 IEAE 扩大调查范围或新的调查对象。与 IAEA 签有保障协议的国家名单见本卷附件 A。
3IAEA，“对伊朗的核查和监督”。
4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注 1)。
5 伊朗重水储量在 117.9 吨到 122.9 吨之间。IAEA 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2015)号决议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核查和监测”，总干事报告，2018 年 2 月 22 日，GOV/2018/7;2018 年 5 月 24 日，GOV/2018/24;2018 年 8 月 30 日，GOV/2018/33;2018 年 11 月 12 日，GOV/2018/47。
6 IAEA，总干事报告(注 5)，GOV/2018/7, GOV/2018/24, GOV/2018/33, GOV/2018/47。
7 伊朗浓缩铀储量在 109.5 公斤到 149.4 公斤之间。2 月，伊朗从仓库中撤出 20 台 IR-1 型离心机，以替换安装在纳坦兹的受损或故障的离心机。8 月和 11 月，出于同样的目的，伊朗分别拆除了 34 台和 33 台离心机。IAEA，总干事报告(注 5)，GOV/2018/7, GOV/2018/24, GOV/2018/33, GOV/2018/47。
8JCPOA(注 1)，附件 2。
9JCPOA(注 1)，附件 2。
10 IAEA，总干事报告(注 5)，GOV/2018/7, GOV/2018/24, GOV/2018/33, GOV/2018/47。
11 IAEA，总干事报告(注 5)，GOV/2018/7, GOV/2018/24, GOV/2018/33，GOV / 2018/47。
12 IAEA，总干事报告(注 5)，GOV/2018/24。
13 IAEA，总干事报告(注 5)，GOV/2018/33, GOV/2018/47 (着重强调)。
14 达文波特·K，军控协会发表题为“伊朗不顾制裁继续遵守 JCPOA”的声明，2018 年 9 月 13 日。
15 见梅加帝尔·A，“伊朗研发核动力舰船可能会使德黑兰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形势进一步加剧”，中东研究所，2017 年 2 月 17 日。
16 IAEA 总干事报告(注 5)，GOV/2018/7。
17 IAEA 总干事报告(注 5)，GOV/2018/24。
18 IAEA 总干事报告(注 5)，GOV/2018/33。
19 更多背景资料，见埃拉斯托，SIPRI 年鉴 2017(注 1)。
20 白宫，“特朗普总统就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发表讲话”,2018 年 5 月 8 日。
21 欧盟对外行动署，“HR/VP 莫盖里尼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伊核协议(JCPOA)声明的评论”，罗马，2018 年 5 月 8 日。
22 英国首相府，“特朗普总统就伊朗问题发表声明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总统埃曼纽尔·马克龙发表联合声明”，新闻稿，伦敦，2018 年 5 月 8 日。
23 埃莫特·R，“欧盟对伊朗制裁持开放态度，此前曾挫败法国、丹麦阴谋:外交官，路透社”，2018 年 11 月 19 日。
24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索瓦·德拉特，在纽约对媒体发表讲话，2018 年 12 月 4 日。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外交大臣关于伊朗发射弹道导弹的声明”，新闻稿，2018 年 12 月 5 日。
25 俄罗斯外交部，“外交部关于伊朗核计划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发展情况的声明”，莫斯科，2018 年 5 月 8 日。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2018 年 5 月 9 日。
27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就 JCPOA 发表电视讲话”，伊朗总统官方网站，2018 年 5 月 9 日。
28 JCPOA 框架下,在执行日(2015 年 10 月 18 日)8 年后，美国必然中止相关核制裁或是只到 IAEA 就伊朗所有核材料均用于和平目的达成广泛一致，美国将“寻求适当的立法行动，终止或修改以达到终结核相关制裁”，JCPOA(注 1)，附件 2。
29 美国财政部，“关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行政命令的常见问题”，“对伊朗重新实施某些制裁”，资源中心，2018 年 11 月 5 日。
30 美国财政部，“伊朗制裁”，资源中心，11 月 5 日更新。
31 中国、希腊、日本、印度、意大利、韩国、台湾和土耳其获得 180 天的豁免。蓬佩奥·M·R，财政部长史蒂文·T·姆钦新闻发布会，美国国务院，2018 年 11 月 5 日。
32 蓬佩奥(注 31)。
33 蓬佩奥·M·R，“协议达成后：伊朗的新战略”，在美国传统基金会上的演讲，2018 年 5 月 21 日。
34 麦克福尔·M 和米拉尼·A，“为什么特朗普苦心经营的伊朗政权更迭计划适得其反”，《华盛顿邮报》，2018 年 5 月 30 日。
35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限制伊朗核计划”，简报，2018 年 11 月 5 日。
36 “美国取代英国，重建新设计的阿拉克重水反应堆”，迈赫尔通讯社，2018 年 8 月 22 日。
37 瓦尔德·E·R，“特朗普制裁就在眼前，10 家公司离开伊朗”，《福布斯》，2018 年 6 月 6 日。
38 “一旦全面恢复对伊制裁后，对伊朗经济的冲击”，大西洋理事会，2018 年 9 月 25 日。
39 埃德布林克·T，“伊朗百姓怨声载道，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纽约时报》，2018 年 8 月 4 日。
40 对伊朗通货膨胀率的估计各不相同。据报道，2018 年 11 月为 18%，但专家认为实际数字高达 37%。“18.4%的通胀率:CBI”，《德黑兰时报》，2018 年 11 月 26 日；弗里森·G，“伊朗陷入政治和经济的两难境地”，《福布斯》，2018 年 9 月 2 日。
41 波佐格迈尔·N 和哈拉吉·M，“食品价格飙升，贫苦的伊朗百姓在制裁下水深火热”，

《金融时报》，2018 年 8 月 7 日。
42 埃德布林克(注 39)。
43 纳斯里·L，莫特瓦利·G 和沙赫拉·A，“制裁后，伊朗经济接近危机边缘”，彭博社，2018 年 8 月 9 日。
44 穆赫辛尼·E，加拉格尔·N 和拉姆齐·C，“抗议后的伊朗舆论：舆论研究(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马里兰国际与安全研究中心:分校，2018 年 7 月)。
45 “和美国谈判就是无稽之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官方网站发表演讲，2018 年 8 月 29 日。
46 “伊朗仍在等待欧洲对石油购买的保证，银行业:FM 扎里夫”，伊朗国家电视台，2018 年 8 月 25 日。
47 “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在沙鲁德市发表演讲，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官方网站”，2018 年 12 月 4 日。
48 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保护欧盟公司利益的法案，投资伊朗是欧盟继续致力于 JCPOA 的一部分”，新闻发布，布鲁塞尔，2018 年 5 月 18 日。
49 卡博内尔·A 和埃莫特·R，“独家：在美国的压力下，EBI 对加入欧盟的伊朗工作计划犹豫不决”，路透社，2018 年 6 月 5 日。
50 尽管阻止法案禁止公司遵守美国的域外制裁，并会为那些面临处罚的公司提供法律保障，但它一样无法弥补这些公司失去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同时也缺乏可靠的执行机制予以支持。拜耳·L，“欧盟针对特朗普制裁向伊朗提供的保护盾牌，看起来不堪一击”，《政客》，2018 年 7 月 17 日。
51 欧盟对外行动处，《落实联合全面行动计划:部长级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纽约，2018 年 9 月 24 日。
52 宾德·K，“与伊朗贸易的特殊目的载体”，《一瞥》，欧洲议会研究处，2018 年 11 月。

第 4 节.禁止核武器条约

泰蒂·埃尔斯特

2017 年《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是第一部禁止发展、部署、拥有、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1]

支持者认为，全面核武器条约是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最终目标，是对 1968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第 6 条的强化。[2]但核武国家(NWS)及其盟国，揶揄 TPNW 好高骛远，并且认为 TPNW 可能会破坏 NPT。[3]

你来我往、争论不休，许多国家到今天都仍未决定是否加入。2018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69 个国家签署 TPNW，并有 19 个国家批准生效。[4]TPNW 将在 50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后 90 天生效。本节概述了 TPNW 的发展现状，并对相关国际及国内讨论进行了论述。

争议不断的 TPNW

2018 年，1968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上，大多数无核国家对 TPNW 表示欢迎。支持者盛赞 TPNW 为“历史性成功”，是“自 1996 年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来多边核裁军谈判的第一个具体成果”。[5]而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对 NWS 持保留意见的核武国家盟友，则不予置评，而是强调有必要以“渐进”方式推进核裁军。[6]

除中国外，NWS 公开批评 TPNW。英国表示，它不将其视为一项新国际法。[7]法国认为，TPNW 可能通过制定替代性规范来挑战 NPT，并加大了常规武器升级的风险。[8]俄罗斯坚持认为，TPNW 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核裁军可以在不考虑战略现实的情况下进行，而且 TPNW“有可能对那些为实现真正核裁军的长期努力造成伤害”。[9]

美国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把重点放在削减核武数量和立即废除核武上，而非真正解决潜在安全威胁。. . 我们既无法推进核裁军事业，也不能推进加强国际集体安全事业。”[10]美国还对 TPNW 薄弱的核查条款进行了批评，核武去合法化将会损害核威慑的可信度，从而带来更大的扩散压力。[11]

面对 TPNW 的质疑声，其支持者强调了 TPNW 同 NPT 的互补性。如，奥地利认

为，TPNW“加强了 NPT 第 6 条的执行力度，是履行 NPT 的必要条件”。[12]新议程联盟对 TPNW“可能阻碍缔约国履行其 NPT 义务和承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而是认为“NPT 第 6 条缺乏执行细节，TPNW 是对此的重新解释。. . 这也依然是 NPT 内部的主要分歧之所在。”[13]爱尔兰表示，TPNW 是“向核武国家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他们确定的核裁军步伐和议程，我们可以说不。”[14]

从 TPNW 支持者的角度来看，继续依赖核威慑的风险大于远离核威慑的风险。根据奥地利的说法，“核打击根本就是一种不合理行为”。“第一次打击的破坏力显而易见”，但是二次打击并非是理性的选择，因为“它既无法消除第一次打击的破坏”，“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核打击”。[15]

国家间辩论和民间辩论

自 TPNW 开放签字以来，TPNW 已成为许多国家国内政治辩论热议的话题，民间组织也参与其中。尽管大多数国家辩论谈论均未公开，但还是有一些国家选择了一个更为透明的方式。

今年 8 月，瑞士政府在一个部门间工作组报告得出结论后，决定不在 TPNW 上签字。报告认为，尽管“从人道主义、国际法和和平政策考虑上”，瑞士赞成加入。但是 TPNW“在进一步推进裁军外交和瑞士国家安全政策利益方面都存在着风险”。[16]报告同时指出，核武非合法化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其他非核武国家。[17]

瑞典还委托编写一份报告，分析 TPNW 以及瑞典加入可能产生的后果。[18]截至 2018 年底，报告尚未发表。瑞典民间组织发表了一份“影子”报告，认为加入 TPNW 不会损害瑞典国家安全，TPNW 并非禁止核相关贸易，而是明确为军事目的核贸易。[19]未参加 TPNW 条约讨论的国家也在热议 TPNW，其中就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挪威政府应议会要求，于 10 月发表了一份报告，对挪威加入 TPNW 影响进行了评估。报告发现，“挪威加入 TPNW，将必然损害其 NATO 义务”。[2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挪威民间组织的一份报告认为，北约成员国对加入 TPNW 并不存在法律障碍，尽管有些成员可能会理解为此举将影响北约团结，可能导致惩罚性措施。尽管承认 TPNW 对核裁军短期影响可能微乎其微，报告还是赞成加入，并指出“从长远来看，挪威等国家对裁军目标的支持至关重要”。[21]

据报道，2018 年 9 月，西班牙政党波德莫斯获得西班牙政府承诺，将签署

TPNW，以换取波德莫斯对 2019 年预算的支持。然而，西班牙尚未宣布执行计划。[22]澳大利亚工党已承诺在执政期间签署和批准 TPNW。[23]英国作为唯一一个讨论过 TPNW 的核武国家，其第一大反对党曾讨论过加入 TPNW 的可能性。[24]

1TPNW 摘要及其他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见基勒・S,“禁止核武条约”,SIPRI 年鉴 2018,第 307-18 页。
2 第 6 条，核武国家承诺“真诚地进行谈判，采取有效措施尽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并推动核裁军，即在严格有效的国家间控制协同下实现全面彻底裁军”。
3 凯勒(注 1)。
4 奥地利、哥斯达黎加、古巴、冈比亚、圭亚那、罗马教廷、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帕劳、巴勒斯坦、萨摩亚、圣马力诺、泰国、乌拉圭、瓦努阿图、瓦努阿图和越南已批准通过 TPNW。库克群岛通过条约成为缔约国。
5 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泰国声明”，2018 年 4 月 23 日，日内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奥地利声明”，日内瓦，2018 年 4 月 25 日。
6 见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对采取渐进手段的一般性辩论声明”，日内瓦，2018 年 4 月 24 日。声明由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日本、大韩民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土耳其共同签署。
7 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英国声明”，日内瓦，2018 年 4 月 24 日。
8《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法国声明”，日内瓦，2018 年 4 月 25 日。
9《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俄罗斯声明”，日内瓦，2018 年 4 月 26 日。
10《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为核裁军创造条件”，美国工作文件，NPT/CONF.2020/PC.II/WP，日内瓦，2018 年 4 月 18 日。
11 福特・C，“禁止核武器条约:一个善意的错误”，冰岛雷克雅未克大学，2018 年 10 月 30 日。
12《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奥地利声明”，日内瓦，2018 年 4 月 23 日。
13《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新西兰戴尔・希吉代表新议程联盟的发言”，日内瓦，2018 年 4 月 23 日。新议程联盟在《不扩散条约》框架内作为一个部长级国家小组开展工作，“重点是构建国际共识，以便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其成员包括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和南非。见“新议程联盟”，核威胁倡议，2018 年 5 月 31 日。
14《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爱尔兰声明”，日内瓦，2018 年 4 月 26 日。
15《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核武器与安全:人道主义观点”，奥地利工作文件，《不扩散条约》/CONF.2020/PC.II/WP，日内瓦，2018 年 3 月 12 日。
16 报告指出，该条约的“污名化议程”不符合瑞士促进“有核武国家和无核武国家”裁军方针，加入该条约也可能对瑞士在和平伙伴关系框架下与北约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瑞士政府，瑞士联邦外交部（FDFA），“分析《禁止核武器条约》工作组的报告”，2018 年 6 月 20 日（德语原件英译本）。
17 瑞士政府(注 16)。
18 瑞典政府，“调查瑞典可能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后果”，新闻稿，2017 年 10 月 23 日。该报告最初定于 2018 年 10 月发表，推迟至 2019 年 1 月。
19 瑞典国际防止核战争医师协会和瑞典妇女国际和平与自由联盟，[在权力的阴影下：瑞典加入核武器公约影响的调查]，2018 年 9 月（瑞典语）。
20 挪威外交部,《挪威批准该条约的后果审查》,2018 年 11 月 28 日《禁止核武器条约》[2018 年 10 月 8 日挪威文]。
21 尼斯图恩・G, 埃格兰・K 和雨果・T・G，TPNW 及其对挪威的启示(挪威国际法学院:奥斯陆，2018 年 9 月)。
22“西班牙会成为第一个签署核禁售条约的北约国家吗?”，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 2018 年 12 月 6 日。
23 “澳大利亚工党承诺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2018 年 12 月 18 日。
24 美林・J，“三叉戟:工党将签署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Inews, 2017 年 10 月 27 日。

第 5 节.核军控、裁军和不扩散多边条约和倡议相关事态发展

泰蒂·埃雷斯特、香农·N·基尔、佩特·托皮奇卡诺夫和乌根·康扎特

202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

1968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于 4 月 23 日至 5 月 4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第二届会议。[1]会议由波兰大使亚当·布盖斯基主持。根据主席会议纪要，“缔约国注意到，自筹备委员会 2017 年会议以来，国际安全环境持续恶化，国际形势更为复杂、极具挑战性”。这一背景下，“他们认识到强化 NPT 权威性的极端重要性”。[2]

NPT 缔约国对老牛慢走的裁军进程表示关切，世界各国都在对各自核武库进行现代化升级、新的军备竞赛如火如荼。[3]对俄罗斯和美国提出 3 点呼吁，切实维护 1987 年中导条约，并继续实施 2010 年战略武器削减条约(新 START)。[4]对于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大多数国家表示继续支持该协议。[5]

美国和新议程联盟提交的两份工作文件却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6]美国反对“削减核武数量和立即废除核武器”，而是呼吁通过解决“潜在安全威胁”，为“核裁军创造条件”。[7]新议程联盟反对这一观点，认为核裁军进程需要一个更为有利的安全环境，主张“执行现有的核裁军义务和承诺. . 将有助于改善全球安全环境。”[8]

1995 年中东决议几乎沦为废纸一张，引发人们广泛的争议。美国放弃了先前关于召开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WMD)大会的建议。[9]阿拉伯集团和不结盟运动对此表示反对。[10] 2018 年 11 月，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决议草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于 2019 年召开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会议。联大于 12 月 11 日通过了该决议。[11]

本届筹委会不同以往的就是，俄英美三国就在叙利亚和英国使用化武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12] 一些国家批评主席会议纪要未能就所有立场做出一个综合的描述，过于看中核武国家的看法。[13]

联合国秘书长新裁军议程---核层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在日内瓦大学启动了“确保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新裁军议程。议程共有三大优先任务：（a）裁军以拯救人类、减少和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b）裁军以拯救生命、减少常规武器的影响；（c）为子孙后代裁军，讨论新军事技术。[14]该议程是在联合国大会无限期推迟联合国核裁军高级别会议一个月后提出，原因是未能选出一名代表主持会议。[15]

古特雷斯对核裁军停滞不前表示关切。此外，秘书长还呼吁美俄解决两国在中导条约上的争端，继续执行新 START，并采取新措施降低核武库存。[16]

议程主要涵盖消除核武器行动要点(见方框 5.1)。其中一些行动要点还需等待 2020 年 NPT 审议大会的积极成果。为增进国家间对话，新的非正式平台将与现有论坛并存，探索核军控的新想法、新思路。

联合国秘书长为裁军议程确立的关键方向：军备控制、不扩散、禁止、限制、建立信任和消除核武。议程结束时，大会呼吁“利用一切机会为核裁军创造动力，并实施给与新动力，以建设一个更为安全、更为和平的世界”。[17]

方框 7.1 联合国秘书长新裁军议程“确保我们的共同未来”中与核裁军相关的行动要点

秘书长和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将加大合作力度，加强正式和非正式场合接触，促进成员国间对话，帮助成员国回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共同愿景和道路上。

秘书长支持不使用核武原则，并呼吁所有国家发表申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核武，这符合国家、集体和人类安全以及人类的生存利益。

秘书长同时呼吁所有拥核国家发表申明，核战争没有胜者，也决不能打。

秘书长呼吁尚未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所有国家，在尚未签署条约的情况下，承诺尽早签署，并加速完成批准进程。

秘书长和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将与成员国合作，加强和巩固无核武区，包括促进现有无核区之间加强合作和协商，鼓励核武国家遵守建立无核武区条约相关议定书，并支持进一步建立无核武区，其中包括中东无核武区。

裁军事务厅将与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一道，支持采取紧急措施，减少使用核武威胁，并建立相互信任。

裁军事务厅将支持就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及其他核爆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开始谈判，并争取早日结束。

裁军事务厅将按大会授权，从 2018 年专家讨论开始，支持发展核裁军核查标准、技术和能力培养。

资料来源：联合国裁军事务厅(UNDOA)，《确保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UNDOA：纽约，2018 年)，第 18-23 页。

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高级别专家筹备小组

2018 年 6 月 8 日，裂变材料禁产条约(FMCT)高级别专家筹备小组，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最终报告。[18]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71/259 号决议，于 2016 年 12 月成立 25 国专家小组。[19]其任务是今后的核裁军谈判(旨在达成一项“非歧视性、多边、可实现有效国际核查”的禁产条约)，执行裁军谈判会议 1995 年提出的任务提供建议。[20]专家组审议工作借鉴了先前这一领域的经验，尤其是 2015 年政府专家组最终报告--联合国秘书长为审查 FMCT 谈判相关条款而设立。[21]

继 2017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1 日和 2018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8 日举行的会议之后，专家筹备组最终报告于 2018 年 7 月提交联合国大会。[22]报告共分 4 节，列出了可能的条约内容。其中包括：条约的未来范围，更具体地说，条约规定是否适用于条约生效前生产的裂变材料储存；裂变材料界定；核查、法务及制度安排；以及条约序言，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报告指出，“可建立条约的结构，以便初步框架或总括性条约生效，随后将就至少两项议定书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具体时间框架节点。”[23]

报告建议“就一项禁止生产核武用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24]但是，越来越多的观察员建议谈判应在不受限任何国家否决的多边论坛上进行。例如，可通过联大决议来达成这一目标，决议设定一个与 TPNW 同步进行的禁产条约谈判。[25]

1 关于本节 NPT 及其他核军控条约，见本卷附件 A。
2《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 2 届会议，“主席事实概要草案”，NPT/CONF.2020/PC.II/CRP，日内瓦，2018 年 5 月 3 日。
3 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印度尼西亚代表不结盟运动的声明”，日内瓦，2018 年 4 月 26 日。
4 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欧洲对外行动处裁军和不扩散问题特使贾塞克·比利卡代表欧洲联盟所做的发言”，日内瓦，2018 年 4 月 23 日。见本章第 2 节。

5 同中俄两国一贯政策一致(见第 3 节)，中俄两国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为该协议辩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二届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JCPOA)的联合声明”，NPT/CONF.2020/PC.II/7/Rev1.，日内瓦，2018 年 5 月 3 日。
6 新议程联盟在 NPT 框架下工作，联盟机制为部长级国家集团，“致力于构建国际共识，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其成员国包括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和南非。见“新议程联盟”，核威胁倡议，2018 年 5 月 31 日。
7《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为核裁军创造条件”，美国提交的工作文件，NPT/CONF.2020/PC.II/WP，日内瓦，2018 年 4 月 18 日。
8《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第六条:重申执行条约的紧迫性”。新西兰代表新议程联盟提交的工作文件，NPT/CONF.2020/PC.II/WP，日内瓦，2018 年 3 月 15 日。
9 美国表示，“2010 年审议大会《最终文件》所载关于中东问题的建议虽为善意，但不能再被视为就这一问题采取行动的适当基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创造有利于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载系统的区域条件”，美国提交的工作文件，NPT/CONF.2020/PC.II/WP.33，日内瓦，2018 年 4 月 19 日。
10 前者认为，“NPT 审议大会仍然是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论坛”，回顾“条约的无限期延长是基于 1995 年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和“任何国家都不能撤回以前审议大会商定的义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阿拉伯集团的声明”，日内瓦，2018 年 4 月 30 日。
11 见联合国大会“召开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域的会议”，A/C.1/73/L.22/Rev.1，2018 年 10 月 17 日;联合国，“联大通过第五委员会建议的 16 条条款，结束第 73 届会议的主要部分”，会议议题范围，2018 年 12 月 22 日。
12 关于叙利亚和英国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见本卷第 8 章第 1 节和第 2 节。
13 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委内瑞拉代表不结盟运动的声明”，日内瓦，2018 年 5 月 4 日。
14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 (UNODA)，确保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UNODA：纽约，2018 年）。议程上关于常规和新军事技术的讨论，见本卷第 9 章第 2 节；关于化武的讨论，见本卷第 8 章第 3 节。
15 军控协会，“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延期”，2018 年 5 月 1 日。
16 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启动新的裁军议程，以保障我们的世界和未来”，联合国新闻，2018 年 5 月 24 日。
17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注 14)，第 73 页。
18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FMCT)专家筹备小组通过最后报告，新闻发布，2018 年 6 月 8 日。
19 联合国大会决议 A/RES/71/259，“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2016 年 12 月 23 日。
20 关于 FMCT，见核威胁倡议，“拟议的《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FCMT)”，2018 年 10 月 26 日。
21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政府专家小组对可能有助于此类条约但并非通过谈判提出建议”，A/70/81，2015 年 5 月 7 日。
22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FCMT)专家筹备小组报告”，A/73/159, 2018 年 7 月 13 日。
23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A/73/159(注 20)，第 26 页。
24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A/73/159(注 20)，第 30 页。
25 迈耶·P，“禁止核材料谈判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原子科学家公报》，2018 年 9 月 25 日。

第八章.化学和生物安全威胁

概述

2018 年，禁化武组织(OPCW)的工作重心还是叙利亚使用化武的指控。报告报评估小组继续努力解决叙利亚最初报告中的空白、不一致和不一致之处，叙利亚真相调查团继续收集和分析指控相关资料。其中一项指控是 2018 年 4 月 7 日在杜马发生的化武袭击事件，促使美国、英国和法国在一周后对三个地点发动报复性袭击。

叙利亚之外，2018 年 3 月，英国索尔兹伯里的诺维霍克神经毒剂事件中使用了一种有毒化学物质，导致住院三人。6 月再次爆发类似事件，又有两人接触到相同的药剂。其中一人叫道恩·斯特格斯，随后在 7 月去世。英国根据 1993 年《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CWC)第 8 条第 38(e)项提出的请求，OPCW 提供了技术援助，并在英国进行两次实地勘察。OPCW 指定实验室对实地勘察期间采集的样本进行分析，证实了英国的调查结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化武使用责任划分再度成为 CWC 缔约国的焦点问题。OPCW-UN 联合调查机制任务期满，也就造成了国际社会在遭遇此类事件时的应对真空。为填补这一空白，法国于 2018 年 1 月发起了打击使用化武有罪不罚现象的国家间伙伴关系。截至 2018 年年底，在欧盟的基础之上，伙伴关系成员国达到为 38 个国家。2018 年 5 月，11 位 OPCW 常驻代表要求为特定议程召开缔约国会议特别会议：高举全球禁化武大旗。特别会议于 6 月举行，为期两天，经表决决定授权 OPCW 负责全球禁化武事业。

化武使用问题，以及如果发现使用化武随后的责任归属问题，都是 CWC 缔约国之间的重大分歧之所在。支持 6 月决议的缔约国认为，叙利亚政府多次在叙利亚使用化武证据确凿，因此认为有必要构建一个责任归属机制；那些反对 6 月决议的国家辩称，指控是为了将 OPCW 将政治化而捏造。这一分歧至少在短期内对 OPCW 内部决策的协商一致模式造成打击，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势。第 23 次缔约国会议和第 4 次审议大会上，缔约国之间的关系

都十分紧张。此外，联大考虑通过化武和生物武器的决议都已被证明困难重

重。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 2018 年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积极进展。利比亚鲁瓦哈地区原化学武器储存点清理工作正在取得进展，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武销毁工作继续推进。OPCW 下属委员会也在继续推进其核心工作。西班牙费尔南多·阿里亚斯大使于 7 月开始担任 OPCW 总干事，任期四年。

在生物裁军和防扩散领域，2018 年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生物武器和毒素武器公约(BWC)专家会议和缔约国会议。会议的重点是 BWC 糟糕的财务状况，12 月的讨论集中在应采取紧急措施确保未来财务的预测性以及可持续性。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实质性整改措施，鼓励及时支付，确保流动性，避免赤字支出或债务累积。2019 年将进一步讨论财政状况。让人们略感意外的是，缔约国会议未能就专家会议审议工作，包括任何可能结果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尽管 8 月会议上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和实质性讨论，而且绝大多数缔约国为谈判最终报告也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但依旧无法弥合分歧。造成这一局面主要是因为某一代表团“顽固固执”所造成，他们不断强调公约会议工作方法早就不合时宜。

一面是大会无疾而终，一面是专家会议热火朝天，同时 2018 年也是 BWC 推广如火如荼的一年。2018 年，各色讲习班一个接着一个，这也证明越来越多的缔约国或缔约国集团、民间组织和其他参与各方都十分关心如何加强生物武器规范和禁令执行，以及如何提升 BWC 的财政状况。

2018 年，生物裁军和不扩散方面的其他重大事件包括联合国秘书长裁军议程公布，以及俄罗斯越来越多的对抗性声明，声称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正在邻国，尤其是格鲁吉亚开展活动。

凯特里奥娜·麦克莱什和菲利帕·伦佐斯

第 1 节.叙利亚化武指控

卡蒂罗娜·麦克莱什

2018 年，叙利亚冲突进入第 7 个年头。同往年一样，叙利亚化武指控一刻都未曾停歇。[1]最近的一次发生在 11 月 28 日，当时叙利亚当局于 11 月 24 日向 OPCW 总干事通报阿勒颇化武事件。[2] 真相调查团对此类指控进行了分析和调查，OPCW 声明评估小组(DAT)继续对叙利亚最初提交声明中的待确认事项进行逐一澄清。

关于在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SSRC)开展的与化武相关活动，仍有人提出疑问。[3]2017 年 11 月提交给 OPCW 秘书处并与 2018 年年初分析的文件，据报承认了 SSRC 在叙利亚化武项目中的角色，但秘书处认为，还需进一步澄清。[4]OPCW 执行理事会第 89 届会议指出“向秘书处提供的信息，其性质和实质内容无法解决所有需确认的问题”，并且“信息中同叙利亚共和国声明的不一致之处有增无减”。[5]因此，执委会无法核实叙利亚声明的准确性和完整性。[6]

2018 年 6 月 7 日和 6 月 23 日，叙利亚申报的余下两处化武生产设施已被摧毁。OPCW 组织于 7 月 12 日证实销毁工作已经完成。[7] 12 月 4 日至 6 日，对位于巴赞和贾姆雷亚的 SSRC 化武设施完成第 4 轮实地视察。

杜马化武袭击事件

4 月 7 日，叙利亚杜马发生化武袭击事件。自今年 2 月起，对东古塔地区残余抵抗力量的围剿就一直在持续。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站数据，仅 2 月份就有 1700 多名平民丧生。[8]

对 4 月 7 日袭击事件的最初描述，似乎主要来自叙利亚-美国医学会(SAMS)和叙利亚民防部队(白盔部队)事件爆发后第二天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声明称，超过 500 多人(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被送至当地医院，其症状表明接触了化学制剂。病人有呼吸窘迫、中枢性紫绀、口腔泡沫过多、角膜灼伤和释放类氯气味等迹象。[9]另一份新闻报道中，SAMS 表示，杜马化武袭击事件可能涉及两起化武袭击，一起涉及“氯弹”，另一起涉及“混合制剂”，包括袭击附近一幢建筑时，使用了神经毒剂。[10]

国际社会、政治和宗教领袖纷纷发声，强烈谴责叙利亚化武袭击。[11]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美国将会有“大的反应”。[12]土耳其外交部声称，袭击“很大程度上被怀疑是叙利亚政府发动”。[13]然而，叙利亚政府、伊朗和俄罗斯发表声明，暗示指控完全是捏造的。[14]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对新闻界说，我们的军事专家和叙利亚红新月会代表实地访问了事发地。. . 他们并未发现任何氯或其他化学物质的痕迹。[15]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杜马化武袭击事件

在杜马事件推动下，俄罗斯(单独一方)和英国、法国、美国、波兰、荷兰、科威特、秘鲁和科特迪瓦(另一方)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议程项目“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应对”框架下讨论杜马化武袭击事件。[16]公开会议纪要表明，会议气氛紧张，各方对化武事件的描述截然不同。例如，俄罗斯大使瓦西里·内本齐亚将杜马事件人员伤亡信息定性为“假新闻”，叙利亚大使巴沙尔·贾阿尔法里在谈到“社交媒体上的捏造信息”时重复了这一观点。相比之下，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代表并未进行反驳。[17]法国弗朗索瓦·德拉特大使发言，受害者症状表明，他们接触了一种与氯混合的强效神经毒素，更为致命；美国大使尼基·海利表示，历史将铭记这一时刻---安理会要么勇敢的担负起自身的责任，要么承认自己无力保护叙利亚人民。无论如何，美国都将有所行动。[18]

会议表决了三项决议草案，涉及类似杜马的化武袭击事件调查机制。杜马事件之前，俄美分别提交了两份草案，旨在建立一个联合国独立调查机制(UNIMI)。[19]两份草案的区别就在于，责权如何划分。俄罗斯草案中，安理会应在 UNIMI 研究之后做出“无可辩驳”的结论。而美国主导的草案，调查机制才可做出结论。OPCW FFM 工作的第 3 份决议草案也进行了讨论。安理会还未能就三份草案的任何一项达成协议。[20]

接下来的四天里，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我们有证据表明，上周的化学武器，至少使用了氯气，而且罪魁祸首就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21]NBC 援引两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美国收集的血液和尿液样本，表明存在氯气和一种未命名的神经毒剂。[22]4 月 14 日公布的法国国家评估报告中，认为杜马事件中使用了不止氯气一种化学毒剂的观点，并未得到重视。[23]评估报告得出结论（i）毫无疑问，2018 年 4 月 7 日杜马化武事件是针对平民；

以及（ii）化武事件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叙利亚武装部队对东古塔发动袭击的一种手段。[24]

美国情报部门对杜马袭击的评估中“极其笃定”地表示，“叙利亚政权使用了化学武器”，结论是基于“多个媒体源对袭击的描述，受害者症状报告，视频和图片显示出两枚桶装炸弹，以及叙利亚军官在袭击前进行联络的铁证。[25]关于是否使用氯以外的其他毒剂，美国报告得出结论，“大量信息表明叙利亚政权在轰炸杜马时使用了氯气，同时还有其他相关信息表明，叙政府军也使用了神经毒剂沙林。[26]

美英法空袭

2018 年 4 月 13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杜马袭击事件举行第 3 次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表示，“冷战以复仇的姿态卷土重来”。古特雷斯对“局势日益紧张，以及在建立问责机制方面始终无法达成妥协，可能导致全面军事升级”表示关切。[27]法国和英国军队对叙利亚三个地点进行了 100 多次空袭：大马士革巴尔泽区巴尔泽研发中心，一处化武储存设施和一处掩体设施，均位于霍姆斯以西的希姆辛萨尔。[28]

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空袭后立刻召开会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一份声明中宣称：“未经联合国授权，打着反恐的旗号，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侵略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规范和原则”。[29]安理会其他成员玻利维亚、中国、哈萨克斯坦和赤道几内亚也对空袭提出批评。另外一些安理会成员国，如美国、英国、法国和波兰，认为空袭是正当的。荷兰代表称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30]当俄罗斯提议草案，谴责“美国及其盟友的侵略行为，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草案未获通过，安理会的内部割裂愈发加深。[31]

在 OPCW 执行理事会 4 月 16 日的一次会议上，类似分歧显而易见。澳大利亚、加拿大、保加利亚代表欧盟(EU)以及阿尔巴尼亚、比利时、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以国家身份表示支持美英法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作出“对等反应”。与之形成对比，执行理事会公开网页记录了俄罗斯和伊朗对空袭的批评。[32]本月晚些时候，俄罗斯代表团通知技术秘书处，将于 4 月 26 日就杜马事件举行通报会，届时将会有杜马居民提供目击证词。[33]俄罗斯代表团在随后的通报会中表示，杜马居民坚称并未发生化武袭击。[34]

OPCW17 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这次通报会“不过是一次粗暴的宣传战”，并呼吁“结束俄罗斯联邦对 OPCW 让人无法接受的诽谤”。[35]

OPCW 杜马真相调查团

2018 年 7 月 6 日，FFM 发布了一份关于 7 月 4 日杜马化武指控的中期报告。[36] 中期报告指出，4 月 12 日派驻的先头调查组，随后在第二天派出跟进小组；跟进小组于 4 月 16 日被派往邻国。但是 FFM 整整一周无法进入杜马，4 月 21 日第一次进入目标调查现场，随后还进行了四次现场调查。目标调查现场包括一个仓库和疑似叙利亚当局化武设施。FFM 在现场共收集样本 100 多份；派驻邻国的调查小组也进行了生物和环境样本收集及接收。调查小组共进行实地采访 34 次。

鉴于所采集的样本数目众多，FFM 对 31 个样本进行了优先排序，以便进行初步分析。对环境样品和血浆样品的分析表明，没有发现有机磷神经毒剂或其降解产物。然而，在一栋公寓楼两个地点采集的样本中发现了各种氯化有机化学品以及爆炸物残留物。中期报告指出，FFM 正在推进调查工作，以确定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对于疑似叙利亚当局化武设施及仓库，都未发现这两个设施参与化武试剂生产的迹象。最终报告将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公布。

OPCW 真相调查团在 2018 年发布的其他调查报告

2018 年，FFM 在叙利亚共发布 4 份报告。除开杜马中期报告外，还有 2018 年 2 月 4 日在萨拉齐布和 2017 年 3 月 24 日和 25 日在 Ltamenah 的化武指控事件报告；以及 2016 年 10 月 30 日在哈马达尼亚和 2016 年 11 月 13 日在卡尔姆塔尔拉布化武指控事件报告。[37]

据称在萨拉齐布事件的调查中，FFM 无法进入实地进行调查，不得不转而依靠其他调查手段，如与报告事件相关人员进行面谈，审查受访者提供的文件及医院记录，以及 2 月 19 日 FFM 收集的环境样本和金属物体分析。通过调查，FFM 确定“11 人表现出化学品接触医学表征，如眼鼻喉和肺等组织刺激灼烧感等症状”。[38]此外，通过机械冲击从商用气瓶中释放氯气，“可能被用作了化学武器”。[39]FFM 还指出，存在既不能解释为自然存在，也不能解释为与氯相关的化学品。. . [而且]报告中的一些医学症状与纯氯接触表征有所不同。[40]关于后一点，FFM 表示，当前还没有足够资料或证据得出任何更多结论。

2018 年 6 月，FFM 发表了关于两起 Ltamenah 化武指控的报告。FFM 根据访谈资料和相关旁证，同时结合环境样本分析及随后的交叉证据得出结论。但是 FFM 并未对所接收的样本立刻进行分析，“因为其他样本具有分析优先权，包括但不限于 2017 年 4 月 4 日汗谢洪事件和 2017 年 3 月 30 日 Ltamenah 事件相关样本”。[41]然而，FFM 确定，16 人在 2017 年 3 月 24 日表现出与乙酰胆碱酯酶抑制一致的体征和症状。样本分析结果显示存在沙林及其他化学品，包括潜沙林毒气相关分解物，FFM 据此得出结论，化武极可能就是沙林毒气。FFM 还注意到，调查结果与 2017 年 3 月 30 日使用沙林的汗谢洪事件和 2017 年 3 月 30 日 Ltamenah 事件的结果一致。在第二天的攻击中，沙林“很可能”被当做化武使用。[42]FFM 确定，“33 人表现出化学品接触医学表征，如眼鼻喉和肺等组织刺激灼烧感等症状”。[43]报告得出结论，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氯被当做化武使用。[44]

FMM 就 2018 年 7 月 2 日哈马达尼耶和卡尔姆塔尔拉布涉嫌使用化武事件发表报告。叙利亚当局提请技术秘书处注意，秘书处据此在 2016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共进行了 5 次调查。基于调查期间接收信息的分析，FFM 发现受害者采访描述和事件报告信息一致，哈马达尼耶事件 60 名受害者、卡尔姆塔尔拉布 40 名受害者症状基本相同，尽管都没有出现任何长期影响，也未有人员死亡。[45]FFM 认定，无法确切“界定 2016 年 10 月 30 日哈马达尼亚和 2016 年 11 月 13 日卡尔姆塔尔拉布地区是否使用了某种特定化学物质”。[46]FFM 结论是，“报告事件中受害者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曾接触过某种非持久性刺激性化学物质。[47]

FFM 继续就 2017 年 6 起化武指控进行调查。[48]包括 2017 年 8 月 9 日萨利迈亚的 Qalib al-Thawr、2017 年 7 月 7 日和 8 月 4 日哈马省的 Khirbat Masasinah、2017 年 11 月 8 日哈马省的 al-Balil、Souran 和 2017 年 10 月 22 日大马士革的 Yarmouk 营地周围发生的化武指控事件。相关调查活动包括相关文件翻译、叙利亚政府提供的信息或是 FFM 调查期间收集信息的分析工作。

化武袭击责任归属

OPCW-UN 联合调查机制于 2017 年 11 月到期。此时，在化武责任划分之时，就出现了裁量主体缺失。[49]为填补这一空白，2018 年 1 月 23 日法国发起了一项打击使用化学武器有罪不罚现象的国家间伙伴关系。其目的是使得 OPCW 所有区域集团成员国携手行动，以维护和加强 CWC 执行力度，促进实现 CWC 目标，向 OPCW

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使其充分履行其责任并阻止任何化武的使用。[50]2018 年年末，这一伙伴关系已从 25 个国家增至 38 个国家和欧盟。

伙伴关系成员国承诺“收集、整理、留存相关信息，以追究扩散或使用化武责任人的责任”，并“在专门的网站公布扩散或使用化武而受到制裁的个人、实体及团体或政府信息。”[51]

网站每年更新两次，列出已被确定参与使用化武或参与研制化武的个人和实体名单，此类国家、实体或个人都将受到法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的制裁。[52]

2018 年，举行了三次伙伴关系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5 月在巴黎举行，与会国就参与化武研制和化武时间肇事者交换信息。[53]10 月在纽约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议报告指出，讨论内容包括 6 月缔约国会议特别会议作出的决定，提出加强 OPCW 行动力度(见第 3 节)。[54] 下一次会议预计在缔约国大会常会和审议大会之前举行，即 2018 年 11 月。本年鉴编写之时，会议报告尚未公布。

1 关于叙利亚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2OPCW 执行理事会，“消除叙利亚化武计划进展”，总干事说明，EC-90/DG，2018 年 12 月 21 日，第 3 页。
3 哈特・J，“叙利亚使用化武的指控”，SIPRI 年鉴 2018，第 349-61 页。
4OPCW 执行委员会，“消除叙利亚化武进展”，总干事说明，EC-87/DG.16，2018 年 2 月 23 日，第 4 页。
5OPCW 执行委员会，“消除叙利亚化武进展”,总干事说明,EC-89/DG.1”,2018 年 7 月 24 日，第 2-3 页。
6OPCW(注 2)，第 2 页。
7OPCW(注 5)，第 2 页。
8 叙利亚人权观察，“我们对杜马化学攻击事件知道多少？”，2018 年 4 月 10 日。
9 叙利亚-美国医学会，“SAMS，叙利亚国防军谴责对杜马镇实施化学袭击”，新闻发布，2018 年 4 月 8 日
10 内姆・D 和拉姆顿・R，特朗普称叙利亚化武袭击“必须付出巨大代价”，路透社，2018 年 4 月 8 日。

11 见欧洲对外行动局，“关于叙利亚杜马镇最新袭击事件的声明”，2018 年 4 月 8 日；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外交大臣对叙利亚杜马镇发生化武袭击报道作出回应”;法国欧洲和外交部，“叙利亚:化学武器/东古塔”，2018 年 4 月 8 日;梵蒂冈新闻，“教皇弗朗西斯呼吁叙利亚和平”，2018 年 4 月 8 日。
12@ realdonaldtrump，特朗普推特，2018 年 4 月 8 日 06.00。
13 土耳其外交部，“关于杜马镇化武袭击事件的新闻公报”，声明 No.13，2018 年 4 月 8 日。
14 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官方消息来源：杜马镇化武指控是明目张胆地阻挡政府军推进”，2018 年 4 月 7 日；伊朗外交部，“伊朗强烈谴责任何一方使用化武”，2018 年 4 月 8 日。
15 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与塔吉克斯坦外长阿斯洛夫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回答媒体提问，2018 年 4 月 9 日。
16 见尼科尔斯・M，“联合国安理会在叙利亚袭击后的周一举行会议”，路透社，2018 年 4 月 8 日。
17 联合国安理会，第 8225 次会议临时记录，S/PV.8225，2018 年 4 月 9 日。未反对这一指控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哈萨克斯坦、荷兰、波兰、瑞典、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和波兰。
18 联合国(注 17)。
19 联合国安理会，“俄罗斯联邦:决议草案”，S/2018/175, 2018 年 4 月 10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草案，“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拉脱

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黑山、荷兰、挪威、北马其顿、秘鲁、波兰、卡塔尔、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乌克兰、英国和美国:决议草案”，S/2018/321，2018 年 4 月 10 日。
20 联合国安理会，“俄罗斯联邦:决议草案，S/2018/322”，2018 年 4 月 10 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化武袭击的 3 份草案，安理会未能就独立调查机制达成一致”，新闻发布，2018 年 4 月 10 日。
21 布里亚肯·P，“马克龙：法国有“证据”证明阿萨德使用了化学武器”，《政客》，2018 年 4 月 12 日。
22 卡贝·C 和迪拉尼亚·K，“美国官员:血液样本显示，叙利亚毒气中含有神经毒剂、氯气”，NBC 新闻，2018 年 4 月 12 日。
23 法国政府，“2018 年 4 月 7 日化武袭击事件(叙利亚东古塔杜马镇):叙利亚秘密化学武器计划”，国家评估文件，2018 年 4 月 14 日。
24 法国政府(注 23)，第 6 页。
25 白宫，“美国政府对阿萨德政权使用化武的评估”，新闻发布，2018 年 4 月 13 日。
26 白宫(注 25)。
27 联合国安理会，“第 8231 次会议临时记录”，S/PV.8231，2018 年 4 月 13 日。
28 美国国防部，国防部新闻简报，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达纳·W·怀特和联合参谋长小肯尼斯·麦肯齐中将在五角大楼简报室，新闻简报(记录稿)，2018 年 4 月 14 日。
29 联合国安理会，“第 8233 次会议临时记录”，S/PV.8233，2018 年 4 月 14 日。
30 联合国(注 29)。
31 联合国安理会，俄罗斯联邦:决议草案，S/2018/355, 2018 年 4 月 14 日。
32 见 OPCW“执行理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文件”。
33 OPCW 技术秘书处，“OPCW 真相调查团访问叙利亚杜马镇第二现场”，叙利亚，2018 年 4 月 25 日。
34OPCW(注 33)。
35 联合声明全文见 OPCW 执行理事会，“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波兰、斯洛伐克、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声明”，EC-M-58/NAT.5，2018 年 4 月 26 日。
36OPCW 技术秘书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杜马镇化武事件真相调查团进展情况临时报告”，2018 年 4 月 7 日，S/1645/2018，2018 年 7 月 6 日。7 月 10 日，一个关于有毒化学物质使用的事件真相调查团中期报告。7 月 10 日，根据 S/1645/2018/CORR.1 公布报告修正，其中调整了真相调查团探访地点坐标。
37OPCW 技术秘书处，“OPCW 叙利亚真相调查团，2018 年 2 月 4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萨拉基布事件报告”，S/1626/2018, 2018 年 5 月 15 日;OPCW 技术秘书处，“OPCW 驻叙利亚真相，2017 年 3 月 24 日至 25 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拉塔梅纳发生疑似化武事件报告”，S/1636/2018, 2018 年 6 月 13 日;OPCW 技术秘书处，“OPCW 叙利亚真相调查团关于 2016 年 10 月 30 日在哈马达尼亚和 11 月 13 日在卡尔塔拉布事件的报告”，S/1642/2018, 2018 年 7 月 2 日。
38 OPCW, S/1626/2018(注 37)，第 7.2 段。
39 OPCW, S/1626/2018(注 37)，第 7.4 段。
40 OPCW, S/1626/2018(注 37)，第 7.5 段。
41 OPCW, S/1636/2018(注 37)，第 5 . 34 段。
42 OPCW, S/1636/2018(注 37)，第 6.8 段。
43 OPCW, S/1636/2018(注 37)，第 6.5 段。
44 OPCW, S/1636/2018(注 37)，第 6.9 段。
45 OPCW, S/1642/2018(注 37)，第 9.9 和 9.10 段。
46 OPCW, S/1642/2018(注 37)，第 9.11 段。
47 OPCW, S/1642/2018(注 37)，第 9.11 段。
48OPCW 技术秘书处，“OPCW 叙利亚真相调查团活动总结通报”，S/1677/2018, 2018 年 10 月 10 日。
49 哈特(注 3)，第 357-58 页。
50OPCW 审议大会，“共同文件:反对使用化武有罪不罚外国际伙伴关系:执行决议 C-SS-4/DEC.3，2018 年 6 月 27 日”，RC-4/NAT.19，2018 年 11 月 29 日。
51 反对使用化学武器而有罪不罚国际伙伴关系“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打击使用化学武器有罪不罚现象的国际伙伴关系”，《原则宣言》，巴黎，2018 年 1 月 23 日。
52 截至 2018 年 5 月 28 日，共有 348 名个人或实体被记录在案。
见<https://www. noimpunitychemicalweapons.org/-en-.html>.
53 法国政府，“反对使用化学武器不受惩罚现象的国际伙伴关系:成员国部长级联合声明”，巴黎，2018 年 5 月 18 日。
54 法国政府，“反对使用化学武器不受惩罚国际伙伴关系成员国新会议”，2018 年 10 月 19 日。

第 2 节.斯克里帕尔案：英国有毒化学品刺杀案

卡蒂罗娜·麦克莱什

索尔兹伯里暗杀未遂案细节

2018 年 3 月 4 日，英国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娅以及威尔特郡警官尼克·贝利探员三人，被发现受到有毒化学物质(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侵害。6 月 30 日，在附近的埃姆斯伯里，另外两人-道恩·斯特格斯和查理·罗利被发现同样暴露在同一有毒化学品之中。斯克里帕尔、尤利娅、尼克·贝利死里逃生，从毒药中恢复过来。斯特格斯就没这么幸运，她于 7 月 8 日死亡。3 月 4 日袭击受害者样本在英国波特恩唐国防科技实验室进行了检测。袭击发生三天后，伦敦警察局负责专家行动的助理专员马克·罗利宣布，法医分析显示有神经毒剂存在。[1]3 月 12 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通知议会，使用的神经毒剂是诺维乔克家族成员，并详细说明英国政府认为俄罗斯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2]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英国警方进行了彻底的调查。约有 250 名警探对数千小时闭路电视录像进行逐一筛查，1400 多份调查走访陈述和法医学调查结果，为检察长起诉两名俄罗斯公民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和鲁斯兰·博希罗夫提供了充分证据。[3]对他们的指控是：（a）阴谋谋杀谢尔盖·斯克里帕尔；（b）企图谋杀谢尔盖、尤利娅·斯克里帕尔和尼克·贝利；（c）使用和拥有诺维乔克神经毒剂；以及（d）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意图杀害尤利娅·斯克里帕尔和尼克·贝利。欧洲对彼得罗夫和博希罗夫签发逮捕令，尽管特蕾莎·梅通知议会，警方认为这两人均为化名。特蕾莎·梅同时告知议会，两名嫌疑人均为俄罗斯军事情报局(GRU)官员。[4]10 月初，由情报专家网 Bellingcat-一个使用公开信源和社交媒体的调查研究网络，调查表明，鲁斯兰·博希罗夫就是 GRU 官员安纳托·利切皮加，亚历山大·彼得罗夫是 GRU 雇佣的医生亚历山大·耶夫根耶维奇·米奥什金。[5]

有关诺维乔克神经毒剂的准确可靠公开信息，如其历史、拥有者、化学成分和性质，都十分有限。可获得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前苏联化学战计划参与者，特别是维尔米尔扎亚诺夫博士，他自称是“苏联化武研究领域的老兵”。[6]公开领域信息有限是因为这一有毒化学试剂似乎是来自秘密研究。然而，就公开信息判断，

可以推测诺维乔克(俄语“新来者”)是苏联开发的一系列化学战剂的名称，为苏联 FOLIANT 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防官员对这些神经毒剂研发猜测纷纷，其目的是“击败西方的侦查和保护措施”，更容易隐藏在“合法的商业领域”，从而使人们能够规避新的国际化学武器管制。[7]此类化武战剂的公开信息可追溯至 1991 年和 1992 年报纸报道。[8]如美国报刊中关于 CWC 批准的讨论中，就直接提到此类化学战剂的存在。如《华盛顿邮报》一篇关于俄罗斯化武的文章，声称广泛援引了美国国防部机密出版物《军事情报摘要》的内容。[9]然而，由于缺乏这类战剂的可靠信息，2018 年 5 月初，OPCW 总干事要求缔约国提供关于新型神经毒剂的资料。[10]

世界各国、国际社会和国际机构的反应

英国和俄罗斯的反应

在 3 月 12 日，特蕾莎·梅告知议会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猜测俄罗斯与索尔兹伯里毒杀事件有关：根据波尔顿唐国防科学技术实验室世界级权威专家对化学战剂的检验呈阳性，我们就知道俄罗斯以前已经生产过此种化学剂，而且仍然保有生产能力。俄罗斯有过进行国家暗杀的记录结合我们的评估，即俄罗斯认为一些叛逃者是合法的暗杀目标。英国政府的结论是，俄罗斯极有可能就是谢尔盖和尤利娅·斯克里帕尔谋杀案的背后黑手。[11]

3 月 14 日，在向议会做出的进一步简报中，特蕾莎·梅宣布，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立即采取反制行动，包括驱逐 23 名俄罗斯外交官，他们被确定为身份未申报的情报官员。[12]随后几周内，北约和布鲁塞尔共驱逐 150 多名俄罗斯外交官。其他国家，如卢森堡以及欧盟选择召回大使。[13]

俄罗斯针锋相对做出回应-驱逐外交官，并称英国的反应是企图“煽动反俄新势力歇斯底里的运动”。[14]特蕾莎·梅暗示“对发生的事情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 这要么是俄罗斯对英国直接下手；要么是俄罗斯政府对可能造成灾难性损害的神经毒剂失去控制，让它落入他人手中。[15]对此，俄罗斯政府官员和媒体提出其他可能的解释。俄罗斯外交部不扩散和军备控制司司长弗拉基米尔·耶尔马科夫表示，“逻辑上还有两种可能。要么英国当局无法确保对其领土上此类恐怖袭击提供保护，要么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袭击俄罗斯公民的准备工作。”[16]尽管耶尔马科夫声称，除了他刚才提出的两种可能之外再无其他可能，但是他还

是暗示还有许多可能性。[17]

OPCW 政治激辩

3 月 13 日，英国大使彼得·威尔逊向荷兰海牙 OPCW 执行理事会通报了索尔兹伯里事件，称这是“二战以来首次在欧洲领土上使用神经毒剂进行攻击”。[18] 注意到英国首相前一天告诉议会的内容，包括她要求俄罗斯政府解释如何在索尔兹伯里拥有此类有毒化学品，威尔逊大使告知执行理事会，OPCW 向英国提供了技术援助。[19]

俄罗斯大使亚历山大·舒尔金回应到，俄罗斯参与的指控是“毫无根据”和“绝对不能接受”。[20] 英国在第二天收到 OPCW 技术援助，3 月 16 日英国按照第 8 条第 38e 段正式请求技术援助的正式信函，分发至所有缔约国。[21] OPCW 总干事随后通知执行理事会，已于 3 月 19 日向英国派出先遣队，就技术援助问题进行初步讨论，3 月 21 日全部技术人员到位。[22]

4 月初，俄罗斯代表团通过 OPCW 技术秘书处向英国当局发送了一份关于“捏造“斯克里帕尔案件”的问题清单。[23] 其中包括要求提供技术援助小组组长姓名和分析样本的认证实验室名称。[24] 总干事随后对执行理事会成员表示：“按其标准流程，秘书处不向主办技术援助现场调查国以外的缔约国透露小组成员身份或任务细节”。俄罗斯请求于 4 月 4 日举行会议，以处理“一个缔约国就索尔兹伯里事件对另一缔约国提出公约合规指控”。[25]

在随后剑拔弩张的直面交流中，英国代表团表示：“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俄罗斯到底想干什么．．实际上，我们的常驻代表是．．”[26] 俄罗斯代表未能就问题作出答复，英国代表团成员表示“俄方 24 个问题的描述都是自相矛盾，又翻来倒去”，这些陈述“是无耻[和]荒谬的”。[27] 赖巴尔琴科教授，俄罗斯国防部化学专家代表俄罗斯代表团进行发言，对诺维乔克神经毒剂的来源只能是来自俄罗斯的观点表示质疑。他认为，回顾公开文献，任何此类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而且基本上可以说是荒谬的。[28] 赖巴尔琴科表示，只要有分子式和合成图，任何拥有必要特种设备、防护等级和足够合格工作人员的现代化学实验室都可合成和研究诺维乔克类物质。此类化合物的前体在很多国家都可以买到。[29]

随后不久，舒尔金大使表示，CWC 并未允许英国接受此类技术援助的条款。[30] 他接着提议对索尔兹伯里事件进行英俄联合调查，并宣布俄罗斯将“承认任何

调查结论 . . . 如果它是基于不可辩驳的事实和证据，符合国际法的所有现有程序并且有俄罗斯方面的强制参与”。[31]巴拿马等一些缔约国敦促俄罗斯和英国进行“建设性对话”。[32]另外一些国家，如加拿大，建议安理会成员“承认俄罗斯决定草案：就是在浪费时间、混淆视听，俄罗斯的目的就是在其无法直面英国质疑俄罗斯参与索尔兹伯里事件问题的时候，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33]俄罗斯决定草案仅获得 6 票赞成，因此被否决。[34]

联合国安理会和第一委员会的政治讨论

俄罗斯大使瓦西里·内本齐亚，3 月 14 日向联合国安理会重申了俄罗斯的立场，即俄罗斯参与索尔兹伯里事件的指控是“毫无根据”且“完全不可接受的”。[35]4 月 18 日，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通知安理会，中谷泉介绍了 OPCW 技术援助小组访问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对此，内本齐亚大使评论说：“今天我们又听到了同一版本未经证实的指控，据说现在指控得到了 OPCW 的背书。”[36]内本齐亚接着阐述了他认为报告中存在的缺陷。在本章编撰期间，此类指控均未得到事实依据佐证。9 月 6 日，他对两名俄罗斯公民逮捕令消息作出回应，他称英国此举完全是“同一谎言”，并暗示这是“和以前行为一样换汤不换药”。[37]他再次强调“俄罗斯联邦从未研发、生产或储存有毒物质-西方称之为“诺维乔克”的化学制品。[38]内本齐亚在结束发言时再次表示，这些指控不过是对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立场的报复：

3 月 4 日事件成为歇斯底里的煽动反俄情绪的最佳契机，并成为 OPCW 叙利亚杜马化武事件大会前夕，打击俄罗斯这一 OPCW 缔约国的利器。我们今天又看到了相似的画面。9 月 5 日特蕾莎·梅发表声明. . .主要涉及正在积极讨论的伊德利卜局势，以及白盔部队面对武装分子的化武挑衅。[39]

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11 月 8 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第一委员会第 73 届会议，也同样反映出联合国安理会和 OPCW 存在着的分歧。一般性辩论中的 50 份声明都提到了化学武器，在不同程度上谴责了化学武器的使用，包括在索尔兹伯里的使用。伊朗在声明中说，OPCW 内部分歧“必须解决”，以避免对公约造成“持久损害”。[40]巴西同样对“OPCW 决策机构中的共识文化削弱”表示遗憾。[41]鉴于存在此类分歧，由波兰提出的 CWC 年度决议草案，通常是以协商一致方式同意，本年却要求就批准提交大会进行表决。投票结果为 148 票赞成，7 票反对(柬埔寨、中

国、伊朗、尼加拉瓜、俄罗斯、叙利亚和津巴布韦)，23 票弃权。[42]12 月 5 日大会审议该决议时，还需要进行表决，投票结果为 152 票赞成，7 票反对(柬埔寨、中国、伊朗、尼加拉瓜、俄罗斯，叙利亚和津巴布韦),22 票弃权。[43]

OPCW 回应

技术秘书处对索尔兹伯里事件的回应是，应英国请求，于 2018 年 3 月和 7 月至 8 月对英国进行了两次技术援助访问。[44]公开总结报告显示，在 3 月 21 日至 23 日的第一次技术援助访问中，技术小组访问了索尔兹伯里“确定为可能残留污染热点”的特定地点，并收集了若干环境样本。[45]报告同时指出，血液样本的生物医学样本被送至 OPCW 指定的环境和生物医学样品实验室，分析结果证实了英国索尔兹伯里有毒化学品事件身份调查结果。[46]此外，由于“有毒化学物质纯度极高，几乎完全没有杂质”，对三位受害者造成了严重伤害。[47]

继 6 月 30 日在索尔兹伯里附件发生相关事件后，应英国请求，OPCW 进行了第二次技术援助访问。第二次技术援助访问报告于 2018 年 9 月 4 日分发给缔约国，并在网站上公布了一份摘要报告。[48]报告指出，7 月 15 日至 18 日进行援助访问，以收集生物医学样本，并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采集了补充环境样本。8 月份访问中，调查小组从一小瓶被警方视为可疑物品的瓶子里收集了一份样本。[49]OPCW 指定实验室后续分析得出结论，查尔斯·罗利和道恩·斯特格斯曾暴露在有毒化学物质中。环境样本中有毒化学物质浓度达到 97—98%， [因此]被认为是高纯度化武战剂。[50]分析得出结论：

OPCW 指定的环境和生物医学样本实验室进行的分析结果，证实了英国有毒化学物质事件调查结论，正是此类有毒战剂导致查尔斯·罗利先生和道恩·斯特格斯女士中毒。有毒化学物质，显示出神经毒物毒性，同 2018 年 3 月 4 日在索尔兹伯里事件中发现的生物医学和环境样本为同种有毒化学物质。[51]

反叙述与信息战在责任归属中的作用

索尔兹伯里事件媒体反馈呈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类媒体都参与论战，共同寻找诺维乔克在索尔兹伯里使用的合理解释。事件发生后的几周里，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洗白俄罗斯的文章，让人十分费解。索尔兹伯里事件的反叙述也开始瞄准针对俄罗斯的其他化武指控，如叙利亚杜马事件。[52]RT 电视

网播出的一些反叙述节目后来被发现违背英国广播标准，RT 未能在 3 月 17 日至 4 月 26 日播出的节目中保持新闻应有的公正性。[53]

媒体不仅质疑俄罗斯是否参与索尔兹伯里事件，还万般诘问 OPCW 样本分析结论。4 月 14 日，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的第 26 届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上发表讲话，引用了斯皮兹实验室提交给 OPCW 的报告，这份报告是通过保密手段获取。[54]拉夫罗夫表示，样品表明有毒化学物质 BZ 及其前提是二类化武痕迹. . . 此类化武曾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北约部队中使用过。苏联和俄罗斯既没有研制也没储存过此类化学制剂。[55]为了让人们对斯克里帕尔父女和尼克·贝利探员的恢复产生怀疑，拉夫罗夫暗示“临床症状更符合 BZ 制剂的使用”。[56]

四天后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总干事表示，OPCW 实验室按照现有质量控制程序制备的控制样品中含有 BZ 前体。[57]瑞士代表团对拉夫罗夫的声明表示“不理解”。无论斯皮兹实验室是否为索尔兹伯里样本分析的指定实验室之一，指定实验室的分析报告都不会以这种方式起草，并且包含据称引用斯皮兹实验室报告的表述. . 这种行动本身就是对 OPCW 信誉和诚信的伤害，因此不可接受。[58]

1 见英国下议院内务大臣安布尔·拉德，“萨利斯-伯里事件”，汉萨德出版社，第 637 卷，第 486 页，2018 年 3 月 8 日。

2 英国下议院，特雷莎·梅首相发表声明，“索尔兹伯里事件”，汉萨德出版社，第 637 卷，第 620-21 页，2018 年 3 月 12 日。
3 英国下议院，特雷莎·梅首相声明，“索尔兹伯里事件最新进展”，汉萨德出版社，第 646 卷，第 167-70 页，2018 年 9 月 5 日;皇家检察署，“CPS:索尔兹伯里”，新闻稿，2018 年 9 月 5 日。
4 英国下议院(注 3)，第 167 页。
5 英国情报专家网 Bellingcat 调查组，“暗杀斯克里帕尔的嫌疑人博什罗夫被确认为俄罗斯间谍机构 GRU 上校，真名安纳托利·切皮加”，2018 年 9 月 26 日;2018 年 10 月 8 日，Bellingcat 调查组，“第二名斯克里帕尔中毒嫌疑人为亚历山大·米什金博士”。
6 米尔扎亚诺夫·V，“拆除苏联/俄罗斯化武设施:内幕人士观点”，A·史密斯森，俄罗斯化学武器裁军:问题与前景，报告 No.17(史汀生中心:华盛顿特区，1995 年 10 月)，第 21 页。见米尔扎亚诺夫·V，国家机密:俄罗斯化武计划内幕纪事(市郊出版社:丹佛，CO .， 2009)。
7 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扩散:威胁与应对(国防部长办公室:华盛顿特区，2001 年 1 月)，第 4 页;美国国防部，国防部化学与生物防御计划，第 1 卷，提交国会的年度报告(国防部:华盛顿特区，2002 年 4 月)，第 9 页;史密森·A，剧毒群岛，报告 No.32(史汀生中心:华盛顿特区，1999 年 12 月)，第 9 页。
8 米尔扎亚诺夫·V，“黑白颠倒”，《新闻报》(莫斯科)，1991 年 10 月 10 日，第 4 页;“关于拥有化武和生化武器的指控”，SIPRI 年鉴 1993，第 266-67 页。
9 格茨·B，“俄罗斯规避化学武器禁令”，《华盛顿时报》，1997 年 2 月 4 日，第 A1 页。见米尔扎亚诺夫·V，“肆意研发化武”，《华尔街日报》，1994 年 5 月 25 日，第 A16 页;格茨·B，“俄罗斯化武揭示条约风险”，《华盛顿时报》，1997 年 2 月 5 日，第 A3 页;克劳斯·C，“美国敦促俄罗斯停止生产神经毒气”，《纽约时报》，1997 年 2 月 6 日，第 7 页;沃克·J，“化学武器的面罩”，《华尔街日报》，1997 年 2 月 13 日，第 A18 页;“一个危险的条约”，《华尔街日报》1997 年 2 月 19 日，第 A18 页。
10OPCW 技术秘书处，“向缔约国索取新型神经毒剂信息的要求”，总干事说明，S/1621/2018，2018 年 5 月 2 日。
11 英国下议院(注 2)。
12 英国下议院，特雷莎·梅首相发表声明，“索尔兹伯里事件”，汉萨德出版社，第 637 卷，第 856 页，2018 年 3 月 14 日。
13 欧洲对外行动署，“欧盟驻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磋商”，2018 年 3 月 23 日；卢森堡外交和欧洲事务部，“卢森堡对索尔兹伯里袭击事件的反应”，2018 年 3 月 28 日。
1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洛娃在莫斯科举行吹风会，2018 年 3 月 15 日”，新闻发布，2018 年 3 月 15 日。
15 英国下议院(注 12)，第 855 页。
16 俄罗斯外交部，“防扩散与军控司司长叶尔马科夫在莫斯科举行吹风会，2018 年 3 月 21 日”，新闻发布，2018 年 3 月 21 日。
17 见联合国安理会，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伦·皮尔斯大使的声明，第 8343 次会议临时记录，S/PV.8343，2018 年 9 月 6 日，第 13 页。此前一天，特蕾莎·梅向议会通报了索尔兹伯里事件以及对两名俄罗斯公民的指控。她也注意到各种描述。见英国下议院(注 3)，第 167 页。
18OPCW 执行委员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 OPCW 执行理事会代表彼得·威尔逊大使在第 87 届会议上的声明”，EC-87/NAT.5，2018 年 3 月 13 日，第 1-2 页。
19OPCW(注 18)，第 1 页。
20OPCW 执行理事会，“俄罗斯联邦常驻 OPCW 代表舒尔金大使在执行理事会第 87 届会议上关于索尔兹伯里化武事件的声明”，EC-87/NAT.9,2018 年 3 月 13 日，第 1 页。
21OPCW 执行委员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 OPCW 代表彼得·威尔逊大使在执行理事会第 87 届会议上的发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索尔兹伯里使用神经毒剂的最新情况)，EC-87/NAT.12，2018 年 3 月 14 日；OPCW 执行理事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在执行理事会第 57 次会议上的发言”，EC-M-57/NAT, 2018 年 4 月 2 日，第 2 页。
22 OPCW 执行理事会，“总干事向执行理事会第 50 届会议通报的最新情况”，EC-M-57 / DG.1，2018 年 4 月 4 日。
23 俄罗斯常驻 OPCW 代表，“OPCW 技术秘书处问题”，2018 年 4 月 1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8237 次会议临时记录，S/PV.8237，2018 年 4 月 18 日。
24 OPCW(注 22)，第 3 段。
25 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团致信执行理事会主席，见 OPCW 执行理事会附件，“俄罗斯联邦要求召开执行理事会会议”，总干事说明，EC-M-57/1，2018 年 3 月 30 日。根据执行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12 条，执行理事会在常会期间举行会议，并在闭会期间举行会议以推进职能执行。因此，理事会各成员需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准备参会。2018 年，理事会举行了 3 次常会和 5 次临时会议。
26OPCW(注 21)，第 1 页。
27OPCW(注 21)，第 2 页。
28 OPCW 执行理事会，“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卡拉马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专家、化学科学教授、博士里巴尔琴科在执行理事会第 57 次会议上的发言”，EC-M-57/NAT.4，2018 年 4 月 4 日，第 4 页。
29 OPCW(注 28)，第 4 页。

30 OPCW 执行理事会，“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舒尔金大使在执行理事会第 57 次会议上的发言”，EC-M-57/NAT.6，2018 年 4 月 4 日，第 3 页。
31 OPCW(注 30)，第 6 页。
32 OPCW 执行理事会，“巴拿马共和国常驻代表威利斯·德瓦莱大使在执行理事会第 57 次会议上，提交 OPCW 的声明”，EC-M-57/NAT.16，2018 年 4 月 4 日。
33 OPCW 执行委员会，“加拿大常驻 OPCW 代表萨宾·诺克大使在执行理事会第 57 次会议上的发言”，2018 年 4 月 4 日。
34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外交大臣约翰逊对俄罗斯在 OPCW 提案失败作出回应”，新闻发布，2018 年 4 月 4 日。
35 联合国安理会，第 8203 次会议临时记录，S/PV.8203，2018 年 3 月 14 日，第 8 页。
36 联合国安理会，第 8327 次会议临时记录，S/PV.8237，2018 年 4 月 18 日，第 12 页。
37 联合国安理会，第 8343 次会议临时记录，S/PV.8343, 2018 年 9 月 6 日，第 9-10 页。
38 联合国(注 37)，第 11 页。
39 联合国(注 37)，第 11 页。
40 联合国大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联合国大使兼常驻代表埃沙格·哈比卜先生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关于所有裁军和国际安全议程项目的发言”，纽约，2018 年 10 月 15 日，第 3 页。
41 联合国，“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部长兼参赞阿历克斯·库斯托梅里在联合国上的声明”，纽约，2018 年 10 月 24 日，第 1 页。
42 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向大会提交 8 份草案，其中包括旨在确定并追究化武肇事者责任的文本”，2018 年 11 月 5 日，新闻发布，2018 年 11 月 5 日。
43 联合国大会，“联大通过 67 项裁军草案，呼吁在全球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采取更大规模集体行动，缩减核武库，增进互信”，新闻发布，2018 年 12 月 5 日。
44OPCW 技术秘书处，“支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技术援助请求的活动报告摘要(技术援助访问 TAV/02/18)”，技术秘书处说明，S/1612/2018, 2018 年 4 月 12 日，第 5 段。
45OPCW (注 44)，第 4 段。
46OPCW (注 44)，第 10 段。
47OPCW (注 44)，第 10 段。
48OPCW 技术秘书处，“支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技术援助请求的活动总结报告(技术援助访问 TAV/02/18 和 TAV/03B/18“艾姆斯伯里事件”)”，技术秘书处说明，S/1671/2018, 2018 年 9 月 4 日。
49OPCW (注 48)，第 8 段。
50OPCW (注 48)，第 10 段。
51OPCW (注 48)，第 11 段。
52 见 2018 年 4 月 16 日电视节目，Ofcom 广播和点播公告，第 369 号，2018 年 12 月 20 日，第 100 页。
53 从 2018 年初开始，英国通信服务监管机构 OFCOM 对 10 个节目进行了调查。10 个节目播出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7 日至 2018 年 5 月 4 日，大约是在 2018 年 3 月 4 日前 FSB 特勤局官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尤利娅在索尔兹伯里遇害后的一段时间内播出。英国通信管理局（Ofcom）发现，RT 新闻频道违反了广播规则，并“有意考虑实施法定制裁”。见 Ofcom，“RT 新闻频道调查的最新情况”，媒体发布，2018 年 12 月 20 日。
54 俄罗斯外交部，“拉夫罗夫外长在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第 26 届会议上的讲话”，新闻发布，2018 年 4 月 14 日。
55 俄罗斯外交部(注 54)。
56 拉夫罗夫声称均来自实验室报告，但这一说法令人怀疑，尤其是瑞士代表团提出的理由。俄罗斯外交部(注 54)。
57OPCW 执行理事会，总干事在第 59 次会议向执行理事会致开幕词，EC-M-59/DG.1，2018 年 4 月 18 日，第 3 页。
58OPCW 执行委员会，“瑞士常驻 OPCW 副代表纳丁·奥利维尔·洛扎诺在执行理事会第 59 次会议上的发言，议程 3，关于为支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技术援助请求而开展的活动的报告（TAV/02/18）”，EC-M-59/NAT.2，2018 年 4 月 18 日，第 2 页。

第 3 节.化学武器：军备控制与裁军

卡蒂罗娜·麦克莱什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CWC)为禁止化学武器提供了国际法律依据。[1]2018 年，CWC 新增一个成员国-巴勒斯坦。[2]截至 2018 年 12 月，CWC 共有 193 个缔约国，OPCW 负责具体执行。[3]

2018 年 6 月，在荷兰海牙 OPCW 总部召开了一次关于化学战受害者医疗问题的国际研讨会。[4]来自世界各地的 50 多名科学家、临床医生、专家、学者和民间组织代表出席本次研讨会。讨论的重点是化学战受害者提供医疗援助面临的各类挑战，尤其是化武对健康和治疗的长期影响。与会者编写了一份专题讨论会宣言，就 OPCW 技术秘书处和国际支持化学武器受害者网络如何最有效地为化学武器受害者提供帮助提出建议。[5]

2017 年缔约国大会任命西班牙费尔南多·阿里亚斯大使任 OPCW 总干事，任期四年，2018 年 7 月 25 日正式履行。阿里亚斯接替土耳其艾哈迈特·居姆居尔大使，居姆居尔在前一天完成了第二任期。阿里亚斯大使是 OPCW1997 年成立以来的第四任总干事。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已有 56 个缔约国在 2014 年 6 月启动的安全信息交换(6)系统中登记并积极使用该系统来传送声明和相关文件。同月，技术秘书处发布 2018 年版《化学品手册》和新版化学品在线预产数据库。二者都有所扩充，包括缔约国 2014 年至 2017 年间申报的登记化学品，以及同期美国化学文摘服务社登列化学品。[6]

OPCW 大事记

2018 年全年，OPCW 技术秘书处议程继续以叙利亚使用化武指控为主，并试图确认叙利亚声明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这两大问题是西方国家同俄罗斯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所在，并对 OPCW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此 OPCW 在 2018 年举行了三次会议---第四届 CWC 审议大会和 CPC 两次大会，一次例会和一次特别会议。

缔约国会议第四届特别会议

应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波兰、罗马尼亚、英国和美国常驻代表请求，6 月 26 日至 27 日举行了特别会议。[7]

特别会议的召开并未得到所有缔约国的支持。中国、伊朗、俄罗斯、叙利亚和委内瑞拉向执行理事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怀疑提出请求的成员国是否真的在认真履行其公约承诺义务”。尽管如此，特别会议还是在摩洛哥举行，由阿卜杜勒乌阿哈布·贝卢基大使主持。第一天为公开会议，第二天为闭门会议。

总干事在特别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此次会议是在国际舆论“日益不安”的背景下举行，相关世界论坛未能追究幕后黑手责任，令人十分震惊。[8]总干事提醒与会缔约国，“如果不能追责，就无法阻止化武再次出现在战争和恐怖事件中”，总干事呼吁大会“团结一致”。[9]

会议开始前四天，英国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得到其他 30 多个国家的支持，支持“应对化武威胁”。[10]这也是第 5 次拟议修正案，前 4 次无一幸免，均被否决。[11]布隆迪提交了一份争锋相对的决定草案以供审议，但英国草案表决后被撤回。英国草案表决 82 票赞成、24 票反对、26 票弃权(见表 8.1)。[12]

表 8.1 “应对化武威胁”草案修正案，缔约国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 2018 年 6 月 27 日

赞成（82 票）	反对（24 票）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象牙海岸、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大韩民国韩国、科威特、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北马其顿、马拉维、马耳他、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西班牙、瑞典、瑞士、多哥、汤加、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美国、瓦努阿图	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布隆迪、柬埔寨、中国、厄立特里亚、印度、伊朗、哈萨克斯坦、老挝、缅甸、纳米比亚、尼加拉瓜、菲律宾、俄罗斯、南非、苏丹、叙利亚、塔吉克斯坦、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

资料来源：OPCW，缔约国大会，缔约国大会第四届特别会议报告，C-SS-4/3，2018 年 6 月 27 日，第 3 段，第 15 段。

这个被称为“六月决定”的决议共有两大组成部分。第一个问题涉及叙利亚，并授权 OPCW

对叙利亚化武责任进行界定，如有需要，对今后发生的袭击事件也同样如此。决定还授权 OPCW 与英国进行信息共享。第二部分则超越叙利亚，授权总干事提议 CSP 建立一个公正独立的专家机制，如遇缔约国遭受化武袭击并对 OPCW 提出请求追责化武肇事者。总干事也有权在有需求时寻求具备相关经验的外部专家的协助。协议甚至允许 OPCW 采取进一步行动，向缔约国提供更多的援助，以防范非国家行为者威胁。保加利亚在决定通过后代表欧盟发言，称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就”。[13]然而，并非所有缔约国都是这样认为。如俄罗斯表示“对所作决定完全不同意”，认为“只有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在涉及国家主权时采取强制性措施，定责是这一能力最重要的体现之一。[14]伊朗同样认为：“公约并未赋予总干事或技术秘书处将使用化武定责划归为总干事或技术秘书处权利或义务。”[15]叙利亚提出 8 个理由，说明其为什么对草案投下反对票，因为叙利亚认为决议是“政治化产物”，超越了 CWC 的规定，是“基于欺骗”，而且“是在决议提交国的威胁和恐吓下通过”。[16]

第 23 届缔约国会议筹备工作

执行理事会第 89 届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日举行。其目的之一是审议 OPCW 2019 年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其中就包括对执行 6 月决议所需资源的预测。

总干事在致执行理事会的开幕词中告知缔约国，五天前，荷兰外交部向他通报了“荷兰国防情报和安全局于 4 月 13 日采取行动，挫败了针对 OPCW 的网络行动”。总干事向缔约国保证，秘书处并未发现“任何信息泄露的证据”。[17]然而，总干事通知缔约国，预算和工作方案草案包括一项关于“专项资本投资基金”提议. . [18]荷兰代表团提请相关各方留意荷兰国防部长给荷兰议会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4 月 13 日：

俄罗斯军事情报人员 [GRU]已潜入海牙 OPCW 总部附近，并准备入侵 OPCW 网络。GRU 官员拥有专门设备，可以拦截和操纵 Wi-Fi 通信。为保护 OPCW 网络完整性，DISS[荷兰国防情报安全局]针对 GRU 先发制人，并于当天护送俄罗斯情报官员离开荷兰。[19]

第 89 届会议公开发表的国家声明表明，缔约国之间存在分歧，即明确提及对新闻的关切(主要是西方国家)，并认为这是对 OPCW 及其工作完整性的攻击，而有些缔约国则闭口不谈。如 OPCW 网站就找不到俄罗斯代表团对这一问题发表看法。

预算草案也出现类似分歧，那些反对 6 月决定的缔约国现在也反对预算中相应的科目。[20]会议报告表决，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表决结果为 27 票赞成，5 票反对，8 票弃权。[21]因此，决定草案未获通过。会议报告同时指出，俄罗斯提议的工作计划和预算决议草案也未通过，表决结果为 6 票赞成、21 票反对、13 票弃权。[22]

2018 年 10 月 16 日，加拿大、荷兰和美国提交了一份“加拿大、荷兰和美国关于 CWC 化学品附件附表 1 进行技术修改的联合提案”。提案于 10 月 25 日送交所有缔约国，但公开网站上并未公布这一通知。[23]美国大使肯尼斯·沃德在执行理事会第 89 届会议上说：

提出这一建议是针对 CWC 处理索尔兹伯里化学战剂事件，并由科学咨询委员会在其最近报告中确定化学品类型。化学品及类似品类并被列入 OPCW 禁止列表，应列入附表 1 化学品。[24]

12 月 7 日，总干事宣布将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召开执行理事会会议，讨论这一提议。[25]11 月下旬，秘书处还收到俄罗斯联邦提出的五项关于修改化学品附件的建议。[26]秘书处对这些建议的评价工作已进入 2019 年 1 月。

第二十三届缔约国会议

会议第 23 届会议就是在这种紧张的背景下举行的，由摩洛哥的贝鲁基大使主持。会议安排在《化学武器公约》第四次审查会议之前的两天举行。除其他外，它的任务是就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2019 年方案和预算有关的事项作出决定，执行理事会尚未就此达成共识。[27]

根据总干事关于执行特别会议决定的建议，中国和俄罗斯提交了一份关于“维护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完整性”的决定草案，要求由执行理事会召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审查有关 6 月份决定执行情况的建议。在唱名表决中，决定草案以 30 票赞成、82 票反对和 31 票弃权未获通过。[28]

伊朗和俄罗斯对 2019 年拟议方案和预算提出了三项修正案，迫使他们各自

进行表决。在这些修正案均未能通过后，方案和预算草案以 99 票赞成、27 票反对和 18 票弃权获得通过。[29]需要举行进一步的表决会议，通过关于设立一个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特别基金以支持 C-SS-4/DEC.3 号决定（6 月的决定）的决定草案，以 94 票赞成、26 票反对、23 票弃权获得通过。[30]

11 月 20 日，第 23 届 CSP 因未能通过最终报告而暂停。就在停摆前，美国提出一项建议，在脚注中加入如下内容："一些缔约国在法律上不承认'巴勒斯坦国'是一个国家，因此也不承认它是 CWC 的缔约国。"[31]拟议新文本并未得人们积极的呼应。[32] 11 月 29 日会议重新召开时，也就是审议大会召开前的倒数第二天，文本措辞又经过修改重新出炉，最终文件修订版上交。在仅仅持续了 14 分钟的分组讨论会议上，修订版并入整体文件，审议后通过。[33]

CWC 第 4 届审议大会

费尔南多·阿里亚斯大使在其第 1 任期第一次出席 CWC 审议大会。他在第 4 届 CWC 审议大会上阐述了自 2013 年 4 月第 3 次审议大会以来 OPCW 工作所取得的里程碑式成就。[34]阿里亚斯强调：（a）俄罗斯申报化学武器储存已销毁完毕，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的申报库存销毁工作也已完成；（b）特别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6 月]决议；（c）对化武指控设立真相调查团进行调查；（d）OPCW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35]然而，阿里亚斯同时指出，OPCW 正处于关键时刻并且严守遵守公约的底线原则。[36]

联合国秘书长向审议大会致信，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指出自 2013 年以来，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既取得了显著成就，也目睹了痛苦的悲剧"。中满泉表示，最近的化武事件是"可憎的"和"不可接受的"，是对"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直接威胁，并强调必须查明责任人并追究其责任，这一点"至关重要"。[37]

对于化武指控、化武指控调查以及特别会议决议中的不同意见，为期三天的一般性辩论中都有涉及。在会议声明和其他相关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对指控调查的指责明显是精心排练过。如针对真相调查，俄罗斯建议"现在是到了对职权范围进行重大修改的时候了"。[38]德国表示 FFM 调查活动是"专业和公正的"。[39]

然而，围绕责任归属问题发表的声明中，人们发现分歧依旧最大。6 月决议支持者们认为责任归属属于 CWC 职权范围，而反对一方则认为，归属仍需一次修

正会议。如英国表示，支持 OPCW 职权归属并非要在大国政治中站队，这也正是步入了全球禁化武事业的深水区。[40] 美国表示，该决议赋予 OPCW 新机制工具，“应成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今后考虑使用化武时的威慑工具”。[41] 与之相反，马来西亚大使表示马来西亚代表团认为，“就所有意图和目的而言，赋予 OPCW 定责归属权的决定，“略显仓促”，并称新机制“飘忽不定”。[42] 俄罗斯称则表示决议“不合法”，是“对几十年来不断推进的化学裁军和不扩散机制的一种破坏”。[43]

会上本就十分紧张的气氛，由于美国提出的俄罗斯拥有化武的指控变得愈发剑拔弩张。[44] 其中包括美国对“伊朗长期以来未向 OPCW 通报其化武计划”的关切，以及“伊朗将中枢神经系统作为攻击目标的化学品研发”。伊朗在答辩时，驳斥了上述指控。[45]

6 月决议的分歧，延续至第二周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缔约国分裂为三大集团：6 月决议的支持者，6 月决议反对者和安静吃瓜群众。吃瓜群众们不发表意见，要么是因为他们本就对责权归属没有强烈倾向，要么觉得自己位卑言轻，根本看不到任何弥补两大集团之间裂痕的办法。[46] 全体委员会在 11 月 26 日开始工作，并于 11 月 28 日下午在全体会议上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会议由大会主席波兰马尔金·泽佩拉克大使主持。在此期间，全体委员会共举行 6 次会议，审议第 4 届审议大会筹备工作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主席-印度尼西亚古斯蒂·阿贡·韦萨卡·普贾大使提交的临时提议草案。然而，在提交全体会议报告中，泽佩拉克大使指出：

11 月 28 日下午，当委员会会议接近尾声时，我们已经很明显的感受到，在有限时间内无法就临时草案所有内容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尽管委员会就大量表述进行了修改，但仍然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分歧根本之所在。[47]

由于全体委员会无法达成协商一致草案，审议大会主席萨尔瓦多阿古斯丁·瓦斯克兹·戈麦斯大使开始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审议大会即将结束的前一天，以主席名义提交一项新草案。会议期间，戈麦斯大使强调一些新增表述，如“上届审议大会议题仍有待辩论”。[48] 主席报告还涵盖了中枢神经化学品，海洋倾倒化武和强调民间组织对 OPCW 事业的巨大帮助。[49]

总务委员会第二天的报告确认，持续一夜的磋商再次说明各代表团立场分歧过大，因此无法就最终报告达成协商一致意见。[50] 主席前一天发表的报告，随后

根据议事规则第 50 条重新发表。[51]

许多缔约国对审议大会未能达成共识表示遗憾，这也在两项联合声明中有所体现：一项声明是法国代表 57 个国家，一项是俄罗斯代表 26 个国家。法国声明指出，“今天，化武的再度出现让人们十分的震惊”，并呼吁采取一系列行动加强 CWC 执行力度。[52]俄罗斯声明则指出，化武的政治化，OPCW 内部的不团结正在大大降低 OPCW 的工作效率，并呼吁“缔约国之间进行对话和协商，以弥合分歧，解决争议”，并探讨是否有可能改进缔约国大会规则和议程”。[53]

2018 年其他大事件

销毁化学武器

截至 2018 年 10 月底，已申报的 1 类化学武器中，96.5%以上已被核查销毁。美国现在是唯一一个还保有化武的申报缔约国，预计销毁日期为 2023 年 9 月。2018 年美国报告表示，已经完成肯塔基州蓝草市的最后一个化学武器销毁设施的建设，并正在稳步推进其化武销毁计划。[54]

德国蒙斯特的指定销毁设施于 2017 年 11 月，完成对从利比亚运出的所有 2 类化武销毁工作。2018 年，利比亚相关化武销毁活动集中在鲁瓦加罐区前化武储存点。秘书处视察员无法亲自前往现场，故对 4 名利比亚人进行了样本收集和实时视频采集培训。现场抽样工作于 2018 年 3 月底展开，并于 2018 年 4 月 5 日结束。OPCW 秘书处正在协助清理该地点，清理工作应于 2019 年 8 月完成。[55]

2018 年，日本在中国境内的遗弃化武销毁工作在哈尔滨化武销毁设施继续进行，并进行了 12 次相关检查。欧洲 6 个缔约国(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英国)进行了大量废旧化武回收。年内，上述国家共进行了 7 次废旧化武巡检。[56]

OPCW 科学咨询委员会

2018 年，OPCW 科学咨询委员会(SAB)提出了 4 份报告，并继续其“外交官科学”倡议，举行 6 次活动。此外，SAB 委员会全体成员国共同编撰了化武样品稳定性和储存建议，并于 10 月出版。[57]还有其他一些同类出版物，其中许多是来自 2017 年 OPCW-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化学安全创新技术研讨会。[58]

应 OPCW 总干事请求，于 2017 年成立 SAB 临时工作组(TWG)，其目的是研究化武调查方法和技术实际应用。TWG 在 2018 年 2 月第一次召开会议。TWG 职权范围是审查与 CWC 第 9 条和第 10 条规定，对相关科学技术进行审查，包括验证证据和确定证据来源(即确定所有权、保管权和地点的时间顺序)，对各信源证据进行整合以重建既往事件。[59] 第一次会议上，成员国听取既往和当前调查结果简报，如 OPCW 叙利亚特派团和 OPCW-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及外部专家简报。设立 6 个分组，审议诸如法医学；数据收集管理；取样、监测和分析等问题。[60]

此外，2018 年审议大会上 SAB 发表一份报告，对 2018 年 4 月发布的上届大会报告后的科技发展进行实质性审议。[61] 对 CWC 安排，SAB 指出：

随着第 4 届审议大会的召开，附表 1 中所列所有化学品现已公开 35 年有余. . 只有当化学品武器化和/或被囤积信息完全透明或高毒性化合物再无合法用途，OPCW 及其缔约国才会对化武载体和固有风险或是任何非列表化学品被用作[化学战剂]感到震惊。[62] 在第 4 届审议大会报告发表几周后，“鉴于英国请求的 2018 年 3 月技术援助访问调查结果”，总干事要求 SAB 就已被认定为新型神经毒气的有毒化学品提供咨询意见。[63] 总干事要求任何具备能力的缔约国都应向 SAB 提供相关信息资料。[64] SAB 完成此项任务，并于 7 月 3 日提交报告。总干事指出：“调查结果为缔约国讨论此些新型神经毒剂与 CWC 的相关性提供了事实依据”。[65]

教育和外联咨询委员会

OPCW 教育和外联咨询委员会(ABEO)在 2018 年举行两次会议：2 月至 3 月和 8 月。2 月，ABEO 向总干事提交了第一份实质性报告。[66] 报告建议，“防止化武死灰复燃”应成为教育外联活动的“绝对主题”。[67] 报告建议不仅要积极接纳利害攸关方民间组织，但最重要的是将其设定为“教育外联的目标”或是教育外联活动设计和实施的得力伙伴。[68] 以报告为蓝本，以各国政府为受众的使用手册在 11 月出版。[69] 第 4 届审议大会强调，教育外联工作是“OPCW 和缔约国接触的重要手段”。[70] 大会要求“秘书处进一步加强教育外联活动力度”，并“鼓励秘书处与 ABEO 通力合作，积极推动教育外联活动的开展”。[71]

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

OPCW 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应对化武恐怖主义威胁问题之上，包括深化与其他国际机构的既有合作关系。3 月，总干事签署了由联合国反恐办公室发起的全球反恐协调契约。[72] 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契约汇集了 38 个国际机构，旨在确保联合国全系统反恐工作的协调一致，包括协调具体业务一级活动以避免业务重叠。OPCW 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一道担任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预防和应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袭击问题工作组联席主席。4 月，OPCW 主办了一次讲习班，为工作组处理 2017 年沙盘推演行动计划奠定基础。[73] 6 月，技术秘书处主办了 OPCW 第一次打击化学恐怖主义会议，来自相关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共 250 多人参与会议。[74] 总干事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表示，应该举行更多此类会议，“以此建立伙伴关系和加强打击化学恐怖主义威胁国际”。

2018 年，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也进一步加深。如 OPCW 同世界卫生组织交换意向书，目的是构建更为正式的合作安排。通过相互参与彼此的活动，OPCW 同 1540 决议机制长期合作关系得以进一步加强，同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也是如此。[75]

联合国裁军和化学武器议程

2018 年 5 月下旬，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提出一项新的裁军议程。[76] 在这份长达 87 页的文件前言，古特雷斯描述了一个黯淡的裁军环境：“在最近众多的武装冲突中，人道主义法则被践踏，诸如化武这样的违禁武器，重新被投入战斗”。[77] 结果就是，“新现实迫切需要我们将裁军和不扩散置于联合国工作的重中之重”。[78]

对于 CW，议程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确保对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全球规范”得到尊重并竭力提升维护规范权威的能力。报告指出，近年来武器规范“屡屡遭受挑战，其核心原因就是在叙利亚和世界其他地方屡次出现的使用此类武器却不受惩罚的怪相”。[79] 报告指出，“政治分歧成了问责路上的绊脚石”。报告认为“除非遏制这一趋势，否则我们极有可能回到一个道德黑暗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年代，化武横行，惨无人道的生物武器也是稀松平常”。[80]

报告呼吁安理会“展现出新的领导能力、团结一致，终结有罪不罚现象”。[81] 报告认为，安全理事会“未能履行其职责”，反而“深陷悲剧政治舞台不能自拔”。[82] 因此，同 CWC 相关的一个明确行动要点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成

员国一道，“构建新的领导，重塑新的团结，恢复人类对全球禁化武规范的尊重，包括建立一个新的公正机制以确定叙利亚化武事件的幕后黑手”。[83] 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公正机制，报告建议，随着 CWC 接近成为普世法则，OPCW 应肩负起执行和调查化武事件的专门机构，其机构能力理应得到秘书长的支持。[84]

议程中提出的一个相关领域是鼓励负责创新。我们注意到科学家已经研发出新的手段和技巧来“保护和确认化学品不被用于和平以外领域并不被用作武器”，并且被运用于指控调查的前沿。报告指出，秘书长支持“工业界和学术界在确保和平利用相关技术的决策中，能够发挥更为包容性的作用”。[85]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于 2018 年 10 月启动了一项“灵活”议程实施计划。[86]该计划指出，关于行动——恢复对化学(和生物)武器“全球规范”的尊重——OPCW-UN 联合调查机制“经验教训”进程正在“推进中”。希望这一进程将“使国际社会更好地对今后任何化武指控做出反应，并加深安理会对长效可信机制样本的理解”。[87]

1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公约”(CWC)摘要及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2 OPCW 执行理事会，“2017 年 8 月 16 日至 2018 年 8 月 15 日期间，OPCW 普遍性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年度报告”，总干事说明，EC.89/DG.12，C23 / DG.9，2018 年 9 月 3 日，第 7 段。
3 以色列签署了 CWC，但尚未批准，而埃及、北朝鲜和南苏丹依旧还未签字。
4 OPCW，“化武受害者医疗救治研讨会:挑战与希望”专题研讨会，海牙，2018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
5OPCW，“化武受害者医疗救治研讨会:挑战与希望”，新闻发布会，海牙，2018 年 7 月 2 日;OPCW，“化武受害者医疗救治研讨会:挑战与希望”研讨会宣言，海牙，2018 年 6 月。
6 OPCW，化学品手册，2018 年(OPCW:海牙，2017 年 1 月)。
7 OPCW 执行理事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俄罗斯联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发表的联合声明”，EC-M-60/NAT.1，2018 年 6 月 4 日，第 2 页。
8 OPCW，缔约国会议，“总干事在缔约国大会第 4 届特别会议致开幕词”，C-SS-4/DG.4，2018 年 6 月 26 日，第 1 页。
9 OPCW(注 8)，第 2、3 页。
10 OPCW，缔约国会议，“缔约国大会第 4 届特别会议报告”，C-SS-4/3, 2018 年 6 月 27 日，第 3.4 段。2018 年 6 月 22 日，提出决定草案 C-SS-4/DEC/CRP.1/Rev.1 的其他 30 个国家分别为: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芬兰、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冰岛、爱尔兰、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和美国。
11OPCW(注 10)，第 3.6 - -3.10 段。哈萨克斯坦提交提案修正案(OPCW 文档 C-SS-4/DEC/CRP.5),白俄罗斯(OPCW 文档 C-SS-4/DEC/CRP.6),委内瑞拉(OPCW 文档 C-SS-4/DEC/CRP.7)、伊朗(OPCW 文档 C-SS-4/DEC/CRP.9)和布隆迪(OPCW 文档 C-SS-4/DEC/CRP.10)。表决记录如下:哈萨克斯坦修正案，22 票赞成，76 票反对;白俄罗斯修正案，23 票赞成，78 票反对;委内瑞拉修正案，21 票赞成，78 票反对;伊朗宪法修正案 19 票赞成，79 票反对;布隆迪宪法修正案 23 票赞成，78 票反对。
12 OPCW(注 10)，第 3.16 段。

13 OPCW，缔约国大会，“保加利亚:欧盟欧洲对外行署不扩散问题工作组主席朱迪特·科罗米在缔约国大会第 4 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C-SS-4/NAT.12，2018 年 6 月 27 日，第 2 页。
14OPCW，缔约国大会，“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团长卡拉马诺夫先生关于第 4 届缔约国大会英国决定草案表决结果的发言”，C-SS-4/NAT42，2018 年 6 月 27 日，第 1-2 页。
15OPCW，缔约国大会，伊朗：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 OPCW 代表阿里扎·贾汉格里博士在缔约国大会第 4 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CSP-SS-4, 2018 年 6 月 27 日,第 5 页。
16 OPCW，缔约国大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 OPCW 代表巴萨姆·萨巴格大使在缔约国大会第 4 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解释投票”，C-SS-4/NAT.19，2018 年 6 月 27 日，第 1 页（条款 1、2、5、7）。
17 OPCW 执行理事会，“总干事向执行理事会第 89 届会议致开幕词”，EC-89/DG.31,2018 年 10 月 9 日，第 7 段。
18OPCW(注 17)第 8 段。
19 荷兰国防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关于在海牙干扰 GRU 网络行动”，2018 年 10 月 4 日。
20 见 OPCW 执行理事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 OPCW 代表阿里雷扎·贾汉格里博士在执行理事会第 89 次会议上的发言”，2018 年 10 月 9 日。
21 OPCW，“执行理事会第 89 次会议报告”，EC-89/3，2018 年 10 月 22 日，第 9.10 段。
22OPCW(注 21)，第 9.11 段。
23 OPCW 执行理事会“总干事关于通过执行理事会第 62 次会议临时议程 3 下联合提案的后续活动，其中所涉财政、行政和方案及预算问题的报告”，EC-M-62/DG.2，2019 年 1 月 10 日，第 1 段。
24 OPCW 执行委员会，“美利坚合众国：常驻 OPCW 代表肯尼斯·沃德大使在执行理事会第 89 次会议上的发言”，EC-89/NAT.10，2018 年 10 月 9 日，第 4 页。
25OPCW，“执行理事会会议通知”，总干事说明，EC-M-62/1，2018 年 12 月 7 日，第 2 段。
26 OPCW 执行理事会，“总干事在执行理事会第 63 次会议上致开幕词”，2019 年 2 月 25 日。
27 OPCW 缔约国大会，“缔约国大会第 23 次会议临时议程”，总干事说明，C-23/1，2018 年 7 月 11 日。
28 OPCW 缔约国大会，“缔约国大会第 23 次会议报告”，C-23/5, 2018 年 11 月 29 日，第 8.12-8.16 段。
29 OPCW (注 28),第 12.1 – 12.5 段。
30 OPCW (注 28),第 15.3 – 15.4 段。
31 格思里·R，“缔约国大会第二天:表决与暂停”，CWC 审议大会报告 No.3，2018 年 11 月 21 日，第 2 页。
32 格思里·R(注 31)，第 2 页。
33 格思里·R，“审议大会倒数第二天暨 CSP 闭幕”，CWC 审议大会报告 No.10，2018 年 11 月 30 日，第 2 页。
34 OPCW 审议大会，“缔约国 CWC 执行情况审议大会第 4 次特别会议，总干事致开幕词”，RC-4/DG.5，2018 年 11 月 21 日。
35OPCW(注 34)，第 6，11，12-15，16 段。
36OPCW(注 34)，第 17、21 段。
37OPCW，“RC-4，第一天上午，第 4 次审议大会”，YouTube, 2018 年 11 月 21 日。
38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团长乔治·V·卡拉马诺夫，在海牙第 4 届化武审议大会上的发言(非官方翻译)，2018 年 11 月 21 日，第 5 页。
39 OPCW 审议大会，“德国：联邦德国裁军和军控副专员鲁迪格·博恩大使在缔约国 CWC 执行情况审议大会第 4 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RC-4/NAT.13，2018 年 11 月 21 日，第 2 页。
40 OPCW 审议大会，“英国：欧洲和美洲国务部长艾伦·邓肯爵士阁下在缔约国 CWC 执行情况审议大会第 4 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RC-4/NAT.10，2018 年 11 月 22 日，第 2 页。
41OPCW 审议大会，“美国：常驻 OPCW 代表肯尼斯·沃德大使在缔约国 CWC 执行情况审议大会第 4 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RC-4/NAT.7，2018 年 11 月 22 日，第 3 页。
42OPCW 审议大会，“马来西亚:常驻 OPCW 代表艾哈迈德·纳兹里·尤索夫大使在缔约国 CWC 执行情况审议大会第 4 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C -4/NAT.34，2018 年 11 月 22 日，第 2 页。
43 俄罗斯外交部(注 38)，第 2 页。
44 OPCW,RC-4/NAT.7(注 41)。
45OPCW 审议大会,”伊朗：伊朗代表团对美国代表团在缔约国 CWC 执行情况审议大会第 4 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的回应”，RC-4/NAT.59，2018 年 11 月 26 日。
46 格思里·R，“第 6 天:全体委员会还是由三个部分组成?”，CWC 审议大会报告 No.9，2018 年 11 月 29 日，第 1 页。
47OPCW 审议大会，“全体委员会主席波兰大使马尔钦·切佩拉克在缔约国 CWC 执行情况审议大会第 4 次特别会议上的发言”，RC-4/CoW.2，2018 年 11 月 28 日，第 2 页。
48 格思里(注 33)。
49 格思里(注 33),第 1 页。
50 格思里·R，“审议大会闭幕及若干思考”，CWC 审议大会报告 No.11，2018 年 12 月 20 日，第 1 页。
51 OPCW 审议大会，“缔约国 CWC 执行情况审议大会第 4 次特别会议主席报告”，RC-4/3/Rev.1，2018 年 11 月 30 日，第 1 页。

52 法国大使菲利普·莱洛在缔约国 CWC 执行情况审议大会第 4 次特别会议的发言，(RC-4/NAT.37，2018 年 11 月 30 日，第 1、3 页。
53 俄罗斯外交部，“安哥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布隆迪、中国、科摩罗、刚果、古巴、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缅甸、尼加拉瓜、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州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越南,津巴布韦在 CWC 第四次审议大会的联合声明,海牙,2018 年 11 月 30 日”,2018 年 12 月 11 日。
54OPCW 执行理事会，“美国:向执行理事会第 88 届会议提交关于彻底销毁其化学武器储备进展情况的报告(2018 年 5 月 31 日)”，EC-88/NAT.3，2018 年 6 月 18 日。
55 OPCW 缔约国大会，“缔约国会议第 23 届会议总干事开幕词(全文)”，C-23/DG.19，2018 年 11 月 19 日，第 35 段。
56 OPCW(注 55)，第 36-38 段。
57 蒂姆佩利·C，“OPCW 科学咨询委员会就化武样本稳定性和储存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以提高其全球调查能力”，Talanta 期刊，第 188 卷(2018 年 10 月)，第 808-32 页。
58 见《纯化学与应用化学》第 90 卷 No.10(2018 年 10 月)，第 1501-1670 页;“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科学顾问委员会就 CWC 相关防暴剂提供的意见”，RSC Advances 期刊 No.73(2018)，第 41731-39 页;博雷特·V，“支持 OPCW 调查执行的科学和技术”，《澳大利亚法医研究杂志》，2018 年 12 月 26 日;福尔曼·J 和蒂姆佩利·C，“化学研究与实践中的担当:全球视角”(美国化学学会:华盛顿特区，2018)。
59OPCW，科学咨询委员会，“科学咨询委员会科技调查临时工作组第一次会议纪要”，SAB-27/WP.1，2018 年 2 月 26 日，第 5.1 段。
60OPCW(注 59)，第 30-33 页(议程 15)。
61OPCW 审议大会，“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咨询委员会在缔约国 CWC 执行情况审议大会第 4 次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RC-4/DG.1，2018 年 4 月 30 日。
62OPCW (注 61)，第 120 段。
63 OPCW 技术秘书处，“向缔约国索取新型神经毒剂资料的要求”，总干事说明，S/1621/2018，2018 年 5 月 2 日，第 2 - 3 页。
64 OPCW (注 61)，第 2 段。
65 OPCW 执行理事会，“总干事在执行理事会第 88 次会议致开幕词”，EC-88/DG.22，2018 年 7 月 10 日，第 20 段。
66OPCW 教育和外联咨询委员会，“教育与外联在防化武中作用的报告”，ABEO-5/1，2018 年 2 月 12 日。
67 OPCW (注 66)，第 1.13 段。
68 OPCW 审议大会，“OPCW 教育和外联咨询委员会成员阿拉斯泰尔·海伊教授在 2018 年 11 月 23 日海牙举行的《化学武器公约》第 4 次审议大会上的发言”，RC-4/WP.12，2018 年 11 月 23 日，第 2 页。
69 OPCW，教育与外联咨询委员会，“教育与外联创造一个无化武世界：缔约国的作用”。
70 OPCW(注 51)，第 9.85 段。
71 OPCW(注 51)，第 9.87 (d)段。
72 OPCW(注 55)，第 80 段。关于同其他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合作关系问题，见第 81 段。
73 OPCW(注 55)，第 80 段。
74 见 OPCW 技术秘书处，“打击化学恐怖主义会议纪要，OPCW 总部，海牙，荷兰，2018 年 6 月 7-8 日”，OPCW 技术秘书处说明，S/1652/2018，2018 年 7 月 16 日。
75 OPCW(注 74)，第 44 段。
76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UNODA)，确保我们共同的未来:裁军议程(UNODA:纽约，2018)。
77 UNDOA(注 76)，第 9 页。
78 UNODA(注 76)，见本卷第 5 部分第 7 章和第 4 部分第 9 章。
79 UNODA(注 76)，第 24 页。
80 UNODA(注 76)，第 25 页。
81 UNODA(注 76)，第 25 页。
82 UNODA(注 76)，第 25 - 26 页。
83 UNODA(注 76)，第 25 页。
84 UNODA(注 76)，第 26 页。
85UNDOA(注 76)，第 53-54 页。
86 见联合国秘书长裁军议程实施计划，2019 年 3 月 11 日更新。
87 见联合国秘书长裁军议程实施计划，行动 9，恢复对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规范的尊重，2019 年 3 月 7 日更新。

第 4 节.生物武器裁军和不扩散

菲利帕·伦佐斯

对抗生物战的主要法律工具是 1972 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BWC)。[1]2018 年，巴勒斯坦和纽埃加入了 BWC，中非共和国批准公约，成为第 182 个缔约国。[2]

2018 年的生物武器裁军和防扩散大事件都发生在 2018-20BWC 闭会期间专家会议(MX)、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及 BWC 缔约国大会(MSP)期间。若干生物裁军和防扩散工作组也在 2018 年成立。主要涉及 BWC 财政收支难以为继，MSP 不向 MX 提交报告，联合国秘书长裁军议程的提出以及俄罗斯日益激烈的对抗性声明，俄罗斯声称美国的生化实验室正在其邻国进行生化试验，尤其是在格鲁吉亚。

2018 年专家大会

2016 年审议大会谈判已进入 2017 年《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商定在 2021 年《生物武器公约》审议大会之前的三年中，举行五次专家会议。[3] MX1 侧重于合作与援助，MX2 侧重于科学技术，MX3 侧重于国家执行，MX4 侧重于援助、反应和准备，以及关于加强体制的 MX5。第一组会议于 2018 年 8 月举行。在每一次 MX 之前，公约履约支持机构(ISU)就审议专题编写一份一般性背景文件。[4]

专家会议 1

MX1 于 2018 年 8 月 7 日至 8 日举行会议，由玛丽亚·特雷莎大使主持

菲律宾 T·伊安默维拉。会议目的是讨论和促进共同理解并对合作和援助采取有效行动，特别侧重加强和平利用生命科学及相关技术方面的合作与援助(第 10 条)。向所有五个 MX 提交的非政府组织(NGO)联合立场文件，表明了 NGO 对会议关键行动的集体看法。联合国安理会第 1540 号决议专家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NTERPOL)、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向大会提交了技术简报。ISU 在会上简要汇报了最新的合作与援助数据库。印度、俄罗斯和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主持了另外 3 场分会。

会议对缔约国执行第 10 条而开展的全面活动进行过了审查。各代表团在探讨如何促进更有力的合作和援助时指出，需要：

（a）进一步优化合作和援助数据库运作；

（b）制定可持续资源调动战略准则；

（c）建立一个数据库，以作为生物安全管理框架样本；

（d）支持学术网络促进发展中国家生物科学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e）提供高效培训及手册指导，支持各国制订生物风险管理系统。[5]

主席在对 MX1 的思考中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供下次 MX1 进一步审议。如执行第 10 条的行动计划；第 10 条报告指导原则；ISU 内部设立一个 BWC 合作援助干事职位；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提供监督、协调和审查合作援助活动；以及与 INTERPOL,OIE 和 WHO 进一步合作的方式。[6]

专家会议 2

MX2 于 2018 年 8 月 9 日至 10 日举行会议，由巴西佩德罗·路易斯·达尔塞罗担任主席。会议旨在讨论和促进 BWC 相关科技领域的共同理解和有效行动，特别侧重于基因重组编辑。缔约国共提交 12 份工作文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1540 号决议，OIE，OPC 和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UNICRI)向大会提交技术简报。中国、俄罗斯、院际伙伴关系(AIP)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和 OPCW 共主持了另外 4 场分会。

会议审查了公约相关科技发展，并界定了潜在利益和风险。会议就生物风险评估和管理，尤其是通过规章制度进行评估管理进行了讨论，并就生物安全教育和生物科学家及其他相关人员制定自愿行为准则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议深入探讨了基因组编辑、其他相关科技及多边活动。[7] 主席就 MX2 会议指出：

会议一致认为，CWC 必须考虑与公约适用领域相关的新技术发展、公约未来的讨论以及公约未来活动的结果。[8]

就此，可就两大领域展开探讨：

（i）风险评估和管理，以及（ii）生物科学家和相关人员自愿行为守则

主席认为，上述两大议题可促进 2019 年和 2020 年 MX2 会议的高效讨论，并“为在 2021 年 BWC 审议大会就[科学技术]问题达成一致结果奠定坚实的基础”。[9] 同时他还指出，尽管 MX2 为当前讨论形式，我们不应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成立与 MX2 并行和互补的工作组。

专家会议 3

MX3 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举行会议，西班牙大使朱利奥·埃尔拉伊兹·埃斯帕尼亚主持会议。会议旨在讨论和促进加强国家执行工作的共识和有效行动。缔约国共提交 9 份工作文件。ISU 向在会上简要介绍了构建 BWC 信任措施新平台(CBM)电子提交系统，平台将于 2019 年正式启用。丹麦生物安全和生物修复中心和肯尼亚、欧盟和美国共主办 3 场分会。

大会对公约第 4 条相关措施进行了审议，第 4 条规定各国有义务采取任何必要的国家措施，在国内实施 BWC 各项规定。同时还考虑建立信任措施，特别是在报告提交数量和质量方面。

虽然过去五年间建立信任措施提交报告数量有所增加，但也只有约 40%国家提交，且报告质量参差不齐。截至 2019 年 1 月，共有 32 份 2018 年报告公开，是迄今为止年度提交数量最多的一年。[10] 会议还讨论了提升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其他途径，特别着重同行互查和透明度访问。大会还审议了第 10 条所规定的国际合作和援助在加强执行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第 3 条相关问题，如出口管制有效措施。[11]

主席对 MX3 的思考中，确定了 2019 年和 2020 年 MX3 进一步讨论的 3 个成熟领域：建立信任措施及其改进、其他自愿透明度倡议和出口管制。[12]

专家会议 4

MX4 于 2018 年 8 月 14-15 日举行会议，由瑞典丹尼尔·诺德主持。会议旨在讨论和促进援助、反应和准备方面的共识和有效行动。缔约国共提交 11 份工作文件。OIE、OPCW 和 WHO 向大会提交技术简报。加拿大、法国、俄罗斯、乔治敦大学和核威胁倡议(NTI)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主办了 5 场分会。

会议讨论了在执行第 10 条过程中的实际挑战和可能的解决办法，该条款要求缔约国需向因违反公约而面临危险的任何缔约国提供援助。尤其应注意援助的准则和形式。会议还讨论了在无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对援助请求作出快速有效应对程序，包括流动生物医学实验室的概念。同时探讨了如何加强国家间应对自然及人为传染病暴发的应对能力，以及在可能对农业、牲畜和自然环境使用生物制剂时的应对和援助方法。[13]

在对 MX4 的回顾中，主席强调，在一缔约国遭受生物武器袭击的情况下，目

前还未有援助请求应对框架。如果今天遇到援助请求，许多必要内容还需临时拟定。然而，尽管在何种方式、何种时候提供援助还存在分歧，MX4 讨论表明，“人们普遍支持制定[此种]框架”。[14]主席建议应制定程序及标准，在准备和培训活动中推广程序及标准并协调各国建立相应数据库，以促进第七条的执行。但关于数据库将如何运作、哪个技术平台，可以列出哪些援助以及可能的财务费用，他敦促在 2019 年和 2021 年进一步努力解决上述问题。[15]

专家会议 5

MX5 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举行会议，由捷克的奥塔·卡戈尔担任主席。会议目的旨在通过讨论，加快对公约形成共识并采取有效行动。缔约国共提交 4 份工作文件。美国、伦敦国王学院和挪威、日内瓦裁军平台和英美安全信息理事会主办了三场侧会活动。会议只有一项议程：审议通过可能的补充法律措施或公约框架内的其他措施，进一步加强公约及其运作的各种手段和选择。[16]

主席在对 MX5 的思考中指出，尽管各代表团强烈表示希望并愿意加强《公约》执行，但对加强《公约》的手段和方法也存在不同意见：“最重大的分歧在于是否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定来实现目标”。“当前或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一问题并不存在达成共识的可能”。[17]主席同时表示：

毫无疑问，立场是坚定的：如果要取得进展，就必须避免采取有害任何一种立场的行动。然而，也许可以采取步骤，通过不涉及新法律机制的政治商定措施，在近期内切实加强《公约》执行力度。

此类措施可以迅速商定和执行，同时可以就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的规格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换言之，MX5 的讨论应继续不仅侧重于法律机制，而且还应侧重于《生物武器公约》的其他体制方面。[18]主席建议改进和扩大现有 CBM，并根据第七条提出援助请求指导方针。

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

2018 年 11 月 5 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关于 BWC 的 A/C.1/73/L.9 号决议。[19]与往年一样，我们能够发现 CWC 缔约国数量有所增加，但不寻常的是，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这些国家没有签名。常规意义上的 CWC 决议的实质性补充协议是因为关注到 CWC 财务状况日渐严峻，并提请 2018 年 MSP 主

席准备一份资料，就今后的财务可预测性和可持续问题及相应对策作出说明。[20]

关于维护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权威的措施，决议得到 178 个国家的同意，其中有 2 个国家经常投弃权票：以色列和美国。[21]没有国家投反对票。《日内瓦议定书》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该决议再次呼吁所有国家“严格遵守议定书原则和目标”。自 1980 年以来，所有国家，包括《生物武器公约》所有缔约国普遍加入《日内瓦议定书》，是在《生物武器公约》框架内商定的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承诺。然而，自 1980 年以来，《生物武器公约》非《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数量有所增加。此外，一些国家仍然正式维持对议定书的保留，决议呼吁这些国家撤回保留。

2018 年 MSP

2018 年 MSP 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5 日和 7 日举行，由北马其顿乔尔金斯基主持。虽然挑选 MSP 主席和副主席的过程没未有明确的法定程序，但最近的做法是区域集团自行决定，除非有人提出反对，否则缔约国将接受这一做法。对于 2018 年 MSP，美国已经提前非正式地告知，它将无法接受不结盟运动（NAM）推选委内瑞拉为副主席国。这次会议上，缔约国决定视为特例，2018 年不设副主席国。

会议负责通过审议 MX 报告管理闭会期间方案，并在预算和财务事项方面采取必要措施。主席在会议开幕之前，编写一份普世化推广报告。[22]此外，大会授权编写一份资料，以处理财务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问题。[23]ISU 编写年度活动报告。[24]缔约国共提交 11 份工作文件。[25]会议间隙期，共举行 9 场侧会活动。[26]

原定为期四天的会议（12 月 4 日至 7 日）缩减至三天（12 月 4 日、5 日和 7 日）。尽管在 12 月 6 日继续举行非正式讨论，但是这一变化还是折射出极为不利的金融环境。

会议焦点是采取紧急措施，确保财务可预测性，以及缔约国会议和 ISU 员工合同的可延续性。

各缔约国认识到，公约财政困难主要是三大原因：某些缔约国长期欠缴会费；一些国家拖缴会费；以及联合国对非经常预算供资活动的财政支出。为解决此类问题，会议核准了一套实质性措施，鼓励及时缴款，确保流动性，避免赤字支出或债务累积。其中一项措施是设立周转基金，由自愿捐款供资，在收到合理预期

的捐款之前，仅用作短期融资来源。会议同时：（a）提请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ISU定期报告WCF论坛资金支出、归集和使用情况；（b）提请2019MSP主席确定进一步措施，包括激励缴款措施，供2019MSP审议；（c）决心继续监测公约财务状况，包括在2019MSP进行审议。[27]

除财务审议外，会议还审议了会员推广、ISU年度报告、2019年议程安排及各MX报告。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会议审议MX报告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微乎其微。2018MSP报告仅有一行涉及2018年MX："未就审议工作(含专家会议)的任何可能结果达成共识"。[28]主席对报告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表示遗憾。特别感到遗憾的是，报告并未提及他作为主席所完成的出色工作。[29]

理查德古思里，见证了通宵达旦的谈判，他表示伊朗代表团应该为最终报告未达成实质性内容负责，而不是人们通常想到经常抱团投反对票的中国和俄罗斯。[30]垂头丧气的谈判各方在2018年BWC大会上进行了大量筹备工作和实质性讨论，绝大多数缔约国都为最终报告贡献各自力量。寻求共识的道路，满是荆棘密布，满是挫折丛生，一个更大的问题浮出水面，当前的工作思路究竟是不是条约的最佳方式。

公约未来发展的影响

自1980年第一次BWC审议大会以来，所有最终文件和MSP报告均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虽然值得称道，但代价也是不小。多数情况下，达成共识并非达成真正实质性妥协，而是通过挖空心思、晦涩难懂的外交表述来掩盖悬而未决的分歧。共识不断增多带来的却是文件边缘化，对现实世界影响甚微。通常，协商一致的措词只是在过往的最终文件基础上反复使用。

为了达成共识，往往需要耗费大量会议时间，而这些时间原本可以更好地用于讨论科学和技术进步，或者是合规性评估和建立互信。共识带来的是其他领域的政治博弈，焦点从条约核心宗旨游移开去。在许多方面，共识已不再是鼓励创造性妥协的工具，而成为苛求一致意见的工具，通常的结果是寻求虚无缥缈的公司，这也扣合了2018年MSP报告。

有人认为，BWC进程还是呈现出一种螺旋式的推进，而并非陷入停滞。[31]然而，MSP报告中的MX审议工作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性成果，现在已经从缓慢推进退化到几近停滞。如果说BWC志在全球防止滥用生化武器对话中保持其主导地位，

今天这样的状态似乎难言乐观。对于处理分歧，一个微小却意义重大的对策就是编写不同类型的报告，突出各类协商一致意见和建议，但也明确未达成一致的各类观点。这在 BWC 并非不能实现，但是需要强力的领导。日渐老套的工作方式是 BWC 面临的更大挑战。一个全局性的办法，是降低对大会的期望值。志同道合的国家，或是国家、民间团体和其他行为方之间的伙伴关系，可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推进，采取各类手段推进实现 BWC 公约宗旨，但无需拘泥于 BWC 框架，可以主动采取各类活动。这也并非是一个新思路：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兜兜转转。[32] 最近，这被描述为一种“创新”手段。并非一个单一的国际反生物武器机制，而是一个结构松散、彼此联系的机制组合，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国家集团，并没有一个统一，全面或明确的层次。[33] 正如 BWC 领域一位专家杰兹-小伍德指出的那样，可以说，这个松散的机制是 BWC 的客观现实，但公约缔约国已经无法继续推进这一模式，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很多国家都拒绝放弃传统形式的军备控制。[34]

尽管一些国家极力反对一种更为松散的机制，但也有不少国家积极鼓励这一做法，还有一些国家似乎持开放态度。在国家、民间团体和其他行为者之间增加互动和对话，构建新的网络和关联、加强协调和更为灵活的机制都是可以发力的方向。

2018 年研讨会

2018 年 BWC 相关讲习班数量之多，实为罕见。这也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或是缔约国集团、民间组织和其他行为者正在发起各类倡议、纷纷出资举办各类研讨会，各方对加强禁止生物武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ISU 和联合国裁军事务厅(UNODA)在欧盟的资助下，举办了 4 场推广讲习班，以提升条约的参与面。此外，ISU/UNODA 还共同出资举办了 4 场类似的讲习班，旨在改进国家执行力度，还有 2 场关于生物材料转让管制的讲习班。今年 6 月，中国主办了一场国际专家研讨会，题为“构建生物安全共同未来的全球社区：制定生物科学家行为准则”。ISU 组织了两场 BWC 第十条之下的合作与援助讲习班，由挪威资助。

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对 BWC 影响举办了几场讲习班。欧盟出资，ISU 和 UNDOA 举行了几场讲习班。学院间伙伴关系、美国国家科学院、克罗地亚科学和艺术学院以及克罗地亚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学会在克罗地亚组织了一场关于“生命科学

两用研究治理”国际专家讲习班。会议报告在 2018 年 MSP 上发布。[35]瑞士主办了关于化学和生物科学重大进展的第三届 Spiez 研讨会(两年一次)。[36]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在日内瓦主办了一场关于 BWC 重大科学进展的全球论坛。

蓄意使用生物武器相应应对和准备，举办了几场讲习班。由加拿大出资，ISU 和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GCSP)共同举办的讲习班，针对国际生物应急管理。在日本资助下，ISU 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举办了一场关于疾病监测和预警机制重要性的讲习班。瑞士主办第 4 届联合国秘书长机制(UNSGM)指定实验室网络讲习班。为进一步支持 UNSGM 指定实验室网络，丹麦和瑞典主办了干实验室计算机模拟演习。在其全球生物政策和方案下，NTI 生物安全部在英国主办了一场“全球生物安全对话”活动。NTI | bio 还介绍了其生物安全创新和降低风险倡议，并在威尔顿公园与牛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和未来人类研究所共同主办了一次关于“强有力行动者、高影响的生物威胁”国际专家会议。

2018 年大事件

除 BWC 资金上捉襟见肘，MX 未向 2018MSP 提交报告以外，2018 年还出现影响生物裁军和不扩散的两大事态发展。

首先是俄罗斯一系列越来越具对抗性的声明，声称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正在邻国运作。俄罗斯剑指乔治亚州理查德·卢格公共卫生研究中心（卢格中心）。[37]虽然此类报道在媒体早已流传多年，但是在英国认定俄罗斯是 2018 年 3 月索尔兹伯里暗杀未遂事件的幕后黑手之手，利用神经毒剂进行刺杀。这一说法更是甚嚣尘上（见第二节）。[38]俄罗斯的这些指控于 2018 年 9 月底进入多边领域，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向 BWC 缔约国分发普通照会进行交流。[39]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代表还通过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发言和答辩权进行了对抗性外交交流。[40] 11 月，应格鲁吉亚邀请，22 名各国代表和专家对卢格中心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透明访问。俄罗斯受到邀请，但并未参加。最后的结论是，“该设施显示出其活动高度的透明度”，并“没有发现任何与预防、保护和其他和平目的不符的情况”。[41]由一名民间组织参与者出具独立报告并加以补充，通过工作文件形式提交至 2018 BWC MSP。[42]透明度访问也在 12 月的 2018 MSP 一次侧会活动上进行了介绍和讨论。[43]

2018 年第二个重大事件是发起了联合国秘书长裁军倡议，“确保我们的共同

未来：裁军议程”。[44]在生物领域，重点是加强 BWC，构建专业机构能力，调查生物武器指控，以及在发生生物攻击的情况下，协调国际应对。[45]这一着力点也和生物裁军界日益重视生物武器风险以及相应的应对准备不谋而合。

1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摘要及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2 BWC，“普及活动报告”，BWC/MSP/2018/3/Rev.1，2018 年 12 月 1 日，第 1 段。
3 BWC，“缔约国会议报告”，BWC/MSP/MSP/2017/6, 2017 年 12 月 19 日，第 19 段。
4 背景文件、所有工作文件、技术简报、活动详情和非政府组织联合立场文件，见 BWC，“2018 年专家会议(2018 年 8 月 7 日至 16 日)”、会议和文件。
5 BWC,“2018年合作与援助专家会议报告,特别侧重于加强第10条下的合作与援助”,BWC/MSP/2018/MX.1/3, 2018 年 11 月 7 日，第 17-23 段。
6 BWC，“合作与援助专家会议，特别注重加强第 10 条下的合作与援助：对可能结果的思考和建议”，BWC/MSP/2018/CRP.2，2018 年 12 月 4 日，第 12 段。
7 BWC，“2018 年与公约相关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发展审查专家会议报告”，BWC/MSP/2018/MX.1/3，2018 年 11 月 12 日，第 17-21 段。
8 BWC，“公约相关科学和技术领域发展审查专家会议：对可能结果的思考和建议”，BWC/MSP/2018/CRP.3，2018 年 12 月 4 日，第 4 段。
9BWC, BWC/MSP/2018/CRP.3 (注 8)，第 7 段。
10 BWC，“建立信任措施”。
11 BWC，“2018 年加强国家执行工作专家会议报告”，BWC/MSP/2018/MX.3/3，2018 年 10 月 18 日，第 16-20 段。
12BWC，“加强国家执行工作专家会议：对可能结果的思考和建议”，BWC/MSP/2018/CRP.4，2018 年 12 月 4

日，第 1、2 和 3 节。
13BWC，“2018 年援助、反应和准备专家会议报告”，BWC/ MSP/2018/MX.4/3，2018 年 11 月 12 日 4 月 3 日，第 16-21 段。
14BWC，“援助、应对和准备专家会议:对可能结果的思考和建议”，BWC/MSP/2018/CRP.5，2016 年 12 月 4 日,第 3 段。
15 BWC，BWC/MSP/2018/CRP.5(注 14)，第 5 段。
16 BWC，“援助、应对和准备专家会议:对可能结果的思考和建议”，BWC/MSP/2018/CRP.6，2018 年 12 月 4 日，第 5 段。
17BWC, BWC/MSP/2018/CRP.6 (注 16)，第 8 段。
18BWC, BWC/MSP/2018/CRP.6(注 16)，第 9 段。
19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A/C.1/73/L.9，2018 年 10 月 18 日。
20 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向联大提交 8 份草案，其中就包括旨在查明并追究使用化武肇事者责任的草案”，新闻发布，GA/DIS/3617，2018 年 12 月 5 日。
21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维护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权威的措施”，A/C.1/73/L.17，2018 年 10 月 10 日;联合国(注 20)。
22BWC，BWC/MSP/2018/3/Rev.1(注 2)。
23 BWC，“关于缔约国商定会议和援助项目的财务可预测性和可持续性相关资料文件”，BWC/MSP/2018/5，2018 年 12 月 5 日。
24 BWC，“援助项目年度报告”，BWC/MSP/2018/4, 2018 年 12 月 8 日。
25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缔约国会议。
26 这 9 项事项由生物安全公司和英国联合主办;德国(2 项事项);俄罗斯;欧盟;汉堡大学;国际科学院合作组织、美国国家科学院、克罗地亚科学和艺术学院以及克罗地亚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学会;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以及联合国反恐中心(UNOCT)、UNICRI 和 INTERPOL。
27BWC，“2018 年缔约国会议报告”，BWC/MSP/2018/6(预印本)。
28 BWC, BWC/MSP/2018/6(注 27)，第 26 段。
29 格思里・R，“2018 年缔约国会议:结论与思考”，MSP 报告 No.5，BWC 会议每日纪要、生物武器预防项目。
30 格思里(注 29)。
31 西姆斯・N・A 和利特尔伍德・J，“雄心勃勃的渐进主义:在没有核查议定书的情况下加强 BWC 执行”，不扩散审查，第 18 卷第 3 期(2011 年 11 月)，第 499-511 页。
32 利特尔伍德・J，生物武器公约:一场失败的革命(阿什盖特：法恩汉姆, 2005);米勒特・P，“生物武器公约:二十一世纪生物武器安全”,《冲突与安全法杂志》，第 15 卷第 1 期(2010)，第 25-43 页;伦南・R,“分裂与代表:BWC 的未来”，国际法与政策研究所，BWC 审议大会系列文件 No.1，2016 年 11 月;科布伦茨・G 和伦茨・F，“风险、权衡与责任科学”，国际法与政策研究所，BWC 审议大会系列论文 No.3，2016 年 11 月。
33 利特尔伍德・J，“对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的影响”，M・克劳利，防止化学武器:武器控制与裁军的科学融合(皇家化学学会:伦敦，2018)。
34 利特尔伍德(注 33)，第 507 页。
35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生命科学中双重用途研究的治理:促进研究监管的全球共识(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华盛顿，2018)。
36 瑞士国家实验室-Spiez 实验室，“Spiez 融合:关于第三次研讨会的报告，2018 年 9 月 11 日至 14 日”，Spiez 实验室，2018 年 11 月。
37 伦茨・F，“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攻击造成了生物危险”，《原子科学家公报》，2018 年 11 月 19 日。
38 伦茨(注 37)。
39 伦茨(注 37)。
40 伦茨(注 37)。
41BWC,“通过透明度构建自信:同行评审透明度视察位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的理查德・卢格公共卫生研究中心的国家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中心”，格鲁吉亚和德国,联合了奥地利、比利时、哥伦比亚、伊拉克、匈牙利、马来西亚、马里、英国和美国提交工作文件,BWC/MSP/ 2018/WP.5，2018 年 12 月 3 日，第 14 段。
42BWC, BWC/CDM/2018/WP.5(注 41);BWC，“透明度视察格鲁吉亚卢格中心:独立报道”，格鲁吉亚提交工作论文, BWC/MSP/2018/WP.11，2018 年 12 月 7 日。
43 BWC, BWC/MSP/2018/WP.11(注 42)，第 66 - 67 段。
44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 (UNODA)，确保我们共同的未来:裁军议程(裁军事务厅:纽约，2018)。
45UNODA(注 44)，“确保尊重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准则”，第二部分，“裁军以拯救人类”。关于议程中与核武器相关部分，见本卷第 7 章第 5 节;关于议程中常规军控，见本卷第 9 章第 2 节。

第九章.全球常规军备控制机制

概述

各国常规军控广泛采取的两种防范：限制和（或）禁止武器，包括被视为不人道或滥杀滥伤的武器；或管控武器生产和贸易以防止其破坏稳定性的激增、转移和/或滥用。本章回顾了 2018 年全球 4 大常规武器生产、贸易和使用管控机制的进展和谈判推进。2013 年武器贸易条约（ATT）及另一项核心机制，将在第 10 章进行论述。

第 1 节聚焦 1981 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CCW 公约)，重点是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与 2017 年一样，LAW 相关讨论以政府专家组形式继续推进，重点聚焦：

（a） LAW 特征；（b）武力使用中人的因素以及人机交互的各个方面；（c）审议相关技术潜在军事应用；（d）新兴 LAW 技术潜在人道主义和国际安全挑战的应对选择。不作出实质性决定，前进的道路就很难达成一致，但可喜的是各国同意将政府专家小组任期延长至 2019 年。同样，在 CCW 讨论中，国际社会对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燃烧性武器和爆炸性武器(EWIPA)的关切之声日益高涨，如火如荼，却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第 2 节探讨 1997 年《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APM 公约）和 2008 年《集束弹药公约》最近执行情况。全球范围内，2017 年 APM 伤亡人数连续第三年居高不下，核心原因就是阿富汗和叙利亚武装冲突。此外，2018 年也是连续第二年因简易地雷伤亡人数高企。2018 年，毛里塔尼亚完成地雷清除工作，但仍有 56 个国家和 4 个其他地区受到地雷污染。冈比亚、纳米比亚和斯里兰卡于 2018 年成为 CCM 缔约国，CCM 缔约国总数达到 105 个。2018 年叙利亚继续使用集束弹药。

第 3 节论述了 2001 年联合国从各层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行动纲领（UN POA）。2018 年 6 月，UNPOA 第三次审议大会集中讨论了 3 个问题：同某些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关联；是否将弹药纳入 UNPOA 管控范围；向非国家行为者转让武器实施管控。就 SDG 和弹药而言，成果文件均先前文件为蓝本，同时增加 UNPOA 范围相关措辞。然而，由于以前的分歧并未解决，尚

无法在向非国家行为者转让武器方面做出新的表述。

2018 年 5 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启动一项新的裁军议程，以确保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 3 大优先事项：（a）通过削减和消除生物、化学和核武器，实现裁军以拯救人类；（b）通过裁军拯救生命，降低常规武器影响；以及

（c） 应对新军事技术发展，为造福子孙后代而裁军（见第 4 节）。

2005-2018 年间，共发生 250 余起由国家发起的网络攻击事件。联合国就网络安全问题的国际讨论走过了 20 载，即便如此，各国在网络安全威胁的性质和应对措施上依旧是难言共识（见第 5 节）。尤其俄美在信息通信技术（ICT）使用及管理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做法。俄罗斯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国际信息安全体系，不扩散机制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则明确表示，任何新 LAW 机制的讨论美方均不接受，但愿意就负责任国家行为的自愿及不具约束力准则展开讨论。双方的核心分歧还是在使用武力和武装攻击门槛，以及国际法适用性和充分性问题。

现在各国在两种立场上出现泾渭分明的现象。第一阵营将 ICT 的扩散视为一种积极趋势，并且认为现有的国际法足以指导网络空间中的国家行为。这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立场。而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一些国家则认为，数字化是一种威胁，并希望能够在 ICT 方面制定新的规范性指导。不同观点的碰撞阻碍了国际社会达成共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些区域性组织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家和公司也正在积极采取重大应对举措。

伊恩·戴维斯

第 1 节.特定常规武器和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公约

文森特·布拉宁、伊恩·戴维斯和马艾克·韦布鲁根

1981 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CCW 公约）及其 5 项议定书禁止或限制使用被认为会对战斗人员或不加区别地戕害平民的武器。[1]这是一项所谓总括性条约，可以议定书形式并入具体协议（见方框图 9.1）。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原公约及其议定书共有 125 个缔约国。2018 年无新国家加入 CCW。并非所有缔约国都批准了所有修订或附加议定书。[2]

CCW 公约对于应对新型武器及其系统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挑战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常规军控的诸多辩论均基于“人道主义裁军”理念，该理念优先考虑的是对民众人身安全的保护、民众的安全和福祉，而非国家。特别强调通过减少武器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来加强对平民的保护。[3]然而，近年来在人道主义需求的优先次序与某些国家认为的军事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其结果就是，条约框架下的很多讨论都陷入僵局。[4]

缔约国大会

CCW 缔约国每年举行年度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审议大会。会议同时会对政府专家组工作(2001 年成立)举行审议，专家组自 2001 年起以各种形式召开各类会议。修订后的 2 号议定书和 5 号议定书都有各自执行进程，并与 CCW 公约执行同步推进。表 9.1 列对 2018 年所有会议举行了汇总。

方框图 9.1. 1981 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最初包含 3 项议定书：禁止使用 X 射线在人体内无法定位碎片的武器（第 1 议定书）；地雷、诱杀装置和类似装置使用的管控（第 2 议定书）；限制使用燃烧武器（第 3 议定书）。随后几年，各国同意增加两项议定书：1996 年增补禁止使用和转让致盲激光武器的第 4 号议定书；2003 年增补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ERW)的第 5 号议定书——地雷、未爆弹药和废弃爆炸物。此外，修订扩大公约范围并强化了执行力度。如修订后的第 2 号议定书对杀伤人员地雷作出进一步的使用限制，而 2001 年将 CCW 范围扩充至国内武装冲突范畴。修订后的第 2 号议定书并未禁止地雷使用，CCW 公约的平

行进程则推出了《杀伤人员地雷公约》(APM)（见第 2 节）。

第 5 议定书缔约国第 12 届年会对 2018 年 6 月专家会议报告进行了讨论，重点讨论国家报告、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ERW)、受害者援助和切实执行第 5 议定书第 4 条款中关于信息记录、留存和传递之规定。[5] 年会并未提出新议程，会议同意 2019 年的工作重心依旧是上述议题。[6]

修订后的 2 号议定书缔约国第 20 届年会，对议定书现状和实施情况进行了审议，并对缔约国国家年度报告中的各类问题交换了意见。[7] 会议同时呼吁推广议定书，并对专家组简易爆炸装置(IED)报告进行了讨论。[8] 尽管 IED 威胁日益突出（见下文第 2 节 APM 讨论以及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讨论），但专家组会议和第 20 届年会均未达成任何新举措。相反，会议重点依旧停留在身份查验、人道主义通关以及平民免受 IED 伤害等问题上国家对策和最佳方案的自愿交流。

表 9.1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WC)大会

日期	会议
4 月 9 日-13 日	LAWS 政府专家会议
6 月 11 日-12 日	IED 第二议定书修正案专家会议
6 月 12 日-13 日	第五议定书专家会议
8 月 27 日-31 日	LAWS 政府专家会议
11 月 19 日	第五议定书缔约方第 12 届年会
11 月 20 日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方第二十届年度会议
11 月 21 日-23 日	缔约方会议

CWC=特定常规武器；IED=简易爆炸装置；LAWS=致命自主武器
注：所有会议均在日内瓦举行

2018 年缔约国大会由拉脱维亚支持。会议审查了 CCW 公约履约情况和全球推广进展。大会要求政府专家组在 2019 年举行为期 7 天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会议（在俄罗斯的坚持下由 10 天减为 7 天），由北马其顿担任主席国（见下文）。同 2017 年一样，缔约国大会还同意将“与公约目标宗旨相关新问题”列入下次大会议程，公开邀请缔约国提交武器科学技术发展相关工作文件。[9] 尽管 2018 年并未有任何会议因资金问题取消(2017 年就有先例)，但 CCW 长期捉襟见肘早已成为会议讨论的核心议题。即便如此，大会主席提出设立应急基金或自愿储备金的提议却被缔约国驳回。[10]

近年来 4 大实质性议程一直是：

（a） LAW；（b）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EWIPA)；（c）燃烧性武器；（d）杀伤人员地雷以外的地雷种类(MOTAPM)。由于难以达成共识，进展甚微。下文会有进一步详细论述。[11]

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政府专家组

2018 年，人工智能和武器系统自主性的挑战依旧是 CCW 公约框架下政府间讨论的重点。[12]LAW 领域新技术专家讨论如火如荼。2017 年，讨论从非正式专家会议转向正式的 GGE，这也是一大转折。[13] 2018 年 GGE 会议时长达到 2017 年或是以前形式会议的 2 倍有余。会议共持续 10 天，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9 日至 13 日和 4 月 27 日至 31 日举行。两次会议都呈现出很高规格—14 个国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和不结盟运动（NAM）共提交 14 份工作文件。[14]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其中报告来自媒体、研究机构、智库和大学，以及以个人身份参会的私营部门工程技术人员代表。[15]

和 2017 年一样，2018 年 GGE 由印度驻裁军谈判会议大使阿曼迪普 •辛格 •吉尔主持。为加深前期讨论，主席提出一项与 2017 年大会类似的工作议程。4 大实质性领域为：（a）审议系统特征；（b）武力使用中人为因素，以及在开发、部署和使用 LAW 领域新技术及人机交互；（c）在工作组工作范围内对相关潜在军事应用进行审议；和（d）LAW 领域新技术对人道主义和国际安全威胁的可能应对之道。[16]

所考虑系统特征

为避免辩论陷入前几次大会一样的定义之争，主席努力界定出各国对 LAW 关键特征的共同点：[17]

（a） 分离性手段，即搁置无核心特征并集中核心特征；（b）累积性手段，即综合考量技术、人道主义和政治安全标准，以评估其与公约相关性；（c）问责手段，依据武器自动识别判定类型和功能特征；和（d）目的效果导向手段，侧重于系统正向和负向结果。[18]尽管主席一心向前，一众缔约国却仍未能就达成一致意见，讨论兜兜转转又回到前几年的轨道。各国对自主概念的界定和是否需要为讨论设置先决条件表现出南辕北辙的态度。虽然多数国家都认为，人为参与程度是界定 LAW 特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就能达成一致。

致命性武器使用中的人为因素

人为参与度问题，主席首先提交了一份图表，对先前讨论和工作文件（见图 9.1）进行了总结。[19]“日出图”显示，研制和使用具备自主功能武器时，人为控制可应用于 4 个不同时点：研发期间（第 1 点）；部署前，通过测试、评估和认证时（第 2 点）；部署阶段，激活时（第 3 点）；武器系统运行期间（第 4 点）。[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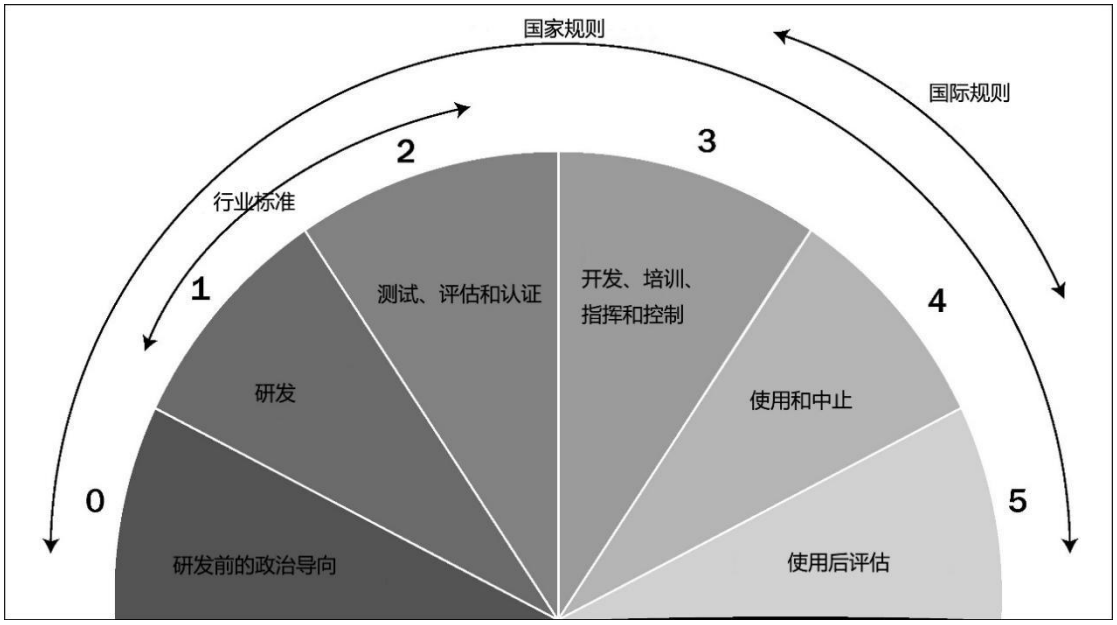


图 9.1　“日升图”：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兴技术背景下人机接触点概念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政府专家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兴技术政府专家组 2018 年会议报告》，CCW/GGE.1/2018/3，2018 年 10 月 23 日，第 14 页。

在讨论中，一些国家认为，还可增加两个要点：研发立项前阶段（第 0 点），在政治层面确定技术要求；部署后，使用后评估时（第 5 点）。[21] 虽然缔约国之间似乎达成了明确共识，即无论是出于法律、道德或军事行动原因，人类都应保持对其使用武器系统的控制，但各国在人为控制类型和程度达成一致。各国还在努力界定在实践中，究竟哪些人为介入是“有意义的”。最后，对于是否应该将人为控制要求转化为国际法新规则或现有国际法规则已能提供足够约束，各国存在分歧。

相关技术潜在的军事应用

审议的目的是帮助提高军事技术发展透明度，并确保 GGE 时刻保持前沿技术的敏感度。来自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专家作了介绍。

人道主义和国际安全挑战的应对之道

第 4 大议程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议程就是，各国心中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安全挑战的应对之道。

主席提出对讨论至今各国提出的各项政策选择的利弊展开讨论。

第一，一项具有约束力的 LAW 管控机制，如 ICRC 提出的开展制止杀手机器人战役，始终担当保持有意义人为控制的积极义务，禁止研究和使用 LAW。[22] 目前，已有 28 个国家明确表示支持立法形式禁止 LAW。[23] 2018 年，奥地利成为第一个支持禁止 LAW 的西欧国家，而安理会五常中只有中国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支持禁止 LAW 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建议是禁止使用 LAW，而非开发和生产。[24] NAM 赞成制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管控机制，对 LAW 实施禁止和管控。[25]

第二，法国和德国提出政治宣言，并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响应。这就有利于就人为控制和问责方面推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宣言。法国和德国人为，政治宣言将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表明各国可以找到一些共识，并能给予更多时间就 CCW 公约进行深入探讨。法德两国认为，他们的提议不失为 LAW 约束机制反对者和支持者都能接受的折衷方案。

第三，加强日内瓦现行公约的实际应用，如新武器 LAW 审查领域的最佳操作和信息共享，以及公约第 36 条第 I 款对战争手段和方法的要求。

最后，还有一种选择是什么也不做；也就是说，当前形势本就是基于 IHL 已完全适用于 LAW 这一考虑。[26] 澳大利亚、以色列、韩国、俄罗斯和美国表示倾向于这一选择，认为对 LAW 采取任何具体行动都“为时尚早”。[27]

大会从政府间讨论中能得到的结论便是，尽管各国没明确表示上述选择必然互相排斥，但是各国也无法形成明确共识。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一些在 2018 年或是更早表示支持禁止 LAW 的国家，尤其是奥地利、智利、古巴和巴西，呼吁在 2019 年加强政府专家组授权。[28] 这些国家认为，如果说 CCW 想要避免被突飞猛进的 LAW 技术所赶超，现在到了开始正式谈判的时候了。然而，

俄罗斯和美国不愿意在 GGE 就工作定义和共识达成之前，展开正式谈判。还有一些国家持观望态度，希望在正式谈判之前，更为深入的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议。各国最终同意 GGE 执行现有授权任务，但是 2019 年大会只定为 7 天，而不是像 2018 年一样的 10 天（见下文）。

可能的指导性原则

讨论之后，主席提出一份 GGE 报告草稿，将各国似乎同意或是认为的重要议题一一罗列。

这些“新共识、新结论和新建议”就可能包含着“可能的指导性原则”。[29] 这份报告称为后面两天紧张谈判的焦点，讨论直至深夜。争议主要集中在：是否应将 LAW 及相关问题称为“潜在问题”、文件语言应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规定性、LAW 工作前进方向、人权与 LAW 审议、定义和术语的相关性以及各缔约方是否应就 LAW“益处”展开辩论。[30] 各国最终同意对文件进行修改，篇幅大幅瘦身，语言也相应做出调整，各方国家都能接受。[31] 报告内容涉及同意主席在 2018 年 2018 年 11 月的缔约国大会公布 10 项原则。其中包括（a）承认 IHHL 继续适用于所有武器系统，包括 LAW；（b）必须保留对使用武力作出决定的人的责任，机器并不担责；（c）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其研制或获得的武器可符合国际法准则要求，并纳入安全保障措施，以限制网络攻击或恐怖主义集团滥用的风险。

CCW 缔约国大会在 11 月举行，大会核准了 GGE 报告并同意其授权展期建议。然而，2019 年 GGE 期限再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一些国家主张 20 天，以便更快取得进展，一些国家则强调参会代表团面临的财政困难。尽管 GGE 建议进行 10 天的审议，但在俄罗斯为首的一些国家的干扰下，11 月会议 7 天就落下大幕。2019 年，GGE 将由北马其顿吉万·戈尔金斯克担任主席。

其他主要讨论：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燃烧性武器和非杀伤人员地雷

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

过去 20 年，暴力越来越向城市集中。[32] 爆炸性武器，特别是使用大杀伤半径爆炸性武器、低精度发射系统或在大范围内投射多弹头，其最终伤亡 90%以上来自平民而非战斗人员。[33]

根据武装暴力行动（AOAV）数据，2018 年共有 9615 名平民死亡和 12720 人

受伤与爆炸性武器有关，较 2017 年减少约三分之一，2017 年共造成 16289 名平民死亡，15615 人受伤。2018 年，爆炸性武器造成的平民伤亡中，IED 占 42%，空袭 32%，地面武器 15%，多种爆炸性武器混用 9%。[34]AOAV 全球平民伤亡总体下降，主要是因为伊拉克和叙利亚 IS 的节节败退，同时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也被击溃。叙利亚爆炸性武器造成的平民伤亡下降 40%以上，从 2017 年的 8767 人下降到 2018 年的 5061 人，但叙利亚仍是受此类武器影响最大的国家。许多伤亡是由于 2 月和 3 月叙利亚和俄罗斯部队对东古塔进行大规模轰炸。索马里、巴基斯坦（下降 48%）和伊拉克（下降 77%）爆炸性暴力平民伤亡也大幅减少。[35]

全球趋势之外，阿富汗是一个另类。爆炸性武器平民伤亡数量急剧飙升，从 2017 年的 1092 名平民死亡增加到 2018 年的 1488 名，AOAV 主要归因于非国家行为者生产的 IED（占所有平民伤亡 76%）或空袭，尤其是美军空袭。[36]也门（从 2017 年 1670 名平民伤亡增至 2018 年 1807 名）、印度(从 2017 年 267 名增至 2018 年 322 名）和利比亚（从 2017 年 163 名增至 2108 年 392 名). 2018 年为 392)。埃塞俄比亚、伊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加沙也都出现上升。[37]

EWIPA 带来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历任联合国秘书长、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发声，呼吁采取措施更好的保护平民，远离此类伤害。[38] 2018 年 5 月启动的联合国秘书长三大裁军新议程（见第 4 节），其中一个就是“拯救生命的裁军”。其中包括“通过联合国会员国的共同努力”，制定一项政治宣言以及符合 IHL 的适当限制、共同标准和行动政策，以“控制”使用危害巨大的 EWIPA”。[39] 2018 年 5 月 22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安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公开辩论中，至少有 12 个国家和联合国秘书长一道表达了使用 EWIPA 对平民造成严重危害的关切，与此同时，爱尔兰、哥斯达黎加和奥地利等国则表示支持就这一问题制定一项国际政治机制。[40]

2018 年 10 月，在联合国大会裁军和国际安全第一委员会会议上，50 多个国家就爱尔兰提出的这一问题发表联合声明。[41]声明呼吁努力扭转 EWIPA 对平民的极端伤害的趋势，并呼吁加强对 IHL 的尊重和遵守。大会最后做出承诺，努力达成政治宣言并大力支持包括地区会议通过的各类相关倡议，继续努力解决 EWIPA 的人道主义伤害。2018 年，民间组织--爆炸性武器国际网络(INEW)也在第一委员会发表声明。呼吁各国“承诺在制定诸如国际政治宣言的新国际标准时，禁止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具有极大杀伤力的 EWIPA”。[42]2017 年 11 月，第一届 EWIPA

区域会议在马普托举行，第二届大会将于 2018 年 12 月在圣地亚哥举行。[43]

一些国家试图将 EWIPA 置于 CCW 公约框架之下。2018 年 CCW 缔约国大会，约 30 个代表团就此议题展开讨论，德国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2018 年 6 月和 9 月，日内瓦举行了两次由德国牵头的研讨会，主题定为“EWIPA 会谈”。奥地利牵头的政治宣言制定工作，以上这些工作都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裁军议程的认可，很多国家也对此类多边努力表示欢迎。[44] 尽管绝大多数代表团都表达了对 EWIPA 的关切，但在未形成共识的前提下，会议报告未能授权任何实质性举措。

事实上，如中国、以色列和英国等一些国家，对 EWIPA 概念本身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一概念过于宽泛或含糊不清，俄罗斯则声称 CCW 公约及其议定书已涉及这一概念。[45] 有鉴于此，会议报告只是表明，一些缔约国表示打算提交工作文件，说明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某些常规武器所带来的挑战及其对平民的影响，尤其是在平民聚集区。[46] 这一议题的未来尚不明朗：一些国家可能倾向于继续在公约框架下进行讨论，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可能会着力于 CCW 公约外另起炉灶，制定一项国际政治宣言。

燃烧武器

CCW 第 3 议定书禁止某些燃烧武器的使用，但是这一限制措施并未能阻止叙利亚、乌克兰和也门等地使用这种武器对平民造成伤害。第 3 议定书存在两大漏洞：与空投模式相比，对地面发射的燃烧性武器管制较弱；对多用途弹药(如白磷)描述不够细致，白磷可在战场上用作遮蔽物或烟幕，可用作信号和标记，同时也可作为一种燃烧武器。[47]

2018 年，人权观察共记录下叙利亚 30 起燃烧性武器袭击事件（较 2017 年 22 起有所增加）。例如，据报道 2018 年 3 月 16 日，在东古塔 Kafr Batna 镇空投燃烧性炸弹，造成至少 61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48] 叙利亚不是第 3 议定书缔约国，因此不受条约限制制约。自 2012 年以来，叙利亚一直在使用俄制或苏联时代燃烧性武器。

一些国家，连同 ICRC、联合国秘书长和众多 NGO，都对最近的燃烧性武器袭击事件表示谴责，并呼吁重新审议并加强第 3 议定书执行力度。[49] 在联大第一委员会 2018 年会议上，人权观察发表声明，敦促世界各国政府制定更强有力的国际法约束燃烧性武器，同时 CCW 缔约国应“在 2019 年留出时间对 3 号议定书执

行情况和充分性进行审议，最好是组织一次非正式专家会议”。[50]尽管自 1980 年第一次作为大会议程，2016 年第 5 次审议大会和 2017 年缔约方会议却都几乎毫无进展，缔约国第一次决定将这一问题作为 2018 年大会单独议程。

2018 年大会上，一些国家再次对最近的燃烧性武器使用事件表示谴责，并呼吁今后会议分配更多时间，讨论如何促进对平民的保护。然而，俄罗斯反对继续保留此议题，中国和古巴也表示反对。[51]因此，最终报告虽然反映出对燃烧性武器的持续关切，但并未作为 2019 年会议单独议程列入大会安排。[52]

非杀伤人员地雷

非杀伤人员地雷(MOTAPM)讨论的重点是反车辆地雷(AVM),其中包括反坦克地雷。这一议题在 CCM 框架下已经讨论了十余年，但是各缔约国之间依旧没能就如何推动辩论达成任何共识。然而，2017 年缔约国大会商定，2018 年主席将主持一次非正式公开协商，讨论如何最好解决 MOTAPM 问题上的若干分歧，如人道主义危害、对发展的冲击、军事用途以及如何在保留军事功能的同时解决人道主义关切。为此，2018 年 6 月 14 日和 10 月 2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两次非正式公开协商会议。[53]然而，会议并未能弥合分歧，主席报告建议 2019 年继续进行非正式协商。[54] 2018 年 MHCP 报告指出，“分歧依旧”。[55]

1《公约》摘要见本卷附件 a 第一节。

2 关于哪些缔约国批准了经修正的议定书或附加议定书的详情，见本卷附件 A 第一节。
3 联合国、大会、裁军和国际安全第一委员会，“民间组织关于人道主义裁军的声明”，2018 年 10 月 17 日；NOG 组织网站，“人道主义裁军”。
4 见关于人道主义裁军的讨论和 2016 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审议大会，“人道主义军控机制：2016 年大事件”，SIPRI 年鉴 2017：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2017)，543-79 页;2017 年大事件，戴维斯·I 和费尔布鲁根·M，《某些常规武器公约》，SIPRI 年鉴 2018，第 381-92 页。
5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之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号议定书缔约国第 12 次会议,2018 年 11 月 19 日，“第 5 议定书缔约方 2018 年专家会议报告”，CCW/P.V/CONF/2018/4，2018 年 11 月 16 日。
6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之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号议定书缔约国第 12 次会议，2018 年 11 月 19 日，“最终文件”，CCW/P.V/CONF/2018/5，2018 年 11 月 29 日。
7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二修正议定书缔约国第 20 次年会，“最终文件”，2018 年 10 月 30 日。
8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二修正议定书缔约国第 20 次年会，“简易爆炸装置报告”，2018 年 10 月 30 日。见戴维斯和费尔布鲁根(注 4)中关于简易爆炸装置的论述，第 387-88 页。
9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日内瓦，“最终报告”，CCW/MSP/2018/11,2018 年 12 月 28 日。
10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日内瓦,2018 年 11 月 21-23 日，关于可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改善秘书处对公约支持的稳定性以及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相关财务问题的报告，CCW/MSP/2018/7，2018 年 11 月 9 日。
11 盖尔·K，“再次滥用共识”，CCW 报告，第 6 卷，第 12 期(Reaching Critical Will 网站，2018 年 11 月 26 日)。
12 对 LAWS 并无一致的国际定义，但民间组织通常将其称为能够在无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自主选择并对目标发起攻击的武器。见布拉宁·V 和费尔布鲁根·M，自主武器系统进化图(SIPRI:斯德哥尔摩，2019)。
13 戴维斯和维布鲁根(注 4)。
14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UNOG)，“2018 年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政府专家小组”。
15 制止杀人机器人运动，“技术工人的崛起”，2019 年 1 月。
16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政府专家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兴技术政府专家组 2018 年会议报告”，CCW/GGE.1/2018/3，2018 年 10 月 23 日。
17 LAWS 法律定义辩论见布拉宁·V，“在 CCW 框架下绘制 LAWS 辩论发展地图:现状评估并大步向前”，欧盟防扩散文件 No.49(2016 年 3 月)。
18 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政府专家小组主席议程总结；议程议项 6(a)，2018 年 4 月 9 日和 10 日；议程议项 6(b)，2018 年 4 月 11 日和 12 日；议程议项 6(c)，2018 年 4 月 12 日；议程议项 6(d)，2018 年 4 月 13 日。
19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注 18)。
20 政府专家组(注 16)。
21 对于相互矛盾的定义的编撰，见辛格·吉尔·A，“图 2:在使用致命武力时考虑到人的因素;致命自主武器系统领域新技术开发、部署和使用中的人机交互研究;辛格·吉尔·A，“议程议项 6b”，2018 年 4 月。
22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人类控制的因素，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方会议上提交的工作文件，CCW/MSP/2018/WP.3，2018 年 11 月 20 日。
23 见制止杀人机器运动，“国家对杀人机器的看法”，2018 年 11 月 22 日。
24 中国提案指出 LAWS 具备以下 5 大特点:致命性、完全自主、激活后无法阻止攻击、无法区分攻击条件以及进化能力。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政府专家组，中国提交的立场文件，CCW/GGE.1/2018/WP.7，2018 年 4 月 11 日。
25 政府专家小组(注 16)。
26 政府专家小组(注 16)。
27 艾奇逊·R，“小心螺旋式下降”，CCW 报告，第 6 卷 No.11(Reaching Critical Will 网站，2018 年 9 月)。
28 然而，28 个国家中只有 25 个国家是公约缔约国。埃及、加纳和津巴布韦曾表示支持禁令，但埃及已签署但未批准该公约;加纳和津巴布韦既没有签署也没有批准该公约。缔约方和签署方”，更新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制止杀人机器人运动（注 23）。
29 政府专家小组(注 16)。
30 艾奇逊(注 27)。
31 盖尔·K 和派特拉克·A，“新闻简报”，CWC 报告，Reaching Critical Will 网站，第 6 卷 No.10(2018 年 8 月 31 日)。
32 见 OECD，“趋势 7：城市暴力正在成为新常态”，脆弱国家，2016 年：亮点，2016，第 21-23 页。
33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口密集区使用爆炸武器”，新闻简报，2016 年 6 月 14 日;国际爆炸武器网络(INEW)网站。

34 打击武装暴力行动，“2018:爆炸性暴力之年”，2019 年 1 月 11 日。
35 论叙利亚和伊拉克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索马里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36 武装暴力行动(注 34)。阿富汗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37 武装暴力行动(注 34)。关于加沙、利比亚和也门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关于埃塞俄比亚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38 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注 33);第 36 条，爆炸武器:保护平民免受在人口密集地区免受爆炸武器的伤害。
88 个国家及地区以及 4 个国家在声明中公开承认了 EWIPA 造成的危害，见“政治反应”，INEW 网站。
39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确保我们共同的未来:裁军议程(裁军事务厅:2018 年 5 月，纽约)，第 10 页，第 34-36 页。
40 联合国，“发言者敦促严格遵守全球法律保护，同时安理会陷入代理人战争和其他冲突地区平民保护的讨论之中”，会议报道，SC/13348，2018 年 5 月 22 日。
41 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关于在人口密集区使用爆炸武器的联合声明”，纽约，2018 年 10 月 25 日。
42 布瓦洛·L，“国际爆炸武器网络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届国际安全和裁军委员会上的声明”，纽约，2018 年 10 月 17 日。
43 INEW,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武器区域会议，圣地亚哥，智利，2018 年 12 月 5-6 日。
44 戴维斯和维布鲁根(注 4)，第 391-92 页;联合国(注 39)，第 36 页;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减轻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对平民的伤害”，德国提交工作文件，CCW/MSP/2018/WP.1，2018 年 11 月 14 日。
45 盖尔·K，“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武器”，CWC 报告，第 6 卷 No.12(Reaching Critical Will 网站，2018 年 11 月 26 日)，第 4-5 页。
46 缔约国会议(注 9)。
47 人权观察，“需要对燃烧武器采取行动”，日内瓦，2018 年 11 月 14 日。
48 叙利亚民防，“Kafr_Bata 镇发生各类恐怖屠杀，造成至少 61 名平民死亡，其中就包括凝固汽油弹”，推特，2018 年 3 月 16 日;人权观察组织，“俄罗斯支持叙利亚对东古塔发动非法袭击”，2018 年 3 月 18 日。
49 见戴维斯对燃烧武器的讨论(注 4)，556-57 页;戴维斯和维布鲁根(注 4)，第 388-89 页。
50 人权观察组织，“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第一委员会关于燃烧武器的声明”，史蒂夫·古斯，人权观察，2018 年 10 月 17 日。
51 多切蒂·B，“燃烧武器，受挫而不是投降”，CWC 报告，第 6 卷 No.12(Reaching Critical Will 网站，2018 年 11 月 26 日)，第 5-6 页。
52 缔约国会议(注 9)。
53 卡克林斯·J，拉脱维亚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兼常驻代表，“2018 年 6 月 14 日背景说明和非正式磋商”，2018 年 5 月 7 日;卡克林斯·J，“关于 MOTAPM 的第二次非正式磋商背景说明”，2018 年 9 月 14 日。
54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日内瓦，“非杀伤人员地雷”，主席选举报告,CW/MSP/2018/3, 2018 年 11 月 2 日。
55 缔约国会议(注 9)。

第 2 节.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弹药

伊恩·戴维斯

杀伤人员地雷公约

1997 年《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APM 公约），禁止使用、发展、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此类地雷是在与人接触时引爆，即“受害者激活型”，因此包括作为 APM 的简易爆炸装置（IED）在内，也都被称为“简易地雷”。[1] 2014 年审议大会上，缔约国确定目标--2025 年全面 APM 及解决此前遗留问题。

总体而言，APM 公约执行情况良好。公约核心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尊重，即便出现分歧，也大都得满意处理。但是由于中国、伊朗、以色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 或北朝鲜)、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等一些国家拒绝签字，APM 公约依旧无法发挥最大效力。[2]

目前，有 164 个缔约国加入 APM 公约。其中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国家以及除古巴和美国以外所有美洲国家。只有 33 个国家还未加入条约。[3] 2018 年没有新国家加入。自 1997 年以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全面禁止 APM 和 APM 公约。2018 年，第 73/61 号决议以 169 票赞成（比 2017 年历史最高赞成票还多 2 票）、0 票反对和 16 票弃权获得通过。[4]

2018 年 APM 使用

各国新使用 APM 的情况已极为罕见。据 2018 年《地雷监测报》数据统计，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0 月间，只有缅甸——非条约国——被记录下使用 APM，缅甸在过去 20 年一直部署 APM。[5]联合国国际独立真相调查团 2018 年报告，对上年地雷使用指控进行独立调查，认定有“合理理由”断定缅甸军方在边境地区和若开邦北部埋设地雷，其“预期或可预见效果”是伤害或杀害逃往孟加拉国的罗兴亚平民。此外，作为“有组织、有预谋阻止罗兴亚难民返乡战略”，缅甸在边境地区大量埋设 APM。[6]虽然叙利亚曾有过使用 APM 记录，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ICBL）在最近一个时期并未发现其有新使用 APM 的证据。

非国家武装组织在冲突中使用包括 IED 在内的 APM，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2017年10月至2018年10月期间，至少有8个国家的非国家武装组织使用了APM：阿富汗、哥伦比亚、印度、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泰国和也门。还有未经证实的指控称，在喀麦隆、伊拉克、利比亚、马里、菲律宾、叙利亚、突尼斯和乌克兰等8个国家，非国家武装组织也在使用此类武器。[7]日内瓦呼吁，一个致力于促进武装非国家行为者在武装冲突中尊重国际人道主义准则的非政府组织，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寻求此类组织采取“承诺行动”，为武装组织兑现人道主义准则承诺提供公共平台。迄今为止，已有52个武装组织签订了APM承诺书。有证据表明，许多组织表现出高度遵守其义务精神。[8]如2018年5月的西撒哈拉，解放萨圭亚·哈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销毁了2 500枚库存APM。[9]

2017年为有数据可查的最后一年，ICBL共记录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ERW)相关伤亡7239例，其中至少2793人死亡。这也标志着伤亡人数尽管略低于2016年，但也连续第三年居高不下，也成为简易地雷年度人员伤亡的第二峰值年份。[10]伤亡人数最多的两个国家为阿富汗和叙利亚，2018年的高伤亡趋势似乎还在延续。

在阿富汗，非国家武装组织使用简易地雷的主要原因是伊斯兰国霍拉桑省(ISKP)和塔利班部队。据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UNAMA)，针对平民使用IED已达到“极端水平”。自2018年初以来，暴力冲突相关平民死亡，几乎一半都是源于IED。[11]2018年1月1日至9月30日，UNAMA记录下自杀式和非自杀式IED袭击平民伤亡3634人，（1065人死亡，2569人受伤），较2017年同期增加21%。

在叙利亚，APM一直在戕害返回前IS控制区平民。例如，2017年10月21日至2018年1月20日期间，在地雷密布的拉卡地区，共有超过491人被地雷炸死炸伤。[12]

清除和销毁措施

2017年，国际社会对排雷行动的支持——清除地雷和其他ERW，以便将土地归还人民——增加超过2亿美元援助：37个捐助国向38个国家和三个地区共捐助6.732亿美元，达到20多年的峰值水平。2017年，前五大排雷行动捐助国德国、日本、挪威、美国和欧盟提供了近80%的国际资金。[13]阿富汗于2018年2月在日内瓦主办了第三次国际认捐大会。2018年支持承诺包括：韩国于2018年3

月承诺 2000 万美元用于越南排雷工作；澳大利亚于 2018 年 6 月承诺 1420 万美元用于伊拉克和叙利亚排雷工作；英国于 2018 年 9 月承诺 5800 万美元用于多个排雷行动项目。[14]

2017 年，128 平方公里土地完成地雷清除，16.8 万余枚地雷被销毁，都较 2016 年出现下滑。[15]毛里塔尼亚在 2018 年完成地雷清除工作。已知存在地雷污染的 56 个国家和 4 个主权争议地区中，有 32 个国家为 APM 公约缔约国。其中只有 4 个国家似乎有望在十年大限内，完成地雷清除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秘鲁、斯里兰卡和津巴布韦，阿塞拜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柬埔寨、乍得、克罗地亚、伊拉克、泰国、土耳其和也门。[16]

朝韩非军事区(DMZ)估计是世界上雷区最密集地区之一，但地雷污染程度数据却十分鲜见。然而，2018 年 10 月 1 日，作为朝韩关系解冻和半岛无核化倡议的组成部分，朝鲜宣布，朝鲜和韩国军队已开始清除两国共同边界下的约 180-220 万枚地雷。扫雷进程基本只是为了象征性的建立信任措施，仅限于在 DMZ 两个地点清除少量地雷：板门店联合安全区和箭头山，朝鲜战争公墓。[17]板门店联合排雷工作于 10 月 25 日完成，箭头山扫雷于 11 月 30 日结束。[18]

缔约国总共销毁了 5400 多万枚库存杀伤人员地雷，其中包括 2017 年销毁的 50 多万枚。阿曼宣布于 2018 年 11 月完成库存销毁，现在只剩下希腊和乌克兰两个有库存销毁义务的缔约国。两国都错过了库存销毁的最后期限（分别为 2008 年和 2010 年），两国都未说明何时可完成销毁工作。希腊已成功重启一项销毁进程，2014 年保加利亚的一个销毁设施在地雷销毁过程中发生爆炸，随后进程暂停。乌克兰的销毁工作挑战来自于苏联时期的 PFM-1 地雷库存。这些地雷极其危险，销毁技术难度很大。[19]

据估计，全球剩余的杀伤人员地雷储存总量不超过 5000 万枚。除乌克兰外，最大库存国都是公约非签字国：俄罗斯（2650 万）、巴基斯坦（600 万）、印度（400-500 万）、中国（500 万）、乌克兰（440 万）和美国（300 万）。[20]

第 17 次 APM 公约缔约国会议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30 日，阿富汗担任主席国期间，APM 公约第 17 次缔约国会议（MSP）在日内瓦举行。[21]会议重申支持公约和 2025 年世界无地雷目标。会议对滥用简易地雷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非缔约国尽快加入 MSP 条约。各委员

会对公约运行和执行情况给出各类建议和结论，大会也都予采纳并通告。[22]

七个缔约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塞尔维亚、苏丹和乌克兰因错过 2016 年 6 月 1 日的排雷大限，违反公约第 5 条。英国发出延期请求，并最终获批。[23]克罗地亚于 1998 年加入公约，提出延期请求并获准延长至 2026 年，而其他六个国家则获准将期限延长至全球 2025 年无地雷目标框架内。[24]最后，会议同意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至 29 日在奥斯陆举行第 4 次审议大会，并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至 24 日举行闭会期会议。

集束炸弹公约

2008 年集束炸弹公约(CCM)是一项有 100 多个缔约国的国际条约，包括前主要生产国和使用国以及受影响国家。条约涉及空投或地面发射集束炸弹对平民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和不可接受的伤害，这些集束炸弹释放出若干体积较小的子炸弹，意在杀死敌方人员或摧毁车辆。对集束炸弹的批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在一个较大区域内低精度散布大量子炸弹；经常无法引爆，而且很难发现；子炸弹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具有爆炸危险性。[25] CCM 确定无条件禁止和行动框架。[26]要求在八年时间内销毁全部库存，在十年时间内清除集束炸弹污染残留，并向受害者提供援助。

2018 年，CCM 迎来十周年，又新增三个缔约国：冈比亚和纳米比亚分别于 12 月 11 日和 8 月 31 日批准公约，斯里兰卡则于 2018 年 3 月 1 日交存加入文书。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CCM 有 105 个缔约国和 15 个签字国。

2018 年 12 月，包括 32 个非公约签字国在内的 144 个国家，投票通过联合国大会第 4 项决议，支持 CCM 公约。[27]联大决议为非公约签字国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表明其对公约人道主义诉求和普遍化目标的支持。津巴布韦是唯一对决议投反对票的国家（连续第 4 年），但有 38 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其中包括俄罗斯，俄罗斯曾在 2017 年对决议投下反对票。[28]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 CCM 辩论集中对使用 CCM 的谴责和呼吁各国加入公约，实现公约普遍化。[29]

2018 年集束炸弹使用

自 CCM 公约通过以来，没有任何缔约国再使用过集束炸弹，多数非公约缔约国事实上也遵守了公约禁止使用和生产 CCM 的规定。然而，尽管饱受国际谴责，

叙利亚一直在使用集束炸弹，尽管似乎较往年不是那么频繁。叙利亚自 2012 年年中，就开始使用集束炸弹。根据集束炸弹监测，截至 2018 年 6 月的 12 个月内，2018 年叙利亚至少发生 36 起集束弹药攻击事件，主要由叙利亚政府武装部队实施。[30]此外，大赦国际还记录下 2018 年 9 月叙利亚使用集束弹药的情况。[31]

同时还有多起未经证实的集束炸弹指控发生在埃及和利比亚。[32] 2015-17 年间，也门也记录下多起集束炸弹攻击事件，2018 年尚未发现使用的新证据。[33]

销毁、透明度和清除措施

截至 2018 年 7 月底，41 个拥有集束弹药库存的缔约国中，有 33 个国家已完成销毁近 140 万枚库存集束弹药，其中含有 1.77 亿枚子弹药。这意味着 99%的已宣布母炸弹和子炸弹库存，已在 CCM 框架下完成销毁。2018 年 6 月至 7 月，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完成了对其库存集束弹药的销毁工作。[34]由于并未有多少国家披露其拥有的集束弹药类型和数量，因此无法对非签字国当前库存集束弹药数量作出全球估计。2018 年 9 月，以色列宣布将对其老旧集束弹药库存进行销毁。[35]

截至 2018 年 7 月，已有 89 个缔约国按照公约要求提交了一份初步透明度报告，13 个缔约国尚未提交，其中 4 个国家原本应于 2011 年提交。此外，56 个缔约国提交了 2017 年最新年度透明度报告。[36]

武装冲突和社会动荡使得几个国家清除集束弹药的工作更为困难，但 2017 年至少完成 93 平方公里受污土地清理工作，销毁 15.3 万枚子弹药，较 2016 年均有所增加。[37]清理土地中，四分之三以上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个国家。据估计，这三个国家是全球 CCM 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因为 1965 年-1975 年，美国在这一地区大量使用集束弹药。[38]老挝在 2017 年也创下遗留集束弹药致死致伤人数之最（32 人），这也表明集束炸弹之殇 50 年依旧。[39]

2010 年至 2017 年间，全球销毁 68.8 万多枚子弹药，清理至少 518 平方公里受污土地。然而，至少还有 26 个国家和 3 个地区受到集束弹药污染。[40]目前无法准确估计受污地区总面积，原因就在于许多国家，特别是非签字国很难界定污染程度和清除工作进展。迄今为止，共有 8 个缔约国完成了公约宣布的受污地区清理工作。[41]在已宣布为受污地区的 13 个缔约国中，只有克罗地亚目前正在推进的清理方案，被认为有望在规定的 10 年清理期限内完成清理工作。[42]

2018 年 2 月 12 日至 14 日，新西兰奥克兰举办了一次常规军控条约区域讲习班，对 CCM 公约进行了讨论。[43]

CCM 缔约国第 8 届大会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CCM 缔约国第 8 次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尼加拉瓜担任主席国。这是自 2015 年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通过以来的第 3 次正式会议，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五年计划为各国设定了公约执行和公约推广路线图。[44]大会最终报告中，缔约国对“最近世界各地发生的使用 CCM 事件表示强烈关切”，并“对任何行为者的任何使用表示谴责”。各国同时对执行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45]

虽然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缔约国违反公约第 3 条(销毁库存)或第 4 条(清除和销毁遗留集束炸弹)的最后期限，但可以预见今后几年会有几个缔约国可能无法完成。因此，会议通过指导原则，指导各国根据条款提出延期请求(分别作为最终报告附件 2 和附件 3)。此外，鉴于会费拖欠，CCM 早已是捉襟见肘，会议要求 2019 年大会主席明确措施，以提升财政状况可预测性和持续性。[46]

1 CCW 公约也讨论了 IED，见本章第 1 节。
2 社论，“为什么地雷仍然杀死那么多人?”，《纽约时报》，2018 年 6 月 6 日。
3 APM 公约摘要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4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的执行情况，A/RES/73/61，2018 年 12 月 5 日。大会决议表决方式重要意义，见禁止地雷国际运动，“关于联合国大会禁止地雷条约决议的常见问题”。
5 国际禁止地雷运动(ICBL-CMC)，地雷监测，2018 (ICBL-CMC:日内瓦，2018 年 11 月)，第 1-9 页。该报告重点关注 2017 年日历年，尽可能包含截至 2018 年 11 月的信息。
6 人权理事会，缅甸问题独立国际真相调查团详细调查结果报告，A/HRC/39/CRP.2，2018 年 9 月 17 日，第 288 页。缅甸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7 禁止地雷国际运动(注 5)，第 1 至 12 页;博蒙特・P，“戴安娜王妃的扫雷努力，在 ISIS 地雷的爆炸声中灰飞烟灭”，《卫报》，2018 年 5 月 31 日。
8 禁止地雷国际运动(注 5)，第 13 页;科纳耶夫・M 和法扎尔・T，“国际人道主义法能约束武装组织吗?”，NGO 杀伤地雷工作的经验教训”;法律战，2018 年 9 月 30 日；日内瓦呼声-网站，“地雷禁令”。
9 日内瓦呼声-网站，“销毁西撒哈拉储存的 2500 枚杀伤性地雷”，2018 年 5 月 30 日。
10 禁止地雷国际运动(注 5)，第 2，49-57 页。
11UNAMA 特别报告，阿富汗:武装冲突中对平民的保护，蓄意和不加区别地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对阿富汗平民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UNAMA:喀布尔，2018 年 10 月)。见人权观察：漫天战火:叛乱分子对阿富汗平民的袭击(人权观察:美国，2018)。阿富汗冲突，也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12 人权观察组织，“叙利亚:数百人被地雷炸死、炸伤”，2018 年 2 月 12 日。另见国际特赦组织，杀戮之战:叙利亚平民因地雷伤亡惨重(国际特赦组织:伦敦，2018 年 6 月)。叙利亚冲突，也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13 禁止地雷国际运动(注 5)，第 2-3、73-86 页。
14 禁止杀伤地雷公约，公约第三次年度认捐大会，2018 年 3 月 9 日；UNDP，越南:在韩国支持下开展扫雷行动”，新闻发布，2018 年 3 月 9 日；反人员地雷公约闭会期间会议，澳大利亚国际合作与援助署与英国国际发展部联合发表声明，“英国援助将保护 82 万多人免受致命地雷威胁”，新闻发布，2018 年 9 月 6 日。

15 禁止地雷国际运动(注 5)，第 3-4 页，第 23-31 页。
16 禁止地雷国际运动(注 5)，第 31-33 页。
17 “朝韩开始拆除非军事区沿线地雷”，CBS 新闻，2018 年 10 月 1 日。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朝鲜韩和平进程，见本卷第 7 章第 1 节。
18 “19 天，清除 JSA 境内地雷”;《韩国中央日报》，2018 年 10 月 20 日；“韩国将完成拆除非军事区部分哨所、地雷的工作”，韩联社，2018 年 11 月 30 日。
19 见希腊和乌克兰在关于《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第 4 条（销毁储存）执行情况的结论中向第 17 次公约缔约国会议提供的最新进展情况，APLC/MSP.17/2018/7，2018 年 9 月 25 日；国际禁止地雷运动（注 5），第 17 页；APM 公约，“地雷会议呼吁严厉谴责临时性杀伤人员地雷，并承认此类武器造成污染”，新闻发布，2018 年 11 月 30 日。
20 禁止地雷国际运动(注 5)，第 4-5、16-19 页。
21 缔约国会议程序、文件和声明相关详情，见《禁止杀伤地雷公约》第 17 次缔约国会议，日内瓦，2018 年 11 月 26-30 日。
22 见联合国，《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公约》缔约国会议第 17 次会议，日内瓦，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30 日，最后报告(预印本)，2018 年 12 月 6 日。
23 每项请求、缔约国提交的其他资料、分析和决定相关详情，见 APM 网站，“关于延长扫雷期限的请求”。
24 联合国(注 22)。
25 国会研究服务处(CRS)，集束弹药:提交国会的背景及事务信息，CRS 向国会提交报告 RS22907 (CRS:华盛顿特区，2019)。
26 集束炸弹公约摘要，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27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3/54 号决议，《集束炸弹公约》执行情况，2018 年 12 月 5 日。
28 集束炸弹联盟，“联合国大会 2018 年 CCM 决议表决”，2018 年 12 月 10 日。
29 大会第一委员会关于 CCM 辩论的摘要，见 Reaching Critical Will 网站，第一委员会监测 No.6(2018 年 11 月 11 日)，第 11 - 12 页。
30 集束炸弹监测，以 2017 年为重点，尽可能将 2018 年 8 月信息纳入。国际禁止地雷运动-集束炸弹联盟（ICBL-CMC），集束炸弹监测，2018 年（ICBL-CMC:2018 年 9 月，日内瓦），第 15-18 页。关于叙利亚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31 大赦国际英国，“叙利亚:集束炸弹和油桶炸弹被用来对付伊德利卜平民”，2018 年 9 月 14 日。
32 禁止地雷-集束炸弹联盟国际运动(注 30)，第 20-21 页;国际特赦组织，“埃及:国际特赦组织证实在西奈半岛北部使用禁用的集束炸弹”新闻发布，2018 年 3 月 1 日。
33 禁止地雷-集束炸弹联盟国际运动(注 30)，第 19-20 页。
34 国际禁止地雷-集束炸弹联盟运动(注 30)，第 25-33 页。
35 库博维奇·Y，“以色列空军计划摧毁有争议的集束炸弹”，《国土报》，2018 年 9 月 18 日。
36 禁止地雷-集束炸弹联盟国际运动(注 30)，第 35-36 页。
37 禁止地雷-集束炸弹联盟国际运动(注 30)，第 60-64 页。
38 1965 年至 1975 年期间，向这三个国家空投弹约 79 万枚集束炸弹，内含至少 3.83 亿枚子炸弹。禁止地雷国际运动-集束弹药联盟(注 30)，第 53 页。
39 禁止地雷-集束弹药联盟国际运动(注 30)，第 94 页;康威里·P，“越南战争结束 50 年后，美国炸弹继续在老挝造成人员伤亡，”半岛电视台，2018 年 11 月 21 日。
40 还未完全销毁集束炸弹的国家有:阿富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乍得、智利、克罗地亚、德国、伊拉克、老挝、黎巴嫩、黑山、索马里兰和联合王国;签字国:安哥拉;阿塞拜疆、柬埔寨、格鲁吉亚、伊朗、利比亚、塞尔维亚、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塔吉克斯坦、乌克兰、越南和也门;其他地区:科索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西撒哈拉。国际禁止地雷运动-集束炸弹(注 30)，第 59 - 64 页。
41 阿尔巴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格林纳达，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挪威和赞比亚。国际禁止地雷运动-集束炸弹联盟(注 30)，第 69 页。
42 其他 12 个国家:阿富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德国、伊拉克、
老挝，黎巴嫩，黑山，索马里和英国。国际禁止地雷运动-集束炸弹联盟(注 30)，第 69-70 页。
43 见“奥克兰常规武器条约宣言”，太平洋会议，新西兰奥克兰，2018 年 2 月 12-14 日。
44 CCM 第一次审议会议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通过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2015 年 9 月 11 日。计划文本见集束炸弹公约执行助力的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2016 年 5 月 27 日。更新见 CCM，“集束炸弹公约，8MSP 推进报告”，监测实施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的进展，第 8 次缔约国会议总统提交，CCM/MSP/2018/5，2018 年 7 月 9 日。
45CCM，最终报告，CCM/MSP/2018/9, 2018 年 9 月 19 日。见 CCM 执行助力“缔约国第八次会议”网站对会议的报道。
46 CCM，最终报告(注 45)。

第 3 节.小武器和轻武器管制措施

马克·布罗姆利

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行动纲领

2001 年，各国通过《联合国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UN POA)，其中概述了国际社会在区域和国家层面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SALW)非法贸易应采取的步骤。[1]2005 年，各国通过《使各国能够及时可靠地查明和追查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机制》(《国际追查机制》,ITI)，其中概述了各国在武器标识和记录方面应采取的步骤。UN POA 和 ITI 均为联合国裁军事务厅（UNODA）辖下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机制，是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持下，在协商一致基础上谈判达成。两者结合形成了一套规范性标准，详细规定了各国在小武器和轻武器生命周期各阶段，打击转移用途所需采取的具体步骤。[2]UN POA 和 ITI 都缺乏有效核查措施，但鼓励各国每两年使用 UNODA 在线模板，上报 UN POA 和 ITI 执行情况。各国还举行两年一次的国家会议 (BMS)，以对两项机制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议，并举行六年一届的审议大会(RevCons)，以便更深入评估执行层面“进展”。

2018 年大事件

2018 年 6 月 18 日至 29 日，在法国让·克洛德·布鲁内大使主持下，UN POA 第三次审议大会在纽约举行。2018 年 RevCon 召开前夕，有人担心，大范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导致 2006 年 RevCon 再度重演。2006 年 RevCon，与会各国无法就最终成果文件达成一致。分歧在于是否以及如果是，将如何对平民拥有 SALW 以及对非国家行为者(NSA)转让武器内容加入其中。[3]2018 年 RevCon，分歧再度重演，但在最后一天会议延长至凌晨 4 点，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大会首次就两大关键议题表述进行投票，并就整个报告进行最后表决。[4]UN POA 和 ITI 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运作。这也赋予了两大机制强大的政治意义，但也同时使得少数国家就能够让大多数国家支持的表述无法被采纳。在纽约，最具争议的三大问题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向 NSA 转让武器和弹药。后面两个问题在 UN POA 的整个周期，分歧严重，难以调和。就 SDG 和弹药而言，

2016 年 BMS 成果文件就有所推进，其中包括在 UN POA 中增加范围和相关性描述。对于 NSA 武器转让问题，由于各国观点一直莫衷一是，新表述无法达成统一。

表9.2 提交POA执行情况国家报告数量

年份	国家报告数量
2002	16
2003[a]	99
2004	41
2005[a]	103
2006[b]	62
2007	36
2008[a]	111
2009	9
2010[a]	107
2011	12
2012	84
2013	3
2014[a]	76
2015	7
2016[a]	89
2017	0
2018[b]	119

POA = 联合国预防行动纲领，从各方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

[a]两年一次的国家会议。

[b]审议大会。

2015 年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相应的 SDG。17 个 SDG 承接了千年发展目标(MDG)工作，为今后 15 年世界发展议程制定了路线图。[5] SDG16 侧重于和平与安全问题，SDG16.4 承诺各国将减少非法武器流动。为衡量其具体执行，联合国统计委员会采用 16.4.2 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机构间专家组（IAEG-SDG）将其定义为“缉获比例，查没或收缴武器，其非法来源或来龙去脉已被主管当局按照国际机制追踪或确立”。[6]基于防范打击非法武器流动这一共同目标，在 SDG16.4 和 UN POA 之间构建联系，相对而言并未引起多大争议。UNODA 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携手合作，与此同时 UNODA 被指定为指标 16.4.2 托管机构。此外，各国在 2016 年 BMS 上，同意向 UN POA 上报执行情况，以便收集 16.4.2.衡量指标数据。UNODA 对报告模板进行了相应修改，增加了一组 SALW 缉获量统计栏。

然而，综合来看，进程成果令人失望。2018 年，119 个国家上报 UN POA 执

行情况。这一数字高于 2008 年-上一记录年份，当时共有 111 个国家提交报告（见表 9.2）。119 个国家中，73 个国家表示，在 2016 年或 2017 年收缴了 SALW，47 个国家提供了相关数据。这也较 2016 年有所增加，2016 年共有 41 个国家报告收缴 SALW，21 个国家提供了相关数据。然而，只有 11 个国家提供追查要求数量数据，这恰好是指标 16.4.2 所需数据。直接涉及指标 16.4.2 的数据提交数量有限，这也彰显出各国在收集非法 SALW 数据时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问---当前框架模式下，16.4.2 作为 SDG 16.4.的衡量指标，究竟功效几何？[7]

纽约大会上，有声音要将 SDG 的其他方面同 UN POA 挂钩，也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一些国家在推动成果文件中，希望能够更为广泛的反应其他相关 SDG 目标，特别关注两性平等和女性/女童赋权的 SDG5。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的支持下，成果文件虽然提及更为广泛的 SDG 目标议程，但还是删除了其他 SDG 内容，仅保留 16.4，文件指出“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对实现包括和平、正义、强力政府机构、减贫、经济增长、健康、两性平等以及城市安全在内的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大影响”。[8]此外，尽管未提及 SDG5，但成果文件中包含不少性别事务的豪言壮志，将本就在 2012RevCon 和 2016 年 BMS 成果文件中有所体现的这一议题延伸至本届大会成果文件。2018 年 RevCon 成果文件提到必须打击基于性别的暴力，在 SALW 项目中融入性别意识，收集按性分列数据，加大妇女参与决策力度。表述中也体现出最近几年 NGO 的一些心声。[9]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和 NGO 都试图将弹药纳入 UN POA 和 ITI 范畴，但是一直遭到强烈抵制，尤其是美国。经过激烈的辩论，2016 年 BMS 成果文件间接提及弹药，文件指出一些国家在 ITI 对 SALW 定义的基础上，在 UN POA 相关条款中提及材料，而其他国家则未明确提及弹药。[10]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辩称，各国对 UN POA 和 ITI 的解读存在巨大分歧，放大这一分歧就可能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进而影响到机制的普遍性。[11] 2018 年 RevCon 成果文件两次提到弹药。第一次并未引发争议，并对 2017 年 12 月的联合国进程表示欢迎，进程旨在对“过量常规弹药存储”引起的问题进行审议。[12]第二次就更具争议性，这一次明确指出，一些国家认为弹药属于 UN POA 框架。同时注意到，这些国家“可相互交流并酌情他国相关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加以应用，他国可以是本机制框架下国家，也可以是加入其它相关机制的缔约国”。[13]美国要求对这一段表述进行表决，但最终

只有美国和以色列投下反对票，而 62 个国家投下赞成票。在弹药辩论继续向前推进的同时，关于向 NSA 转让弹药的讨论又回到以往 RevCon 和 BMS 的老路上。同以前几次会议一样，一些国家呼吁加上明确禁止未经出口国和进口国批准武器转让的措辞。然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却阻止补充这一定义。和往年一样，人们认为，美国这样的立场不过是为了保留自己向同情的非国家行为者提供武器的选择。[14]2018 年 RevCon 的措辞复制了以往 UN POA 文件中的措辞，并提到需要防止向“未经授权终端用户”转让武器，但却并未提及究竟是谁来授权。[15]

尽管 UN POA 概念范畴可能会因为 2018 年 RevCon 而有所拓展，但有人担心，UN POA 作为国际层面 SALW 有效管控工具效力其实是在倒退。各国在 SALW 标识等领域的分歧还将存在，并且随着武器生产技术不断发展，此类差异还将继续扩大。[16]尽管如此，许多国家还是在最近几年的讨论中作出大量努力，为 ITI 增补技术附件，以寻找关键领域确立共通操作，但是仍有少数国家横加阻拦。他们还同时对起草指导文件进程设置障碍，而宁可选择一个不那么难企及的目标，只不过是请联合国秘书长就这一问题出具一份报告。[17]任何关于 3D 打印及其在非法枪支生产中潜在运用的内容，也都在最终文件中被删除。原因就是各国都表示出对这一问题的关切，阻止这一技术被“分享”也终于变得名正言顺。最后，非 ATT 成员国和对联大投票不满的国家，毫不意外反对在最终成果文件提及 ATT。同时受到阻碍的还有《联合国枪支议定书》，这也意味着尽管三大机制在 SALW 管控上，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实际仍是各自为政，缺乏联系。

1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防止、打击和根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所有方面行动纲领草案》，A/CONF.192/L.5/Rev.1，2001 年 7 月 20 日。

2 这些步骤包括:(a)制订立法、条例和行政程序，以便控制 SALW 生产和转让;(b)记录所有这些领域;(c)

将非法制造、拥有、储存和贸易 SALW 定为犯罪;(d)标记 SALW 并保存记录;(e)改进 SALW 的追踪;(f)扣押和收缴非法拥有的 SALW;(g)销毁剩余 SALW。
3 泰勒·M·E，“联合国小型武器会议陷入僵局”，《今日军控》，2006 年 9 月 1 日，第 46-47 页。
4 派特拉克·A，“社论:在荒谬的剧院里，RevCon3 的最后一天”，《轻武器监控》，第 10 卷 No.6(2018 年 7 月 3 日)。
5 关于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见张·S 和米兰特·G，“危险地区状况”，SIPRI 年鉴 2016，第 345-63 页。
6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机构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专家组，秘书长说明，2016 年 12 月 15 日。
7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审议《防止、打击和根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行动纲领》所有方面执行情况的第六次大会(两年一次)国家会议的成果，A/CONF.192/BMS/2016/WP.1/Rev.3，2016 年 6 月 10 日。
8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审议《防止、打击和根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行动纲领》所有方面执行情况会议的报告，A/CONF.192/2018/RC/3，2018 年 7 月 6 日。
9 见 IANSA 妇女网，“小武器，大危害:公民社会就性别问题和小武器管控采取行动的呼吁”，IANSA。
10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注 7)。
11 戴维斯，“常规武器控制”，SIPRI 年鉴 2017，第 543-79 页。
12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因常规弹药库存过剩而产生的问题”，A/RES/72/55, 2017 年 12 月 4 日。
13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注 8)。
14 见霍尔顿·P，“禁止向非国家行为体转让武器和武器贸易条约”，UNIDIR，2012 年。
15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注 8)。
16 见联合国大会，比利时提交的关于有效标记、记录和追踪模块化和聚合物枪支的工作文件，A/CONF.192/2018/PC/WP.1，2018 年 3 月 5 日。
17 派特拉克(注 4)。

第 4 节.联合国秘书长启动新裁军议程

西比尔·鲍尔

2018 年 5 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瑞士日内瓦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确保我们共同的未来：裁军议程”。[1]议程确定 3 大优先事项：

（a） 通过减少和消除生物、化学和核武器的裁军来拯救人类；（b）通过减少常规武器影响来的裁军来拯救生命；（c）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裁军，在前任秘书长强调裁军的同时，强调全新的人道主义视角、全新的综合应对手段以及全新的新技术关联。[2]

新议程出炉的背景是秘书长对全球裁军停滞不前、军费高企和全球军备竞赛日趋白热化深深的忧虑。与此同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对话机制日渐衰弱。古特雷斯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危险的时刻”。[3]

这份 80 页的文件中，常规武器占据三分之一篇幅。常规武器包括主战常规武器、小武器和轻武器、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IED)。杀伤人员地雷和集束弹药已被禁止，常规武器已有各类武器贸易条约管控。但是，上述种种措施并未阻止其进化的步伐，常规武器继续变得越来越精密复杂也愈发致命。

议程讨论了人类裁军进展的现实需求，并强调裁军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之间的直接联系。正如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述的一样，SDGS 明确规划出减少非法武器流动的具体目标。[4]裁军议程同时提出挤出效应，议程认为军费支出的飙升会耗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并呼吁各国政府减少军备开支，转而投向 SDG 目标。[5]SDG 目标 5.2，即消除所有针对妇女和女童的一切形式暴力，议程提出军备对性别问题冲击这一重要议题。议程敦促各国在存在性别暴力风险的情况下，不转让符合武器贸易条约规定存在性别暴力危害的武器或弹药；将性别视角融入裁军和军控政策制定工作；并在军控和裁军政策中考虑性别角色的影响。[6]

文件进一步强调在城市战争中使用爆炸性武器对平民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平民伤亡估计会占到总伤亡人数 90%。为应对这一挑战，联合国成员国目前正在讨论制定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EWIPA)的限制和行动政策(见第 1 节)。联合国大会 2018 年第一委员会会议期间，50 个国家发表

了一项联合声明，对使用 EWIPA 造成的人道主义戕害表示关切。[7]

“裁军拯救子孙后代”，裁军议程强调，新技术如果被恶意使用，可能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危及子孙后代。报告认为，“新武器技术的综合风险可能对我们未来的安全产生巨大影响，可能会改变战争规则”。[8] 虽然这一思想贯穿始终，但它与常规武器密切相关，原因就是新技术会使其功能和杀伤力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点已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下的自主武器系统可见一斑（见第 1 节）。秘书长提议支持各国制定新措施，例如“具有约束力的 LAW 管控机制”，以确保“人类始终保持对所使用武器的控制”。[9]

裁军议程赞同消除和销毁、禁止和限制、不扩散、管制、减少和限制、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机制以及排雷等补救措施等传统裁军机制手段。对于常规武器，议程特别强调储存管理的重要性。议程同时还鼓励新举措，特别是强调需要通过加强协调、更好地利用专业知识、提升和强化妇女的作用、更多地吸纳青年人以及加强年轻人的教育和培训来保证现有裁军机制活力。[10]

裁军进程执行计划将就常规武器在两个领域采取行动：减轻人道主义影响，解决过度积累和非法贸易问题。[11] 在人道主义层面，议程支持鼓励会员国采取行动，避免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并制定转让、持有和使用无人机的共同标准。秘书长明确支持关于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政治宣言。联合国机构层面的其他重大行动包括：（a）分享保护平民的政策和做法；（b）在联合国行动中引入伤亡记录；（c）在军事机构内组建降低平民伤害小组，以便“跟踪、调查并采取适当措施加以处理，减轻和补救对平民的伤害；和（d）加强 IED 的机构间协调。[12] 为解决过度积累和非法武器转让问题，鼓励各国及其他相关行动各方采取行动改善储存管理。强调建立区域信任对话的重要性，鼓励对军费开支和军购以及武器持有和转让实施相互监督限制。

尽管这些新动能都是针对联合国机构，但大多数行动需要各国参与才能取得成效，最明显的是：在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内设立小武器信托基金；（b）“提升武器管控在冲突管理中作用的认识”；和（c）促进对话以建立信任，最终目标是减少军费开支以及武器购置、持有和转让。说明各项行动执行状况，为监测执行提供量化指标。2019 年 1 月，执行状态从“行动待执行”变更为执行准备中或正在执行。

尽管在其他方面已是十分完备，但是裁军议程的一个明显的遗漏就是没有提

及武器贸易条约。

联合国成员国对议程的反应大体是积极的，这也体现在第一委员会的很多发言中。然而，五常中只有中国在第一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运中提及并对议程表示欢迎。因此，除了上述各项行动不仅需要迈过调动财政资源这一道坎，还要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

1 古特雷斯·A，在日内瓦大学发表裁军议程启动宣言，联合国，日内瓦，2018 年 5 月 24 日。
2 联合国，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确保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联合国：纽约，2018 年）。关于生物和化学武器问题的讨论，见本卷第 8 章第 3 节；关于核问题的讨论，见本卷第 7 章第 5 节。
3 联合国(注 2)。
4 见布罗姆利·M 和卡帕里尼·M，“可持续发展目标 16.4 和非法武器流动数据收集:取得的进展和未来面临的挑战”，SIPRI 背景文件，2018 年 6 月 15 日。
5 联合国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启动新裁军议程，保障我们的世界和未来”，2018 年 5 月 28 日。
6 联合国，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注 2)，第 39 页。关于武器贸易条约，见本卷第 10 章第 1 节。
7 联合国大会发表《关于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武器的联合声明》，爱尔兰，联合国大会，2018 年 10 月 25 日。
8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注 2)，第 3 节。
9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注 2)，第 55 页。
10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注 2)，“执行摘要”，第 11 页。
11 联合国，确保我们共同的未来:裁军议程，实施计划，更新于 2019 年 3 月 8 日。
12 联合国(注 2)，第 36 页。

第 5 节.网络军控与适应力

埃内肯·蒂克

概述

联合国军控和信息通信技术(ICT)对话可追溯到 90 年代末。1998 年，由于美国提出信息战理论和 ICT 的飞速扩散，俄罗斯立刻警惕起来，决定将 ICT 问题作为和平安全威胁提交联合国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最终催生政府专家组的成立(GGE)，负责从国际安全角度研究信息通信领域发展，GGE 于 2004 年首次举行会议。

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对 ICT 破坏性影响的关切日益加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 2005-18 年间，共发现 250 多起由国家发起的网络攻击。[1] 对所涉国家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结果同对 2000-14 年网络攻击的分析(2014 年公布结论)基本一致。[2] 涉及约 20 个国家，多数都参与过 GGE 讨论。

20 年火热的讨论，各国在威胁性质和应对举措方面难言共识。联合国讨论面临着一个核心挑战就是，各国在 ICT 使用和规范上基本就是南辕北辙。俄罗斯和美国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但两国视角却正好相反。俄罗斯希望对最强网络行为主体施以严格监管，控制国内信息流动。俄罗斯提倡多边管控进程，以解决 ICT 用于军事、恐怖主义和犯罪目的。美国作为全球网络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主要围绕国家行为或以国家为目标的网络行为展开讨论，较少涉及国内安全和信息威胁。因此，美国辩称，没有必要在国际层面加以额外管控，其原因就是各国 ICT 运用已被囊括在国际法范畴。俄美立场的争锋相对，一直是联合国层面推进的障碍，背后折射出的是两大阵营的全面对立。俄美立场之间的距离一直是联合国层面取得进展的障碍，反映了不同国家集团立场上的更广泛分歧。

一边是联合国层面讨论热火朝天，一边是各国背后加大对网络攻击支持的现实，这一进程就变得更为混乱。绝大多数已知的由国家发起的网络攻击都是网络间谍活动。而对于产生显著影响的事件，多数并没有国家身影：攻击网站、暂时禁用系统服务和功能、数据破坏，少数情况下的无力破坏。[3] 然而，多数国家并没有独立有效的检测能力，所以也就难言对国家网络范围和目标进行精准定位。

更为棘手的是，任何个体都可以使用 ICT，网络又往往是归私营部门所有并负责运维，这就使得政府难以对其实施控制，或者说甚至放任对其的管控。[4]

俄美都不愿做出额外的承诺，保证其不会进行低于武力门槛的网络行动。这一表态也就使得绝大多数国家的网络行动争端--如间谍活动、网络阻拦和数据销毁等---都无法在第一委员会对话框架下得以解决。此外，第一委员会对 ICT 的讨论仍然独立于其他 ICT 研发和使用问题。网络犯罪、恐怖分子使用 ICT、互联网治理、监视、隐私保护和其他人权问题被排除在军控对话重点之外。

本节首先对国际社会关于 ICT 使用问题，在联大第一委员会的讨论情况进行了回顾。报告首先讨论了各国对 ICT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不同看法，以及各国在相应举措上的分歧。在对国际网络安全对话前景进行评估之后，重点审查了俄美这两个国际网络军控对话主要对手的成绩和诉求。同时将其他区域和私营部门努力相结合，旨在创建一个共通规范标准并提升适应力。本节最后就网络安全最终规范性指导意见达成一致性意见，表达出总体悲观的态度，但也强调世界各国可通过采取具体措施进行相应补救。

联合国框架下国际对话

根据俄罗斯发起的联合国大会关于“从国际安全角度审视 ICT 发展”的一系列决议，联大第一委员会就各国 ICT 使用情况展开讨论。[5]一些国家将这些举措视为国际网络安全对话，其他相关行动视为国际信息安全谈判。

上述决议同时启动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进程。第一，每年提请联合国成员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其对信息安全问题的看法和评估，以及在全球层面制定相关措施的可能性。第二，自 2004 年以来，GGE 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并对威胁进行研究，提出相应威胁对策。3 个 GGE(共 5 个)已达成协商一致报告（见表 9.3）。

GGE 进程

第 1GGE 未能就发展和使用 ICT 是否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达成共识。然而，2007 年的针对爱沙尼亚的网络攻击和 2008 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中的网络攻击事件后，专家们同意就网络威胁和相应对策展开讨论。2009-10 年、2012-13 年和 2014-15 年 GGE 谈判结果是，各方普遍承认存在这一威胁，并一致认为国际法适用于国际信息安全问题。

时至 2015 年，第 4GGE 制定出一个 4 级讨论架构：（a）国际法适用性；（b）制定国家负责任行为的自愿和无约束力准则、规则和原则；（c）建立信任措施(CBM)；以及（d）相关能力建设。2016-17 年，第 5GGE 的任务是厘清如果将国际法适用于各国 ICT 使用。[6]然而，形态各异的国家利益使得共识极难形成。[7]工作组主席得出结论，“各国在 ICT 的国际法适用问题上，依旧存在极大的分歧。”[8]

联合国大会在 2017 年并未达成一般性决议，2018 年也未提出实质性议程。这也让国际社会怀疑，网络军控议程是否已然后继无力。

表 9.3 2004-17 年国际安全背景下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问题政府专家组

年份	成员国数量	主席国	其他参与国	共识报告
2004－05	15	俄罗斯	白俄罗斯、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约旦、韩国、马来西亚、马里、墨西哥、南非、英国、美国	未发布
2009－10	15	俄罗斯	白俄罗斯、巴西、中国、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印度、以色列、意大利、 韩国、卡塔尔、南非、英国、美国	发布 a
2012－13	15	澳大利亚	阿根廷、白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埃及、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	发布 b
2014－15	20	巴西	白俄罗斯、中国、哥伦比亚、埃及、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加纳、以色列、日本、肯尼亚、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美国	发布 c
2016－17	25	德国	澳大利亚、博茨瓦纳、巴西、加拿大、中国古巴、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韩国、墨西哥、荷兰、俄罗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瑞士、英国、美国	未发布 d

a 联合国，联大，国际安全背景下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问题政府专家组报告，A/65/201，2010 年 7 月 30 日。
b 联合国，联大，国际安全背景下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问题政府专家组报告，A/68/98，2013 年 6 月 24 日。
c 联合国，联大，国际安全背景下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问题政府专家组报告，A/70/174，2015 年 7 月 22 日。
d 联合国，联大，第 72 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A/C.1/72/PV.192017 年 10 月 23 日，第 1-3 页

2018 年联大两项新决议

联大一般性决议在 2018 年进行了重大升级。[9] 现在决议罗列出 GGE 建议的若干准则、规则和原则。同时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OEWG)，在先前专家组工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OEWG 将讨论上述准则执行情况，如有必要，将对其进行相应修改或制定其他行为规则。OEWG，联大进程，将召集外交官讨论“在联合国支持下简历广泛参与的定期机制的可能性”。[10] 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可以研究并促进相互理解：（a）信息领域中存在的既有和潜在安全威胁；（b）应对此类威胁可能采取的合作措施；（c）在各国 ICT 使用中如何适用国际法；（d）CBM；和（e）能力建设。

俄罗斯是这一进程的发起国。进程致力于联合国 ICT 安全谈判进程更为民主、包容，更为透明。

美国对决议形式和内容都表示强烈反对。[11] 因此，美国发起一项单独的大会决议，题为“在国际安全背景下，促进负责任的国家行为”。[12] 决议建议以一个全新的、政府间专业知识为基础的共识，GGE 在这一理念上提出早期 GGE 报告评估和建议，并“继续研究，以促进共同理解和有效实施，以合作解决信息安全领域存在的既有和潜在威胁”。这样的共识包括“各国负责任的行为准则、规则和原则、建立信任措施和能力建设，以及国际法如何适用于各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13]

因此，这一进程分裂为两大主线，而这两条主线均不是 1998-2017 年原始进程的直接延续（见图 9.2）。俄罗斯支持的 OEWG 旨在通过具有 LAW 约束力的机制来控制网络或信息武器，而美国支持的新的 GGE 则侧重于和平时期的自愿和不具约束力的规范。

俄罗斯和美国的意图、理念和定义

两种看似殊途同归的工作方式，千万别误认为能实现某种统一。为了理解俄罗斯设置 OEWG 的意图，必须理解其信息安全政策和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说明了其呼吁禁止信息武器的初衷，因为信息武器早已成为现实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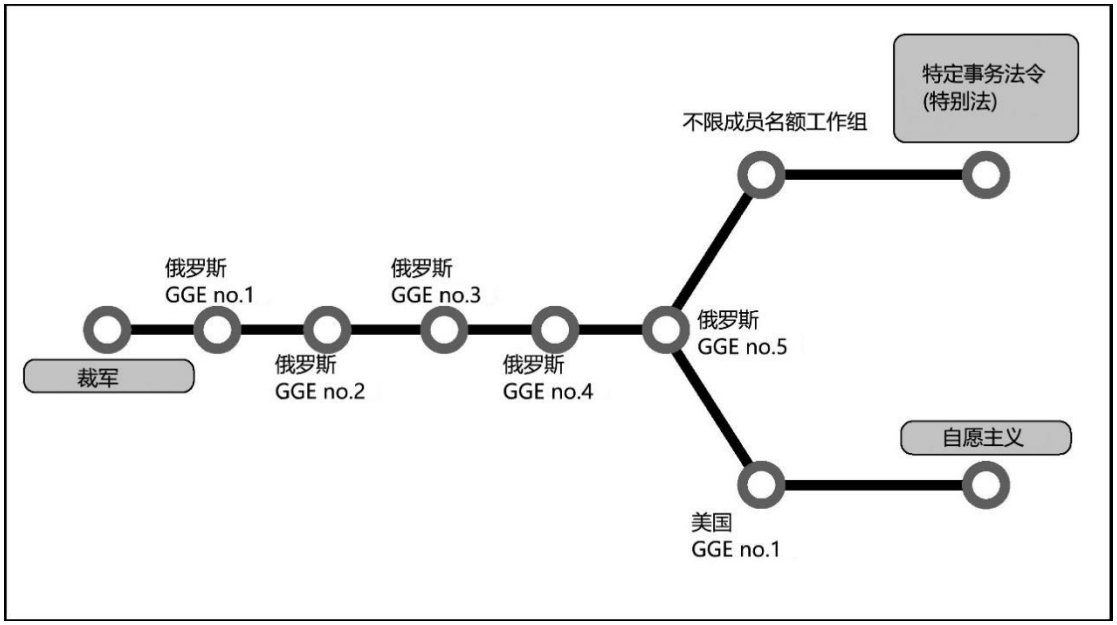


图 9.2 国际网络安全对话进程

GGE =政府专家组

GGE 进程中，俄罗斯首先将信息武器定义为“旨在破坏另一国信息资源、进程和系统的手段和方法；利用信息损害一国国防、行政、政治、社会、经济或其他重要系统，以及为破坏社会和国家稳定而对一国家人口进行大规模操纵”。[14] 最近，俄罗斯军方将信息武器定义为摧毁敌方信息系统或使其暂时失效的能力。具体而言，此类武器包括：（a）电磁武器，如无线电干扰机、电磁脉冲武器和定向能武器；（b）软件武器，如计算机病毒、计算机蠕虫、特洛伊木马程序、隐藏管理实用程序等；（c）硬件武器，如允许未经授权访问计算机信息书签，下载并发送至收件人，对计算机网络发动攻击，以修改或销毁存储信息。[15]

俄罗斯的信息安全理论设定出一个十分微妙的进程，旨在禁止发展、传播和使用信息武器。

俄罗斯的目标仍然是构建一个国际信息安全体系。[16] 其中包含一个专门的不扩散机制。[17]

俄罗斯一贯主张就此调整国际防，但俄罗斯也强调这一体系必须建立在普遍公认的原则基础上以及尊重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国家单独和集体防御权利等国际法规则之上。[18] 由于中国拒绝将国际人道主义法适用于网络攻击，这也埋下了中俄分歧的种子，中国表示联合国宪章就有绝对禁止在网络空间使用武力的表述。[19]

显然，俄罗斯对现有国际法的解读并非其他许多国家所想。2011 年和 2015 年，上海合作组织(SCO)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关于国际信息安全行为准则，便是最好的例证。[20] 这些提议包含了一些大家熟知的国际法规则及标准的描述，但也应声寥寥。2018 年联大信息安全决议直接提到被人们遗忘已久的 1981 年联大决议--《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21] 宣言包含了俄中两国寻求在联合国内部推广的制度理念：强烈强调主权，不干涉、不干预他国内政外交的原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同时提到国家特性和文化遗产概念，以及各国“发展其信息和大众媒体系统并利用其信息媒体促进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利益和愿望的权利”。据说后者是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相关条款和新的国际信息秩序原则为基础提出。[22]

俄罗斯高级官员指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实际上并未施加任何控制”地发展和传播网络武器，其结果是“非法使用网络武器的情况正在成倍增加”。[23] 然而最近，也许是为了强调美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人们观察到俄罗斯也在同样使用网络技术和工具。这反过来又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国际信息安全制度管理方式，因为现在不扩散的针对对象是那些不具备先进 ICT 能力的国家，或是恶意使用 ICT 的国家。

美国坚持认为，国际法已充分涵盖各国使用 ICT 问题。美国依旧强烈反对俄罗斯倾向的针对信息流动实施国家监管。特别是，美国强调在网络攻击背景下，有权采取措施进行自卫。美国主张实行后果政策，政府必须通过这一政策来遏制恶意非国家行为体：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应列出一份手段清单，确保让对手承担来自美方雷霆般的致命反击。已备应对那些尚未达到使用武力门槛，但需作出强力反应的事件，且反应需与美国义务和承诺相一致，并可产生后续威胁效果。[24] 最近英国也表示，就网络安全而言，主权只是一项原则，而并非一项规则。[25] 这一观点与美国网络司令部官员不谋而合，美方表示通过网络侵犯主权是正当行为。[26]

2018 年美国国家网络战略旨在通过加强“使用两种管理机制，为应对与美国理念框架不一致的国家行为提供基础，以此实现和平”。[27] 美国总统唐纳德 J. 特朗普政府承诺“在网络空间促进基于国际法的负责任国家行为框架，遵守在和平时期适用的关于负责任国家行为的自愿、无约束力准则，并考虑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建立信任，以减少恶意网络活动诱发冲突的风险”。美国已做好准备，将对

不负责任、恶意和有害网络行为抱以“雷霆般的致命反击”。美方认为所有国家手段均可使用。[28] 美国国防部网络战略既能促进网络军事行动能力提升，又能铁拳打击恶意网络行为体。同时强调，国防部“将在和平时期加强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的自愿、无约束力规范”。[29]

因此，尽管存在分歧，俄罗斯和美国都对 2014-15 年 GGE 工作成果感到满意，尤其是责任国家行为的 11 项行为准则建议。[30] 尽管 GGE 明确表示，这些准则、规则和原则均为自愿性、不具约束力，因此我们并非迈向一个新的法律机制。报告也可以被解读为支持俄罗斯的主张，即国际法存在需要填补的空白。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完全同意俄罗斯或美国观点。在 OEWG 投票中，美国投下反对票，得到欧盟(EU)成员国和五眼情报共享联盟成员国的支持。[31] 然而，就在投票前几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大发表一项声明，声明表示法国对主权的承诺绝不含糊。[32] 荷兰发起“网络外交工具箱”（见下文）讨论时，欧盟似乎也并非是铁桶一块。是威慑优先还是构建强力政府和国家网络安全耐受力议程，欧盟内部也是莫衷一是。[33] 澳大利亚似乎不太认同英国和美国对主权的看法。[34] 中国继续努力推动网络安全相关讨论，朝着更加强调治理的方向推进。中国在赞同俄罗斯主权观的同时，也为国际法辩护，强调必须遵守规则，履行责任。[35]

然而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哪些规则和谁负责？为实现其政治抱负，俄罗斯正努力在 ICT 环境中队其国家身份、文化遗产、媒体领域和公共秩序等概念进行一一梳理。反过来，西方国家也对国家责任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仔细思考。在国际法对话中，中俄联盟通常采取基础规则的手法，而西方则采取基于政策的立场。一位专家认为，前者认为国际法的规范性强，但适用范围有限；后者认为国际法规范性弱，但适用范围广。[36]

用军控手段推进国际对话？

第一委员会和 GGE 之间的对话使用的是传统军控语言。2010 年、2013 年和 2015 年 GGE 报告中，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那就是频繁提及冲突预防和建 CBM。由于和军控逻辑基本相似，GGE 成员得出结论，武装冲突中的 ICT 扩散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他们议题，必须通过类似军控的措施来应对 ICT 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通过规范性措施限制 ICT 使用和发展，通过 CBM 防止网络冲突及恶化，以及具体的机制安排。

然而，军控手段并未在 ICT 背景下得以充分实施。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减少、限制或禁止发展和使用 ICT 的国际机制谈判。无论国家或是非国家行为者是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使用 ICT，都也没有任何权威性指导来界定国际法如何适用或是不适用上述情况。GGE 成员也没有对国家网络能力和活动进行监督或审查。其结果就是，GGE 的措施既未能有效针对对抗，同时也无法解决对抗的起起落落。相反，有一些专家认为，其各自国家很难接受报告提及的自愿性和不具约束力规范。在强调协商一致基础的原则下，只要有一位专家强烈反对某一特定法律概念，就可能实现。[37]

尽管政府背书的网络行为被人广为诟病，但是 GGE 还是未在防范网络攻击上表明自己的明确立场。使用武力和武装攻击以及使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门槛问题，尚未解决。俄罗斯的重点是通过网络手段获得使用武力保证，而美国的重点仍然是在敌对情况下再次强调适用现有规格体系。[38]

总之，5 个 GGE 在不扩散问题上几乎没取得什么成果。相反，GGE 在处理诸如国家治理能力、耐受力不足以及对 ICT 益处缺乏共同认识等问题上展开研究。然而，这些都不适用军控措施。尽管如此，GGE 进程还是号召一批对此有兴趣的国家，围绕上述议题展开讨论。这些国家也是出于 ICT 对国家安全潜在影响的担忧。2006 年至 2017 年间，共有 110 多个国家成为俄罗斯联大决议提案国。随着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不再表示支持，OEWG 提案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同情的目光。[39] 自 1999 年以来，已有 70 多个国家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对局势的评估报告。[40]

国际对话现状

2016-17 年之前，人们一直认为每个后续 GGE 都会继承上一工作组的前提和结论，也正是因此，一些问题才得以解决。2013 之前，俄罗斯最初的主张是，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法律体系，以禁止发展、生产或使用高度危险的信息武器。[41] 为此目的，各国就如何制定国际原则以加强全球信息和电信系统安全，促进打击全球信息恐怖主义和犯罪行为展开磋商。[42]

然而，GGE 在 2013 年得出结论："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可适用，对维护和平与稳定以及促进开放、安全、和平和无障碍信息和通信技术环境至关重要。"[43]

这一表态被人们尤其是西方世界解读为，对既有国际法权威性的接受，同时不吝为对呼吁特定法律机制的驳回。但是，同时也有报告指出：

将现有国际法相关条款运用到 ICT 规范实践中，是降低国际和平、安全和稳定风险的必要措施。此类规范如何适用于国家行为和各国 ICT 实践，要形成共识还需进一步研究。鉴于 ICT 的特殊属性，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定更多规范。[44]

在 GGE2016-17 届年会上，一些专家直接对国际法适用性提出质疑。[45]因此，对于国家运用 ICT 技术实践中，国际法的适用性和充分性问题还有待解决，也同时是国际信息安全对话的核心。

GGE 报告措辞意义重大，因为它体现出对世界的两种不同看法和期望。第一种来自于西方，他们认为 ICT 的扩散是积极正面的，并认为现有国际法足以引导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另一种观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一些国家，他们认为数字化是一种威胁，并倾向于对国家使用和发展 ICT 给予规范性指导。多年来，GGE 报告框架和措辞一直都是平衡兼顾。因此，GGE 报告也对于向国际社会提供规范性指导，也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GGE 并未谴责或是限制任何特定行为，而是倾向于支持寻求自愿的、不具约束性的准则、规则和原则，并有选择地重申国际法概念。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对这一做法表示欢迎，但它对解决问题没多大实质性作用。严格执行不具约束力和自愿性基础，此基础上提出的规范办法，对国际网络事务不具备可预测性，并会使得国际法权威难言信服。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川泉乐观地表示，报告形成的共识为预防和减轻攻击性网络行为奠定了基础，但她也同时强调，当前的机制框架十分松散。[46]

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非网络冲突风险，都已通过双边军控措施得到解决，如建立俄美热线以避免重大战争。出于这一逻辑，俄罗斯提议进行两军对话和谈判，以避免俄美之间爆发意外网络冲突。迄今为止，美国尚未作出回应。[47]

联合国进程展望

俄罗斯试图游说国际支持，构建一个网络体系不扩散机制，成立 OEWG 自然是俄罗斯大业又进一步。OEWG 成立的背景是国际网络对抗阴魂不散，这也是两极世界秩序回归的有力体现。这一步棋的背后是俄罗斯相信，它能够说服全世界认识到数字化和过渡依赖 ICT 背后的危险。通过决议组建 OEWG 的意义在于，能

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机会，对狂飙突进的 ICT 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今后，GGE 和 OEWG 都需要在俄美的对立立场、观点和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或是做出妥协，同时还要在那些对先进技术热衷或不热衷的发展中国家间做出选择。面对两大论坛中林林总总的各类威胁、各类应对手段，世界各国也发表了各自许多看法。这些措施包括讨论新的 LAW 机制和具体禁令，就国家行为模式交换意见，以及将此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例如，古巴仍决心“在联合国框架内采取紧急行动，防止个人、组织和国家秘密非法利用计算机系统攻击其他国家，因为存在挑起国际冲突的可能。”[48]

埃及是则认为，网络安全已成为影响各国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战略设施和基础设施安全稳定的重要一环。联合国今天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制定一个协商一致基础之上的国际标准，确保网络空间不被用于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目的。[49]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指出网络能力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挑战，并呼吁就这种战争手段进行紧急国际辩论。[50]芬兰呼吁就低于武装攻击门槛的严重网络攻击交换意见。[51]爱沙尼亚总统凯尔斯蒂·卡尔朱莱表示，“所有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问题都应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国际法对于此类问题已明显滞后。”[52]

法国提议采取进一步措施，控制进攻性网络工具和技术出口，以限制其在网络空间的扩散，并提出更为详尽措施，防止非国家行为者在网络空间开展进攻性活动。[53]巴西坚持认为，是否有必要针对网络工具及技术制定一项特定法律框架，国际社会必须对此展开讨论。包括禁止首先使用进攻性网络武器、篡改数据链、恶意在系统或网络中植入漏洞，以及损害他国信息安全。[54]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则更为明确地建议，如联合国认真对待裁军问题，也必须认真对待网络安全问题，“提升网络安全就有可能阻断武器非法制造、转让和流通”。[55]

今后的道路将更为包容、更为透明。OEWG 进程对所有国家开放。联合国裁军事务厅(UNODA)将与相关区域组织展开合作，在 GGE 大会之前举行一系列磋商，就 GGE 职权范围内问题交换意见，以此支持 GGE 工作。此外，GGE 主席将组织协商会议，使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能进行互动式讨论并交流意见，然后主席将相关意见转达 GGE，以便审议。[56]当然，我们不应对透明度及包容性提升过分乐观。对话国家必须清楚自身诉求，同时明白能够在多大程度得以实现。否则，GGE 很可能会沦为俄美战略安全对抗的棋子。

对于国际社会对 ICT 发展和使用的关切，管理规范办法并非能解决一切问题。下一阶段对话，自上而下的军控式或自愿性规范手段自然会吸引各国更多的目光。对于增强国家耐受力(自下而上)而实现的国际法补救措施，前者将作何解读，又将如何实现？这就有可能同联合国层面框架和进程发生冲突。

区域、国家和公司进程

与联合国对话相比，一些区域组织取得重大进展。同时还有一些重要的国家和公司倡议。

区域组织努力

2018 年，通用数据保护条例(DPR)和网络和信息安全指令(NIS 指令)在欧盟生效。[57] 对数据泄露和系统入侵给予更多的制度保障。此外，在“网络外交工具箱”(欧盟对网络行动的联合外交反应)基础之上，荷兰正在采取一项欧盟网络外交协调倡议。[58]这一步骤也表明，欧盟正从预防性和规管性转向反应性和报复性策略。[59]

2013 年和 2016 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通过了一套 CBM 措施，以减少因 ICT 使用而带来的冲突风险。[60]OSCE 重点关注 2017 年和 2018 年上述措施的执行。具体包括威胁评估交换、国家网络安全当局间合作、风险协商、信息共享、联合能力建设以及国家政策和立法透明度。2016 年对各国执行 OSCE CBM 措施分析发现，北欧国家执行率很高，并强调快速响应小组在 CBM 中的作用。[61]

北约已果断采取行动，大力发展网络作战能力。北约已将网络空间划归其面临“所有战略方向的挑战和威胁”之一。[62]北约重申其按照国际法行事的承诺，并“同意整合主权网络效应[即各成员国的军事网络组织]。. . 在强大的政治监督框架之下，美国、英国、荷兰和爱沙尼亚等北约成员国都能发挥自身能力。[63] 北约还在比利时蒙斯总部建立一个网络空间行动指挥中心。[64]鉴于其成员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法适用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北约将面临国际法法条限制的挑战。网络安全也是北约和欧盟合作的领域之一。[65]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已采取步骤，改善地区网络安全，特别是提升国家网络能力。在规范制定方面，新加坡率先实施 GGE2015 年建议，并制定出具体的东盟规范。2018 年，东盟同美国一起公布一项联合声明，东盟领导人承诺在网

络事务、特别是规范进程方面开展务实合作。[66]

国家和公司倡议

为支持具体议程和目标，国家和公司倡议应运而生。自 2011 年开始，伦敦进程每两年举行一次一系列全球网络空间会议。世界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和促进网络空间务实合作，加强网络能力建设，并讨论相关网络空间负责任行为准则。会议主席发言概括了国家在网络空间负责任行为的各种原则和结论。2017 年，网络空间大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大会主席发言被视为是对先前承诺的一种倒退。[67]

自 2015 年在海牙主持伦敦进程会议以来，荷兰通过主办和资助几项具有影响力的网络安全活动，成为国际网络界领域的领军者。网络空间稳定全球委员会(GCSC)，一直致力于就加强国际安全与稳定准则和政策建言献策，并指导负责任国家和非国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68]

网络专门知识全球论坛，是一个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公司在网络能力建设方面交流最佳实践和专门知识的全球平台，总部也设在海牙。[69]

荷兰同时还为海牙进程的塔林手册提供资金支持。北约网络防御卓越合作中心(CCDCOE)在爱沙尼亚塔林，主办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目的在于讨论如何将国际法运用于国际网络行动。

塔林手册便是学术讨论成果的汇总。[70]2015 年，荷兰外交部决定资助这一进程，以便将塔林成果呈现给全世界。最终成就了一系列网络行动国际法适用课程，课程设置蓝本就是塔林手册。[71]

2018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乌镇举行，会议确立一项“基本共识”，即“网络空间治理框架”将继续推进，共担治理体系需加以改进”。[72]

虽然互联网治理和国际网络安全这两个问题被 GGE 有意分割开来，但两者在其他环境中不断融合。同时荷兰还注意到，[2016-17 年]在保护互联网一般功能上，进行了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讨论。[73]

法国正在推动其自身国际网络安全议程。自 2018 年 11 月以来，包括欧盟所有成员国在内的 60 多个国家通过签署巴黎网络空间信任与安全呼吁，承诺支持制定一项网络武器和互联网使用标准的新国际协议。[74]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均未签字。

美国科技公司微软发起了一项旨在推动日内瓦数字会议的进程。进程呼吁各国政府“在和平时期保护互联网平民”，并推动“一项呼吁世界各国政府保证不对私营部门发起网络攻击，不对民用基础设施发起攻击的公约，无论其是电力、经济还是政府机构”。[75] 尽管倡议并未得到美国政府支持，但已引起一些国家注意，并且 ICRC 也同其商讨如何在网络攻击中更好的保护平民。[76]

国家耐受力和企业责任

2011 年，美国在提交第一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一条基本线索，表明各国在不可能实现普遍有效规范性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正在做什么：“会员国当前任务有两个层面：国内和国际。确保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是一国政府的国内职责，同时必须与利益攸关的民间组织相协调。[77] GGE 同时还概述了国家网络安全标准，以及各国如何在标准执行中进行合作，如核心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确保供应链完整性，防止恶意 ICT 扩散，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共享。[78]

2018 年联大对话也标志着一个隐性的转变，即从网络安全讨论转向就网络相关问题进行更具包容性和更全面的对话。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似乎正在指导国际对话，利用技术发展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秘书长将新技术对战争的影响称为“对我们保障和平与安全共同责任的直接威胁”。[79]

在秘书长眼中，人类生命的生杀予夺最终掌握在机器手中，实在难以接受。

新的战争形式中很可能会有大规模网络攻击，不仅针对军事能力，同时针对关键民用基础设施，简直是天理难容。

如果我们要确保负责任地使用新技术，就需要在此类问题上开展更多工作，以便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建立信任。[80]

联合国秘书长新技术战略指出，网络安全威胁规模之巨、影响之广，同时行为主体采取进攻性姿态极可能“削弱当代国际安全架构的微妙平衡和互惠体系”。[81] “确定联合国系统将如何推动此类技术的使用，以加速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促进其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法准则和标准所载的价值观相一致”，就是当下的工作重心。[82]

这里也传达出一个信号，人类有可能就新技术与国际发展、和平、稳定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展开更为务实的国际对话。2018 年 7 月，古特雷斯成立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可能成为国际对话的重要平台。[83]

抛开各国网络能力水平的区别，利益诉求的差异，有一个强烈的声音，一国家对网络安全的责任完全取决于其自身。例如，不结盟运动谴责任何针对和平核设施的网络攻击或网络攻击威胁，认为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承认核安全首要责任在于各国自身。[84]

因此，制定和实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是各国信息自决的一个基本特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会置本国国民于不顾，向本国 ICT 完全置于外国势力影响之下。迄今为止，已有 106 个国家通过国家信息安全或网络安全政策和战略，明确发展国家能力、法律和体制框架、能力和机制建设。除能力、机制和框架建设外，加强保护重要基础设施、打击网络犯罪。[85] 伴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公民隐私、人权、国家间合作和国家责任等问题，都可能重新纳入联合国对话议程。[86]

结语

第一委员会的讨论，现在甚至是包括整个联合国大会，对国际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的讨论都变得扑朔迷离、雾里看花。在可预见的未来，联合国网络安全对话可能仍将保持极度的两极分化，也只能是出台一些无关痛痒的解决方案。对于国家或是非国家行为者的网络攻击，很难有快刀斩乱麻，立竿见影的补救措施。实际上，对于那些倚重自愿和无约束力规范的国家，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大家都得接受一定程度的网络风险同时要接受国际法解读的冗余度。这也说明，网络问题核心属于国家耐受力范畴，而非国家间监管框架。

国际信息安全或网络安全问题，和过去甚至将来的进程都无多大关联。今天的问题并非是国际法解读的分歧。今天的问题也和网络攻击或 GGE 无关。今天的问题是对于 ICT 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是国家在运用和发展此类技术中的角色问题，是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差异问题。这也是信息系统在社会、工业和政府大面积部署后，国家缺乏活力和耐受力的关键问题。所有网络问题上的分歧折射出的是世界观的差异，是大国间的根本性和制度性差异。由于网络无人监管的天然脆弱性，政治分歧在 ICT 背景中被极端放大，无处遁形。

俄美在战略高度的对峙，其他国家也必然无法将 ICT 问题简单的视为一个孤立的政策问题，必将提升至国家和国际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解决这一安全问题并非要从预防冲突的视角出发。强力的国家系统和耐受力是消除机

会主义占主流的网络攻击风险的良药，原因就在于必然重视 ICT 运用中的安全问题。先进国家的手段和经验将为对话铺平道路，更好的开展国家间对话，更好的进行国家间网络行动合作，提升网络安全耐受力水平。

因此，世界各国必须调整好自己的网络理念和进程，但是也必须承认，这些理念和进程只是过往主题的映射。联合国对话可能已然转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面数字进程，促进 ICT 技术助力国家及全球发展，并且摆脱当下俄美把持的国际 ICT 氛围。

1 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络行动追踪者”。
2 瓦莱里亚诺·B 和马内斯·R·C,“敌对对手间网络冲突”,2001-11,第 51 卷 No.3(2014 年 5 月),第 347-60 页。
3 外交关系委员会(注 1)。
4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信息及电信领域发展-国际安全领域通讯”，秘书长报告，A/66/152, 2011 年 7 月 15 日。
5 联合国大会，关于“国际安全背景下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的决议，1998 年 12 月 4 日第 53/70 号决议;1999 年 12 月 1 日第 54/49 号决议;2000 年 11 月 20 日第 55/28 号决议;2001 年 11 月 29 日 56/19 号决议;2002 年 11 月 22 日第 57/53 号决议;2003 年 12 月 8 日第 58/32 号决议;2004 年 12 月 3 日第 59/61 号决议;2005 年 12 月 8 日第 60/45 号决议;2006 年 12 月 6 日第 61/54 号决议;2007 年 12 月 5 日第 62/17 号决议;2008 年 12 月 2 日第 63/37 号决议;2009 年 12 月 2 日第 64/25 号决议;2010 年 12 月 8 日第 65/41 号决议;2011 年 12 月 2 日 66/24 号决议;2012 年 12 月 3 日第 67/27 号决议;2013 年 12 月 27 日第 68/243 号决议;2014 年 12 月 2 日 69/28 号决议;2015 年 12 月 23 日第 70/237 号决议;2016 年 12 月 5 日第 71/28 号决议;以及 2018 年 12 月 5 日第 73/27 号决议。
6 联合国大会第 70/237 号决议(注 5)。
7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国际安全框架下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政府专家小组，秘书长报告，A/72/327, 2017 年 8 月 14 日。
8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2 届大会，第一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A/C.1/72/PV.19，2017 年 10 月 23 日。
9 联合国大会第 73/27 号决议(注 5)。
10 联合国大会第 73/27 号决议(注 5)，第 5 段。
11 伍德·R·A，美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的发言，2018 年 10 月 29 日。
12 联合国大会第 73/266 号决议，“在国际安全框架下推进网络空间负责任的国家行为”，2018 年 12 月 22 日。
13 联合国大会第 73/266 号决议(注 12)，第 3 段。
14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国际安全框架下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秘书长报告，A/54/213, 1999 年 8 月 10 日，第 10 页。
15 迪列夫斯基·I·N，俄罗斯联邦政治军事层面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军事思想》，第 24 卷，No.1，第 7-16 页。
16 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原则，经 2016 年 12 月 5 日第 646 号总统令（俄语）批准，第 19 和 29 (b), (c), (d)段。英文翻译版见 <http://interkomitet.com/foreign-policy/basic-documents/doctrine-of-information-security-of-the-russian-federation/>.
17 至 2020 年俄罗斯联邦国际信息安全国家政策基础,2013 年 7 月 24 日,No.1753(俄语)。见迪列夫斯基(注 15)。
18 迪列夫斯基(注 15)。
19 联合国，A/C.1/72/PV.19(注 8)，第 14 页。
20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2011 年 9 月 12 日中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致秘书长的信，A/66/359, 2011 年 9 月 14 日;2015 年 1 月 9 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致秘书长的信(A/69/723,

2015 年 1 月 13 日)。本卷附件 B 第 2 节对上海合作组织作了简要介绍。
21 联合国大会第 73/27 号决议(注 5)，首段;联合国大会第 36/103 号决议，“关于不允许干涉和干涉别国内政的宣言”，1981 年 12 月 9 日。
22 联合国大会第 36/103 号决议(注 21)，第 1 (c)段。
23 迪列夫斯基(注 15)。
24 美国国务院网络问题协调员办公室，“总统关于威慑对手和更好地保护美国人民免受网络威胁的建议”，2018 年 5 月 31 日。
25 赖特·J，英国司法部长，“21 世纪网络与国际法”，演讲，英国司法部长办公室，2018 年 5 月 23 日。
26 科恩·G·P 和泰勒·R,“网络时代主权”，权威国际法期刊 AJIL Unbound，第 111 卷(2017)，第 207-12 页。
27 白宫，美利坚合众国国家网络战略(白宫:华盛顿特区，2018 年 9 月)，第 20 页。
28 白宫(注 27)，第 20-21 页。
29 美国国防部网络战略(DOD:华盛顿, DC, 2018)，第 4-5 页。
30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政府专家小组关于国际安全框架下信息电信领域发展的报告，A/70/174, 2015 年 7 月 22 日，第 13 段。
31“五眼联盟”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组成。
32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3 届会议，第 6 次全体会议，A/73/PV.6，2018 年 9 月 25 日，第 29-30 页。
33 欧盟理事会，“欧盟恶意网络活动联合外交应对框架之理事会论断”（以下简称“网络外交工具箱”），10474/17，2017 年 6 月 19 日。
34 澳大利亚政府，2017 年外交政策白皮书:安全力量机遇(外交贸易部:堪培拉，2017 年 11 月)，第 74 页。根据各国国家政策和战略文件，分析各国对国际法的看法，见瓦尔贾塔加·A，追踪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文件中的法律意见(NATO 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塔林，2018)。
35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3 届会议，第 12 次全体会议，A/73/PV.12，2018 年 9 月 28 日，第 19 页。
36 科斯肯尼米·M，从道歉到乌托邦:国际法律论战架构(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第 184-85 页。
37 2015 年 GGE 报告中，各国在国家责任和尽职调查方面存在差异，此类主题被纳入了规范、规则和原则部分。联合国，A/70/174(注 30)，第 13 段。
38 联合国，A/66/152(注 4)，第 18 页。
39 俄罗斯提出的联合国大会第 73/27 号决议(注 5)，以 119 票赞成、46 票反对、14 票弃权获得通过。美国提出的第 73/266 号决议(注 12)以 138 票赞成、12 票反对、16 票弃权获得通过。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3 届会议，第 45 次全体会议，A/73/PV.65，2018 年 12 月 5 日，第 4 页;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3 届会议，第 65 次全体会议，A/73/PV.65，2018 年 12 月 21 日，第 14 页。
40 相关国家名单，见蒂克·E 和克图宁·M，共生：相持中的网络外交，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NUPI)报告编号.5/18 (NUPI: 奥斯陆，2018)，附件 A。
41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53 届会议，第一委员会，1998 年 9 月 23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致秘书长的信，A/C.1/53/3，1998 年 9 月 30 日，附件，第 3 (c)段。
42 联合国大会第 53/70 号决议(注 5)。
43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政府专家组关于国际安全框架下信息电信领域发展的报告，A/68/98, 2013 年 6 月 24 日，第 19 段。
44 联合国，A/68/98(注 43)，第 16 段。
45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2 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7 次会议，A/C.1/72/PV.7，2017 年 10 月 9 日，第 21 页。
46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2 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10 次会议，A/C.1/72/PV.10，2017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日，第 3 页。
47 斯特雷佐夫·A 和斯米尔诺夫·A，俄美在国际信息安全领域的合作:优先领域的建议，梅兹杜纳罗德那亚·日涅，2017 年 11 月，第 72-81 页。
48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2 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3 次会议，A/C.1/72/PV.3，2017 年 10 月 3 日，第 15 页。
49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2 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4 次会议，A/C.1/72/PV.4，2017 年 10 月 4 日，第 11 页。
50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2 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9 次会议，A/C.1/72/PV.9，2017 年 10 月 23 日，第 7 页。
51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2 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20 次会议，A/C.1/72/PV.20，2017 年 10 月 23 日，第 11 页。
52 阿雷西尔德·A，爱沙尼亚籍，联合国安理会传达了什么信息? 佩德, 2018 年 9 月 20 日(作者翻译)。见波罗的海国家通讯社，“主席:爱沙尼亚可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网络安全问题”，2018 年 8 月 12 日。
53 联合国,A/C.1/72/PV.20(注 51)，第 15 页。
54 联合国,A/C.1/72 / PV.19(注 8)，第 23 页。
55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2 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6 次会议，A/C.1/72/PV.6，2017 年 10 月 6 日，第 23 页。

56 联合国大会第 73/266 号决议(注 12)，第 5 段。
57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16 年 4 月 27 日关于在处理个人数据及此类数据自由交换的第 2016/679 号条例（欧盟），废除第 95/46/EC 号指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欧盟官方公报，L119，2016 年 5 月 4 日；以及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16 年 7 月 6 日关于欧盟网络和信息系统高度通用安全措施的第 2016/1148 号指令，欧盟官方公报欧盟，L194，2016 年 7 月 19 日。
58 欧洲联盟理事会(注 33)。
59 见爱沙尼亚在联合国的评论，A/C.1/72/PV。20(注 51)，第 12 页。
60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常设理事会，“欧安组织为减少因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而产生冲突风险，而采取的初步建立信任措施”，决议 No.1106, PC.DEC/1106, 2013 年 12 月 3 日；
OSCE，常设理事会，“OSCE 建立信任措施以减少因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而产生冲突风险”，决议 No.1202 号，PC.DEC/1202，2016 年 3 月 10 日。
61 OSCE 与佛罗伦萨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系，分析最初执行的一套建立信任措施，以减少因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而产生冲突的风险(费伦泽大学出版社:佛罗伦萨，2017)。
62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大西洋理事会，“布鲁塞尔首脑会议宣言”，NATO 新闻公报(2018) 074, 2018 年 7 月 11 日，第 2 段。
63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注 62)，第 20 段。
64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注 62)，第 29 段。
65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欧盟，“欧盟与北约合作联合声明”，NATO 新闻稿 No.(2018) 095, 2018 年 7 月 10 日。
66 东盟-美国领导人关于网络安全合作的声明，新加坡，2018 年 11 月 15 日。
67 2017 第 67 届全球网络空间大会 (GCCS)，“主席声明-摘要”,2017 年 11 月 24 日;卡斯帕·L，“GCCS2017: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网络空间(但主要是安全)”，全球合作伙伴数字, 2017 年 11 月 29 日。
68 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
69 全球网络专家论坛，“框架文件”，2016 年 4 月 16 日。
70 施米特·M·N(编辑)，适用于网络行动的塔林国际法手册(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
71 施米特·M·N(编辑)，适用于网络行动的塔林国际法手册 2.0(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
72 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高级别咨询委员会，“乌镇——展望 2018”，2018 年 11 月 9 日，第 5 点。
73 联合国,A/C.1/72/PV.19(注 8)，第 24 页。
74 巴黎呼吁网络空间信任与安全，2018 年 11 月 12 日；法国欧洲和外交部，“网络安全:2018 年 11 月 12 日在巴黎召开网络空间信任与安全会议”;法新社，“巴黎呼吁”:51 个国家承诺支持全球网络武器规则”，法国 24 小时电视台，2018 年 11 月 12 日。
75 史密斯·B，微软总裁，“数字日内瓦会议的必要性”，主题演讲，RSA 大会，旧金山，加州，2017 年 2 月 14 日。
76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CRC)，数字技术与战争，2017 年 6 月 27 日。
77 联合国，A/66/152(注 4)，第 15 页。
78 联合国，A/C.1/72/PV.20(注 51)，第 11 页。
79 联合国，A/73/PV.6(注 32)，第 3-4 页。
80 联合国，A/73/PV.6(注 32)。
81 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新技术战略(联合国:纽约，2018 年 9 月)，第 9 页。
82 联合国(注 81)，第 3 页。
83 联合国，“秘书长数字合作高级小组”。
84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2 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2 次会议，A/C.1/72/PV.2，2017 年 10 月 2 日，第 8 页。关于不结盟运动的简要说明及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 B 第 1 节。
85 克顿·M 和蒂克·E，“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致力于发展”，网络政策研究所，2018 年 12 月。
86 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规范解读，见克顿·M 和蒂克·E，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规范分析(欧盟安全研究所:巴黎，即将于 2019 年出版)。

第十章. 军民两用和武器贸易管制

概述

2018 年，全球、多边和地区层面都在继续加强对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常规、生物、化学和核武及其运载系统的贸易管制。旨在为武器及军民两用品贸易构建通用标准的各类国际和多边机制越来越多，最近逐渐稳定下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机制效力正日益受到国家资源紧张的考验。未能遵守 2013 武器贸易条约(ATT)规定提交报告的国家越来越多；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的事件越来越多；找到愿意担任某些出口管控机制主席国的国家越来越难。更为宽泛的地缘政治紧张和科技进步步伐加快，国际社会对出口管控有效性的广泛共识也日益面临挑战。美国和欧盟以及欧盟内部，对于出口管控机制目标都存在分歧，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同时各国也对其他机制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利用对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防扩散和其他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手段。

2018 年 8 月，ATT 第 4 届缔约国会议在东京举行(见第 1 节)。大会可以对分歧所在进行集中梳理，同时也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讨论信托基金的管理事宜，支持低收入国家参与和条约体系构建的其他相关事务。此外，对 ATT 报告及资金义务的遵守方面仍显不足，这对 ATT 的长期健康发展构成严重挑战。近年来，为实现 ATT 普世性做出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截至 2018 年年底，共有 100 个缔约国，尽管在地域分布上还不均衡。

2018 年共有 36 项多边武器禁运生效：联合国 14 项，欧盟 21 项，阿盟 1 项(见第 2 节)。欧盟的 21 项禁运中，有 10 项是直接执行联合国禁运，1 项是在联合国对等禁运之前就开始执行，2 项类似联合国禁运但在地域覆盖和武器类别上存在差异，8 项并无联合国对等禁运。

大多数禁运只涉及常规武器。然而，联合国和欧盟对伊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禁运，欧盟对俄罗斯和叙利亚禁运，还包括军民两用物出口禁运。2018 年，联合国对南苏丹实施一项新多边武器禁运。联合国和欧盟于 2009 年对厄立特里亚的武器禁运已经解除。同前几年一样，联合国调查发现大量禁运执行问题，报告多起违反禁运事件。

四大多边出口管制机制：澳大利亚集团(化学和生物武器)、导弹技术管制机

制，核供应国集团和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协议——在2018年审查了各自贸易管制清单及准则(见第3节)。同往年一样，上述机制的共同点集中在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同时打击非法军购。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又使得局面更为复杂。最后，对于每年均设轮值主席的机制，找到愿意接棒主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同时执行上述4项机制，欧盟为军民两用品出口、经纪、过境和转运建立了一套通用法律框架(见第4节)。欧盟是唯一制作这类框架的区域组织。2018年，欧盟各机构继续致力于“重构”欧盟军民两用品条例，并开始审视欧盟在武器出口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在这两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和欧洲议会都试图扩大此类机制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强化其在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措辞。这些做法也招致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对。

2018年，美国、欧盟和一些欧盟成员国采取措施，加强FDI管控在敏感或战略技术转让中的作用(见第5节)。国家和多边军民两用品及武器出口管控的一个核心就是技术转让管控。军事新兴技术在民用部门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外对相关公司和研究机构投资不断加大，使得出口管控长期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然而，利用FDI条例限制技术贸易的做法，可能会被视为

进一步坐实各国以管控机制为名，谋经济利益之实。从长远来看，管控机制作为军民两用品及武器转让的稳定器的作业也会因此而受到损害。

马克·布罗姆利

第 1 节.武器贸易条约

马克·布罗姆利、科莉亚·布罗克曼和乔瓦娜·马莱塔

2013 年武器贸易条约(ATT)是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旨在制定规范常规武器贸易和防止非法武器转让的标准。[1]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有 100 个国家加入 ATT，35 个国家签署但尚未批准。2018 年，6 个国家批准了该条约，包括巴西、喀麦隆、智利、几内亚比绍、莫扎姆-比克和苏里南。较 2017 年的 3 个国家有所增加。[2]

继日内瓦举行两次筹备会议之后，第 4 届缔约国会议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24 日在东京举行，日本大使高川信孝担任主席。111 个国家以及 39 个区域和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研究所、行业协会和国家执行机构出席会议。会议涉及七大领域：（a）条约执行；（b）透明度和报告；（c）条约普及化；（d） 国际援助；（e）秘书处工作；（f）ATT 财政捐助状况以及财政状况改善；（g）CSP5 筹备工作。[3]

就第 4 届缔约方会议筹备和大会本身，人们都试图将注意力从条约架构技术问题转至条约具体执行层面，如条约执行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练习，努力避免和弥合彼此在常规武器禁运上存在的分歧。然而事与愿违，CSP4 相当一部分精力并未放在更为实质性的执行层面，而是继续流于拖缴会费、报告提交以及 ATT 技术秘书处权限等问题的讨论之上。此外，尽管对条约普及、外联和援助给予了高度重视，但 ATT 在地理分布上依旧极不平衡。同其他地区相比，更多着力于欧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美洲地区。

本节对 2018 年 ATT 相关大事件和辩论进行了总结。首先着眼于条约执行情况，尤其是存在的各类分歧。然后重点讨论条约机制、各国国家报告和财政捐助的不足，以及 ATT 秘书处职权范围的讨论。最后，讨论了条约普及化及援助问题，重点为中东和北非地区--ATT 参与度相对较低的地区。

条约执行

分歧所在--通常被定义为“将物品从授权所有者/用户转移到未授权用户”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各类多边出口管控机制的核心问题。[4]然而，这方面的

讨论大多集中在对“最终使用”或“最终用户”的管控之上，其中包括武器接收国同意限制其进口武器最终用途。[5]而 ATT 将转移定义为可发生在转让的所有阶段均可能出现的情况。从这一逻辑框架起点出发，CSP4 自筹备到举行始终备受关注。

条约有效执行工作组(WGETI)报告，在 CSP4 召开之前分发，报告强调了武器供应链中各种潜在转移点。报告还强调进口商、出口商，过境国和转运国都可限制此类风险，并提出各国可采取措施，做到案件信息共享。[6]CSP4 分组讨论会上，就将武器转移给未经授权最终用户/用途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在东京举行了很多相关活动。[7]最后，联大于 2018 年晚些时候通过一项决议，批准在 ATT 中使用鼓励各国“防止和应对常规武器和弹药转移至未经授权的最终用户/用途”的措辞。[8]

WGETI 在两届大会闭会期间的海量工作、闭会期间讨论(工作组和小组主席协助下)中，最终用户/用途转移只占到其工作的一小部分。WGETI 第 10 条款(转移用途)工作组，第 6/7 条款(禁止及出口评估)，第 5 条款(全面执行)工作组得出结论，条约的有效执行有赖于长期持续推进。这也应该包含国家管控系统的经验交流，更多着力性别暴力，继续狠抓各类转移用途手法应对，同时还需进行具体的风险评估。[9]

全年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缔约国提供资源，促进条约有效执行。为实现这一目的，各小组都进行了参考文件清单汇编，以协助条约全面执行，进行风险评估，在某些条件下，遵守第 6 条款义务，处理禁止武器出口和处理转移用途问题。[10]此外，缔约国首先制定了一份关于建立国家贸易管制制度的指导意见清单，并为新缔约国确立“欢迎礼包”，以促进条约执行。[11]

同前几年一样，NGO 协调一致，见工作重心转至筹备会同时 CSP4 讨论的重点也转到特定武器转让以及转让是否合规的问题上来。然而在 CSP4 上，缔约国同 NGO 就参与也门战争的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主体转让武器的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较前两次 CSP 会议缓和很多。[12]

条约机制

尽管已在东京开展实质性工作，但 CSP4 也强调了 ATT 在今后将面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提交两份报告的缔约国数量比例持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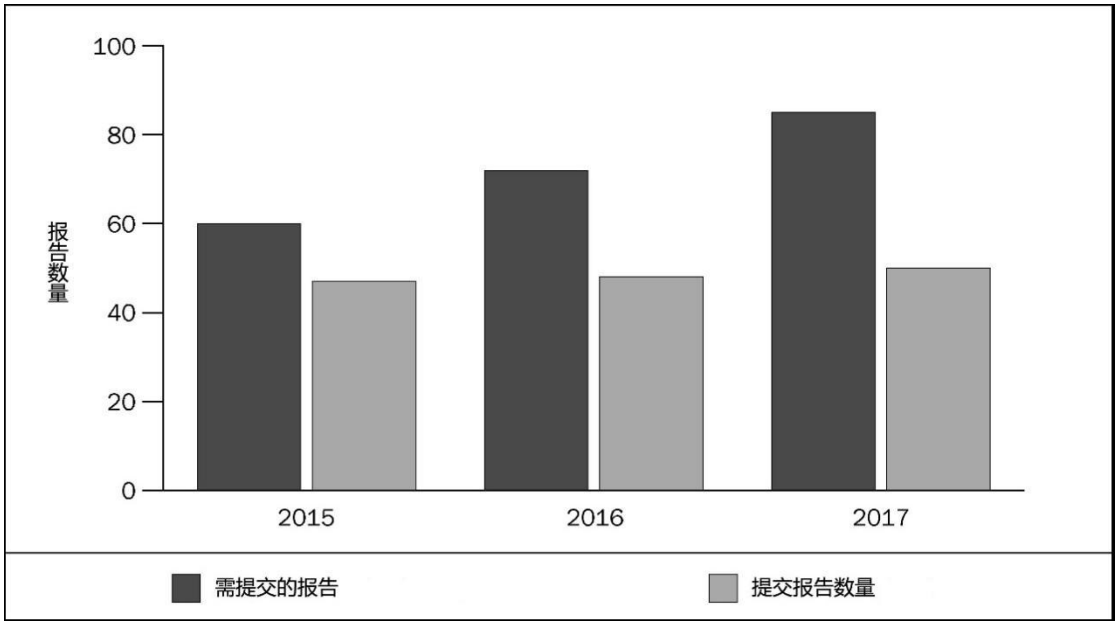


图10.1 提交年度报告的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数量，2015-17

注：年份是指报告提交时间，而非报告所述年份。
资料来源：ATT秘书处，“年度报告”。

条约批准后一年内，每个缔约国都有义务向 ATT 秘书处提交一份初次报告，详细说明“为执行本条约而采取的措施”。[13]截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应提交初次报告的国家中有 28%未能提交初次报告。[14]尽管这一数据令人失望，但仍较 2018 年 3 月有所改善，当时有 32%的国家未提交报告。[15]然而，尽管 CSP4 上有些国家的管控体系进步明显，但自初次提交报告以来，也只有瑞典一个国家更新了初次报告。

ATT 缔约国还必须提交一份武器进出口年度报告。[16]尽管报告工作难度极大，整个 2018 也在一直努力，尤其是透明度和报告工作组(WGTR)，可是提交报告的国家比例还是在继续下降。截至 2019 年 1 月 9 日，2015 年被要求提交报告的 60 个国家中，只有 47 个国家(78%)提交了 2015 年报告，2017 年被要求提交报告的 85 个国家中，只有 50 个国家(59%)提交了报告(见图 10.1)。[17]

所有 ATT 缔约国和签字国以及作为观察员出席 CSP 的国家都必须提供财政捐助，以支付 CSP 组织费用及 ATT 秘书处工作费用。然而，仍有相当数量国家未缴纳其分摊会费。[18]截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140 个应缴纳会费国家中有 64 个国家拖欠会费，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延续，累积赤字将达 338572 美元。[19]这无疑将损害 ATT 信誉和 ATT 秘书处开展工作。CSP4 最终报告“呼吁拖缴国家尽快履行

其缴费义务”，并强调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ATT 运作将面临风险。[20]

在 CSP4 最后一天，大会出现分歧---为了使发展中国家能参与 ATT，究竟谁应该掌管捐助方案制定？CSP1 决定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管理该方案。[21]然而，2018 年初，人们一致认为 ATT 秘书处现在可自行掌管。然而，墨西哥为首的一些国家坚持继续由 UNDP 掌管，理由就是 ATT 秘书处还缺乏此类管理经验。[22]各国最终同意将责任移交 ATT 秘书处。[23]除此之外，还有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地域之争，基本也再无其他争议。

各国就一份详细的成果文件达成一致，成果文件全面规划了 CSP5 前工作计划。CSP5 计划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至 30 日举行。拉脱维亚在 2018-19 年期间当选 ATT；轮值主席国，并至 CSP5 大会期间，尤尼斯·卡里什大使担任主席。防止性别暴力，将是拉脱维亚担任主席国期间的工作重心。[24]

表 10.1. 按区域分列武器贸易条约批准国、加入国和签字国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地区	国家数量	缔约国数量	签字国数量	未签字国数量
非洲	53	25	14	14
美洲	35	26	3	6
亚洲	29	3	7	19
欧洲	48[a]	41	2	5[a]
中东	16[b]	1[b]	5	10
大洋洲	14	4	4	6
合计	195	100	35	60

注：本条约开放供签字，自2014年12月生效。既有签字国可接受、批准或核准该条约，以便成为缔约国。非签字国现在必须直接加入该条约，才能成为缔约国。

[a] 数据含罗马教廷。

[b] 数据含巴勒斯坦

资料来源：联合国，条约汇编。

条约普及推广和国际援助

扩大签字国和缔约国数量依旧是 ATT 工作的重中之重。从目前情况看，ATT 的参与在地域分布上并不均衡。就签字国和缔约国数量而言，中东和亚洲的代表性尤为不足(见表 10.1)。

CSP4 大会期间，各国讨论了推广条约的各种策略。根据条约推广工作组(WGTU)联合主席提交报告，缔约国同意在 CSP5 之前 WGTU 采取的若干相关举措。[25]其中包括开发一个“普及工具包”，厘清 ATT 适用范围并阐明加入条约将会面临的挑战。[26]CSP4 最终报告欢迎 WGTU 的建议，坚持不懈的同议会接触以“推动

国内批准进程”。[27] 最后，CSP4 强调以缔约国数量最少的地区为目标，意义十分重大。联席主席建议侧重亚洲和非洲的时候，WGTU 也强调条约普遍性的重要性。[28]

如上文所述，中东和北非参与度依旧极低。[29] 北非四国都不是 ATT 缔约国，只有利比亚签署了 ATT。中东 15 个国家中，巴勒斯坦是唯一的 ATT 缔约国，而巴林、以色列、黎巴嫩、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在条约签字。黎巴嫩议会于 2018 年 9 月批准了 ATT，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交存批准书。[30] 这种低参与度水平也折射出中东地区许多国家对 ATT 的忌惮。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对 ATT 谈判结果表示不满。埃及、伊朗和叙利亚表达出 ATT 对其国防构成的潜在威胁。[31] 然而，中东和北非是最急需有效控制武器转让和 SALW 的地区之一，原因就是这一地区国家面临各种安全威胁，其背后就是暗流涌动的武器转让和武器扩散。最为典型的就是冲突后武器散落和非国家行为者武器转移。[32]

ATT 另一个目标是提供援助，以支持各国提升或构建国家武器转让管控体系。为此，ATT 计划设立自愿信托基金(VTF)，以协助缔约国呼吁国际援助，执行条约。[33] 基金由 CSP2 于 2016 年正式成立，并由 ATT 秘书处在 VTF 甄选委员会协助下进行管理。[34] 自成立以来，VTF 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经历了两个轮回，为 24 个项目提供了资金。[35] 2018 年 10 月发布了第三个周期(VTF 周期 2019)项目建议书征集。[36] 在第四个周期期间，缔约国重申支持 VTF 实施，并继续讨论如何改进其运作和管理：如根据基金甄选委员会建议，制定 VTF 项目评估指导意见。[37] VTF 职权范围规定，“缔约国在双边基础之上或是其他渠道，避免与 UNSCAR[联合国支持军备管控合作信托基金]的重叠/重复。”[38] 但是，如火如荼的援助活动可能会让 VTF 再无动力，很难在既有工作基础之上再接再厉。为解决这一问题，VTF 和欧盟成员国代表就 VTF 欧盟外联伙伴关系展开讨论，其目的就是避免出现重复工作。[39] ATT 秘书处 HIA 定期与 UNSCAR 联系，在 VTF 援助项目筛选阶段就可避免出现项目重叠。[40]

1 关于武器贸易条约摘要及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2001 年《联合国枪支议定书》也同样具有法

律约束力，但仅涵盖对枪支贸易的管制。2001 年 5 月 31 日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联合国枪支议定书)作为联合国大会第 55/255 号决议，2005 年 7 月 3 日生效。
2 当时 97 个缔约国中，79 个缔约国和 38 个签署国中的 22 个国家出席了第 4 次 CSP，其¾出席占比同前两次 CSP 会议大致相同。此外，中国、加拿大等 8 个观察国出席会议。《武器贸易条约》，第 4 次缔约国会议，“最终报告”，ATT/CSP4/2018/SEC/369/Conf.FinRep.Rev1，2018 年 8 月 24 日，第 2-4 页。
3《武器贸易条约》，第四次缔约国会议，“CSP4 临时附加说明工作方案”，ATT/CSP4/2018/SEC/350/Conf.AnnPoW，2018 年 7 月 20 日。
4《武器贸易条约》，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处理常规武器转移问题”，ATT/CSP4.WGETI/2018/JPN/312/M2.JAPArt11，2018 年 5 月 25 日，第 1 页。
5 瓦森纳协定，“军事设备清单出口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管制简介”，经全体会议商定，2014 年 7 月 3 日。
6《武器贸易条约》，ATT 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主席提交 CSP4 报告草稿”，ATT/CSP4.WGETI/2018/Chair/355/Conf.Rep，2018 年 7 月 20 日，附件 D；布罗姆利·M，“武器贸易条约现状：推进国际援助和非法转移努力”，SIPRI，和平博客，2018 年 8 月 29 日。
7《武器贸易条约》，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注 4）。
8 联合国大会，《武器贸易条约》，第 73/36 号决议，2018 年 12 月 5 日通过，A/RES/73/36，2018 年 12 月 11 日。
9《武器贸易条约》，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注 6）。
10《武器贸易条约》，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注 6），附件 A、B、C、D、E 和 G。
11《武器贸易条约》，有效执行条约工作组（注 6），附件 F。
12 布罗姆利·M (注 6)。
13《武器贸易条约》(注 1)，第 13（1）条。
14 ATT 秘书处，“初步报告：截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情况”。
15 布罗姆利·M 和布罗克曼·K，“武器贸易条约”，SIPRI 年鉴 2018，第 405-12 页。
16《武器贸易条约》(注 1)，第 13（1）条。
17 ATT 秘书处，“年度报告：截至 2019 年 1 月 9 日情况”。关于各国根据附件和其他国际机制提交的武器转让报告，见本卷第 5 章第 4 节。
18 关于未能缴纳分摊会费以支持其他国际军备控制机制所面临的挑战，见戴维斯·I 和
费尔布鲁根·M，《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国家武器研究所年鉴 2018，第 383 页。
19 ATT 秘书处，“截至 2018 年 11 月 14 日 ATT 预算情况”。
20《武器贸易条约》，第四次缔约国会议，“最终报告”，ATT/CSP4/2018/SEC/369/
Conf.FinRep.Rev1，2018 年 8 月 24 日，第 8 页。
21《武器贸易条约》，第 4 次缔约国会议，“ATT 预算计划：审议当前安排”，
ATT/CSP4.MC/2018/MC/354/Conf.SponsProgr，2018 年 7 月 20 日，第 1 页。
22Reaching Critical Will(网站)，《摘要》，ATT 监督，第 11 卷，第 5 期（2018 年 8 月 26 日）。
23《武器贸易条约》，第 4 次缔约国会议（注 20）。
24 武器贸易条约，“主席”。
25《武器贸易条约》，ATT 条约普遍化工作组，“共同主席提交 CSP4 报告草案”，ATT/CSP4.WGTU/2018/CHAIR/356/Conf.Rep，2018 年 7 月 20 日；以及《武器贸易条约》，第四次缔约国会议（注 20）。
26《武器贸易条约》，ATT 条约普遍化工作组（注 25）；和《武器贸易条约》，第四次缔约国会议（注 20）。
27《武器贸易条约》，第四次缔约国会议（注 20）。
28《武器贸易条约》，第四次缔约国会议（注 20）；和《武器控制》，“每日摘要：第三天，2018 年 8 月 22 日”，第四次缔约国会议，东京，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24 日。关于 ATT 在亚洲的状况和在该区域实施相关援助的概述，见布罗姆利·M 和布罗克曼（注 15）。
29 就本章而言，中东包括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北非包括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和突尼斯。
30 美联社，“黎巴嫩议会批准武器贸易条约，激怒了真主党”，国防新闻，2018 年 9 月 25 日。
31 布罗姆利·M，马莱塔·G 和布罗克曼·K，“中东北非武器转让和 SALW 管控管制：
绘制能力建设路线图”，SIPRI 背景文件，2018 年 11 月，第 8-9 页。
32 布罗姆利·M（注 31）。
33《武器贸易条约》(注 1)，第 16(3)条；和《武器贸易条约》，第二届缔约国大会，“最终报告”，ATT/CSP2/2016/5，2016 年 8 月 26 日。
34 ATT 秘书处，“ATT 自愿信托基金的职权范围”，
ATT/VTF18/2018/SEC/251/ToR.Cons.Dr.v1.Rev1；布罗姆利·M，“《武器贸易条约》”，SIPRI 年鉴 2017，第 583-87 页。
35《武器贸易条约》，自愿信托基金，“ATT 自愿信托基金(VTF)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间工作报告”，ATT/VTF/2018/CHAIR/359/Conf.Rep，2018 年 7 月 20 日,关于 VTF 项目概述，见《武器贸易条约》，“自愿

信托基金”。
36《武器贸易条约》，自愿信托基金（注 35）。
37《武器贸易条约》，第 4 次缔约国大会(注 20)；《武器贸易条约》(注 35)。
38 ATT 秘书处(注 34)。
39《武器贸易条约》，自愿信托基金（注 35）。
40 武器贸易条约，自愿信托基金，“ATT 自愿信托基金（VTF）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间工作报告”，ATT/VTF/2017/CHAIR/163/Conf.Rep，2017 年 8 月 29 日；和马莱塔·G，“协调武器转让和 SALW 管制援助：ATT 自愿信托基金的作用”武器贸易条约？，SIPRI 和平博客，2019 年 3 月 27 日。

第 2 节.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多边禁运

马克·布罗姆利和彼得·韦泽曼

2018 年共有 36 项多边武器禁运生效：联合国 14 项，欧盟 21 项，阿盟 1 项(见表 10.2)。[1]欧盟有 10 项禁运为直接执行联合国武器禁运，1 项为联合国禁运之前就已开始执行，2 项类似联合国禁运，但在地理范围和武器类型上存在差异，8 项无联合国对等禁运。[2]阿盟对叙利亚的武器禁运并无联合国对等制裁。

2018 年，联合国对南苏丹实施一项新多边武器禁运。2018 年，联合国解除了对厄立特里亚的武器禁运，欧盟武器禁运也随之解除。

大多数多边禁运只涉及常规武器及相关商品及服务。然而，4 项禁运还涉及某些“军民两用品”——可用于民用目的及可用于生产、维持或操作常规、生物、化学和核武器的商品、软件和技术。联合国和欧盟对伊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的禁运适用于核供应国集团(NSG)和导弹技术管制制度(MTCR)管控清单上的军民两用品。欧盟对俄罗斯联邦的禁运适用向军事终端用户转让欧盟军民两用品的所有品类。

2018 年，联合国安理会指派联合国武器禁运执行监控调查团也折射出禁运执行面临林林总总各色挑战。与联合国武器禁运不同，欧盟和阿盟武器禁运并无专门的监督组织进行系统性监督。

本节回顾了联合国对南苏丹的新武器禁运、联合国对厄立特里亚解除武器禁运、联合国某些武器禁运的执行情况以及欧盟武器禁运的推进情况。

表 10.2 2018 年期间执行的多边武器禁运

被禁运方 a	最早实施禁运的日期	2018 年主要变动
联合国武器禁运		
CAR(部分)	2013/12/5	延长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刚果民主共和国(部分)	2003/7/28	延长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厄立特里亚	2009/12/23	2018 年 11 月 14 日解除
伊朗(部分)	2006/12/23	
伊拉克(NGF)	1990/8/6	
ISIL,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个人及团体	2002/1/16	
朝鲜	2006/7/15	
黎巴嫩(NGF)	2006/8/11	
利比亚(部分)	2011/2/26	

索马里(部分)	1992/1/23	延长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
南苏丹	2018/7/13	新禁运
苏丹(达尔富尔)(部分)	2004/7/30	
也门(NGF)	2015/4/14	延长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
塔利班	2002/1/16	
欧盟武器禁运		
基地组织，塔利班及其相关个人和团体*	1996/12/17	
白俄罗斯	2011/6/20	延长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中国 b	1989/6/27	
CAR(NGF)*	2013/12/23	
刚果民主共和国(NGF)*	1993/4/7	
埃及 b	2013/8/21	
厄立特里亚*	2010/3/1	2018 年 12 月 12 日解除
伊朗	2007/2/27	
伊拉克(NGF)*	1990/8/4	
朝鲜	2006/11/20	
黎巴嫩(NGF)*	2006/9/15	
利比亚(部分)*	2011/2/28	
缅甸	1991/7/29c	延长至 2019 年 4 月 26 日，且禁运范围扩大
俄罗斯	2014/7/31	延长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索马里(部分)*	2002/12/10	
南苏丹	2011/7/18	
苏丹	1994/3/15	
叙利亚	2011/5/9	
委内瑞拉	2017/11/13	
也门(NGF)*	2015/6/8	
津巴布韦	2002/2/18	延长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
阿拉伯国家武器禁运		
叙利亚	2011/12/3	

* =欧盟直接实施联合国禁运；ISIL=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NGF =禁运适用于非政府部队（如果满足某些条件，可允许将武器转移到目标国家）。
a 自最早实施此项制裁以来，被制裁方可能发生了变化。此处所列为 2018 年底状况。
b 欧盟对中国和埃及的禁运是政治承诺，而其余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
c 欧盟及其成员国于 1990 年首次对缅甸实施武器禁运。
资料来源：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欧盟委员会，“现行限制措施（制裁）”。SIPRI 武器禁运档案，详细介绍了自 1950 年以来生效的大多数多边武器禁运及相关修订。

联合国武器禁运

南苏丹

2018 年 7 月，联合国安理会对向南苏丹实施禁运，禁止供应“所有类型”常规武器和军事装备。[3]这是自 2015 年以来联合国首次实施的新武器禁运，如无延期，禁运期将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

武器禁运是针对南苏丹民族团结过渡政府(TGNU)与反对派武装之间的冲突而实施。冲突始于 2013 年，造成重大生命损失、粮食危机和饥荒，400 多万人

流离失所。[4]冲突伊始，安理会就一再呼吁对南苏丹交战各方实施武器禁运。2011年南苏丹宣布独立，欧盟对南苏丹实施武器禁运。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GAD)2014年威胁对南苏丹实施武器禁运，在促成和平协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5]非盟(AU)呼吁联合国在2015年实施禁运。[6]但是吃完唯一一次试图通过安理会决议实施禁运，却无疾而终。[7]

武器禁运实施之前，联合国在2015年指派一个专家小组来监测南苏丹局势。专家小组还负责收集“阻碍达成最终和平协议政治进程或参与违反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个人和实体信息”。[8]2018年4月，专家小组得出最终结论：武器弹药通过东非各种渠道进入南苏丹。此外，南苏丹安全部门军购还在继续，但更多的是转为秘密路线进行。然而，反对派武装却几乎没有武器弹药来源，反击能力几乎丧失殆尽。[9]

安理会武器禁运决议以9票赞成、6票弃权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同2016年一样，中国和俄罗斯弃权，而未选择行使否决权。2016年以来，美国就一直强烈支持实施武器禁运，是禁运决议的主要提案国。美国认为，尽管仍需继续努力推动和平谈判，但遏制暴力需立刻停止南苏丹武器输入。此外，美国坚称，武器禁运也是安理会对和平进程迟迟不见效果的一种表态。[10]弃权国则指出，实施制裁同参与和平谈判的两个区域组织立场相悖。诚然IGAD和非盟此前曾主张武器禁运，但时至2018年，它们表示，在南苏丹和平进程取得明显进展之际，现在实施制裁显然是百害而无一益。[11]

厄立特里亚

2018年11月，联合国解除了对厄立特里亚的所有制裁，其中包括武器禁运。2009年实施制裁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联合国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察组证据收集，表明厄立特里亚向索马里境内武装团体，特别是青年党提供了政治、财政和后勤支持。第二，厄立特里亚拒绝从与吉布提接壤的有争议领土撤军，并拒绝就此问题进行外交对话。[12]

解除制裁也是基于上述两个问题的发展做出反应。[13]首先，安理会的结论是，联合国监测组最近的报告并未发现任何确凿证据表明厄立特里亚支持青年党。[14]其次，厄立特里亚目前已与吉布提展开对话，两国总统于2018年9月举行会晤。[15]此外2018年，厄立特里亚恢复了与埃塞俄比亚外交关系，和平协议尘埃落定，

自 1998-2000 年的边境战争以来，打打停停，20 年的干戈终化为玉帛。[16]

联合国武器禁运执行

联合国禁运执行监督小组和专家强调 2018 年出现了三类禁运违规现象。第一，有直接违反禁运交付武器的情况。与往年一样，大规模输出武器案件固然不多，但蚂蚁搬家式的小批量走势却屡禁不止。第二，有些国家未事先提交武器转让通知或请求批准。一些联合国武器禁运允许向政府军转让武器，但需提前告知联合国制裁委员会或安理会批准。然而，执行情况却很不乐观，有时武器出口国根本不遵守禁令。第三，有报告表示，按照通知或许可流程交付的武器却最终流入非国家武装团体之手。联合国的几项武器禁运要求或鼓励各国完善出口对象国武器管理标准，以杜绝上述现象的发生，但往往收效甚微。

联合国监督小组或安理会指派专家，根据 2018 年中非共和国(CAR)、利比亚和索马里武器禁运执行情况编写的报告，便是最佳例证。

中非共和国

联合国对 CAR 的武器禁运禁止对非国家武装团体转让武器，但允许向政府安全部队出口武器装备，条件是事先得到联合国制裁委员会的批准。联合国 CAR 禁运问题专家小组公告了两大非国家武装团体——CAR 复兴人民阵线(FPRC)和 CAR 和平联盟(UPC)。

专家小组观察到，人们频繁看见 UPC 和 FPRC 武装分子手持手枪、突击步枪、榴弹发射器和车载机枪。其中许多武器似乎是从苏丹获取。苏丹武器贩子利用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开展的收缴武器运动，从苏丹战斗人员手中获取武器弹药，并将其倒卖给 CAR 武装派别。如联合国小组提及 2018 年 4 月查获的一起案件，UPC 从苏丹境内获得了 200 支突击步枪、6 支机枪和 25000 发子弹。[17]

小组报告，核准机制运行良好。制裁委员会事先批准俄罗斯和法国武器捐赠武器，以及中国、美国、法国和比利时提供车辆和其他非致命装备。[18]专家小组注意到，向 CAR 安全部队提供的武器达到五年最高水平。这也表明，武器禁运并未阻止 CAR 政府获取武器。[19]同时也说明，有必要严格执行禁令，有助于确保对进入该国的武器装备进行有效监管，并构建相应的武器装备库存管理识别国家标准体系。

尽管如此，CAR 政府还是对武器禁令愤愤不平。和几年前一样，CAR 政府官员辩称，为解决 CAR 危机，必须全面解除对 CAR 武器禁令。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也呼吁在 2018 年取消武器禁令。[20]

利比亚

联合国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禁止向非国家武装团体转让武器，但允许向国际公认的民族团结政府(GNA)输送武器，前提是必须事先得到联合国制裁委员会批准。同前几年一样，利比亚禁运问题专家小组报告一些案件，似乎都是未经事先批准而交付武器，而各国都没有按照制裁委员会的要求，对可能违规事件作出书面回复。[21]阿联酋(UAE)向利比亚国家军队(LNA)交付一艘巡逻船，该巡逻船曾注册在溢价阿联酋公司名下。阿联酋对制裁委员会的问询置若罔闻。[22]据报道，摩尔多瓦货机被用于 LNA 下辖武装组织，摩尔多瓦也为给出确切答复。[23]

专家组同时注意到，专家组同 GNA 之间的互动并未能改善核准机制下武器接收国的武器管理水平。专家组支出，自 2011 年武器禁运实施以来，联合国制裁委员会按照批准程序共核准 6.5 万支突击步枪、6.2 万支手枪、1.5 万支冲锋枪、8 000 具榴弹发射器、4 000 支机枪和 6000 多万发子弹的豁免申请。尽管上述武器并非全部兑现交付，但其中大多至今下落不明。此外，尽管面对海量的豁免申请，GNA 依旧表示手中的武器严重短缺。这也使得专家小组笃信，武器要么就是未实际交付到核准接收者手中，要么就是在抵达利比亚后被转卖至其他终端用户。[24]

索马里

联合国对索马里武器禁运禁止向非国家武装组织转让武器，但允许向政府安全部队输送武器。但是索马里政府必须在任何转移物质运抵之前告知联合国制裁委员会，并提交一份书面交付报告。[25]此外，还要求索马里政府每半年向联合国制裁委员会提交其武器库管理标准和操作报告。

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监督小组记录了 2018 年的几起非法武器流入索马里案件。邦特兰仍然是武器第一大入境点，其中大部分从也门经由海路运抵，背后是当地同胡塞武装相互勾结的走私网络。[26]2017 年 9 月，邦特兰海警部队截获一批货物，载有中国和塞尔维亚制武器。这批武器世界为 2015 年和 2016 年交付阿联

酋和沙特阿拉伯。[27]

2017 年和 2018 年，索马里政府共接收到来自中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吉布提和美国等多个供应商的武器。[28]虽然上述武器转让均事先提交通知或在交付后报告，但没有一次交付完全符合通知流程。监督小组发现，尽管有所改善，但武器库管理和操作依旧松散。特别是，报告指出“武器库内部记录不一致”和“缺乏有效库存管理能力”。[29]专家小组还发现有证据表明，2017 年交付索马里政府的武器被倒手至该国军火贩子。虽然大部分外流武器都是安全部队内部个别成员蚂蚁搬家式的监守自盗，但是也找到了高级官员参与了大规模转移武器的证据。[30]

欧盟武器禁运

缅甸

1991 年以来，欧盟一直对缅甸实施武器禁运。针对面对侵犯人权的行为，欧盟对缅实施了一些列制裁措施，旨在施压缅甸推进民主化。2013 年，缅甸实施政治改革，欧盟解除了除武器禁运外的所有制裁。[31]2017 年，缅甸军方与若开邦激进的罗兴亚人组织之间的暴力冲突升级为残酷的军事冲突。大量平民死亡，约 70 万人流离失所。[32]2018 年 2 月，安理会谴责缅甸军方和安全部队对罗兴亚人民的系统的无差别迫害，再次强调武器禁运的重大意义。[33]

2018 年 4 月，欧盟扩大了对缅限制措施，规定：（a）禁止出口军警或边防警察为终端用户的军民两用品；(b)限制出口可能用于内部镇压的通讯监控设备；以及（c）对军事训练和军事合作的限制。[34]

沙特阿拉伯

2015 年以来，欧盟成员国内部和欧洲议会就加强对沙特武器供应限制可能性反复进行过多轮讨论。辩论的核心人们担心，2015 年沙特为首的也门军事行动正在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并指责沙特军队在也门参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35]欧洲议会于 2016 年 2 月和 2017 年 10 月通过决议，呼吁对沙特实施武器禁运。[36]

2018 年 10 月初，欧洲议会呼吁欧盟成员国不要向沙特、阿联酋以及正在干预也门联军任何其他成员国，以及也门政府冲突各方出售武器。[37]

2018 年 10 月底，议会就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当月早些时候在土耳其遇害一事通过决议。据信，谋杀很可能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本就知情或就是他操控。因此，决议呼吁欧盟理事会形成共同立场，对沙特实施欧盟范围武器禁运，并禁止向沙特出口可用于镇压目的的监视系统和其他军民两用品。[38]

不过，2018 年安理会依旧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些欧盟成员国单方面对也门不断恶化的局势作出反应，阻止、暂停或停止向沙特出口某类武器。但是对于其他欧盟成员国而言，沙特仍是重要的武器出口市场(见第 4 节)。[39]

1 此外，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SCE，现已更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要求所有成员国禁止向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作战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部队运送武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高级官员委员会，声明，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 2 号日刊附件 1，布拉格，1992 年 2 月 27 日至 28 日。

2 表 10.2 列出了实施联合国禁运的 10 个国家。1 为联合国对南苏丹实施同等禁运之前，2 与联合国对等禁运不同的是，对伊朗的禁运涵盖较联合国禁运更为严格，对苏丹的禁运覆盖整个国家，而联合国禁运仅适用于达尔富尔地区。无联合国对应禁运机制的 8 个国家为白俄罗斯、中国、埃及、缅甸、俄罗斯、叙利亚、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
3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8 号决议，2018 年 7 月 13 日。
4 关于南苏丹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5 魏泽曼·P·D 和凯利·N，“多边武器禁运”，SIPRI 年鉴 2015，第 622 页。IGAD 概述，相关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B 第 2 节。
6 布罗姆利·M，凯利·N.和魏泽曼·P·D，“武器和军民两用物品多边禁运”，SIPRI 年鉴 2016，第 750 页。
7 关于 2017 年之前的事态发展，见布罗姆利·M，凯利·N.和魏泽曼·P·D，“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多边禁运”，SIPRI 年鉴 2017，第 589-90 页。
8 联合国安理会第 2206 号决议，2015 年 3 月 3 日。
9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最终报告，S/2018/292，2018 年 4 月 12 日，第 24-29 页。另见冲突军备研究（CAR），南苏丹内战中的武器供应（CAR:2018 年 11 月，伦敦）。
10 联合国，安理会，第 8310 次会议，S/PV.8310，2018 年 7 月 13 日，第 2-3 页。
11 联合国，S/PV.8310（注 10）。
12 联合国安理会第 1907 号决议，2009 年 12 月 23 日。
13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44 号决议，2018 年 11 月 14 日。
14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44 号决议（注 13）。
15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44 号决议（注 13）。
16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宣布“战争结束”，半岛电视台，2018 年 7 月 9 日。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和平协定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17 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安理会第 2399（2018）号决议延长中非共和国专家小组最终报告提交时间，S/2018/1112，2018 年 12 月 14 日，第 18-19 页。关于 CAR 冲突，另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18 联合国，S/2018/1112（注 17），第 41 页。
19 联合国，S/2018/1112（注 17），第 42 页。
20 联合国，S/2018/1112（注 17），第 42 页。关于 ECOWAS 和 ECCAS 的简要说明和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B 第 2 节。
21 联合国，安理会，根据第 1973（2011）号决议，S/2018/812，2018 年 9 月 5 日。关于利比亚冲突，另见本卷第二章第五节。
22 联合国，S/2018/812（注 21），第 18 页。
23 联合国，S/2018/812（注 21），第 33 页。
24 联合国，S/2018/812（注 21），第 36 页。
25 联合国安理会 2014 年 3 月 5 日第 2142 号决议。关于索马里冲突，另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26 联合国安理会，索马里：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根据第 2385（2017）号决议提交的报告，S/2018/1002，2018 年 11 月 9 日，第 20 页。
27 联合国，S/2018/1002（注 26），第 3 页。
28 联合国，S/2018/1002（注 26），第 11-12 页。
29 联合国，S/2018/1002（注 26），第 13 页。
30 联合国，S/2018/1002（注 26），第 14-15 页。
31 理事会 2013 年 4 月 22 日关于对缅甸采取限制性措施的第 2013/184/CFSP 号决议，欧盟官方公报，L111，2013 年 4 月 23 日。
32 关于缅甸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33 欧盟理事会，“理事会会议结果：第 3598 次理事会会议”，2018 年 2 月 26 日，6541/18，第 8 页。
34 理事会 2018 年 4 月 26 日第 2018/647 号条例（欧盟），修订关于缅甸限制性措施的第 401/2013 号条例（欧盟），欧盟官方公报，L108，2018 年 4 月 27 日。
35 关于也门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4 节。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由巴林、埃及、约旦、科威特、摩洛哥、塞内加尔、苏丹、阿联酋和卡塔尔组成，直到 2017 年 6 月。冲突期间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指控，见大赦国际，大赦国际报告，2017/18：世界人权状况（大赦国际：伦敦，2018）；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门人权状况，包括 2014 年 9 月以来的侵犯和虐待行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报告，A/HR C/36/33，2017 年 9 月 13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2140（201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也门问题专家小组报告。
36 欧洲议会，关于武器出口的 2017 年 9 月 13 日决议：执行共同立场 2008/944/CFSP，2017/2029(INI)；以及欧洲议会，也门局势 2017 年 11 月 30 日决议，2017/2849(RSP)。
37 欧洲议会，2018 年 10 月 4 日关于也门局势的决议，2018/2853(RSP)。
38 欧洲议会，2018 年 10 月 25 日关于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杀害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决议，2018/2885(RSP)。
39 向沙特阿拉伯转让武器问题，见本卷第 5 章第 2 节和第 3 节。

第 3 节.出口管控制度

乔瓦娜·马莱塔、西比尔·鲍尔、科莉亚·布罗克曼和马克·布罗姆利

主流的出口管控机制有澳大利亚集团(AG)、导弹技术管制制度(MTCR)、核供应国集团(NSG)和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协议(WA)，协调化学、生物、核及常规武器相关商品及技术的贸易管制(见表 10.3)。[1]所有 4 项具有政治约束力的管控协定均以协商一致方式运作，并通过国家法律加以执行。它们还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交流功能，因为 4 项管控机制组成了一个交流框架，使政策、许可证、执法、技术和情报官员能在框架内进行交流。除成员资格外，管制机制在管制清单和操作层面具有重要的规范职能，其原因就是众多非缔约国愿意自愿遵守。

与往年一样，此类机制的共同点集中在同技术发展和非法军购保持步伐一致；以及寻求国际管控标准全球化，同时将管控机制的讨论限制在若干国家政府范围以确保其功能和保密性。

为在有效应对技术变革方面向前迈出坚实的步伐，需在这一问题上加强机构间参与。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又成为一个复杂的变量，这也影响到机制推进。最后，由于很难找愿意主持上述机制的国家，未能 2010 年 MTCR 中期审议大会那样举行大型国际会议。为避免这一情况再次出现，在 2018 年就敲定了今后两届主席国。

澳大利亚集团

AG(澳大利亚集团)，拥有 43 个成员国，旨在努力通过协调出口管控，信息共享及加强外联的方式应对生物化学武器(CBW)技术及材料的扩散。[2] AG 成立源于 1980 年-1988 年两伊战争期间，其背景是国际社会对生化武器的恐忧。自那时以来，AG 覆盖面已从化学武器及相关生产设备和技术扩大至包括生物武器以及可用于其开发、生产和使用生物武器的设备、材料和技术。AG 控制清单由集团成员国一致决定进行持续更新。

2018 年 AG 全体会议对叙利亚、伊拉克、英国和马来西亚境内的化武使用表示关切。[3]

表 10.3. 4 个多边武器出口控制机制

机制（成立年份）	适用范围	参与国家数量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大会主席国	2018 年大会
澳大利亚集团（1985）	生化武器相关材料、技术及软件	43	澳大利亚	6 月 7-8 日巴黎
导弹技术控制机制（1987）	可投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人机	35	—a	—a
核供应国集团（1974）	核及核相关材料、软件和技术	48b	拉脱维亚	6 月 14-15 日尤尔马拉拉脱维亚
瓦森纳安排（1995）	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技术	42	英国	12 月 5-6 日维也纳，奥地利

a 由于没有国家自愿担任主席国，中期审查并未确定 2018-19 年期新主席国。新任主席传统上主持年会，因此 2018 年并未举行正式的全体会议。即将离任的联合主席国爱尔兰和冰岛继续担任，直至 2018 年 12 月巴黎加强联络点会议召开。
b 欧盟委员会和桑格委员会主席都是核供应国集团常驻观察员。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集团；导弹技术管制制度；核供应国集团；以及关于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协议。

AG 成员国注意到英国对 2018 年 3 月索尔兹伯里两名俄罗斯公民遭受化武袭击，最终一名英国公民身亡，以及随后 OPCW 对英国进行的技术援助调查报告。[4] 与会者讨论了诺维乔克毒剂---索尔兹伯里袭击时间中所使用的神经毒剂类型及其前体，并就 2019 年全体会议之前就这一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达成一致。

和前些年一样，与会人员回顾了叙利亚局势以及叙利亚战事中化武的反复使用问题。[5] 成员国呼吁叙利亚政府“根据遵守其 CWC 中条款 5 下义务，宣布全面彻底销毁其化学武器计划”。与会者商定了对“叙利亚实施具体管控”若干修正案。[6]

AG 与会者重申，AG 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化学和生物武器能力感到关切，特别是针对 2017 年 2 月马来西亚机场使用神经毒剂 VX 杀害金正男的恶性事件。[7] 与会者欢迎 2018 年 6 月 26 日至 27 日在海牙召开 CWC 缔约国会议特别会议，讨论更为强力的应对措施，以履行 CWC 承诺，并加强 OPCW 管理。[8] 此外，全体会议还听取了关于打击使用化武不受惩罚现象的国际伙伴关系简报。[9]

AG 发表了一份单独声明，重申上述关切，并特别谴责 2018 年 4 月 7 日在叙利亚杜马发生的化武袭击事件；暗杀金正男事件；以及某些国(不点名)的纵容行

为，使得使用化武国家可以逍遥法外。[10]

继 2017 年同拉丁美洲国家成功举行对话之后，AG 继续与非缔约国进行接触，召开了另一次区域对话会议。[11]AG 于 2018 年 3 月 7 日至 9 日在伦敦举行的闭会期间会议，有史以来第一次为非洲国家举行对话会议。AG 与会国同意采取后续行动并再次呼吁各国采纳 AG 指导原则和管控名单，并将其视为国际武器管控的典范操作。[12]AG 对马来西亚、塞尔维亚和巴基斯坦进行了外联访问。与会者强调向工业界和学术界推广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前科技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

与 2017 年一样，2018 年 AG 技术讨论集中在新兴技术、网络空间开发和无形技术转让方面。与会者分享了在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防止向恐怖分子在内的非国家行为者扩散武器的方法。[13] 2018 年 AG 管控清单更新并未公布。

闭会期间形成共识，印度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加入 AG。[14]2018 年没有新增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和塞尔维亚的申请仍在审查中。[15]

导弹技术控制机制

MTCR 力求防止导弹和其他可用于化学生物武器和核武投送的无人机系统的扩散。MTCR 成立于 1987 年，目的是通过控制核武和导弹载具和技术出口来防止核武扩散。[16]随后，其管制范围从导弹(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扩大到所有类型无人机、导弹和核武载具无人机，包括生物化学武器载具无人机。自成立以来，会员国从 7 个增至 35 个。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和拉脱维亚三国单方面宣布遵守 MTCR 准则和控制清单。

2018 年未举行正式中期审议大会，原因是没有任何国家自愿担任 2018/19 期间轮值主席，而轮值主席国通常恰恰是全体会议东道国。即将离任的联席主席爱尔兰和冰岛继续履行主席国职责，直至 2018 年 12 月巴黎加强联络会议召开。除全体会议无法召开之外，MTCR 轮值主席空缺的影响仍有待观察。

其他会议按计划举行，包括日本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于 2018 年 10 月主办的信息交流会议。[17]瑞士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在巴塞尔主办了一次技术专家会议。本次会议对 MTCR 管控清单进行了定期审查，并同意对文本进行少量修改。[18]其中包括增加对爆轰发动机的出口控制，以前并未被纳入清单。[19]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会主动将最大速度低于 650 公里/小时的无人机，归至二类管控清单，以期在 MTCR 内部达成一致共识。这一变化使得美国在无人机市场上同以色

列和中国的较量更为得心应手，毕竟中国和以色列都不是 MTCR 合作伙伴国。[20] 由于未能确定本期主席国，MTCR 同意新西兰担任 2019/20 年主席国，奥地利担任 2020/21 年主席国。[21]

即将离任的联席主席在 2018 年对非成员进行了外联访问：

3 月巴基斯坦，7 月 22 日约旦和以色列。[22]2018 年 3 月 19 日至 23 日，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技术专家会议的同时，举行了一次技术推广会议。[23]此外，联席主席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在东京举行的亚洲出口管控年度研讨会上发言，继续关注“全球导弹扩散，尤其是中东、东北亚和南亚的导弹计划，以及这些活动可能导致其他地区的扩散风险”。[24]

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守则

海牙行为准则作为 MTCR 的补充，于 2002 年在 MTCR 框架内设立，此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弹道导弹扩散的透明度和信任机制。[25]签字国承诺在弹道导弹和空间运载火箭发射及试飞前事先通告，以及每年公布计划发射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官方计划。

第 17 届 HCOC 年会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至 29 日在维也纳举行，139 个签字国中的 72 个国家代表团出席会议。[26]瑞典接替波兰接任 2018/19 年会主席国。瑞典主席概述了 HCOC 主要目标，即促进 HCOC 的“普遍化”和“全面彻底执行”，以及促成一项决议，重申 HCOC 在联大第一委员会中的作用。[27]

2018 年 12 月 5 日，大会通过了第 73/49 号决议。这是自 2008 年提出第一项此类决议以来最有力的支持。决议肯定了 HCOC 的巨大作用，并鼓励更多的国家加入 HCOC，并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解决弹道导弹扩散问题。[28]

瑞典担任主席期间开展一系列外联活动，如在加勒比、南亚和西非举办区域研讨会。签字国还通过非正式协商，努力加强公约执行力度。

核供应国集团

NSG 旨在通过控制核材料、设备、软件和技术转让，防止核武器扩散。2018 年，拉脱维亚接任 NSG 主席，并主办第 28 次全体会议。协商小组和技术专家组分别由墨西哥和瑞典主持。信息交流会议主席已由美国担任。[29]

2018 年全体会议上，与会各国政府讨论了朝韩关系及朝美峰会。[30]然而，大

会重申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朝鲜相关决议，禁止向朝鲜提供管制物品。[31]

同时决议呼吁朝鲜以“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方式”销毁核武并终止其核计划，并禁止向朝鲜提供任何品类的违禁品。[32]NSG 全体会议还讨论了伊核协议 JCPOA,并确认伊朗履行了联合国第 2231 号决议之义务。[33]与会国听取了 JCPOA 框架下军购渠道联合工作组协调员汇报，并对进一步详细汇报表示出兴趣。[34]

全体会议期间，NSG 讨论了管控清单的最新情况，与会国定期对清单进行了调整，使之适应科技和商业模式的发展。[35]外联部分，与会国注意到商界的一些新举措，对此表示欢迎，同时介绍了 NSG 网站的信息修改。全体会议也是一个机会，各国可以分享提高认识的心得，不仅是同工业界人士交流，同时也是同学术界和研究机构的一个交流机会。2018 年 4 月 10 日，NSG 同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和世界核协会举行行业推广活动。[36]

2018 年，与会各国政府继续讨论新兴技术对防扩散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增材制造所带来的潜在扩散威胁仍是 NSG 内部讨论的焦点。[37]NSG 内部还就某些技术(如区块链)、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在提升管控效力中的作用举行了讨论。[38]

最后，NSG 重新讨论了非 1968 年不扩散条约(NPT)缔约国参加 NSG 技术、法律和政治会议的问题。[39]这一议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 2016 年提交成员国申请后开始讨论。[40]虽然印度的 NSG 成员国地位曾在外联活动相关讨论中有过明确阐述，但 2018 年上述两个国家的成员申请都未能有任何进展。[41]2017 年 11 月就这一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以来，对于非 NPT 国家的成员国地位标准，各方立场一直存在分歧。[42]2018 年 NSG 非正式会议是否将会讨论这个话题，尚无任何消息。

同时，2017 年获得俄罗斯和意大利等国的公开支持后，印度继续为其成员国资格四处寻求外交支持。[43]2018 年，印度获得了日本、荷兰和瑞典的明确支持。[44]此外，2018 年 8 月 3 日，印度被提升至美国商务部战略贸易授权许可例外法规一级，称为 STA-1 状态。[45]印度媒体将此解读为美国进一步支持印度加入 NSG。STA-1 地位允许印度从美国进口敏感技术和军事货品，包括“核电发展相关材料”，而无需出口商申请单独许可证。[46]印度是第 37 个获得这一地位的国家。

与此同时，2018 年巴基斯坦核贸易变得更为困难。2018 年 NSG 全体会议之前，美国对 7 家涉嫌与巴基斯坦核公司进行非法核交易的公司实施制裁。这也无异于对雄心勃勃加入 NSG 的巴基斯坦，迎头浇上一盆凉水。[47]

瓦森纳协定

WA 旨在推动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转让的“更大透明度和更大责任”。更为具体地说，力求防止上述品类的“不稳定积聚”以及落入恐怖分子手中。[48]WA 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至 6 日在维也纳举行全体会议，英国担任轮值主席国。希腊 2019 年 1 月 1 日接任全体会议轮值主席国。[49]

同往年一样，全体会议继续讨论“技术变化和市场趋势”。与会国承认，需要“进一步努力”应对此类挑战。[50]全体会议通过了 WA 管控清单修改。其中许多是为了跟上技术的飞速发展，如对抗量子密码算法(即能够抵抗量子计算机攻击的密码)和抗电磁脉冲(EMP)软件(即能够抵抗 EMP 攻击的软件)引入了新的管控措施。这两套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均代表各自领域的前沿水平。[51]管控清单修改也放松了一些领域的控制，如物联网领域管控，以及“高性能连续波激光器”和“红外相机”。对性能阈值进行了调整，其目的就是考虑到民用市场上需求的日益复杂。[52]

WA 所列安全问题新技术中，审查进程将继续考察卫星部件、人工智能和“先进传感器和导航设备”，以加强武器系统自主性和“战场自动化”等领域。[53]今后还将继续处理增材制造相关领域，并继续与 MTCR 和 NSG 进行相关技术对话。[54]

2018 年全体会议期间，与会国还对“工业咨询问题清单”进行了更新。清单最初在 2013 起草，目的是帮助企业识别“疑似应于国家出口许可当局接触”的情况。[55]各国也提出了一些 WA 最佳实践指南建议，并确定需要进行调整升级的指导准则。[56]WA 最佳实践指南覆盖了管控领域的方方面面，是 WA 提升管控水平的重要依据。

WA 外联工作鼓励自愿遵守 WA 管控清单和 WA 标准，与对 WA 感兴趣的非成员国分享 WA 相关工作信息。外联活动包括全体大会后的简报会和一次高级技术简报会，目的是讨论管控调整，并促进非成员国相互间交流经验。以前高级技术简报每年举行一次，但 WA 秘书处最近宣布，计划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下届会议将于 2020 年年中举行。[57]

2018 年，WA 秘书处外联活动包括参加 2 月至 3 月在东京举行的第 25 届亚洲出口管制研讨会；5 月由巴基斯坦战略出口管制司举办的国际出口管制研讨会，

这是 WA 邦首次访问伊斯兰堡；6 月在大韩民国(韩国)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国防技术安全会议；9 月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小型企业国防出口年会。[58]这些活动都是秘书处介绍 WA 职能作用及最新发展情况的舞台。近年来，WA 秘书处还应邀访问印度、以色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59]

自 2017 年底印度被接纳为第 42 个成员国以来，虽然仍有国家继续申请资格审查，但并未有其他国家在今年被吸收为 WA 成员国。[60]

1 参加每一制度的国家的简要说明和名单见附件 B，本卷第 3 节。
2 澳大利亚集团，“澳大利亚集团：简介”；澳大利亚集团，“集团目标”。
3 澳大利亚集团，“澳大利亚集团关于化学武器的声明”，2018 年 6 月 8 日。
4 见本卷第 8 章第 2 节。
5 澳大利亚集团，“2018 年澳大利亚集团全体会议主席声明”，2018 年 6 月 8 日。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学武器公约》) 的摘要和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关于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另见本卷第 8 章第 1 节。
6 澳大利亚集团，“2018 年澳大利亚集团全体会议主席的发言”（注 5）。
7 哈特・J，“关于在伊拉克和朝鲜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SIPRI 年鉴 2018，第 362-64 页。
8 见本卷第 8 章第 3 节。
9 见本卷第 8 章第 3 节。
10 澳大利亚集团（注 3）。
11 鲍尔・S，《出口管制制度》，SIPRI 年鉴 2018，第 424-36 页。
12 澳大利亚集团（注 5）。
13 澳大利亚集团（注 5）。关于使控制适应新兴技术，见布罗克曼・K，鲍尔・S 和布兰・V，Bio Plus X: 军备控制和生物学与新兴技术的融合技术（SIPRI:斯德哥尔摩，2019 年 3 月）。
14 澳大利亚集团，“印度加入澳大利亚集团”，新闻稿，2018 年 1 月 19 日；鲍尔・S（注 11）。

15 德国联邦外交部，“印度联邦外交部加入澳大利亚集团”，新闻稿，2018 年 1 月 19 日。
16 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常见问题解答”（FAQ）。
17 MTCR 合作伙伴国代表，与作者的通信，2018 年 12 月 17 日。
18 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技术专家会议主席报告：MTCR 附件更新，2018 年 12 月 19 日。
19 导弹技术管制制度，“设备、软件和技术附件”，导弹技术管制制度/TEM/2018/Annex，2018 年 11 月 30 日，第 3.A.2 项。
20 梅塔·A，“美国将在 11 月推动无人机协议的新规则”，《国防新闻》，2018 年 9 月 11 日；鲍尔·S，（注 11），第 428-29 页。
21 彼得斯·W，新西兰裁军和军备控制部长，“新西兰将主持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声明，新西兰政府，2018 年 12 月 13 日。
22 导弹技术管制制度，“MTCR 联席主席报告：对巴基斯坦的外联访问”，2018 年 12 月 19 日；导弹技术管制制度，“MTCR 联席主席报告：对约旦的外联访问”，2018 年 12 月 19 日；导弹技术管制制度，“MTCR 联席主席报告：对以色列的外联访问”，2018 年 12 月 19 日。
23 奥雷利和维斯特曼，MTCR 联席主席，在第 25 届亚洲出口管制研讨会上的发言，2018 年 2 月 27 日。
24 奥雷利和维斯特曼（注 23）。
25 海牙行为准则，“HCOC 是什么？2019 年 1 月。26《海牙行为准则》，《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签署国第 17 次常会》，新闻稿。27 海牙行为守则（注 26）。
28 联合国大会，《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守则》，第 73/49 号决议，2018 年 12 月 12 日。
29 核供应国集团，’组织’。
30 关于朝鲜-美国核外交，见本卷第 7 章第 1 节。
31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1 号决议，2017 年 8 月 5 日；第 2375 号决议，2017 年 9 月 11 日；第 2397 号决议，2017 年 12 月 22 日。2018 年，安理会没有通过与联合国制裁相关决议。关于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的制裁决议摘要，见凯勒·S·N，“对朝鲜的国际不扩散制裁”，SIPRI 年鉴 2018，第 386-88 页。
32 核供应国集团，“2018 年核供应国集团全体会议公开声明”，6 月 15 日，拉脱维亚，居马拉，2018 年 6 月 15 日。
33 见本卷第 7 章第 3 节；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2015 年 7 月 20 日。
34 核供应国集团（注 32）。
35 核供应国集团，“更新了 NSG 第 1 部分和第 2 部分控制清单”。
36 核供应国集团（注 32）。
37 坎达诺·D，“出口管制和新威胁：核供应国集团观点”，在欧盟出口管制论坛上的发言，2018 年 12 月 13 日；格里菲斯·P，“瓦森纳协定在迅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的作用”，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第五届国际国防技术安全会议，2018 年 6 月 20 日，韩国首尔。同时见布罗姆利·M，布罗克曼·K 和马莱塔·G，“对无形技术转让和增材制造的控制”，SIPRI 年鉴 2018，第 437-47 页。
38 坎达诺（注 37）。关于此类用途，见卡斯珀森·A 和金·C，“在确保技术效益的同时减轻核风险挑战”，V·布拉宁，《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和核风险的影响》，第 1 卷，欧洲-大西洋展望（SIPRI:斯德哥尔摩，2019 年 5 月）。
39 关于《不扩散条约》的摘要和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40 鲍尔（注 11），第 431-33 页；鲍尔·S 和马莱塔·G，“出口管制制度”，SIPRI 年鉴 2017，第 600-601 页。
41 核供应国集团（注 32）。
42 鲍尔（注 11）。
43 鲍尔（注 11）；以及鲍尔和马莱塔（注 40）。
44 瑞典政府，“瑞典-印度联合行动计划，由斯特凡·勒夫文总理和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商定”，2018 年 4 月 17 日；印度外交部，“荷兰总理访问印度期间的印度-荷兰联合声明”，2018 年 5 月 24 日；日本外交部，“日本-印度愿景宣言”，2018 年 10 月 29 日。
45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美国-印度主要国防合作伙伴：根据出口管理条例执行印度加入瓦森纳协定和印度加入 A 组：5，《联邦公报》，第 83 卷，第 150 号（2018 年 8 月 3 日）。另见美国商务部，“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宣布增加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商业计划”，新闻稿，2018 年 7 月 30 日。
46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美国：印度满足所有条件，但由于中国的否决而挡在门外”，《印度时报》，2018 年 9 月 13 日；普拉哈德·S，“美国给予印度 STA-1 地位是对中国的一大打击”，《经济时报》，2018 年 8 月 1 日；卢特拉·P，“STA-1 授权意味着什么？” 印度-美国国防伙伴关系”，CNBC TV18，2018 年 8 月 6 日。
47“美国因核贸易制裁巴基斯坦公司”，路透社，2018 年 3 月 26 日。
48 瓦森纳协定，概况，2018 年 12 月 7 日。
49 瓦森纳协定，“大会主席就瓦森纳协定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出口管制 2018 年成果发表声明”，维也纳，2018 年 12 月 6 日。
50 瓦森纳协定（注 49）。
51 见马夫罗埃迪斯·V，维希·K，齐奇·M·D 和约桑·A，“量子计算对当前密码学的影响”，国际先进

计算机科学与应用杂志，第 9 卷，第 3 期（2018 年），第 1-10 页；伊曼纽尔松·J，“为电磁脉冲攻击或严重太阳风暴做好准备”，未来科学。
52 瓦森纳协定(注 49)。有关 WA 控制列表变更，见瓦森纳协定，“变更摘要：截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军民两用品、技术清单及弹药清单”。
53 格里菲斯（注 37）；格里菲斯·P，“瓦森纳协定：近期发展”，第 25 届亚洲出口管制研讨会，201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东京。
54 格里菲斯（注 37）。
55 瓦森纳协定，“工业咨询问题清单”，2003 年全体会议通过，2018 年修订。
56 瓦森纳协定（注 49）；瓦森纳协定（注 55）。
57 格里菲斯·P，“多边出口管制制度：瓦森纳协定”，第 26 届亚洲出口管制研讨会，2018 年 2 月 26-28 日，东京。
58 格里菲斯（注 53）；格里菲斯（注 37）；格里菲斯，P.，“瓦森纳协定最新情况”，SMi，第 13 届年度会议，国防出口，2018 年，罗马，2018 年 9 月 19 日至 20 日；格里菲斯·P，“瓦森纳协定：规范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及技术转让透明度和有效性”，战略出口管制国际研讨会，伊斯兰堡，2018 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巴基斯坦外交部战略出口管制司，SECDIV 国际出口管制研讨会，2018 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伊斯兰堡。
59 格里菲斯，瓦森纳协定（注 58）。
60 瓦森纳协定（注 49）。

第 4 节.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

马克·布罗姆利和乔瓦娜·马莱塔

欧盟(EU)

欧盟(EU)是目前唯一一个对军民两用品出口、经纪、过境及转运有共同法律框架的区域组织。

法律框架主题是欧盟武器禁运、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条例、欧盟武器出口共同立场(EU 共同立场)，欧盟内部转让指令和反酷刑条例。[1]

欧盟武器禁运推进见第 2 节。本节重点介绍欧盟军民两用管控条例和欧盟共同立场，均为 2018 年审议重点。两个方向上，非政府组织和欧洲以后都努力扩大管控机制覆盖面，尤其是在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使用更为激烈的措辞，但遭到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对。

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条例

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条例包括对军民两用品、软件及技术的出口、过境、转运和经纪活动的管控。条例为直接使用欧盟成员国内部法律，但通过其国家管控体系实施和执行。管控条例自 2011 年开始审查。2016 年 9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管控条例新版本草案，旨在重塑管控体系。[2]

委员会提议对军民两用品条例内容作出重大修改。其中许多措施目标是使欧盟管控体制代化，以减轻对出口商的监管负担，包括为低价值货物、密码加密技术货物和公司内部技术转让等设立新的欧盟一般出口许可证(EUGEA)。[3]

不过，欧盟委员会提议还包括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将赋予保护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置于更为核心的地位。同时在欧盟成员国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机制中定义为“为打击恐怖主义作出贡献”，并将扩大对所谓网络监视技术出口的管制。“网络监视技术”一词是指“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使用的软件及硬件，或在其指导下网络运营商使用的软件和硬件，以秘密监视和/或通过信息和通讯技术存储通信数据”。[4]该提案将扩大军民两用品定义范围，将网络监视技术囊括在内，为多边出口管控机制制定一个欧盟“自主”管控清单，并对可能违反人权或国际人道主义法或恐怖主义行为的未列入清单的军民两用品实施新的“全面管控”。

欧盟公司被披露在 2011-12 年向中东国家提供网络监控技术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试图通过审议对此品类转让实施更为严格的管控。[5]

按照欧盟立法程序，欧盟委员会提案将经过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三堂共审”，最终版本方能通过。为确定谈判立场，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必须首先就委员会议案的拟议修正案达成一致。

2018 年 1 月 17 日，欧洲议会通过了由其国际贸易委员会(INTA)起草的 98 项修正案。[6]此类修正案支持扩大拟议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特别是，赞同委员会关于 EUGEA 的所有建议，并呼吁完全取消对使用密码技术的物品出口的所有限制，认为此类系统对信息技术安全和通信安全至关重要，不应纳入军民两用出口管制范围。[7]修正案还赞同通过一项欧盟自主管控清单和一项新的全面管控提案，但会限制其管控范围，特别是确保将用于 IT 安全的技术系统排除在外。最后，拟议在是否批准某一特定出口或是是否将某一品类划归新的全面管控清单的时候，将人权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包括隐私权、言论自由权和结社和集会权。[8]欧洲议会在通过决议时明确指出，审查的主要目标是填补欧盟管控机制中存在的“危险空白”和“漏洞”。[9]负责协调修正案起草工作的欧洲议会议员还指出，过去迟迟不能达成修改的管控机制，终于迈出了重大意义的一步。[10]

相反，尽管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讨论，截至 2018 年底，欧盟理事会未能通过委员会拟议修正案。[11]欧盟成员国似乎赞成建立促进两用物品流动机制，但未能就其确切范围和内容达成一致。几项 EUGEA，比最初委员会提议的范围都要小，但其他欧盟成员国认为缩小范围“影响深远”且“危险”。[12]同时，尽管欧盟成员国似乎对简化加密技术管控表现出兴趣，但欧洲议会完全撤销管控的建议却遭到一致反对。

特别是，许多国家政府重视对密码技术的管控，因为密码技术可对国家安全潜在相关技术贸易进行监控。[13]

欧盟成员国似乎在为网络监视技术制定一份欧盟自主管控清单，并加大人权问题在各国在出口许可证流程批准考量中的比重。2018 年 1 月，一个由 11 个欧盟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公布的工作文件中，对两项提议均给予有保留的支持。[14]然而，在 2018 年 5 月，一个由 9 个欧盟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公布的第二份工作文件中，对两项提议均表示拒绝。一个国家都拒绝了新的全面管控方案，认为这些方案可能会对欧盟公司产生“有害影响”，使它们受到欧盟以外不受管控机制约束

公司的冲击。[15]因此，与欧洲议会侧重于对机制“修修补补”不同，两份工作文件都强调，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条例的依旧应该是对“国际出口管控机制取得的成果的总结和执行”。[16]

欧盟成员国表示，它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在 2019 年上半年通过一套修正案。[17]然而，即便修正案获得成功，似乎也与欧盟委员会和议会的雄心壮志相去甚远。这可能会给三部曲进程带来挑战。[17]

欧盟武器出口共同立场

2018 年初，欧盟共同立场 10 周年，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和欧盟成员国开始评估其执行情况和“目标实现情况”。[18]这是第二次审查欧盟共同立场，第一次评估在 2011-15 年。那次会议上，文本保持不变，但对用户指南进行了少量修改，并采取措施改进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信息交流。[19]欧盟共同立场第二次审查正好适逢中东问题再次成为欧洲和各国公开辩论的焦点。

特别是，欧盟一些成员国对不断恶化的也门局势做出反应，阻止、暂停或停止向沙特和阿联酋出口某型武器(见第 2 节)。[20]2016 年荷兰和比利时法兰德斯地区就曾采取类似措施，2018 年初，德国和比利时瓦隆地区紧随其后。[21]在 2018 年 10 月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后，丹麦和芬兰也对向沙特武器转让实施了更严格的限制，而德国则进一步收紧限制。[22]然而，主战武器出口国，特别是英国、意大利和法国则坚持认为，它们对沙特的武器出口符合国家和欧洲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国家均被起诉政府对沙特武器出口不符合出口管控政策，并强迫上述国家政府改变武器出口政策。[2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许可证制度在欧盟成员国内部达成一致，依旧是困难重重。这也常常被人诟病是欧盟武器出口管控机制的主要缺陷，值得在审查过程中好好思考。[24]

与欧盟两用条例不同，欧洲议会在起草欧盟共同立场方面没有正式作用。然而，自 2000 年 7 月以来，议会外交委员会一直定期发表对欧盟武器出口年度报告的回应，包括对所采取步骤的评估和对未来行动的建议。[25]最近的报告呼吁欧盟成员国和 EEAS 在本次审查中能够解决一些具体问题。[26]问题包括提高风险评估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如将查阅用户指南变为“在线互动资源”；将年度报告变成“公开开放的在线数据库”；加强语言表述。[27]概括而言，欧洲议会还邀请欧盟成员国和 EEAS 利用这一机会评估共同立场在国家一级执行情况，包括许可证

发放程序。[28]理事会武器出口问题工作组(COARM)围绕四个“工作队”就当前审查进程内容进行了讨论，每个“工作队”处理一个具体问题，由一个欧盟成员国主持。[29]波兰负责用户指南工作队，比利时负责透明度和报告，德国负责技术问题，荷兰负责研究其他可能相关问题。[30]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欧盟共同立场审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1 理事会 2009 年 5 月 5 日第 428/2009 号条例，建立管制军民两用品出口、转让、中介和过境共同体机制，《欧洲联盟公报》，L134，2009 年 5 月 29 日；理事会 2008 年 12 月 8 日第 2008/944/CFSP 号共同立场，界定了军事技术和装备出口管制共同规则，《欧洲联盟公报》，L335，2008 年 12 月 8 日；2009 年 5 月 6 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09/43/EC 号指令，简化共同体内国防产品转让条款和条件，《欧洲联盟公报》，L146，2009 年 6 月 10 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16 年 11 月 23 日第 2016/2134 号条例（EU）修订了关于某些可用于死刑、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货物贸易第 1236/2005 号条例（EC），欧盟官方公报，L338，2016 年 12 月 13 日。

2 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建立欧盟管制军民两用品出口、转让、经纪、技术援助和过境制度的条例提案》，COM（2016）616 最终版，2016 年 9 月 28 日。另见鲍尔・S 和布罗姆利・M，“欧盟军民两

用品和武器贸易管制进展”，SIPRI 年鉴 2017，第 612-15 页。
3 EUGEA 为欧盟层面共同商定的一种开放式许可证，允许出口商在单一许可证项下进行多次装运。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采用某种加密标准的系统已纳入瓦森纳协定军民两用品清单第 5 类，与其他出口管制机制管制清单一同构成欧盟军民两用品清单基础。撒贝·N，“国际密码学规则和全球信息经济”，《西北科技与知识产权杂志》，第 11 卷，第 7 期（2013 年秋季）。
4 布罗姆利·M，《出口管制、人类安全和网络监视技术：审查欧盟军民两用品条例拟议修改》（SIPRI:斯德哥尔摩，2017 年 12 月），第 7 页。
5 布罗姆利·M，“人权、欧盟和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SIPRI 年鉴 2017，第 616－26 页。
6 欧洲议会，欧洲议会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通过的关于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建立欧盟军民两用品过境、技术援助出口、转让、中间商交易管制制度提案的修正案，(COM(2016)0616—C80393/2016—2016/0295(COD))，2018 年 1 月 17 日。动议以 571 票赞成、29 票反对、29 票弃权获得通过。
7 欧洲议会（注 6），修正案 13 和 15。
8 欧洲议会（注 6），修正案 26 和 62。
9 欧洲议会，“欧洲不应帮助独裁者监视本国公民”，新闻稿，2018 年 1 月 17 日。
10 布克纳·K，国际贸易委员会欧洲议会报告员，“开幕词”，欧盟出口管制论坛，2018 年，布鲁塞尔，2018 年 12 月 13 日。
11 哥斯特尔·C，奥地利联邦数字和经济事务部，奥地利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开幕词”，欧盟出口管制论坛，2018 年，布鲁塞尔，2018 年 12 月 13 日。
12 哥斯特尔（注 11）。
13 布罗姆利·M，布罗克曼·K 和马莱塔·G，“对无形技术转让和增材制造的控制”，SIPRI 年鉴 2018，第 437-47 页。
14 欧盟理事会，“工作文件：欧盟出口管制，欧盟第 428/2009 号条例”，WK 1019/2018 INIT，2018 年 1 月 29 日。
15 欧盟理事会，“文件讨论：通过改进后的欧盟出口管制第 428/2009 号条例和促进人权及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网络监视管制”，WK5755/2018INIT，2018 年 5 月 15 日。
16 欧洲联盟理事会（注 14）。
17 丘皮图·G，罗马尼亚外交部，出口管制司军民两用品处，“理事会关于欧盟出口管制现代化的长期争论立场”，2018 年欧盟出口管制论坛，布鲁塞尔，2018 年 12 月 13 日。
18 欧洲联盟理事会，“理事会关于审查武器出口和武器贸易条约执行情况的共同立场的结论 2008/944/CFSP”，2015 年 7 月 20 日。
19 欧洲联盟理事会，“理事会共同立场用户指南 2008/944/CFSP，界定了管制军事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共同规则”，
2015 年 7 月 20 日；鲍尔·S.和布罗姆利·M，“欧盟出口管制发展”，SIPRI 年鉴 2016，第 768-69 页。
20 关于也门武装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21 布罗姆利·M 和马莱塔·G，“也门冲突和（欧盟）武器出口管制：“暴露当下政府的无能”，SIPRI 论文，2018 年 3 月 16 日。
22 芬兰外交部，“没有武器出口授权给沙特阿拉伯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18 年 11 月 22 日；丹麦外交部，[外交部暂停对沙特阿拉伯的武器出口]，新闻稿，2018 年 11 月 22 日；“默克尔：杀戮未被清除前，德国不得向沙特出口武器”，路透社，2018 年 10 月 22 日。
23“法国政府在向沙特出售武器方面面临法律压力”，路透社，2018 年 5 月 6 日；反对武器贸易运动(CAAT)，“沙特阿拉伯：法律挑战”，2018 年 7 月 27 日；麦卡斯基尔·E，“意大利官员和德国公司在沙特出售武器方面面临法律诉讼”，《卫报》，2018 年 4 月 18 日。
24 鲍尔·S，布罗姆利·M 和马莱塔·G，“欧盟武器出口管制机制实施”，研讨会总结报告，欧洲议会对外政策司，2017 年 5 月；鲍尔·S，布罗姆利·M 和马莱塔·G，“进一步推进武器出口管制 944/2008/CFSP 共同立场”，外部研究，外部政策总局，欧洲议会，2018 年 7 月。
25 年度报告，见本卷第 5 章第 4 节。
26 欧洲议会，“武器出口报告：2008/944/CFSP 2018/2157(INI)共同立场执行情况”，A8-0335/2018，2018 年 10 月 16 日。
27 欧洲议会（注 26）。
28 欧洲议会（注 26）。
29 COARM，见欧盟理事会，常规武器出口工作组，2017 年 11 月 9 日。
30 科普斯·D，“通过增加信息交流加强欧盟武器出口管制”，政策简报 1 号，佛兰德和平研究所，2018 年，第 2 页。

第 5 节.控制技术转让和外国直接投资：出口管控的局限性

马克·布罗姆利和科莉娅·布罗克曼

国家和多边管制军民两用品及武器出口的一个关键是管制“敏感”或“战略”技术的转让。在出口管控方面，技术被定义为“开发”、“生产”或“使用”受管制物项所需的具体信息。[1]

对以这种方式界定的未经授权的技术转让是武器出口管制一个极具挑战的层面。与几乎所有受出口管控的其他品类不同的是，技术可以采取无形方式(如人脑中的知识)，并可以使用无形手段(如 email 或以电子传输数据等其他手段)进行转让。[2]广义上说，这里的技术是指“科学知识应用研发的机器和设备”。[3]

此类技术转让受一系列手段管控，包括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筛选和阻止。FDI 是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直接投资(通常由公司而非政府进行)，涉及组建业务或获取有形资产，包括获取其他企业的股份；它“不仅仅是所有权的转让，原因就在于通常涉及资本补充要素的转让，包括管理、“技术和组织技能”。[4]近年来，包括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已采取步骤加强其 FDI 的筛查工作。第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和自主系统等领域科技迅速发展，预计将对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性能产生重大影响(WMD)。[5]然而，科技的飞速发展常常是发生在民用领域技术的研发之上，如自动驾驶，药品研制。这就使得对特定品类的界定变得十分困难。既要保证相关技术受到严格的管控，又要保证不影响民用领域的自由竞争。此外，这些研发成果大多是民用领域取得，而并非国防部门公司或是政府管理资助的公司取得，这就使得国家更难区分究竟哪些公司或研究部机构参与其中，或是对该成果的研发影响多大。一国政府同其国防部门有着极为微妙的关系，国防部门既是客户又是赞助方又是监管方，这也就使得国防部门可以控制、影响或是监督正在研发的武器系统。[6]

商业部门的控制和影响力则更为薄弱，许多核心技术研发均在这里举行。如虽然国防领域公司正在大力投资研发自动化系统，但与信息和通信技术及运输部门相比，投入其实还是很少。[7]

其次，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在想方设法对上述领域的众多公司进行投资

或收购。就中国而言，这是中国政府正在推进的众多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缩影。其投资也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8]这引发了人们一系列的关注：（a）中国公司相对于西方竞争对手获得商业优势的潜力；（b） 西方军队保持关键材料供应链安全可靠的能力；以及（c）中国政府影响或收集西方国家经济安全政策情报的能力。然而，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上述投资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使得中国企业可不受技术出口管控限制。而这些技术恰恰可能有利于中国军力水平的提升。[9]中国从西方获取此类技术，有着或秘密或公开的操作，如工业间谍、企业收购、中西方公司组建合资公司等等。然而，FDI 已成为主要途径之一。[10]

西方国家已作出回应，他们想确定现有的技术出口管控机制是否存在漏洞，是否需要将一些新增品类列入管控清单。然而，他们也对管控、筛查和阻止 FDI 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收购外国公司不同，FDI 常常涉及“资本补充因素的转移”，如组织技能、管理和核心技术。[11] 自 70 年代以来，全球都最大程度放松了对 FDI 的管控，也刺激了这一领域的持续增长。[12] 尽管出现这一趋势，但各国对于如何管理 FDI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敏感或战略技术转让纳入管控机制，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13]

2018 年，欧盟(EU)和美国采取措施修改其 FDI 筛查机制。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国家安全问题视为 FDI 筛选过程的核心考虑。这也意味着美国将对以往的做法作出反思。美国将赋予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更大的权力，CFIUS 为对 FDI 实施监管的主要机构。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将鼓励和便利 FDI 视为主要政策目标之一。加强 FDI 监管，也意味着路线改变，为应对“公共秩序和安全”威胁，采取共通标准。美国和欧盟正在制定的监管措施，对敏感或战略技术转让构建更为严格的管控究竟应该严格到何种程度，以及他们需要客户怎样的困难已达成以下目标。

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和新兴技术的管制

传统而言，美国的国家出口管控体系不仅关注防止常规武器和 WMD 的扩散，同时更为注重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官员明确表示，美国出卡口管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持美国在核心及军事及军民两用品(包括具备军事用途的新兴技术领域)领域的战略优势。如始于 2012 年奥巴马执政期间的美国出口管制

改革倡议，2017 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仍在延续，其管控重心就是“美国核心军事或情报优势技术”。[14] 此外，除了出口管控外，美国还有其他若干管制机制——特别是对 FDI 的管制——可适用于技术转让管控。如上所述，对 FDI 的管控主要由 CFIUS 领衔。CFIUS 是一个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主席的多部门委员会，负责根据可能存在的国家安全问题对 FDI 进行审查。美国法律赋予的治外法权，加上美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意味着 CFIUS 甚至能够阻止收购持有美国资产的外国公司。[15] 例如 2016 年，CFIUS 阻止了中国投资者收购德国芯片制造商爱思强的计划，以及荷兰公司飞利浦向一家中国基金出售 Lumiled 照明设备的计划。[16]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出口管制变得更为明显。2018，两项新法律强化了美国 FDI 管控，并特别关注出口管制和 FDI 中的“新兴及基础技术”：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RRMA)。2018 年出口管制改革法，为美商务部颁布的出口管理条例(EAR)重新确立永久法律基础。[17] 自 2001 年失效以来，曾要求总统行政令延长有效期。[18] 改革包括对制裁中国家许可证的审查制度，以及要求商务部在“对美国防工业冲击”的基础上审慎颁发对出口许可证。[19] 除美国出口管控制度的这些变化，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同样也提供了一个公众咨询，作为拟议规则制定(ANPRM)的事先告知。这一过程包括对公司和研究机构的意见咨询，以界定“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特定新兴技术”。[20] 作为 ANPRM 的一部分，BIS 首次确定了 14 个“具有代表性的技术类别”，大致概括了可视为新兴技术的范围。[21] 虽然这次公开咨询只是正式确定类别的第一步，但对出口管制和 CFIUS 都具有重大意义，其原因就是这将直接决定 FDI 的范围。

鉴于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某些形式的 FDI 难以被管控机制覆盖，2018 年 CFIUS 将 FDI 审查报告范围扩大，涉及投资、行业和技术品类。CFIUS 审查流程将更为及时有效。[22] 对于“关键技术”的一些核心条款，FIRRMA 定义为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和过边出口管控机制所覆盖的技术，包括“根据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第 1758 条下的新兴和基础技术”。将有一个为期 18 个月的试验期，并在第一个月对征求了公众意见。[23] 根据该计划，CFIUS 将管辖范围扩大至外国人士对涉及核心技术或生产、设计、测试、制造和研发的美国公司的非控股型投资。[24]

欧盟关于 FDI 筛选的拟议规则

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相比，欧盟成员国对 FDI 限制性管控较少。[25]事实上，欧盟一直将促进跨境投资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FEU)第 63 条禁止“对成员国之间以及成员国与第三国之间资本流动实施一切限制”。[26]然而，TFEU 还同时表示为实现条约确定目标，可“基于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考量实施管控。[27]欧盟成员国在这一领域的做法差异很大，没有针对成员国的强制性政策协调机制，甚至在涉及多个欧盟国家的 FDI 可能涉及跨境安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28]目前，有 14 个欧盟成员国建立了 FDI 筛选机制。但其中一些机制最近已经或计划引入更为严格的举措，对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 FDI 愈发重视。[29]

2016 年，面对亲身经历的 FDI 飙升，欧盟主要成员国对 FDI 水平和来源表现出深深的忧虑。2015 年至 2016 年间，中国欧盟 FDI 增长了三分之二，达到 350 亿欧元。[30]此后，2017 年中国欧盟 FDI 下降至 290 亿欧元，2018 年继续下滑降至 170 亿欧元。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加强了对外资金流动的控制，以及欧盟成员国也相应的出台了一些政策。[31]2016 年 10 月，德国经济事务和能源部长西格玛·加布里埃尔，对中国正在欧洲进行“购物之旅”表示担忧，欧洲战略性技术正被中国一扫而空。[32]加布里埃尔呼吁在欧盟范围内制定一项“保障条款”，用于阻止外国收购欧盟核心技术公司。而此类公司对欧盟的竞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33]

2017 年 2 月，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联名致函欧盟委员会，要求欧盟委员会制定一项新的法律机制，允许欧盟成员国建立新机构，旨在监测和阻止外国收购。[34]2017 年 5 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驾驭全球化”的反思文件，强调欧盟需要继续开放投资，同时也承认 FDI 投资模式和“捍卫欧盟基本利益必要性”的关切。[35]

2017 年 9 月 13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一项法规提案，拟议建立一个共同的欧盟法律框架，用于对流入欧盟的 FDI 进行筛选。[36]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进行谈判之后，条例最终版本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达成一致，并于 2019 年初获得通过。[37]

条例并不强制要求没有筛选机制的欧盟成员国建立筛选机制，也未详细说明筛选机制应具备的特征。相反，条例规定了任何筛选机制都应具备的基本要求，规定各国有义务分享其正在审议的具体案件信息，并允许各国就欧盟其他盟国的

FDI 案件提出自己的意见。欧盟委员会还将对“可能影响欧盟安全和公共秩序的”FDI 案件发表不具约束力的意见。[38]

控制敏感或战略性技术的转让只是条例努力解决的挑战之一。然而，条例背后的诸多关切都位列其中，也在条例起草过程中得以一一应对。最终版本表示，各国在决定是否批准 FDI 时，以及外国投资者是否“直接或间受控于政府控制、国家机构或武装部队”，应考虑应对理事会第 428/2009 号条例(EC)第 2 条第 1 点中定义的“关键技术和军民两用品”的潜在影响，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网络安全、航空航天、国防、能源储存等诸多技术。[39]

结语

欧盟新规并非要迫使成员国对 FDI 实施筛查措施。然而，对信息共享和达成一致意见的最低标准可能会鼓励更多的成员国这样做，并且有助于确保既有措施更协调更高效。然而，要想实现有效运作，法规必须克服若干重大障碍。欧盟成员国不一定非得对 FDI 案例在“公共秩序和安全”方面形成一致意见，也并非所有欧盟国家都清楚的指导，在其领土上究竟是哪些公司和机构正在生产或研发敏感或战略技术。一旦信息分享涉及商业敏感信息，一些欧盟成员国可能不太愿意或无法分享其 FDI 具体细节。最后，也并非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有法律和监管权限来阻止 FDI。

在美国，FDI 管控的所有相关机制工具、权力和决策结构都收口于联邦政府，国家有明确的、以经济考量驱动实现管控目标。此外，在加强管控的同时还有其他配套措施，以确定哪些技术应被视为“敏感”或“战略级”技术，并明确是否有需要添加至美国出口管控清单或是从中移除。在欧盟一级并未有对等措施。然而，考虑到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其他国家也确实很少有实力效仿美国模式。此外，美国这一做法背后既有特朗普政府日益膨胀的保护主义倾向的推动和背书，也有中美贸易战逐步升级的刺激。因此，这也可能会被视为美国愿意利用贸易管制促进自身经济利益的又一力证。从长远来看，作为抵御武器和军民两用品非法贸易的利器--贸易管控机制的真正价值也正在被侵蚀。

1 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和弹药清单，WA-清单（16）1

Corr. 1，2017 年 2 月 17 日；导弹技术管制机制，设备、软件和技术附件，2017 年 10 月 19 日。
2 布罗姆利·M，马莱塔·G，软件和技术转让对不扩散努力构成挑战：实施和遵守出口管制（SIPRI:斯德哥尔摩，2018 年 4 月）；布罗克曼·K，起草、实施和遵守出口管制：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战略贸易审查，第 4 卷，第 6 期（2018 年），第 7 页；布罗姆利·M，布罗克曼·K，马莱塔·G，增材制造的无形转让控制'，SIPRI 年鉴 2018，第 437-47 页。
3“技术”，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第 12 版（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2011）。
4《金融时报》“外国直接投资定义”。
5 见布里德洛夫·P 和科萨尔·M·E，“新兴技术和国家安全：俄罗斯、北约和欧洲战区”，胡佛研究所，2019 年 2 月 25 日;布罗克曼·K,鲍尔·S 和布兰宁·V,生物+X:军备控制同生物与新兴技术的融合(SIPRI:斯德哥尔摩，2019 年 3 月)。
6 海登坎普·H，劳斯·L 和泰勒·T，国防工业三部曲：客户、出资方和监管者三合一的政府，白厅文件（皇家联合服务学院：伦敦，2013 年）。
7 布兰宁·V 和韦布鲁根·M.，绘制自主武器系统发展路线图，(SIPRI:斯德哥尔摩，2017 年 11 月)。
8 伍贝克·J，中国制造 2025：高技术超级大国的形成及其对工业国家的影响，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中国论文第 2 期（MERICS:Berlin，2016 年 12 月）。
9 卡尼亚·E·B，“中国对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研究和创新领导力的威胁”，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上的证词，2018 年 7 月 19 日。
10 诺文斯·M 和莱加达·H，“中国对军民两用技术的追求”，国际战略研究所，2018 年 12 月 18 日。
11“外国直接投资定义”（注 4）。
12 汤姆森·S 和米斯图拉·F，投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吗？来自 OECD 对 FDI 管制限制性指数的证据（OECD：巴黎，2017 年），第 1 页。
13 汤姆森和米斯图拉（注 12），图 5，第 5 页。
14 美国工商安全局，出口管理条例修订：出口管制改革初步实施，2013 年 4 月 16 日。
15 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多相关信息，见美国财政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
16 奥查德·E，“中国在美国抵制后放弃对地图公司的投资”，路透社，2017 年 9 月 26 日。
17《出口管制改革法》为《 2019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第 17 部分子标题 B，No.115-232，2018 年 8 月 13 日签署成为法律。
18 霍根·洛弗斯，“出口管制改革 2.0”，2018 年 8 月 21 日。
19 霍根·洛弗斯（注 18）。
20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拟议规则制定的预先通知：对某些新兴技术控制措施的审查”，联邦公报，第 83 卷 No.223（2018 年 11 月 19 日）。
21 14 个技术类别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定位、导航和计时(PNT)技术、微处理器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数据分析技术、量子信息和传感技术、物流技术、增材制造、机器人、脑机接口、高超音速、先进材料和先进监视技术，美国商务部（注 20）。
22 美国财政部，《2018 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摘要》，《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为《国防授权法》2019 财政年度的子标题 A（注 17）。
23 美国财政部公共事务办公室，《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管理局试点计划暂行条例》，情况说明书，2018 年 10 月 10 日；美国财政部公共事务办公室，《问答：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管理局试点计划暂行条例》，2018 年 10 月 10 日。
24 雷诺兹·J·B，《在出口管制下定义“新兴技术”的第一步》，《改革法案》，戴维斯波尔克，2018 年 11 月 28 日。
25 汤姆森和米斯图拉（注 12）。
26《欧洲联盟运作条约》，《欧洲联盟公报》，C 326，2012 年 10 月 26 日。
27 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建立欧盟外国直接投资筛选框架的法规提案”，2017 年 9 月 13 日。
28 霍根·洛弗尔斯，“欧盟筛选外国直接投资新框架”，2018 年 12 月 4 日。
29 14 个成员国为奥地利、丹麦、德国、芬兰、法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贸易委员会支持外国直接投资筛选协议”，新闻稿，2018 年 12 月 10 日；霍根·洛弗尔斯（注 28）。
30 哈尼曼·T 和霍塔里·M，欧盟-中国外国直接投资：致力于投资关系互惠，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中国论文第 3 期更新(MERICS:柏林，2018 年 5 月)。
31 哈尼曼·T 和霍塔里·M 和克拉茨·A，中国在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2018 年趋势和新筛选政策的影响，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中国论文第 3 期更新(MERICS:柏林，2019 年 3 月)。
32 尼纳伯·M，“德国部长中国之行之前反对收购的言论”，路透社，2016 年 10 月 29 日。
33 尼纳伯（注 32）。
34“法国、德国、意大利敦促重新考虑在欧盟的外国投资”，路透社，2017 年 2 月 14 日。
35 欧洲议会，“立法培训计划：平衡和进步的贸易政策，以驾驭全球化”，2018 年 12 月 14 日。
36 欧洲议会（注 35）。
37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机构间谈判产生的临时协议”，2018 年 12 月 6 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

事会 2019 年 3 月 19 日第 2019/452 号条例（欧盟），建立欧盟外国直接投资筛选框架，欧盟官方公报，L79 I，2019 年 3 月 21 日。
38 法规（欧盟）2019/452（注 37），第 19 段。
39 第 2019/452 号法规（欧盟）（注 37），第 4（1）（b）条和第 4（2）（a）条。引用的法规是欧盟军民两用品法规。理事会 2009 年 5 月 5 日第 428/2009 号条例，建立管制军民两用品出口、转让、中介和过境共同体制度，《欧洲联盟公报》，L134，2009 年 5 月 29 日。

附件

附件 A. 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

附件 B. 国际安全合作机构

附件 C. 2018 年大事记

附件 A.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

本附件所列为军控与裁军相关多边、双边条约、公约、协议及协定。除另有说明，缔约方及签署国协议均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国际安全合作机构，见附件 B。

注：

1.协议分为通用条约(即多边条约对所有国家开放,I)节,区域性条约(即多边条约开放状态的一个特定的地区,在第二节)和双边条约(第三节)。每一节中列出的协议日期的顺序,他们采用,签名或者开放供签署多边协议或签署了双边协议。还列出了这些条约生效的日期和多边条约的保管人。

2.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条约保存人提供的签署国和缔约国名单。在缔约方和签署国名单中，名字以斜体显示的国家在 2018 年批准、加入或继承或签署了该协定。

3.被列为缔约方的国家和组织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前批准、加入或支持这些协定。由于许多协定将一国在批准或加入后的一段时间内推迟生效，当 2018 年末发生时，该协定可能尚未在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对该国全面生效。

4.前非自治领土在获得国家地位后,有时对前统治国缔结的所有协定作出连续性的一般性声明。本附件所列缔约国仅包括那些已就连续性作出无异议声明或已将其继承情况通知秘书长的新国家。俄罗斯联邦继续履行苏联的国际义务。

5.除另有规定外，本附件所列各项多边协定均向所有国家、各有关地区或区域的所有国家或某一国际组织的所有成员开放，供其签字、批准、加入或继承。并非所有的签署者和缔约方都是联合国会员国。台湾虽然没有被许多国家承认为主权国家，但被列为它批准的协定的缔约国。

6.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条约文本的精确副本(印刷出版物或在线出版物)的位置。这可以由条约保存机构、与条约有关的机构或秘书处提供，也可以在《联合国条约汇编》中提供(可在网上< http://es.un.org/>)。

第 1 节.普遍性条约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和细菌性作战方法的议定书(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

1925 年 6 月 17 日在日内瓦签署;1928 年 2 月 8 日生效;法国政府负责文本存托。

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和细菌性作战方法。议定书仍然是国际禁止化学和生物战的基本基础，1972 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和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明确支持其原则、目标和义务。

缔约国(141):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冈比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教廷、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朝鲜(北),韩国(南)、科威特、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台湾、坦桑尼亚、泰国、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越南、也门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除 141 个缔约国外，亚美尼亚于 2018 年初加入议定书，巴勒斯坦申请加入。

在加入议定书时，一些国家提出了保留意见，坚持它们有权对议定书的非缔

约国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对包括非缔约国在内的联盟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或对违反议定书使用此类武器的一方作出反应。许多这些国家已取消此类保留意见，尤其是在缔结 1972 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和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之后，保留此类意见已与其公约下义务相违背。

除了这些“明确的”保留意见外，一些在获得独立时宣布继承前任国家“隐晦的”保留意见。如那些从英国和法国赢得独立的国家，或撤销此类保留或是对其进行修订。加入(而非继承)议定书的国家没有以这种方式继承保留。

议定书文本:国际联盟，条约系列，第 94 卷(1929 年)，第 65-74 页，

< https://es.un.org/ doc/Publication/ aunt /LON/Volume 94/v94.pdf>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灭绝种族罪公约)

1948 年 12 月 9 日在巴黎开放签字;1951 年 1 月 12 日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公约文本存托。

根据公约，任何意图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都按国际法宣布为种族灭绝罪行。

缔约国(149):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群岛,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朝鲜),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瑞典,瑞士,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也门*、津巴布韦*

*有保留及/或声明。

签字但尚未批准(1):多米尼加共和国

公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es/1951 /01/19510112 08-12 PM/Ch_IV_1p.pdf>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四)

1949 年 8 月 12 日条约在日内瓦开放签字;1950 年 10 月 21 日生效;瑞士联邦委员会负责条约文本托存。

《日内瓦公约》(四)规定了在战争地区和被占领土内保护平民的规则。1949 年 4 月 21 日至 8 月 12 日举行的外交会议上，还同时制订了另外三项公约:《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病员状况的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病员和遇难军人状况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三)。

缔约国(196):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朝鲜(北)*,朝鲜(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

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南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有保留及/或声明。

公约文本:瑞士联邦外交部，

https://www.fdfa.admin.ch/dam/eda/fr/documents/aussenpolitik/voelkerrecht/geneve/070116-conv4_e.pdf

《关于保护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

《关于保护非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

1977 年 12 月 12 日在伯尔尼开放签字;1978 年 12 月 7 日生效;瑞士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文本托存。

议定书确认，参与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的各方选择战争方法或手段的权利并非毫无限制，并禁止使用造成多余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或战争手段。

第一议定书缔约国(174)和第二议定书(168)缔约国: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Angola1 *,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的*,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

乍得、智利* *,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伊拉克 1,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鲜(北),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 1、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苏丹、南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 1,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 *,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 1,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有保留及/或声明。1

只适用于第一议定书的缔约方。

第一议定书文本:瑞士联邦对外事务部，<https://www.fdfa.admin.ch/dam/eda/fr/documents/aussenpolitik/voelkerrecht/geneve/77prot1_en.pdf>

第二议定书文本：瑞士联邦对外事务部，<https://www.fdfa.admin.ch/dam/eda/fr/documents/aussenpolitik/voelkerrecht/geneve/77prot2_en.pdf>

南极条约

1959 年 12 月 1 日，12 个原缔约国在华盛顿特区签署;1961 年 6 月 23 日生

效;美国政府条约文本存托。

条约宣布南极地区将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条约禁止在南极采取任何军事性质措施，例如建立军事基地和防御工事，进行军事演习或试验任何类型武器。条约禁止任何核爆炸以及在南极洲处置任何放射性废料。条约规定了对南极洲所有站点设施进行现场视察的权利，以确保遵守其规定。

通过在南极洲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活动，如建立科考站或派遣科考队，表明其对南极洲感兴趣的国家有权成为协商成员国。根据第九条之规定，协商成员国定期举行会议，就南极洲相关事项交换信息、进行协商，并向各国政府建议促进条约原则和目标的措施。

缔约国(53):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古巴,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匈牙利、冰岛,印度,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朝鲜(北),韩国(南)*、马来西亚、摩纳哥、蒙古,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

*条约第九条协商成员。

条约文本:南极条约秘书处，<http://www.ats.aq/documents/ats/treaty_original.pdf>

《环境保护议定书》(1991 年马德里议定书)，1991 年 10 月 4 日开放签字，1998 年 1 月 14 日生效。议定书将南极洲定为致力于和平与科学的自然保护区。

议定书文本:南极条约秘书处，

<http://www.ats.aq/documents/ats/treaty_ original.pdf>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部分禁试条约，PTBT)

1963 年 8 月 5 日由三个原缔约国在莫斯科签署，并于 1963 年 8 月 8 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开放供其他国家签署;于 1963 年 10 月 10 日生效;英国、俄罗斯和美国政府的保管人

《条约》禁止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a)在大气层，超过其限度，包括外层空间，或在水下，包括领海或公海;以及(b)在任何其他环境中，如果这种爆炸导致放射性碎片出现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外。

缔约国(126):阿富汗、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佛得角、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芬兰、加蓬、冈比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韩国(南)、科威特、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黑山、摩洛哥、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台湾、坦桑尼亚、泰国、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也门、赞比亚

签署但未批准(10):阿尔及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埃塞俄比亚、海地、马里、巴拉圭、葡萄牙、索马里

条约文本:俄罗斯外交部，< http://mddoc.mid.ru/api/ia/download/?uuid=561590f5-ed1a-4e2a-a04e-f715bccb16ad>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外层空间条约)

于 1967 年 1 月 27 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开放签字;于 1967 年 10 月 10 日生效;英国、俄罗斯和美国政府为条约保管人

《条约》禁止任何携带核武器或任何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进入地球轨道，禁止在天体上安装此类武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驻留。禁止建立军事基地、设施和防御工事，禁止试验任何武器，禁止在天体上进行军事演习。

缔约国(108):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

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智利、中国、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鲜(北),韩国(南),科威特、老挝、黎巴嫩、利比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叙利亚、台湾、泰国、多哥、汤加、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

签字但未批准(25):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伊朗、约旦、莱索托、马来西亚、黑山、巴拿马、菲律宾、卢旺达、塞尔维亚、索马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条约文本:英国外交和联邦办公室，条约编号No.10(1968),<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70006/Treaty_Principles_Activities_Outer_Space.pdf>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于1968年7月1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开放供签署;于1970年3月5日生效;英国、俄罗斯和美国政府为条约保管人

条约将核武器国家定义为在1967年1月1日之前制造和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根据这个定义，有五个核武器国家: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所有其他国家都被定义为无核武器国家。

条约禁止核武器国家向任何接受国转让或控制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并禁止它们协助、鼓励或诱导任何无核武器国家制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这种武器或装置。它还禁止无核武器缔约国从任何来源、从制造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得核武

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缔约各方承诺便利为和平利用核能交换设备、材料和科学和技术资料，并确保将和平利用核爆炸的潜在利益提供给《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它们还承诺就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效措施以及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进行诚意的谈判。

无核武器缔约国承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缔结保障协定，以防止将核能从和平用途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1997 年核可了保障协定附加示范议定书，加强这些措施;各国分别与原子能机构签署了其他安全警卫议定书。

1995 年根据《条约》召开的审查和延期会议决定，《条约》应无限期有效。

缔约方（192）：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刚果（的民主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 d（的共和国）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 ，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 ，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尼*，*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韩国（南）*，韩国（北）一，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摩尔多瓦*，摩纳哥* ，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

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瑞典*，瑞士*，叙利亚*，台湾*，斯威士兰*，瑞典*，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 根据条约的要求，或核武器国家自愿缔结的与原子能机构生效的保障协定的缔约国。

†条约定义的核武器国家

a 朝鲜于 2003 年 1 月 10 日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当时一项保障协定已生效。其他各方对朝鲜的现状存在争议。根据条约的要求，或核武器国家自愿缔结的与原子能机构生效的保障协定的缔约国。

条约文本:国际原子能机构，INFCIRC/140, 1970 年 4 月 22 日，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1970/infcirc140.pdf

生效的附加保障协议（133）：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 1 ，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

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帕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塞内加尔，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多哥，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

1 丹麦格陵兰岛附加议定书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生效。

注:伊朗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截至 2016 年 1 月 16 日，它将暂时适用 2003 年签署但尚未批准的附加议定书。台湾已同意实施《示范附加议定书》所载的措施。

附加保障协议文本:国际原子能机构，INFCIRC/540(更正)，1997 年 9 月，<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infcirc540c.pdf>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上部署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海床条约)

1971 年 2 月 11 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开放签字;于 1972 年 5 月 18 日生效;英国、俄罗斯和美国政府为保管人

条约禁止植入或安置在海底外部界限之外 12 海里英里(22-公里)海底区域任何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结构、发射设施或其他设施专门设计用于存储,测试或使用这种武器。

缔约方(95):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中国,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芬兰、德国、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冰岛、希腊,印度,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韩国(南)、老挝、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黑山、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拿马、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瑞士、瑞典、瑞士、台湾、多哥、突尼斯、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越南*，也门，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签署但未批准(21):玻利维亚、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几内亚、洪都拉斯、黎巴嫩、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里、缅甸、巴拉圭、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苏丹、坦桑尼亚、乌拉圭

条约正文:英国外交和联邦办公室，条约编号 13 (1973)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

1972 年 4 月 10 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开放签字;1975 年 3 月 26 日生效;英国、俄罗斯和美国政府为条约保管人

《公约》禁止以其他方式发展、生产、储存或取得或保留种类和数量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而这些制剂或毒素没有理由作预防性、保护性或其他和平目的。它还禁止用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种药剂或毒素的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对双方拥有的代理人、毒素、武器、设备和运输工具的销毁，或将其转用于和平目的，应不迟于《公约》对每个国家生效后九个月内进行。

缔约国每年举行政治和技术会议，以加强《公约》的执行。设在日内瓦的一个三人执行支助股支助缔约方执行《条约》，包括协助收集和分发年度建立信任措施和支助它们实现普遍成员资格的努力。

缔约国(180):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

绍、圭亚那、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鲜(北),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台湾,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 不结盟运动,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有保留及/或声明。

签署但未批准的(6):中非共和国、埃及、海地、索马里、叙利亚、坦桑尼亚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除 180 方外，巴勒斯坦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加入《公约》。

条约正文:英国外交和联邦办公室，条约编号 11 (1976)

禁止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使用环境修改技术公约(Enmod 公约)

于 1977 年 5 月 18 日在日内瓦开放签字;1978 年 10 月 5 日生效;存托联合国秘书长

《公约》禁止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使用环境修改技术，这些技术作为破坏、损害或损害缔约国的手段，具有广泛、持久或严重的影响。“环境改造技术”一词是指通过有意操纵自然过程而改变地球的动力学、组成或结构的任何技术，包括地球的生物群、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层，或外层空间。在谈判中达成的谅解(但未写入公约)定义了“广泛的”、“持久的”和“严重的”。

缔约国(78):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巴西、保加利亚、佛得角、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埃及、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朝鲜),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立陶宛、老挝、马拉维、毛里求斯、蒙古,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也门签署但未批准(16):玻利维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教廷、冰岛、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亚、卢森堡、摩洛哥、葡萄牙、塞拉利昂、叙利亚、土耳其、乌干达

*声明。

公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1978/10/1978100500am /Ch_XXVI_01p.pdf>

《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公约》

1980 年 3 月 3 日在纽约和维也纳开放签字的原有公约;于 1987 年 2 月 8 日生效;2005 年 7 月 8 日通过的修订;经修订的公约于 2016 年 5 月 8 日对其批准国生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最初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责成缔约国在国际运输中为和平目的保护核材料。

经修订和重新命名的《公约》还责成缔约国保护核设施和储存期间用于和平目的的材料。

原公约缔约国(155):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群岛*,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智利、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

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原子能共同体*,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尼*,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鲜(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岛*,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丹,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也门，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注:除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的 155 个缔约国外，巴勒斯坦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加入《公约》。

签署但未批准的(1):海地

公约案文:国际原子能机构，INFCIRC/274, 1979 年 11 月，

修正后公约缔约国(115):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原子能共同体*、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

尔多瓦、摩纳哥、黑山、摩洛哥、缅甸*,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圣•露西亚,圣马利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有保留及/或声明。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除 115 方外，巴勒斯坦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接受了修改后的公约。

国际原子能机构，INFCIRC/274/Rev.1/Mod，2016 年 5 月 1 日，9 日，

<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circ274r1ml.pdf >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公约》或《非人道武器公约》）

1981 年 4 月 10 日在纽约开放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议定书供签署;于 1983 年 12 月 2 日生效;存托联合国秘书长

《公约》是一项“伞形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可以以议定书的形式缔结具体协定。为了成为《公约》的缔约国，一个国家必须批准至少两项《议定书》。原《公约》第一条修正案于 2001 年 11 月 21 日在日内瓦开放签字。它扩展了应用程序的范围或其他非国际-武装冲突。经修订的公约于 2004 年 5 月 18 日生效。

第一议定书禁止使用旨在用 x 光无法在人体中检测到的碎片进行伤害的武器。第二议定书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经修订的第二定书于 1998 年 12 月 3 日生效，加强了对杀伤地雷的限制。第三议定书限制使用燃烧弹武器。第四议定书于 1998 年 7 月 30 日生效，禁止使用专门设计来永久失明的激光武器。第五议定书于 2006 年 11 月 12 日生效，承认需要采取一般性的措施，尽量减少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危险和影响。

原公约和议定书缔约国(125):阿富汗 2,阿尔及利亚 2、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 1,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 5、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 2、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 4,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

迪瓦'Ivoire4,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2、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2、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 1,意大利*,牙买加2,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2、韩国(南)3、科威特2、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2、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尔代夫2日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3,蒙古,黑山,摩洛哥4,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2、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勒斯坦2、巴拿马、巴拉圭、秘鲁2、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2,罗马尼亚,俄罗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1,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5、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2、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多哥、突尼斯、土耳其*3,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1仅为1981年第一号和第二号议定书的缔约国。

仅为1981年第一号和第三号议定书的缔约国。

仅为1981年第一号议定书的缔约国。

1981年第二号议定书的缔约国。

仅为1981年议定书III的缔约国。

签署但未批准最初的公约和议定书(4):埃及、尼日利亚、苏丹、越南

修定后的第二议定书缔约国(10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韩国(南)*、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摩洛哥、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

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第四议定书缔约国(108):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蒙古、黑山、摩洛哥、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

*有保留及/或声明。

第五议定书缔约国(9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朝鲜(韩国),科威特、老挝、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摩尔多瓦、黑山、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

巴勒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原《公约和议定书》案文:《联合国条约汇编》,《条约》。
un.org/doc/Treaties/1983/12/19831202 01-19 AM / XXVI-2-revised.pdf >

公约修正案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
2001/12/20011221am /Ch_XXVI_02_cp.pdf>

修订的第二议定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
/1996/05/19960503 01-38 AM/Ch_XXVI_02_bp.pdf>

第四议定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 /
1995/10/19951013am /Ch_XXVI_02_ap.pdf>

第五议定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
/2003/11/20031128 01-19 AM/Ch_XXVI_02_dp.pdf>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于 1993 年 1 月 13 日在巴黎开放签字;于 1997 年 4 月 29 日生效;存托联合国秘书长

《公约》禁止发展、生产、获得、转让、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制度包括四个“支柱”:裁军、不扩散、协助和保护化学武器，以及和平利用化学的国际合作。

各方承诺在 2012 年 4 月 29 日之前销毁其化学武器库存。在宣布储备化学武器的七方中，有三方(阿尔巴尼亚、印度和韩国)销毁了化学武器，俄罗斯在 2017 年完成了化学武器储备的销毁，三方(伊拉克、利比亚和美国)继续销毁化学武器。叙利亚 2013 年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时申报的化学武器库存在 2016 年被销毁。旧的和废弃的化学武器将继续被销毁，因为它们将从以前的战场上被发现。

缔约国(192):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签署但未批准的(1):以色列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除 192 个缔约国外，巴勒斯坦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交存了《公约》附件。但是，它在《公约》生效之前于 2018 年 1 月 8 日撤回了该文书。

公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

于 1996 年 9 月 24 日在纽约开放供签署;尚未生效;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条约禁止进行任何的核武器试验保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敦促双方避免任何这样的核爆炸在任何地方在其管辖或控制,避免造成,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核武器试验的实施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

《条约》将在列入《条约》附件的 44 个国家交存其批准书之日起 180 天后生效。所有 44 个国家都拥有核反应堆和/或核研究反应堆。

待批准生效国家(44):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及*、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朝鲜)*,韩国(南)、墨西哥、荷兰、挪威、巴基斯坦、秘鲁、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越南

*尚未批准该条约。

批准书交存(166):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刚果(共和国)、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墨西哥、密克

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挪威、阿曼、帕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丹、苏里南、瑞典、斯威士兰、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赞比亚签署但未批准(17):

中国、科摩罗、埃及、赤道几内亚、冈比亚、伊朗、以色列、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美国、也门、津巴布韦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https://es.un.org/doc//1997/09/19970910 07-37 AM/Ch_XXVI_04p.pdf>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和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于1997年12月3日至4日在渥太华及1997年12月5日在纽约开放供签字；于1999年3月1日生效;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公约禁止杀伤人员地雷(APM)，杀伤人员地雷的定义是当人员出现、接近或接触时起爆，使人员丧失行为能力、伤害或杀死一人或数人的地雷。

所有缔约国承诺最晚在公约生效后的四年内，销毁其储存的APM。各缔约国还承诺，在公约生效后的10年内，在其管辖或控制的雷区内，销毁所有地雷设施。

缔约国(16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

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挪威、阿曼、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南苏丹，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有保留及/或声明。

签字但尚未批准(1):马绍尔群岛

公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es/1997/09/1997091807-53AM/Ch_XXVI_05p.pdf>

集束弹药公约

2008年12月3日在奥斯陆开放签字;2010年8月1日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文本存管。

公约宗旨是禁止使用、生产、传输和储存会对平民造成不可接受伤害的集束弹药,并建立相应框架,以合作和协助确保为受害者提供足够的护理和康复,清除污染地区,风险管控教育和销毁集束弹药库存。该公约不适用于地雷。

缔约国(102):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喀麦隆、加拿大、乍得、智利、

哥伦比亚、科摩罗、库克群岛、刚果(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斐济、法国、德国,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老挝、黎巴嫩、莱索托、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莫桑比克、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勒斯坦、帕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葡萄牙、卢旺达、萨摩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索马里，南非，西班牙，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英国，乌拉圭，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签字但尚未批准的国家(17):安哥拉、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浦路斯、吉布提、冈比亚、海地、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利比里亚、纳米比亚、尼日利亚、菲律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坦桑尼亚、乌干达

注:除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的 102 个缔约国外，斯里兰卡于 2018 年 3 月 1 日加入《公约》。

公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 https://es.un.org/doc/publication/ CTC/26-6.pdf>

武器贸易条约（ATT）

2013 年 6 月 3 日在纽约开放签字;2014 年 12 月 24 日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存管。

条约的目标是为常规武器国际贸易管控制定尽可能高的国际统一标准;防止和根除常规武器非法贸易及转移。如武器将被用于进行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条约禁止缔约国授权转让武器。条约同时还要求出口国对出口武器可能破坏和平与安全，或被用来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或国际人权法进行评估。每一个缔约国应提交一份关于核准或实际常规武器进出口的年度报告。

缔约国(92):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韩国(南)、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卢，英国，乌拉圭，赞比亚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除 92 个缔约国外,哈萨克斯坦和巴勒斯坦在 2017 年交存了加入文书，但要到 2018 年 3 月才成为缔约国。

签字但尚未批准(41):安道尔、安哥拉、巴林、孟加拉、巴西、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共和国)、吉布提、加蓬、几内亚比绍、海地、以色列、基里巴斯、黎巴嫩、利比亚、马拉维、马来西亚、蒙古、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帕劳、菲律宾、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新加坡、苏里南、斯威士兰、坦桑尼亚、泰国、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瓦努阿图、津巴布韦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 Treaty /2013/04/20130410 12-01 PM/Ch_XXVI_08.pdf>

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

2017 年 9 月 20 日在纽约开放签字;尚未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存管。

条约在序言中提到使用核武器对人道主义和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并援引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和武装冲突国际法规则。条约禁止缔约国发展、试验、生产、制造、获得、拥有或储存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禁止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最后，缔约国不得允许在其领土驻扎、安装或部署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

条约概述了 2017 年 7 月 7 日之后拥有、获取或控制核武器的任何缔约国销

毁核武器之程序，由缔约国指定的“主管国际机构”监督。各方须维持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之间的现有安全保障协定，并且至少必须同原子能机构缔结并实施一项全面保障协定(INFCIRC/153)。条约同时还包括对测试或使用核武的受害者给予适当补偿和援助，同时对污染地区的环境修复采取必要和适当措施的条款。

条约将在第 50 份批准文书交存 90 天后生效。条约成员资格并不损害缔约国其他、相容国际义务(例如《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试条约》)。条约无固定有效期限。缔约国提前正式通知退出，12 个月后即有权退出条约。

交存批准书国家(3):圭亚那、梵蒂冈、泰国

签字但尚未批准(53):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巴西、佛得角、中非共和国、智利、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刚果(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斐济、冈比亚、加纳、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爱尔兰、牙买加、基里巴斯、老挝、利比亚、列支敦士登、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墨西哥、纳米比亚、尼泊尔、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南非，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多哥，图瓦卢，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

注:除 3 个国家在 2018 年 1 月批准该条约外，墨西哥在 2018 年 1 月 16 日批准,古巴 1 月 30 日，巴勒斯坦 3 月 22 日，委内瑞拉 3 月 27 日。截至 2018 年 1 月，共有 53 个国家签字但尚未批准该条约。哈萨克斯坦于 3 月 2 日签署条约。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https://es.un.org/doc//2017/07/20170707_03-42_PM/Ch_XXVI_9.pdf

第 2 节.区域性条约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原条约于1967年2月14日在墨西哥城开放签字;1968年4月22日生效;1990年、1991 年和 1992 年三次修订;墨西哥政府负责托管。

条约禁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试验、使用、制造、生产或取得核武器，以及接受、储存、安装、部署和以任何形式拥有任何核武器。

各方应与 IAEA 单独缔结协定，以便对其核活动实施保障措施。IAEA 有权进行特别督查。

条约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所有独立国家开放签字。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区域内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承诺对这一区域适用军事非核化规约。

根据《第二附加议定书》，公认的核武国家 –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 承诺尊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非核化，不参与违反条约之行为，也将不对条约缔约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原条约缔约国（33）：安提瓜和巴布达 1，阿根廷 1，巴哈马，巴巴多斯 1，伯利兹 2，玻利维亚，巴西 1，智利 1，哥伦比亚 1，哥斯达黎加 1，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 3，厄瓜多尔 1，萨尔瓦多 1，格林纳达 1，危地马拉 1，海地，洪都拉斯 1，牙买加 1，墨西哥 1，尼加拉瓜 3，巴拿马 1，巴拉圭 1，秘鲁 1，圣基茨和尼维斯 1，圣卢西亚 1，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4，苏里南 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乌拉圭 1，委内瑞拉 1

1 已批准 1990 年、1991 年和 1992 年条约修订。

2 仅批准 1990 年和 1992 年条约修订。

3 仅批准 1992 年条约修订。

4 仅批准 1991 年和 1992 年条约修订。

第 1 附加议定书缔约国(4):法国*、荷兰*、英国*、美国*

第 2 附加议定书缔约国(5):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

*有保留及/或声明。

原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34 卷(1968 年)，

<https://es.un.org/doc/ Publication/ aunt /Volume 634/v634.pdf>

修订后的条约文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机构，S/Inf.652 第 3 版，2002 年 1 月 29 日，<http://www.opanal.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Treaty_Tlatelolco.pdf>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通加条约)

1985 年 8 月 6 日在拉罗通加开放签字;1986 年 12 月 11 日生效;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负责存管。

南太平洋无核区被定义为适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澳大利亚东西海岸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边界以及使用南极条约的南部地区，大体上都在赤道以北。

条约禁止制造或购买任何核爆炸装置,以及禁止各方在区域内外任何地方拥有或控制该类装置。各方还承诺不供应核材料或设备,除非接受 IAEA 保障措施,并禁止在其领土部署或测试任何核爆炸装置及转储,并禁止在该区域任何海域倾倒放射性废物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各方仍可自由允许外国船只及飞机访问和过境。

条约对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开放签字。根据《议定书 1》，法国、英国和美国承诺在它们负有国际责任的区域内领土内实施相关制造、驻留和试验核爆炸装置的条约禁令。

根据《议定书 2》，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对条约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或对《议定书 1》缔约国负有国际责任的区域内的任何领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

根据《议定书 3》，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在该区域内的任何地方试验任何核爆炸装置。

缔约国(13):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瑙鲁、新西兰、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

议定书 1(2)缔约国:法国*、英国*;签字但尚未批准(1):美国

议定书 2(4)缔约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签字但尚未批准(1):美国

议定书 3(4)缔约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签字但尚未批准(1):美国

*有保留及/或声明。

条约文本: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
<http://www.forumsec.org/wp-content/uploads/2018/02/South-Pacific-Nuclear-Zone-Treaty-Raratonga-Treaty-1.pdf>

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CFE 条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16个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组织(WTO)的6个成员国于1990年11月19日在巴黎签署CFE原始条约;1992年11月9日生效;荷兰政府负责存托。

条约规定了五类条约限制装备的上限(TLE)—坦克、装甲战车、10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区域覆盖大西洋至乌拉尔山脉(大西洋至乌拉尔，ATTU)范围。

条约由WTO和NATO成员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95年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框架内谈判达成。

1992年塔什干协议,采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土ATTU区域内的应用程序(除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和1992年奥斯陆文档(特别会议最后文件CFE条约缔约国)介绍修改所需的条约,因为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国家。

缔约国（30)：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2，保加利亚2，加拿大2，捷克共和国2，丹麦2，法国，格鲁吉亚，德国2，希腊，匈牙利2，冰岛2，意大利2，哈萨克斯坦，卢森堡2，摩尔多瓦2，荷兰2，挪威，波兰，葡萄牙2， 罗马尼亚，俄罗斯1，斯洛伐克2，西班牙，土耳其2，英国2，乌克兰，美国2

1 2007年7月14日，俄罗斯宣布计划暂停参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以及2007年12月12日生效的相关文件和协议。2015年3月，俄罗斯宣布完全中止参与该条约。

2 2011年11月至12月，这些国家通知存管国，他们将停止条约规定下对俄罗斯的义务。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第一次审查会议通过了1996年侧翼文件，该文件从地理和数字上重新界定了侧翼地区,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以较少约束的方式进行少量TLE部署。

原(1990)条约文本:荷兰外交部，

<https://treatydatabase.overheid.nl/en/Verdrag/Details/004285/004285_Gewaarmerkt_0.pdf>

合并条约文本:荷兰外交部，

<http://wetten.overheid.nl/ BWBV0002009/>

侧翼文件文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http://www. osce.org/library/14099?download=true>, 附件 A

欧洲常规武装部队人员力量谈判修改协议(CFE-1A 协议)

CFE 缔约国于 1992 年 7 月 10 日在赫尔辛基签字;修改协议和 CFE 条约同时生效；荷兰政府负责文本保存。

这项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协定规定了各方在 ATTU 地区常规陆基武装部队部署人数上限。

协议文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http://www.osce.org/library/14093?download=true>

关于修改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的协定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缔约国于 1999 年 11 月 19 日在伊斯坦布尔签字;未生效;荷兰政府负责文本保存。

随着 WTO 解散以及一些前 WTO 成员加入北约，该协议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国与国间的军事平衡转变为区域间军事平衡，建立单个国家 TLE 上限，并构建新的限制架构和灵活机制，侧翼次上限并同时提高透明度。协议将对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开放 CFE 机制。所有签字国批准后，即可生效。

欧洲常规武装部队会议 1999 年最后文件及其附件载有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安排，涉及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中欧以及从外国领土撤出武装部队(即伊斯坦布尔承诺)问题。许多协议签字国都将视政治承诺执行情况来决定协议批准。

交存批准书国家(3):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1

*有保留及/或声明。

2007 年 7 月 14 日，俄罗斯宣布计划暂停参与于 2007 年 12 月 12 日生效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及其相关文件和协定。2015 年 3 月，俄罗斯宣布完全停止参与该条约。

注:乌克兰于 2000 年 9 月 21 日批准了协定，但未向文书保管国交存条约文书。

协议文本:荷兰外交部，

<https://treatydatabase.overheid.nl/en/Verdrag/Details/009241/009241_Gewaarmerkt_0.pdf>

1999 年修订条约文本:SIPRI2000 年年鉴，第 627-42 页

最后文件: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http://www. osce.org/library/14114>

开放天空条约

1992 年 3 月 24 日在赫尔辛基开放签字;2002 年 1 月 1 日生效;加拿大和匈牙利政府负责条约文本存管。

条约规定，缔约国各方有义务在接到临时通知后，向非武装侦察飞机开放其领空。开放范围从加拿大温哥华向东延伸至俄罗斯海参崴。

条约由 WTO 成员国和 NATO 成员国谈判达成。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任何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该条约。

缔约国(34):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签字但尚未批准(1):吉尔吉斯斯坦

条约文本:加拿大条约信息，

<http://www.treaty-accord.gc.ca/text-texte.aspx?id =102747>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

1995 年 12 月 15 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10 个成员国在曼谷签定条约;1997 年 3 月 27 日生效;泰国政府负责文件文本存管。

东南亚无核武区包括缔约国领土、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条约禁止在区域内或区域外发展、制造、获取或试验核武器，禁止在区域内或经由该区域部署和运送核武。各缔约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船只和飞机访问和过境。各方承诺不

向海上倾倒或向区内任何地方大气排放任何放射性物质或废料，或在区域内陆地处置放射性物质。各方应与 IAEA 缔结协定，在其和平核活动中实施全面保障措施。该条约开放供东南亚所有国家加入。

根据《条约》的一项议定书，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对条约任何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它们应进一步承诺不在该区域内使用核武器。该议定书将于各缔约国交存批准书之日起对其生效。

缔约国(10):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议定书:未签字，无缔约国

条约文本:东盟秘书处，

<http://asean.org/?static_post=treaty-on-the-southeast-asia-nuclear-weapon-free-zone>

议定书文本:东盟秘书处，

<http://asean.org/?static_post=protocol-to-the-treaty-on-the-southeeast-asia-nuclear-weapon-free-zone>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

1996 年 4 月 11 日在开罗开放签字;2009 年 7 月 15 日生效;非洲联盟秘书长负责文本保存。

非洲无核武器区包括非洲大陆领土、非洲联盟(AU)岛屿国家和非盟认为是非洲一部分的所有岛屿。

条约禁止研究、发展、制造和获得核爆炸装置，禁止在该区试验或部署任何核爆炸装置。各方仍可自由允许外国船只和飞机访问和过境。条约还禁止任何针对核设施的攻击。各方承诺不向区域内任何地方倾倒或允许倾倒放射性废物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各缔约国应单独与 IAEA 缔结协定，以便对其和平核活动实施全面保障措施。

条约向所有非洲国家开放加入。

根据第一议定书，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对条约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

根据第二议定书，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在该区域内测试

核爆炸装置。

根据第三议定书，法国和西班牙将承诺遵守条约关于两国在其国际责任区域内领土的某些规定。

缔约国（41）：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乍得，科摩罗，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 - 比绍，肯尼亚，莱索托，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西撒哈拉），塞舌尔，塞内加尔，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多哥 ，突尼斯，赞比亚，津巴布韦

签字但尚未批准的国家（13）：佛得角，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摩洛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乌干达

第 1 议定书（4）缔约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 签字但尚未批准（1）：美国*

第 2 议定书（4）缔约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 签字但尚未批准（1）：美国*

第 3（1）议定书缔约国：法国*

*有保留和/或声明。

条约文本：非洲联盟，
<http://au.int/sites/default/files/treaties/7777-treaty-0018_-_the_african_nuclear-weapon-free_zone_treaty_the_treaty_of_pelindaba_e.pdf>

次区域军备控制协定（佛罗伦萨协定）

佛罗伦萨协定由五国签订，于 1996 年 6 月 14 日生效。

协定是在 OSCE 主持下根据 1995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框架公约（代顿协定）附件 1-B 第四条的授权进行谈判。 协定为前交战各方军备设定了数字上限。 包括五类重型常规武器：武装坦克，装甲战车，重型火炮（75 毫米及以上），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 上限需在 1997 年 10 月 31 日之前达到; 到目前为止，已经销毁 6580 件武器，即 1996 年 6 月以前武器总量的 46%。 截至 2010 年 1 月 1 日，又有 2650 件武器被自愿销毁。

协定的执行受到OSCE轮值主席私人代表及联系小组(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监测和协助，并得到其他OSCE国家支持。根据2009年11月达成的两阶段行动计划，在签署了一系列新的协议修正案之后，协议执行责任将于2014年12月5日移交给双方。

缔约国(4):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

协议文本:克罗地亚国防部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303180926/http://arhiva.morh.hr/hvs/SPORAZUMI/tekstovi/SSKN-engleski.pdf>

美洲禁止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公约(CIFTA)

公约于1997年11月14日在华盛顿特区对美洲国家组织(OAS)成员国开放签字；1998年7月1日生效;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负责文本保存。

公约目的旨在防止、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卖枪支、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促进促成各方之间的合作以及信息和经验的交流。

缔约国(31):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有保留，签字但尚未批准的国家(3):加拿大、牙买加、美国

公约文本:OAS

<http://www.oas.org/en/sla/dil/inter_american_treaties_A-63_illicit_manufacturing_trafficking_firearms_ammunition_explosives.asp>

关于常规武器采购透明度的美洲公约

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于1999年6月7日在危地马拉城开放签字;2002年11月21日生效;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负责文本存管。

公约目标在于通过常规武器购置信息交换，促进美洲各国之间信任，从而更充分地促进区域在此类信息上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缔约国(17):阿根廷、巴巴多斯、巴西、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多米

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

签字但尚未批准(6):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海地、洪都拉斯、美国

公约文本:OAS，
<http://www.oas.org/en/sla/dil/inter_american_treaties_A-64_transparency_conventional_weapons_adquisitions.asp>

关于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区域管制枪支、弹药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议定书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布兰太尔开放供南部非洲共同体成员国签字;2004 年 11 月 8 日生效;南部非洲共同体执行秘书负责文本存管。

议定书目标包括防止、打击和铲除枪支、弹药和其他有关材料非法制造，以及防止该枪支弹药在该区域过度贩运、购买和使用。

缔约国(11):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签字但尚未批准(2*):刚果(民主共和国)、塞舌尔**

* SADC 的 3 个成员国，-安哥拉、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既未签字也未批准该议定书。塞舌尔在 2001 年签署议定书，但在 2004 年退出 SADC（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之前都未批准该议定书，2008 年塞舌尔重新加入 SADC。

议定书文本-SADC

<http://www.sadc.int/files/8613/5292/8361/Protocol_on_the_Control_of_Firearms_Ammunition2001.pdf>

关于在大湖区和非洲之角预防、控制和减少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内罗毕议定书

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内罗毕秘书处 10 个成员国和塞舌尔于 2004 年 4 月 21 日在内罗毕签署议定书;2006 年 5 月 5 日生效;大湖区、非洲之角和边界国家小型武器储藏区域中心(RECSA)

议定书目标包括预防、打击和消灭区域内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制造、贩运、拥有和使用。RECSA 负责监督议定书实施。

缔约国(9):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苏丹、乌干达

签字但尚未批准(6):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塞舌尔、索马里、南苏丹、坦桑尼亚。

协议文本 RESCA

web.archive.org/web/20140721014017/http://www.recsasec.org/publications/Nairobi_Protocal.pdf

西非经共体小武器和轻武器、弹药和其他有关材料公约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15 个成员国于 2006 年 6 月 14 日在阿布贾通过公约;2009 年 9 月 29 日生效;西非共同体委员会主席负责文本存管。

公约责成各方防止和打击小武器在 ECOWAS 的过度军备和破坏稳定。

缔约国(14):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

签字但尚未批准(1):冈比亚

公约文本:ECOWAS 执行秘书处，

< http://document.ecowas.int/ download/en/publications/Convention on Small Arms.pdf>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

中亚五国于 2006 年 9 月 8 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签署条约;2009 年 3 月 21 日生效;吉尔吉斯政府负责文本存管。

中亚无核武器区定义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条约规定，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研究、发展、制造、储存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拥有或控制核武器或任何其他核爆炸装置。

根据议定书，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对条约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

缔约国(5):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议定书缔约国(4):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签字但尚未批准(1):美国

*有保留及/或声明。

条约与议定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publications /No Volume/51633/Part/I-51633-080000028023b006.pdf>

中非控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及可用于制造、修理和装配的所有零件和部件公约(金沙萨公约)

非洲中央经济共同体(CEEAC)和卢旺达 10 个成员国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在布拉柴维尔开放签字;2017 年 3 月 8 日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文本托存。

公约旨在防止、打击和根除小武器在中非的非法贸易和贩运(确定为 CEEAC 成员国及卢旺达领土);加强对小武器生产、贸易、转让和使用的区域控制;打击武装暴力，减轻小武器在该地区造成的人类痛苦;并促进缔约国之间的合作与信任。

缔约国（7）：安哥拉，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共和国），加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签字但尚未批准（4）：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卢旺达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10/04/12000430-01-12 PM / Ch_xxvi-7.pdf

2011 年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维也纳文件

2011 年 11 月 30 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在维也纳通过维也纳文件;2011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

2011 年维也纳文件以 1986 年关于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和裁军的斯德哥尔摩文件以及以前的维也纳文件(1990 年、1992 年、1994 年和 1999 年)为基础。1990 年维也纳文件规定每年就军事情报、军事预算信息、风险防控流程、通讯网络和年度战略弹道导弹执行情况评估等信息进行沟通交流。1992 年维也纳文件和 1994 年维也纳文件扩大了适用范围，为军事活动、国防规划和军事接触推出了新机制和参数。1999 年维也纳文件旨在提升双边、多边和区域范围内透明度和信心，同时推出了一些区域改进措施，尤其是在限制性措施方面。

2011 年维也纳文件对核查活动的时间和新型武器及装备系统演示等事项进

行了修订。文件同时还制定了每五年对维也纳文件进行一次更新的程序，但原定于 2016 年重新公布的文件并未出现。

文件正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http://www.osce.org/fsc/86597?download=true>

第 3 节.双边条约

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 条约)

1972 年 5 月 26 日，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条约;1972 年 10 月 3 日生效;2002 年 6 月 13 日起失效。

条约双方—俄罗斯和美国—承诺不建设针对弹道导弹攻击的全国性防御系统，并限制获准部署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和部署。条约禁止各方向防空导弹、雷达或发射器提供对抗战略弹道导弹技术能力，并禁止其在战略反弹道导弹模式下进行试验。1974 年反弹道导弹条约议定书对获准进行的弹道导弹防御采取了进一步的数量限制。

1997 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接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成为条约缔约方以及接收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任国，并签署一系列协议将战略导弹防御条约(条约不允许)和非战略或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允许)做一个清晰的界定。俄罗斯在 2000 年 4 月批准了 1997 年的一系列协定，但是由于美国尚未批准，协议并未生效。

2001 年 12 月 13 日，美国宣布退出于 2002 年 6 月 13 日生效的条约。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44 卷(1974)，< https://es.un.org/doc/Publication/ aunt /Volume 944/v944.pdf>

协议文本:美国国务院，<https://www.state.gov/t/avc/trty/101888.htm#protocolabm>

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禁试条约，TTBT)

美国和苏联于 1974 年 7 月 3 日在莫斯科签署;1990 年 12 月 11 日生效。

俄罗斯和美国承诺不进行任何当量超过 15 万吨的地下核武器试验。1974 年的核查议定书在 1990 年被新的议定书所取代。

条约与议定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14 卷(1993 年)，

<https://treaties. 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 1714/v1714.pdf>

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和平核爆炸条约，PNET)

1976 年 5 月 28 日，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签署条约;1990 年 12 月 11 日生效。条约双方承诺不进行任何单体或组合地下核爆当量超过 15 万吨的和平目的核试验;不进行任何组合核爆当量超过 150 万吨的核爆试验，除非组合中单体爆炸可通过商定的核查程序加以识别和测量。1976 年核查议定书在 1990 年被新议定书所取代。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14 卷(1993 年)，

<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 1714 / v1714.pdf >

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INF 条约)

1987 年 12 月 8 日，美国和苏联在华盛顿签署条约;1988 年 6 月 1 日生效。

条约要求条约双方—美国和苏联—在 1991 年 6 月 1 日止销毁所有射程 500-5500 公里(中程，1000-5500 公里；短程，500-1000 公里)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到 1991 年 5 月，共计销毁了 2692 枚各型导弹。自 1991 年 6 月 1 日之后的 10 年间，为核查双方遵守情况，美苏进行了联合现场视察。2001 年 5 月 31 日实地视察结束后，继续使用监测卫星收集数据。

1994 年，条约成员国扩大至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57 卷(1991 年)，

< https://es.un.org/doc/ Publication/ aunt /Volume 1657/v1657.pdf>

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

1991 年 7 月 31 日，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条约;1994 年 12 月 5 日生效;2009 年 12 月 5 日条约期满。

条约要求最初的两个缔约国—美国和苏联—在 7 年内分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力量。条约对部署战略核运载工具(SNDV)—洲际弹道导弹(ICBM)，海基弹道导弹(SLBM)和重型核弹—以其携带的核弹头—设置了数量上限。

促进执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议定书(1992 年《里斯本议定书》),于 1994 年 12 月 5 日生效。本条约同时恢复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对前苏联所应承担的条约义务。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美国国务院，
<http://www.state.gov/t/avc/trty/146007. htm>

美苏关于进一步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

1993 年 1 月 3 日，俄罗斯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尚未生效。

条约将责成缔约各方在 2003 年 1 月 1 日之前,将装备有分导式多弹头(MIRV)的 ICBM 全部清除,并其部署的占了核弹头数量减少至不超过 3000-3500 枚(其中不超过 1750 枚将部署在 SLBM)。1997 年 9 月 26 日，双方签署条约附加议定书，将条约实施期限延长至 2007 年底。

两签署国批准了条约，但从未交换过批准文书。因此，条约从未正式生效。2002 年 6 月 14 日，作为对美国退出 6 月 13 日生效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条约)的回应，俄罗斯宣布不再受《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约束。

条约及议定书文本:美国国务院，
<http://www.state.gov/t/avc/trty/102887. htm>

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ORT 条约，莫斯科条约)

2002 年 5 月 24 日，俄罗斯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条约;2003 年 6 月 1 日生效;2011 年 2 月 5 日起失效。

条约责成缔约国双方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减少其实际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各方战略核弹头总数不得超过 1700-2200 枚。条约于 2011 年 2 月 5 日通过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50 卷(2005 年)，
< https://es.un.org/doc/ Publication/ aunt /Volume 2350/v2350.pdf>

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新 START 条约，布拉格条约)

2010 年 4 月 8 日，俄罗斯和美国在布拉格签署条约;2011 年 2 月 5 日生效。

条约要求缔约国双方—俄罗斯和美国—将各自(a)部署的 ICBM、 SLBM 及重型轰炸机数量至 700;(b)装备在 ICBM、 SLBM 以重型轰炸机的核弹头数量降至 1500 枚;(c)部署和未部署 ICBM 发射装置、 SLBM 发射装置及重型轰炸机数量降

至 800。削减必须在 2018 年 2 月 5 日之前完成;双边协商委员负责解决相关条约遵守及其他执行问题。条约附加议定书含有核查机制。

条约为 START I 后续条约，并取代 SORT。协议将继续执行 10 年，除被随后协议取代。如条约缔约国双方同意，可延长 5 年，但不能超过 5 年。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美国国务院，

< http://www.state.gov/t/avc/newstart/c44126.htm >

附件 B　国际安全合作机构

本附件描述了主要的国际组织、政府间机构、条约执行机构和转让管控机制，其目标包括促进安全、稳定、和平或军备控制，并列出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为止的成员或参与者。所述机构分为三类:具有全球重点或成员资格的机构(第 I 节)、具有区域重点或成员资格的机构(第 II 节)和旨在控制战略贸易的机构(第 III 节)。

首先列出联合国成员国和联合国系统机构，然后按字母顺序列出所有其他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国或参与国并非都是联合国成员国。2017 年加入或首次加入该组织的国家以斜体表示。各组织信息均附有可查网站信息。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见附件 A。

第 1 节.全球性机构或成员国

联合国(UN)

联合国，这一世界性政府间组织，1945 年通过其宪章后成立。UN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联合国的六大核心机构为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托管理事会(1994 年暂停运作)、国际法院(ICJ)和秘书处。

联合国大会设有六大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处理裁军和相关国际安全问题。第四委员会(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处理包括非殖民化、巴勒斯坦难民和人权、维持和平、地雷行动、外层空间、新闻、原子辐射和和平大学的各类事务。

联合国秘书处下属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UNODA)致力于推动核武器、生物、化学和常规武器裁军。联合国还有众多专门机构及其他自治机构。

联合国会员国(193 个)和加入年份

阿富汗，1946 年	厄瓜多尔，1945 年	立陶宛，1991 年
阿尔巴尼亚，1955	埃及，1945 年	卢森堡，1945 年
阿尔及利亚，1962 年	萨尔瓦多，1945 年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1993 年
安道尔，1993 年	赤道几内亚，1968 年	安哥拉，1976 年
厄立特里亚，1993 年	马达加斯加，1960 年	安提瓜和巴布达，1981 年
爱沙尼亚，1991 年	马拉维，1964 年	阿根廷，1945 年
埃塞俄比亚，1945 年	马来西亚，1957 年	亚美尼亚，1992 年
斐济，1970 年	马尔代夫，1965 年	澳大利亚，1945 年
芬兰，1955 年	马里，1960 年	奥地利，1955 年
法国，1945 年	马耳他，1964 年	阿塞拜疆，1992 年
加蓬，1960 年	马绍尔群岛，1991 年	巴哈马，1973 年
冈比亚，1965 年	毛里塔尼亚，1961 年	巴林，1971 年
格鲁吉亚，1992 年	毛里求斯，1968 年	孟加拉国，1974 年
德国，1973 年	墨西哥，1945 年	巴巴多斯，1966 年
加纳，1957 年	密克罗尼西亚，1991 年	白俄罗斯，1945 年
希腊，1945 年	摩尔多瓦，1992 年	比利时，1945 年
格林纳达，1974 年	摩纳哥，1993 年	伯利兹，1981 年
危地马拉，1945 年	蒙古，1961 年	贝宁，1960 年
几内亚，1958 年	黑山，2006 年	不丹，1971 年
几内亚比绍，1974 年	摩洛哥，1956 年	玻利维亚，1945 年
圭亚那，1966 年	莫桑比克，1975 年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92 年
海地，1945 年	缅甸，1948 年	博茨瓦纳，1966 年
洪都拉斯，1945 年	纳米比亚，1990 年	巴西，1945 年
匈牙利，1955 年	瑙鲁，1999 年	文莱达鲁萨兰国，1984 年

冰岛，1946 年
印度，1945 年
印度尼西亚，1950 年
伊朗，1945 年
伊拉克，1945 年
爱尔兰，1955 年
以色列，1949 年
意大利，1955 年
牙买加，1962 年
帕劳，1994 年
巴拿马，1945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1975 年
巴拉圭，1945 年
秘鲁，1945 年
菲律宾，1945 年
刚果民主共和国，1960 年
罗马尼亚，1955 年
俄罗斯，1945 年
卢旺达，1962 年
圣基茨和尼维斯，1983 年
圣卢西亚，1979 年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1980 年
吉布提，1977 年
多米尼克，1978 年
多米尼加共和国，1945 年
沙特阿拉伯，1945 年
塞内加尔，1960 年
塞尔维亚，2000 年
塞舌尔，1976 年
塞拉利昂，1961 年
新加坡，1965 年
斯洛伐克，1993 年
斯洛文尼亚，1992 年
所罗门群岛，1978 年
索马里，1960 年
南非，1945 年
南苏丹，2011 年
西班牙，1955 年
斯里兰卡，1955 年
苏丹，1956 年

尼泊尔，1955 年
荷兰，1945 年
新西兰，1945 年
尼加拉瓜，1945 年
尼日尔，1960 年
尼日利亚，1960 年
挪威，1945 年
阿曼，1971 年
巴基斯坦，1947 年
乍得，1960 年
智利，1945 年
中国，1945 年
哥伦比亚，1945 年
科摩罗，1975 年
波兰，1945 年
哥斯达黎加，1945 年
科特迪瓦，1960 年
克罗地亚，1992 年
古巴，1945 年
塞浦路斯，1960 年
捷克共和国，1993 年
丹麦，1945 年
利比里亚，1945 年
利比亚，1955 年
列支敦士登，1990 年
苏里南，1975 年
斯威士兰，1968 年
瑞典，1946 年
瑞士，2002 年
叙利亚，1945 年
塔吉克斯坦，1992 年
坦桑尼亚，1961 年
泰国，1946 年
东帝汶，2002 年
多哥，1960 年
汤加，1999 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62 年
突尼斯，1956 年
土耳其，1945 年
土库曼斯坦，1992 年

保加利亚，1955 年
布基纳法索，1960 年
布隆迪，1962 年
佛得角，1975 年
柬埔寨，1955 年
喀麦隆，1960 年
加拿大，1945 年
中非共和国，1920 年
日本，1956 年
约旦，1955 年
哈萨克斯坦，1992 年
肯尼亚，1963 年
基里巴斯，1999 年
朝鲜，1991 年
葡萄牙，1955 年
卡塔尔，1971 年
科威特，1963 年
吉尔吉斯斯坦，1992 年
老挝，1955 年
拉脱维亚，1991 年
黎巴嫩，1945 年
莱索托，1966 年
萨摩亚，1976 年
圣马力诺，1992 年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75 年
图瓦卢，2000 年
乌干达，1962 年
英国，1945 年
乌克兰，1945 年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 年
乌拉圭，1945 年
美国，1945 年
乌兹别克斯坦，1992 年
瓦努阿图，1981 年
委内瑞拉，1945 年
越南，1977 年
也门，1947 年
赞比亚，1964 年
津巴布韦，1980 年

非成员观察员国家（2）：梵蒂冈，巴勒斯坦
网站：<http://www.un.org/>　P588 联合国加入时间

联合国安理会

安全理事会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必须遵守其决定。安理会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每个常任理事国可对安理会决议行使否决权，同时还设有 10 个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两年。

常任理事国（P5）：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

非常任理事国（10）：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赤道几内亚**，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荷兰***，秘鲁**，波兰**，瑞典*

注：2017 - 18 年度是 50 多年来第一次有 2 名成员国同意分享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意大利为 2017 年，荷兰为 2018 年。

网站：<http://www.un.org/en/sc/>

裁军谈判会议（CD）

CD 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规模最大的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论坛。 自 1960 年以来，多次扩大规模并多次更名。作为非联合国下属机构，CD 却需向联合国大会报告。CD 设在瑞士日内瓦。

成员国（65）：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 ，法国，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韩国（北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蒙古，摩洛哥，缅甸，荷兰 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秘鲁，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内加尔，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委内瑞拉，越南，津巴布韦

网站：<http://www.unog.ch/cd>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IAEA 是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个政府间组织。IAEA 规约于 1957 年生效，其任务是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并确保核活动不被用于任何军事目的。根据 1968 年不扩散条约和无核武器区条约，无核武器国家必须接受 IAEA 核保障，以证明其履行核武义务。IAEA 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

成员国（169）：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REPUB ），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 LIC，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卢旺达，罗马尼亚，俄罗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注：朝鲜是 IAEA 成员国，直至 1994 年 6 月。除上述国家外，佛得角、科摩罗、冈比亚、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和汤加的成员国资格均得到 IAEA 大会批准；上述国家向 IAEA 交存相关必要法律文书，即可生效。

网站：<http://www.iaea.org/>

国际法院（ICJ）

国际法院于 1945 年基于联合国宪章设立，为联合国核心司法机关。 国际法

院的作用是解决法律纠纷并向联合国下属机构及其他专业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院由 15 名法官组成，任期 9 年，由联大和安理会负责甄选。ICJ 设在荷兰海牙。

网站：<http://www.icj-cij.org/>

双边协商委员会（BCC）

BCC 是根据俄美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新的 START，布拉格条约）建立的论坛。 新 START 条约取代了 1991 年 START 条约中的遵守条约联合监督委员会（JCIC）。除双方另有约定，BCC 每年须至少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两次会议。BCC 工作内容保密。

网站：美国国防部，负责采办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https://www.acq.osd.mil/tc/nst/NSTtoc.htm>

英联邦

英联邦成立于 1949 年，是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组织，其目的是在成员国内外推进民主，人权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项重申其英联邦核心价值观和原则的章程于 2012 年得以通过。英联邦秘书处设在英国伦敦。

成员国（52）：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伯利兹，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喀麦隆，加拿大，塞浦路斯，多米尼克，斐济，加纳，格林纳达，圭亚那，印度，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莱索托，萨摩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马耳他，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新西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所罗门群岛，南非，斯里兰卡，斯威士兰，坦桑尼亚，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卢，乌干达，英国，瓦努阿图，赞比亚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英联邦共有 52 个成员国，冈比亚于 2018 年 2 月 8 日重新加入英联邦。

网站：<http://www.thecommonwealth.org/>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

CTBTO 将在 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生效时开始运作。CTBTO 将解决条约遵守中出现的问题，并作为缔约国之间协商与合作的论坛。成立筹备委员会，以便为 CTBTO 工作做准备，尤其是组建由地面、水声、次声和放射性核素台站组成的国际监测体系，监测数据将传输至 CTBTO 国际数据中心。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

CTBTO 签字国（183）：见附件 A

网站：<http://www.ctbto.org/>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

FATF 是一个政府间决策机构，其目的是建立国际标准，制定和促进国家和国际两级政策。 FATF 由七国集团（G7）于 1989 年成立，最初是为了审查和制定打击洗钱措施；于 2001 年扩大至包括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并在 2008 年再次扩大，包括打击资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 FATF 秘书处设在法国巴黎。

成员国（37）：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欧盟委员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海湾合作委员会， 日本，韩国，南非，卢森堡，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俄罗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

网站：<http://www.fatf-gafi.org/>

全球打击核恐怖主义倡议（GICNT）

GICNT 成立于 2006 年，是一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自愿国际伙伴关系，致力于加强预防、发现和应对核恐怖主义全球能力。 GICNT 通过开展多边活动来加强其合作伙伴计划、政策、程序和互通性，从而实现上述目标。

合作伙伴国（88）：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根廷，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巴林，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佛得角，柬埔寨，加拿大，智利，中国，科特迪瓦，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利比亚 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拉圭，菲律宾，波兰，尼日利亚，摩洛哥，黑山，摩洛哥，墨西哥，马耳他，

毛里求斯，马来西亚，马耳他，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 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赞比亚

官方观察员（5）：国际原子能机构，欧盟，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nterpol），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网站：<http://www.gicnt.org/>

西方七国集团（G7）

G7 是主要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在国家或政府层面进行非正式会晤。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洲委员会代表欧盟参加首脑峰会。

1997 年至 2013 年期间，G7 成员国和俄罗斯一起组成八国集团（G8）进行会晤。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G7 于 2014 年 3 月决定不再另行通知俄罗斯。

成员国（7）：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

*2018 年峰会主办国

** 2017 年峰会主办国。

网站：<https://g7.gc.ca/en/>

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材料扩散的全球伙伴关系

全球伙伴关系于 2002 年由 G8 发起，旨在解决不扩散、裁军、反恐和核安全问题。 成员国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由 G7 主席国主办，主要目标是启动具体项目，以解决常规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滥用问题，并减少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风险。 2011 年 5 月全球伙伴关系无确定期限延长。

成员国（32）：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丹麦，欧盟，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意大利，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 新西兰，挪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乌克兰，美国

注：俄罗斯虽被排除在 G8 之外，但尚未正式退出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尽管未被邀请参加相关活动。

网站：<http://www.gpwmd.com/>

国际刑事法院（ICC）

ICC 是一个独立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处理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ICC 设在荷兰海牙。

ICC 规约于 1998 年在罗马通过，并于 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2010 年通过了罗马规约修正案，定义侵略和灭绝罪。 2017 年通过的修正案将战争罪定义扩大至包括使用微生物、生物或有毒武器，受到 X 射线无法察觉碎片伤害的武器以及激光武器。 修正案仅适用于已批准这些修正案的国家。

罗马规约缔约国（123）：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库克群岛（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约旦，肯尼亚，韩国（南），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马尔代夫，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蒙古，黑山，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勒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里南，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乌干达，英国，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赞比亚

已接受 ICC 管辖权的非缔约国（1）：乌克兰

注：布隆迪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2016 年冈比亚和南非宣布退出，2017 年撤销声明。2018 年 3 月 17 日，菲律宾提前 12 个月宣布它将退出 ICC。

网站：<http://www.icc-cpi.int/>

不结盟运动（NAM）

NAM 成立于 1961 年，是联合国就不结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备控制问题进行磋商和协调的论坛。

会员国（120）：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斐济，加蓬，冈比亚，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牙买加，约旦，肯尼亚，韩国（北），科威特，老挝，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南非，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叙利亚，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特里尼达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2019 年峰会主办国

** 2016 年峰会主办国

网站：<http://www.nambaku.org/>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OECD 成立于 1961 年，其目标是通过协调成员国之间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总部位于法国巴黎。

成员国（35）：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

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

网站：<http://www.oecd.org/>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

OPCW 执行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CWC）。 总部设在海牙，负责监督化学武器库存和相关基础设施销毁，实施核查制度，确保不再重新出现该类武器，并促进和参与国际合作，以加强条约遵守，促进和平利用化学。

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192）：见附件 A.

网站：<http://www.opcw.org/>

伊斯兰合作组织（OIC）

OIC（原伊斯兰会议组织）于 1969 年由伊斯兰国家成立，旨在促进成员国间的合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所有穆斯林人民的和平、安全和斗争。秘书处设在沙特阿拉伯吉达。

成员国（57）：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文莱达鲁萨兰国，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几内亚，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也门

网站：<http://www.oic-oci.org/>

特别核查委员会（SVC）

SVC 是根据 1987 年苏美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INF 条约）建立，其职能是作为解决合规问题和提高条约可行性和有效性措施的论坛。 自 2000 年 SVC 就再未举行会议，直至 2016 年 11 月和 2017 年 12 月再次重启论坛。

INF 条约缔约方（5）：见附件

第 2 节.区域性机构及成员国

非洲联盟（AU）

AU 于 2001 年正式成立，于 2002 年启动，取代了成立于 1963 年的非洲统一组织（OAU）。AU 成员国资格对所有非洲国家开放。 AU 旨在促进非洲团结、安全和冲突解决，民主、人权以及政治社会和经济一体化。其主要机构包括非盟大会（最高机构）、委员会（秘书处）、泛非议会和和平与安全理事会。AU 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成员国（55）：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共和国 ，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 ，尼日利亚，卢旺达，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西撒哈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南苏丹，苏丹，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

*摩洛哥 1984 年离开 OAU 后，在 2017 年 1 月加入非盟。

网站：<http://www.au.int/>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PSC）

PSC 的 15 名成员国是非盟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常设决策机构。它是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APSA）的主要支柱。

成员国任期为期 3 年，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5）：刚果（共和国），埃及，肯尼亚，尼日利亚，赞比亚

成员国任期为期 2 年，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10）：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乍得，尼日尔，卢旺达，塞拉利昂，南非，多哥，乌干达

成员国任期为期 2 年，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20（10）：安哥拉，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加蓬，利比里亚，摩洛哥，卢旺达，塞拉利昂，多哥，津巴布韦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APEC 成立于 1989 年，旨在加强亚太地区贸易开放和经济繁荣。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APEC 越来越多地讨论安全和政治问题，包括打击恐怖主义、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有效的武器转让管控体系。其总部位于新加坡。

成员国经济体(21):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加拿大、智利、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台湾、泰国、美国、越南

网站:< http://www.apec.org/ >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ASEAN 成立于 1967 年，旨在促进东南亚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区域和平与安全。ASEAN 秘书处设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成员国（10）：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网站：<http://www.asean.org/>

东盟地区论坛（ARF）

ARF 成立于 1994 年，旨在促进政治和安全问题对话和磋商，并有助于亚太地区建立信任和预防性外交。

参与国（27）：东盟成员国和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南方，蒙古，新西兰，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斯里兰卡 ，东帝汶，美国

网站：<http://aseanregionalforum.asean.org/>

东盟+3（APT）

APT 合作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启动，并于 1999 年制度化。其目的是促进其参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以及金融稳定。

参与国（13）：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韩国

网站：<http://www.asean.org/asean/external-relations/asean-3>

东亚峰会（EAS）

东亚峰会始于 2005 年，作为促进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对话的区域论坛，EAS 旨在促进东亚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东亚峰会年会同 ASEAN 峰会密切相关。

参与国（18）：东盟成员国和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南部），新西兰，俄罗斯，美国

网站：
<http://www.asean.org/asean/external-relations/east-asia-summit-eas/>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

CSTO 的六个签署国于 2002 - 2003 年正式成立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目标是更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等战略问题。CSTO 设在俄罗斯莫斯科。

成员国（6）：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网站：<http://www.odkb-csto.org/>

独立国家联合体（CIS）

CIS 成立于 1991 年，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多边合作框架，总部设在白俄罗斯明斯克。

成员国（11）：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尚未批准 1993 年独联体宪章，但自 2005 年 8 月 26 日起作为准会员参加独联体活动。 乌克兰尚未批准该宪章，自 1993 年以来一直是该组织的非正式的准成员国。

网站：<http://www.cis.minsk.by/>

非洲中部非洲经济共同体（CEEAC，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CEEAC 成立于 1983 年，旨在促进政治对话，建立关税同盟并在中非建立共

同政策。 CEEAC 还与“中非控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及其所有零部件制造，修理和装配公约”（金沙萨公约）进行协调。 CEEAC 秘书处位于加蓬利伯维尔。

中非和平与安全理事会（COPAX）是一个旨在在非洲中部冲突预防、冲突管理和解决中促进联合政治军事策略的机制。

成员国（11）：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网站：<http://www.ceeac-eccas.org/>

亚洲互动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CICA）

CICA 于 1992 年成立，于 1999 年正式成立，作为加强成员国之间安全合作和建立信任措施的论坛。 它还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 其秘书处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

成员国（26）：阿富汗，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埃及，印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勒斯坦，卡塔尔，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泰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网站：<http://www.s-cica.org/>

欧洲委员会（COE）

COE 成立于 1949 年，对所有接受其法律原则并保障其公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欧洲国家开放。COE 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下属机构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委员会发展银行。

成员国（47）：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 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 ，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

网站：<http://www.coe.int/>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CBSS）

CBSS 成立于 1992 年，是波罗的海地区合作的区域政府间组织。 其秘书处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成员（12）：丹麦，爱沙尼亚，欧盟，芬兰，德国，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波兰，俄罗斯，瑞典

网站：<http://www.cbss.org/>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

ECOWAS 成立于 1975 年，旨在促进西非国家贸易与合作。 1981 年，ECOWAS 通过国防事务互助议定书。ECOWAS 执行秘书处设在尼日利亚阿布贾。

成员国（15）：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

网站：<http://www.ecowas.int/>

欧盟（EU）

欧盟是欧洲各国在广泛领域开展合作的组织，包括一个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若干成员国使用的共同货币以及共同的外交及安全政策(CFSP)。其主要组织机构为欧洲理事会、欧洲联盟理事会(又称部长理事会)、欧洲委员会(秘书处)、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外交政策和共同安全与防卫政策(CSDP)由外交和安全政策联盟高级代表协调，欧洲对外行动处(EEAS)协助。EU 主要机构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成员国（28）：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 2017 年 3 月 29 日英国通知欧洲理事会，英国计划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退出欧盟，年触发欧洲联盟条约第 50 条。

网站：<http://europa.eu/>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原子能机构或 EAEC）

欧洲原子能机构是 1957 年，在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机构条

约）基础上创建。旨在促进和平目的核能项目并对其进行管理。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供应机构位于卢森堡，其任务是向欧盟成员国定期平等的提供矿石、原料和特殊裂变材料。

成员国（28）：欧盟成员国

网站：<http://ec.europa.eu/euratom/>

欧洲防务局（EDA）

EDA 为欧盟下属机构，接受欧盟理事会指导。EDA 成立于 2004 年，旨在帮助欧洲发展防务能力，促进欧洲军备合作，并建立强大的欧洲国防技术和工业基地。EDA 决策机构为指导委员会，由成员国国防部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机构负责人）组成。 EDA 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成员国（27）：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网站：<http://eda.europa.eu/>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海合会正式名称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于 1981 年，旨在促进成员国间金融、贸易、行政和立法等领域区域一体化，并推动科学和技术进步。 成员国同时还在外交政策，军事和安全事务等领域开展合作。 最高委员会是 GCC 最高权力机构。GCC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成员国（6）：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网站：<http://www.gcc-sg.org/>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GAD）

IGAD 成立于 1996 年，旨在扩大区域合作，促进非洲之角的和平与稳定。IGAD 取代了 1986 年成立的政府间干旱与发展管理局（IGADD），秘书处设在吉布提。

成员国（8）：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南苏丹，

苏丹，乌干达

网站：<http://www.igad.int/>

大湖区国际会议（ICGLR）

ICGLR 于 2004 年启动，旨在促进大湖区和平与安全，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增长和发展。2006 年，成员国通过了大湖区安全，稳定与发展公约，公约于 2008 年生效，执行秘书处设在布隆迪布琼布拉。

成员国（12）：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

网站：<http://www.icglr.org/>

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拉伯联盟成立于 1945 年，旨在阿拉伯国家间更为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合作。1950 年成员国签署了集体防务和经济合作协议。2015 年，阿拉伯联盟同意为区域维和行动建立一支阿拉伯联合军事力量，阿盟总秘书处设在埃及开罗。

成员国（22）：阿尔及利亚，巴林，科摩罗，吉布提，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叙利亚*，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也门

*叙利亚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被暂停其成员国身份。

网站：<http://www.lasportal.org/>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NATO 成立于 1949 年，北大西洋公约（华盛顿条约）实际为西方国家军事同盟。 条约第 5 条规定北约承诺当任一成员国遭受武装攻击时，成员国需作出回应，其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成员国(29):阿尔巴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美国

网站：<http://www.nato.int/>

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EAPC）

EAPC 将北约及其和平伙伴关系（PFP）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进行对话和磋商，为双边 PFP 计划的总体政治框架。

成员国（50）：北约成员国和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塞尔维亚，瑞典，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瑞士，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网站：<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49276.htm>

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ICI）

ICI 成立于 2004 年，旨在通过泛中东地区同北约的务实双边安全合作，促进长期全球和地区安全。

参与国（33）：北约成员国和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网站：<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2956.htm>

地中海对话

北约地中海对话成立于 1994 年，是北约与地中海国家进行政治对话和务实合作的论坛。对话反映北约观点，即欧洲安全与地中海地区安全与稳定密切相关。

与会国（36）：北约成员国和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

网站：<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2927.htm>

北约-格鲁吉亚委员会（NGC）

NGC 于 2008 年 9 月成立，旨在成为政治磋商和务实合作的论坛，帮助格鲁吉亚实现加入北约的目标。

参与国（30）：北约成员国和格鲁吉亚

网站：<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50091.htm>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RC）

NRC 成立于 2002 年，是一个就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建立共识，合作以及联合决策和行动的机制。 它侧重于 1997 年北约 - 俄罗斯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创始法案以及恐怖主义，危机管理和防扩散等新领域确定的共同关心领域。

参与国（30）：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

注：2014 年 4 月，俄罗斯军事干预乌克兰之后，尽管大使及以上层面的沟通得以保留，北约暂停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 NRC 国家之间的实际合作。

网站：<https://www.nato.int/nrc-website/>

北约-乌克兰委员会（NUC）

NUC 成立于 1997 年，负责就政治和安全问题，预防和解决冲突，不扩散、武器和技术转让以及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磋商。

参与国（30）：北约成员国和乌克兰

网站：<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0319.htm>

组织联合军备委员会（OCCAR，联合军备合作组织）

OCCAR 成立于 1996 年，自 2001 年起具有法律地位，为特定协作武器计划提供更为有效和高效的安排，总部位于德国波恩。

成员国（6）：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

参与国（7）：芬兰，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波兰，瑞典，土耳其

网站：<http://www.occar.int/>

OPANAL，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

OPANAL 是基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在 1967 年成立，旨在与原子能机构一道解决条约执行问题，OPANAL 位**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缔约国（33）：见附件

网站：<http://www.opanal.org/>

民主与经济发展组织 -GUAM

GUAM 为四国集团，旨在促进稳定和加强安全，其历史可以追溯至 1997 年。GUAM 成立于 2006 年。成员国合作促进八个工作组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和贸易， 秘书处在乌克兰基辅。

成员国（4）：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

网站：<http://guam-organization.org/>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于 1973 年启动，1995 年更名为欧安组织。目的是作为重要的全面安全合作工具，涉及早期预警、冲突防控、危机管理以及冲突后重建。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其他分支机构设在欧洲其他地方。

欧安组织三驾马车由当年，前一年和下一年主席国代表组成。 安全合作论坛（FSC）负责军备控制以及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成员国（57）：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 见，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的马耳他共和国，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 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克兰，美国，乌兹别克斯坦

* 2017 年主席国

** 2018 年主席国

*** 2019 年主席国

网站：<http://www.osce.org/>

联合协商小组（JCG）

JCG 是一个基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 条约）建立的欧安组织附属机构，通过协调解释和实施的含糊不清来促进条约的目标和实施。JCG 总部位于奥地利维也纳。

CFE 缔约国（30）：见附件 A

注：2007 年俄罗斯暂停参与 CFE 条约，并在 2015 年 3 月份年宣布彻底退出 CFE。

网站：<http://www.osce.org/jcg/>

明斯克小组

明斯克小组支持明斯克进程，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纳戈尔诺 - 卡拉巴赫冲突的论坛。

成员国(13):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瑞典、土耳其、美国*、欧安组织三驾马车(奥地利、意大利和斯洛伐克)

*三个国家共同担任明斯克小组主席国。

网站：<http://www.osce.org/mg/>

开放天空咨询委员会（OSCC）

OSCC 成立的目的是为解决 1992 年开放天空条约缔约国合规问题而建立。

开放天空条约缔约国（34）：见附件

网站：<http://www.osce.org/oscc/>

美洲国家组织（OAS）

美洲国家组织于 1948 年通过其组织宪章，目标是加强西半球和平与安全，活动以民主，人权，安全和发展四大支柱为基础。OAS 总秘书处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

会员国（35）：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

*根据 2009 年 6 月 3 日决议，1962 年将古巴排除在 OAS 的决议将不再有效；根据 2009 年决议，古巴参与该组织“将是对话进程之结果”。古巴拒绝参加 OAS

活动。

网站：<http://www.oas.org/>

黑海经济合作组织（BSEC）

BSEC 倡议成立于 1992 年，并于 1999 年发展成为成熟的经济组织。其目的是确保和平，稳定和繁荣，促进和发展黑海地区经济合作和进步。BSEC 常设秘书处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成员国（12）：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希腊，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土耳其，乌克兰

网站：<http://www.bsec-organization.org/>

太平洋岛屿论坛

太平洋岛屿论坛，前身为成立于 1971 年的南太平洋论坛，旨在加强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治理和安全方面的合作。 论坛同时还负责监督 1985 年拉罗通加条约执行情况，该条约宗旨为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设在斐济苏瓦。

成员国（18）：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纽埃，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

网站：<http://www.forumsec.org/>

大湖区和非洲之角非法轻小武器区域中心（RECSA）

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秘书处设在内罗毕，目的在于协调执行 2000 年“关于大湖区和非洲之角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的内罗毕宣言”。2005 年转为 RESCA 以执行 2004 年“内罗毕预防，控制和减少小武器和轻武器议定书”。 RESCA 总部设在肯尼亚内罗毕。

成员国（15）：布隆迪，吉布提，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塞舌尔，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

网站：<http://www.recsasec.org/>

区域合作委员会

RCC 成立于 2008 年，其职能是作为东南欧稳定公约继承者，旨在进东南欧各国相互合作和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以促进该地区发展，造福人民。RCC 侧重于六大领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能源和基础设施，司法和内政，安全合作，建立人力资本和议会合作。 其秘书处设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萨拉热窝，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设有联络处。

成员国（46）：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欧洲委员会开发银行，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挪威，摩尔多瓦共和国，黑山，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科索沃，拉脱维亚，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世界银行，联合国，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欧洲，东南欧合作倡议，斯洛文尼亚

网站：<http://www.rcc.int/>

上海合作组织（SCO）

SCO 的前身是上海五国集团，成立于 1996 年; 它于 2001 年更名为上海合作组织，并向所有支持其目的的国家开放，成员国在建立信任措施和区域安全以及经济领域进行合作。 SCO 秘书处在中国北京。SCO 区域反恐怖主义机构（RATS）总部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

成员国（8）：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网站：<http://www.sectsco.org/>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

1991 年，随着《特古西加尔巴议定书》的签署，SICA 成立。该组织的宗旨之一是在合理均衡各方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安全模式;强化文职政府;克服极端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消除暴力、腐败、恐怖主义、毒品和武器贩运。该组织总部设于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

成员国(8):伯利兹、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

网站:< http://www.sica.int/ >

六方会谈

六方会谈始于 2003 年，当时是中国提出的一项外交倡议，旨在解决有关如何解决朝鲜核武器计划争议。自 2009 年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以来，没有举行过任何谈判。

参与国(6):中国、日本、朝鲜(北)、朝鲜(南)、俄罗斯、美国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成立于 1992 年，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主权、和平与安全、人权和民主等基本原则。SADC 取代了 1980 年成立的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SADCC)。SADC 政治、防卫和安全合作机构的目的是促进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秘书处设在博茨瓦纳的哈博罗内。

成员国(16):安哥拉、博茨瓦纳、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舌尔、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网站:< http://www.sadc.int/ >

苏瑞美尼亚国家联盟(UNASUR，南美洲国家联盟)

UNASUR 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其目的是加强区域一体化、政治对话、经济发展和成员国之间在防务事务方面的协调。UNASUR2008 宪法条约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生效，将逐步取代安第斯共同体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方共同市场)，总部设在厄瓜多尔的基多。

UNASUR 联盟成员国于 2008 年 12 月批准了《苏里马卡亚防卫委员会(CDS)》，并于 2009 年 3 月举行第一次会议。CDS 目标是巩固南美洲作为一个和平区的地位，创造一种区域特征，并在防务问题上加强区域合作。

成员国(12):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巴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圭、委内瑞拉

* 2018 年 4 月 20 日，这 6 个国家暂停 UNASUR 成员国资格一年。

网站:< http://www.unasursg.org/ >

第 3 节.战略性贸易控制机制

澳大利亚集团(AG)

AG 是一个非正式的国家集团，欧洲委员会于 1985 年成立。AG 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就战略贸易管控交换意见，并相互借鉴成功经验，目的在于确保军民两用材料、技术及设备不被用于生化武器活动或项目。

成员国(42):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欧盟委员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共有 42 个成员国, 2018 年 1 月 18 日，印度加入 AG。

网站:< http://www.australiagroup.net/ >

《反对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

2002 年制定 HCOC 的原则是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系统扩散的需要。成员国在发展、试验和部署这类导弹方面必须实行管控。奥地利外交部实际起到人权理事会秘书处之职责。

成员国(138):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韩国(南)、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丹、苏里南、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东帝汶、汤加、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赞比亚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共有 138 个成员国加入了 HCOC, 2018 年 1 月，莱索托加入 HCOC。

网站:< http://www.hcoc.at/ >

导弹技术控制系统(MTCR)

MTCR 为非正式国家集团，自 1987 年以来一直寻求协调各国出口管控，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弹系统的扩散。MTCR 国家集团未设秘书处。法国外交部

负责联络工作，分发政策工作文件，并定期主持政策和信息交流会议。

合作伙伴国(35):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站:< http://www.mtcr.info/ >

核供应国集团(NSG)

NSG，前身为伦敦俱乐部，成立于 1975 年。根据其核转让指南(伦敦指南，1978 年首次同意)，协调国家对核材料转让的管控。其中包含一个触发材料清单，即当对任何无核国家出口用于和平目的的“清单”内材料时，都将触发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监管，以及军民两用核相关设备、材料、软件和相关技术(华沙指南)。NSG 指导方针是各参与国根据参与国本国法律和惯例执行。NSG 未设秘书处。日本常驻维也纳 IAEA 代表团实际起到联络和日常辅助之职能。

参与国(48):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南),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站:< http://www.nuclearsuppliersgroup.org/ >

防扩散安全倡议 (PSI)

“防扩散安全倡议”是根据美国 2003 年宣布的一项倡议所设立的一个多边论坛，其重点在于加强执法合作，在陆地、空中或海上过境时拦截和没收非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导弹技术和及相关材料。2003 年颁布了《防止贿赂条例》。PSI 没有秘书处，但其日常活动由 21 人组成的业务专家组负责协调。

成员国(105):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 ,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柬埔寨,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 ,格鲁吉亚,德国*_,希腊,罗马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 ,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南)*、吉尔吉斯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摩尔多瓦、蒙古、黑山、摩洛哥、荷兰* ,新西兰* ,挪威* 、阿曼、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波兰* ,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也门

*业务专家组成员。

†PSI 轮值主席国，2003-17 年。

网站:美国国务院

关于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瓦森纳安排，WA)

瓦森纳安排于 1996 年正式成立。其目的是防止 WA 成员国密切关注的国家获取武器装备和用于军事目的的敏感军民两用品及技术。WA 秘书处设在奥地利维也纳。

成员国(42):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站:< http://www.wassenaar.org/ >

桑戈委员会

核出口委员会(简称“桑戈委员会”)成立于 1971-74 年，是核供应国之间每年举行两次的非正式会议。其目的是根据其定期更新项目清单，协调对核材料的出口管控，对核供应集团工作进行补充。

成员国(39):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站:< http://www.zanggercommittee.org/ >

附件 C. 2018 年表

伊恩•戴维斯

2018 年大事记列出了 2018 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相关重大事件。下方为关键词。

1 月

1 月 1 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讲话中以核武器威胁美国，但提议与韩国谈判。

朝鲜;核武器;韩国;美国

1 月 2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推特上互发核威胁。

朝鲜;核武器;美国

1 月 3 日 今年 1 月，北韩重新开通了与韩国的边境热线电话。

朝鲜;韩国

1 月 15 日 委内瑞拉军队和国民警卫队对朱基托多发动突袭，导致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奥斯卡•佩雷斯及其组织五名成员死亡。

委内瑞拉

1 月 19 日 印度加入澳大利亚集团(AG)

AG

1 月 23 日 法国发起“反对使用化学武器不受惩罚国际伙伴关系”，这是一项加强有关化学武器攻击报告信息共享的新倡议。

法国 CW

1 月 25 日 塔利班袭击了阿富汗喀布尔的一家酒店，造成 22 人死亡。

阿富汗；塔利班

1 月 27 日 一枚炸弹在喀布尔一辆救护车内引爆，造成至少 95 人死亡。塔利班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阿富汗；塔利班

1 月 29 日 哥伦比亚第二大游击组织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ELN)一系列袭击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暂停同 ELN 的和平谈判。

哥伦比亚；ELN

1 月 30 日 俄罗斯在索契主办叙利亚问题和平会议，会议代表多为阿萨德支持者。

俄罗斯；叙利亚；和平进程

2 月

2 月 2 日 美国对南苏丹内战各方实施武器禁运。

武器禁运;南苏丹;美国

2 月 2 日 美国发布其新的核态势报告。

美国；核武器

2 月 4 日 叙利亚叛军控制的萨拉克布镇被投下一枚炸弹，据信装满氯气。随后至少有 9 人因呼吸困难入院治疗。

CW；叙利亚

2 月 7-8 日 叙政府军对美国顾问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展开攻击。随后，美国军方对叙利亚政府军支持的武装分子展开空袭。据报道，大约 100 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但也有报告显示，可能多达 200 名俄罗斯雇佣军被打死。

俄罗斯；叙利亚；美国

2 月 9 日 埃及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打击西奈半岛叛乱。

埃及

2 月 10 日 一架以色列 F-16 战机在对伊朗支持的叙政府军实施空袭时，在叙利亚提亚斯空军基地击落。

伊朗；以色列；叙利亚

2 月 19-20 日 叙利亚政府军在东古塔发动袭击，据报道约 200 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和急救人员，并炸毁东古塔 5 处医疗设施。联合国谴责针对平民和基础设施发动武装袭击。

俄罗斯；叙利亚

2 月 26 日 俄罗斯宣布将在叙利亚古塔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每天保持五小时停火。

俄罗斯；叙利亚

2 月 28 日 喀布尔和平与安全合作进程第二次会议在阿富汗举行，数十名区

域和全球代表参加了会议。

阿富汗；喀布尔进程

3 月

3 月 1 日 斯里兰卡加入《集束弹药公约》。

斯里兰卡;CCM

3 月 1 日 博科圣地对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一个难民营附近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 11 人死亡，其中包括 3 名救援人员。

。博科圣地;尼日利亚

3 月 2 日 圣战分子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袭击了军队总部和法国大使馆，造成 8 名安保人员和 8 名袭击者死亡，包括平民在内的 80 人受伤。

布吉纳法索

3 月 4 日 前俄罗斯军官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尤利娅•斯克里帕尔在英国索尔兹伯里被人用神经毒剂杀死。

CW;OPCW;俄罗斯;英国

3 月 6 日 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全国进入 10 天的紧急状态，这是自 1983-2009 年内战以来的第一次。

斯里兰卡

3 月 14 日 英国驱逐 23 名俄罗斯外交官，原因是俄罗斯无视最后期限，未能在最后期限内就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中毒事件向英国首相作出解释。英国还呼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英国在会上得到除俄罗斯以外所有成员国的支持。

CW;俄罗斯;英国;联合国

3 月 15-16 日 中亚五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近十年来的首次峰会。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3 月 16 日 据报道，叙利亚东部古塔的 Kafr Batna 镇遭受燃烧弹袭击，造成至少 61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

叙利亚；燃烧弹

3 月 16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台湾旅游法》，官方表态鼓励美台官员互

访。中国对此表示强烈批评，违背了长期以来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台湾;美国

3 月 18 日 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叛军占领了叙利亚城市阿夫林。

叙利亚；土耳其

3 月 25 日 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及也门边境和西南部城市发射多枚导弹。沙特声称其导弹防御系统成功拦截来袭导弹。导弹拦截留下的碎片造成一名埃及人死亡，两人受伤。

沙特阿拉伯;也门

3 月 25-28 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回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此次非正式为金正恩 2011 年掌权以来首次出国访问。

中国，朝鲜

3 月 26 日 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驱逐了 100 多名俄罗斯外交官，作为对本月早些时候英国神经毒剂袭击事件的协调反应。俄罗斯宣布将予以回应。

CW;欧盟;俄罗斯;英国;美国

3 月 26-27 日 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的支持喀布尔进程会议上，21 个国家和政府间组织再次呼吁塔利班接受和平提议。

阿富汗；喀布尔进程；塔利班

3 月 28 日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联合国维和行动举行的高级别辩论期间，宣布了一项名为“建设和平行动”(A4P) 的新倡议。

联合国;维和行动

3 月 30 日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UNMIL)结束了近 15 年的工作。

联合国;维和行动

3 月 30 日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发起了一场被称为“伟大的回归游行”的抗议活动。以军使用实弹、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驱散聚集在加沙和以色列边界围栏附近的数万名巴勒斯坦抗议者，冲突造成至少 17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400 多人受伤。

联合国；以色列维和行动；巴勒斯坦

4 月

4 月 1 日 青年党对下谢贝利地区的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AMISOM)基地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 46 名 AMISOM 士兵死亡。

青年党；索马里；AMISOM

4 月 1 日 分离主义武装分子与印度安全部队在克什米尔发生战斗，造成至少 12 名武装分子和 3 名印度士兵死亡。同日晚些时候，至少 4 名平民在示威中丧生。

印度；克什米尔

4 月 4 日 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总统在安卡拉会晤，讨论叙利亚和平进程。

伊朗；俄罗斯；叙利亚；土耳其

4 月 7 日 叙利亚杜马发生疑似化武袭击，造成至少 42 人死亡。

CW；叙利亚

4 月 10 日 联合国维和部队和当地安全部队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发动了一场清剿附近武装组织的行动，造成 28 人死亡。

CAR；联合国维和部队

4 月 11 日 叙利亚杜马发生疑似化武袭击事件后，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约 500 人因暴露于有毒化学物质，引发相关症状并入院治疗。

CW；叙利亚；WHO

4 月 13 日 荷兰情报机构干扰了俄罗斯针对海牙禁化武组织总部的网络行动。

荷兰;俄罗斯;OPCW

4 月 13 日 美国、法国和英国对叙利亚境内的三个目标实施空袭:霍姆斯以西的两个疑似化武储存设施和大马士革的一个研究中心。

法国；叙利亚；英国；美国

4 月 17 日 包括 Facebook 和微软在内的 30 多家全球科技公司宣布联合承诺，不协助任何政府进行攻击性网络攻击。

网络安全

4 月 20 日 金正恩在讲话中宣布，朝鲜将停止进一步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

朝鲜；核武器

4 月 22 日 呼罗珊省(ISKP)袭击了喀布尔的一个选民登记中心，造成大约 60 人死亡。

阿富汗;ISKP

4 月 23 日 尼加拉瓜 4 月 16 日推出的社会保障改革引发反政府抗议活动，造成至少 26 人死亡。

尼加拉瓜

4 月 23-24 日 202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NPT 筹备会议

4 月 26 日 欧盟扩大对缅甸的武器禁运范围，包括军民两用品及其他商品。

欧盟；武器禁运；缅甸

4 月 27 日 十多年来的首次朝韩首脑会议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非军事区会面，同意努力清除朝鲜半岛所有核武器。

朝鲜；韩国

4 月 29 日 据报道，以色列对叙利亚西部城市哈马的空袭造成至少 25 名伊朗士兵死亡。

伊朗；以色列；叙利亚

5 月

5 月 1 日 中非共和国班吉一座教堂遭遇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 15 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牧师。

CAR

5 月 8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

伊朗；JCPOA；美国

5 月 9 日 经过多年谈判，日本和中国同意建立海上和空中沟通机制，以应对危机。

中国；日本

5 月 13-14 日 IS 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发动了一系列炸弹袭击，造成至少 25 人死亡。三个家庭实施的恐怖袭击，其中甚至还有孩子，目标是教堂和警察。

印尼；IS

5 月 14 日 今天是 2014 年加沙战争以来暴力事件最严重的一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以色列边境杀死了 60 多名巴勒斯坦抗议者，造成至少 2400 人受伤。

以色列；巴勒斯坦

5 月 15 日 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后，朝鲜终止了与韩国的沟通，并宣布可能退出原定与美国举行的峰会。

朝鲜；韩国；美国

5 月 22 日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公开辩论，讨论了扩大和加强对冲突地区平民的国际保护。

联合国;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

5 月 24 日 国际调查人员表示，俄罗斯对 2014 年在乌克兰东部击落马航 MH17 航班负有直接责任。调查人员确认，库尔斯克第 53 防空导弹旅发射山毛榉导弹，击落了马航 MH17。

马来西亚；俄罗斯；乌克兰

5 月 24 日 联合国秘书长启动了联合国新的裁军议程，题为《确保我们共同的未来:裁军议程》。裁军;联合国

5 月 24 日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原定于 6 月 12 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的几小时前，朝鲜声称炸毁了其主要的核武器试验场。朝美峰会随后重启。

5 月 25 日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即将生效，该条例赋予互联网用户对其在线数据更多控制权，并对企业获取、使用和处理在线数据的方式设限。

欧盟;GDPR

5 月 29 日 经历了 18 个月的边界冲突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意恢复 2003 年在克什米尔控制线沿线达成的停火协议。

印度；巴基斯坦；克什米尔

5 月 29 日 法国巴黎主办利比亚问题峰会，利比亚主要的反对派领导人均到会。

法国；利比亚

6 月

6 月 5 日 埃塞俄比亚执政联盟宣布将全面接受并执行结束 1998-2000 年与厄立特里亚边境战争的和平协议。执政联盟表示将接受 2002 年边境委员会的裁决结果，裁决将有争议领土判给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平协议

6 月 7 日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宣布与塔利班无条件停火至 6 月 20 日，但该安排不包括 IS 和基地组织。

阿富汗；塔利班

6 月 9 日 就在阿富汗政府下令单方面停火几天后，塔利班宣布与政府军停火三天，以配合本月晚些时候的开斋节。

阿富汗；塔利班

6 月 12 日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FYROM)和希腊签署了一项协议，解决了他们 27 年来关于 FYROM 正式名称(现为北马其顿共和国)的争端。面对两国的反对，这项协议仍需批准，以解除希腊反对 FYROM 加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最后障碍。

欧盟；希腊；前北马其顿；北约

6 月 12 日 在意大利和马耳他拒绝 629 名非洲移民入境后，西班牙同意接受这艘救援船。

意大利；马耳他；移民危机；西班牙

6 月 12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 联合声明中，金正恩重申其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承诺，特朗普承诺暂停美韩联合军演。

朝鲜；美国

6 月 13 日 尽管联合国试图促成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和沙特联军之间达成和平协议，沙特联军还是对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发动了攻击。

沙特；联合国；也门

6 月 15 日 据报道，巴基斯坦塔利班高级领导人法兹鲁拉在美国对阿富汗的空袭中丧生。

阿富汗；塔利班；美国

6 月 18 日 特朗普总统宣布即将组建一支太空部队，称其为美国第六军种。

美国；太空部队

6 月 18 日 塔利班拒绝与阿富汗政府延长三天停火。阿富汗政府称其安全部队将继续停火 10 天。

阿富汗；塔利班

6 月 18-29 日《联合国预防、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行动纲领》第三次审议大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UNPOA

6 月 19 日 美国以反以色列偏见为由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联合国；美国

6 月 21 日至 24 日 据信在尼日利亚中部游牧牧民对农业聚居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 86 人死亡。6 月 21 日，贝隆族农民袭击了富拉尼族牧民，引发了数天的暴力冲突。

尼日利亚

6 月 23 日 阿联酋宣布暂停对也门荷台达的进攻，以便联合国斡旋进行谈判。

阿联酋；也门

6 月 23 日 津巴布韦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在该国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的一个体育场举行竞选集会，发生爆炸，造成 2 人死亡，至少 49 人受伤。

津巴布韦

6 月 23 日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在参加一次政治集会时险些被暗杀。这次袭击造成 1 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

埃塞俄比亚

6 月 26-27 日 应几个国家的请求，召开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缔约国会议特别会议，讨论如何维持对化学武器的禁令。会议授权 OPCW 明确使用化武的责任。

CWC；OPCW；CW

6 月 27 日 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和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前副总统芮克•马查尔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签署了一项初步框架协议，旨在南苏丹实施停火，并建立新过渡政府。

南苏丹

6 月 29 日 情报机构报告称，近几个月来，朝鲜在多个秘密地点增加了核武器燃料的生产，并可能试图掩盖这些秘密，同时在与美国的核谈判中寻求美方让

步。

朝鲜；核扩散；美国

6 月 30 日 一对英国夫妇，在昏迷后被发现在处理受污染物品时接触了诺维乔克。其中一人于 7 月 8 日死亡。

CW；英国

7 月

7 月 1 日 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 19 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锡克教少数民族成员。IS 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阿富汗；IS

7 月 8 日 突尼斯安全部队在靠近阿尔及利亚边境地区遇袭，至少 6 名成员丧生，袭击者身份不明。

突尼斯

7 月 8 日 尼加拉瓜，据报道有 38 人在抗议者和军队的冲突中丧生。 这是自 4 月爆发反对总统奥尔特加政府的抗议活动开始，伤亡最为严重的一天。

尼加拉瓜

7 月 8-9 日 为期两天的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平首脑会议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正式结束边界冲突，恢复全面外交关系。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平协议

7 月 10 日 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的一次选举集会发生袭击事件，造成至少 20 人死亡，其中包括当地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塔利班

7 月 11 日 联合国安理会就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进行一般性辩论。

联合国;气候变化

7 月 11-12 日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围绕美国继续致力于北约的责任分担和不确定性展开了辩论。

北约峰会

7 月 12 日 经 OPCW 核实，叙利亚境内申报的最后两个化武生产设施已全

部销毁。

叙利亚；CW

7 月 13 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2428 号决议，延长对南苏丹的制裁，其中包括禁止向南苏丹提供任何类型的武器和军事装备。

联合国；南苏丹；武器禁运

7 月 13 日 巴基斯坦大选前，班努和默斯东的选举集会发生两起爆炸事件。默斯东袭击造成 149 人死亡，186 人受伤;IS 声称对此负责。班努袭击造成 4 人死亡，至少 19 人受伤;没有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IS；巴基斯坦

7 月 16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俄美峰会。

俄罗斯；美国

7 月 18 日 来自 36 个国家的 2000 多名世界顶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誓言决不发展 LAWS。

LAWS

7 月 24 日 一架在戈兰高地地区对叙利亚叛军发动攻击的叙利亚飞机，误入以色列领空并被击落。

以色列；叙利亚

7 月 25 日 巴基斯坦大选期间发生了几起暴力袭击事件。 最严重的袭击中，至少 31 人在奎达市一个投票站外的自杀式爆炸中丧生，IS 声称对这起袭击负责。全国各地发生的小型爆炸也造成两人死亡，数人受伤。

IS；巴基斯坦

7 月 26 日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签署《棉兰老穆斯林邦萨摩洛自治区组织法》，该法律是根据 2014 年菲律宾政府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NLF)之间的和平协议制定。主要特点是提议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部分地区建立一个新自治区。

菲律宾

8 月

8 月 1 日 大约 200 名 IS 武装分子向阿富汗政府投降，以避免成为塔利班的俘虏。此前，IS 和塔利班之间已经进行了两天的战斗。

阿富汗；伊斯兰国家；塔利班

8 月 2 日 东盟和中国共同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草案。

东盟；中国；南中国海

8 月 2 日 沙特联军空袭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击中平民目标，造成至少 30 人死亡。

沙特阿拉伯；也门

8 月 9 日 以色列和哈马斯自 2014 年以来首次交火。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贝尔谢巴发射火箭弹，而以色列则向加沙发射导弹。袭击发生在停火前几小时，造成 25 人受伤。

以色列；巴勒斯坦

8 月 10 日 沙特联军在也门发动的一次空袭，击中一辆闹市区的公共汽车，造成数十名也门平民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沙特阿拉伯；也门

8 月 10 日 叙利亚政府向伊德利卜省、哈马省和阿勒颇省投放传单，敦促平民投降。一天后，空袭造成至少 29 人死亡。

叙利亚

8 月 20-24 日 《武器贸易条约》(ATT)第四次缔约国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

ATT

8 月 24 日 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警告称，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已接近危机临界点，其严重程度堪比地中海难民事件。

UN;难民危机

8 月 25 日 据报道，美阿联合军事行动击毙了阿富汗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萨阿德•埃尔哈比。他是自 2017 年 7 月以来第三位在阿富汗被杀的伊斯兰国头目。

阿富汗；IS；美国

8 月 27 日 伊朗与叙利亚签署一项协议，重申将继续留在叙利亚，并深化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军的合作。

伊朗；叙利亚

8 月 27 日 经过 12 个月调查，联合国缅甸问题独立国际真相调查团宣布，缅甸军队指挥官和其他高级将领因其针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而面临指控。缅甸一如既往拒绝指控。

缅甸；联合国

8 月 28 日 联合国专家小组报告指责沙特和阿联酋在也门犯下战争罪或纵容战争罪。报告还指出，也门内战中的胡赛反对派组织也犯下罪行。但报告称，多数伤亡来自沙特联军的空袭。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联合国；也门

8 月 31 日 美国宣布将停止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 UNRWA)提供任何资金。德国政府承诺将大幅增加对该机构的资助。

UNRWA;美国

8 月 31 日 纳米比亚批准 CCM。

纳米比亚

9 月

9 月 2 日 由联合国支持的 GNA 宣布的黎波里及其郊区进入紧急状态。此前，敌对武装组织之间的战斗持续了几天。至少 39 人在暴力中丧生，近 100 人受伤。

利比亚

9 月 5 日 英国警方指控两名俄罗斯男子亚历山大•彼得罗夫和鲁斯兰•波什罗夫在 3 月份企图谋杀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英国政府表示，这两人隶属于俄罗斯情报机构。

CW；俄罗斯；英国

9 月 11 日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境口岸自 1998 年以来首次重新开放。

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

9 月 12 日 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叛军领袖马沙尔，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签署了关于解决南苏丹冲突的和平协议。

南苏丹；和平协议

9 月 12 日 欧盟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禁止完全自主的 LAWS。

欧盟；LAWS

9 月 15-16 日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奥罗莫族中心地带，发生针对少数民族的暴力事件，至少 23 人丧生。

埃塞俄比亚

9 月 17 日 俄罗斯和土耳其同意建立并监督非军事缓冲区，以保护叙利亚

伊德利卜省平民。俄罗斯；叙利亚；土耳其

9 月 17-18 日　一架俄罗斯军机在叙利亚海岸被叙利亚防空炮火击落。俄罗斯最初指责以色列，但第二天表示，袭击飞机的不是以色列。

以色列；俄罗斯；叙利亚

9 月 18 日　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开始谈判解决边界争端。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勒和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夫维尔基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峰会上举行了会晤，这是十多年来两位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

吉布提；厄立特里亚

9 月 18-20 日 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朝鲜平壤，这也是朝韩领导人 2018 年第三次峰会。平壤声明称，朝鲜将允许国际观察员监督朝鲜关闭导弹试验基地，并表示，如果美国采取“相应措施”，朝鲜愿意永久拆除延坪岛主要核设施。

朝鲜；核裁军；韩国；美国

9 月 22 日 伊朗阿瓦兹市的一场阅兵式发生袭击事件，造成 25 人死亡，近 70 人受伤。　IS 和当地一个反叛组织都声称对袭击负责。伊朗指责当地叛乱组织，但也职责该组织背后是海湾国家和美国。

伊朗；IS；美国

9 月 30 日 前马其顿共和国就将国名改为北马其顿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率达不到 50%的最低要求，但 90%以上的人都支持这一改变。因此，该国总理誓言要推进这一改变。

北马其顿

10 月

10 月 1 日 作为朝韩之间建立信任的一部分，朝鲜和韩国的军队开始在非军事区两个地点清除少量地雷。

朝鲜；韩国；地雷

10 月 2 日 著名记者、沙特阿拉伯政府的批评者贾马尔•哈苏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沙特领事馆内失踪，后发现在领馆被杀。沙特官员最初否认与贾马尔失踪有关。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

10 月 4 日 荷兰、英国和美国官员指责俄罗斯情报官员在全球范围内对调查俄罗斯不当行为的调查人员发动网络攻击。

网络安全；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

10 月 7 日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平壤会面，并同意举行第二次美朝峰会。

朝鲜；美国

10 月 8 日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警告称，全球变暖可能在 12 年后变得不可逆转。

气候变化；IPCC

10 月 12 日 一支以洪都拉斯人为主体的中美洲移民车队从洪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出发，前往美国。它是在 10 月初通过草根社交媒体运动组织起来。

洪都拉斯；移民车队

10 月 15 日 冈比亚成立真相和解与赔偿委员会，调查前总统叶海亚•贾梅 22 年统治期间的虐待行为。

冈比亚

10 月 15 日 朝鲜和韩国就公路和铁路联通达成协议，尽管该计划可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

朝鲜；韩国；制裁

10 月 16 日 朝鲜和韩国开始就解除边境村庄板门店的武装进行谈判，并允许警卫和游客自由穿越分界线。

朝鲜；韩国

10 月 17 日 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地带 20 个目标发动空袭，以报复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遭受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巴勒斯坦

10 月 17 日 国际刑事法庭(ICC)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发出严厉警告，称可能将对加沙地带的战争罪行进行调查。

国际刑事法庭；以色列；巴勒斯坦

10 月 18 日 坎大哈警察和情报机构负责人在一次袭击中丧生，塔利班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阿富汗；塔利班

10 月 19 日 沙特官员承认 10 月 2 日在土耳其发生的贾马尔•哈苏吉意外死亡事件。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

10 月 19 日　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将退出 1987 年签署的《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INF 条约)。

美国；INF 条约

10 月 20-21 日和 27 日 原定于 2016 年举行的议会选举最终在阿富汗举行，尽管塔利班袭击了全国各地的投票站。最终结果将于 12 月 20 日公布。

阿富汗

10 月 21 日 埃塞俄比亚与奥加登民族解放阵线达成和平协议。

埃塞俄比亚

10 月 23-24 日　索马里索勒地区，敌对部族民兵组织之间的战斗导致至少 40 人死亡。

索马里

10 月 26 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中国；日本

10 月 27 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四方峰会上，法国、德国、俄罗斯和土耳其领导人参加了叙利亚和平谈判。

法国；德国；俄罗斯；土耳其；叙利亚和平进程

10 月 27 日　IS 杀害了至少 40 名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暂时夺回了早些时候丢掉的叙利亚东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地区。

IS；叙利亚

10 月 30 日　美国宣布将派遣 5200 多名士兵前往墨西哥边境，与此同时，一支由数千名中美洲移民组成的大篷车队正驶向美国。

墨西哥；移民车队；美国

10 月 31 日　在加拿大的指挥下，北约伊拉克特派团(NMI)正式启动。

北约；伊拉克；加拿大

11 月

11 月 2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8 国获得豁免。

伊朗；制裁；美国

11 月 6 日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UNAMI)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的一份联合报告称，在伊拉克一度被 IS 控制的地区发现了 200 多个乱葬岗，其中有多达 1.2 万具尸体。

伊拉克；IS; OHCHR; UNAMI

11 月 9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向在也门作战的沙特联军提供空中加油援助。

沙特阿拉伯；美国；也门

11 月 9 日 塔利班代表和阿富汗高级和平委员会成员的会谈，在俄罗斯主持下召开。

阿富汗；俄罗斯；塔利班激进伊斯兰组织

11 月 9 日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数起炸弹袭击，造成至少 53 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青年党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青年党；索马里

11 月 12 日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互联网治理论坛(IGF)上发起网络空间信任与安全巴黎倡议。

网络安全；法国

11 月 12-13 日 利比亚两大政治势力领导人在意大利主办的会议上，实现了五个多月来的首次会晤，这是朝着重新制定联合国和平计划和 2019 年选举迈出的一步。

利比亚

11 月 12-13 日 以色列特种部队进入加沙地带后，一名以色列军官和七名巴勒斯坦人(包括一名当地哈马斯指挥官)被杀。经过两天的战斗，在埃及的调停下，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以色列；巴勒斯坦

11 月 14 日 联合国安理会解除自 2009 年起对厄立特里亚实施的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等制裁。

厄立特里亚;联合国制裁

11 月 14 日 8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和至少 12 名刚果士兵在刚果民主共和国(DRC)东北部针对叛军的联合军事行动中丧生。

DRC；埃博拉；联合国维和部队

11 月 18 日 一年一度的亚太经济(APEC)峰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闭幕，但由

于美中两国存在分歧，自 1993 年 APEC 领导人首次会议以来首次未能就最终公报达成一致。

APEC；中国；美国

11 月 19-20 日 《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二十三次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商定 2019 年方案和预算。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化武组织

11 月 21-23 日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年度例行会议。

CCW

11 月 21-30 日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四次审议大会在荷兰海牙举行，但未能达成共识。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11 月 24 日 阿勒颇发生化学武器袭击，造成 100 多人受伤，叙利亚呼吁联合国谴责叛军。攻击的来源和使用的物质尚不清楚，但禁化武组织正在调查。

CCW

11 月 25 日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关闭了墨西哥提华纳的边境通道，并向大约 500 名试图逃避墨西哥警方边境封锁的中美洲移民发射催泪瓦斯。

墨西哥；移民车队；美国

11 月 25-26 日 俄乌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在刻赤海峡附近开火并劫持三艘乌克兰海军舰艇。第二天，乌克兰议会批准了总统波罗申科提出的在乌克兰实施 30 天戒严令的建议。

俄罗斯；乌克兰

11 月 28 日 在瑞士日内瓦，阿富汗总统加尼宣布了一项新的升级版和平计划，该计划基于先前喀布尔进程的基础，并表示实施将需要五年时间。

阿富汗；喀布尔进程

11 月 28 日 美国参议院以 63 票对 37 票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案》，决定限制美国在也门的行动。

沙特阿拉伯；美国；也门

11 月 29 日 真相委员会在哥伦比亚开始启动，旨在评估国内武装冲突的根源并促进民族和解。

哥伦比亚

11 月 29 日 美国总统指令草案提出了建立太空部队计划。

美国；太空部队

11 月 30 日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以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新的三边协定将被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仍然需要得到所有三个国家的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那之前仍然有效)。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NAFTA；USMCA

12 月

12 月 2 日 据报道，塔利班在阿富汗南部的最高指挥官毛拉•阿卜杜勒•马南在美军空袭中丧生。

阿富汗；塔利班；美国

12 月 2 日 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宣称对印尼巴布亚省至少 31 人死亡事件负责。

印尼

12 月 4 日 美国宣布将在 60 天内退出《中导条约》，除非俄罗斯重新遵守该条约。

INF 条约；俄罗斯；美国

12 月 4-7 日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年度会议仅就 8 月专家会议的成果达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识，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BWC

12 月 6 日 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联盟同意交换近 5000 名囚犯。这是在瑞典和谈开始时商定的几项建立信任措施中的第一项。

沙特阿拉伯；也门

12 月 10 日 164 个国家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契约》。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旨在协调全球移民行动的国际协议。

GCM；移民；联合国

12 月 11 日 冈比亚批准 CCM。

冈比亚；CCM

12 月 11 日　一名持枪者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圣诞市场杀死 5 人，打伤 11 人。两天后，袭击者被警方击毙。IS 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IS；法国

12 月 13 日　联合国在瑞典主持了为期一周的和平谈判后，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在也门港口城市荷台达达成停火协议，允许人道主义救援进入。

沙特阿拉伯；联合国；也门

12 月 13 日　美国参议院投票结束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也门战争的支持，并谴责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杀害贾马尔•哈苏吉。

沙特阿拉伯；美国；也门

12 月 14 日　在波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就实施 2015 年巴黎气候协议的规则手册达成一致，但因一些棘手的问题被推迟。

气候变化；巴黎气候协议；联合国

12 月 14 日 科索沃议会批准了政府计划，将轻武装的科索沃安全部队转变为国家军队。

科索沃

12 月 14 日　俄罗斯建议与美国讨论相互检查，以挽救《中导条约》。

中程核导弹条约;俄罗斯;美国

12 月 15-16 日 美国对索马里甘达赫的青年党据点发动六次空袭，击毙 60 多名疑似武装分子。

青年党；索马里；美国

12 月 17 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球难民公约》，该公约以现行的难民待遇国际法为基础。联合国;全球难民公约

12 月 17 日　美国官员会见了在阿联酋的阿富汗塔利班代表，为未来的和平谈判奠定基础。

阿富汗；塔利班；美国

12 月 19 日　联合国大会 152 个国家签署 GCM。

UN;GCM

12 月 19 日　俄罗斯表示将不允许美国检查其可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美国称这违反了《中导条约》。

中程核导弹条约；俄罗斯；美国

12 月 19 日　特朗普总统下令 2000 多名驻叙利亚美军全面快速撤离，并宣布战胜 IS。

IS；叙利亚；美国

12 月 20 日　特朗普总统下令从阿富汗撤出大约 7000 名美军，这将使美国军事存在减半。

在美国决定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后，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宣布辞职。

阿富汗；美国

12 月 22 日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青年党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 16 人死亡，20 多人受伤。

青年党；索马里

12 月 24 日　阿富汗公共工程部在喀布尔遭到袭击，造成至少 43 人死亡，25 人受伤。尚不清楚是谁实施了袭击。

阿富汗

12 月 28 日　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在几个城镇上空升起了博科圣地旗帜，并占领了一个多国军事基地。

博科圣地；尼日利亚

12 月 29 日　埃及安全部队在西奈北部和吉萨的三次袭击中击毙了 40 名激进分子嫌疑人。一天前，一辆旅游巴士遭到炸弹袭击，造成 4 人死亡。

埃及

12 月 30 日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选举在推迟两年之后终于举行。

刚果民主共和国

作者简介

西比勒•鲍尔博士(德国)，SIPRI 军备和裁军研究主任。自 2018 年起，她同时担任 SIPRI 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项目主任，此前曾领导并创建 SIPRI 军民两用和武器贸易控制项目。在此领域，她设计和并执行欧洲和东南亚能力建设活动。2003 年加入 SIPRI 之前，曾任布鲁塞尔欧洲研究所(ULB)研究员。其最新出版物包括 SIPRI 背景文件，《3D 打印与导弹技术控制》(2017 年 11 月，合著)；《欧盟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实施中的挑战和成功经验:跨部门分析》(SIPRI，2017 年 7 月，合著);并为核裁军进程推进奠定基础(SIPRI，2018 年 4 月，合著)。

文森特•布兰宁博士(法国/瑞典)，SIPRI 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研究与新兴军事和安全技术的生产、使用及控制相关问题，尤其是网络监控工具和自动化武器系统。布兰宁博士目前正主持一个为期一年的研究项目，研究技术和工业进步使武器系统自动化程度得以提升。文森特•布兰宁拥有巴黎高等教育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

科利亚•布罗克(德国)为 SIPRI 军民两用品贸易管控项目研究助理。其研究领域为防扩散和出口管制，重点是合规性、技术转让、增材制造和武器贸易条约。此前，曾在 SIPRI 和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出口控制办公室(BAFA)实习。曾就读伦敦国王学院，并获得不扩散与国际安全硕士学位。最新著作包括《新兴技术对出口管制的挑战:控制增材制造和无形技术转让》(2018 年 4 月，合著)和《中东和北非武器转让和 SALW 管制：规划能力建设努力》(2018 年 11 月，合著)。

马克•布罗姆利(英国)，SIPRI 军民两用品和武器贸易管制项目主任，其研究领域为国家、区域和国际武器贸易管控，此前曾任英美安全信息委员会(BASIC)政策分析师。其最新著作包括

《中东和北非武器转让和 SALW 管制：规划能力建设努力》，SIPRI 背景文件(2018 年 11 月，合著)，《软件和技术转让对不扩散努力的挑战：实施和遵守出

口管制》，(SIPRI,2018 年 4 月，合著)，《出口管制，人类安全和网络监控技术：审查欧盟两用法规的拟议变更》，(SIPRI，2017 年 12 月)。

伊恩•戴维斯博士(英国)，SIPRI 年鉴执行编辑和 SIPRI 军备和裁军领域副高级研究员。2014-16 年，戴维斯博士曾担任 SIPRI 编辑部、出版部和图书馆部主任，负责监督编辑团队，管理部门预算和工作流程。加入 SIPRI 之前，曾担任数个高级职位，并出任人类安全和军备控制独立顾问。戴维斯博士长期从事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并撰写北约问题相关博客。最新发表的著作包括同 I•夏皮洛和 A•图兹合著的《建立一个开放和负责任的北约》,《北约宪章》(耶鲁大学出版社，2018 年)和《英国核武开支是多少？》基础研究报告(2018 年 11 月)。

泰蒂•埃拉斯托博士(芬兰)，SIPRI 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领域核武器项目研究员。其目前研究重点为伊朗核协议、禁止核武器条约、美国/北约-俄罗斯导弹防御争端以及全球裁军和不扩散制度。此前，她曾就职于华盛顿犁头基金;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维也纳裁军和不扩散中心;芬兰坦培尔和平研究所。最新出版物包括：《不扩散条约》和《第三方核武器条约：相互冲突或兼容的核武器条约？》，SIPRI 和平博客(2019 年 3 月 6 日)；“中东裁军缺位：不扩散条约的眼中钉”，SIPRI 和平安全观点(2019 年 1 月)；以及《剖析国际社会对伊朗导弹的担忧》，SIPRI 专题背景文件(2018 年 11 月 15 日)。

奥德•弗勒兰特博士(加拿大/法国)，SIPRI 武器和军费支出项目主任。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军火市场转型和供需动态互动分析。此前，曾任巴黎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武器和防务经济学主任。弗勒兰特博士在军事学院和 SIPRI 任职期间撰写了多篇军工和军费开支的文章。最新著作包括《2017 年世界军事支出趋势》、SIPRI 简报(2018 年 5 月，合著)和《2017 年国际武器转让趋势》、SIPRI 简报(2018 年 2 月，合著)。

香农•N•凯勒(美国)，SIPRI 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项目高级研究员和核武器项目负责人。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核武控制和不扩散，对伊朗和朝鲜的核项目

研究颇深，研究同时涉及伊朗和中东相关地区安全问题。1994 年以来，凯勒为 SIPRI 撰写大量出版物，包括关于核武器控制和核力量以及武器技术相关章节。

乌格纳•科玛蒂塔(立陶宛)为 SIPRI 核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方案的实习生。她致力于与核裁军核查和《禁止核武器条约》相关问题。科玛蒂塔获伦敦国王学院军控和国际安全硕士学位。最新出版物包括《核裁军核查实施》，SIPRI 工作文件(2018 年 4 月合著)。

汉斯•M•克里斯滕森(丹麦)，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核信息项目主任，SIPRI 副高级研究员。经常为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提供相关核武器问题的咨询，并与人合著《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核笔记本》专栏。最新出版物包括《新 START，究竟什么可以真正控制美俄核武器》，俄罗斯(2017 年 2 月)，《日渐迫近的核战争威胁和健康社区的重要性》，《世界医学杂志》(2016 年 10 月)，《核武库:当前发展趋势及功能》，《国际红十字会评论》(2016 年 7 月,合著)。

亚历山德拉•库伊莫娃(俄罗斯)，SIPRI 武器和军费支出项目研究助理。负责 SIPRI 军事支出、军火和武器转让数据库，重点关注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后苏联国家。加入 SIPRI 之前，库伊莫娃曾在俄罗斯外交部新挑战与威胁司实习，还曾在摩洛哥艾萨阿迪大学和开罗州立大学完成暑期实习。最新著作包括《保加利亚和黑海安全》、《格鲁吉亚和黑海安全》、《罗马尼亚和黑海安全》、《俄罗斯和黑海安全》、《土耳其和黑海安全》和《乌克兰和黑海安全》(2018 年 12 月合著)。

拉比基特里(法国)，比利时佛兰芒和平研究所研究员，致力欧洲武器转移研究。2018 年 7 月至 12 月，在 SIPRI 军民两用品和武器贸易控制项目实习，负责在世界各地区武器贸易条约执行中加强国际合作。研究方向为武器贸易管制、小武器轻武器扩散以及枪支相关犯罪。拉比基特里获得法国理工学院和德国明斯特大学国际和欧洲管理硕士学位。曾在德国国防部和和平与安全研究与信息小组接受培训。

菲利帕•伦佐斯博士(挪威)，伦敦国王学院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 SIPRI 军

备和裁军副高级研究员。她还是《原子科学家公报》生物安全专栏作家、生物科学杂志副主编和《生物与毒素武器公约》非政府组织协调员。作为资深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伦佐斯博士积极参与生物裁军和防扩散事业逾 15 年。伦佐斯博士编辑《21 世纪生物威胁：政治、人民、科学和历史根源》(450 页)，2016 年帝国学院出版社出版。

贾伊尔•范德•金(荷兰)，SIPRI 和平行动和冲突管理项目负责人，同时也是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米根内梅亨大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和平行动的未来、和平行动评估和影响因素，以及和平任务多重执行手段。最新出版物包括《和平建设和摩擦:冲突后社会的全球和地方冲突》(劳特利奇出版社,2016,合编)，《维和部队受到威胁?》，《联合国和平行动的致命趋势》，《SIPRI 政策简报》(2015 年 9 月，合著)，《非洲方向：在和平行动中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SIPRI，2017，合著)；以及《多边和平行动与来自有组织犯罪的挑战》，SIPRI 背景文件（2018 年 2 月）。

乔凡娜•马利塔(意大利)，SIPRI 军民两用品和武器贸易控制项目研究助理。研究领域涉及出口管制研究，包括合规和执行，尤其关注欧盟(EU)成员国的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政策。马利塔还参与了 SIPRI 在欧盟不扩散与裁军联盟中作用的相关活动。此外，马利塔的工作还涉及制定武器转让和 SLAW 管制领域合作和援助活动，以及《武器贸易条约》(ATT)执行的相关活动。

凯特隆•麦克利什博士(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室(SPUR)高级研究员，也是哈佛苏塞克斯化学和生物武器项目联合主任。研究重点为在高效执行《化学武器公约》和《生物武器公约》中政府对军民两用品的管控，以及如何构建有效机制防止合法科学技术的滥用。其最新研究包括对过往化学和生物战的回顾；审议化武使用指控；同时审查非政府行为者在化学和生物裁军中的作用。

蒂莫•斯密特(荷兰/瑞典)，SIPRI 和平行动和冲突管理项目研究员，负责 SIPRI 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并对和平行动趋势和各种相关主题问题进行研究。2014 年重新加入 SIPRI 之前，曾在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议会大会工作。最新著作包括《妇女参与 UN，EU 和 OSCE 和平行动》，SIPRI 政策文件(2018 年 10 月，合著)和《多边和平行动与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的挑战》，SIPRI 背景文件(2017 年 11 月)。

丹•史密斯(英国)，SIPRI 主任，长期从事各种冲突与和平问题研究和出版工作。目前工作重心为气候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关联、中东和平与安全问题以及全球冲突趋势。曾在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咨询小组任职 4 年，其中 2 年(2010-11 年)担任主席。2014 年至 2017 年，任曼彻斯特大学和平与冲突教授。丹•史密斯历年来一直编撰政治、战争与和平、中东问题专题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博客专栏作家。

南天博士(南非)，SIPRI 武器和军费支出项目研究员，负责领导军费开支研究项目。其研究方向为非洲和拉丁美洲，重点关注军费开支和国内冲突的原因和影响，以及与军费预算、开支和采购透明度和可信度相关问题。此前，曾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担任气候变化经济学家，并在开普敦大学任讲师。南天博士在《国防与和平经济学》、《和平与安全经济学期刊》、《和平经济学》、《和平科学和公共政策》发表文章多篇。

埃内肯•蒂克博士(爱沙尼亚)，芬兰于韦斯屈莱网络政策研究所(CPI)网络实力和影响力负责人。2012-13 年、2014-15 年和 2016-17 年，她向国际安全背景下信息和电信领域发展向联合国政府专家组爱沙尼亚专家提出建议。目前在塔林理工大学(TalTech)教授一般数据保护法规和网络运营课程。其最新出版物包括《网络领域战略演变档案》（IISS/劳德里奇出版社，2016 年）、《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中负责任国家行为的自愿、无约束力规范：评论》(UNODA，2018 年，合著)和《边界：相持中的网络外交》(NUPI，2018 年，合著)。

彼得•托皮奇卡诺夫博士(俄罗斯)，SIPRI 裁军、军控和不扩散项目高级研究员，研究核不扩散、裁军、军控和新技术对战略稳定的影响相关问题。2018 年加入 SIPRI 之前，他曾在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国家研究所国际安全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2006 年至 17 年，托皮奇卡诺夫是卡内基莫

斯科中心防扩散项目研究员。2009 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研究所获得历史博士学位。最新出版物包括《美苏/俄关于印度核武器计划的对话》,《战略分析杂志》(2018 年 5 月)，以及《为实现核裁军创造条件》，SIPRI 工作文件(2018 年 4 月，合著)。

麦克•维尔布鲁根(荷兰)，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博士研究员。2016 年到 2017 年，在 SIPRI 担任研究助理，研究新兴军事和安全技术。其专业领域为新兴军事技术对军备控制的挑战，尤其关注不断变化的科学技术对军事创新的影响，以及军控机制在新兴军事技术管控中的潜在协同作用。维尔布鲁根拥有奥斯陆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方向哲学硕士学位，曾在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和荷兰外交部防扩散、裁军、军备控制和武器出口控制部接受培训。

皮耶特•D•魏泽曼(荷兰/瑞典)，SIPRI 武器和军费支出项目高级研究员。自 1994 年以来，魏泽曼为 SIPRI 众多出版物撰稿，包括 SIPRI 全球武器转让、武器工业和军费支出趋势年度报告。魏泽曼还发表多篇关于中东军费开支、多边武器禁运、非洲非法武器流入和欧洲军工企业相关报告。2003 年至 2006 年，担任荷兰国防部武器扩散问题高级分析师；2017 年，联合国军费开支报告审议期间，担任联合国政府专家小组技术专家。

西蒙•T•魏泽曼(荷兰)，SIPRI 武器和军费支出项目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武器转让、军费开支和军火公司监控，尤其关注亚太和前苏联地区，冲突中武器使用，武器转让透明度，以及常规军事技术发展。其最新著作包括《北极军事能力:北极的新冷战?》， SIPRI 背景文件(2016 年 10 月)；黑海沿岸六个国家和黑海安全的背景文件(2018 年 12 月，合著)；《2018 年世界军费支出趋势》，SIPRI 简报(2019 年 4 月，合著)；《2018 年国际武器转让趋势》，SIPRI 简报(2018 年 2 月，合著)。